

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坂本龙马

明治维新

与

MARIUS B. JANSEN

[美] 马里乌斯·詹森 著

曾小楚 译

新

上海三联书店

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MARIUS B. JANSEN



坂本龙马
与
明治维新

[美] 马里乌斯·詹森 著

曾小楚 译

上海三联书店

SAKAMOTO RYOMA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by Marius B. Jansen

Copyright © 199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 © 1961 Marius B. Janse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Beijing Imaginist Time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9-2018-1181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 / (美) 马里乌斯·詹森 (Marius Jansen) 著；
曾小楚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5

ISBN 978-7-5426-6630-7

I. ①坂… II. ①马… ②曾… III. ①明治维新 (1868) —研究
IV. ① K313.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3457 号

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

[美] 马里乌斯·詹森 著 曾小楚 译

责任编辑 / 杜 鹃

特邀编辑 / 鲁兴刚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责任印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0)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A座6楼

邮购电话 / 021-22895540

印 刷 /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 349千字

图 片 / 22幅

印 张 / 16

书 号 / ISBN 978-7-5426-6630-7/K · 519

定 价 / 7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推荐序：一个维新的交易员

一

他执意要送我坂本龙马牌的袋冲咖啡。在包装盒上，是那张著名的照片：这位土佐志士身着松松垮垮的和服，双手背后，一头乱发向后拢去，一把短刀斜插在腰间，昂首远方。他眉毛粗重，双眼眯成一条狭长缝隙，紧闭的嘴角向下撇去，显得踌躇满志又漫不经心。这神情也是志士们对自己的普遍期许——心系日本之命运，却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 1853 年黑船来袭与 1868 年明治维新肇始之间，这些来自不同藩的志士，是推动日本改变的最活跃力量。很可惜，这张照片的一角被裁剪掉，坂本龙马的那双皮鞋消失了，他的另一个特性也因此遮蔽：在这群志士中，他不仅以眼界开阔、勇敢无畏著称，还是他们中最时髦的一位。他喜欢西洋的手枪，用皮鞋替代木屐，还是第一个旅行结婚的日本人。或许也是个咖啡的爱好者，至少这盒袋冲咖啡宣称，这是“龙马爱过的咖啡”。

金子刚先生是咖啡出品人。他年近六十，消瘦、挺拔，脸上总

是挂着微笑，曾经营过多年的日本料理与西餐厅。他泛黄的头发、有些凹陷的眼眶，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长崎的外来因素。在漫长的德川时代，这座城市是日本唯一的对外窗口，欧洲的影响渗透到食物、建筑、语言、风俗甚至人的基因。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在一间狭长安静的办公室里，金子刚讲起 18 年前他前往高知县——在德川年代，这是土佐藩，坂本龙马正是从这里走向全国性的舞台——说服了这些故乡人，授权给他坂本龙马品牌，创造了这一款咖啡。这也是日本的另一个有趣之处，它的历史人物既有神一般的地位，备受崇敬，又有一种奇特的亲切感。他们被制成玩偶、进入漫画、拍成偶像剧、进入商业广告，像是你身边的朋友。各地都会组成协会，他们研究、讨论这些人物，寄托自己的个人期望，寻找社群的慰藉。在这些历史人物中，坂本龙马的角色尤其突出，也最受欢迎。他不仅创造了历史功业，还对当代人有致命的吸引力，软银的创始人孙正义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他的追随者。

这个形象是事实与传说的混合体，每个时代都按自己的方式塑造他。第一部关于坂本龙马的小说，出版于 1883 年。那正是自由民权高涨之时，龙马被塑造成一个民主与宪政的先行者。土佐藩虽已变成了高知县，但他的昔日伙伴板垣退助成为这场运动的中坚力量；1920 年代，众多小说将他塑造成一个和平主义者、一个为自由而战的人，这响应了大正民主浪潮；到了 1940 年代初，他又摇身变成了帝国海军的先驱、狂热的爱国者。

而金子刚与孙正义崇拜的龙马，来自司马辽太郎。这位历史作家在 1962—1963 年间的一份杂志上连载了《奔跑吧，龙马》，将他

塑造成幕末维新中最重要的英雄。与传统的武士不同，他是一个战略家、一个联盟缔造者、一个永远拥抱新事物的人物。这也是个励志故事，龙马并非天生不凡，甚至到了12岁仍会尿床，但全凭个人意志与远见，开创了自己的命运。这个形象正与战后的日本新精神吻合，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的日本，要用贸易与商业重新证明自己。这套历史小说不仅卖出了2400万册之巨，还被一次次地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漫画。

“我喜欢他的企业家精神，能无中生有。”金子刚说。四十年前的大学时代，他也是司马辽太郎的热情读者。如今，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长崎的坂本龙马学会的副会长。在一家坂本龙马主题的居酒屋，我还见到了消瘦、内敛的会长，身穿龙马式的和服，只是腰间少了一柄短刀。他在长崎大学学习水产科时，就为龙马的胸怀大志与实干精神所吸引。

他们创建了这个社团，举办各式聚会，与遍布日本各地的相似组织，分享对龙马的理解。他们还在凤头山上集资兴建了龙马的铜像。他双臂抱怀俯视着长崎港，似乎不仅给昔日，也给此刻的日本，指出了方向。

二

在长崎的一家海港酒吧，我喝着麒麟啤酒，翻阅着手边的《坂本龙马和明治维新》。已故的马里乌斯·詹森是英语世界最重要的日

本权威之一。他在日本研究中的地位，类似于费正清之于中国研究。他 1922 年出生于荷兰，还是个婴儿时就到了美国。他原本在普林斯顿研修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欧洲史，但战争改变了他。冲绳服役的经历，让他对日本发生兴趣。1969 年，他出任普林斯顿刚设立的东亚系主任。詹森可以同时用英文与日文书写，出版的著作超过 20 本。《坂本龙马和明治维新》出版于 1961 年，也是这位历史学家的成名作，出现在关于日本的各式必读书单中。

很可能，司马辽太郎的小说受到它的影响，但比起冗长且滑向个人传奇的小说，这是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詹森想借这个土佐藩武士短暂的一生，折射出幕府末年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这个常年封闭的社会如何应对突然到来的外来冲击，个体如何在这混乱中展现雄心、才华与勇气。

长崎是阅读这本书的理想地点。潮湿的海风拂面，夕阳下的港口，船影绰绰，间歇有黑色的山鹰从山上冲下，掠过海面。这个安静、诗意的港口曾经忙碌异常，自 1641 年德川幕府锁国以来，它是日本唯一被许可的对外窗口。在我所坐的酒吧不远处，就是出岛，在漫长的时间里，这个人工岛是日本主要的贸易中心。每年 8、9 月，季风把荷兰商船从巴达维亚（雅加达）吹到此地，带来胡椒、砂糖、玻璃器皿、天鹅绒，11 月后，再将铜、樟脑、漆器运出。贸易从来不仅关于货物，也与理念、思想紧密相连。尽管在欧洲人中，荷兰以实利主义著称，但这小小的出岛，仍变成了新知识中心。一些好奇心旺盛的日本人开始学习荷兰语，并从零星获得的著作中，开始钻研医学、天文学这些原本只能从中国人的书籍中获得的知识，由

此也诞生了“兰学”。

长崎也是各种新事物的体验之地，羽毛球、钢琴、咖啡、巧克力……我手中的麒麟啤酒也诞生于此，是日本本土酿造的第一款啤酒，它的制造者就生活在酒吧斜对面的山间。作为怡和洋行的大班，苏格兰人托马斯·格洛弗也卷入了幕末维新的浪潮之中。他出售舰船、大炮给萨摩人，还送年轻人前往英国读书；他相信萨摩藩与长州藩，而不是江户的幕府将军，才能代表日本的未来。他也认识坂本龙马。

长崎是坂本龙马展现自我的最佳舞台。1865年，他带着二十多名土佐藩人来到长崎，创办了一家商贸公司。时年30岁的坂本已经经验老到，动荡的社会环境逼迫他迅速成熟。

1835年，他出生在土佐藩一个富裕的乡土之家，当时日本似乎处于一种永恒的稳定之中。1603年统一日本的德川家康与其继承人，创造了一种精巧的统治机制。身在江户的德川将军是权力的中心，大名又是各自封地统治者，拥有自己的军队和官僚系统。将军用土地分封与参觐交代来控制大名。将军按“士农工商”划分了严格的社会等级，每个人被牢固地限制在土地与身份之中。与中国称读书人为“士”不同，日本的士是“武士”。

这个模式为德川幕府赢得两百多年的安定，但它的控制不可避免地松弛，无法适应一个更复杂的日本社会。大名生出了越来越强烈的自主意识，武士则日渐潦倒，在日益扩展的市场力量中，他们找不到位置，不满开始蔓延。在坂本龙马出生后不久，一场失败的天保改革更加剧困境。

直到前往江户之前，坂本龙马对此所知甚少，除去所属的村庄

及藩国，甚至不知日本意味着什么。像很多武士一样，他学习剑术、儒家著作与朴素的道德准则，其中一条是“片时不忘忠孝修行，此为第一要事”。

18岁的他在江户一家武馆深造时，黑船开入东京湾，江户城陷入恐慌，他与土佐藩士兵一起被派往品川备战。“异国船各处到来，如此则近日有战。其时，吾当取异国之首后回国”，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尽管当时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但像很多同代人一样，黑船事件是坂本龙马政治意识觉醒的开始。这些下层武士突然发现，他们有了开创命运的机会。

几年之后，坂本龙马被卷入到迅速兴起的“尊王攘夷”运动。德川幕府的政治机制的隐患显现出来，尽管依赖幕府的保护与支持，京都的天皇仍是名义上的统治者。二元权力结构创造的缝隙，让一部分不满幕府内政与外交政策的人士脱颖而出，其中既有势力强大的大名，也有雄心勃勃的宫廷官僚，更有下层武士，他们是其中最活跃的因素。

他们以“志士”自诩，宣扬一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在酒肆与伎馆痛饮畅谈，推崇暴力与自我牺牲。他们为陷入危机的日本找到一条简单、明确的道路，追随天皇而非幕府的权威，驱逐、攻击外国人以及这些外国力量的日本支持者——不管他们是官员还是学者。

坂本龙马也是“志士”的一员。除去纵情于风流韵事，他也试图刺杀著名的开国论者胜海舟。年长坂本12岁的胜海舟曾是个热忱的兰学者，还在长崎学习海军，驾驶航船前往美国，长期鼓吹培

养翻译人才、训练海军。他们的会面成了日本历史上最浪漫的传说之一，预谋的刺杀变成了促膝长谈，胜海舟对日本前途的分析让坂本大为折服。在给姐姐的信中，坂本称胜海舟是“日本第一人物”，并追随他前往神户开设海军学校与造船厂。这 18 个月的经验将这个土佐志士带入一个更开阔与复杂的世界，他逐渐了解西方，超越了地方藩国的日本概念，习得更成熟的处世之道，获得了一个新关系网络。

这种新能力令他在接下来几年脱颖而出。1860 年代的日本进入了一个更为颠簸的年代。天皇与幕府摩擦不断，将军继承人之争也不停歇，外样大名长州藩公然倒幕，英国人炮轰了马关与鹿儿岛，使两个最强大藩国意识到“攘夷”的不可行。

在 1865 年一片混乱的长崎，坂本龙马却看到一条新道路。他成立了名为“海援队”的商业组织，资金来源于萨摩藩。他邀请长州藩的伊藤博文与井上馨住进萨摩公馆，从格洛弗手中买到 7000 支来复枪，他还说服萨摩藩从长州藩购买大米。对于原本互相敌视的长州与萨摩来说，这种关系不可想象。坂本龙马奔走于九州、萨摩与京都之间，极力促成联盟的达成。他相信，只有这个联盟才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幕府，创造一个新日本。

到了 1867 年，他已确信幕府统治即将结束，开始憧憬一个新秩序。在前往京都的船上，坂本写下了八条改革计划：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当出于朝廷；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以参万机。万机决于公议；选有才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赐官晋爵，以为顾问，令除旧来有名无实之官；广采公议交际外国，新立至当之规约；折

中古来之律令，新撰定完善之大典；扩张海军；置亲兵以守卫帝都；金银货物与外国定宜当之法。

这就是著名的《船中八策》，尽管它不过是当时流行看法的总结，但诉诸文字后诞生出另一种力量。很多人相信，明治天皇的五条誓文正脱胎于此。

在京都，迎接坂本龙马的不仅是即将到来的胜利，还有突然的死亡。1867年12月10日夜晩，在河原町的一家酱油店里，坂本龙马被刺杀，年仅32岁，至今没人知道刺客是谁。死亡塑造了坂本的神话，他无须面对明治时代的新混乱，像他的朋友西乡隆盛那样从一个维新缔造者变成了叛军头领。在很多人眼中——比如他的土佐同乡板垣退助——长州与萨摩的获胜武士也成了新的压迫者，他们塑造了一种反民众的寡头政治。

三

回国后的一个早晨，我冲下一杯龙马咖啡，很可惜，并没有体验出它的独特之处。窗外的北京笼罩在冬日的萧瑟与雾霾之中。我忽然想起詹森对于那些“志士”的描述——“在冬季的江户，他们身穿薄薄的便服，光脚踩着木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他们不修边幅，而且大肆挥霍，必要时也不是不会向商人借款或者干脆强取豪夺……作为一群没有计划的革命者、正在寻找领袖的追随人，他们在摸索一个更有机会出人头地的社会。不过，他们身上也有一种真

正的爱国精神，而且相信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此时立刻采取果断的措施要比逻辑而理性的分析这种危险的内涵重要得多。”

不管历史学家对于幕末与维新做出了多少政治、经济、文化分析，多么强调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但人们总是倾向于记住（或猜想）那浪漫一刻，个人摆脱种种束缚，做出了大胆的抉择。坂本龙马多姿的一生以及他突然的死亡，使得他无疑成为一代人中最浪漫的一位。

许知远

2019年2月18日于东风乡

写在新版的前面

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三十三年了。得知读者对坂本龙马依然有浓厚的兴趣从而使它再版，我非常高兴。对研究日本现代史的历史学家而言，这证明了日本以及日本人看待自己过去的方式发生了某些变化。

1950年代我开始研究坂本时，他在大多数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并不太高。日本人深切意识到战争和占领给国家带来的变化，然而却常常倾向于将明治维新看作军国主义和战争的前奏。一轮又一轮毁灭性的军国主义和战争控制了他们的生活，摧毁了他们的城市。那些促成明治维新巨变的参与者和领导者最多只是一些模糊的形象。战前的教育也以对帝国现代化的贡献大小来衡量他们的价值。在这些人中间，相比于在现代政府和军队中占有绝对优势的萨摩和长州的成员来说，来自土佐这样的小藩的代表自然排在后面。

司马辽太郎以坂本为主题写的畅销历史小说，在改变公众对坂本的态度方面作用很大。他最近写道，从明治帝国政府的立场来看，坂本更可能被视为闹事者，甚至造反者，而不是英雄。他抛弃了祖

籍和家人，因而违背了孝道；他抛弃了自己的领主和藩国，因而违背了忠诚。他的提议影响了自由民权运动。此外，他并非来自萨摩和长州这两个为明治政府输送了大量领导者的藩国。官方的教科书很顺畅地从坂本的同时代人——西乡、木户、大久保——过渡到明治天皇的高官伊藤和山县。诚然，1891年，坂本和中冈在死后都被追封，但还是很难与萨摩、长州类似人物获得的功勋媲美。没有人需要一个土佐来的浪人。

在日俄战争中的对马海峡战役爆发前夕，坂本的名字出现在了日本的报纸上，进而被写进课本，但是这个故事也有些奇怪。据书中描述，皇后非常担心这场战役的结果，于是梦到有人走过来对她说，自己“是土佐的坂本龙马，曾经在德川幕府末期发挥过一些作用”，并叫她不必担心即将到来的这场战争。

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皇后显然从未听说过坂本。她向周围的人询问梦中人是谁时，来自土佐的侍臣田中光显不得不安慰她说，确实有个人叫这个名字。司马先生推断说，宫内的谈话极少泄露出去，因此这想必是宫里土佐藩的人士刻意公布。无论如何，这个故事虽然迅速为龙马取得了进入日本海陆军帝国先贤祠的资格，但它仍是一个老套的寓言故事，丝毫未能表达出坂本可能做出的真正贡献。

事实上，坂本在土佐当地成为神话传说，但在土佐以外的地方则很少被人们说起。他是浪人和动乱分子的形象，早早的离世使他对现代政府的影响非常有限。1950年代，只要我一说出自己的研究课题，得到的反应似乎总是怜悯和困惑，就像哈佛或哥伦比亚毕业

的高才生可能对一名自称在研究戴维·克罗克特* 政治思想的认真的日本年轻人的反应一样。

现在情况不同了，因为坂本已经成为维新时期最著名的英雄之一。是什么造成了这种转变？首先，日本帝国结束，并被和平民主的制度所代替，让人们对旧社会那些离经叛道者产生了新的兴趣。旧教科书中那些将军和海军上将们不得不让位于新日本的其他先驱。

其次，拜土佐当地历史学家们的不懈努力，重新认识坂本有了巨大的学术基础。本书中经常提及的平尾道雄是我深深敬重的一位学者。直到1979年去世，他一直笔耕不辍，参考了近2500种笔记、文章和书籍，增加并完善有关土佐的历史知识。他早年写的坂本传记已经多次再版，1966写的《龙马全传》（『竜馬のすべて』）则更加全面。平尾先生还与滨田龟吉合作，翻译了这本书，并且已经在时事通讯社多次再版。平尾的合作者宫地佐一郎继续他未竟的事业，于1988年完成了大部头著作《坂本龙马全集》。现在这本书已经成为优秀的文献资源。1991年，宫地先生再接再厉，编辑整理了《中冈慎太郎全集》。不过，最了不起的还是司马辽太郎的《坂本龙马》（1966）。这本杰出的历史小说使坂本完全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从那以后，适合各种年龄段的图书、杂志和文章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信息社会的技术进一步加快了坂本形象的传播。伴随着日本电

* 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 1786—1836），美国政治家和战斗英雄，被誉为“西部荒野之王”，曾当选代表田纳西州的众议员，并参加了得克萨斯独立运动。

——译注

影的伟大时代，坂本热出现。伊藤大辅导演的《幕末》（1970）将坂本塑造成一个仰慕西方科学技术，同时充满了民主思想的革命者。他说，如果在战前拍摄这部影片，他不可能表现出坂本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有多么不满。导演五所平之助在《挽歌》（1958）中主要讲述了寺田屋事件发生的始末，剧中坂本在和龙*交往时透露了阶级平等和男女平等的思想。而在篠田正浩导演的《暗杀》（1964）中，坂本在1860年以暗杀大老井伊直弼的刺客的朋友身份首次露面。也许最有名的要数黑木和雄导演的《龙马暗杀》（1974），剧中，导演着重强调了个人在变革和背叛的年代下的徒劳努力。^[1] 这些电影编剧利用坂本作为自己的（经常是革命性的）进步思想的支持者，但他们能够这么做，也是因为坂本已经成为一位有吸引力的进步历史人物。

余下的工作则由电视来完成。随着日本重拾了自信和财富，日本的媒体回到明治时代去寻找出发点。一系列大受欢迎的历史剧的播出，使坂本龙马等明治英雄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新的”坂本年轻而勇敢，显得与众不同，他非常乐观，可以很快地接受新思想。手枪好过刀剑，而商业好过战争。议会制好过世袭制，而民主则比大名统治更加切实可行。

结果，坂本成了战后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心目中一个颇有魅力且真实可信的人。京都灵山历史馆收藏了大量与明治维新有关的资料，有好几年，馆长都忙着接收年轻人向“坂本龙马”讨教个人

* 嵯崎龙，坂本的妻子。——译注

问题的信件，并一一回复。有时人们甚至致电历史馆，要求和“坂本先生”说话。就像《读卖新闻》的记者所说的，“在有关坂本的电影、电视剧和小说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似乎可以直接将他视为自己的同龄人”。坂本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些建议，比如有个孤独的年轻人收到的“试着加入一些社团”，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政府和民间都掀起纪念坂本及其意义的热潮。高知县建起了一座豪华的新博物馆，记录了18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的重大事件；高知机场附近有座私人的小博物馆，用生动的场景再现了坂本的一生，场景的英文解释即取自本书。不久前的1991年，高知县在桂滨海滩建起了一座“坂本龙马纪念馆”，不远处便是1920年代由几个青年组织私人捐建的坂本塑像。坂本龙马纪念馆是一栋引人注目的玻璃建筑，它指向远方的太平洋，见证了一个向世界开放的日本，见证着它的贸易和思想。这个形象正是坂本龙马留给当代日本的遗产。

马里乌斯·B. 詹森

普林斯顿，1994年8月

序言

19 世纪中叶的亚洲与西方世界一样，充满了动荡和不安。各种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造成的重大结果堪比美国的废除奴隶制和俄国的废除农奴制。然而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同样非常重要，因为西方的介入不同程度地加快或影响了亚洲的发展。即便在那些西方无意征服的国家，譬如日本，西方文明也对传统社会带去冲击。西方国家进步的活力、宪政、工业化，都明显提供了新的构想，吸引或排斥着那些渴望改变的人。1857—1859 年的印度士兵起义使英国开始了对印度的全面控制，1856—1864 年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则利用一种奇特的教义，试图将满族统治者赶出，建立一个新的政教合一的国家。太平天国没有得到精英阶层的支持，但他们军事上的成功让外国的科学技术首次被这个国家接受，因为对中国统治者来说，它至关重要。

世纪中叶的日本同样面临着西方的威胁。它紧随着印度和中国陷入了危机，但就像统治者所认为的那样，外国侵略从未是真正的危险。自 1858 年与汤森·哈里斯开始通商条约的谈判开

始，到 1867 年军事政权德川幕府垮台的十年间，积蓄已久的仇恨和矛盾终于爆发。当然，这段时期思想和政治上的骚动也孕育了明治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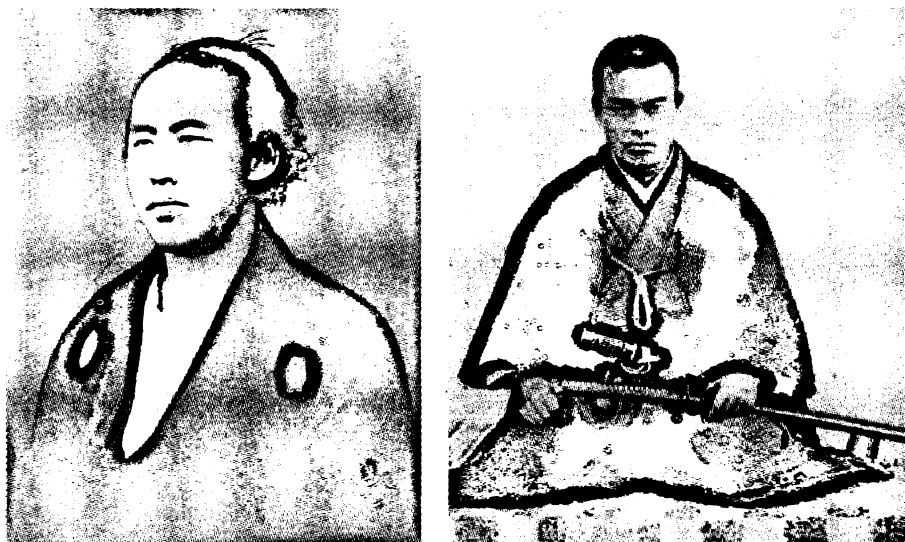
明治维新使日本成为努力与外国列强平起平坐，同时主导亚洲的统一国家。就像法国大革命对欧洲的影响一样，日本维新领袖的成功，激励着他们的亚洲邻国。孙中山、康有为、金玉均^{*}、埃米利奥·阿奎纳多[†]、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等人梦想着自己的国家也有日本那样的团结和驱动力，让亚洲首次拥有与欧洲列强平起平坐的能力。许多人将日本的成就归功于那些多姿多彩且具有献身精神的维新运动领袖，因此，维新的积极分子成了亚洲各国的英雄和榜样，激励着他们创造同样的功绩。在日本国内，明治维新的领袖们同样成为新的政治理想和榜样，即心怀理想、独来独往、英勇无畏而又全身心地投入帝国事业的爱国者——志士。二战前夕，日本的年轻军官正努力进行着 20 世纪的“昭和维新”，一边嘲笑传统的道德标准和条条框框，一边声称自己拥有上述这些品质。

鉴于日本维新的重要性和利害关系，西方学者对它的极端轻视不禁使人感到震惊。近年来，在日本社科学者的指引下，西方作家

* 金玉均（1851—1894），朝鲜王朝末期的政治家。1884 年发动“甲申政变”，成立新政府，但仅三天便宣告失败，后在上海被刺身亡。——译注

† 埃米利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 1869—1964），菲律宾共和国首任总统，菲律宾独立战争后期领袖。——译注

‡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as Chandra Bose, 1897—1945），印度激进独立派政治家，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印度国民军的最高指挥及印度国大党领导人。——译注



坂本龙马（左）与中冈慎太郎（右）

更加关心明治维新的“原动力”及其意义，而不是改革本身和实施改革的那些人。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是应该放在事件之后再来研究，而不是在此之前。

在本书中，我通过研究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对后者的介绍比较简略）一生的经历和思想来讲述明治维新的故事。这两人都来自土佐这个维新时期在政治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藩国。两人的出身都相对低微，而且都不是日本“西学专家”圈子里为人所熟悉的人物。他们的家乡土佐对维新有功，但并非维新的领导者，因此地方的政治势力和抱负一开始并没有让他们大量地接触西方事物，这一点与那些更强大的藩国有所不同。坂本和中冈在将军辞职后不久的1867年就被刺杀身亡，我们对他们维新活动的看法并没有受到他们后来

的尊显或者失败的影响。尽管如此，他们在维新的舞台上仍然扮演了重要且激动人心的角色。事实上，坂本多彩的一生，已经使如此多的日本作家和剧作家为其倾注心血，其罗曼史甚至已经或多或少掩盖了真正的事实。然而外国学者较少受到这种影响。那些已经出版的文献资料包含了足够多的个人特点，足以吸引传记作家和作者，并使他们有大量的机会将虚构的故事筛除掉，只留下事实。

我最初对志士，这些“有着高尚情操的人”产生兴趣，是在研究中国革命的时候。明治后期，那些自称“中国浪人”的日本冒险家及其中国朋友（例如孙中山）往往将自己比作维新英雄。随着对19世纪日本民主运动调查的深入，我把目光转向了维新时期的土佐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极其有趣且很有机会的领域，而且几乎从未有人涉足。极少有历史学家关注这个世界近代史上的伟大话题，因此，迄今为止，我的主人翁坂本龙马几乎没有在西方人关于日本的文献中被提及。为了讲述坂本的故事，我不得不将精力放在研究维新发生的过程，而不是研究目前日本普遍关注的它发生的原因。但毫无疑问，我也获得了与这些原因相关的一些启发性信息。志士的理想主义、奉献精神和大无畏精神通常与实用性及自我实现的愿望相结合，使之成为面对西方挑战时的某种回应。不管怎样，时代的影响和机会首先必须在个人身上起作用，在我看来，德川时代末期的社会有如此多样的动机和信仰，我们不可能用一种理论来概括其成因。

此番研究的许多基本资料，是我得到福特基金会奖学金的资助，于 1955—1956 年间在日本收集的。我在土佐时很幸运地认识了平尾道雄先生。他是当地历史的权威，所有日本人和许多外国历史学家都对他心存感激。在亚洲基金会的协助下，1958 年夏，平尾先生来到华盛顿大学，很快就成为研究德川时代土佐历史的研讨小组的核心。研讨小组的成果准备结成一本土佐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文献记录，目前仍处于准备阶段。得到华盛顿大学远东和俄罗斯研究所研究项目的大力支持，我在同事平贺延的协助下参加了这本书的编撰。我非常感激平尾先生，本书注释中频繁地引用了他的著作便可以看出这一点。我要感谢广江清为本书绘制了地图，他正在高知市公共图书馆的赞助下，着手绘制土佐的历史地图册。我要感谢高知县的吉村织丰（音译，Yoshimura Shokuho）和目前属于冈山县玉岛市的井上和夫（法官），他们帮我摄影，并慷慨地让我使用书中图片的复印件。普林斯顿大学提供了一笔补助金，使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关于书中出现的大量人名，我想最好是使用土佐当代的读法，相信参照索引，那些习惯将“山内”写成 Yamanouchi 而不是 Yamauchi 的读者是不会感到混淆的。所有的日期都已换成了西历，因为深入阅读的专家不会为将日期转换成日本旧历而感到头疼。但是名字则按照日本的写法，姓在前，名在后。除了一些最常用的地名外，名字中保留了长元音的长音符号。

我必须感谢华盛顿大学日本研究小组的同事们，在他们的帮助和鼓励下，我于 1958—1959 年完成了这本书的初稿。我对他们以及美国和日本的专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充满了感激之情。我还要

特别提到格蕾丝·布鲁尔小姐和安·亚尼太太，她们帮我完成了手稿。当然，对于本书中出现的所有未经说明的事实和翻译错误，我个人将承担全部责任。

马里乌斯·詹森

普林斯顿，纽约

1960年5月

目 录

第一章	坂本的日本 / 001
第二章	对西方的反应 / 047
第三章	勤王岁月 / 091
第四章	跟随胜海舟 / 153
第五章	萨长联盟 / 187
第六章	海援队 / 229
第七章	船中八策 / 281
第八章	维新 / 323
第九章	土佐的维新 / 359
注释 / 395	
年表 / 427	
参考文献 / 431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 443	
主要人物的生平简介 / 459	
索引 / 475	

第一章 坂本的日本

在日本的维新积极分子成长的过程中，知识上和政治上的特别体验，便是发现自己的国家无法有效地抵挡西方的侵略。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建议，希望以此来挽回国家衰弱、落后的局面。一些以前认为不错的改革措施，如今在绝望而紧迫的气氛下付诸实施。变革措施受到了西方人到来之前便已长期存在的紧张氛围的影响，但是这些措施却越来越受到追捧，因为人们希望可以借此实现强国梦。坂本龙马及同时代人所向往的改革，也受到了他们所了解的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因此，回顾一下维新领袖出生的 1830 年代，从那里开始讲起，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德川时代的背景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民众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有巨大的影响，” 1830 年，设在长崎的荷兰商馆馆长如是说，“因此我将简略介

绍一下日本政府，特别是长崎的地方政府，作为我下面这番描述的序言。”^[1]梅廉（Germain Felix Meijlan）的小册子尽管视野有限且有很多错误，但就像其他住在日本的荷兰人所说的，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证据，即尽管观察者自由受到限制，但也能看出许多日本的主要特点和问题。

19 世纪早期的日本，依旧是在 17 世纪几次大战之后形成的封建自治的组织形式。在多次取胜，并被享有声望而毫无实权的天皇任命为征夷大将军之后，德川家族的将军为了使自己的家族永远掌权，对自己的家臣和战败的敌人进行分封。最初几任德川将军几乎是随意地分封领土，随后则逐渐削减了昔日的对手、敌人（外样大名）的数量和领地，而对世袭的家臣（谱代大名）和属于同一家族的成员（亲藩大名）宠爱有加。亲藩大名和一些最负盛名的谱代大名成为管理国家事务的军事政府（幕府）的老中和阁僚的主要人选，幕府的首都设在江户（现在的东京）。幕府牢牢掌控着年产近 700 万石*大米的土地，这几乎是全国大米产量的 1/4，其中大约 300 万石大米的土地被分配给了地位在大名之下的直属家臣，即旗本。将军在自己信任的家臣中选出奉行、代官和目付等官职，并通过他们对这些土地以及自己的土地进行管理。将军的领地辽阔无比，有时一名代官管辖的地方比一些大名的还要大，收成也更多。但是由于采用轮换制，因此他们的职位和特权都在大名之下。大名级别的贵族

* 石，日本古代的体积单位，应用在粮食上时，1 石约为 0.18 立方米。中世末至近世，政府将土地的粗米标准产量称为“石高”，作为征税的依据。——编注

管辖的封地年产至少一万石大米。除了幕府代表的定期巡视和监督基督教传播的职责外，他们不受任何管辖。最重要的是，这些大名不必定期向幕府纳税。他们在礼节、戍卫和在江户出席方面的支出也非常有限。幕府有时会向所有的大名借一笔特别贷款，但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必要时幕府也会借款给大名。^[2]

大名虽然不用定期纳税，但却被一种灵活的措施控制，以致日本的历史学家有时会用“中央集权的封建制”这个词来表达这种反常的政治制度。贵族的婚姻和行动必须事先得到将军的许可；他们应该为幕府的计划慷慨解囊；未经许可不得修筑城堡等防御设施；不能私设关卡收费。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必须服从“参勤交代”的相关规定，轮流到将军位于江户的城堡中居住，不在江户期间，则要将继承人和妻子留作人质。前往江户的队伍在排场上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大名为此付出了巨大的花销，而他们住在江户期间，虽然不像之前那样操心军备，却又有人情往来和礼节方面的各种烦恼。藩主们住在江户期间需要主要家臣陪同，而且要维持各种设施，因此这项制度的影响远远超过了首当其冲的各位大名。对于那些跟在主人队伍中的低级仆从来说，它包括开销、冒险和机会。

最早的几代将军采取了各种控制措施，其中之一是防止主要大名在政治和社交上与京都宫廷联系过多。天皇的薪俸微薄，经济状况仅比低级的封建领主好一点，而那些宫廷贵族（公家）的薪俸则更低。将军派驻京都的代表，负责任命贵族为宫廷大臣以及为幕府传递消息等官职的事宜。^[3]幕府采取了特别措施，防止大名到京都去，而封建贵族和宫廷贵族之间的联姻也必须经过详细审查。可是，

随着升平日久，这些监管措施变得松弛了。1634年，第三任将军家光带领大队人马造访京都，就是为了震慑宫廷。而天皇要是胆敢越雷池一步，不久就会被强制退位。后来，随着儒学界日益尊崇天皇的正统地位，京都方面也并没有什么危险的迹象，这些早期的严格限制才逐渐松弛下来。主要的外样大名逐渐和宫廷贵族结亲，曾是近卫家资产管理人的萨摩藩岛津家族就和近卫家族长期保持姻亲关系，土佐藩的山内家族和三条家族建立了类似的关系，长州藩的毛利家族从早年的战争时期起便特别受到宫廷的宠爱。因此，在19世纪，这些藩国的代表希望能够进一步加强这种联系，一旦出现一位软弱、犹豫且无能的将军，他们便看到了机会并备受鼓舞。

日本政府规定，除了荷兰商人外，其他外国人一律不许入境。这种政策同样是担心变化和政权被颠覆的反映，但它与对大名和宫廷的政治控制迥然不同。虽然早期的将军清楚地意识到贸易带来的好处，并渴望扩大其规模，但是他们越来越肯定基督教将随之而来，最终出台了禁止基督教及传教士入境的法令。1637—1638年，随着最后一个支持基督教的商馆关闭，日本只与非天主教的荷兰人之间存在少量的贸易。荷兰人被迫住在长崎一处环境恶劣的、原来为葡萄牙人安排的地方，而且行动受到限制。后来他们的生活条件多少有些改善。即便如此，行动和交往均受到限制的梅廉在1830年用可怜的语气指出他知道的这种“友好关系”：“如果这就是对待朋友的态度，那么请上帝饶恕任何落入日本人之手的敌人！”^[4]

虽然早期几代将军实施的措施在1830年代看起来依然有效，但是表面之下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德川时代的社会建立在严

格的等级区分上，武士阶层统治着农民阶层，并靠他们的劳作供养自己。在儒家的职业等级中，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地位较低，而且生产力不高，因此国家没有向他们定期征税。可是，在德川家族统治的太平年岁里，治安和商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统治社会的军队却没有机会（或者说动力）调整或改善他们的组织结构或者作战技术。他们的官僚组织获得了高度发展，但作战能力显著下降。他们穿着祖先的铠甲，佩着祖先的佩刀，可是已经无法使上一次（在17世纪）用过的阵式和武器再向前发展^[5]，19世纪从西方引进新的作战技术和概念时，似乎对封建社会的特权和传统构成了威胁。在此之前，武士阶层一直集中在城镇，相对懒散地保护领主。在城市诱惑的影响下，他们已经丧失了勇武的气概，变得热爱享受和平的生活。在19世纪配备了先进武器的西方船只再次到来并引发恐慌前，他们极少有人对军事战术抱有切实的兴趣。有兴趣的人又分成不同的剑术和兵法流派，其内容自创立之日起便原封不动地保留，传承数代人。日本面对西方威胁的最初反应是意识到应该重新加强传统的军事训练，而领导和主宰1860年代反抗外国人运动的便是那些剑法已经过时的剑术家。

也许日本在军事方面没有取得什么重大进步，但在城市的工商业活动方面，无论是规模还是重要性都得到了发展，部分是因为那些为了保障武士阶层和德川家族首要地位而制定的政治制度产生了重要的经济后果。大名到江户参勤交代，离开了自己的领地，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卖掉大部分收到的米以支付旅途以及在江户居住的花销，而这也使得他们不得不和大阪的米商讨价还价。在江户和大

名城堡所在的城市里有越来越多离开自己封地和田产的家臣，他们被迫出售自己的大米，换取城市的生活所需。各地的武士阶层都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商人的帮助和服务。商人的财产没有法律保障，因此他们总是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在规则混乱或者松弛期间，商人通过与那些愿意牺牲儒家准则以换取利益的官员合作，获得了很大的影响力。然而，即便没有腐败，城市生活的种种问题也使讲究排场和喜欢摆阔的武士债台高筑。他们所受的教育和观念更看重面子而不是实际，使得他们拙于处理这些问题并为此烦恼不堪。在所有的生活领域，越来越多的关系表现为货币而不是实物交易，幕府决定用硬币支付家臣的工资即是货币经济增长的明证。货币的流通在将军自己的藩国最为活跃，那里的商人的影响力也要比外样大名控制的那些次要地区的大得多。奸商的勾结、政府的无能和落后的运输方式结合，使粮食市场对天灾很敏感，而且容易受到人为操纵的影响。米价的不定期波动不时给城里的生活制造紧张气氛，城镇经常发生针对富裕米商的抗议活动，成为许多政府首脑感到棘手的问题。

乡村的各种关系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备受封建统治者歌颂、劝诱和压迫的农民，对于为城市生产的商品的变化，以及土地可能转给新的承包人非常敏感。在一些落后的边远地区，阶级等级和农奴的状况几乎和他们当初向农民一士兵（这些人留在了当地，并成为村长）臣服时没有什么变化。^[6]可是，在那些毗邻贸易要路和大都会的地区，人们利用金钱、债务以及为了生产手工业产品而缔结的契约关系，催生出一一种新的佃农。勤奋和懒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

乡村群体之间的极小流动，但是在土地和影响力的竞争方面，城镇的势力或集团却不一定能超过乡村的固定领导者。^[7]没有一处乡村的“农民”状况是相同的，那时有村长、年寄、地主、自耕农、佃户和仆人。^{*}随着大部分武士离开了乡村，乡村统治者的声望以及落入其手里的权力，使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自信。德川幕府的顾问既讨厌富农，也讨厌贫农，但他们想不出什么措施来敲诈前者或者救济后者。

江户幕府时期，农业产量稳步提升。随着人口的增长，农民开垦了更多的土地，使用优质的种子和肥料进行精耕细作。结果，农业的产量增加，产量预计常常是领主原先预计的两倍左右。尽管如此，官方的税率却没有相应提高。^[8]毫无疑问，一部分乡村增加的财富被杂税和特别税征收，但许多仍然留存于乡间。村里征税的税则明细通常掌握在庄屋和年寄的手里，增加的那部分产量显然流向了拥有土地的农民，从而加剧了他们和佃户之间的差距。^[9]

武士阶层搬到城里居住之后，当地的行政事务便由年寄和村长打理，并受到地区行政长官的管辖。他们非常聪明，知道如何在推诿和剥削之间采取一条中间路线，从而使自己在积累土地、财富和文化方面处于战略地位。一旦新的税法和垄断威胁到他们业已发展起来并一贯坚持的模式，村长通常组织大家提出抗议，若抗议失败则进行抵制。他们的判断大体而言是明智的，而且从外国旅行家的笔下也可以看到他们保护了自己的利益范围。19世纪五六十年代，

* 对他们最流行的称呼分别是庄屋、年寄、地主、本百姓、名子、间人。

旅行家们写下了许多乐观、富饶的乡村和贫困、荒废的城镇的对比。阿礼国发现这里“太平、富裕和明显的满足”，并评论说“这个国家在精心培育和维持方面甚至比英国还要完美，到处可见精美的木雕”，而休·米特福德在描写另一个地区时则说，“我们不禁被这里的繁华深深吸引……难以找到比这里更快乐的人民”。^[10]梅廉对高度发达的信贷机构和商业感到震惊，笼统地断言所有人，即便是乡下人，也至少都能识字，进一步证明他所了解的几个地方在封建统治下欣欣向荣的事实。^[11]我们将会看到，土佐维新的领袖们大都来自这些村镇官员。至少对他们而言，政治野心伴随着经济实力和令人尊敬的社会地位。

19世纪早期，日本统治阶层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他们虽然位居社会顶端，但收入已经跟不上不断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个别武士为了从主人的税收中分取一杯羹而竞争，而这些收入和两个世纪前并没什么两样。加官晋爵使部分武士的地位提升，但这通常是在损害失败者利益的前提下进行。随着武士阶层的人数不断增加，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尽管一些武士的非长子退出了特权阶层，但是其他人依然需要依靠别人生活。一家之主经常发现家族的财务入不敷出。更糟糕的是，大名时常会为了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而委婉地向武士借一部分薪俸，从而削减了他们的生活开支。因此，大部分武士过着体面但却贫寒的生活。德川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有无数这样的例子，武士抵押自己的刀，负债累累，买不起自己急需的书籍，而在一些地方，有的武士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而杀死婴儿。藩国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武士的收入、人数以及大米的产量相差悬殊。

中冈慎太郎说，在土佐藩被认为很低的武士薪俸在萨摩藩看来却显得慷慨无比。^[12]但显然，在每个地方过着舒适生活的“上层”武士非常少，乡村官员的经济状况通常要比大多普通武士好得多。

为了达到收支平衡，幕府及其附属的藩国认可并利用了垄断的行业协会，此外他们还向商人借钱。^[13]获得授权的行业协会发挥着政府代理的角色，垄断并控制着供应中央市场的各地特产的经营权。封建领主试图通过和商人结盟，以低价买入高价卖出的方式赚取利润。然而，这类做法只有在不会招致村领导反对的情况下才可能取得成功。幕府也试图通过改铸货币并使货币贬值来解决问题。各藩藩主不得私铸货币，因此只能采取发行纸币等类似的措施，但他们的纸币只能在领地内流通，而且这种方法只有在少数几个统一的大藩国才可行。由于他们有陪侍德川将军的义务，而且必须在幕府的大城市大阪和江户出售自己藩国的产品，所以各藩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多地卷入了中央的经济轨道，这类发行的纸币鲜少取得成功。有见识的商人们意识到用这些纸币购买其他商品时会产生兑换问题，于是拒绝使用。

在努力追求更高收入的同时，政府也定期采取一些措施限制公众过度消费。长期的放纵和徇私，特别是将军或大名的统治一帆风顺，天下承平日久之后，往往出现政府严厉的改革。实施这类改革的新统治者通常是一名养子。他们不像藩国的继承人那样必须住在江户，并非在奢华、宠溺和轻浮的环境下长大，因此往往体格强壮且意志坚强。改革期间，为了限制老百姓消费而颁布的严厉法规使一切形式的卖弄和炫耀都受到影响。然而，这些努力往往流于表面，

未能触及统治阶级根本的财政问题。随着德川时代进入最后的五十年，传统的改革显然无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那些措施并没有对导致城市化、专门化和商业贸易的制度进行修改，并没有减轻城市周边地区的税负以使农民不再逃往城里，反而成功地使当时的窘境变得更加引人注目。

不时出现的令人吃惊的不满现象，显示出幕府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的举措收效甚微。类似的事情发生在 1837 年，一名出身武士阶层的儒家官僚代表带领一帮绝望的市民，抗议富裕的投机商人，以及那些在背后给他们撑腰的官员。大盐平八郎的暴动发生在幕府的商业中心大阪，他们贴出的檄文遍及整个日本。^[14]1830 年代，乡下农民抗议和示威的频率也明显增多起来。尽管学者对这些农民起义的意义和评价仍有争论，但它们对封建统治者造成的震惊则是毫无疑问的。^[15]

随着 1841 年水野忠邦升任老中（中央议会的首领）*，幕府开始了 1840 年代最后一次也是最失败的一次尝试，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水野希望全面加强幕府的地位。他尝试通过颁布法令来降低米价。在看到商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利润过高后，他下令解散大的航运公会（株仲間），以为没有垄断者的定价，自由市场的米价将会下降，而农民也能够提高他们的价格；水野认为江户急剧膨胀的人口是农民没有守法离开了自己土地的缘故，因此下令村民们返回原籍；他制定法律，限制私人消费，严格控制城市的娱乐活动，同时约制女人、

* 老中由 4 至 5 名领地在 25000 石及以上的谱代大名组成。他们组成幕府的最高议会机构，负责处理高层问题，例如与控制大名和宫廷有关的事务等。

服装、发型、房屋的装饰和花费。与此同时，水野还迁走了大阪和江户附近的大名，集中幕府直接管辖的区域。这使他丧失了官僚阶层的支持，最后甚至连原先拥护他的人也起来反对。1843年，一伙江户暴徒袭击了水野家的宅邸，之后不久他就被解职，结束了希望日本回到前商业时代的无望努力。^[16]因为年号，这场改革被称为天保改革，但最后告以失败。幕府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而竭力推行中央集权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现在已经不可能重回分散的封建自然经济，因为武士和平民都不会接受厉行的节俭和更低的工资，必然会起来反抗。德川幕府已经丧失了经济偿还能力，这时有人提出应当开国以免最后陷入不利地位，它也就无法做出创造性的有力回应。1844年荷兰国王便建议日本这么做，但是幕府并没有回应。国库空虚，防御体系又落后，因此幕府急于避免与外界接触。

幕府在经济上无能为力，在思想和制度上同样准备不足。正如一名作者所说的，德川幕府的老中们认为他们的作用就像是管家，一套完好无损的制度到了他们手里，他们有责任将其原封不动地传下去。^[17]尽管有些人可能大胆地提出建议，应该修改参勤交代制度让领主们有更多的收入投入防务、应该修改锁国政策以便引进更多西方防御装备和意见，然而幕府的主要官员是谱代大名，他们的祖先曾经在16世纪带领过德川家族的军队，因此决心保护祖先创下的基业。

德川时代的思想界倾向于强化现有制度既公平又合适的观点。儒家的道德思想强调农业的崇高地位，称其为立国之本。这种被称作“农本主义”的思想重视自然经济，不可避免地使执政者的顾问

们更关注重建以前的美好社会，而不是利用和采纳当前商业上的种种可能性。日本确实有许多儒学流派，1790年朱熹的儒家学说甚至成为官方钦定的思想流派。然而大部分的改革主张均强调让武士和农民返回原籍，同时结束在城市的腐败生活。到了1800年，一些学者接触到通过长崎的荷兰商馆渗透进来的知识之后，开始质疑当时社会的原则。然而，他们的人数很少，而且几乎不为人知。19世纪早期，佐藤信渊笼统地提过一个建议，要求废除封建制，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政府，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建议。直到政府生死存亡的1860年代，幕府官员才开始认真地考虑它。^[18]

尽管极少有人——即使有，也很少被人知道——提出清晰的构想去解决当前的政治问题，但是到了1830年代，非正统的主张已经有了潜在的基础。对西学感兴趣的知识分子虽然还很少，但是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而且他们从狭隘的技术和医学转向兴趣更为广阔的其他书籍。幕府本身响应并推进了这种潮流，他们在天文机构“天文方”内设立了翻译西方书籍的翻译机构。^[19]民间学者们准备走得更远，他们了解到西方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意识到英国正在向中国南部推进，俄罗斯则正从北方逼近的事实，从而对德川幕府的政策和软弱表现大为不满。即便他们尚未反感其统治，但这群学者至少潜在地对德川幕府统治的方式感到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水野忠邦在天保改革期间采取了一些反对兰学者*的措施，指责

* 当时日本把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叫作“兰学”，研究“兰学”的学者被称为“兰学者”。——译注

他们不够忠诚。^[20]

另一个反对德川幕府统治的理论基础也由学者建立。他们在研究神道教传统时，发现其中包含了天皇的神性以及古代祭政一致等各种理论。儒学研究往往间接地支持宫廷的合法性，认为京都宫廷的地位在江户的军事政权之上。^{*}然而，在这类理论改变江户和京都之间的权力均衡之前，需要有宫廷和幕府之间冲突的具体实例，以及天皇旨意受到忽视的证据。19 世纪早期的学者心中满腹疑团，但他们并没有大声说出来，直到新发生了几宗对宫廷不敬的大事才证实了理论上的疑惑。只有当危急时刻到来、已有的解决方法和习惯程序显然无法处理那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时，新的理论才会成为可能。

必须强调的是，维新舞台上的演员都在一个社会和政治框架内工作，他们直到最后一天都认为这个框架非常牢固。19 世纪中期的幕府已经有两个半世纪的威望。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它都是日本已知最长久、最稳固和最成功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经济危机和社会混乱很可能会越来越麻烦，但这些只是日本统治者自 17 世纪以来便一直处理的问题的变体。儒家学说和神道教学说似乎远不会颠覆政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受到幕府的赞助和支持。在江户幕府统治的中心地带，国学研究几乎完全在德川家族的赞助下进行。西

* 这一点对于水户藩的历史学家尤其重要，他们的作品和学生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影响力。例如，藤田东湖就曾经是土佐藩大名的老师。赖山阳写的著名的《日本外史》也宣扬了这种观点，该书影响了许多人，例如伊藤博文和土佐藩参政吉田东洋。

学研究的情况也是一样。早在像新井白石^{*}和吉宗[†]等人主宰国政时，幕府就已经对西方感兴趣并开始赞助相关研究。到了18世纪末，一些藩国，例如萨摩藩和佐贺藩扩展了“兰学”中心。这些藩国后来在国内政治界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将它们后来的政治活动归功于西学学者带来的颠覆性影响，但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因为若说起对西学研究的不懈追求和慷慨赞助，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上江户的幕府。西方的书籍、技术和专家不但没有被戒备的领主们鬼鬼祟祟地私藏，反而在各大活动中心被人们借阅、交换和分享。没有人比幕府本身在这类交换中获益更多，而在吸引和奖励其他地区的学者方面，也没有人比得上幕府本身的强大能力。

到了19世纪中期，民间兰学私塾大量出现，上面的话也许就需要做些修改。像绪方洪庵在大阪开设的那类私塾（福泽谕吉就是在这里学习的）缺乏强有力的支持者，所有者不得不更加谨慎小心，更加精心守护自己的藏书和资源。即便如此，他们也并非完全得不到位于幕府中心的好处。尽管福泽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极其鄙视自己所经历的德川幕府的统治，但他却可以使用幕府机构的图书馆，并且在幕府谋得了一官半职。^[21]

* 新井白石（1657—1725），名君美，号白石，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家、诗人和儒学学者。他虽出身浪人，却积极向学，永宝六（1709）年成为日本幕府第六代将军德川纲丰的文学侍臣，并于德川家继即位后任辅佐幼君大臣。1713和1715年，新井先后写成了《采览异言》《西洋记闻》。这两本书是日本传播洋学的先驱著作，书中认为对西方科学技术应加以吸收，应将其与天主教分开，肯定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一般认为，日本西学开始于新井白石。——译注

† 即德川吉宗（1684—1751），江户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在位期间奖励武艺与俭约风尚，开发新田，允许输入与天主教有关的外国书籍。——译注

福泽在回忆录中对儒学的痛恨和偏见不应该遮盖另一个重要事实：研究西方事务的学者，大部分都牢牢地植根于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和封建价值观，他们研究西学并非为了宣泄郁积已久的愤懑和反抗情绪，而是在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领域谋生，就像新时代的科技一样。他们并不清楚那个时代的本质，然而拥有将科学应用于医药和武器上的西学知识，显然会使他们在国家招募英才时更具优势。对许多学者来说，这种最初的实用性引导他们产生了真正的求知欲。然而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变成颠覆分子。这些学者服从大名和幕府的指示，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将此认为是儒家“格物”思想的一种正常实践。德川时代末期和明治时代早期，“究理”这个词的含义从研究朱熹的新儒学思想变成了研究西方的“科学”。对于那些完全理解个中含义，并且极有逻辑性的人而言，这很可能导致他们对整套儒家学说产生怀疑。福泽似乎就是其中之一。然而许多其他学者均设法在脑海中划出一个单独的区域，从而在讨论西方科学背后的研究方法时，由于不必考虑儒家的经典作品而变得相对容易。即使就福泽而言，我们最好记住他的自传写于老年时期，因此很容易夸大自己年轻时的反叛思想；再说，福泽憎恨这种伴随自己成长的阶级和等级制度，也有他个人的原因。^[22]

换句话说，这时需要一个新的特别的外部问题来将这种潜藏的、亟待发泄的不满情绪提升至表面。西方人的到来提出了挑战。担忧俄国人会入侵北方列岛的人早已预见到了这个问题。这一现象在英国数次入侵中国之前就已经存在。长崎商馆的荷兰人曾经严肃地警告过日本。所有识字的人很快就会清楚这一危险的细节及后果，因

为除了“兰学者”谨慎地思考该现象的意义外，从中国流传过来许多著作。它们无须翻译，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都能看懂，经过日本作者适当地简化和改写之后，全部信息迅速在受过教育的广大日本群众中传播开来。

现在也许可以从国内形势转为描写土佐藩以及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所熟悉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了。这些可以为上面那些概括性的论述提供事实支持。土佐藩与其他藩国一样，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为了增加收入，政府雄心勃勃地进行大胆的改革。改革与传统利益集团发生冲突，产生了不信任和恐惧的氛围，而维新领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脱颖而出。西方的知识尚未得到广泛传播，对日本疲弱的揭露则有力地激励着年轻武士。他们大多是乡村统治者，在高级武士离开之后实际控制了乡村。这些人成立了一个忠诚的小团体，由一位受过神道教和儒家忠诚教育的人领导。他们对外来威胁的第一反应是恐惧。在这些方面，坂本和中冈是同龄人的代表。与其说他们是革新者，还不如说他们是同辈的追随者。他们有文化，但丝毫称不上学者；他们思想传统，但是反对愚昧；他们非常忠诚，但是对于他们所了解的制度和大名并不狂热；他们虽然在求学期间接受了大部分的忠君和神道思想，但并非学生或者学者，因此和神道教以及儒家学说的关系并不密切，和西学以及西方价值观的关系就更远了。对于名义上依附的统治阶级的经济困境，他们一开始有所耳闻，后来才充分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们的教育方式受到本地区特有问题的严重限制，但其反应则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同时代人。

土佐藩

高知县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德川时代的土佐藩边界。这片扇形的多山区域位于四国岛的南部，是日本最难进入和访问的地方之一。1936 年铁路才连接东北边的高松市，而前往附近的德川时代的城池松山市与宇和岛市，则仍然需要乘坐慢吞吞的汽车，在陡峭的狭谷中修建的原始道路上蜿蜒前行。

高知，或者说土佐（当地居民更喜欢这个古代名称）是一个四面环山的统一王国。在德川家族统治的时期，日本的交通非常落后。为了防止各藩国之间联系过多，国土全境的道路常年失修。高知当局在遵守这些规定时尤为认真。17 世纪时，土佐藩的统治者曾经因为受惊的农民逃往邻国而大伤脑筋，后来边境的村民数次因不满新的税收政策而翻山越岭，到邻国避难，直到事情解决才回来。因此各主要关卡均严加防守，除了去意已决的难民，一般人很难走出连绵的群山而进入邻国。在德川时代，只有九州南部的萨摩藩（现在的鹿儿岛）和土佐藩一样与世隔绝。大多官员和政府许可的商人选择走海运前往大阪和濑户内海的其他港口，陆路难行，且很少有人选择。

土佐气候温和，全年有 241 天是适合作物生长的无霜期，从而可以种植双季稻，全年超过 2500 毫米的丰沛降水也使灌溉问题迎刃而解。这里的土壤虽没有气候那么友善，但少数适合种植水稻的平坦谷地很早以前就已开辟成梯田，并给乡下的居民带来恩惠。在德川家族统治的初期，土佐藩的人口大约有 30 万，到了 1842 年，

已经增加到大约 50 万。

对于生活在温暖、骤雨、险要地形的环境中的人们，通俗作家有时会把他们的个性分为两种，生活在山里的人性格粗粝、心胸狭窄、顽固而又倔强，而沿海地区的人则在谈判中更懂得使用迂回战术，思想更加开放，对新鲜和陌生的事情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你很难相信这种区分种族类型的方法，对其地理成因则更加怀疑，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人们正是用这些特征来形容本书的两名主人公——坂本龙马恐怕属于那类灵活的“沿海”居民，而中冈慎太郎则属于思想较单纯的山地居民。^[23]

土佐藩的统治者是山内家族的家主。山内家族虽然属于外样大名，但在德川家族的统治下却备受恩宠。1600 年的关原之战结束后，德川家康剥夺了土佐藩大名长宗我部盛亲的领地，将其赠送给山内一丰。山内是远江国一个拥有 5 万石领地的小领主，在战前加入了德川家族一方，但并没有参加战斗。因此他获得的奖赏似乎远远超过了其功绩，这一恩宠使其继承人对德川家族感恩戴德，人们常常援引他们在幕末没有积极参加倒幕运动的事实来证明其对德川家族怀有感激之心。无论是出于信念还是慎重考虑，这都是德川时代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所处的地位和你们完全不同，”山内一丰的第 14 代后裔丰信（容堂）向萨摩藩的代表西乡隆盛指出，“因为我们在道义上对德川家有亏欠。”^[24]

土佐藩主在德川幕府各藩中排名第 19。土佐藩是外样大名中的强藩，身为一国之主的藩主拥有世袭的从四位品秩，参勤交代时在江户的千代田城与众贵族平起平坐。^[25]礼节性的义务和荣耀与额定

的大米收入成正比。土佐藩的等级为年收入 202600 石大米。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土佐藩的大米收入便比这个数字高，而德川幕府的官员故意忽略了可能增加的 5 万石收入。外界通常认为这是德川家的善意之举。等级越低，越有可能节约支出。^[26]

除了大米，土佐大名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土佐的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在山内家族的统治下，这里对本州的木材出口明显增加。其中一些是作为贡品奉献给幕府作修建城堡、寺庙和战船之用，但大部分还是卖给了大阪的特许经营商来增加藩国的收入。森林也出产薪柴以及更重要的土佐和纸。港湾的捕鱼业非常发达，土佐的鲣鱼干（鲣节）从各个渔村通过正当的行会渠道，出现在了大阪和江户的市场上。此外，荒地开垦、精耕细作和种植技术的改良也增加了大米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27]土佐藩的潜力使得山内家族跻身于实力非常强大的大名行列。

山内家族通过和幕府及其主要藩国大体相似的官僚机构进行统治。在德川时代末期，进入并留在行政机构内是当时政策的关键，因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藩国政府的主要分支机构。它们是：

内厅官，主要管理藩主家庭的内部事务。

内官，主要负责管理武士，维护山内在江户和其他地方的公馆，在武士学校授课，以及掌管档案和记录。

外厅官，主理藩国事务。

可以看出，虽然并没有什么敬称和名号，但实际上第三个机构最

为重要；在平民和武士眼里，这个机构的政策和人员代表了藩政府。外厅官中最重要的是常常被称为“三职”的部门：

行政长官（奉行职），由三名高级家臣组成，拥有最高的权威和职责。

长官助理（仕置役），由奉行的三名助手组成。他们同时也是管理神社和寺庙的部门领导，因此负责宗教调查和人口统计事务。

警察长（目付），由三个人组成，负责领域内的治安和监视工作。

在这三个部门中，最为重要的通常是第二个部门仕置役。这个部门管辖城、郡、税收、财政、公共事务、建筑、造船、沿海地区、森林和山区。其中郡奉行充当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间的纽带。土佐的七个郡均设有奉行一职，郡奉行有时通过下属官员（代官）和村领导联系。^[28]

上面只列出了最重要的藩国官职。对于藩国的官位，只有达到一定级别的武士才有资格出任。武士的级别和他们的地位相当，他们可以获得薪俸或者从支藩获得相应的收入。此外，级别和头衔也意味着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而这支军队最后一次参加战斗是在 16 世纪。虽然他们多年来只在仪式上和阅兵时发挥作用，但军队的结构却保留下来。德川时代晚期武士的主要级别如下：

“上级”武士（上士、御侍，也被称为しかく）：

家老，11名。1500—10000石土地。掌管着内厅和国内事务，并担任奉行职。他们同时担任主要军队的领导，可以使用山内家族的名号，和大名的关系就像最受信赖的谱代大名、亲藩大名与将军的关系一样。

中老，11名。450—1500石土地。他们是一些重要官职的人选，和尊贵的家老比起来，通常更接近政策的贯彻和执行。

“普通”武士（平士）：

马回，大约800名。100—700石土地。这一名称来源于他们在战场上的位置——大名营帐周围。他们充当了管理层的大部分领导职位，特别是仕置役由他们和中老担任。

小姓组，人数不定。70—250石土地。服务马回，大部分是地方官员。

留守居组，人数不定。50—200石土地。服务小姓组，多是一些地方官和低级官吏。

德川时代的封建官僚制度主要分为这五个统治等级。官职通常带来额外的收入，例如仕置役除了正常的收入，每年还可获得450石的额外收入，郡奉行的额外收入则是250石。当时对于各个级别的大米消费均有明确的规定。^[29]

在较低的上级武士之间存在着人员的流动，但是在那些受宠的武士和下面的五个级别之中则很少有人流动，他们被统称为“下

级”武士（下士、けいかく）：

乡士，900—1000 人，30—250 石土地。

用人，人数不定。

徒士，人数不定，收入为 12—17 石。

组外，人数不定，10 石。

足轻，意为“徒步的士兵”，又可进一步细分为许多类，收入是仅够糊口的 3—7 石。

后面四个级别的武士直接从领主的仓库领取薪俸。他们可能被分派一些低级公务，报酬即便有也很低，通常是全家人的口粮。最低一级的足轻实际上被用作伐木时的劳力。^[30]这样一来，前面五级武士和后面这些武士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事实证明，这条鸿沟在后来的勤王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因为勤王党的许多早期成员正是来自第六级的武士家庭。

正如德川幕府将家臣都聚集在城里一样，土佐的统治者也逐渐将大部分家臣集中在高知。这座建在高知城之下的城市，连同其高高的地基，都是山内家族在统治巩固之后征集全体高知百姓建造的。^[31]在和平年代，武士和自己分配到的土地的联系越来越少，结果乡村的统治权逐渐落入郡奉行的手里。支藩的授予在事实上已经停止，因为在盛产大米的高知，用米支付薪俸已经成为规则。高知有一个完全自治的支藩，是授给山内一丰弟弟的，但 17 世纪末幕府剥夺了藩主的统治权，并将其归还给了高知。^[32]

在低级武士中，位居最高级别的乡士将是本书的重要角色。从这一级武士中走出了许多土佐维新的领导和英雄人物，包括坂本龙马和武市瑞山。乡士这个级别源于山内家族进入土佐后管理上遇到的问题。17世纪山内家族来到土佐时，追随他们而来的武士数量很少（倒也适合这个国土），不足以填充上面所说的各个级别。土佐本身仍然处在当地势力很强的长宗我部家臣的控制之下。有一段时间曾零星发生过长宗我部家族的人反抗新领主的斗争。经过了几场叛乱和大面积的逃亡后，山内家族急于恢复秩序，因此设法利用和安抚一些长宗我部的家臣，授予他们乡士的称号。

乡士（“乡村武士”）的称号始于1613年，当时只授予高知城附近的少数长宗我部家臣。他们将住在乡村，管理后来明确规定的30—250石土地。委派给他们的军事任务大约和军士相当，而他们的身份地位也足够荣耀，可以出席大名在新年举行的阅兵仪式。有时他们也会陪同山内前往江户履行职责。

这些是为了建立和维持乡村秩序最先采取的措施。然而1644年，土佐藩的行政长官野中兼山改变了原有的模式，以封号作为开垦荒地的奖励。^[33]任何人只要开垦年产大米至少30石的荒地（新田），就可以申请成为乡士，而野中准备发放100个乡士称号。当时仍然要求申请者必须是长宗我部家臣的后代，但是随后为了开发边远地区，订立的规则更注重申请人的品格而不是家庭出身。1763年和1822年，土佐发放了大量的武士称号，使乡士的总人数增加到了800人。^[34]

就在上层武士被政治和经济措施吸引到居城之时，乡村在当局

开荒政策的鼓励下形成了一个拥有土地的武士新团体。他们中许多人肯定积聚了大量的土地，因为 1690 年颁布的法令允许那些拥有至少 100 石田产的“上级”留守居组转为乡士。我们很难估计有多少人转成了乡士，但是 1735 年颁布的新规将最低的田产拥有量提高到了 200 石，也许说明了转为乡士的人实在太多。^[35]

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乡士定义为一群身兼武士和农民，在业已商业化的社会里保存着农村和封建理想的人。到了德川时代中期，那些潜在的申请人已经不可能找到一整块符合这样要求的地供仆人耕种。当时，乡士的田产往往分为好几块，耕种时需要资金来支付工人和佃农的酬劳。具备管理上的能力才能有效地管理这类田产。藩国可能急于保证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因此对于申请乡士的规定越来越不注重武士背景。1763 年，土佐在即将开发幡多郡时发布的公告宣布，任何家庭背景均可申请。“即便出身商人之家，只要他能证明自己合适即可申请。”现在，只有那些祖上有犯罪前科的人才被排除在外。1822 年的公告更进一步规定，乡士的头衔可以自由买卖，只要买方的品格和履历符合要求。^[36]

这些变化带来的后果是一些出钱购买头衔的商人或者农村富裕阶层混进了乡士的团体。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新乡士都喜欢住在城内或者高知城附近，而不是在农村分得的那块地上。19 世纪早期的一次调查显示，在大约 800 名乡士之中，有 82 户住在高知城内或者距高知城非常近的地方。难怪原有的乡士集团成员和许多上级武士会看不起这些住在城里的“乡村武士”，并屡次上书反对这类情况。^[37] 1835 年，坂本龙马正是出生于一个这样的家庭。他的

祖父是一名富裕的酒商，于 1771 年购买了乡士头衔，但是全家人继续住在高知。

不过，绝大多数的土佐乡士住在乡间，在上级武士都搬到城里之后，他们直接接触到民意，并对民意的形成起了推动作用。乡士还是一群有文化的乡村统治者，他们既骄傲又团结，整个土佐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许多事件反映出他们在和更高级别的武士对抗。例如，1797 年，一位名为高村的乡士辱骂了一位名为井上的上级武士，井上立刻拔出剑来，把高村刺成重伤。藩国的第一反应是将这个案子定性为下级对上级无礼。但乡士们对此议论纷纷，最终酿成了集会和抗议。随着气氛越来越紧张，藩国重审了案子，惩罚了上级武士，并剥夺其头衔，没收其收入。但是乡士们仍不满意，团体和个人的抗议证明了他们的组织性和决心。1801 年，大名在震惊之下驱逐了井上，随后一大波藩国官员辞职和突然生病，使这一事件更具有爆炸性。^[38]从这次和类似的事件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乡士对傲慢的上级武士憎恨有多深。

乡士虽然重要，却没有直接管理乡村的权力。这个权力是落在村长，即庄屋的身上。他们和乡士一起，构成了土佐勤王党的大部分成员。为了弄清楚中冈慎太郎和吉村寅太郎这样的庄屋如何成为德川时代末期的政治领袖，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这个职位的权力，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

庄屋是藩国管理的最小单位，但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平民而非武士，所以他们也是乡村组织的最高管理人，是当地和乡村利益的有

效代言人。庄屋由郡奉行从村里有名望的家族中选出。事实上，许多庄屋都是世代担任这一职务，而且可以将家族的显赫追溯到农民和武士之间界限还很模糊的德川时代以前。他们就这样自长宗我部时代的农民—武士一代代传承下来，因此许多人声称自己的家庭背景与那些最古老的乡士家族一样。这类家族数量上也许不多，因为到 19 世纪时他们可能已经成为乡士，但是这种社会和精神上的传奇人物是如此能干和显赫，并不需要数据上的支持来证明他们的作用。这两个团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大部分的乡士正是来自庄屋的家庭，确切地说，是他们年轻的儿子。

庄屋管理整个村子，而像中冈这样的大庄屋，则管理着 13 个或者更多的村子。除一些特别严重的违法行为外，他们有权处置村内纠纷，管理村内治安，另外他们还负责征收地税。庄屋还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村民、拒绝接受不在乡武士的无理要求。在任何时候，不在乡武士都是他们在影响力和权威上的天然对手。流传下来的资料显示，他们认为自己是“人民的首领”，而且由于他们在收税和向上级报告时，通常包括了家臣的居住税，以及区域内包括乡士和其他武士在内的所有人的宗教信仰报告，因此也有理由认为自己是重要人物。当原封不动地执行上级命令将危及乡村的安宁时，他们通常会在责任感的驱使下向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冈慎太郎正是为此而不顾路途遥远，数次到高知去为自己的郡求情。^[39] 藩政府承认庄屋是封建统治的支点。官方关于庄屋的记录中包括对那些阻止或者汇报了初始抗议和叛乱的村领导的赞誉，而那些没能成功阻止叛乱的庄屋则被追究责任。^[40]

虽然庄屋在社会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的级别在乡士之下，事实上，他们根本不是统治阶级的正式成员。住在自己区域内的乡士在许多方面都不受庄屋管辖。17 世纪时，他们愤慨于自己必须屈从于那些等级比自己低的人，提出抗议并在最后获得了豁免权。偶尔，庄屋会要求重获对乡士的管辖权。在日常的生活和管理中，这两个团体之间无疑会有很多摩擦。可是，从其他方面来看，庄屋和乡士似乎有更多的理由联合起来，而不是互相竞争，在得宠的城内高级武士面前，他们同样饱受歧视。两者大体上代表了乡村的利益，尤其是富裕村民的利益，对一心想从乡村攫取更多利润的高知统治者而言是潜在的反对者。他们的儿子通常和他们上一样的学校，接受的教育也大同小异；他们的世界观大体相同，而且庄屋向乡士阶层输送了最多人才。因此，在上学时就曾一起学习剑术和文化的乡士、庄屋阶层成为德川时代末期发生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勤王运动的领袖就不足为奇了。

仔细研究一下土佐藩的政策和乡村统治者之间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对立，就会发现 19 世纪全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所面临的问题。这种对立本质上是争夺乡村的富余收入，而那是统治阶级唯一可以获得的真正财富。

乍看之下，土佐乡村的统治肯定比日本大部分地方效率更高，也更加有效。这是因为山内家族的统治者在 1622 年恢复了一套定期重新划分“本田”（旧田，即大名的领地）的机制。这套制度起源于奈良—平安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唐朝。在这套制度下，

每五年或七年，有时是每十年，将土地按不同的等级分成一块一块，然后通过抓阄的方式决定由谁耕作。“抓阄获得的土地”（籤地）就这样耕作下去，直到下一次重新分配（“地割”）。在边远地区，土地分配的间隔时间非常不规则，但在城堡周围的高知平原，政策执行得无疑最好。也许这个政策不得人心，或者至少表明农民在收税员面前感到无助，许多村民从“本田”的村庄搬到了高知等城镇。在一些地方，这些失耕的土地后来被重新开垦成新田，垦荒者通常是那些准备成为乡土的人。“本田”的税收比例是6：4，大半必须上交，而新田的情况则正好反过来。新田的收成可能很低，而且垦荒者需要激励，以保证他们会继续开荒种植。在德川时代末期，其他藩国为了增加收入也曾试着恢复重新分配土地的制度，然而似乎无一取得成功。土佐藩能坚持实施这一制度，是执行政策的官员和庄屋努力工作的结果。^[41]

由于农业的收入非常有限，藩政府开发了一些副业来增加收入。其中主要的是将木材、和纸等物品运到大阪的市场上出售。藩国的财政部门下面设立了地方特产部门（“国产会所”），专门鼓励生产这些商品并管理销售。对于有利可图的商品，藩国限制私人经营的规模，并将重要的经营权委托给获得特别授权的行会，让他们获得在土佐采购的垄断权。作为回报，这些商人将付给藩国一笔许可费。财政部门的官员和那些获得特权的商人不免亲密起来。

这种行会垄断制度伤害了乡村的供应商。这些人将商品低价卖给垄断行会，以及那些经营同一行业的、在自由竞争时期规模很小的当地企业主。严厉执行这些政策的时期通常也被认为是非常腐败

的时期，因为商人在藩国政策中变得举足轻重。这也是恶政府的时期，因为平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因此，当时虽然没有明确地宣告私企的权利或者意义，但是对邪恶官企的反对还是非常活跃。

垄断和勾结对乡村和地方感情的伤害可从 1787 年著名的池川“纸乱”中清楚地看出来。那一年，行会在获得特权之后，为了利润最大化而将收购价压得很低，生产和纸的村庄被迫起来反抗。大约 600 名池川居民提交了抗议书，并越过边界逃往相邻的松山藩。经过与松山藩官员长时间的谈判、对难民做出种种保证，以及相当数量的官员辞职和被免职后，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42]

因此，情况总是这样，“改革家”希望通过增加收入和抑制民间消费来加强藩国财政，但却受到严厉攻击。他们被认为手段过于残酷，而且引诱政府进入商业渠道，开了官员腐败的不正之风。即便像伟大的野中兼山也难逃这一命运。野中通过兴修水利、开垦荒田和垄断贸易等一系列措施大大加强了土佐藩的经济，但 1663 年，他被认为是导致各阶层人民生活艰难的罪魁祸首，遭到解职和流放。从后面几章我们可以看到，1860 年代的改革家吉田东洋的命运也是这样。野中下台后，垄断贸易随着藩国财政陷入困境和平民的抗议而时断时续。不过，平民的抗议极少有机会被听取；除非由乡间的乡士和庄屋提出来。或许可以再补充一点，那些改革成功的机会不大，除非它得到上述两个受到改革冲击的团体的合作，因为他们是乡村经济、社会和政治上的领导者。包括佐藤信渊在内的德川时代的经济学家都赞扬土佐完整地保留了古代的封建理想和制度，较之土佐，这些评论让我们了解更多日本其他地方的情况。^[43]也许佐藤

赞扬的是土佐的乡士，因为他们似乎是硕果仅存的、古代自给自足的农民武士的典范。但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的，许多乡士既非自给自足，也非农民或者士兵。

尽管这样，如果说乡士和庄屋代表了与城市垄断阶层对抗的朴素的乡村企业，以及他们在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活动源于反封建或者商业资本主义思想，那又将大错特错。那个时代的反抗受到年轻人成长和教育的舆论环境的限制，而且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更倾向于恢复唯农论，而不是促进商业企业的发展。

大部分乡士和庄屋的儿子都在私立学校（私塾）接受教育，这样的学校在高知城及其附近就有近 20 家之多。家臣的儿子有在官方藩校上学的资格，平民则在随处可见的寺庙学校（寺子屋）接受启蒙教育。藩政府鼓励低级武士的儿子和村领导的儿子致力于文化和武艺的学习，而他们大多在私塾学习。私塾分为几种，老师们信仰的流派也各不相同，但是总的说来以朱熹的理学思想最为流行。这种思想自谷秦山（1663—1718）时代起便在儒家学者中传播开来。谷是山崎闇斋的学生。山崎非常强调神道教的重要性，谷吸收了老师的许多思想，并呼吁将爱国思想和中国圣人的智慧结合在一起。由于不接受藩政府的命令，拒绝听从 1670 年代受到藩政府青睐的伊藤仁斋弟子的指示，谷被逐出高知城，并开始在乡间教书。这件事也许意义重大。因为私塾从一开始就有可能传播异端学说了。1711 年谷被赦免，此后他的学说“南学”逐渐主宰了官方的教育机构和大部分私塾。到了 19 世纪也仍然有专门讲授神道学的私塾。^[44]

不管南学的政治倾向如何，你都很难在其中找到一丝反对土佐

和德川社会以之为根基的农本论思想。南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曾经受野中兼山眷顾的山崎闇斋。谷秦山最初的窘况可能部分源于他的学说与遭到贬斥的野中、山崎有联系。后来野中的大部分政策被再次施行，因此也适合重新评价他的哲学门生了。在教学思想上，私塾并不比高级学生所上的藩校更反封建。如果想在已毕业的乡士或者庄屋身上寻找进步思想，那么你往往会无功而返。事实上，与藩国的高级管理者相比，他们可能更缺乏远见，因为前者需要面对各类国内问题，更倾向于采取前瞻性的解决方法。与之相反，早期的勤王党领导由于没有背负沉重的责任，因此可以保持思想上的连续性和“封建性”，即便他们的上级很久以前就已改变了立场。作为一名住在城里的乡士和勤王党领导，武市瑞山经常想通过没收商人的财产为必要的军事改革筹措资金，而他的追随者对商人也好不到哪里去。^[45] 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士和庄屋的代言人不仅没有代表反封建思想，而且常常坚持必须回到纯粹的农业年代。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有时也会对住在城里的上级武士的价值和贡献表示怀疑。

世纪中叶的土佐

坂本、中冈等维新统治者出生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的不满情绪越来越明显，为了恢复统治集团的地位，官方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日本各地的暴动和叛乱均被镇压下去，统治阶级似乎并

未受到什么伤害。随后，一些藩国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而做的努力也取得了成功。可是，当世纪中叶西方使节到来并引发了民族危机时，我们看到原来的不满情绪换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正像官方的改革和调整中存在可以追溯至以前各种政策的潜在性和局限性一样。因此，我们不妨来研究一下天保时期（1830—1843）土佐的社会趋势。

这段时间，土佐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庄屋不满事件。似乎庄屋认为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对城市商人有利的商业大潮的威胁。在一些地方，年寄那样的普通村领导被看成是政府官员，而且和庄屋争夺起原来只为庄屋所有的荣誉。许多庄屋利用职位和财富之便投资当地的小型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可能用于购买土地或者为儿子购买头衔，因此，他们也同样憎恨偏袒垄断商会的藩国政策。正如一名学者在提到另一个藩国时所说的，封建统治者对利益的追求可能已经从重商主义和局部自给自足政策、从无法榨取更多利润的行业，转为与当地的有产阶级竞争，争夺迄今为止他们只得到一小部分的剩余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46]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类政策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与乡村领导的庄屋进行直接竞争。

但是，庄屋的不满，表现为他们想回到过去那套与商业无关的传统价值观上去。私塾的教育都集中于过去的智慧，而儒家的价值观和日本的传统则偏向于向他们灌输回归大同社会的希望。在那个社会里，将没有人挑战他们的角色，也没有人会羞辱他们。1830年代，城市利益体，包括商人和武士挑起了竞争。庄屋们纷纷抱怨那些巡视的次要家臣傲气十足，仿佛他们自己就是主子。

“复古”是维新时期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口号。在土佐，“复古”

的潮流也很明显。像鹿持雅澄（1791—1857）这样的私塾教师用本居宣长早先提倡的学说教导了整整一代此后会成为庄屋和乡士的学生。他们后来参加了武市瑞山在 1860 年代创立的勤王党，一点也不值得惊奇。值得一提的是，武市本人就是鹿持的侄子兼学生。^[47]

流传下来的资料中，与不满有关的都是庄屋。有趣的是，这些资料显示，庄屋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高于乡士。可能他们憎恨的是那些通过购买头衔获得乡士身份，并且住在高知城内或者附近的人，因为我们手上的资料显示，庄屋抱怨的对象都集中在高知城周围的村庄。所以，我们无须过于看重这些不满，认为庄屋—乡士拥有共同利益的设想站不住脚。后来土佐勤王党的成员主要来自这两个团体即是这一设想的明证。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的几件事，使庄屋的不满情绪更加引人注目。1837 年，在前滨村举行神社的祭祀活动期间，城里的官员想坐在比庄屋更尊贵的座位上。庄屋们抓住这件事，认为它体现了商人和城镇凌驾于农民和乡村之上的扭曲价值观，并向当局请愿，要求阻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他们说，“收入有高低贵贱之分。种田得来的收入要比做买卖得来的收入高级”。城里的官员和自私的商人勾结，而庄屋只和品行高洁的农民联系，在这点上，城里的官员根本无法和庄屋相比。庄屋继续说道，庄屋做着社会上最重要的工作：“我们鼓励农耕和渔牧，监督每年的税收按时上交，并保证公共工程的运作，必要的时候甚至负责征兵的工作……总而言之，我们担负着藩国事务中最重要的部分。”将我们和城里官员的生活相比，“不啻将天比作地”。^[48]

1841年，“庄屋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庄屋的不满达到了顶点。入盟的庄屋提交请愿书，要求回归原来那种令他们感到光荣的管理方式，而现在他们的光荣感已经消失殆尽。他们要求对所有住在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均有专属的权力，子孙可以拥有姓氏并佩刀，审问时可以使用武力，以及与乡士书信往来时被冠以敬称“殿”。在同盟的纲领中，庄屋们提出的要求比这还要多得多。忠君思想和受伤的尊严结合，使他们认为庄屋在古代曾被帝王授以总管之职，他们真正是天皇的臣仆。古代，庄屋的荣誉堪比武士。他们暗示说，近来武士已经成了毫无用处的奢侈摆设。“普天之下，四海之内，”他们说道，“只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人……他就是无上尊贵的天皇。将军是他的代理人，大名是他管理国家的指挥官，而庄屋则是负责管理土地和人民的官员。”之后将会提到的武士并没有出现在官职表中。请愿书在其他地方称他们为“贵族之底”，而庄屋则是“人民的领导”。^[49]官方对这些抗议的反应并没有记录下来，但他们很关注接下来十年那么多的庄屋参加国内政治运动的热情。考虑到乡士和庄屋的儿子同样吸收了上面的学说，当意愿或者利益发生冲突时，私塾的学生不太可能听从社会上和军中上级的劝阻。

庄屋的抗议中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它表明了这一团体强烈的忠君思想。这可能源于土佐盛行的谷派南学的民族主义倾向，以及个别神道教学者的影响，例如鹿持雅澄。可是，我们不太可能有信心去讨论这类思想在土佐的发展，并预测各个团体对这类思想的热情程度。一些高级武士也是鹿持的学生。^[50]也许鹿持对乡士和庄屋阶层的学生影响更大，因为他们占了私塾学生的绝大部分。不管怎么

样，上文所述的庄屋请愿书中无疑带有神道教的思想。作为行动或改变的正当性理由，《古事记》的内容以及为君王服务的先例显然比封建实践更有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勤王党的狂热分子再次使用了这种方法。显然，对于身份较低的人来说，憎恨上级天生的优越感、意识到自己社会角色的重要性、忠于更高一级的君王以及以前君王统治的秩序，都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因此，看到坂本龙马及其同伴自信地引用这些合法性理论，向父母和朋友解释自己不遵守上级命令时，我们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上述的抗议事件发生后不久，土佐政府为了加强藩国的经济实力，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政策和庄屋的抗议可能关联不大，甚至没什么关联，但它们无疑是为了加强当局的统治和垄断地位，而这正是庄屋深恶痛绝的。尽管如此，土佐改革的意义深远，因为它是一场普遍性和实质性的全国性改革，试图恢复商人和封建权利之间的不平衡局面。

在家齐将军漫长而慵懒的统治（1787—1837）之后，天保改革到来。正如这类漫长统治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不公、铺张和腐败的现象变得比比皆是。这些现象并不只限于幕府。已经于1787年退隐的萨摩藩藩主岛津重豪（1745—1833）一直影响着藩国政策，

* 坂本这么给一位逃亡朋友的父母写信：“大名……不理解将政权交还给天皇的想法，然而这件事却是迫切需要做的。那么，低级的武士应该怎么做才能为陛下分忧呢？你们知道，一个人应该将皇室看得比国家、比亲生父母还重要。那种时常认为将亲戚、藩国、母亲和妻儿放在第二位是违反职责的想法——正是那些愚蠢的官员灌输给我们的……”引自高知县佐川町立青山（田中）文库一封未发表的信。

直到 1833 年去世。他生前慷慨地资助文化和科学项目，在江户生活的排场也很铺张，因此身后留下巨大的债务；土佐藩的藩主山内丰资（1794—1872）统治了 34 年，直到 1843 年退隐；长州藩的藩主毛利齐熙（1783—1836）在 1836 年去世之前已经统治了 27 年，这段时间长州藩的债务已经累计相当于藩国 37 年的平均收入。当这些漫长的统治结束时，财政问题四处凸显，新的统治者也希望进行改革。

天保改革最先始于德川家族的旁系水户藩。1830 年，德川齐昭继任水户藩藩主之后，着力扭转农村由于人口减少而引发的危机。当时，水户平原的农民大量涌入江户。齐昭试着削减开支和一些不必要的享受，并强迫一些武士离开城市回到乡村，这样他们的生活成本会比较低，而且能够发挥作用。但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

与此同时，在低级官吏、儒家学者大盐平八郎的领导下，1837 年大阪爆发了令人震惊的起义。所有人都意识到全国性的改革已经迫在眉睫。齐昭利用自己在老中中的影响力，向 1841 年升任首席老中并施行了一系列全面改革的水野忠邦施压。水野试图收回发给垄断行会的执照，同时厉行节约，限制和削减公共开支。可是他的努力却使大名疏远了他，1843 年水野被革职。他努力想让日本回到商业经济以前那种俭朴的生活水平，然而失败了。上文已经提到过，1843 年，在被革职后，一伙江户的暴徒袭击了他的宅邸。^[51]

幕府的改革失败了。支出继续高于收入。试图废除行会（座）的做法正好显示出它们的重要性，因为食品暂时停止运往江户。此外，并非水野原来想象的那样，被垄断行会在某种程度上压低的价

格，如今在自由竞争的机制下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涨了起来。

尽管如此，在其他经济关系没有那么复杂，重商主义的目标更容易实现的藩国，这一时期的改革则取得了成功。萨摩藩的大名为了处理债务和收入不足的问题，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措施。对于拖欠大阪金融商人的债务，部分重新筹资偿还，部分则被免掉。他们缩减开支，暂停了在鹿儿岛进行的大量西学实验。武士的薪俸被削减到最低水平，同时，他们加强种植供应国内市场的经济作物，以提高藩国的收入，同时继续保持与琉球人之间的奢侈品贸易，获取高额利润。萨摩藩出产蜡、棉花和蔗糖，农民被迫要种植这些，但藩内却很少使用或者享用，其收支状况因此得到改善。结果它成为德川幕府最后几十年的经济强藩。萨摩藩的成功之处，正是幕府的失败之处，因为它可以相对地使自己的藩国不与外界接触；因为它拥有大量的武士，可以利用他们来监督和执行那些限制平民生活水准的措施；因为它可以利用自己的地理优势，控制与琉球人之间的贸易而获利丰厚。一些学者指出，萨摩藩的统治者之所以取得成功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更“现代”，而是因为跟幕府统治的社会相比，他们的社会更落后。^[52]

本州岛西部的长州藩采取了不同的措施，效果也差不多。长州藩也面临着巨大的债务，而且1831年爆发了一次大起义，直接威胁到政府的统治。1838年开始，长州藩政府通过削减礼仪支出、允许武士延期偿还债务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统治，改善了武士的生活。这反过来又稍微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更重要的是，他们采取了削减藩债的措施。政府开垦荒地，开办盐厂，增加的收入用来向航

运企业投资。通过将传统的债务模式转向商人和企业家，长州藩政府利用自己战略性地理位置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使自己在随后动荡的日子里始终屹立不倒。虽然这些经济措施没有萨摩藩的苛刻，也比水野当政时的幕府政策开明得多，但总的说来，长州藩的政策是德川时代改革政策的合理延续。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是，政府涉足了一些私人企业的领域，例如高利贷这种以前只有商人经营的行业。长州藩的放债人被迫解除了武士的债务，或者同意他们延迟付款，而政府也采取措施防止武士继续借债。^[53]

萨摩藩和长州藩的改革与水野在江户进行的改革相比，区别主要是在执行上，而不是在目的上。改革的成功也许应该归功于它们的地理位置。这两个藩国处于一个在贸易上具有战略地位，且与世隔绝而相对容易控制的区域。不过，它们有一个地方还是有明显的差别。水野在对待西学方面非常保守和排外，在当政期间，许多江户的兰学者受到迫害。^[54]长州藩的天保改革给官方的藩校带来一系列变化，其中包括重视兰学，藩政府还出资翻译主要的兰学著作；萨摩方面，因为不再需要，其天保改革在西学方面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前任大名重豪曾经耗费巨资，将大部分的藩债用于西方的科学实验。天保时期，萨摩藩的支出减少，但他们对西方事务并不反感。^[55]

天保时期土佐藩也进行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改革，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著名改革不太相同。第13任大名山内丰熙于1843年继位。他发现土佐藩债务庞大，而且每年都在亏损。藩国的净收入是141689石，其中的2/3，或者说98372石用于在江户、大阪和京

都伏见区的花销，剩下 43317 石用于藩政府的运行。增税和增加垄断行会的做法均不太可行，因为上一年吾川郡爆发了农民起义，几百农民越过边界逃往邻藩。这说明乡村不可能平静地接受额外的索取而不做反抗。^[56]况且，债务和商业化显然正影响着整个统治阶级。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乡士头衔的转让增多了。1845 年在册的乡士一共是 742 名，1830—1867 年间有 1/3，即 212 名乡士转让了头衔。^[57]

土佐藩一开始使用传统的方法。1842 年，他们颁布的一项法令取缔了藩内的 13 个主要行会，这无疑是在仿效前一年水野的做法。接着藩国又颁布法令控制物价，禁止价格上扬。政府也着手削减开支，并且按照惯例宣布将会降低武士的薪俸。他们在想办法摆脱与大阪商人之间的联系，希望借此摆脱欠债。这种做法自然遭到商人的反对，同时还有一些武士阶层的成员，尤其是上层的特权集团表示反对。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放贷受到限制，同时担心自己的收入会成为藩国紧缩政策的对象。^[58]

然而对土佐藩的创建者来说，天保改革更多的是个人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丰熙在物色主持改革的新人选时，选择了一名留守居组，也就是上级武士中最低一级的武士马渊嘉平。1820 年代，马渊曾在江户的财政部门任职，在和江户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接触到了一种在商人阶层中广为传播的新的融合思想。“心学”是石田梅岩（1685—1744）最先提出来的。石田原来在京都的商家当学徒，后来放弃从商，将儒学、神道教和佛教的思想融合，创立了一门名为“商人道”的学说。石田认为交易和获利对商人来

说非常合理，并且赞扬了诚实、正直、敬畏和忠诚的品格。心学的老师并没有批评政府，事实上，他们认为武士是所有阶层的道德模范。^[59]随着心学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商人中传播，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被它吸引，其中就包括土佐藩的武士马渊嘉平。幕府认为心学有许多优点——天保改革禁止一切的公共活动，除了教授心学和神道教的课程、武道课程和落语——但是让武士们接受一种本应属于商人的思想似乎不太妥当。1827年，马渊嘉平不太体面地从江户回到土佐。他在土佐继续研究和教授自己的第二爱好柔术，并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丰熙任命马渊为财政部门的直属官员，开始了改革计划。此后，马渊负责全藩的经济改革。聚集在他周围的是他的柔术学生，这些人同时也向他学习了心学。学生中有高级家臣，甚至包括一位姓柴田的家老。马渊的门徒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其中包括一些热心支持西医和心学的学生。

天保改革使土佐藩的武士团体觉得自己的地位和收入受到威胁，因此，他们自然憎恨马渊集团的影响力和显赫地位。这些人用一种会带来好运的贝壳打比方，给马渊集团起了个绰号叫“棘螺组”^{*}。不久，他们诽谤马渊。一时谣言四起，说他秘密信奉基督教，关于他原来信奉心学的陈年旧事也再次流行起来。最后，藩主丰熙听从了劝告，派人监视他，结果发现马渊事实上仍然相信心学，于是丰

* 日语为**おこぜ**，是土佐地区对亚洲棘螺的俗称。当地人认为，将亚洲棘螺放在怀里，捕猎或打鱼时可获得丰收，因此忌妒马渊一派的人称他们为**おこぜ**。——编注

熙把马渊监禁起来，并将他的学生驱散。马渊的改革措施也随之消失。1843年，土佐的天保改革结束了。^[60]

天保改革曾经是很多学者关注的对象。幕府的改革失败了，而萨摩藩和长州藩却取得了成功，一些学者认为西南大藩取得成功的原因在于它们没有德川家族那么“现代”，而且政策施行起来也比领有日本商业最发达地区的德川家族更为严厉。也有人认为，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年轻武士在这些改革中通过担任行政管理人员获得了经验，从而成为19世纪后半叶国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明治早期的政府，尽管在勤王党人的领导和指挥之下带有封建和资本主义的特点，但是却经常被视为“专制主义者”，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新的政治和政府架构始于天保改革。但是，从短期呈现的土佐改革中，我们很难找到持久或者重要的经济、政治成果。土佐藩在军事方面进行了改革，也采取了一些增强经济偿还能力的措施，但这些计划跟意图和以前差不多。再说，天保改革期间，土佐藩的大部分维新领袖还只是努力用功的学童，并非钻研官僚权术的学者。长州藩和萨摩藩的情况也是一样。不过，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在天保期间，土佐等藩国的低级官员获得了一些经验，从而能够成为1850年代安世时代卓有成效的改革家。这导致了1860年代维新领袖第一次起来反对他们，而那些改革带来的藩国的富强又增加了反抗的力量。不过，紧迫而有效的安世改革与其说是源于统治阶层内部新的动力和定位，还不如说是因为西方的威胁正在逼近。^[61]

马渊嘉平下台后的那几年，土佐藩并没有采取富有想象力的方法来处理封建社会末期的问题 and 经济问题。吉田东洋是马渊任命的

新人，曾担任船奉行和郡奉行。他利用恩师下台，自己被迫赋闲的这段时间，阅读了大量历史著作，同时收集西方的资料。1850年代土佐藩进行的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主要应归功于他那几年的研究。吉田研究的书籍都来自中国，其中包括魏源的《海国图志》。^[62]然而他的情况只是个例。佐佐木高行后来回忆说，马渊下台的那几年，土佐知识界受到严重伤害，任何武士只要表现出热烈一点的求知欲，就可能遭到同伴训斥，认为他有向已遭摒弃的心学派及其思想靠拢的秘密倾向，即便是1850年代掌权后的吉田东洋也受到污蔑，被说成是精神上的谋反派“新棘螺”组的统治者。^[63]

世纪中叶，土佐藩政局中最后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是1848年山内丰信（容堂）继任大名。容堂出自第10代大名丰策的旁支，精力非常充沛，而且很有才华。他是德川时代最后十年少数几位影响国内政局的人物之一。容堂非常精明，能一眼看出下属的个性和能力；他读了大量的史籍，对吉田东洋这样能干的大臣充满信心。这些都使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显得意义非凡。他的酒量很大，土佐男人的豪饮全国有名，此外，他还很有个人魅力。容堂性格外向，充满活力；他嘲笑呆板的礼节，蔑视空洞的仪式，因此和地位比他低的人有广泛的交情，同时也让同等级的人震惊不已。他即位后首次会见幕府老中阿部正弘即是一例。容堂低声敷衍了一些诸如阿部的职位如此之高，担子一定很重之类的话，之后突然话锋一转，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我真正的想法是，你跟那些愚蠢的大名打交道肯定感到很轻松，并且乐在其中。但是对我你可要小心。”^[64]容堂

随着形势的需要，时而活力四射，时而幽默风趣，时而粗鲁无礼，时而温文尔雅。他平衡着各派系和人物，从而尽可能地将藩国的政策和发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他非常尊敬自己的家臣，包括那些和他意见不一致的人。在德川时代晚期，这种情况并不常见。

容堂以下的高级职位，由高级家臣的家族代表出任。如果我们相信他们同龄人的判断，那么这些人大多身体虚弱，过于相信自己的安全，同时又懒惰无能，毫无想象力和随机应变的能力。土佐与其他藩国一样，门阀的观念根深蒂固，世家望族安于现状，因为这能保证他们世代荣显。而且，他们还得到了前大名丰资的支持。他们害怕任何改变，不论是藩国还是幕府的政策。这些人最担心的是藩国的政策会与幕府老中的意愿相悖。因此，对于本可以使藩国的财政和军事力量得到加强的全面改革措施，他们只是勉强地表示支持，担心会引发幕府的猜疑和反对。容堂后来巧妙地去除了他们的影响力，但他不可能也不愿意将他们从官场中剔除出去。19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吉田东洋领导的改革派开始一系列改革时，为了除掉吉田，去除他的影响，这些名门望族被证明会放下架子和最低级的心怀不满者合作。

土佐的官员主要来自武士阶层，但不是最高级的那种，而是高级武士下面五种统称为上士的武士。一些最能干的官员正是出自马回和小姓组。吉田东洋本人是一名级别较低的马回，薪俸200石。他的祖先是长宗我部氏的家臣，后来为山内家族效力。从他的追随者和学生当中，走出了像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福冈孝弟这样的中上级武士。他们主宰着德川时代晚期土佐藩的政策，进而在明治



福岡孝弟（左）与板垣退助（右图前排中间）

时期的政治历史中发挥重大作用。

平士之下是下级武士，其中主要是乡士，以及他们的乡村盟友、邻居庄屋。庄屋的社会和经济基础使他们可以安全地提出抗议，也导致他们对改革当局过于热心的中央集权政策表示愤怒。这些人的儒家思想和忠君思想也很浓厚。他们被专横地排除在高级藩职之外，但却控制着对那些人来说最为重要的区域。随着德川时代晚期外国威胁和国内矛盾的日渐严重，他们越来越认识到军事训练，尤其是剑术的重要性。下级武士的剑术学校后来成为政治联盟诞生的温床。在这种环境中涌现了许多未来维新斗争的思想家和狂热分子。1862年去世的乡士吉村寅太郎首次给父亲写信，解释自己的行动，其内容就令人回想起1841年庄屋同盟的决议。^[65]在维新时期的斗争中，土佐庄屋、乡士之子的骁勇善战和勇往直前无人能比。对他们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进入梦寐以求的武士阶层的机会。中冈慎太郎是

土佐东部一名大庄屋的儿子，这一状况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他一开始是勤王党的成员，和一群主要由乡士和庄屋组成的志愿者前往江户。他在那里为容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离开土佐，成为长州军事组织支持下的一名统帅。从这两个阶层还涌现出了另一个人，他最先接受的训练和观点使其完全赞同勤王乡士的政纲，后来还参与制订了一个计划，经过修改成为新成立的明治政府的第一个行动纲领。从坂本龙马这名 1771 年获得乡士身份的酒商之孙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那一代人在典型的政治教育下思想和行动上的变化。

世纪中叶土佐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没有一个被 1840 年代的改革所解决。一名才能非凡的大名刚刚继位。对德川家族世代相传的责任将制约他，使他认识不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并限制他参加 1860 年代的倒幕运动。责任和特权相结合，使他的大部分家老成为既定秩序的代言人。然而在他们之下的实际管理层面，我们将会发现一些具有丰富管理经验，同时又懂得变通的人。许多乡村的社会和政治领导将自己与那位 16 世纪被废黜的大名联系起来。他们没有机会像上层阶级一样获得官职，也没有机会像上层武士那样住在城里。到了 1850 年，无数社会问题造成的紧张气氛已经开始呈现。不过，这些问题本身并不足以形成改革或者是行动纲领。政府因准备不足而无法应对 1850 年代出现的新问题，被迫进行必要改革时，在下文中提出的大部分建议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采用了神道教老师的语言。这些老师对他们的神圣土地和统治者的关心已经渗透进了私塾的教育中。

第二章 对西方的反应

1853 年夏，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到来，为幕府、其下属以及他们的家臣们开启了一个充满新问题和各种可能性的时期。幕府面临着外交和国防方面的决策。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它重新将大名集结起来，以求获得支持。不过，外来威胁也为幕府巩固自己的地位提供了可能，因为我们将会看到，西方列强之间的竞争使日本有可能获得一两个希望在刚刚开放的日本获得特殊待遇的国家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幕府官员难免会想在某个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获得对大名的绝对控制。那些大名自作主张已经有些年头，看上去有必要对他们采取这类措施。被召集的大名的首要问题在于对幕府的要求和地区性的防务措施提出自己的意见。在这当中，长期建立起来的特权模式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具体细节我们将在土佐看到。同时，对大名的家臣来说，思想和活动的新潮流开辟了组织和计划的新途径，而这些之前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却通过一些保存文化遗产的标语而变得合法起来。掌握事态发展的细节对我们很有用。我们将观察幕府内部对西方威胁的反应、这种反应在土佐

藩造成的变化，以及这一切对年轻的乡士坂本龙马正在形成的性格有何影响。

德川幕府的反应

前文已述，德川幕府的领导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控制那些拥有广袤土地的大领主。大名按祖先加盟的先后顺序被分为不同的等级，而且参勤交代也耗尽了他们的时间和财产。其次是防范对幕府权威的固有反抗。这个问题通过隔绝和诋毁京都的宫廷已经得到解决。天皇的一举一动都在幕府代表的监视和控制之下，各大藩国和京都贵族之间的联系被降到最低，而且必须经过幕府的批准。宫廷隔绝于政府机构之外，完全不问政事，以致许多日本人很少意识到（假如他们有意识到的话）皇室的政治和宗教权利。荷兰商人认为宫廷本质上只是一个教会，经常顺理成章地认为将军是日本的合法统治者。京都似乎不会带来什么威胁，以致幕府本身成为国学学者的主要资助者，而他们则再次将尘封已久的古代神话搬出来，声称天皇拥有神权。到了19世纪，早先有关藩国和宫廷之间联系的禁令有所松弛，但幕府总是不时重申自己的权威。当平田笃胤在为神权奔走而做得太过火时，让他闭嘴似乎再自然不过；幕府在天保改革期间也是一样。我们将会看到，1858年宫廷势力首次显示出来时便被德川幕府的守旧分子毫不犹豫地打压下去。第三点是通过防范大藩与外界之间的可能联系来加强这一切。这是个与世

隔绝的社会，荷兰商人和幕府指定的渠道只在长崎进行安全而有益的接触，因此日本与外国之间的联系只有少数几种对幕府本身有益的商品和信息。

佩里对幕府第三种领导模式的挑战，使人们对另外两种领导模式也产生了质疑。这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和平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幕府在试图解决 19 世纪的危机时，国库是空的，1840 年代的失败改革仅仅成功地凸显了幕府的无能，它已无法使经济事务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了。那些强藩大多跟它一样束手无策。幕府最重要的支持者谱代大名和亲藩大名的情况尤其如此。他们的领地是大片平原，中间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城市中心。在这些地方，商业的高速发展已经大大削弱了统治阶级的地位。显然，幕府不能指望这些大名能有效地重整军备，支持自己，除非将他们从那些意在削弱他们的巨大花销中解放出来。再说，既然佩里带来的危机本质上来自外国，那么幕府不可避免地要呼吁大名在考虑国防问题和国内利益时通力合作。这些反过来使人们思考，什么是国内而非国外，什么是传统而非舶来品。所有这些无一例外指向京都。神道教学者的著作已经在知识阶层和目不识丁的人群中间广泛传播，因此，我们已经看到遥远的土佐各地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1840 年代幕府能够通过法律手段，阻止这些极端思想的传播。当时它的主要防线看起来仍牢不可破，然而现在，一处漏洞将接二连三地揭示出其他的重要缺陷。

海军准将佩里关于订立条约的要求使幕府陷于两难的境地。大家认为，直接拒绝将会导致战争——一场日本不可能取胜的战争。

尽管如此，许多负责的人却肯定会赞成这种做法。自从18世纪末开始议论俄国威胁论以来，日本国内出现了大量关于如何避免外国侵略的方法，19世纪英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这一问题显得更加紧迫。“开国”和“攘夷”是五六十年代国策争论的两个极端，但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一片存在着各种观点的广阔区域。主张拒绝美国人要求的并不只是对西方力量毫无认识的反开化论者。在许多方面，正是由于对敌人科技和军事上的优势有清醒的认识，才使许多人赞成拒绝佩里的外交照会。这些人解释道，同意的话将会使日本臣服于西方；反过来，拒绝则会带来危险并可能使日本战败，然而日本正需要这种同仇敌忾来提振日本人的精神，重整日本的军备。这类强调日本精神本质的观点，在逻辑上和那些努力想彰显这种精神的学术活动有关。对大部分识字的日本人来说，它和水户平原上受到以德川齐昭为首的德川旁系大家族资助的学派有关。水户学的学者继承了德川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儒家学说和忠君思想，对西方势力有全面的认识。然而，其代表人物，例如会泽正志斋和藤田东湖，却强调必须在加强民族精神之后再与外国联系。他们的主人德川齐昭是1850年代这种观点的有力支持者，水户藩实际统治者德川齐昭一方面急于利用西方的军事技术，一方面又坚定地认为西方人没有进入日本的权利。

另一种做法是同意美国人的请求，希望在外国人变得贪得无厌之前满足他们的要求，避免无法取胜的抵抗，同时全面进口军备，提升日本的力量，为最终将外国人拒之门外做准备。在民众的心目中，这种观点与那些学习西方的、他们称为“兰学者”的人有关。

在 19 世纪中期的日本，这些外部世界的专家在重要性和自尊方面大大增强。佐久间象山是江户西北部一个小藩的藩士，非常勤于教学和著述。他的领主在担任德川幕府的老中时表现不俗，使他也声名远扬，许多藩国都来请他去。佐久间有许多学生，其中包括长州藩的年轻学者吉田松阴。松阴后来在松下村幽禁期间，培养了一代未来的统治者。

必须要指出的是，这些观点尽管在争论时水火不容，但它们却有很多共同点。攘夷派认识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而开国派之所以赞成开国，也是为了加强国力以便将来一举将夷人赶出国门。佐久间象山强烈反对最终与佩里达成的协议，认为该协议不公平，是对日本的侮辱，但还是被一名认为他是叛国者的真正的保守分子杀害。他的弟子吉田松阴则通过热情的授课和不顾一切地策划暗杀与西方签订条约的幕府“逆”官，继续成为长州藩勤王志士和攘夷派的偶像。吉田广为西方人所知主要是通过罗伯特·史蒂文森的描述。史蒂文森深表同情地描写了他为了目睹外国人的威胁而试图登上佩里的战舰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上不断出现新的可能性，开国和攘夷口号的内容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没有一种观点是固定不变的，也没有一种观点完全不受其他观点的影响。

幕府在这些问题上的决策权主要落在老中手里。老中由四五名谱代大名轮流担任，每人任期一个月。担任这一重要职位的谱代大名，均是祖先自 16 世纪后期便追随德川家族转战四方，立下赫赫战功的家族。他们与现有的秩序利益攸关，因而敏锐地意识到保持自己在制度上的优势地位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避免

外样大名与国外无限制地接触。但是另一方面，在德川幕府的安排和控制下有限地开放国土好过与外国人开战，因为外样大名可能在战争中增强自己的实力和自主性。德川家族的旁系，特别是水户藩的大名在幕府做重大决定时也有一定的责任。当将军没有子嗣时，继任者一般从尾张藩或者纪伊藩的旁系家族中挑选，水户藩的德川家族按照惯例没有继承权，但是他们一直都担负着监护的责任，因此有特殊的地位。德川齐昭在外国威胁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以及水户学者的预言性角色，让水户藩和偏向于保持社会现状的谱代大名之间产生了分歧，而这些将导致重要的冲突和幕府内部的分裂。^[1]

这种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分歧和争吵。当幕府征求意见时往往不可避免。为了达成一致意见，同时分摊决策者难以避免的责任，在佩里到来一个月后，老中首座阿部正弘将佩里带来的菲尔莫尔总统的信的翻译件发给大家传阅。同时附上一封写给所有大名、高级官员、学者甚至是一些商人的请求信。“国家正在危难关头，”信中说，“请认真思考这封信的含义，并畅所欲言。”^[2]这个崭新而灵活的方法本身蕴含着危险，即幕府会倾听所有人的意见。它首次表明幕府意识到，在新的特殊危机下需要对组织机构做出调整。该组织机构在和平年代运作良好，但是除了顺从之外并不能保证获得大名的支持。年轻的阿部正弘首先迈出了这一步，表明德川幕府的等级制度对那些特别灵活且有进取心的人留有余地。然而，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在执行自己的政策时不够坚定，而且在怨恨和不满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这种理性的闪现也越来越少了。

从现存 59 位大名的回复中可以看出，阿部虽然没有通过咨询他人的意见而解决问题，但他确实使问题得到缓解。大名们的意见当然反映了高级家臣的意见，即同意继续实行闭关锁国这一理论上的美好愿望。他们知道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军事抵抗，因此竭力主张避免立刻发生战争，而且非常赞成马上着手防务和军备。大部分留存下来（大约占总数的 1/5）的回复可以解释为赞成至少暂时同意佩里的要求。然而，最强烈的观点来自德川家族内部。由于他们都是有权参与决策的人，阿部仍不得不疏远一些他征求过意见的人。最重要的反对派是水户藩名义上的大名——德川齐昭之子，他赞成坚定不移地拒绝美国人的要求，而强大的谱代大名——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提出的观点也很重要，即进行一段时期的贸易，从而帮助日本加强国防。幕府内部存在两派不同的意见，导致未来一定会产生激烈的辩论。井伊的态度受到一些直接负责防务和贸易的低级官员的重要支持，而且阿部正弘本人是他们仕途上的保护伞。相反，外样大名则很少反对大家猜测的、在接下来几年出现的幕府的意图。萨摩藩的大名建议推迟决定，以便幕府和各藩制订防务计划。长州藩的毛利家族建议拒绝贸易的提议，专心防务。佐贺藩的锅岛家族主张立刻一口回绝，而土佐藩的山内容堂则建议拒绝美国人，转为向荷兰人求助，请他们帮忙制订一个紧急防卫计划。另一方面，其他的外样大名，例如福冈藩的黑田家族则主张开放贸易港口。幕府组织的讨论至此毫无结果。它促使一些（也许是大部分）大名认真权衡各种利弊，并提出可以避免与外国人一战的方法。它也显示出我们一开始便已知道的，日本人对与西方世界重新进行交流的想法

普遍缺乏热情，而且清楚地表明幕府通常请教的智囊团和领导层的意见有明显的分歧。^[3]

当佩里 1854 年回来听取德川幕府的答复时，此前向各藩保证将努力维持和平，并且不给佩里明确答复的幕府却勉强同意和对方签订条约。条约虽然没有包含任何贸易条款，^[4]但是佩里的目的已经达到。幕府还向大名承诺将尽快完善军备，这时已经开始订购。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采取政治行动减轻不满情绪。为了获得对与美国签订条约的支持，阿部正弘任命水户藩的德川齐昭负责国防事务。攘夷派的首要代表就这样被说服，并与自己所反对的政策进行合作，而条件是他掌握大权，有朝一日可能实施更加强有力的政策。

但是，齐昭对行政和军事改革的大力支持却引起了幕府中守旧派的怨恨和担忧，他们认为全面改革威胁到了自己的利益。确实，破除藩国的限制，任人唯贤（就像齐昭所说的那样）可能会淘汰一些本来可以领干俸的人。例如，新设立的西学机构招收了两名教授、十名教授助理和三名句读教授，其中德川的家臣排在最后面，级别也最低。^[5]然而，针对齐昭的斗争却非常短暂。事实证明，他的主要支持者阿部正弘对长期的官僚斗争不感兴趣。1855 年秋，他任命堀田正睦为幕府老中，并将领导权交付给他。两年后阿部去世，不过在那之前他的光芒已经被堀田掩盖。堀田从一开始便大力主张开国。没有了阿部的支持，齐昭在幕府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自那以后，攘夷派在江户便失势，甚至连发言的机会也失去了。^[6]

1856 年，汤森·哈里斯来到下田，小心谨慎地开始了谈判，其

成果便是 1857 年与幕府官员签订的贸易协定。到了这时候，每个人对西方的势力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西方对中国第二次战争的胜利使许多人抵制哈里斯的条约，但是其他人，例如参与谈判的德川幕府官员，则坚信与西方人打仗不会有任何效果。齐昭这时的攘夷态度也有些软化，但仍坚定地反对幕府进行谈判。相反，他提出了一系列将西方人拒于千里之外的措施，但这些天花乱坠的措施表明他更多的是在反对幕府的态度，而不是政策本身。他说，假如不进行贸易就无法将美国人赶出去，那应该派他和三四百名浪人和农夫的小儿子到美国去。这样就不会“对农民、市民等人造成重大的伤害，因为你给我的只是没人要的小儿子，不论发生什么事，全家人的生活都不会受到影响”。^[7]

江户没有人支持他，因此齐昭寻求京都宫廷的支持也就不足为怪了。水户学一直强调传统的忠君思想，因此京都的贵族都是他的天然盟友。更值得注意的是，幕府感觉到各藩对新的贸易条约不满，也向京都寻求支持。按照惯例，幕府在做重大决策之前，必须获得宫廷的批准，但是堀田正睦把这看成是让天皇降旨，同意与西方进行贸易的大好机会。因此，幕府的两股势力分别向德川家族以外的京都势力寻求支持。这一重要的变化使得京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之前一直小心翼翼不问政事的年轻公卿也开始接受政治教育。现在，他们也开始谈论起国事的发展，使“天皇大感不安”。长期以来幕府都认为自己的职责是使天皇安心，保护天皇，并且可以在关键时刻采取必要的手段。从这一天开始，它将不得不面对一种传言，即它反而应该为天皇的受辱和伤心负责。不过，德川幕府的影响力并



德川家茂（左）与德川庆喜（右）

没有开始减少，而且这种言论主要是在那些老练的保皇派和天真的激进分子中传播，后者人数急剧增长，坂本龙马就是其中的一位。

京都成为国内和国际政治的中心。时势的紧迫和将军家定的无能，使许多人意识到日本急切需要一位能干且强有力的将军。家定没有子嗣，在继承人选择时便有许多可能。按照惯例和血缘关系的远近，幕府应该从纪伊藩的德川家族中选出一名继承人，谱代大名都同意这种做法。但是这名继承人（即后来的将军家茂）过于年轻且没有经验，于是有人提出能干的庆喜才是目前最为合适的人选。庆喜是水户大名德川齐昭的儿子，过继给了一桥家。齐昭现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他可以通过支持“能干的人选”而支持自己的儿子。庆喜的候选人资格得到了少数几位有能力的大名的鼎力支持，包括萨摩藩的岛津齐彬、土佐藩的山内容堂、宇和岛藩的伊达宗城，以

及德川家族的旁系越前藩藩主松平春岳（庆永）。几年前阿部正弘曾经非正式地咨询过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这些藩主派特使到京都游说，希望宫廷支持幕府选择一名成熟且有能力的将军。值得注意的是，这群人中仍然没有任何仇恨幕府的倒幕思想。他们是希望通过选出一名有能力的将军来改变德川幕府。这名将军将有足够的智慧改变现有的制度，使之有益于国家的统一和强大，并将立于国门的外国人驱赶出去。

1858年春，堀田正睦亲自来到京都，敦促宫廷尽快下旨批准幕府的政策。在他到达京都之后，哈里斯协议和将军继承人两个问题彻底混淆起来。这里现在成了阴谋策划的中心。那些支持庆喜的大领主大部分都和宫廷的贵族有姻亲关系，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展示其影响力。他们派出信任的家臣充当自己的代言人。那些人的地位和名气通常都不是太高，最适合眼下这个微妙而不起眼的任务了。然而，这座古城不像戒备森严、到处是幕府衙役的江户，因此也同时成为一些自封为独立卫道士的人活动的天然舞台。许多浪人、煽动分子和攘夷狂热分子在这里增加对时局的影响力。

宫廷贵族分为许多等级，非常复杂。堀田清楚高级公卿对德川幕府的愿望反应热烈，但是年轻和低级的廷臣在人数上占优。最后，高级公卿在辩论中胜出。堀田取得了险胜，天皇同意幕府政策的谕旨颁布下来。但是，关于该谕旨其实并非天皇本意的谣言甚嚣尘上，包括后来的维新领袖岩仓具视在内的一些低级廷臣集会抗议，并成功使天皇收回了谕旨。修改后的宫廷态度出现彻底逆转，谕旨变成了向将军下令，要求他忠于德川幕府的现行制度。“变革东照官以

来之良法，涉全国人心之归向，难量永世安全”。谕旨继续说，临时条约的签订将使“国威难立”。因此天皇命令幕府再次与大名磋商后再向宫廷汇报。^[8]

堀田返回江户时，已经想好了支持齐昭之子庆喜成为将军继承人的计划。鉴于国家正处于危急关头，幕府将指派一名摄政，或者说大老*担任老中的首领。首先推举庆喜为将军继承人的松平春岳似乎是这个职位的可能人选，而如果这个任命顺利的话，其他职位的任命也就顺理成章了。幕府的合作态度将赢得京都的信任，届时，京都将会支持幕府的行动，而在京都活动的大名也将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这个计划失败了，因为谱代大名在江户的圈子中仍然有着很强的势力。他们警觉到自己的特权正在丧失。这些人确定了大老的人选是彦根藩大名井伊直弼。继承人的问题很快也解决了，大家都倾向于选纪伊藩的旁系家族。不久之后，幕府开始对庆喜的支持者进行清洗，并逐渐蔓延到宫廷和家臣中间。那些受大名委派而前往京都为其游说的家臣遭到尤其严酷的处理，许多人被处死或者死于狱中。[†]正当幕府进行大力整治时(假如这种整治谈不上聪明的话)，西方人在中国的动作更大，并已深入中国内地的消息传来。幕府的

* 这是一个只有在危急时期才设的官职，职位在老中之上。按照惯例，只有等级最高的谱代大名才有资格出任，实际上这时只有四人有此资格，彦根藩的井伊家族便是其中之一。松平春岳是德川家族的旁系，不是谱代大名，因此假如他出任这个重要职位，将代表一股新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独立的”政治势力。

死去的人包括长州藩的吉田松阴、越前藩藩主松平春岳的谋臣桥本左内（桥本也是最先思考成立议会的人之一）以及具有忠君思想的独立学者梅田云滨（梅田一直在各地巡回讲学，在宫廷的公卿中有重要的影响）。

谈判官员从汤森·哈里斯口中听说这些消息后惊恐万分，不停地催促幕府立刻批准条约。1858年7月，摄政井伊在没有取得天皇同意的情况下批准了条约。这一系列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疏远了许多外样大名，京都的公家和德川阵营内的水户藩也同样疏远了幕府。土佐等地的勤王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佩里到来后的几年时间里，这些政治和外交上的变化占据了绝大部分国内事务。幕府对西方问题的反应包括采取一系列旨在加强军事装备的措施，而简要叙述一下它们对我们是有益的。1850年代，荷兰人对日本的影响达到了顶峰。显然，无论贸易与否，为了加强国防，日本也需要更多的西式武器和技术，而荷兰人则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些信息的传递者。所以，这十年是通过这一过渡性渠道获取西方科学技术的最后一段时期，随着1860年港口的全面开放，荷兰人的势力将被英国人和法国人取代。1850年代还涌现出几名海战方面的专家，后来在幕府的政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一人便是后来成坂本龙马朋友的胜海舟。不幸的是，幕府的计划受到业已描述过的政治纷争的影响，对技术方案的支持时断时续，导致原来设想的许多目标都没有达成。这对于未来关键性十年中幕府的力量有着重要的影响。

1850年代，从荷兰商人进口书籍和武器的数量明显增多。50年代末期，范·西博尔德（P. F. von Siebold）回到长崎，使荷兰的贸易攻势更加突出。西博尔德在世纪之初曾经来过日本，为日本西学的传播奠定了基础。^[9] 1854年，“索恩宾”号汽船被派往长崎，

随船同去的还有海军上尉法比尤斯 (G. Fabius)。法比尤斯带来了一封信，其中解释说因为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一时无法弄到战舰，所以无法满足日本先前提出的购买一艘军舰的要求。尽管如此，为了彰显荷兰对日本国王的友好之情，国王派法比尤斯前往日本，法比尤斯在日期间，将尽自己所能地教日本人造船和航海技术。从 8 月 21 日到 10 月 26 日，有 200 多名学生在长崎听法比尤斯授课。法比尤斯回国前，日本人送了他两把日本刀以示感谢。^[10]

法比尤斯回国后的报告让荷兰加大了对日本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一步便是在 1855 年派出一支由海军上尉佩尔斯·里杰肯 (Pels Rijcken) 率领的 21 人小分队，连同“索恩宾”号来到日本，教授日本人航海技术。“索恩宾”号也作为礼物赠送给幕府。后来，“索恩宾”号改名为“观光丸”，成为日本人学习现代航海术的第一个工具。1857 年，这艘船在日本人的驾驶下驶往江户，船上的水手也都是受过荷兰小分队教导的日本人。^[11] 1857 年 9 月，第二支荷兰小分队来到日本，代替第一支小分队继续培训日本人。他们使用的是荷兰政府卖给幕府的其他船只。1859 年 3 月，可能是因为江户的统治者怀疑有官员牵涉其中，这项计划中止。但是，长崎的一所医学校则一直开办到 1863 年。^[12]

两支荷兰训练小分队提交给政府的报告显示，他们对日本学生取得的进步并不是太满意。教官们对封建地位给现代技术教学造成的困难记忆犹新，他们说，日本水手都是很棒的小伙子，个个身体健康，但是由于出身低微，一开始并不允许他们带任何武器操练。由于没有任何伙食补给，这些人便在“索恩宾”号上生火做饭，他

们的长官则神经兮兮地担心火种蔓延。相反，那些出身高贵的日本人一方面年纪太大（二十大几或者三十出头），一方面也太傲慢，不关心有效管理所必需的繁重的日常工作。在荷兰指挥官的抗议下，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水手们可以带枪操练。所有的军官都必须学习荷兰语，后来计算和测航两门课都是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授课的。但是教官们仍然认为，他们的日本学生怀有可悲的等级意识。这些人对训练中那些有趣的方面非常感兴趣（“击鼓课简直乱成一团，二等兵哈夫提杰（Heftij）训练的十到十二名鼓手整天带着鼓在大街上砰砰地敲个不停”），但却非常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智力训练，认为那太过无聊。报告特别指出，与藩国来的学生和军官相比，德川家族的军官在智力上和制度上的适应性都比较差，尤其是那些来自彦根（佐贺）藩的学生，要比来自德川家族的学生优秀不知多少倍。^[13]

当然，这份对于德川家臣的负面评价中也有例外。第二支荷兰小分队的指挥官范·卡滕戴克写道：“皇家（即幕府）和藩国的军官中也有一些能力突出的人，他们将来肯定大有作为。”胜海舟无疑便是其中一位。他协助教官授课，并在1857年“观光丸”驶往江户时担任指挥工作。就这样，荷兰人的教导一方面开始了日本现代海军的训练，一方面使一些未来具有领导才能的人崭露头角。对于坂本龙马未来的恩人胜海舟来说，这个经历尤其重要。

这几年通过长崎进口的书籍大部分都是为江户新设立的一个西学机构所购置的。在佩里到来后不久，胜海舟便上书幕府，强烈请求设立一个专门收集和传播西学知识的机构。胜海舟希望设立学校，吸收西方和中国在军事、枪炮、天文、地理以及所有相关的科学知

识。他说，只有这样，日本才能变得强大，与西方接触时才能无惧其带来的危险。幕府的高层听取了他的意见，经过认真准备，1857年初，江户的“蕃书调所”开始运作。幕府从全国征调有才干的人任职，使这个机构成为西学最重要的中心。^[14]

尽管当时国内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幕府与藩国、宫廷之间的地位也在迅速变化，但佩里到来后的几年，幕府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贸易往来却越来越接受。1860年，幕府首次派使团到西方访问标志着他们踏出了第一步。官方大使出使时乘坐的是一艘美国轮船，然而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一群在长崎受过荷兰人训练的船员自己驾驶“咸临丸”来到旧金山。

使团成员带回来的书籍和个人经历都是全新的西学知识。他们的亲身经历证明英语远比荷兰语重要，使日本人学习荷兰语的热潮转向了英语；他们在美国的亲身经历以及购置的书籍，使这种转变必然成为永久性的转变。

使团对国策也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三人对日本问题的反应截然不同。他们的每一种观点都代表了解决这些问题的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德川幕府的最后几年正是在这些观点之间摇摆。福泽谕吉是这些人中最不像政治家的一位。他是大阪一家私塾的荷兰语学生，在外国商人来到横滨之后，他转而努力学习英语。福泽谕吉认为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和启蒙，他将余生都用在普及和推广自己丰富的西学知识上。福泽将毕生精力都用在帮助落后的国民身上，对政治没什么兴趣，对政治家就更不用说了。^[15]胜海舟本来就支持蕃书调所成为推广西学和各类科学技术的机构，回来之后

更是坚定不移相信全面实现现代化和自由平等的重要性。他是第一批建议将军放弃统治权的人。在接下来几年与不同等级和不同地区的人（例如松平春岳和坂本龙马）的接触中，胜海舟将展示出其不同寻常的平权思想的发展过程。第三个人是小栗忠顺，后来会接替胜海舟成为幕府的海军奉行。小栗回国后同样认为有必要实行全面的现代化。然而与胜海舟不同，小栗希望在幕府的支持下这么做，并且认为这完全可能实现。他逐渐接受了一种观点，即幕府必要时可以在外界的帮助下将对手打压下去，结束封建制度，建立一个在自己独裁统治下的现代统一国家。^[16]大家将会看到，不管这些反应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如果进行合理的推论，每一种都将对传统的幕府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因此，在与西方接触的最初几年里，日本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少数几位能干的大名敢于大胆地参与政策的制定，而这在之前是禁止他们涉足的领域。尽管鲁莽行事将使他们中的几位受到幕府的惩罚，但他们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许多时候，在隐退后也一样有强大的影响力。幕府向大名征询意见并向宫廷寻求支持，表明它已经将权力放松，以后它将发现再将这些权力收回是多么困难。最后，西学和与西方交往的计划一旦开始就无法结束。一批新的顾问和专家将由此产生，他们的意见虽然基于特殊的第一手知识和经验，但却在将来起到重要的作用。对权威、等级和传统的尊重等德川时代日本的特点将被自信和果断取代，而这种变化现在已经开始了。目前所讲述的这些事件中，直接的参与者并不多。但是，随着他们的努力在藩国展现出来，几个人变成了几百人甚至几千

人。因此，我们现在有必要将视线转向土佐，讲一讲坂本的青少年时代了。

土佐的改革

幕府寻找新的外交政策的努力，给各藩制造了许多问题。他们不得不对一些通常超出能力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同时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加快完成地方的防务工作。另一方面，时局的紧迫也可以作为官僚制度彻底进行改革的理由，而平时很难有这种理由。由于领导软弱，许多藩国在回复幕府的问题时畏畏缩缩，在行政和军事改革方面的探索也未有多大效果。但是，土佐藩的山内容堂是少数几位阿部正弘认为值得咨询意见的大名之一，而且总是有话直说。他是1858年全力谋划让一桥庆喜成为将军继嗣的少数人之一。他还强烈地认为土佐藩内部应该进行改革，并借机调离或淘汰了那些无能但控制着土佐政坛的门阀世家。因此，在这位能干大名的个人想法的左右下，土佐对西方、对幕府合作的提议的反应已经非同寻常。

幕府要求各藩就佩里来信一事各抒己见，土佐藩最初反对答应美国人的请求。容堂在信中写道，西方国家看上去一心想着吞并日本，他们一开始以战舰作为威吓的手段，“示兵威而求开交易，渐以仁爱之意，笼络无智之人，终将日本国尽置于支配之下”。他认为，即便是尝试性地开放贸易，也无法只限于美国一个国家，如果欧洲

列强和俄国也拥有这类特权，那日本就离贫困和俯首称臣不远了。他建议加强海防，雇用荷兰的工程师和军事专家，并充分利用这次的危机感，提振武士阶层的士气。^[17]

接下来几年容堂都坚持这种观点，也许可被称为是介于攘夷和开国之间的中间派。日本不应该屈服于西方，但也不应该忽视防务，而是要通过长崎的荷兰人进口技术、产品，引进军事方面的专家，从而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谴责幕府签订条约显然不太现实，因为它根本无法避免。容堂似乎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极少参与到各方在对西方做出重大让步之后的互相指责之中。反过来，他的立场使他可以同时影响辩论的双方，因为每一方都认为他赞同自己的观点。所以，在与汤森·哈里斯签订贸易协定之后，容堂的建议便显得异常重要和有意思。

容堂写信给幕府，表示自己反对新签订的协议，尤其反对有关治外法权的规定。“如果我们同意美国人将领事馆及该区域视为自己国家，后果将非常可悲。此外，条约还包含许多无礼和侮辱性的要求，读来令人气愤。我想敦请幕府采取坚决的措施，维持自己的声望，同时制服外国人。”^[18]然而与此同时，他又写信给京都，支持幕府的立场。他给宫廷贵族、舅舅三条实万写信说，将夷人赶出去是不可能的。鉴于国家面临的形势危急，他建议天皇应该将与外国人谈判的权力交给幕府，不去干涉他们如何谈判。幕府的承诺得到尊重这一点至关重要，这样才能在军备这些重大问题上保持统一。^[19]

这时，你会发现容堂在谨慎地向幕府施压，希望它认识到为了

确立国防的准则而有必要进行改革。支持京都贵族那些不现实且反开化的攘夷政策，不仅无法使国家变得强大，还会削弱国家。不管怎么说，容堂都是一位充满阶级自豪感的真正的封建贵族，他看不上京都贵族的政治智慧和能力。据说他在1858年与越前藩的松平春岳谈话时警告说，“先下手行内地之大变革，后严肃京都守卫之义，不令京师置喙”。^[20]

容堂说的“大变革”指的是推选一桥庆喜为未来的将军。这样一来，容堂的密友、庆喜的支持者松平春岳将成为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庆喜的父亲德川齐昭肯定也会全力配合。看到问题似乎马上得到解决时，容堂显然认为已经胜券在握，于是改变了对哈里斯条约的立场。如果幕府本身确定会进行改革，那么条约带来的伤害将会被日本国内力量的增强所抵消。因此，当幕府在宫廷的命令下再次询问各大名的意见时，容堂的回答是希望宫廷尽快批准条约生效——条件是必须同时开始一系列改革。他写道，这些改革应该包括幕府内部行政制度的改革，摒弃旨在削弱大名力量的传统政策，并努力争取更多藩国支持幕府等。^[21]容堂同意的条件包括修改挑选将军的传统方法、放松要求大名住在江户的参勤交代制度、赋予主要大名在国内事务中更大的话语权。这些正是松平春岳及其朋友高喊的“公武合体”口号的精髓。这个计划完全无法被德川家族的谱代大名接受，因为他们非常在乎自己的特权。

从这套建议中，人们很容易就以为日本正在计划实施一种更有代表性的决策制度。稍后我们对与议会组织相关的讨论追根溯源，可能发现它们大部分都在松平春岳及其谋士所提的这些刍议当

中。”^{*} 尽管这一计划蕴藏着潜在的“现代性”，但其根源则是儒家和封建主义思想。“用人唯贤”及重大决策咨询各藩意见都是 19 世纪中期政治家们多年耳濡目染的陈旧的政治思想。他们也好，他们的谋士也好，实际上都没有考虑到任何与遥远的民主制或者真正的代议制有关的东西，即便由于事态的急剧发展，他们原来提出的建议和口号不到十年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到那时，第一批明确提出这些计划的人因为逝世或被杀而退出了历史舞台，相关计划渗透了新的西方思想之后继续向前发展，远远超出了原先的设想。事态的发展和西方思想的快速传播就这样产生了叠缩的效果，使西欧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一个进程，在日本几十年就完成了。虽然追溯坂本龙马等人后来掌握和利用的政治组织的思想根源非常重要，然而我们同样需要把握那些首次提出这些口号的同时代人的观点，以免这些口号在 1858 年高谈“民族团结”的封建贵族眼里显得言过其实。

然而，这种向新政策平稳过渡的希望注定要落空。前文已经提到，京都的反开国论者暂时取得了胜利，再次强调幕府本身的传统特权。大老的职位没有给松平春岳，而是给了井伊直弼；将军的继承人也不是一桥庆喜，而是年轻的德川家茂。随后，幕府的新政权开始清除自己内部的中立派，待完成之后又开始对京都那些贸然企图左右幕府政策的贵族公卿下手。那些涌向京都，企图向宫廷贵族施加影响的浪人和学者的领袖都被逮捕，为他们牵线的贵族的仆人

^{*} 松平春岳的主要谋士是桥本左内和横井小楠，后者将对坂本龙马有重要影响。

和随从也未能幸免。这些死于井伊直弼清洗之下的人里，有些后来成了维新大业烈士名单上的英雄，比如梅田云滨。他是一名儒学者，曾参与撰写一些从宫廷发出的主要文件。坂本龙马未来的岳父榑崎将作逃过一劫。那些被大名派往京都活动的代表也成了幕府衙役的目标，有些人的学说看起来和这场令幕府为难的骚动有关，同样成了幕府的阶下囚。桥本左内和吉田松阴就是这样被捕的——前者是松平春岳的谋士；后者是长州藩的学者兼老师，逐渐转向拥护倒幕事业，并计划暗杀忠于井伊直弼的幕府官员。井伊直弼逐步准备向大名本人下手。德川齐昭和松平春岳被迫引退，并在家幽禁，而山内容堂也注定将受到类似的惩罚。

幕府下令容堂加强大阪的防卫，以防外国人可能的入侵。容堂拒绝接受此命令，从而加速从政治舞台上离开。他提醒幕府，自己的力量尚不足以保护自己藩国的海岸线，同时提议支付因参勤交代暂停七年而省下的费用。此外，他还希望得到幕府的帮助，获得新近从荷兰订购的一批军火和一艘船。接着他建议疏散大阪居民，以简化防卫工作。^[22] 这些让容堂不受江户新官员的喜爱，事实上，由于支持庆喜，他已经受到了纪律处分。一开始他被勒令辞去藩主一职，此后行动和自由也逐渐受到限制，到1859年，容堂被命令在江户郊外品川的宅邸里幽禁，甚至不许接收外界来信。他在这里一直蛰伏到1862年春。^[23]

除了敦促国家变革行政管理制度外，容堂还利用佩里造成的危机，对土佐藩的行政制度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改革。根据佐佐木高行

的回忆，容堂一直在等待机会进行改革。1853年夏，容堂正在高知城，官方邮差送来了幕府的指示以及菲尔莫尔总统信件的翻译件。从江户到土佐，一般要走十三天，邮差快马加鞭只花了九天时间。根据一本纪念下级勤王志士的活动的书记载，容堂将信件拿给高级家臣看，但没有一个能弄懂美国人的信是什么意思。^[24]有人猜测，这已足以使这位饱受传统束缚之苦的大名明白，藩国的行政制度亟须整顿了。

容堂任命了一批新的官员，由他们负责改革事宜，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持续五年（1854—1859）的“安政改革”。改革的领导者是马回役出身的武士吉田东洋（1816—1862），他曾在马渊嘉平短暂的天保改革中初露头角。吉田被任命为仕置役，或者说辅臣，实际上主管着接下来几年所有的人事任命和行政事务。他和大部分同事虽然身处藩政府核心部门，位高权重，但是较之被他们替换了的人，地位却要低好几个等级，而且似乎也不打算讨好那些元老。吉田是一名学者，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担任船奉行和郡奉行期间获得了具体的管理经验。在江户随侍期间，他接触了著名的水户学者藤田东湖。通过阅读中国来的译著，例如《海国图志》，他对西方列强在东方其他地方的侵略行为有了清楚的认识。^[25]除了从中国书籍中获得二手信息外，吉田还多次和中滨万次郎交谈，从中获得了大量西方的信息。中滨是一名土佐渔民，曾因船只失事而被一艘美国的捕鲸船救起，并在美国受过教育。^[26]

在1858年以前，吉田的改革都是以军备为主。这是因为在与西方的条约正式签订之前，似乎非要使用武力才能解决问题。在收

到佩里的有关消息之后，吉田就立刻着手进行军事准备。土佐的军队接到驻防到大阪附近的住吉的命令，军队的急速调动让许多人以为战争已经开始了。佐佐木后来回忆说，这些年轻人因为即将越过藩界执行任务而雀跃不已。军事准备还包括努力在土佐制造新的武器，包括大炮。看到各藩之间因此而加深合作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1854年，土佐藩派官员前往萨摩，学习武器制造技术。他们开始建造反射炉，但是没有完成；大炮也开始生产了，尽管结果并不是太如人意；较容易制造的以铜合金为主的武器取得更大的成功，于是为了能成功制造出武器，许多人出于爱国热情把家里的铜器都捐了出来。

最重要的军事创举是创立了民兵队。这是一支小型的西式军队，人数有10000人，年龄从17岁到50岁不等，由农民、渔民和水手组成。每营有100人，由一名乡士担任营长，每个小组再选出自己的领导。民兵队是德川时代晚期首个成立的此类军事组织。长州的奇兵队更加有名，它是高杉晋作在将近十年之后的1863年成立的一支私人军队，招募的武士多于农民。然而，1863年土佐的民兵队解散，结果高杉为反幕而成立的奇兵队名声大噪。不过，土佐的民兵队是藩国的官方组织，成立的前提是应对与西方可能的战争，因此在1858年哈里斯的条约签订之后便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民兵队的重要性和人数逐渐减少，直到1869年又重新活跃起来。^[27]吉田东洋启动了这些改革方案，并任命专人进行监督。但他自己则在1854年夏到1858年初这段时间被迫有所收敛。这件事的缘由让我们得以一窥与幕府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即便是如山内这种强大

的大名也是如此。1854年夏，容堂到江户进行参勤交代。一天晚上，他宴请了一位在幕府任职的远房亲戚。吉田等高级官员也都在场。夜已很深，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江户的客人开始取笑土佐官员，并无礼地用扇子敲每个人的头。吉田看不惯这种行为，警告对方说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主公的大不敬，最终忍无可忍，把对方打了一顿。客人觉得受了侮辱，要求容堂下令吉田切腹，只有这样才能平息他的怒气。急于平息事态的容堂命令其辞职回家，于是吉田回到家乡蛰居。他在那里一边教学一边思考，同时计划着有朝一日重返政坛。^[28]

1858年初，容堂将吉田官复原职。此时正值他在国内政坛异常活跃的时期，一方面为与哈里斯签订和约的事出谋划策，一方面又为庆喜的继承问题奔波操劳。幕府似乎即将放宽限制，任命吉田不会再有什么危险。容堂急于找个人帮自己处理大部分的藩国政务，因此不顾高知元老的反反对，再次起用吉田。不久，吉田一一安排自己的朋友和学生出任要职。福冈孝弟、后藤象二郎和板垣退助这三名土佐维新的统治者就是这个时期受到吉田的提拔而崭露头角的。

吉田重返政坛几个月后，井伊直弼被任命为江户的大老，容堂在国内政坛的影响就此结束。由于井伊要求容堂待在江户和品川，因此对于高知城中名义上的藩主——少年山内丰范——而言，吉田事实上既是摄政又是首相。对于井伊直弼的报复会进行到何种程度，人们仍没有把握，因此高知的保守派担心这位来势汹汹的幕府领导甚至可能会剥夺山内家族的藩国。吉田自然表现出对国内政治不感

兴趣的样子，专心处理藩国事务，以免主公的处境更加危险。

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使藩国的财政重新变得充足。土佐在匆忙军事化的过程中既要训练像民兵队这样的军事组织，又要为它们提供武器装备，耗资巨大。此外，1857年的大地震也使土佐全境受灾严重。除了向大阪商人大量借款之外，要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一些更为长远的措施。因此，吉田通过增加白糖、木材和木炭这类经济作物的产量、增加和纸的产量、开采铜矿，以及提高从其他藩进口商品的关税的方法来增加藩国的收入。^[29] 这些措施与17世纪野中兼山首次实施的土佐改革政策类似，只不过自1850年代末幕府首次允许外国商品进入日本之后，筹措资金的标准清单上多了几样物品，花钱的名目也多了一些而已。

哈里斯的条约生效后不久，吉田派岩崎弥太郎（后来三菱商会的创始人）到长崎去安排土佐樟脑、鲣鱼干（鲣节）及和纸的出口事宜。接下来几年，长崎成为土佐商品的重要出口口岸，同时也是土佐武器的进口口岸。但是吉田的计划并非到此为止，他在考虑发展航运事业，从而占领南太平洋上那些无人居住的岛屿。^[30] 为了实施这些计划，吉田不遗余力地收集有关西方的可靠资料。在他的努力下，山田马次郎随第一批德川使团出使美国。吉田派了一批学生到长崎去学习荷兰语，等他们回来后，吉田甚至亲自学起了荷兰语。

教育也是吉田关注的问题。1862年，专门为武士设立的学校“文武馆”（后来更名为“致道馆”）代替了原来的藩校。这间学校同时开设了国学和西学两门课程，有一段时期，所有15—40岁之间的

普通武士（平士）都必须在文武两个科目中至少选择一门。

吉田还修改和简化了武士的分级制度，将原来多如牛毛的分类相对简化，并按之前比较流行的分法将武士分为十级。行政法令和社会规范都详细写在著名的《海南政典》之中。它是土佐藩在德川时代编纂的最后一本法典。

当井伊直弼惩罚山内容堂时，失去了保护人的吉田不免受到冷落。他的改革触动了许多出身良好的上层武士的特权，而且改革显然也没有为下层人民带来什么新的机会，特别是在新成立的军事组织被废除之后。保守派批评他带领容堂走上邪路，致使其被幽禁在品川，而低级武士则对吉田奉行的谨慎不干预政策失去了耐心。其实吉田这么做是为了避免进一步连累主公。为了从农业、造纸业和渔业获取更多的利润，藩国实行了新的垄断政策和经济改革，但这些政策有可能激怒乡村领导，招致他们的不满。藩国元老讽刺地称吉田的追随者为“新棘螺组”，以此将他们比作1840年代思想上曾受到攻击的改革派。^[31]吉田的所有敌人，不论地位高低，都在抱怨他的措施代价太大，同时郁闷诉说着人民的苦难和不满。这两个群体都曾试图规谏吉田，但他很少听取反对派的意见。吉田非常自负，且对自己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他继续沿着自己规划好的道路前进，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土佐的国力。吉田的固执己见是土佐勤王党所最不能原谅的，因为这与他们的想法正相反。土佐勤王党同样非常武断，认为自己的看法是最正确的。他们对吉田及其门徒的反感越来越深，简直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将近十年之后，像坂本龙马这样的人发现后藤象二郎也有类似的性情时，感到非常惊讶。这两个

群体之间有一道宽广的鸿沟。我们接下来将掉转笔头，描写青少年时期的坂本龙马，这样一来，对于这道鸿沟产生的原因将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坂本龙马接受的教育

1850年代的危机和紧张状态给日本各地的年轻武士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而观察它们对年轻的坂本龙马有何影响是非常适宜的。与在土佐的大部分同时代人一样，坂本对西方的威胁表现出强烈的愤慨。他的天性和所接受的教育使他在面对该威胁的代理人时，更容易采取直接反抗的方式，而不是去分析怎样才是最好的应对方法。他后来在剑术学校成立的组织则强化了这种与生俱来的偏好，即喜欢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坂本和剑术学校的同学们一样，喜欢以“勇”这一简单的道德标准来衡量藩国官员，因此当藩国官员由于担心陷国家于危险之中而犹豫不前时，坂本和朋友们便骂他们为懦弱无能之辈。外国问题逐渐揭露了国内长期积累的愤怒，而在土佐年轻人的脑海里，攘夷问题也逐渐和对统治阶级的憎恨联系在一起。鉴于许多年轻人受过忠君思想的教育，这类愤怒自然可以打着天皇的旗帜，将焦点集中在这位德高望重并凌驾于一切封建规章制度之上的天皇身上。土佐藩的乡士和庄屋对自己的封建上级心怀不满，他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和偏见也不少，而这些都成为激励他们的因素。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早期的愤怒大部分都蛰伏着，直到外国

威胁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出现，才使破坏传统从属关系的行为变得正当起来。

坂本生于 1835 年，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他的大哥权平继承了家族。三个姐姐中，最小的姐姐乙女是一个既有魄力又有个性的女人，对坂本的许多行动都采取了鼓励的态度。坂本毫无保留地向姐姐袒露心扉，从那些动人的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对姐姐的感情有多深。姐姐的来信成为他最好的（有一段时期，也是他唯一的）行动指南。

坂本的家谱是德川时代土佐社会流动性的一个极佳例子。大约在 16 世纪中期，坂本家族的创始人太郎五郎为了逃避战乱，从当时战乱频仍的京都周围来到土佐。他在长冈郡的才谷村开荒种田，成了一名农民。1666 年，他的曾孙搬到高知，开了一家名为“才谷屋”的商号，做起了生意。从此，当铺和 1677 年开的一家酒屋便成为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到了 18 世纪中期，坂本家族的家主便经常出任“年寄”这类低级的行政管理职位。1763 年土佐藩公布法令，宣布凡是在幡多郡开垦荒地的人都可申请乡士的头衔，商人首次获得申请资格。八年之后的 1771 年，坂本家族的第七任家主将家主的位置让给了弟弟，自己重新成立了一个家族旁支，并成功申请了乡士头衔。^[32]

因此，坂本家族成为“商人转为乡士”的一个极佳例子。家族的长房继续经商，而长房和二房之间的相互收养关系也使得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流传下来的一些资料显示，这个家族非常富裕。^[33]

乡士登记簿上记载，该家族的财产合 161 石 8 斗 4 升 3 勺大米。这在高知城内外的 82 名乡士中排名第三。这些乡士中只有六个家族的资产高于 100 石，平均资产只有 50 石。坂本家的田地分散于八个村庄，显然并不是由家族成员耕种。^[34] 据说坂本早年曾被父亲派往幡多郡，因此我们猜测他在那里有田产，这样坂本家才有资格获得幡多郡颁发的乡士头衔。坂本家的大部分田产位于距离高知最近的土佐郡。不过，我们不清楚长冈郡原有的田产是否仍为长房所有。出于军事上的目的，坂本家族和一个以福冈为姓的家老家族领导的部队有联系，这使得他们之间有礼节上的往来。每年一月初，福冈返乡拜谒祖墓时总是会经过坂本家，并奉上一杯酒。值得注意的是，福冈还给继续经营“才谷屋”的坂本家的长房送鱼等礼物，因此坂本家族中经商的那一支可能和福冈有生意上的往来。不管怎么说，坂本家都不是贫苦的底层武士家庭。他们是成功搬到了城里并开始经商的农户，并在此过程中富裕起来，买到了统治阶层向他们打开的唯一一扇门的通行证。还有一件趣事值得一记。维新前夕，就在旧体制看起来岌岌可危时，坂本使用了“才谷”作为自己的别名，以此纪念先祖务农和经商的背景。^{*}

坂本是次子，因此家族的重任都落到了哥哥身上。哥哥权平是一名模范长子——身体强壮，饱读诗书，长于吟诗作对，而且精通武术。后来他多次出仕，在藩政府中任职。哥哥对藩国和家庭尽忠尽职，使坂本没有了后顾之忧，而与他关系融洽的姐姐乙女又鼎力

* 1866 年秋，坂本改成了这个名字。

支持他，成为他商议计划的好对象。坂本身为乡土的眷属，获得了这一身份带来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不受任何责任的阻碍。成年之初的他勇于接受新的思想，可能部分应该归功于这种相对自由和独立的状态。一些作者认为坂本是商人利益的代表，并试图在他身上寻找证据，然而坂本的信件从未就商人阶级发表想法，清楚表明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武士。或许可以说，他的大部分早期思想来自一起学习武术的同伴。在 1850 年代，整个武士阶层无疑都受到同一种信仰的影响。

1846 年，坂本家将他送往高知城下的一家私塾学习。假如坂本用功的话，那他将会接受儒家经典思想的教育，但他对所学的课程根本不感兴趣，不久就从学校退学了。家庭的担子怎么样也落不到他身上，因此他不必急急忙忙地选择一条合适的道路。坂本的文化水平一直不高。后来，一个叫平井收次郎的朋友警告自己的姐姐，不要加入坂本的计划：“坂本虽为人物，然不读书，时有错误之行为。”^[35] 坂本的信，尤其是那些写给姐姐的，出现了无数语法结构别扭的句子，而且词汇贫乏。后来学习荷兰语时，他只学习那些最简单的单词，而且没有迹象表明他取得了多大的进步。^[36] 人们很容易认为坂本后来对封建义务的蔑视源于他没有在学校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他在写信给一位 1864 年脱离藩籍的朋友的父母时这样说道：“在现在这个时代，认为放弃母亲、妻子和孩子，将亲人放在第二位而将国家放在第一位的做法违反道德，这种观点简直是荒唐至极，而这就是我们那些愚蠢的官员所说的。”^[37]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坂本在家接受的道德教育，与同时代人一样，都紧紧地围绕着德川时

代的儒家传统。他之所以拒绝履行正常的职责，是因为他认为天皇的事业高于一切。坂本没接受多少正规的教育，因此这种狂热的忠君思想肯定是他随后上剑术学校时学到的。

从 1840 年代末到 1850 年代，西方带来的危险使日本人意识到必须重新武装日本的统治阶级，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学习传统武术的新热潮。土佐与其他藩国一样，激励武士们不论等级高低都应该精益求精地磨炼自己的剑术。论热情，没有人可以和低级武士相比，他们只有在热情和勇猛上可以和上司的特权相比。剑术道场挤满了一个个野心勃勃且精力充沛的武士，因此那里成为极端主义者和反开化主义者思想、行动的中心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江户各大剑术中心举行的比武大会，为联络关系和结交朋友提供了理想的机会。随着行动日期的临近，剑客们利用国内骚乱和政治暗杀的机会，一试自己的武功。因此，坂本精湛的剑术意味着他将和当时江户最激进鲁莽的年轻人混在一起。

1848 年，坂本被送往高知城外一家由日根野弁治开的武馆学习剑术。他很快就成为日根野最优秀的学生之一。由于家里能够负担他的旅费和学费，1853 年，他被送往江户继续学习剑术。在江户的旅行和学习使这名土佐来的年轻武士大开眼界。他住在距离城中心不远的锻冶桥的土佐兵营本部。每天从那里步行至京桥千叶定吉的武馆学习。千叶是江户三位最有名的剑术大师之一的弟弟。^[38]

临行前夕，坂本从父亲那里接受了一套简单的禁令，它们是这位年轻的乡士所接受的价值观的总和：

一、片时不忘忠孝修行，此为第一要事。

二、不为诸道具心移而费银钱。

三、不耽色情，忘国家之大事，使心灵有污。

以上三条谨记于胸，厉行修行，专心学成归国。^[39]

坂本到江户后不久，就发生了海军准将佩里率领舰队来到日本的事，国内局势随之而变。当幕府宣布加强沿海各郡的海防措施时，各藩位于江户的兵营大多空空如也。于是他们颁布紧急部署的命令，甚至要求私塾的学生也和官兵一起站岗。土佐的士兵都驻守在品川公馆附近的岸边，坂本也身在其中。与此同时，土佐国内正忙着准备将更多的士兵派往江户。^[40]虽然佩里滞留的时间很短，只留下一封信以及明年再来的口信就走了，但是疯狂的备战并没有停止。1853年晚些时候，土佐藩采取措施，加强了品川附近滨河沿岸的防卫。1854年2月，当美国人的舰队再次来到东京湾的时候，这些炮位都由包括从国内召集来的新兵在内的土佐士兵把守。坂本自然在内，并且一直服役到1854年3月幕府和佩里签订了友好条约并解散了紧急部队。他也认为战争一触即发。“异国船各处到来，”1853年10月他写信告诉父亲说，“如此则近日有战。其时，吾当取异国之首后回国。”^[41]

危机平息之后，坂本于1854年夏天回到土佐。那年秋天，家乡刚好发生了大地震，高知城受灾严重。^[42]重建家园需要大量的经费，使军事上的任务和吉田东洋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更加复杂。

返回故乡的坂本有机会和以前的旧识重新建立联系。他分享

了自己在大都市的经历，同时又从别人那里听到土佐藩正采取措施加强防务的消息。从他的朋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高知的社会流动性有多大。例如，其中有个叫近藤（后来改为上杉）长次郎的，是一家豆沙包店店主的儿子。近藤进了学校，学习儒家学说，后来还自费到江户的“兰学馆”，在高岛秋帆的指导下学习炮术。再后来他参加了坂本的计划，并且成为其助手。对近藤而言，与坂本的一席话使他意识到了西方的强大和危险。^[43]近藤同时也是河田小龙的朋友。河田是一名艺术家，曾是萨摩军事使团的成员，负责报告西方人在武器制造方面的进展。河田的绘画技巧无疑使他可以将鹿儿岛看到的技术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河田还与遇难归来的中滨万次郎多次接触，因此与坂本相比，河田掌握的西方信息要准确得多。

几年后，河田回忆了坂本返回土佐后不久与自己的一番谈话，并将其记录下来。他回忆道，坂本一个劲地问他闭国还是开国这个棘手的问题。河田说必须在贸易和经济上采取措施才能加强国力，抵御西方的威胁。他解释说，日本的武器和战船与敌人的相比还是小儿科。所有的藩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御敌。外国船只肯定会陆续来到，如果我们还是这么就开国还是闭国的问题吵嚷不休的话，日本将会亡国。河田的个人观点是，最好是与西方人做生意，而这么做与其说是为了利润，还不如说是为了加强国力；日本应该购买一艘外国船，配备上专业的水手，然后在东西方之间运输官方和私人的货物。水手们将学习航海技术，并在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据河田回忆，坂本被他的说法深深吸引。“坂本拍手而喜，且云：‘吾若

年好击剑，此所谓击一人之敌。若无大业，则难伸志向。今即其时也。’”接下来的谈话讨论了如何从下层武士中吸收有能力之人共襄盛举的问题。河田解释道，“从来饱食俸禄之人无志”，因此在那些弱势群体中更容易找到有才干的人。^[44]

这席令人耳目一新的谈话，虽然在坂本的整个回忆录中记录较晚，但却是他在高知期间所持观点的几个源头之一。它显示出坂本与各式各样的人相交，其中一些人令他受益匪浅。我们很容易便想象出来，坂本作为一位聪明而好盘根问底的年轻人，会去拜访像河田这样受人尊敬的老人，并询问他们对于时局的看法。在没有其他信息交流和信仰的情况下，河田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个人，无疑在那些心系国家大事的人心目中有很大影响。而且，坂本的政治意识显然已经开始觉醒。

坂本在高知一直待到 1856 年秋。在这段时间里，他的父亲去世了，哥哥权平继任家族的当家。坂本继续练习剑术，偶尔也会在师傅的武馆里充当指导。1856 年 9 月，坂本再次前往江户，继续学习剑术。他的土佐通行证有效期足足有一年还多。就在坂本离开高知之前的两个月，汤森·哈里斯按照佩里和约的规定去到下田定居，而在坂本前往位于江户筑地的土佐公馆报告后不久，哈里斯首次要求前往江户，当面向将军提交总统的信件。

这几年，江户的武馆成了攘夷思想的中心。由于幕府对于采取何种策略犹豫不决，认定并坚持一种方针的人便在武士中享有很高的声望。没有人的地位可以和那些狂热的攘夷分子相比。他们的立场清晰，解决方法引人注目，爱国热情看起来无懈可击。武馆里的

年轻人渐渐将水户藩的德川齐昭视为自己行动的领导者。尽管齐昭的实际态度比他们想象的要模糊得多，但他对幕府策略的敌意以及水户学者与皇权事业的联系，使其自然而然地成为这些正在训练传统武器作战技巧的武士们心目中的英雄。随后，由于齐昭在幕府失宠、幕府与汤森·哈里斯之间的贸易协定开始谈判，年轻的武馆学生对他们所理解的幕府立场越来越不满，而齐昭在他们眼里变成了一位受到冷落的先知。井伊直弼针对齐昭所采取的措施，以及他不经皇室同意便擅自批准哈里斯协议的做法，都清楚地表明这位大老其实是一个专制狠毒的角色。江户武馆的许多学生确实受到这种日益高涨的极端主义思潮影响，特别是那些出身低下的武士。不管怎么说，他们的数量更多，而且与已经处于领导地位的高高在上的前辈们相比，他们在学习上更加刻苦。另外，与前辈们相比，这些低级武士更加不受官方的约束。许多时候他们甚至没有住在江户的藩营里。由于他们与其他地方的同龄人住在一起，又一起训练，因此很容易合谋，其结果是，低级武士之间的藩国界限并不像高级武士之间那么明显。极端主义和勤王思想的发展可以从这批土佐剑术学生的身上看得一清二楚，坂本正是他们中的一员，而这种发展又与一个名为武市瑞山（半平太）的人纠缠在了一起。

1856 那年，武市瑞山 27 岁。他是土佐长冈郡仁井田村一名乡士的长子。他家的土地零散分部在西野地（音译，nishinochi）、上仓（音译，uenoko）、仁井田和池（音译，ike）等乡，在 19 世纪早期的总产量为 50 石 1 斗 8 升 7 合大米。这使得他们家在长冈 189



武市瑞山的狱中自画像

户乡士家庭中位列第三，然而长冈的乡士收入极不平均。武市家的收入跟一个年收入4石的家庭相比显得非常高，但是跟另外一个年收入363石的家庭相比则远远落后。^[45] 早在山内家族统治土佐的初期，武市家族就和其他长宗我部的家臣一起获得了乡士的头衔。武市的亲戚中有国学学者鹿持雅澄（1791—1858），他是武市瑞山的叔父。武市吸收的传统思想比坂本多得多，但他最大的兴趣却是剑术。他12岁开始学习剑术，在高知的几家武馆学习之后，成了一名得到大家认可的剑术老师。1854年他把家搬到高知，并在城里开了一家武馆。后来的土佐勤王党领袖大部分都出自他的门下。他的学生人数超过了120人。

藩政府认识到武市的天赋和领导能力，先后派他到几个郡教当地的年轻人剑术。为了增强土佐的防御能力，山内容堂鼓励年轻人学习和练习剑术，为此花钱请来一些高手切磋武艺，还将自己的剑术高手派到日本其他地方去与同辈们一起学习。因此，1856年武市被派往江户的桃井武馆学习。他获得了七两银子的零花钱，同行的还有他的五名学生。同年秋天，坂本回到江户继续学习，不久他就受到了武市的影响。

在年轻的剑术学生中，武市是当之无愧的绝佳统治者。由于在土佐时已经是一名公认的剑术大师，他受到了特别待遇，可以住在远离藩营的江户武馆附近。不久武市便成为剑术老师的助手。武市给所有学生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经常称他为“墨龙先生”，因为他的形象像极了水墨画上的一条游龙——高高的个子、苍白的脸色、认真的神情，以及由于练习剑术而锻炼出来的一副好身板。他的个性强烈，很快便成为土佐剑术学生的领袖。他的思想也和他的人格一样，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武市身上有一股慢慢显示出来的动力，那就是勤王和藩政改革。后者应该源于他自己的等级障碍。他认为藩国应该任人唯贤，而不是按品秩授予官职。此外，他对天皇极为尊敬，以致获得了“天皇迷”的美称。^[46] 1856年，坂本搬到了武市的住处，而且很快便受到他的影响。

前一年坂本在高知与河田交谈后刚刚露出一点开国思想的苗头，很快就被武馆中占主导地位且热情高涨的攘夷和反开化思想代替。考虑到坂本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坂本参加了几次江户的比武大会，并为自己赢得了声誉。武市的一个

亲戚因酒后闹事犯下严重的罪行，甚至可能被处死，坂本帮助这个人溜出了江户城。他还和日本各地与自己有同样想法的年轻人交朋友。他和土佐武士见到了许多长州藩和水户藩来的年轻剑术学员，而长州和水户是对幕府政策最为不满的两个藩国。

1857年，坂本和武市回到土佐。武市是因为祖母生病了，而坂本则是因为通行证到期。坂本一路上颇为悠闲，据说他故意显得漫不经心，而这正是真正武士的标志。他将旅费散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地悠闲走，一并游览了大和国的许多史迹。那些地方都是历史上忠贞故事发生的地点。^[47]藩国法规解决了他从大阪到高知的交通问题，因为它规定商船必须搭载任何想到土佐去的武士。^[48]回到高知后，坂本继续研究剑术。他还发愤读书，但是人们推测他并没有取得什么惊人的成果。这个时期的一个故事生动地说明坂本已经拥有了相当的自信和学识。有个朋友来访，坂本声称自己已经开始读书，并将一本《资治通鉴》拿给对方看。朋友感到惊异，但是承认这本书对他来说太难。于是，坂本拿起书，开始高声朗读起来。坂本的朗读错误百出，而且根本不考虑句读。朋友非常吃惊地问他：“这样你能理解文章吗？”坂本回答说：“我只看它的纲领。”^[49]

武市这时则在土佐继续当剑术老师，而且声誉和影响与日俱增。依附在他门下的人更多了。其中就包括从安艺郡跑来的中冈慎太郎。中冈是一名管理13个村子的庄屋，按照土佐藩特有的精确算法，他的田产有25石1斗3升7合6勺大米。^[50]武市的门徒开始带有乡士和庄屋之子联盟的特征。坂本自始至终都是他的助手和崇拜者。

武市返回高知后不久，他的追随者正式向他的前剑术老师麻田堪七提交了一份陈情书，请求他提议武市获得藩国的一项特别奖。他们在陈情书中详细解释了武市精湛的剑术、在江户的经历，以及在桃井武馆的地位。这些人不吝其词地赞美武市的人格和道德修养。由于麻田的推荐，1858年春，藩政府（由刚刚官复原职的吉田东洋领导）提高了武市的薪俸，额外为他增加了两份口粮作为奖励。^[51]

在江户武馆结识的朋友将武市和坂本引入了国内的政治圈。1858年秋，水户藩派人来和他们接触。武市和坂本两人已于1857年秋回到土佐。接下来几个月，他们看到藩主山内容堂的努力失败了。容堂试图利用幕府需要宫廷批准哈里斯的贸易条约这一契机，实现幕府的人事更迭，同时使一桥庆喜成为将军的继承人。1858年的春暮至夏，以大老井伊直弼为首的新幕府领导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那些胆敢干涉幕府决策的人进行打压。水户藩的德川齐昭曾极力主张幕府向各藩妥协，以便真正实现国内的统一。1858年8月底，身为行动首领的他被命令在江户的公馆幽禁。这一举动触怒了大批水户藩的武士，他们从藩内学者那里接受了忠君勤王的思想，现在正争取一起学武的朋友们的支持，号召大家加入倒幕行动。武市和坂本正是基于这种原因成为水户藩注意的对象，两人去年显然已经在江户的武术界出名了。

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1858年底，一群水户藩的武士动身。他们的任务非常艰巨。正如结果证明的那样，由于对幕府政策反对的程度不同，水户藩被割裂成两派，彼此隔阂深重，水火不容。内部

的倾轧使水户藩无法成为德川时代晚期政坛的参与者和参与者。但是目前，对齐昭的惩罚所激起的愤慨看起来能够占上风。这四个由住谷寅之助领头的极端主义者来到土佐，希望得到熟人的帮助。

他们在土佐的遭遇很好地解释了这个藩国是多么与世隔绝，以及坂本龙马对政治的了解是多么有限。水户藩的使者被拦在了立川的边境驿站外，无法进入土佐。反而是坂本带领一小队人来和他们见面，可能是武市瑞山派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表。边境上的一番谈话之后，坂本一行人返回高知，看能否为客人弄到土佐的通行证，但是两天后消息传来：没有办法。进入土佐失败后，客人们在边境又等了几天，看看他们托坂本带去的信有没有什么回复。但是什么消息也没有。他们对合作彻底死心了，于是收拾行装回程。

从水户藩使者住谷的日记里，我们可以一窥水户人和土佐人在政治觉醒这个问题上的差别。他写道：“两外人（土佐人）于国家之事一切不知，龙马更不知役人名谓。空费数日，遗憾遗憾。”^[52]

假如坂本真的对国内事务一无所知，那么他从带回高知的水户藩信件中便可以知道很多事情。这是一封从德川齐昭支持者的观点出发，讨伐大老井伊的独裁统治的信件，信中详细罗列了井伊的各项罪行。他们指控井伊忽略和轻视了他们藩主的合理意见，而且蔑视天皇的意愿。他逮捕了那些在京都为国家呕心沥血的高尚人士，而且竟敢惩罚齐昭本人。信中继续写道，水户藩的武士自然气愤至极，有必要认真考虑接下来的行动方针。^[53]

武市和坂本没有确认收到这封信，也许是因为他们觉得信的内容主要还是井伊和齐昭之间的关系问题。虽然他们的攘夷情绪非常

强烈，但是和水户藩的人相比，他们与那些拟开放的通商口岸以及德川幕府的政策相隔甚远。他们自己的藩国尚未感受到井伊政策的伤害或者危险，因为对容堂的惩罚还没有下来。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接下来几个月他们就知道自己判断错了。大老对敌人的清洗蔓延到了山内容堂身上，他逐渐失去了行动自由，直到被幽禁在江户郊外品川的公馆中。由于担心幕府会进一步报复，吉田东洋领导下的藩政府行事异常小心谨慎。事实上，吉田曾向江户祈求，希望不要完全剥夺山内家族的领地。后来，幕府与外国人签订了条约，战争不太可能打响，于是自 1854 年开始实施的紧急军事措施开始松弛，并最后停止，而吉田则在努力修复这些措施对藩国财政造成的损害。

武市及其追随者们不可能赞成这种谨小慎微的做法。相反，他们越来越表露出对幕府内外政策的强烈不满。由于呼声得不到尊重，他们便将愤怒转向他们一直以来没有什么话语权的政治制度。与此同时，从 1859 年到 1860 年，他们作为领导人的声望越来越高。1859 年，武市被任命为所有乡士、白札^{*}及以上层武士的剑术总督。第二年，31 岁的他被批准带领一小部分追随者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考察剑术，并进行训练。^[54]

容堂在国内政治舞台大展身手的那段时期——佩里到来之后和哈里斯协议签订之前——土佐藩的下级武士几乎对国内的问题一无

* 土佐武士的一个等级，地位介于上士和下士之间。——译注

所知。相反,他们练习剑术,并不加鉴别地随声附和周围的所有观点。然而随着容堂被软禁在品川公馆,武市领导下的土佐乡士和庄屋越来越深地卷入了国内的政治旋涡。他们首先对幕府的政策不满,然后才是他们的藩国大臣吉田东洋。吉田对幕府唯命是从的态度令他们感到不爽。最后他们成立了组织,看看能否在这两方面有所作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人的行为很像那些由于幕府软弱和缺乏连贯政策而变得蠢蠢欲动的德川家臣。同样,他们也将外部问题和“任人唯贤”的必要性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们将会看到,土佐藩的家臣和幕府的家臣一样,对未来并没有一个完整或者有目的性的计划。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出问题了,如果只是因为它弱小和无防备能力。但是他们远远没有想到要推翻藩政府(或者幕府),或者是使“王政复古”。事情的进展刺激着他们,使他们越来越倾向于激进的解决方法,而他们那些极端的反应也加快了政治改革的步伐。随着时间的推移,尊敬天皇的模糊想法将逐渐演变成具体的计划。事情将如何发展,我们只能翘首以待。对坂本及其朋友们而言,旧的秩序和答案已经再也无法令人信服,但是新的出路在哪里,大家仍不清楚。

第三章 勤王岁月

1860年给坂本龙马这类年轻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动。现在，他们开始抗拒封建上级的命令，并按照自己认为对天皇有利的方式行事。通商口岸的开放，使许多日本人和所有统治阶层都认识到了外国人问题的严重性。横滨新城紧邻江户，城中的商人成为年轻剑客的一个目标。他们急于在可恨的夷人身上一试刀锋。几桩针对外国人的事件也被西方各国充分利用，作为向幕府要求更多特权的筹码。1860年，被认为是把外国商人引进来的罪魁祸首的幕府老中被暗杀。他的死标志着几年无政府状态的开始。自17世纪以来，还从未有过一个如此充满变化、决断和机会的时期。

对坂本龙马和许多同龄人来说，这些年他们有种置身时局热点问题的新感觉。坂本和同伴们一样，将这些问题看成简单的是与非，即政策和统治者道德与否的问题。在逐渐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之前，他的反应一直都被一种强烈的愿望主宰，即直接铲除那些他认为对天皇不忠的政策施行者。

土佐的问题则更为复杂，因为低级武士、乡村领导与城中的封

建上级之间出现了新的矛盾。吉田东洋的改革使这些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而且使高级武士和低级武士之间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联盟，因为两者同样对现实感到不满。不管他们之间的利益以及反对的措施有何不同，但对这名藩国参政的痛恨是一样的。吉田东洋的被杀，以及替代他的政敌没有尽力缉拿凶手，原因俱在于此。接下来我们必须讨论这些紧张关系及其产生的政治后果，因为它们详细说明了土佐藩政策发生变化的原因，以及坂本和朋友们对时代挑战做出的反应。

但反过来，土佐又是国内现象的一个翻版。在日本国内，幕府的政策、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及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关系使得各强藩实施的政策往往互相矛盾。藩政府根据自己对时局的解读，利用或者打压下属的行动。从许多方面来看，1860年之后的几年，不同藩国的武士之间的合作已经达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它们往往是在江户武馆开始的各种形式的密谋的延续。相似的利益和危机感让一些强大的大名开始携手合作，他们从“公武合体”（即宫廷和幕府互相妥协）这句口号中看到了提升自己地位的机会。国内利益并没有开始成为大名考虑的主要问题；地区优势也许有许多种解读的方式，但是却从未被忽略。1860年后，所有的团体都在寻找盟友和传统的支持，结果将宫廷贵族再次拉入政治旋涡。勤王运动期间，一些京都贵族在处理国内政治问题时显示出了非凡的胆识和魄力。

接下来的十年里，幕府的政策将决定大名和宫廷贵族的政治选择。1860年大老井伊遇刺后，幕府为了消除怨恨，促进合作，放松了对藩国的控制。但是这开启了新的独立行动的可能性，极端的攘

夷分子利用这个机会使德川幕府的计划和行动几近瘫痪。于是幕府承诺把刚来的外国商人赶出去——这个承诺只是表达排外立场的情绪化而荒唐的幻想，但一些勤王分子信以为真。直到 1863 年，许多人对“尊王攘夷”这句口号所包含的勤王和攘夷思想都非常认真，尤其是像坂本这样的年轻剑客。更高的道德理念和对简单直接的解决方法的迷恋，为勤王岁月增添了一丝勇敢无畏但又狂热冷酷的色彩。这些正是坂本龙马和同伴们最为突出的特点。

志士的榜样和理想

1860 年代的激进分子称自己为“志士”，即“志向高尚的人”。虽然他们非常重视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但其实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伦理类型。这种类型后来受到他们帮助建立的新政府的赞美，但也受到这个政府未来的敌人，即 1930 年代的暗杀者诟病。如果不了解坂本及其朋友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将无法理解坂本在 1860 年代初的行为，以及后来的历史和罗曼史对他的形象塑造。

激进分子的思想武器是经过日本封建制度改造过的儒家经典价值观。责任，尤其是更高的政治使命，是排在家庭问题和职责之前的。忠诚是优秀武士的标准，而日本的封建制度又含有强烈的家族主义思想，因此忠和孝是一个意思。它们强化了职责的需要。在勇士们的武器库中，这些品质超过了人道和诚信等在形势和关系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其他品质。

19 世纪的勤王分子在思想上受到水户学者的著作和态度的影响。水户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用儒家学说解释这些伦理要求，使其显得合理而高尚。朱熹的“大义名分”尤其是水户学的核心。这句话频繁出现在维新积极分子的文件中。“大义名分”第二层意思是强调“名和责”的重要性，或者说按照社会名称和地位行使政治职责的必要性。按照在传统藩校教书的儒学老师的想法，这些学说应该有助于使勤王党人（其中许多人地位卑微）变得尊重和顺从。至于为什么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是因为德川时代的许多儒家学说喜欢用这条教义来研究其他问题，特别是使天皇的政治职责和他的名字匹配这一最高愿望或最高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大义名分”得到了传统国学，或者说神道教的支持，它们再现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创造了——天皇的神圣典范。天皇像圣父一样统治着这片神圣而不可侵犯的土地，对先祖负责，并听从先祖的教诲。^[1]而论及违背这种理想，没有什么比 1860 年之后的事情更严重了。这一年，由于夹在中间的幕府犹豫不决，污秽的夷人强行登上了这片神圣的海岸。不管幕府的政治地位多么反常，只要它能保护宫廷就能够获得理论支持，然而当衰弱的幕府成为导致天皇悲伤的原因时，它将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不道德的篡夺者。在这种时候，“最高使命”将会指引人们采取措施纠正这一状况，即便冒着违反传统规范和责任的大不是。这种使命很看重对藩主的责任，而且解释了因背叛藩国而给家人乃至父母造成痛苦的原因。对许多激进分子而言，藩主和天皇之间的对立是不存在的，他们宁愿相信藩主其实是站在自己这一方，只是暂时被一些糟糕的建议或者恶毒的顾问蒙蔽。

在处理当时的问题时，极少藩主表现出明确的态度，因此这一观点解释得通。就像 1930 年代那些军国主义者一样，他们相信天皇被保守的顾问缚住了手脚，不敢大胆行动，而自己说出了天皇的真实想法。

这种对使命的解释，对出生卑微且没有多少政治经验的武士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例如，就坂本而言，他的行为和愿望便很好解释了。身为一名已经城市化了的乡土的次子，他的政治前途通常是只能当一名教师，向那些对剑术更感兴趣的学童解释什么是“大义名分”。而另一方面，有些人生来责任和地位便已确定，更可能在投身一项事业之前认真权衡利弊。随着政治经验的增加，志士们将会明白，彻底的攘夷虽然听起来很美好，但根本行不通。

如果说无须担负公务或者家庭上的责任对志士有所帮助的话，那么勇气则是他们不可缺少的基本要素，武馆在这方面使他们受益良多。武士崇拜的浪漫形象：聪明勇敢的武士，眼里只有终极目标，心灵像闪耀的刀刃一般纯洁，抛开一切个人想法，追求自我完善以成为更加完美的正义化身——所有这些构成了他们对自己的浪漫想法。

浪人剑客的行为既残酷又勇敢。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最高的道德和使命，因此可以随便杀死他们痛恨和鄙视的敌人。不管怎么说，武士信仰中从不看重仁慈和怜悯，而在 1860 年代那种兴奋和狂热的状态下，它们展示的机会就更少了。我们必须记住，这两种美德在日本社会的任何地方都极为少见。即使不是在道德或者政治问题的关键时刻，一个人的名誉和社会地位也远远比它们重要。佐

佐佐木高行讲述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个故事。佐佐木的侄子年方16岁，是家中的长子，与一名出身比自己低得多的土佐武士发生了争论。这名武士20岁，是家中的次子。朋友和亲戚将他们分开了。那天晚上，两边的人分别聚在一起，佐佐木一方在门外，另外一方在门内，考虑如何才能更好地既顾及体面又维护正义。身为长辈和高级武士的佐佐木解释说，拖延和妥协可能会带来怯懦的骂名，而对涉事的下级武士采取集体行动又会使上下层武士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他认为，决斗是解决这件事情的最好方法。这样一来，“敌人”将会比想象中更加体面。他向另一方大声地提出这个建议，对方同意。佐佐木急不可耐地将侄子推向前去。“贯之助在几名亲戚的陪同下，冲向了内院……他认出冒犯自己的人之后，大喊一声‘看剑！’——便一刀结果了对方。”那个人由于刚刚受伤，根本无法站起来抵抗。佐佐木写道，每个人都称赞他的处理方法既公平又干脆。^[2]假如这种行为在土佐藩是合法的，那么我们几乎没有理由希望志士在他们所构想的帝国事业中会按剑不动。

勇气、执着的信念（不管表达得多么含糊）以及对实际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蔑视（同伴们正是受其牵绊）——这些正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的标志。自小接受的教育使武士们对物质利益毫不关心，而志士则将这种豪奢发挥到了极致。有钱就一起花，不管这些钱是公有的还是私人的；如果没钱，志士也会认为自己的道德无比高尚，要求那些社会地位卑微的人拿出钱，以此提升他们的道德水平。志士们根本不关心明天会怎样。他们勇敢、随意而又无忧无虑，在处理与“头等大事”有关的事情时非常严肃，至于其他则毫不在

乎。他们对许多事情不负责任，同时又寻欢作乐，沉溺于美酒和女人。德川时代的监管措施使餐馆和妓院不可避免地成为催生阴谋的场所，因为只有在这些地方，男人们才能聚在一起而不会引起怀疑。这正好和志士的爱好暗合。他们的行为很好地诠释了贝特兰·沃尔夫说过的一句话：“在被追捕的人的生活方式中有一种东西，使片刻的喘息和欢愉显得无比珍贵。”^[3]中冈慎太郎留下的日记片段中，有几次写到他去妓院之前做好了必死的准备，然而却在那里遇到了其他成员，结果那天晚上他们一边饮酒作乐，一边讨论政治。多亏如此，维新运动才有了女人的身影，因为艺妓和酒馆的老板娘经常搭救那些了无挂碍的顾客一命。

这些激进分子首次参与国内政治是在 1850 年代中期的外交危机期间。他们大多受雇于积极讨论通商口岸和将军继承人问题的大名，而井伊直弼逮捕的那些大名代理人大多是后来英雄们的老师和同伴。因此，当大老将惩罚的范围扩大到大名本身时，藩政府便极力制止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土佐藩的山内容堂和越前藩的松平春岳都被幽禁，水户藩的德川齐昭也是如此，藩国现在在国内政治中选择走保守路线，意味着那些曾满怀希望进行制度改革并打一场对外战争的家臣又回到了原点。大部分时候，希望的落空使他们相信，一个更高的使命要求其采取措施来纠正这些错误。虽然儒家学说中的“任人唯贤”也许可以提供一种解决方法，但在年轻武士草拟的各项罪状中，自己仕途的停滞不前并没有处在显著的位置。另一方面，幕府对他们藩主的惩罚是另一回事。藩国政府小心谨慎，面对惩罚不敢吱声，以及对幕府臣服于西方的明显默认态度都成为他们

愤怒和行动的理由。

因此，志士们力求达到的“目标”便有了保护“神国”免受外国人的污染，以及尊敬京都宫廷的含义，而后者是“和魂”的精髓所在。勤王党人后来的所有辩论都充满了使命感和正义感。他们往往冒用一些词语以显示自己和同党在道德上的优越性。于是，在水户藩他们是“正义”派，在长州藩他们是“开明”派，而在土佐藩他们则是“勤王党”。他们的对手通常是所谓的“俗论”派，统统被称为“贪官污吏”。他们的成功取决于夺取负责自己集团的职位，这关系到用“能力”而不是地位或者家庭作为遴选官员的标准。从1860年代早期识字不多的剑客的狂热情感中，从这些社会和文化背景中，产生了一种将个人喜好转化为道德需要，以及将派系策略转化为宗教改革的观点。志士们将道德手段和特点鲜明的派系混淆在一起的做法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笔政治遗产，但它并非完全是件好事。

不管对藩国领导的政策多么气愤，激进分子们并不指望这些人会做出改变。暴力也许可以打倒一名大臣，就像土佐发生的那样，但是接任的新人地位和观点都和他相似。封建社会的身份限制正变得越来越弱，但仍未取消，出身卑微的人不大可能影响政策。此外，志士并非总能提出积极的建议或想法。他们的特殊本领是制造混乱使其他人得以涌现出来，但他们自己的对策通常比1930年代攻击平民政治家的年轻军官们还要少。年轻的军官们相信“军队”，志士们则相信“宫廷”。正如1932年刺杀首相的一名凶手所解释的，“我们首先考虑的是破坏。我们从不承担建设的责任。但是我们能够预

见，一旦完成了破坏，自然会有人接手建设的工作”。

志士转向京都的贵族求助，以便与他们不再尊敬的封建长官抗衡。京都贵族的小圈子一直都收留着一些来求助并听从使唤的浪人。各地的勤王党人越来越多地涌向京都，似乎当一名“贵族武士”（公家侍）要比当一名藩国的低级雇员高贵得多。他们的工资也许不高，甚至更低，但是依附于国内某位知名人物后，社会地位不再低下，无须再受到上级的层层施压。这一点还是令人高兴的。由于只有那些喜欢冒险和勇敢的人才到京都去，因此，对贵族的家臣来说，这里的气氛与他们业已离开的身份社会相比，肯定要刺激和有趣得多。

德川时代末期，大量的武士离开藩国，成为浪人。1650年代以后似乎已经解决的浪人问题再次成为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17世纪以后，对于脱离藩主和原籍的惩罚已经缓和了许多。严格的法律依然存在于书本中，然而违反法律比遵守法律更受人尊重。逃亡者通常没人过问，除非他们触犯了德川幕府的刑法而被捕快追捕。无数的土佐武士擅自离开了江户军营，同时也彻底离开了武士阶层。他们有些成了城里人，有些加入了以前的逃亡者，在上野原（现在山梨县的一个村落）开辟了新的耕地。如果武士家族的家主叛变，投靠了其他地方或者其他阶层，藩国通常会没收该家族的财产，吊销其身份。但是次子和幼子则没什么问题，而且由于他们在土佐藩国内没有什么机会，许多人都选择了离开。德川时代末期土佐的所有脱藩浪士（那些脱离藩籍的浪人）中只有一人最终受到了惩罚。跟随武市瑞山学习剑术的冈田以藏逃到了京都。他在那里生活潦倒，并最终染上了恶习，不仅抢劫，还杀人。这些都违背了志士的“最



坂本龙马脱藩雕像。左为泽村惣之丞，中为坂本龙马，右为那须俊平

高理想”。他被京都的官员逮捕后，递解给了土佐藩当局，后者审判后将其斩首。^[4]然而这个案件主要是用来衬托无数过得不错的逃亡者。

但是，当武士的逃亡涉及政治和不满藩国的政策，尤其是当逃亡发生在土佐藩的政治暗杀事件之后，处理手法就和之前基于经济原因的叛逃事件有所不同了。追捕和惩罚现在变得非常普遍。田中光显的回忆录便明确地说，志士们感到自己的处境极其危险。“毕竟幕府当时的势力似乎很大，哪怕我们（山内）藩主的佐川家也很有势力。”逃离藩国如同越狱般，而且在大阪或者江户这些设有土佐军营，并处在土佐藩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地方，你也不可能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跟踪抓捕你。一旦被抓，当局为了问出其他叛逃者的

行踪和计划，肯定会严刑拷打。许多武士甚至在离开土佐之前就被逮捕了，但假如他们潜逃成功，受罪的将会是他们的父母。田中接着写道：“我逃走后，我的父亲因此而受到惩罚。他失去了地位、薪俸和房子。这真可怕。因为我的原因，父亲不得不变成浪人，靠教书等获得的微薄收入勉强过活。”^[5]显然，这时需要一种更高的责任来解释这类不孝的行为。坂本和同伴们认为，天皇的重要性在“愚蠢的官员”和妇女们所拥护的大名和家主之上。正如坂本逃亡后给土佐藩写的信中所说，大名似乎无法理解将权力还给天皇这一想法。“那么，我们这些低级武士要怎么做才能为陛下分忧呢？正如你所知道的，一个人应该将宫廷看得比自己的藩国重要，比自己的父母重要。”^[6]显然，这便是“最高的责任”。幸运的是，对志士来说，这与他们的行动和兴奋不谋而合。

土佐藩叛逃者的行动和愤怒，比水户藩和萨摩藩的同伴们晚了一年或者更久。志士的理想最先出现在水户藩。那里是勤王思想的中心和德川齐昭的领地。齐昭曾猛烈地抨击幕府的对外政策，并希望儿子成为将军的继承人，然而他的希望破灭了。井伊大老下令齐昭在家幽禁，齐昭的家臣气愤不已。我们已经知道，水户藩派了一帮人到立川的边境驿站，希望与土佐藩的盟友建立联系，然而并没有成功。成员们发现坂本什么都不知道，也没能联系上武市瑞山。但他们在联系萨摩藩的志士时颇为成功。1858年，才能出众的大名岛津齐彬去世后，藩国行政部门区别对待齐彬宠臣，从而导致反对国内政策的不满情绪高涨，以及对阻挠藩主最后计划的幕府老中的极度痛恨。信使秘密地往来于水户藩和萨摩藩，商讨武装起义的计

划，还将计划告诉了京都的年轻贵族。他们一度认为萨摩藩政府会同意动用驻守在京畿的卫戍部队。其起草的文件引述了历史上的英雄行为和“奉安”均违反了传统的尊卑习俗的例子，而暗杀井伊直弼、袭击横滨的外国人和以樱花旗（令人想起 1930 年代早期桥本上校的樱花会）占领京都地区的计划则显示出这些诉求同时融合了文化传统、政治上的愤慨以及攘夷的情绪。

当结果证明萨摩藩当局不同意这些做法时，有 40 人准备偷偷越过萨摩边界独自参加战斗。衙役阻止了他们，但是他们的水户同人则没有被阻止。^[7]

勤王岁月始于 1860 年 3 月底的一个大雪天。那天 18 名志士（其中一人来自萨摩藩，其余均来自水户藩）袭击了大老井伊的护卫，当时井伊一行人正准备由樱田门进入江户城。井伊的护卫身穿防雪服，行动不便，被骗离了岗位，其中一名凶手砍下了井伊的脑袋后，前往一名高级廷臣的宅邸前剖腹自杀。幕府首席大臣在江户的城门前被人暗杀，这个大胆阴谋预示着暴力时代的来临。

水户藩的志士首先准备了一份长长的文件，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份文件对于理解 1860 年的勤王党有着重要作用。^[8]迄今为止，他们没有表示任何废除幕府的决心。相反，他们将近期政策的弊端归咎于大老一人。他的失误使他不仅仅是幕府的罪人，而且成了民族的罪人，因为他把外国人放了进来。大老无视天皇的意愿，其行为使所有德川幕府的谱代大名都应该向伊势大神宫的天照大神羞愧地忏悔。面对这样的暴行，只有坚决攘夷才能完成“奉安”。但是，井伊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惩罚和羞辱那些规谏他的人，像

“土佐等有名之诸侯”也受到排斥。种种不义政策导致了井伊直弼之死。

文中屡次祈求神道教以及天照大神所在的伊势神宫惩罚幕府第一大臣。显然，在此后反抗幕府政策的号召中，攘夷情绪和勤王思想将发挥重要的作用。1837年，大阪的大盐平八郎起义使所有的日本人意识到了幕府经济危机的严重性。1860年摄政井伊的遇刺则首次使人们意识到，反对新的政治和外交行动的力量有多大，强度有多深。因此，各大城市的年轻武士显然会将他们的成功看成一种使命的召唤。他们与水户志士意气相投，而且有过类似的受训经历。这些人将首先在本地，然后再在全国的舞台上尽忠报国。

土佐勤王党

从大阪返回的商船带来了大老井伊直弼遇刺的消息。这很快就在高知传开，但是由于消息来源于底层，而且难以相信大老真的被杀，因此大家并没有立刻相信。不久，位于江户的土佐公馆通过正规的官方渠道确认了此事，然后整个故事才在城里迅速传播开来。^[9]这件事在官员的圈子里并没有掀起很大的波澜。时任参政的吉田东洋强烈谴责水户阴谋家的行为，并认为幕府除了严惩水户藩以外别无选择。他认为水户藩已经一派混乱，藤田东湖的伟大教诲已经被倡导直接行动的人扭曲。在吉田眼里，“大义名分”从来就不能作为袭击幕府大臣的理由。有趣的是，对服从看得如此之重的吉田并

不认同元禄时代的四十七浪人事迹和所谓的道义，而这件事常常被那些为水户志士辩护的人引用。这种对责任和服从的狭隘理解招致了同情勤王党的上层人士的不满。^[10]

年轻的下级武士与水户志士们意气相投，且有共同的受训经历。吉田的禁令丝毫吓不了他们，而且他们逐渐将成功的暗杀视为一种使命的召唤，指引他们先在土佐，然后再在全国的舞台上施展身手。剑术学校的学生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大老之死。他们很快就拿到一份水户凶手起草的宣言，其中详细解释了其目标和信仰。坂本龙马好几个晚上都和朋友池内藏太等未来的勤王党人一起，热烈地讨论责任和守法的问题。按照通常的说法，几年前被水户藩士认为一无所知的坂本，现在异常坦率地支持水户志士的做法，并且预测自己和朋友们未来将不得不同样走这条路。^[11]有关这几个月他们的活动，大家希望了解得更多。显然，活动的舞台已经准备就绪，武馆中的友谊正开始升华为政治上的兄弟情谊，年轻的激进主义者，即跟随武市瑞山学习剑术的学生和跟随间崎沧浪学习文化知识的学生，开始认为自己是思想和政治变革的催化剂。不幸的是，因为他们都在高知，这段时间留下来的信件很少或者说没有。事实上，接下来几年他们全部都英年早逝，因此也没有留下什么回忆录可供参考。但是我们仍然不难（也并非毫无根据）从大老遇刺后的激动气氛中看到一种背景，而这种背景有助于将之前潜藏着的或者朦朦胧胧的能量和野心激活，并大声地喊出来。

上层阶级的机会同样增加了。佐佐木高行是一名马回役武士出身且具有勤王思想的官员，他的文章为我们再现了井伊直弼死亡后

的混乱状态。高知上下极为担忧仍然被囚禁在品川公馆的山内容堂的安危。容堂的被囚令土佐武士极为愤慨，但井伊被杀之前，他们什么也做不了。即便在那之后，他们也仍然不知幕府是加重还是减轻处罚，于是佐佐木高行率领一小队人前往江户。他在许多年后写的文章中，再现了这种由于通信缓慢和信息有限而造成的捉摸不定和疑虑丛生。^{*}他手下的十个人——“其中葛目是读书人，其余皆是武士”——全都不在乎夜里是否睡得舒适，也不在乎过河的危險。这次出行刚好碰上春季的几场特大暴雨，河水暴涨，过河变得尤其困难。那些坚持身份的旅客很难雇到挑夫（有个人的家臣怒打了挑夫一顿，挑夫“一气之下，扔下担子跑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罢工”），但是佐佐木和手下的人没有什么行李，因此走得很快。一路走下去，他发现路上其他藩国的使者越来越多。原来他们和他有着同样的使命。佐佐木说，这些行旅中的武士彼此打量，认为对方来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因此非常看重自己的荣誉和声威，轻易不向他人施以援手。佐佐木到达江户筑地住处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很多。他全身湿透，而且比同伴先到，因此不得不叫醒驻地的低级武士，让他们开门放他进去。到了那里之后，他发现容堂并没有新的危險，监禁

^{*} 佐佐木写道，当时前往江户几乎像死别一般。在土佐，出门的时候要先踩檐下的小石子。走了五六十步之后，家里的老妇人会用一把绑有枸橘的勺子向他召唤，喊着：“主人！主人！”这时他会回过头走一段。之后勺子和枸橘被放在神龕上供奉，而那块小石头则每天都要清洗，以保证他旅途平平安安。当他平安返回的消息传来时，这块石头会被包起来，并在他回来时再使用一次，然后清洗干净。与此同时，每天早上要在他的空座位前摆上碗筷和饭菜。不过，佐佐木的妻子非常节省，在他不在的时候只摆一个干鱼头。

条件反而渐渐松懈下来。结果，佐佐木在江户的时间都用在了政治讨论和剑术练习上面。^[12]

但是，大老井伊的遇刺对怀有政治理想的低级武士影响最为深刻。他们中的一些人至少开始看到个体和阶层地位发生改变的可能性。大部分土佐武士痛恨幕府对容堂的处理方式。这种愤怒很容易让他们对造成这种看似不公待遇的罪魁祸首——封建制度——感到不满。^[13]不过，他们最初的动机似乎是反开化主义者所怀有的对外国人的仇恨，而且将此与对京都宫廷的敬意联系起来。这些勤王主义者不必承担谈判和政府的责任，心中充满了源于本国文化的狂热尚武精神，而且由于对强大的西方了解不多而无知无畏。他们非常乐意用剑和勇气将可恨的西方人驱逐出去。他们思想上尚未是坚定的倒幕派，但却逐渐强烈地支持京都的宫廷。在这点上，土佐武士具有与西南其他藩国同人一样的特点。然而，跟那些人不同的是，他们有武市瑞山这名杰出的领袖，而且在容堂不在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土佐统治集团中上级阶层的不和。

武市瑞山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土佐年轻武士的领导者。大老遇刺的几个月之后，他受土佐藩政府派遣，带领三名随从前往四国和九州考察剑术。1860年秋，他回到土佐，第二年春天，31岁的武市再次前往江户。此行的目的并不清楚，不过可能还是作为剑术老师而前去考察首都的剑术氛围和条件。他的行动自然完全自由，事实上他也完全无视江户公馆。^[14]

武市于井伊直弼遇刺一年后来到了江户。事件发生后，社会局面是浪人暗杀政客，而幕府犹豫不决。对于喜欢采取直接行动的年轻

剑客来说，很少有现在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武市在江户联系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几年前曾被拦在了土佐边境外面的水户武士将自己藩内的混乱局面告诉了他。武市还见到了长州藩的维新领袖们。作为吉田松阴的狂热信徒，久坂玄瑞是那些恐吓外国公使人员的激进分子公认的领导，几年后，他也使长州藩成为极端倒幕运动和攘夷运动的领导。从长州来的还有木户孝允（此时叫桂小五郎），他也是吉田松阴的弟子，同时也是全国闻名的剑术大师。过几年，久坂玄瑞和高杉晋作去世后，木户将成为长州激进分子的领袖。^[15]

在这些人中，武士还会见了萨摩藩的桦山三圆。他是精通茶艺的僧人。桦山已经在江户住了很长时间，认识许多萨摩藩的重要官员，其中包括明治时期的领导大久保利通（此时叫大久保一藏）。萨摩藩的攘夷极端分子非常乐观，认为自己很快会占上风。他们将武市视为同道中人。桦山在日记中写道，“首次见面，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勇敢的人”。^[16]

因此，武市有机会见到其他勤王思想和勤王活动中心的同伴。久坂和木户介绍了吉田松阴这位已经牺牲的老师的教诲，还给他写了几首吉田的诗。那些诗对武市来说有些晦涩难懂，但他的新朋友详细解释了这些汉诗的全部含义。^[17]他们非但没有看不起文化程度不高的武市，还认可其为领导，并尊其为剑术大师。武市向他们介绍了同在江户的其他土佐人，其中包括池内藏太。这个人将会在坂本后来的事业中频繁出现。

在结交了新的朋友、接受了新的思想之后，武市瑞山让土佐剑客承诺要遵守一份纲领，逐步确立了在他们之中的领导地位。1861

年10月初，土佐勤王党成立。其成员均宣誓遵守以下的信仰：^[18]

堂堂神州受戎狄之辱，帝深叹古来之大和魂今既断绝。然久处治世，染因循委情之俗，无一人欲振举此心，攘皇国之祸。老公（容堂）夙忧此事，争言有司之人，却致获罪。此情真意切之念何罪之有？君受辱之时则臣亦死。

皇国之今已欲左衽。吾人欲奋起大和之魂，结异姓兄弟，不夹一丝私心，相谋以裨辅国家兴复。待锦旗一立，则团结一致，不辞水火，誓于神明，上奉帝之御心安泰，继老公之御志，下除万民之患。此中如有私心者，神怒降罪，且于吾人面前剖腹。各署姓名于后。

1863年3月，唯一一份勤王党的成员名单被提交给了山内容堂。192人的名字全部是血书，坂本龙马也在其中。

正如盟约所言，迄今为止，武市领导下的勤王党人仍然认为，他们对“老公”的封建义务和忠君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冲突。但是，如果发生冲突的话，那帝国的要求可能高于传统的向藩主尽忠。与此同时，对仅有模糊轮廓的未来的献身精神，使他们所能立下的最神圣誓约发挥了作用。血字签名、兄弟般团结的组织、对违反组织精神而追求个人“私心”的人实施的最高惩罚。他们所说的罪恶现在表现为耻辱、疾病，意思是神圣的日本国土受到了夷人的玷污。为了抵抗这种罪恶，使焦虑不安的天皇安心，他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打破幕府定下的不准集会的封建法规。^[19]

武市的192人名单并没有将土佐所有的勤王分子包括在内。不过，这份名单上的人却来自土佐各地。中冈慎太郎来自土佐东部的安艺郡。在高知城传播勤王思想且广受学生欢迎的学者间崎沧浪也在盟约上签了名。一些武市的追随者并没有出现在名单上，可能是因为在武市将名单提交给容堂的时候，他们的行为已经使藩政府感到不快。吉村寅太郎就属于这一类。他是一名庄屋，因参加土佐之外的勤王起义而为人所知。这份名单几乎包括了未来几年去世的全部83名土佐勤王分子。不过，勤王思想在土佐明显已经深入人心，武市的勤王党也只不过是献身这一事业的年轻人中最重要、最有凝聚力和最活跃的一群而已。土佐的每个地方都有勤王党人，他们通常是私塾先生，都有自己的追随者：幡多郡的樋口真吉培训了近千名学生，高冈郡的深尾家族有一群充满朝气的家臣，而安艺郡的清冈道之助也有大批的追随者。因此，武市的勤王党是藩国有无数勤王分子盟友和支持者的外在表现。

土佐的勤王党是些什么人，又代表了什么？对于同时代人而言，这些人似乎就是社会的叛乱分子和分裂分子。上级武士中，未来的陆军中将、政治家谷干城，以及佐佐木都对他们的宗旨深表同情。但是，不论多么同情，他们首先尽忠的对象是藩主及其代表的封建秩序，因此不可能与自己的下级纠缠在一起。正如佐佐木后来回忆道：“自己等人大体与武市同感，但我们和藩主的关系与武市的不同，无法悉数赞同。特别是，武市的言论温和至极且正正堂堂，但其手下多是下级武士，非常危险。”^[20]在佐佐木看来，武市的勤王运动显然带有下级武士愿望的烙印。他在其他地方写道，乡士以下的所

有武士都是勤王党，甚至在一篇文章中更进一步地认为，乡士勤王分子虽然大谈尊敬君主，但他们更关心的还是反抗封建上级。^[21]参加了土佐勤王党的田中光显也说，土佐的维新是一场不同等级之间的斗争。

官方修订的土佐勤王运动发展史表明，这一团体主要由乡士和庄屋组成。最近的一番认真区分显示，127名身世清楚的勤王党人的组成为：乡士54名，低级武士（例如足轻）51名，村官（庄屋和年寄）14名，上级武士2名，被剥夺头衔的乡士2名，农民1名，医生1名，工匠1名，僧侣1名。参加1864年安艺郡武装示威活动的23名勤王党人的组成，更加清楚地显示出勤王党人大部分都来自乡村。全部的名单中村官9名，乡士4名，农民3名，被剥夺头衔的乡士2名，足轻、商人、工匠、医生和僧侣各1名。^[22]

我们也许可以这么理解，这群人主要出生于农村，在土佐随处可见的私塾接受教育，被仕途升迁排除在外，同时又受城里颁布的法令管制。乡士和庄屋是他们的领导。不过，自德川时代早期以来情况就是如此。外国人的到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反对封建统治者的具体理由，但佐佐木猜测，对许多人来说，个人的愿望要比这类广泛的抱怨更加重要。

土佐勤王党最讨厌的人是山内容堂的参政吉田东洋。他施行了许多措施来增强藩国实力。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敌意部分来源于吉田的改革措施。虽然改革的原意是为了增加藩国收入，并增强军事力量，但它同时也加强了对藩国的控制。新增的奉行被派往沿海地区，加强海岸的监管；政府采取措施到处收集金属来制造武器，

并加强藩国的垄断政策以增加财政收入；他们设立新的部门，将和纸、樟脑等货物送往新的通商口岸，卖给外国人。对乡村统治者来说，这些措施意味着利润的减少和自主权的降低。它很容易就遭到攘夷、结束官员腐败、藩国团结一致应对民族危机的口号抵制。许多乡村领导显然有具体的不满，吉田的几条政策正是因为其反对而流产。1860年实施的加强和纸采购的政策由于反对而不得不中止，七个村的乡士也曾联合起来抗议一项税银的改革政策。吉村寅太郎是一名世袭的庄屋，曾在几个职位上显示出过人的才干。他在家信中也引用了1840年代庄屋联盟的一些话。我们也许可以将他视为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些乡村领导从地方事务的处理中得到自信，而这又鼓励他们参与大型问题的讨论。因此，对吉田东洋领导下的藩国政策的痛恨，也许正是对武市勤王党同情之心高涨的一大原因。藩政府后来在审理武市的案子时拖了一年多才宣判，原因之一就是意识到他后面的广泛支持。这种支持随时可能发展成暴乱。事实上，樋口真吉延缓了幡多郡的起义计划，大部分原因就是担心武市的生命会有危险。

吉田东洋和批评他的勤王党人应该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不停地呼吁“任人唯贤”，而不是依照社会地位授予官职。勤王党人显然认为自己是这类政策的受益者。他们也呼吁藩国团结一致，以取得攘夷战争胜利，为天皇分忧。但这种思想就很少将重点放在与世袭职位和特权有关的“私心”上面。吉田本人也求贤若渴，但他认为贤人更多存在于上层武士的中间群体中。吉田和批评他的人至少在反对土佐封建阶层的最高等级这一问题上观点相同。主要

由大家族和显贵组成的最上层，从古至今一直都是经济和社会特权上获利最多的一群人。吉田的改革剥夺了他们的职位，限制了他们在管理自家大宅时的自主权。但是，吉田还不至于到封建等级制度的底层去寻找管理人才。结果，武市这些出身低微的勤王党人和旧集团中的一些高级官员便逐渐联合起来。武市感到失望是因为吉田裹足不前，而其他人愤怒的原因则是认为他的行为太过火。^[23]

土佐的勤王党有着这样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不过，也有另外一小群人感激吉田，即便不打算保护他。他们是像佐佐木和谷这样的人。吉田提拔了他们，但他们却不赞成其看重利润而将货物卖给西方人的做法，认为那过于唯利是图。虽然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是保守派，但在思想上倾向于勤王派和攘夷派。不过，需要再次强调一下，在经济利益上，坂本龙马这类文雅的乡士和中冈慎太郎这类纯朴的庄屋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我们务必要记住，许多勤王党人显然忠于自己立下的誓约。他们狂热地希望打一场攘夷战争，将西方人在国土上留下的污秽洗涤干净；他们也渴望在政府部门任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他们的计划。许多人难免有些私心杂念，但是对于大多数为了“最高目标”而不惜牺牲生命的志士领袖来说，时代的危险和奉献精神表明，思想和理想主义的力量十分强大，甚至比他们想的还要大。

在江户成立了勤王党后，武市发现来自长州、水户和萨摩的新朋友正准备采取暴力手段表达对幕府政策的不满。孝明天皇的妹妹和宫即将跟年轻将军结婚的事情尤其令他们愤慨不已。一些人计划

半路拦截和宫的送亲队伍，让她返回京都，另外一些人则计划袭击促成这桩婚事的幕府老中安藤。^[24]然而武市却极力反对这么做。他认为这样改变不了什么，而且会牺牲大量的志士，对勤王事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最好的做法是成员们回到各自的藩国，把当地的武士都发动起来。如果一个藩国采取了坚定的攘夷立场而其他藩国也纷纷响应，那么接下来幕府的政策必然发生转变。久坂玄瑞和长州的激进主义者打算留在江户继续指导行动，但是最终武市的意见占了上风。志士们同意说服各自的藩国领导来年春天在京都聚首。离开江户之前，武市还成功说服了池内藏太，使他认识到自己应该与刺杀老中安藤的阴谋撇清关系。1862年初，刺杀安藤的计划以失败告终；土佐、长州和萨摩的主要志士均已回到各自的藩国，准备更大的举事。^[25]

武市回到土佐之后，先是努力说服吉田东洋和藩政府接受自己的观点。在和吉田的几次见面中，他解释了自己在江户参加的那些计划。土佐是时候任用贤人，采取攘夷方针，并派兵与萨摩、长州的军队在京都会合了。武市还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吉田的几名助手，其中包括福岡孝弟。在他看来，由于新大名山内丰范即将到江户的将军官邸去履行参勤交代的职责，借此到京都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直到队伍在京都停下，不再前进，否则一切看起来就像是在执行幕府的公务。

武市发现，藩国的领导们并不欢迎下级提出的意见，而且认为他的建议过于鲁莽和激进。他们最关心的依然是不要给前大名容堂添麻烦。容堂在幕府的地位迄今尚未完全恢复。为了向幕府示忠，

吉田计划运大量的木材到品川去，重修容堂住的公馆。他和同僚们还打算推迟丰范的江户之行，直到有确切的消息表明幕府允许容堂回到高知。他们不希望同时有两名藩国的合法继承人离开高知。

最令武市感到气馁的是，吉田将他与长州人、萨摩人结盟的故事当成了笑柄。按照剑客们在江户定下的计划，武市保证那些强藩将会在春天动员起来，然而吉田听后只是傲慢地指责他居然将浪人的阴谋看得如此认真。他郑重地说，如果长州和萨摩真的有什么计划，土佐藩将会通过正规的渠道得到消息。不管怎么说，土佐藩和德川家族的关系非比寻常，而且自从关原之战以来就是如此。土佐藩不可能轻易地和西南各强藩合作。吉田在打击武市希望和京都勤王派公卿合作的愿望时甚至更狠。他说，那些“长袖”的人根本就不懂政治。不顾与幕府之间的关系变僵以及容堂的安危，为了一些尚不明确的好处便与那些政治上尚不成熟的宫廷贵族合作，显然是极不明智的。^[26]从这些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之间鲜明的对比。一方是负责任的封建官员，清楚地知道自己藩国的历史和战略利益，另一方是情绪激动的勤王党人。他们都意识到要增强国力就必须进行改革，然而其活动的领域各不相同，彼此的计划也很不一样。

藩政府充分了解过武市的计划，并持反对态度，因此武市要离开土佐就变得更加困难了。然而，他仍然需要与长州和萨摩的盟友保持联系，于是派自己的助手充当联络员。他有一次选了坂本龙马去执行这一重要任务，可见很信任这名年轻的崇拜者。坂本的剑术非常有名，所以相对容易获得旅行所需的通行证，因为他能够以拜访剑客和参加其他地区举行的比武大会为由申请到通行证。

1862年初，坂本被派往长州。他到了萩市，并于3月经由大阪回到土佐。从萩市带回来的消息不是太好。长州政府刚刚实行了一项政策，充当幕府和宫廷之间的调解人，希望借公武合体支持者这一角色提升长州在各藩国中的地位。公武合体仍然对幕府有利，留给京都方面的利益很少，因此长州的勤王志士强烈反对该政策，但他们还无法对其修改，或者是将这项政策的象征——大老长井雅乐——的职位撤销。^[27]所以，土佐、长州和萨摩在京都进行合作的愿望看来无法实现了。但是长州的勤王志士似乎准备发动起义来迫使藩国改变政策。在坂本带给武市的一封信中，久坂玄瑞表明了这种决心：“诸侯不足恃，公卿不足恃，草莽志士纠合义举之外尤无他策。虽为失敬之语，然纵使尊藩敝藩灭亡，若为大义亦不为苦。”^[28]在土佐，为了民族利益——当然也有个人利益——情绪激动的勤王党人已经准备牺牲地区的安全，但他们发现上级的官僚阶层对此没有一点反应。

武市的另外一名信使是庄屋吉村寅太郎。1862年春，吉村去了九州和长州之后返回土佐。他不仅联系了萨摩、长州的勤王党人，还和下关海峡对面久留米和福冈的人取得了联系。吉村还带回起义一触即发的消息。他称久留米和福冈的勤王党准备和长州的勤王党一起行动。萨摩人向他保证说，萨摩的摄政岛津久光准备带领大队人马到京都去，充当勤王事业的领军人。吉村本人已经承诺不久会返回长州参加战斗，他还怂恿武市说，假如土佐无法组织起义，勤王党人应该离开藩国，到长州去与朋友们并肩作战。

这类消息很快在武市的追随者中引起一片哗然，许多人强烈请

求武市带领他们横渡濑户内海。然而武市却不愿采取直接行动，他仍然希望藩国会采纳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山内容堂会喜欢自己的计划，似乎没有必要直接犯上，自绝后路。武市的不情愿还因为他对藩国忠心耿耿，而且有强烈的责任感。要是勤王党人都跑了或者参加暴动，藩主和土佐将会怎么样？在他看来，尽忠之路在于纠正藩国的政策，而不是抛弃它和追随者一头扎入国内的政治旋涡。^[29]

由于武市拒绝带他们离开土佐，而且预计长州和萨摩举事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土佐的勤王党人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们越来越不满意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无足轻重，而且早就准备抨击那些无可救药的保守派和佐幕派的上级。当时发生了几起上级武士对乡士不尊重的事件。这类事件通常在一方或者双方都醉酒的状态下发生。^[30]官方修订的土佐勤王党史《维新土佐勤王史》是一部对上级阶层的愚蠢和顽固的冗长控诉史。从无数封写给当局要求“任人唯贤”的请愿书中，不难看出是下级志士的个人利益和偏见在发挥作用。这些措施都失败之后，一些勤王党人无法继续忍受按兵不动的局面。他们担心错过前方的重大事件，于是偷偷溜过边界，到长州和京都过起了浪人生活。由于无法说服武市相信采取武力的必要性，在听说长州的盟友已经在藩政府得势后，吉村寅太郎也离开了土佐。武市很不情愿地看着他离开，但是成功说服他留下一位负责藩政府治安管理计划的朋友。

坂本龙马也对武市的按兵不动感到不耐烦。1862年4月底，就在吉村出走几个星期后，坂本听说长州和萨摩的志士在京都南部的伏见碰头，具体地点在萨摩公馆附近一家名为寺田屋的酒馆。坂本

决心参加这场即将爆发的起义，于是和朋友泽村一起逃走了。坂本的出逃令朋友们感到难过，他们认为这是对土佐勤王党的一次严重打击。曾想方设法让龙马留在家里的哥哥权平也慌了。坂本向另外一名亲戚借了路费，因此绕过了哥哥。他还向另外一名勤王党人平井收次郎询问其妹妹的联系方式，后者在京都的三条家做帮佣。但是平井不想让妹妹成为坂本阴谋的牺牲品。他写信给她，警告她不要成为坂本任何计划的帮凶。^[31]

志士们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1863年，坂本写信给池内藏太的父母，解释池内离开土佐的原因。我们可以借此进一步了解坂本对于自己离开土佐的看法。信中反映了他的行为对封建的忠孝之道所造成的压力。坂本批评大名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他写道：“的确，他们对我们所说的‘神国’^{*}没有丝毫的忠诚之心。他们无法理解让天皇重新掌权的思想，而这正是迫切需要做的。在这种情况下，低级武士要怎么做才能为陛下分忧呢？你们知道，一个人应该将朝廷看得比幕府重要，比父母重要。在这样的时代，认为将亲人和藩国放在第二位，抛弃母亲和妻子儿女的做法违背了一个人应尽的义务——这种想法当然来自我们那些愚蠢的官员。而那些糊涂的父母跟在他们后面，大谈特谈‘我们藩国’和‘我们家’，直到他们的儿子根本不知道该采取何种立场。”^[32]

坂本离开两个星期后，武市看到自己最优秀的助手均已离开了

* 日本自称是神之国度。——译注

土佐，于是决定采取行动反对吉田东洋。为了使土佐加入看起来大有希望实现的志士密谋计划，现在似乎有必要行动起来。浪人正在伏见聚集，萨摩藩的军队已经开拔，长州藩的人也在准备推翻他们的保守政府。如果土佐藩政府得到允许，无限期地延缓年轻大名的参勤交代之行，将会失去加入聚集到京都的代表集团的机会。另外，反对藩国首席大臣的行为似乎不会很危险。吉田的性格冷漠而不得人心，很少得到土佐武士的支持，和高级家臣之间的关系也很疏远——后者的职位、收入和权力都被他削弱了。一些恶言诽谤的小册子在社会上流通，公开抨击他是“王安石”。武市咨询了吉田东洋最重要的几名对手，发现他们并不愿意或者说没有能力采取直接行动——他们曾经要求他辞职，但是失败了。然而武市却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印象，即如果其他人肯代他们行动的话，这些人不会感到震惊。不管怎样，他们许多人都是强烈的攘夷派，对于勤王党人对吉田对外贸易政策的批评也早就深有同感，而且这帮人很有可能在吉田下台后执掌政坛。受到调查和惩罚不再是直接行动的主要顾虑，于是，武市下定决心，组织了一帮杀手。

1862年5月8日，吉田东洋从高知城返回自己的宅邸。他刚刚给年轻的主公讲了一节赖山阳的《日本外史》。^{*}天下着小雨，吉田手里拿着一把伞。五名随从跟在他周围，包括后藤象二郎和福冈孝弟。突然，有剑客袭击了这一小队人。那须信吾从后面一刀将吉田

^{*} 吉田挑选这本有着浓厚忠君思想的名著作为教材，显示出他绝非对手所指控的盲目的佐幕派。

的头砍了下来。后来他逃到了长州一个同情勤王党的商人家里，并在那里向父亲写信，报告自己的壮举。^[33]

终在四月朔日定刺杀之事。同志夜夜伺机，既而于八日夜得机会。诸同志共盟，誓取其首级挂于刑场。众人持行李，共十人许，前往四半桥观音堂。诸人于待屋町待（吉田）最早夜半前登城归来。余先自后砍其首，思一击必中，但为伞所阻，只留轻伤。彼之护卫反身拔刀，片刻争斗，渐得机会，直取其首。余携此前往观音堂，于路侧小沟清洗首级及刀，以先前所备束带包裹，只一人自待屋町沿南奉公人町向西。各处犬吠，乃啃首级，大苦恼。终至观音堂，交于同志，内心安堵。此时乃缓缓收取行李手枪等，以备旅途。^[34]

那须的同伴将吉田东洋的头颅挂在高知刑场的一块牌子上示众，木牌上写着这名已遭处决的统治者的斑斑劣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指控根本没有提到日本国内政治，只有那些能在高知引起最大反响的问题。牌子上写道，吉田滥用了参政的职权。他利用藩国的财政政策谋取私利，那些积极的经济措施已经造成了疯狂而肆无忌惮的铺张浪费，使平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使土佐的林地变成荒山，本来亟须加强的藩国财政体系变得更加不堪一击。这次的惩罚是为了缓解人民的痛苦，是让他为自己犯下的滔天罪行赎罪。^[35]

水户浪人在江戸城外刺杀大老井伊直弼而燃烧起来的燎原之火，现在已经蔓延到了高知，烧到了山内家族的城门之下。事实证明，

志士们从武馆学到的与其说是如何抵御外国人，还不如说是如何与那些拒绝听从激进分子意见的政治家直接对抗。

正如武市所料，当局并没有用力追查吉田东洋遇刺的案子。吉田的人缘不太好，死后遭到各种各样的人嘲笑、议论。三个与暗杀直接相关的人去了长州，并从那里转去京都，受到长州和萨摩藩友人的庇护。有一段时间，高知城的调查似乎要牵连到武市瑞山，志士们准备用武力抵抗事态的发展。但这一努力几乎毫无必要，因为他们与一些吉田东洋的高级敌人，特别是山内家族的亲戚进行了合作。吉田的改革措施曾经损害了这群人的特权和收入。山内丰誉给武市写了一封措辞友好的信，从而成功阻止了勤王党人武装起义的准备。一切复归于平静，藩政府的改革就这样实现了。^[36]

吉田一死，政府部门的高级官员便全部换了一批人。这些人事变动由退隐已久的藩主山内丰资（1809—1843年在位，1872年去世）一手安排。他曾经阻挠过马渊嘉平的天保改革，而且从未认可过吉田东洋的改革措施。由于山内容堂仍然在江户，没有人能够阻挡改革派，结果吉田任命的人几乎全部都被免职。新上任的官员大多都是守旧派，曾经反对吉田为加强藩国实力而施行的激进政策。这些人更喜欢旧的秩序，认为这样才能保证家族和传统万世不灭。其中有些人倾向于支持勤王运动，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保守观念远远超过了可能公开表态的勤王主义观点。高官中只有小南五郎右卫门与平井善之丞两个人赞同勤王主义，他们俩都是御目付，即高级警官，结果，衙役队伍中的下级职员全部都是武市的人。但是大多数

政府部门都受到了保守的山内家族旁系的严重影响。新政府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一位名为小八木五兵卫的大保守派，藩政府集体倒向后来被称为“佐幕派”的立场，换句话说，勤王党人并没有更接近权力中心。吉田东洋死后，武市无论如何都算得上是土佐政治舞台上最强有力的人物，然而因为出身低微，他没能在新政府中获得任何职位。相反，暮气沉沉却家世完美的保守派占据了要职，就连不喜欢吉田并希望他下台的佐佐木高行，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人全是废物。^[37]

不出大家所料，新政府也和旧政府一样，不愿将年纪轻轻的大名（丰范此时 16 岁）送到京都和江户，让他卷入政治漩涡。不过，武市发现，维新的时间比他一开始想象的要长。他手下参加的浪人密谋计划被瓦解，伏见酒馆的浪人以为岛津久光会出手相助，没想到 5 月 21 日，他却派兵镇压了他们。17 世纪以来的第一宗浪人阴谋计划失败了。许多参加者被捕，并移交给各藩的治安部门，其中就有被移送给土佐町奉行所的吉村寅太郎。坂本龙马本来打算参加寺田屋的起义，但他最后去了江户，因此没有牵涉进去。

因此，土佐并不急于参加国内的政治行动。武市有充足的时间精心策划一场运动，以迫使年轻的领主离开藩国。即将到来的参勤交代似乎仍然是前往江户的一个最好机会。京都的勤王派公卿无疑受到浪人同党的怂恿，纷纷撺掇三条实美让他的山内亲戚去江户时顺便前往京都。作为武市的追随者，平井收次郎也在高知向上级请愿，努力促成领主的江户之行。他指出，萨摩和长州均在京都部署了军队。在促成京都与江户和解这件事上，土佐不应该落后他人。山内家族旁系中唯一的一名勤王党人也在一份公文中加上了自己的

观点，并说这是容堂的愿望。他认为，因为对德川家族的个人义务便忘记民族大义是非常愚蠢的。但是，高知城里那些小心谨慎的庸才让年轻的领主回答说，由于自己年纪尚幼，无法对国事做出评论，只有等自己直接到江户去咨询容堂之后才能做出决定。^[38]

高知的勤王党通过京都的朋友给三条带话，让他请天皇下旨，命令丰范去江户的路上在京都停留一下。收到谕旨后，藩国特别派了一名信使到江户去咨询容堂的意见。武市已经将自己的重要助手间崎沧浪派到江户去，以便解释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容堂认为最好是尊重天皇的旨意。然而高知的官员仍然担心会卷入自己并不喜欢的政治旋涡。他们决定，年轻的领主应该直接去江户询问容堂，再决定是否去京都。

丰范的江户之行，自从在4月6日以生病和社会动乱为由推迟以来，终于在1862年7月22日启程了。这是土佐藩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出行，其原因并非完全是为了丰范。队伍正在列队时，高知城忽然出现了大量的乡士，叫嚷着要陪同年轻的大名前往江户。当局不情愿地将他们安排到了队伍中，预算的花销也相应增加了。有大约600名各种等级的武士护送丰范前往江户，如果将仆役也算在内，人数据说超过了1000人。^[39]

在京都停留的计划并没有定下来，然而此时天意起了作用。年轻的大名和随从在大阪附近遇上了麻疹疫情。这支不太雅观的队伍终于停止了前进。^{*}他们在大阪停留的一个月给了勤王党人进一步活

^{*} 长期以来，大名出行是造成疾病和瘟疫在全国蔓延的罪魁祸首。德川时代晚期的几次天花大流行正是沿着参勤交代的路线传播的。

动的机会。队伍和江户之间的书信往来非常频繁。幕府看上去已经越来越弱，江户之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此时京都来的信使却带来了宫廷的新命令，要求领主去江户之前先到京都去。大名一行人整整迟疑了一个月，直到容堂方面来消息说赞成先到京都去，这件事才尘埃落定。^[40]

9月18日，丰范一行终于来到京都，给那里的混乱局面火上浇油。同在队伍中的武市此时可以继续与其他藩的朋友们一起密谋起义计划了。土佐的勤王志士最终将自己的上级拖入了国内的政治漩涡。土佐人刚到，天皇便下了一道圣旨，要求年轻的丰范留在京都，协助宫廷抵抗夷人的威胁。^[41]武市根本无须收到圣旨，就已经一心扑在了这项工作上。

志士登上国内政治舞台

土佐志士出现的京都是个政治上极端混乱的地方。为了理解土佐勤王党的活动，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井伊直弼遇害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开国以来，日本国内的经济一片混乱，政治也变得复杂起来。在国际市场和国内节俭政策的双重影响下，武士的薪俸降低，但与此同时，生活成本却提高了。对现实的种种不满使武士们愤慨不已，排外情绪也进一步加剧。正如大家所想的那样，收入微薄的下级武士对这些变化的感受尤为深刻。对于逃到京都的浪人而言，飘忽不定的物价当然是开国以来种种错误行径的另一个标志。这些因素导

致绝望、愤怒的武士的流动性大大增加，他们的思想很容易转为暴力对抗外国人以及允许外国人进来的幕府。

国内政治的复杂性还表现为，一些强大的外样大名抓住机会，根据可能对自己有利的原则，不断地改变对幕府或者宫廷的态度。每个藩国内部都和土佐一样，激烈地讨论到底是应该小心地遵守不插手国内政治的传统规定（佐幕派，即支持幕府的政策），还是努力在宫廷和幕府之间调停（公武合体派），抑或是支持勤王和攘夷事业（尊王攘夷派）。对于哪种做法对藩国最为有利，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在土佐，拥护第一种即佐幕派的是那些把持朝政的守旧派，拥护第二种公武合体派的主要是精力充沛的改革家和规划家，第三种立场带有激进主义的色彩，自然成为下层人民和对现实不满的人的庇护所。派系和官僚之间的对抗使三者之中任何一者都无法一家独大，然而它们又普遍存在，因此藩国的政策问题就有保守派、中间派和激进派三种明显不同的观点。这些派系能够从外部环境和内部压力中得益。内部压力主要由明显占优势的下级武士和攘夷情绪组成，因此在关键时刻，“舆论所向”可以成为政策向他们倾斜的理由。外部环境主要表现为大藩主，尤其是萨摩藩的岛津家族和长州藩的毛利家族之间的不断斗争。这两个家族互相猜疑，其程度至少与各自对幕府的不信任相等。土佐大名意识到自己与这些强大的邻居相比力量孱弱，因此始终避免诉诸武力，以免沦为附庸而丧失领导地位。它偏向于在两者之间斡旋，以此为自己的主要作用。长州一开始以调停为主导方针，等到萨摩也使用同样的策略而且似乎占了上风后，长州才转而支持勤王党的极端主义政策。每一次这

样的转变都意味着国内的官员相应地从一派换成了另一派，而在此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对立派系的人被处死或者暗杀。所有这些都受到幕府内部官僚斗争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发生，因此勤王运动期间的政治舞台非常复杂多变，简直如走马灯一般。本书必须对那些与土佐主要人物有关的事件进行描绘。

大老井伊遇害的事件发生后，幕府老中显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井伊的离去，把安藤信正和久世广周推上了前台。安藤是井伊任命的谱代大名，打算继续执行井伊的对外政策；久世之前曾被免职，现在的重新任命是希望他能修复幕府和水户派的关系。这两个人代表了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和派别，但他们没有创造力，又缺乏足够的制度保障，因此无法合二为一或者将对方淘汰出局。幕府并未下定决心对水户藩的支持者进行清洗。新的水户大名被禁止进入将军的官邸，而他那些造反的家臣则被抓捕处死或者被逼自尽，但是关于大老被杀一事的惩罚就此告一段落。1860年8月25日，水户藩的统治者德川齐昭去世。这名过去几年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离世后，该藩陷入了严重的内部纷争，一派主张延续齐昭的政策，一派则主张与幕府统治者紧密合作。虽然齐昭的儿子一桥庆喜周围总是围绕着一帮水户藩的人，但是水户藩作为一股由来已久的势力将变得不再重要。

新一任幕府领导首先将精力用在改善江户和京都的关系上。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预计采取的一个主要步骤是让公主和宫嫁给年轻的将军家茂。孝明天皇反对这个提议（因为公主已经许配给了有栖

川亲王。后来有栖川亲王将带领天皇军进攻誓死抵抗的德川幕府军队)，但是宫廷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同意了这门亲事。其中，最有说服力的论点来自天皇最信任的顾问岩仓具视写的一篇文章。岩仓主张同意将军和公主联姻，因为现在宫廷尚未准备好与幕府全面对抗。他认为，完全相信外样大名是不明智且危险的行为，因为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宫廷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幕府的要求。他写道，最好的方法是“名义上做出让步，而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失去”。宫廷同意将军的求婚，并以此为砝码影响未来幕府的政策。因此他们强烈要求幕府做好攘夷的准备，幕府则同意将在“七八年到十年内”通过谈判的方式废除条约，或者用武力驱逐外国人。^[42]1860年夏末，联姻的协议谈成。和宫将于1861年11月抵达江户，婚礼于1862年1月举行。幕府老中安藤信正在这些谈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正因为如此，武市的志士朋友们才建议暗杀他。1862年1月13日，他们的暗杀以失败告终，然而安藤受伤过重，不得不从老中的位置退隐。支持联姻的岩仓也引起了志士的不满和猜疑，1862年9月，他们成功将他排除出朝廷。

接着，幕府对反对井伊直弼的大名的管制渐渐松下来。1860年8月，土佐藩的山内容堂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直到1862年5月23日，他才和越前藩的松平春岳以及一桥庆喜一起，再次完全获得了与他人交流的自由。此后，这三个人的荣誉和重要地位也慢慢恢复了。这一点对于松平春岳和一桥庆喜来说尤为重要。他们都是德川家族的亲藩，有资格在幕府任职。6月，两人受到了将军的接见，接着各方开始努力劝说他们接受顾问一职。不过，江户那些思想保

守的谱代大名不希望他们俩参与决策，因为几年前他们曾竭力反对庆喜成为将军的继嗣，担心庆喜会重新夺回自己失去的东西。

空气中充满了和解的气氛，西南强藩的大名们竭力充当和解的代言人。最先行动的是长州藩。长州虽然贡献了超额的志士，但并没有因为官方的举动而受到怀疑。长州藩家老长井雅乐是该政策的主要倡导者。1860年，他向朝廷提交了一份《航海远略策》，极力主张开国，并促进江户与京都之间的和解。他的开国观点显然和幕府一致，这就意味着，他的和解计划必须争取到京都对幕府行动的支持。这一早期版本的公武合体计划对幕府极为有利。长井雅乐得到了自己大名的支持，并被批准去京都和江户为自己的计划活动。为了让这位家老的工作做得更加完满，大名毛利也随后前去。然而，1862年2月，正当毛利在江户时，那里发生了志士袭击安藤信正以及安藤隐退的事件。京都和长州的激进主义浪潮不断高涨，长井为实现公武合体而做的进一步努力注定会失败。他无法提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来证明自己的政策有过人之处，因此失去了大家的信任。在长州藩，极端的保守分子和勤王积极分子均激烈地反对他的观点——事实上，长州藩的志士在暗杀安藤的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结果，长井的努力以失败告终。1863年，他被勒令自杀，结束了自己的一生。^[43]

在长州藩政策的改变上，一个重要且可能最关键的因素是它的地位受到了萨摩藩岛津久光的威胁。后者提出了一个更受宫廷欢迎的公武合体计划，一时名声大噪。看上去那是唯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调解计划。这个计划与攘夷联系在一起，因此偏向于京都宫廷的

立场。4月14日，岛津带领一支一千多人的军队离开了鹿儿岛。志士们以为这支军队会出手相助，但是他们错了。土佐藩内之所以群情骚动，是因为大家认为假如土佐勤王党不参加行动，这支队伍将会和聚集在伏见寺田屋的浪人一起独享胜利的果实。然而，志士们误解了岛津的意图。这名萨摩的统治者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派。他先把自己藩内几个主要的捣乱分子遣送回去，然后敦促宫廷采取措施控制那些不服管束的浪人，最后他亲自出马，于1862年5月21日镇压了寺田屋的阴谋分子。这次行动导致志士在未来谋划时改为向长州求助，并且造成了萨摩和长州的多年不和。

岛津久光计划利用公武合体，提高宫廷和西南强藩的地位。该计划按照京都的意思做了修改，逐渐变得完善而清晰。它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将军应该到京都来，向宫廷咨询国事，以显示他对天皇负责的态度；第二，呼吁西南沿海强藩像16世纪的秀吉时代一样，担负起更重要的角色；第三，任命大名们信任的两个人为幕府高官。松平春岳将出任政事总裁，而曾被井伊直弼勒令禁闭的一桥庆喜则将担任将军后见职。计划确定之后，宫廷派敕使到江户告知了将军。宫廷贵族大原重德将担任大使，而岛津久光将率领自己那支萨摩大军护送他前往。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彰显朝廷立场的变化，因为之前的宫廷敕使只是礼节性地带几名护卫，而现在，大原发现自己正处在日本西部最强大的大名的保护之下。大原、岛津一行人于1862年7月6日抵达了江户。

江户的谱代大名拒绝了使团的某些建议，尤其不愿让一桥庆喜和松平春岳成为幕府的决策者。然而在他人劝说、担心被害，以及

有希望阻挠这两个被迫接受的新官职的情况下，他们终于屈服了。8月1日，松平春岳和一桥庆喜收到了任命书。其他的革新也随之而来。9月24日，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被任命为京都守护，地位在传统上掌管与宫廷之间一切联系的幕府所司代之上。井伊直弼的家人和支持者均受到惩罚，以弥补其生前针对宫廷的不法行为。改革军事、人事和衣着的新规公布。另外，在松平春岳及其顾问横井小楠的影响下，1862年10月15日，幕府极大地修改了参勤交代的规定，允许家族人质离开江户，缩短大名参勤交代的时间为三年内的100天，目的是使大名利用节省下来的开支加强国防。大多数大名从江户解救出自己的家人之后，都径直奔赴京都。9月，明显胜利完成出使任务的岛津久光也回到了京都。路上发生了著名的生麦事件，萨摩藩的武士称，英国人理查德森试图横闯大名的队伍，因此将其杀死。^[44]

岛津久光发现，京都的情况和他几个月前离开时有很大不同。他离开京都后，长州藩改变了立场，解除了长井雅乐的职务，而且对京都的态度比以前热情得多，结果宫廷再次由支持萨摩转为支持长州。接着，9月18日，年轻的土佐大名山内丰范来到京都，使京都的武士人数又增加了几百人。同行的武市和勤王党人，一到京都就立刻开始行动，煽动激进主义和排外主义的风潮。显然，如果说公武合体还有市场，那现在也是以宫廷为中心，且程度比岛津久光之前预料和设想的要严重得多。而且，以宫廷为中心也就意味着受志士煽动和影响。志士的同伴刚刚在寺田屋感受过萨摩人的刀锋，不可能喜欢他们。因此，这名萨摩藩的统治者离开京都，回到了

鹿儿岛。此时萨摩与英国的外交危机正不断升级，时局迫使他回去安抚因理查德森之死而不依不饶要求赔偿的英国人。

京都现在无可争议地成为国内的政治中心。将军准备前往京都与天皇商讨大原重德传达的朝廷命令，到京都居住的大名也越来越多。然而，因为有大量的志士和勤王派浪人，这座城市给人的主要影响和印象还是混乱和暴力。在他们的努力下，攘夷派公卿的影响越来越大。姊小路公知和三条实美都是有影响力的人物，岩仓具视的政治观点更趋理性，但由于早年支持将军与和宫结婚一事而被罚禁闭，不得不从职位上退下来。由于担心遭到暗杀，岩仓住进了京都郊外的西芳寺。京都的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来，他在那里思考和评论时事，直到时机成熟，东山再起。^[45]

京都越来越成为公家侍和浪人的天下。他们在大街上成群结队，招摇过市。和他们一起的老朋友摇身一变，成了西南强藩藩主随从，中颇有影响力的人物。由于缺乏管制以及武士激增，京都的街道成了危险之地，任何人只要更喜欢旧制度，就有可能在命丧街头。

志士们自然而然地聚集在某些著名的攘夷和倒幕派公卿的周围，而没有人比三条实美更符合这个条件了。很快，三条就在下级武士中建立很大影响力，并且拥有一批信众。三条显赫的社会地位、与宫廷的密切关系以及那些强有力的观点均令他们目眩神迷。此外，他和山内家族是亲戚，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土佐勤王党的指导人物。此前，武市等人就曾利用三条的关系，成功使朝廷下旨要求丰范入觐。从1862年起一直到德川幕府垮台，一帮忠诚的土佐志士一直

追随着三条。三条后来落难长州时，他们也追随而去，并在流放期间照顾他。^{*}这个时候的三条实美 25 岁。另外一名受志士喜欢的公卿是 23 岁的姊小路公知，他总是乐意倾听他们的激进讨论。

土佐藩的志士现在正与长州以及一些来自萨摩藩的激进主义者顺利地合作。他们联手控制了京都，并将其变为恐怖之地。与那些反对去京都的保守派相比，土佐勤王党在藩政府中的地位也提高了。圣旨和委任状如雪片般向 16 岁的藩主飞来，保守派的阵地已经让给了武市及其党羽。事实上，小八木五兵卫不久就因绝望而返回高知。

接下来几个星期，鲁莽和暴力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到京都后不久，武市就向宫廷的朋友们提交了一份陈情书，附有年轻藩主的签名。武市这么做是为了将勤王事业往前再推一步，其中对“王政复古”的呼吁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大胆的一次。武市建议应该分三步走。首先，他建议将大阪和京都周围的整个畿内平原置于宫廷的直接统治之下，迁移走在这里拥有田产的大名，并派军队驻守，由公卿和宫廷亲自掌控。他认为，可以下令让大阪的商人支付相关的费用。一旦宫廷安全得到保障，就可以颁布攘夷的命令。其次，武市建议大胆地改革参勤交代制度，让大名们三五年来一次即可。第三，武市建议宫廷重新担负起所有政治决策的责任。他写道：“一切政令都应该由宫廷发布，而且大名们参勤交代的地点也应该是京都，而不是江户。”武市在陈情书中认为，幕府不会对宫廷的强硬

^{*} 在对这名落难公卿一直不离不弃的一小群人中，土方和田中是尤为突出的两位。

立场做过多的抵抗。他说，只要让宫廷调动七八个强藩进行一次军事演习，幕府的态度就会变得恭敬起来。^[46]

志士的势力和自信心在逐渐增强，而幕府的声望和对京都管制权却日益旁落。在土佐人到来之前不久，京都刚刚开始了一波暴力浪潮。随着他们的到来，暴力行为更是日渐升级。敌人，不论是真的还是想象的，官员，不论是否真的与三年前摄政井伊的清洗行动有关，都惨遭杀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八人被杀。最大胆的一次是24名土佐、长州和萨摩藩的勤王党袭击了正准备返回江户的京都奉行及其随从。“天诛”这个词开始出现在志士散发的布告和传单上。贴在墙上的恶言诽谤和非难攻击、在大街上传播的只言片语，使受到天诛威胁的人数比实际被杀的人要多得多。志士们的计划得逞，成功地令许多人恐惧得发抖。当地的豪商自然成为行动的目标，为了避免受到诛罚，他们经常被迫提供金钱。剑客们将刀下之鬼的头颅悬在京都的主要大街上示众，旁边还附上布告，解释他们的罪行。看到这种景象，即使那些对威胁不以为意或者嗤之以鼻的人，也会感到心惊肉跳。

在这段时间，勤王党人巧妙地向宫廷施加压力，罢黜了一些被认为是佐幕派的宫廷高官，代之以与三条一姊小路集团关系更密切的人。这些年轻的宫廷贵族和他们的军事盟友一样，认为具有极端的勤王思想就是优秀的品德，而对立的保守派通通都是“佞臣”。

这种环境催生出了再次派使节到江户去的计划。由于岛津—大原的出使，将军计划前往京都，而一桥庆喜则要提前做好安排。按照合理推测，庆喜的到来将会缓解紧张的气氛。志士和他们的公家

朋友们认为，如果能够阻止庆喜这么做，他们的地位将会得到加强。于是，他们决定给将军再下一道命令。为此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由三条实美和姊小路公知率团第二次出使江户。在挑选使团成员时，武市及其长州盟友与宫廷的朋友们密切合作。1862年11月12日，使团成员全部挑选完毕，并于12月3日出发。16岁的领主山内丰范带领500人充当护卫。他们带去了立刻将夷人驱逐出日本的圣旨。狂热的攘夷派就这样成功地使幕府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有些人可能是利用夷人作为攻击幕府的工具，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在提出立刻与夷人进行殊死搏斗的要求时，武市及其土佐同胞是非常真诚的。

此次出使也出现了一些奇特的迹象。以乡士身份跟随藩主来到京都的武市成了使团的一名护卫，是宫廷贵族姊小路的随从之一。他现在的称号是筑后国领主柳川左门。他那把著名的长刀换成了宫廷贵族佩带的精美宝剑，而且也不用在尘土中大踏步前进，而是坐上了轿子。不难看出，这类活动使这名下级武士如此扬眉吐气，要知道就在一年前，他还无法得到藩国官员的尊重和接见。“到达江户后，”武市写信告诉妻子，“我将进入江户城，并且见到将军。我们也会收到礼物。将军大人赏赐我们物品，真是不可思议。”关于那些派来服侍他的人，他说：“他们跟在我身后，真的就跟狂言里的一样。”^[47]

使团于1862年12月18日抵达江户。他们带去的命令使松平春岳和一桥庆喜领导下的幕府改革面临严重的危机。事情的转变直接让春岳既泄气又愤怒，他立刻提出辞职。庆喜也随后跟上，但是

两人很快就被劝说再考虑一下。在接下来的复杂斡旋中，山内容堂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容堂说，他认为京都的攘夷命令是个政治陷阱，幕府只需笼统地同意攘夷而不做出具体的保证，这样才能避免上当。他担心公然拒绝命令只会引发内战。通过和三条的关系，容堂得以控制对方的急躁情绪，同时也让春岳和庆喜重新考虑辞职的事。长州藩的志士对旷日持久的谈判感到不耐烦。为了发动战争，他们决定趁这段空闲时间消灭横滨的外国人。容堂从武市那里听说后，及时派自己的手下去横滨阻止他们。结果，他手下的人差一点就和长州人打了起来。^[48]在容堂的协调下，1863年1月，三条一姊小路使团带着幕府正式接受攘夷命令的回复返回京都。不过，攘夷的具体时间并没有确定，不久将军将和京都的官员会面，届时可能会讨论到这些细节问题。

从武市的观点看来，这次出使肯定是一次绝对的成功。他参加了宫廷贵族的护卫队。返回京都后，年轻的大名将 he 擢升了一级，变成留守居组。他终于成了一名上级武士。吉田东洋的追随者全部被赶下台，四处散落，有些甚至被杀害。山内容堂重新活跃在政治舞台，而武市认为他足以和土佐藩内任何残余的保守势力抗衡。

武市跟随三条的使团离开江户几天后，又有一伙土佐勤王党来到江户。他们的发展很好地见证了时代的混乱对传统封建结构造成的分裂。

高知城内一直都为山内容堂的安全担心不已。人们听说他重新成为幕府的顾问，还听说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促成了一些改革，减少了大名参勤交代的义务。通信的缓慢使消息被夸大，土佐藩内流传

的一些曲解的消息让勤王党人相信，他们的前领主现在正在幕府保守派的手中，生命危在旦夕。有消息说容堂在江户不受欢迎，其他人显然利用这个谣言，作为他们离开土佐参加国内政治的一个适当理由。不管这 50 人（大部分是乡士）的理由是什么，总之他们聚集在高知，要求当局允许他们到江户去解救山内容堂。

这些人里面最重要的是中冈慎太郎。对他来说，这次江户之行标志着他开始踏足国内政坛。中冈是德川时代晚期土佐东部一名乡士的长子，管理着年产大约 1520 石大米的广袤地区。他曾跟随间崎沧浪学习，并向武市瑞山学习剑术，也是武市勤王党的创始人之一。庄屋的经历使他同时具备了独立和负责的特点。有一年发生饥荒，为了帮助村民渡过难关，他还曾到高知借钱应急。虽然他很早就对武市的勤王运动有浓厚的兴趣，但因为是长子，有义务在身而一直无法离开。1857 年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然而 1862 年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时，他再也按捺不住，成为 50 名乡士的组织者之一。^[49]

中冈领导的这群人向当局申请离开高知的许可证，于 12 月 7 日获得了批准。去江户的一路上风雪交加。这些轻浮的剑客希望朝廷能颁布敕令，允许他们进攻幕府。一路上他们找到了以前吉田东洋手下的人，并清算了几笔旧账。虽然初来乍到，但江户的政治形势在他们看来并不平静。这 50 人的到来，平衡了京都和江户勤王志士的力量。根据记录，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发誓为容堂的利益而战。^[50]

与京都的同伴们一样，这些江户的志士在衣着和行为上采取了一套他们认为与自己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一致的做法。他们留长发，还嘲笑刮胡子和洗澡的人。在冬季的江户，他们身穿薄薄的便服，

光脚踩着木屐在大街上走来走去。他们不修边幅，而且大肆挥霍，必要时也不是不会向商人借款或者干脆强取豪夺。^{*}他们身上充满了“大和魂”。有几个人甚至打算切腹自杀，以激发同伴们的英雄气概，其他人好不容易才劝阻了他们。就像别人所认为的那样，他们是骚乱的产物，是亡命徒和恶棍。作为一群没有计划的革命者、正在寻找领袖的追随人，他们在摸索一个更有机会出人头地的社会。不过，他们身上也有一种真正的爱国精神，而且相信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危险之中，这是他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外国人已经到来，此时立刻采取果断的措施要比逻辑而理性地分析这种危险的内涵重要得多。维新时期那些模糊、不断变化且经常互相矛盾的口号特别适合这些革命者，因为他们无须忠于一个目前尚未成型的纲领。

但是，我们不应该就此得出结论，认为所有的勤王志士都是轻率的剑客，脑子里只想着屠杀真正或者幻想中的敌人。许多土佐勤王党的思想确实还很不成熟。当武市问上冈胆治，现在机会这么好，有没有好的建议来解决藩国的财政问题时，上冈的回答也只是在大阪的富人身上想办法。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大阪瞬间就会夷为平地，因此他们最好立刻借给土佐 20 万两银子。上冈接着说道，如果那些富商拒绝这么做，志士就当着他们的面切腹，以表达自己深切的悲哀和诚挚之心。他预计没有商人能够忍受三次以上这样的自杀。

^{*} 在现代的某些特殊高中的学生身上，还保留着志士的穿着和一些风貌。也许那也是早期武士学校的一种基本精神。福泽描述自己在大阪的学习生活时，也充满了这种怀旧味道。当然，近来的极端右翼组织正不遗余力地挖掘志士们生活上的优缺点，这些人养活自己的方式往往也一样地轻松随意。

武市认为这个策略不错，然而其他的志士并不像他们这么关心藩国的财政问题。^[51]而且其他人的方法更好。间崎沧浪认为土佐的统治者应该像长州藩的一样，购买用于贸易的外国船只。藩国应该在横滨设立商会，推销和出售土佐的产品，以此筹措军费。武市赞成创办学校，让年轻的武士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而平井收次郎则和大阪的商人谈判，让更多的土佐商品流入这个贸易中心。^[52]就这样，在耗费了大量的藩国财力后，土佐的狂热者面临弥补藩国财政的问题，而他们采取了吉田东洋之前使用过的一些方法。未来三四年，土佐的新政府将会继续使用这些方法。不过，两者之间还是有巨大的差别：吉田东洋实施这些政策的首先是为了加强藩国的地位，而志士们通常首先考虑更远大的目标。他们关心藩国的不足，只是为了在更广阔的国内舞台上大施拳脚。

极端勤王思潮的衰落

前文所述，勤王主义者在国内政治舞台上的胜利，是长州藩支持下的志士和年轻的宫廷公卿共同合作的结果。他们一起利用对外问题，扭转了京都和江户之间的合作趋势。然而勤王主义者掌权的时间极其短暂。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是志士们做得过头，竟然覬覦宫廷都不太渴望获得的权力。另外，西方的实力证明攘夷并不现实，进而使早期志士的反开化思想失去了成立的根基。此外，在京都和激进主义运动中大出风头的长州引起了岛津久光的暴怒，并导

致了萨摩和幕府在军事上的短暂合作。这些事件直接影响了土佐藩的政策和武市勤王党的命运。

三条、姊小路使团带来了幕府将访问京都的承诺，时间定在1863年的春天。^[53]自从17世纪以来，江户的统治者便从未到过京都。即便家茂带了3000多名随从，但仍然无法掩盖他们处于弱势这一意味。陪同将军一起来的还有松平春岳和一桥庆喜。他们到了京都后发现，宫廷的人事发生了很大的变动。三条和姊小路握有更大的权力，攘夷派的力量大大增强。在京都新一波的恐怖浪潮中，浪人们砍掉了足利将军雕像的头颅，以此表达对其继任者的强烈不满。

当局开始采取措施，处理浪人和志士的暴力问题。在1862年9月继任京都守护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决定利用浪人制服浪人。他并没有让自己的家臣去镇压京都的激进分子或者避免彼此冲突，而是鼓励他们混到里面去，然后把那些人的行动报告给他。之后，他组建了一系列忠于幕府的特别行动队。“新选组”等几个类似组织就这么成立了。他们绝对服从组织的领导，而且经过特别训练，使用和勤王党人一样的恐怖手段来打压他们。^[54]几年之后，坂本便死于这类组织之手。

在幕府和宫廷进行的政治讨论中，幕府首次被委托“像以前一样管理国家”。有趣的是，宫廷以前从未颁发过这种授权，这说明德川幕府的权力和威信亟须合法化。将军参观京都的神社时，宫廷成员在仪式上对他的无礼也同样意味深长。当宫廷打算再次安排将军到神社参拜时，将军和庆喜都以身体不适为由婉拒了。最重要的

是，一桥庆喜不愿接受把 1863 年 6 月 25 日定为攘夷的最后日期。庆喜希望修改或者弱化这个不现实的承诺，但这很快就给了长州独立行动的理由，而江户那些思想守旧的谱代大名也公开指责庆喜的行为令他们忍无可忍。此时松平春岳已经辞去职务，不过他在江户和京都未来的谈判中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萨摩藩的统治者岛津久光对长州藩和浪人在京都为所欲为的情况感到极为愤怒。1863 年春，他再次到京都做短期停留，试图游说自己所理解的公武合体（这个词有许多种解释）计划，但发现宫廷完全处在极端主义者的控制之下。当原定的攘夷日期来临时，长州显示出了攘夷的决心。他们将 6 月 25 日攘夷的承诺理解为开战时间，在未经幕府同意的情况下，炮轰经过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7 月 8 日，年轻的宫廷公卿姊小路公知在京都遇刺身亡。凶手本想将他的同伴三条实美也一并杀死，但是没有成功。此事不确定是萨摩人所为，但长州的勤王党人抓住这种不确定性，驱逐了宫廷卫戍部队中的萨摩人。^[55]接下来，他们建议京都宫廷全权负责对外事务，进一步推行自己的计划。宫廷中的同党推动并获得了一份敕令，宣布天皇授权发动攘夷战争，且自己担任最高指挥官。孝明天皇显然不愿意接受这类责任，但这些事情依旧发生，而且敕令还提出了一个令人担心的请求，即要求萨摩藩的岛津久光恢复京都的秩序。

接下来情况急速扭转，出现了改变勤王党人命运的事件。1863 年 9 月 30 日，会津藩和萨摩藩的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皇宫的城门，并且不准长州藩的军队进入。长州军队在一片混乱之中离开了首都，随行的还有七名公卿。土佐志士的偶像三条实美也

在其中。现在，勤王党人的主要支持者长州藩因为炮击下关海峡的外国人而惹上了麻烦，而且丧失了以获得宫廷最高授意为借口的一切机会。他们喜欢的宫廷公卿也都遭到了流放。那些几个月前看起来很快就可实现的目标，突然之间变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或者不太可能实现了。

长州藩在京都的失势使勤王极端分子的几场起义计划都取消了。没有了后盾，他们现在变得孤注一掷。土佐藩的庄屋吉村寅太郎加入了大和国的“天忠组”（也写作“天诛组”）并成为领导。京都宫廷的同党计划让天皇到奈良的神社参拜，并在此期间发动起义，以示效忠天皇，支持者则在全国各地起义响应，声援京都。起义的主力是一支由 75 人组成的队伍，名义上由与吉村寅太郎及其长州盟友联系密切的年轻公卿中山忠光领导。这群人从京都坐船到堺市，然后上岸来到内陆。他们前往那里的代官所，杀死代官及其四名助手，并割下头颅示众，在旁边附上张贴，宣布这个地区为“天朝直辖地”。为了吸引支持者，起义军宣布将减税 50%，并允许普通民众使用姓氏和佩刀。起义者中来自土佐藩的人数量最多，包括三名下级武士、两名乡士、三名庄屋，另外还有七名无法确定身份的人。大和地区的许多乡士本来和宫廷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下更是响应号召，加入了村里的起义者。据说，最后参加的人数接近两千人。9 月 30 日，京都发生的政变使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天皇到神社参拜的计划取消，长州方面也没有派援军来。临近各藩纷纷听从幕府的指令，派兵镇压起义者。负伤的吉村寅太郎在一家农舍切腹自尽。包括中山忠光在内的一些起义领袖则逃到了长州。^[56]

与大和起义有联系，并打算声援它的是发生在现在神户附近的生野之变。当时，一群狂热主义者打着公卿泽宣嘉（他已于9月份离开宫廷）的旗号，试图建立一处“天朝直辖地”。起义军的实际领袖平野国臣是一名有经验的勤王主义煽动者。他们计划号召生野地区的乡士招募数千名农民兵。当天诛组胜利无望的消息传来时，平野曾试图取消暴动，但是遭到了否决。他们跟大和的起义军一样，占领了一处代官所，随后向附近地区的民众发表声明，其中包含了惯常的指控和承诺。他们宣布本地区为“天朝直辖地”，未来三年的赋税将减半。然而，和中山在大和的行为不一样，幕府的军队从姬路城逼近时，“总帅”泽宣嘉却先逃走了。村民们看到自己的领袖处境艰难，纷纷倒向幕府军队一边。这场起义就这么不光彩地结束了。^[57]

勤王主义者在京都开始了一连串的暴力行动，因为长州人想夺回被萨摩人抢去的朝廷地位。对幕府和会津藩的痛恨被萨摩人的介入掩盖了。1863年底，长州藩给所有的家臣发了一份公告，虽然仍强调忠于幕府，但却指出会津和萨摩才是长州的敌人。1864年2月1日，一艘萨摩藩的船在下关海峡受到攻击。不久，长州人在别府港又烧了一艘萨摩人的船。他们的情绪越发高涨。1864年7月8日，长州志士与土佐志士一起，在京都的池田屋奋起反击突袭的新选组。幕府得到消息说，志士计划进行政变。为了阻止大规模的骚乱，新选组围攻了正在池田屋密谋的志士，结果七名志士被杀，四人受伤，20人被捕。长州藩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将军队从水路调往大阪。分成几股的长州军队毫不费力地进入京都，充分说明幕府已经丧失

了军事上的主动权。在危急和恐怖的时刻，未经幕府许可便将军队开入曾经的禁城，已经不再被自动看成是叛变了。

8月12日，伟大的西化主义者佐久间象山骑着配备西式马鞍和挂饰的马在街上溜达时，被一名熊本藩的仇外者杀害。这件事顿时引爆了京都的紧张气氛。一个星期后，长州藩的军队来到禁门之下，古都变成了战场。在战役的主要发生地蛤御门，双方一度处于胶着状态，但是会津藩、幕府和萨摩藩的军队最终占了上风。许多重要的勤王领袖都被杀死，包括久坂玄瑞。一些支持勤王党的人也死了，例如直木和泉，而一直参加长州军队的中冈慎太郎则受了伤。幕府乘胜追击，并处决了从生野及大和叛乱中抓获的俘虏。

此事发生之后，长期以来暗藏于水户藩的勤王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强烈不满与仇恨终于爆发了。内战以保守派一方获胜而告终，但它严重消耗了水户藩的人力和财力，使其在之后的国内政治舞台上一蹶不振。^[58]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必要描绘一下土佐藩内勤王党人的命运。1862年山内容堂被解除了幽禁，回到了土佐。不管怎么说，容堂的归来将使这群人丧失大部分行动的自由。但是容堂并非完全的自由人，他跟其他大名一样，必须同时考虑自己的家臣和首都的意见。不过，不一样的是，他非常有技巧，每次总是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和立场。容堂完全配得上英国翻译家米特福德对他的评价：“他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智商很高……天生具有那种即便在伟人中也非常罕见的魅力，这足以解释为何他在同辈中的影响力如此之大。”^[59]他在下属中的影响力甚至更大，于是也充分利用这个优势，使自己

得知他们的计划。容堂和松平春岳一样，会花时间倾听浪人和志士的意见，以此来判断国内的“舆论”走向。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听听那些用剑投票的人的意见是一种谨慎的做法。容堂夸奖他们，设酒宴款待他们，并鼓励他们把计划讲给自己听。他非常喜欢喝酒，这使他受到志士们的喜爱。每次聚会散场时，他们对前藩主的敬意总是又加深了一层。^[60]

勤王党人一直都认为容堂站在他们那一方，并且深信不疑。他曾受到批准通商条约的大老的惩罚，因此必然是反对那些条约的。另外，最近他还建议幕府接受三条、姊小路使团的攘夷命令。确实，年轻的藩主丰范已经成为勤王党人活动的有用幌子，最近和长州藩主的女儿结婚也被认为有助于维持土佐藩在勤王事业中的地位。^[61]但是，年轻的丰范还不可能具备容堂那样的领导能力，而土佐的勤王党人希望有一个强大的领导，使他们可以和长州的同党平起平坐。可以肯定的是，直到这时他们都无意废除或者撇开他们的藩主。

因此勤王党人急于让容堂回到京都。经过和宫中的同党协商，1862年秋，宫廷发布命令，要求容堂前往京都。命令下达时，容堂刚刚开始江户再次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他在接受三条、姊小路使团带来的命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可以不必立即上路，而是晚一点再去京都。

与此同时，他不得不处理1862年12月跑到江户来“保护”他的50名乡士和庄屋的问题。容堂很担心下级家臣会做出激烈的行为，因此当听说这些人要来时，便打算在大阪地区把他们拦住。在

他们抵达江户之后，容堂成立一个由 50 名上级武士组成的特别小组，以应付下属的威胁。这个新组织的领导是板垣（当时叫乾）退助。他当时的身份是一名马回，后来则成为维新的英雄，并创立了日本的第一个政党。板垣将自己的拥护者组织起来之后，勤王党人确信以暴制暴的情形一定会出现。^[62]容堂就这样，先是在江户，后来又在京都和高知，利用阶级界限来加强和巩固藩国的政策和计划。板垣本人和他手下的许多人本身是攘夷派，而且越来越支持京都，但他们无法和社会地位比自己低的下属混在一起，共同破坏既定的秩序。再说，板垣能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也是因为受到吉田东洋的提拔。

在制止了 50 名武士的过激行为之后，容堂和其中一些比较负责任的成员有了联系。1863 年初，他让土佐东部来的庄屋中冈慎太郎到松代去，请西学专家佐久间象山到土佐藩任职。中冈和长州激进分子的领袖久坂玄瑞一起前去。他们先到了水户，可能是为了联系那里的志士，然后折向北进入现在的长野县，寻找那位著名的学者。久坂似乎同时带来了一封信，请求佐久间到长州藩任职。不确定容堂是否知道这件事，但这一奇怪的做法可能反映出他是在以邀请函为手段，使自己能对勤王党人的一举一动了然于胸。他可能也认为，与佐久间的联系可能会给中冈上一课。不过，佐久间象山的逻辑和学识似乎令来访者叹服不已，以致他们都没有提到此行的目的。佐久间谈了西方列强、西式武器的先进之处以及西方科学知识的本质。^[63]他提醒说，日本必须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抵挡西方的入侵，两名勤王党人听后无言以对。佐久间曾自学了荷兰语，而且思考过各种各样的科学思想，但同时，他也是一名勤王党，其炽热

的爱国心几乎无人能够质疑，更不用说其朋友吉田松阴的弟子久坂了。久坂和中冈继续赶路，并于1863年2月26日抵达京都。遗憾的是，没有明确的资料显示佐久间的一席话对中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人们很容易赋予这个早期的小插曲以某种含义，认为它使这名年轻的土佐庄屋意识到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64]佐久间对中冈和久坂一生的最后影响是在1864年的夏天。他在京都遇刺身亡，进而引起禁门之变。久坂在长州军队和幕府军队之间的交火中丧生，中冈受伤。

1863年2月，容堂确实到了京都，但目的却是为了支持那些先他而到的人，并陪伴将军游览古都。容堂盛赞新一届幕府的成就，并肯定了松平春岳和一桥庆喜为达成一致协议而做的种种努力。他还与大久保一翁和胜麟太郎这些属于温和派的幕府下级官僚过从甚密。3月10日，他从大阪出发去京都，启程之前给全部土佐武士发布了一道命令，从中可以看出他的立场：

一、至诚之心片时不可忘。

二、接应诸蕃之人，不可为出位之议论。但无益之往来亦可禁止。

三、于洛中（京都）以吾威权恐吓人民，为最可慎之事。^[65]

到达京都之后，容堂与包括岛津久光本人在内的公武合体派领袖进行磋商，希望找到方法，改变勤王派极端分子控制宫廷的局面。^[66]

容堂在京都主要想促成宫廷和幕府之间的和解。他知道松平春岳等人已经提出了若干建议。容堂的设想似乎是希望成立某种大名议会，统一国内的意见。然而他发现，宫廷充斥着那些不愿合作的人，而这些人又受到长州藩和志士意见的影响——直到9月30日，长州藩被逐出宫廷为止。当攘夷的日期确定下来时，容堂意识到自己的计划失败了。5月底，他返回了阔别八年之久的高知。

正当容堂在京都为促成公武合体而努力时，他收到了一封又一封勤王党领袖的陈情书。间崎沧浪、平井收次郎，特别是武市瑞山，不停地向他渲染形势的紧迫性、藩主行动的及时性，以及强硬的勤王主义立场的必要性。这些陈情书无不要求土佐藩政府进行改革，其中最基本的一点便是“任人唯贤”，而不是看门第出身。例如，武市特别希望他的一些出身更高贵的支持者可以担任重要的职位。他和伙伴们明确地预见到，一旦采取了这些措施，自己在藩政府中的影响力将会大大增强。陈情书还提到了土佐统治者面临的“奉安”大业，并继续坚持在“高尚和正义”的基础上成立萨摩—长州—土佐联盟的可能性。从武市的陈情书中可以看出，假如致力于更伟大的责任而不是那些小目标，那么藩政府将更加关心天皇的安危，幕府的命令也将不再重要。依照幕府命令而驻扎在住吉的军队应该前往京都，土佐藩在京都的势力将借此大大增强。那些奢侈而昂贵的风俗习惯应该废除，以使土佐的财力完全用在增强藩国的军备上。藩国不应该花很大力气加强边界，防范外来人口进入或者本国的人逃跑，而是应该更关心全国的边界。如果让外国人进入日本，那么保护土佐边界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些逃跑的浪人能有什么危险呢？

更好的做法是采取一种高尚的勤王立场，并成为浪人们的庇护所，而不是担心他们逃跑。^[67]

在启程去京都之前，容堂回复了这些要求。他将武市的三名手下，间崎沧浪、广濑健太和平井收次郎派往土佐藩政府任职。三人以为等待他们的是可以实施改革计划的重要职位，高高兴兴地前往。他们还随身带着一份从一名高级公卿那里获得的写给前大名丰资的敕令，其中批准了他们的人事改革要求。然而他们失望了。三人回到土佐时，这里依旧处在小八木等保守派的领导之下。勤王党人发现自己不仅没有重新上位，反而离权力中心更远了。

留在京都的志士情况稍微好一些。间崎沧浪在高知灰心丧气地度过了几个月。当他再次回到京都时，发现平井收次郎正被控告非法获得宫廷敕令。两人向容堂承认了错误，并听任容堂发落。尽管形势不妙，武市本人还是继续向容堂灌输他的计划和想法。5月2日，武市被任命为京都土佐公馆的主管。新职位使他无法继续和朋友们会面和密谋。因此，土佐勤王党丧失了行动的自由。^[68]

志士们现在开始意识到他们看错了容堂。平静的首都有再次受到暴力威胁的危险，板垣领导的上级武士非常气愤，甚至打算杀死这50名下级武士以绝后患。武市和板垣之间进行了多次谈话，彼此都知道对方非常认真。他们同时避免了一场火并。^[69]

1863年5月底，容堂决定从京都返回高知。即使到这个时候，土佐勤王党人依旧存有一丝成功的希望。他们自告奋勇地陪容堂前往，希望能对家乡的政策有所影响。颇受容堂赏识的中冈慎太郎甚至被提拔为这次出行的目付。一到高知，勤王主义者便断定藩政府

十有八九会遵守宫廷颁布的攘夷敕令。即便土佐一开始不参战，但是一旦其他藩国开始攘夷战争，土佐将不得不加入。事实证明，他们判断错了。容堂不赞成长州在下关海峡的过激行为，并坚决反对那些想去支援长州的人。^[70]全面的攘夷战争并没有打响。

相反，容堂开始着手调查去年吉田东洋遇刺的案件。志士的嫌疑自然最大。一些人预见到了这一点后就离开土佐，前往京都加入长州的同党。长州的朋友早就建议武市这么做，但被他拒绝了。武市和容堂在高知进行了几次深入的谈话，他继续不屈不挠地请求“任人唯贤”和进行基本的改革。“非常之时则用非常之人才”。藩、国正处于危险之中，形势非常紧急，必须打破旧有的模式，重新建立一套新的制度。^[71]

接下来几个星期，容堂表示赞同武市的观点，然而，结果证明两人对于什么才是“人才”有不同的看法。一旦容堂认为藩国的舆论已经平息，便马上任命了一批新的政府官员。他们大部分都是吉田东洋原来的手下。做完这件事后，容堂准备拿勤王党人开刀了。间崎沧浪、平井收次郎（已经被押送往高知）和广濑健太是最先受到惩罚的三个人。他们的罪名是以不法手段获取颁给前大名丰资的敕令。容堂从询问的那名京都贵族口中听说了此事，7月，三人被勒令切腹。直到最后一刻，这些下级武士都非常在乎自己的阶级地位，并急于显示那无比高洁的品格。他们感激容堂允许他们体面地死去，而不是作为罪犯被处斩。三人热忱地希望平静而高雅地完成这一仪式，使自己的英名永存。这些都使我们感到好奇，并清楚地提醒我们，封建价值观在所有统治阶级的心目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

位。在这种时候，志士们看起来并不像是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而战，反而更像是为了回到古代。^[72]

接着就是 1863 年 9 月 30 日的政变，长州军队和他们的公卿勤王同党不得不离开京都。容堂认为是时候处理土佐勤王党领袖了。勤王派在宫廷已经失势，现在可以对勤王党下手了。他们近年来的暴力活动和反抗已经严重威胁到藩国安全。京都政变三天后，武市和余下的勤王党领袖一并被捕。与此同时，包括中冈慎太郎在内的无数志士逃离了土佐。中冈逃到了长州的三田尻，接下来三年成了长州军事组织中的一名成员。

接下来则是对武市早年的行为进行漫长而又细致的调查。当局无数次想证明他与吉田东洋遇害一案有牵连，但是都没有成功。最终，武市因为在京都的陈情书上伪造年轻藩主的签名而获罪。经过长时间的拖延和调查之后，1865 年夏，武市同样被勒令切腹。^[73]

许多土佐人计划发动一场叛乱，将武市从监狱里解救出来。乡士和庄屋们经过多次讨论之后决定不发动全面起义，以免弄巧成拙，使武市死得更快，毕竟他的性命现在掌握在狱卒手里。但是，1864 年 10 月，土佐东部的 23 名勤王党人还是举行了一场抗议活动表达心中的不满。他们准备了一份宣泄冤屈和不平的声明，并集体到街头示威。这群人预计不会遭到强烈的报复，并计划如有必要则跨过边界逃到安房国。但是他们错了。土佐藩的军队向他们扑来，而边境通行站也不让他们通过。结果，示威者不是在抵抗中被杀就是被捕后遭处斩。^[74]

在 1864 年夏长州进攻京都时受伤的中冈慎太郎，早年曾在土

佐的勤王党人中极力煽动反抗情绪，但是现在在信中变得谨慎起来。他说，现在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只有耐心等待机会，东山再起。^[75]

勤王运动期间，许多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这种牺牲不限信仰，也不限阶级地位，其中就包括武市瑞山和吉田东洋这两个德川幕府时期土佐最强有力的人物。然而暴力行为并非一无是处。一些年轻的极端主义者逐渐意识到无组织和准备欠周的暴动的愚蠢之处，此后将成为更优秀的政治家。而在长州和萨摩炮轰外国舰艇的事件中，他们对外国人的武器也有了较为正常而合理的尊重。事实上，从此以后，不管一些人多么热忱，攘夷主要的作用只是作为谴责幕府的一个理由。

千万不要因为这些志士和浪人的鲁莽行为，便武断地认为日本的法律和秩序已经完全崩溃。京都出现叛乱的原因可能只是因为长州的军事实力使幕府的管制措施一时失效而已。个人的英雄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可能起到恐吓作用，但是却无法否定那些手中握着传统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掌权者。每一个走上反叛道路并成为浪人的家臣后面，都有好几个像武市、间崎和平井这样拒绝离开藩国的人。他们明知会受到惩罚，甚至有可能送命，但依然毫不畏惧。就像长井雅乐一样，武市平静地接受了切腹，证明了传统价值观和约束力的力量。

这种传统的忠君和顺从思想，被山内容堂熟练地玩弄于股掌之间。正是这种思想使土佐有可能重新回到吉田东洋原先确定的路线上。容堂的个人能力和威望，以及手下人对他的尊敬之情，成为未来几年的一个关键因素。



田中光显

然而，武士阶层内部的激烈冲突同样引人注目。在土佐藩的政治舞台上，勤王派和保守派的态度均带有明显的阶级烙印，因此后来有人把土佐的维新运动形容为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我们可以从佐佐木高行和田中光显的回忆录中找到大量的证据证明这一观点。1864年，上级武士和下级勤王主义者之间的敌对情绪已经非常尖锐，很容易就爆发冲突。只有当勤王党人被镇压之后，像板垣退助这样的上级武士才有可能赞同勤王和攘夷的观点。

比乡士和下级武士的愤怒更值得注意的，可能是那些控制乡村的人——庄屋、村领导、乡士——和那些在城里制定政策的人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土佐藩乡村的勤王势力，似乎与不满吉田东洋改革带来的中央集权政策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在高知附近的其他地方，勤王党人发动起义的前提条件是村领导和乡士必须具有招募和影响

各自邻居和农民的能力。但其实，失败和危险证明了这种影响力非常有限，而且很容易消耗殆尽。尽管以这些个别事件便推导出国内危机全面爆发有些过于武断，然而许多作者正是这么做的。不过有一点毫无疑问，即日本几大重要的阶级关系领域内存在着严重的不满和不安感，随之产生的不稳定性与其他国家在革命变革期间的特点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关于避免天皇忧心的讨论正是在这种不安定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而这正是这场外交危机令封建统治者如此头疼和忧心忡忡的原因。

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勤王运动期间的政治斗争和暴力行为时，将不可避免地犯下一个错误，即夸大勤王志士与同辈们在思想上的分歧程度。除了极少数煽动者外，志士们一点也不准备质疑或者排斥当时社会的基本特征。在此不妨提醒一下我们自己，所有团体之间都有着巨大的一致性。当志士上位时，他们变得越来越喜欢使用吉田东洋一派（已经死于他们手下）的想法和策略，而包括佐佐木在内的上级武士后来回忆说，他们之前之所以无法完全接受勤王主义，是因为这样看起来像是和下级武士混在一起。我们所说的“勤王主义者”的立场——对外国人决不妥协，并坚决认为天皇的权力最大——尚未确定下来，它将随着经验和责任的变化而改变。在一份获得广泛支持的计划出台之前，需要决策者具有灵活而老练的眼光。为了追溯事情发生的来龙去脉，我们有必要在下一章讲讲坂本龙马的活动经过。

第四章 跟随胜海舟

德川时代末期最令人惊叹的事情之一，是有无数安分守己且思想忠诚的年轻人大胆地认为自己比长辈们知道得更多，并勇敢地闯出一条新路。他们这么做时，通常是将抱负和理想结合在一起，认为将自己一直以来接受的责任模式一拳打碎非常合理，因为他们对国家和天皇有更高的义务。许多作者公正地指出，志士愿意为这种新发现的宏大目标牺牲自己的地位和生命，然而这种甘愿牺牲一切的精神，需要有获得名望和权力的愿望相佐才值得。1862年4月离开土佐后的坂本龙马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由于对藩国当局的保守政策不耐烦，他与武馆内一帮急于为自己和国家干一番事业的人交上了朋友。当发现无法对土佐藩政府施加影响时，坂本和许多人一样，逃离了自己的家乡和藩国，以便在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

接下来几个月显示出坂本和同伴们对日本面临的复杂问题知之甚少。一开始，他在按照剑客的简单逻辑分析之后，认为政策分歧的源头在于高层的胆小或者破坏行为，因此决定直接行动，认为礼貌的要求失败之后，暗杀和恐怖行动也许可以取得成功。然而，当

意识到自己错了之后，坂本不仅愿意重新审视自己的指控和威吓，甚至同意接受一个他本来计划要杀害的人的调遣，为他服务。这种从敌人到信徒的转变根源于日本的封建行为模式，不过在坂本的例子中，日益的老练和成熟使他完全有可能为自己早年简单而激进的思想找一个更好的替代品，进而在该思想的指引下更有可能地实现天皇的统治。尽管如此，新的立场并不需要坂本付出个人名声和地位的代价。实际上，他憧憬着可以认识各种各样令人兴奋的人，而这在使他相信自己的新计划仍有明智方面，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无论坂本的野心和理想有多少，他在选择自己的刀下之鬼时无疑非常幸运。胜麟太郎是一个有独特经验和教育经历的人，对当时的国内问题有深刻的洞察。他在德川幕府的管理层中有大量的朋友和支持者。而且，他的人格和见解，尤其是对坂本的成见和偏好有特殊的吸引力。因此，要研究坂本思想上的转变，就必须先了解一下这个接下来两年半时间里成为他的导师的人。

胜麟太郎

1823年胜出生于江户，其父是一名贫贱的德川家臣。幸运的是，他后来过继给了伯父，地位和前途均大大得到改善。他早年的艰苦生活表明，即便是旗本，经济状况也可能很糟糕。^[1]胜少年时代便刻苦学习剑术。他可能比大部分官员更能理解自己后来那些弟子的感受，因为他们大多也毕业于剑术学校。胜的剑术老师鼓励他进行

禅修。禅修非常重视精神和身体上的灵敏性，他后来几次幸运地躲过刺杀就是得益于此。^[2]

到此为止，胜的背景和许多同时代人并没有多少区别。但是，十五六岁时——天保时代末期——他开始学习兰学。由于态度勤勉认真，胜被引荐给了福冈藩藩主黑田长溥，并得到提拔。^{*}胜受到资助前往江户学习，住在江户的福冈公馆里，经济上没有后顾之忧，因此学习突飞猛进。这段经历使他开阔了眼界，以后眼里不再只有德川家族。

1850年，胜已经成为一名著名的兰学者。他开办了自己的兰学馆，并与当时主要的兰学者交往甚密。例如，因为发表小册子抨击幕府当局对“马礼逊”号一事的处理而躲起来的高野长英就曾找过胜，求他帮忙。高野强烈主张必须加强海防，他的观点可能影响了胜自己的立场。^[3]

佩里的到来及其产生的问题，使幕府对其西方专家的看法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前面已经说过，胜是幕府向各界征求意见时咨询的兰学者之一。邀请他发表意见的是官员大久保一翁，这个人后来对胜和坂本都非常重要。胜以一封陈情书作答，其中激烈批评日本的国防已经过时。他极力主张培养一批能干的翻译家和外国事务专家，同时训练一批军事人才。这份文件使幕府决心创设蕃书调所，以便

* 多亏了过继制度，统治阶级上层才得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名福冈藩主是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哥哥。岛津齐彬思想进步，曾大力支持鹿儿岛的西学研究。福冈藩主和肥前藩（佐贺藩）的锅岛家族一起负责长崎的防务，这一工作使其家臣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兰学。胜就这样顺利地得到了资助。

筹备、监督和传播西学。胜还提交了一份海防报告，详细论述制造军舰的必要性。他提出了一个“以商养船”的造船计划，第一步是购买外国船只，并学习驾驶和操作。他承认一开始会有困难，因为日本人的经验不足，但是日本民族的精神和智慧不久就会弥补这些空白。胜在阐述西式学校、西式武器以及制造玻璃、弹药和钢铁等产品时想法详尽，充分显示出西方对他的影响并非一朝一夕。在他看来，这场危机的价值主要在于，使那些本来可能被视为颠覆而危险的观点变得合法且富有爱国热情。

大家一致认为，胜现在是对日本安全起着关键作用的专家。他正式出仕，并在蕃书调所的筹备委员会任职。这种职务使他接触到了思想最进步和最开明的幕府官员。他还跟随大久保一翁巡视了大阪和纪伊沿岸的海防状况。

最重要的是，胜等人被派到长崎学习海军知识，由爪哇来的一队荷兰军官和士兵担任老师。1855年胜离开江户，来到长崎，接下来的几年都在那里度过。他后来写道：“当时学的海军知识和现在的毫无差别。我们学习驾驶、运输、机械和算术等六门课。当然也学习天文。而且，所有科目都用荷兰语上，对于我这样学过兰学的人还好，但是很多人只倚赖汉字，实在有些辛苦。”^[4]

学业结束后，胜并没有随第一批学生回去，而是留了下来，并毫无疑问地成为第二批学生中的佼佼者。他自己写道，他曾协助老师训练第二批学生，而荷兰人的报告中也说他曾于1858年或者1859年初指挥一艘船驶往江户。^[5]

胜在描写自己那段长崎时光时，说自己曾与外国人聊天，听他

们讲一些国际关系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情况。在江户求学时，胜就总是看不起藩国之间的壁垒。他肯定注意到各藩派来向荷兰人学习海军知识的代表均非常优秀。胜和大多数国人一样，强烈反对幕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当听说条约的事情之后，他写道：“闻此事不堪愤慨，奈何身贱，见事不明，独叹息不止。”^[6]

1859年初胜回到江户。现在掌权的是大老井伊。他已经开始惩罚京都的公卿和水户藩的支持者，现在正考虑缓和长崎等边远地区的不满情绪。1859年3月，长崎的海军传习所被勒令关闭。不久，幕府的学生便都被悉数召回。^[7]胜在江户沮丧地发现，井伊的政策导致以前的朋友都不敢和他交谈了。此时和井伊下台后，他都为德川幕府统治下官员的人心惶惶感到痛心。

胜返回江户的原因是他想参加第一批遣美使节团。因为风险太大，幕府反对派日本船只去，但他成功说服当局同意使团成员乘坐美国轮船“波瓦坦”号，而自己则驾驶“咸临丸”跟在后面。对于这艘为沿海航行而设计的小船来说，横跨太平洋需要娴熟的驾驶技术和巨大的勇气。使团成员福泽谕吉后来在描写这段37天的航程时自豪地写道：“看看现在的朝鲜人、中国人以及东方各国人，不论在事业上还是在勇气上讲，绝没有靠五年航海经验就想横跨太平洋的。”^[8]不过福泽对胜的表现却评价甚低。他写道，胜是最怯懦的一个，老是待在自己的船舱里，只有船靠岸时才会出现。

包括福泽在内的使团成员继续前往华盛顿，在此期间，胜和“咸临丸”则留在旧金山湾。对胜来说，在加利福尼亚待的这段时间充分显示了西方文明的强大。他记录了大量自己在那里看到的海

军装备、船只和武器，并急着了解组建海军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各种问题。他还参观了三藩市周围的矿井和工业区，并认真详细地做了笔记。这显示出他勤勉的态度，以及想要抓住这次机会的急切心情。^[9]对胜和福泽来说，这次美国之行使他们有机会亲眼见识西方，从而为加快日本的改革进程提供了许多新的证据。两百年前，德川家族的统治者认为只有闭关锁国，他们的政治制度才能永远存续下去。现在闭关锁国政策已经灰飞烟灭，日本向西方派出的第一批使节意识到，封建制度本身也需要修改。修改的方向和尺度仍有许多商讨的余地，但是使节们发现，他们的同胞和上级并不打算认真听取他们带回来的意见。

胜回到日本后发现，大老井伊已经被暗杀了。在幕府新的统治者上台之前，国内政策的变化暂时停止了。胜感到既泄气又不安，有一阵子又回到以前默默无闻的状态。他将自己的感受写进了一本小册子里，这本《墙棘之记》写于1860年冬至1861年，既是历史又是政论，直到很多年后才出版。胜写道，即使没有外国人施压，日本的政治制度也早就该改了。他发现社会道德水准滑落，浪费公帑严重，贿赂横行，而政府却不愿听取那些对此感到震惊的人的意见。他认为，这些大部分都是亚洲普遍存在的现象，而不是日本独有。科技的停滞不前和道德败坏的现象随处可见。他将此与刚刚在美国看到的情况对比，那里的人们正尽一切努力掌握新的科学技术和方法。中国的鸦片战争已经证明，西方的科技远比亚洲的优越。胜接着提出了全面开放日本的必要性。他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赞同夷人或者贬低日本自己的传统，而是因为这是让国家强大同时又避免发

生颜面尽失的灾难性战争的唯一方式。于是，胜的学识和经历开始结合，形成一套具有建设性的综合理论，日本也许可以由此保持独立和完整。他根本不是什么“亲夷派”，但也不再是只意识到传统的优越性的狂热分子。^[10]

井伊直弼遇刺之后，幕府犹豫了一段时期，然后再次开始了科技现代化和政治改革的进程，胜的举荐人和朋友再次成为显贵。1861年5月，胜等人被派去学习军制。他自己研究的领域是海军。他们在提交的学习报告中一再坚持必须将各藩国刚刚萌芽的现代海军力量集中起来。从此时开始，胜被认为是海军方面的专家。1862年夏，他作为新式海军的代表成为幕阁成员，1864年他被任命为海军长官“军舰奉行”。在这个职位，他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倡导的一些路线行动。胜主张的国内海军应该统一的理念仍然无法实施，但他一有机会便利用那些与自己有类似想法的人的热情和爱国热忱，而不去管他们的地位或者出身。

胜的见解和经历，使他有可能看到志士身上具有某种权贵所没有的东西。反过来，他自己在剑术和禅学上的修炼，以及毫不掩饰的对日本精神和生活方式显著特点的欣赏，使他能被当时那些盲目爱国的年轻人接受。胜知道自己的能力，并为自己日益重要的地位感到自豪。他精神抖擞的样子赢得了年轻武士的崇拜和信任，因为勇气和活力是他们评价同时代人的标准。

胜之所以能取得年轻武士的信任，主要在于他成功地使他们相信自己并非亲夷派。他诚恳地告诉志士，虽然自己认为日本必须开放，但一刻也不认为这合乎理想，也不认为它能长久。他认为，通

过与亚洲其他国家联合，日本也许还有可能打败外国人，与日本合作，对朝鲜和中国百利而无一弊。如果各藩合力抗夷的道理讲得通，那么亚洲各国通力合作抵抗西方人的道理同样讲得通。日本可以利用国土的被迫开放发展贸易，加强经济实力，而在经济实力增强后，反过来又可以加强军事实力。这样，有朝一日，日本将无须再向西方屈服。通过这类辩辞，胜成功地使许多维新领袖相信，自己和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事实上，日本的现代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他推崇备至，称他为 20 世纪日本国土扩张的先驱者。^[11]

坂本和胜

1862 年 4 月 22 日，坂本逃离了家乡和藩国。上文已经写到，他对武市瑞山无法在土佐获得提升感到不耐烦。长州藩和萨摩藩的极端主义者正在准备雄心勃勃的计划，他也担心土佐不参加的话将会彻底输掉。最后促使坂本下定决心的是泽村惣之丞，泽村之前已经和吉村寅太郎一起逃离了土佐。他偷偷溜回来汇报说，京都那边正在准备起义，萨摩的摄政岛津久光打算提供一支军队支援浪人。武市听到这个消息后无动于衷，于是坂本决定和泽村一起逃跑。

坂本之前和身为家主的哥哥权平讨论过自己的计划，权平强烈地反对。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坂本。他从亲戚那里借了些钱，姐姐乙女也悄悄地将一把家传的刀塞给他。

两名逃亡者先是到了长州的下关，住在商人白石正一郎的家里。

白石支持勤王党，为其提供经费，他的家经常成为流亡志士集会的地点。他们以为可以在那里找到吉村寅太郎，结果发现他已经去了首都，加入即将举行的壮举去了。接着，消息传来，岛津不仅没有支援起义，反而于5月21日袭击了伏见寺田屋的浪人指挥部，镇压了起义者。这时已经没有必要匆匆忙忙赶去了。坂本在九州游历了一番，大约两个月后才去到大阪。^[12]

坂本在高知的朋友知道他的行动，预料到他会积极地投身政治风潮。一些人则认为他的行为鲁莽而不负责任。勤王党人平井收次郎的姐姐在京都的三条家帮佣，他给姐姐写信，警告她不要听信坂本讲的任何计划。“坂本龙马廿四日夜逃亡，应去汝处。龙马出国前，屡屡相谈其事。然不论龙马如何谈论，决不可答应。今汝在该家，继父母之愿，不可为他人所遣。坂本虽为人物，然不读书，时有错误之行为，汝当好好留意于心。但求汝不失报恩之节，不欠忠孝之道。”^[13]

然而坂本并不打算长时间待在京都。不久土佐的朋友就告诉他成功刺杀吉田东洋的事。政府的反勤王手段完全有可能将他逮捕后审讯，并给予惩罚。因此坂本决定继续前行，到江户去，并于1862年夏末到达。那时，他的土佐勤王党朋友正在分享暗杀吉田东洋带来的种种好处。这群人主宰了京都的政坛，三条、姊小路出使江户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我们将会记得，使团抵达德川家族的江户城的时间是12月中旬。

我们无法准确地描绘坂本在这座都城内的活动。当得知藩政府并没有用力追捕刺杀吉田东洋的凶手时，他肯定松了一口气。毫无

疑问，他与那些成功在藩政府任职的勤王党人有联系，而且大家都知道他与自己原来的剑术老师千叶重新取得了联系，可能还得到了千叶的庇护，住在千叶家里。

没有迹象表明坂本最初的激烈的攘夷情绪有任何改变。他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念离开了家乡和藩国，在得知无缘参加 1862 年夏惨遭岛津军队镇压的浪人起义时，心里肯定感到非常懊恼。坂本以半逃亡者的身份在正派的武士团体中生活了大约八个月，之后肯定急于做出一番惊人的功绩，以此扬名立万，成为大名鼎鼎的勤王英雄。长州和土佐的勤王志士加入后，京都掀起了新一轮的暴力浪潮，这很可能影响到了坂本。也可能是有着许多土佐勤王党的三条、姊小路使团抵达江户，使坂本决心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

无论如何，胜是坂本选中的暗杀目标。胜大力鼓吹开国，引起了志士们的注意。不难想象，坂本肯定罗列了打算暗杀的这个人的罪行。西学者、跟长崎的荷兰人学习过、曾因井伊直弼签订的条约生效而随使团访美、影响力日增而越来越有机会实现他的开国观点——这个人当然是绝佳的目标。不少罪状没他多的人都已经被暗杀了。

坂本打算 1862 年 12 月动手。他决定通过土佐藩前藩主山内容堂的朋友、福井（越前）藩前藩主松平春岳找到胜。春岳已经摆脱了井伊直弼的处罚，成为幕府新政府的政事总裁。他和容堂一样，在志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春岳继续让那些勤王党信任的人留在自己身边，而且经常讨他们欢心，倾听他们的意见，以此来试探这群反复无常的人的看法。即便如此，孤单一人的坂本能够神态自若地

出现在日本最重要的政治领袖面前，还是令人感到震惊。

后来，春岳写信把当时的情况告诉了勤王党人土方。土方活到了维新之后，并成了一名政府高官。春岳回忆说，他当时正准备离开将军的居城，突然有两名武士闯进来要求接见。春岳让他们去找自己的助手，^[14]但后来又让他们回来并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这两个人就是坂本龙马和冈本健三郎。^[15]春岳写道，他们俩“吐露热望勤王攘夷之厚志。受其他恳笃之忠告，不堪感佩。两士上京，乃信胜安芳、横井平四郎^[16]二人为暴论妨碍政事之舆论”。春岳同意将他们介绍给胜和横井，并看着他们离开。两个人径直去了胜家里。胜事先已经得到警告，因为“两士一进屋，胜大声说道：‘你们是来杀我的吗？如果是，那就等辩论之后吧。’两士大惊丧胆”。春岳接着写道，“两士面会胜，听胜谈话，感佩心服胜之志向”。两人对胜的感情从恨转为爱。其后，当有新谣言说胜可能会被刺杀时，坂本和冈本悄悄地在胜家周围巡逻，担任警卫，保证他的安全。^[17]

春岳的描述有很多疑点。要杀一个人，通常不会正儿八经地去拿到介绍信再去行动，除非胜身边的警卫比春岳还多，否则这一行为很难解释得通。而且，春岳显然已经使胜提高了警惕。春岳肯定已经向两名浪人说过，他们打算暗杀的这个人具有无穷的魅力，因此坂本显然对胜即将对自己说的一番话有所准备。然而胜本人却以为他们会动武。根据他的说法，“（坂本）语余曰：‘今宵之事，窃有所期，乃依公之说如何，以定刺公与否。今听公之说，大耻余之固陋，自此请为公之门下生。’”^[18]

胜说了什么，使坂本如此敬佩不已？我们无法还原他们谈话的

细节，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是胜的爱国精神和对西方人要求的不满使两名杀手停下了手中的刀。然后，开国可以增强国力、创造性地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将使国家变得强大的想法，肯定使坂本意识到自己的“固陋”是多么不合时宜。

尽管我们手头没有胜与坂本谈话的资料，但可以看到几个月后他与长州勤王党人木户孝允是如何探论的。这时的内容与他向坂本说的话想必大同小异。1863年6月的一篇对我们颇有启发的日记展示他如何向木户和一个朋友分析日本担任亚洲首领的可能性。“论朝鲜之事。依我之见，当今亚细亚洲中，无可抵抗欧罗巴人者，此皆规模狭小，不及彼远大之策之故。今自我邦出船舰，广说亚细亚各国之主，合纵连横，共筑海军盛大，互通有无。如不研究学术，难遁彼之蹂躏。先自邻国朝鲜说此，后及中国。同人悉同意。”^[19]

坂本现在找到了一个自己信服的领导。他的变化之快，乍看之下，似乎是因为善变或肤浅，或者最初的信念就不够坚定。但是，我们将此归咎于他此前经历和思考的局限性可能会更正确一点。坂本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志士一样，经历和见解都受到惯有模式的严格限制。他们的主要经历都是学习剑术这种不太需要思考的运动。看到社会和国家出了问题时，坂本的反应激烈而极端。早期攘夷的狂热和恐惧变成了混乱且不理性的冲动，加入土佐勤王党又使他开始了令人激动不已的阴谋策划。这些早期的活动并不需要理智的思考。不过，坂本很快就接受了一份具体而理性的计划，因为他还从未进行过如此高水平的思考。结果，他欣然认识到，加强国力和攘夷的最佳方式就是利用夷人的科技和制度。没有人比机智的胜更适合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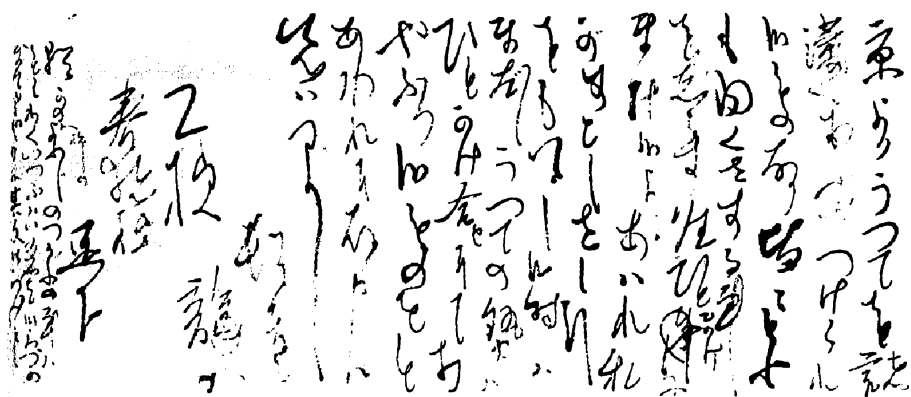
坂本证明这一点。

另外，追随胜并不意味着必须和老朋友断绝联系。我们接下来将会看到，胜的计划需要许多热情的年轻人帮忙，而坂本则是一名可以胜任的招聘官。而且，与胜相熟的松平春岳继续和山内容堂走得很近，而容堂仍然是土佐勤王党的希望所在，即便是错误的。因此，坂本可能认为自己是在帮助土佐的朋友。1863 年底，坂本带了几名勤王党的朋友去拜访松平春岳。一个月后，他与新导师胜一起启程，前往大阪地区。

山内容堂知道胜，而胜则为了坂本在第一时间向容堂求情。1863 年 3 月初，胜和春岳一起坐船去京都，为将军的到访做准备。容堂也最终决定遵守京都方面的要求到首都去，两人的船同时停泊在下田港。容堂邀请春岳和胜到他的船上来。三个人愉快地谈了很久，期间胜提到了“坂本龙马以下八九名，现在在我们下潜匿。彼等原无恶意，愿以宽典处之”。容堂喝酒时通常心情很好，一口答应将不追究坂本逃离藩国的行为。胜担心容堂是酒后戏言，以后会反悔，于是要求他写一份正式的赦免书。4 月 19 日，土佐政府正式赦免了坂本。^[20]

坂本知道自己找到了奋斗目标和领袖，他的喜悦之情可以从几个月后写给姐姐乙女的一封信中看出来。信的笔调非常愉快：

我必须说，人的命运真是不能掌控。有运气差的人，从浴盆里出来，结果撞到睾丸死掉。如果和这种人相比，我的运气真是好，几次都死里逃生。我真的以为自己会死，但是结果却



写给姐姐乙女的信

又活了下来。现在，我成为日本第一人物胜麟太郎的弟子，每天都可以做梦寐以求的事情。因此，到四十岁我都不想从这里回家。我和哥哥也这样说了，他很开心，同意我的做法。我将为藩国和天下奉献我的力量。^[21]

胜对这名皈依者的热情同样显而易见。在后来写的《海军历史》一书中，他写道：“幸土佐人士坂本龙马入我塾，大可此举，鼓舞激徒。”^[22]

神户海军操练所

1863 年春，政府在现在神户附近的海滨村落兵库，建造了一所新的海军训练学校和造船厂，这就是胜需要用到坂本精力和热情的

项目。学校是该年4月21日至7月31日将军家茂访问京都的产物。那年春天，胜去了京都（其间他成功使坂本得到了容堂的谅解）为将军之行做准备。他充分利用家茂到京都地区的机会，向他展示那一段濑户内海在防守上的不足。^[23]随后他又上书，指出大阪和堺市不堪一击，以及大阪地区极度缺乏造船厂和船舶修理厂。他的敦促有了结果。1863年5月11日，政府下令在兵庫建立一所海军训练学校和造船厂。早先在长崎设立的机构将转移到新址，而胜则获得委派，负责这个项目。^[24]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胜需要坂本这样的人做助手。幕府的金库几乎已经告罄，显然需要把各藩召集起来，让他们掏钱并整合他们的海军力量。这两个机构所需的人员将从大阪地区的德川家臣中挑选，不够的话再从其他藩国招募。现在需要谈判，才能让各藩捐献幕府已经无力强制要求的金钱。为新的海军基地招募各级人员的工作同样非常紧迫。胜遵循的方针显示出他无私的立场，他希望全国上下同心协力，而不仅仅是建立一个以幕府为中心的机构。对于自己手下的人，他很少问及对方的出身或者地位。幕府的那些保守派对他很不放心，1864年11月，他们以窝藏浪人的罪名将他革职了。

但是，直到那时为止，坂本都是胜助手的不二人选。作为一名受志士信任的勤王党，他能够招募到一些像他一样志向高远而出身低微的人。此外，他对新导师忠贞不贰，再加上诚意和才干，使其成为代表胜前往各藩谈判的理想人选。

对坂本的成长更加重要的是，胜的任务使他得以接触到德川幕府中最为开明的一批高官。实际上，他正是从这些人那里第一次听

说，将军可以将权力和平地移交给天皇。

1863年3月初，坂本与一些他刚刚被胜招募的土佐朋友一起，会见了胜的朋友和介绍人大久保一翁。大久保是蕃书调所的头取*，同时又担任外国奉行，因此有大量的机会接触西学。他从自己了解到的西方政府体制知识中产生了一个想法，即为了国家的团结，将军辞去自己的特权和职务，只保留在骏河国、远江国和三河国的领地。这是一个有效做法。有了这些领地，将军依旧是真正代表国民的新政府中的重要一员。在大久保对政府构成的设想中，主要藩主组成一个议会，每五年在大阪或者京都开一次会；较小的藩主组成一个常驻江户的议会。这个粗糙的两院制设想当然是现代日本议会制思想的最初形式，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它产生于幕府的机构。最近的研究显示，这个思想是大久保传给松平春岳和胜的。^[25]沿着这条线，坂本龙马也受到了这种思路的影响。3月7日，坂本写道，他听说胜在江户的大广间亲自提议将军辞去职位和头衔，令在场的保守派惊恐万分。因此很明显，五年后为促成权力和平交接而做出巨大贡献的坂本，首次听说这些可能性时就是在胜手下做事的时候。^[26]

胜派给他的任务越来越重要，坂本对新生活的热情也随之日渐高涨。6月，姊小路等宫廷贵族给予仍在京都的将军巨大压力，要求他采取彻底攘夷的立场。于是胜让坂本给年轻的姊小路带去几篇自己写的有关海防的文章，同时还有荷兰人写的一篇介绍塞瓦斯托

* 即行政官员的意思。——译注

波尔^{*}的文章的翻译。坂本的朋友武市和间崎曾与这名年轻公卿亲密合作过，因此可以想象他是信使的最佳人选。姊小路愉快地收下了这些资料。然而没过不久，这名年轻的贵族遭暗杀身亡，胜的努力也付之东流。^[27]不过，我们仍然不难想象坂本在接到这类重要任务时的激动心情。

勤王党人的狂热和危害不可能对胜手下那些志士没有影响。胜的日记记录了当周围气氛日趋骚动时，他的一些土佐手下如何坐立不安起来：“昨夜，被害有五六人。我门下土佐之藩士田所岛太郎来，言其同志忠志未达，愤激异常。云同志会三百人，有奉书之密议。”^[28]但是坂本继续从自己的浪人同伙，尤其是那些来自土佐的人中招募胜的支持者。土佐人至少有一次帮胜杀掉了尾随的刺客，救了他一命。^[29]与胜共事的这段经历使坂本感到既骄傲又兴奋，而对胜来说，土佐勤王党为他提供了亟须的帮助，甚至保卫了他的安全。

1863年6月，胜派给坂本的任务越来越重要而艰巨。神户海军操练所的资金将会来源于大名的捐献，但是极少有大名同意筹款的要求。胜自然将目光首先投向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已经回到了福井藩的松平春岳。7月1日，胜派坂本到福井去。这是坂本那年夏天两次出行中的第一次。多亏了这些任务，坂本才有机会接触到日本最有才华的年轻封建官员。其中之一便是春岳的天才顾问横井小

* 塞瓦斯托波尔 (Sevastopol)，克里米亚半岛的著名港口，是俄罗斯通黑海的门户和黑海舰队的基地。——译注

楠。半年前坂本第一次见到横井时，曾经想刺杀他。他们一起讨论过无数次国内的问题，坂本也给福井藩士留下了酒徒和享乐主义者的印象。在这种把酒言欢的过程中，他结识了春岳的另外一名杰出家臣由利公正（当时叫作三冈八郎）。坂本可能跟这些人讨论过他所听说的将军退位的提议，因为横井本人非常欢迎这种和平的解决方法。不管怎么说，这些闲聊拉近了坂本与未来的重要人物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开阔了视野，使他明白国内政治有多种可能的解决方法。他还为胜筹集到了 5000 两银子的经费。^[30]

接下来几个月，胜越来越信任和欣赏坂本。1863 年 12 月初，他去江户时带上了坂本，月底坂本被任命为兵庫海军操练所的校长。他们在江户短暂停留期间，土佐藩政府试图让坂本回去继续为藩国服务。胜给江户的土佐公馆的信中清晰显示，土佐藩曾提出要这个人，而他并没有选择回去。胜在信中解释说，坂本和他一起正在从事一些非常重要的工作，他到江户去实际上是出于神户海军操练所校长的工作需要。胜提醒目付，自己已经与容堂本人讨论过坂本的身份问题，希望以后不会再有任何麻烦。^[31]然而不论胜如何努力，土佐藩还是坚持要坂本回去。当坂本拒不服从时，他又一次被列为浪人。

坂本作为胜的助手，在兵庫的海军学校工作了大约 18 个月。这一时期是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他身上保留了大量剑客的尚武精神，效忠天皇的誓言依然在他的耳边回响。但除此之外，他也获得了由于交往扩大而带来的全新政治观，以及胜和大久保那种更加老练的处世方式。

坂本写给乙女的许多信中均透露出他如何看待自己扮演的新角色，我们很难怀疑野心和英雄气概对他的个性所起的作用。他在向她介绍自己的新职位时是这么说的：

最近，我成了天下无二的军学者胜麟太郎的门人。他可不是寻常的人，而是一位先驱。不久，我们将会距离大阪十多里远的兵库建立一所大型的海军训练学校，还要在那里建造六十或者一百米长的大船。我们已经招募了四五百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我将和高松太郎*他们一起在这所海军所学习，不时也学习如何驾驶船。不久我们将驾驶训练的蒸汽船到土佐去。到时候等着瞧吧！……

全信都洋溢着坂本的志得意满，他甚至也为此感到难为情。“我看起来似乎有点狂妄了†，但这是在私下里。在外人面前我还是相当严肃的。”^[32]

责任越大，成就感也越大，1863年8月，坂本在给姐姐写信时已经不那么小心翼翼了。这时他写的一封长信详细描绘了他此时的状况，因此我们全文照录。

* 高松太郎是坂本姐姐高松千鹤的儿子。在坂本的说服下，他也来到神户海军操练所学习。——译注

† an “Ahem!” look. Ahem (エヘン) 是“呃哼”的意思，坂本似乎是开玩笑，表达他适度的自大情绪。

写给姐姐乙女的信,可以看到“日本(ニッポン)を今一度せんたく”(肃清日本)的字眼。

这封信极其重要,绝对不要给任何人看,也不要跟任何人说。我不记得是六月廿日还是哪一天给你写过信。昨天我从杉那里收到了你的信,真是太谢谢了。

目前我一切均非常顺利。其中一个大藩真的让我参与他们的秘密计划。假如现在情况不妙,我还有两三百个人可以用。说到钱,我至少还有十几二十两银子。这样一来,我就放心了。但是糟糕的是,上个月长州六次炮轰外国船,挑起了战争。这对日本一点好处也没有,我一点也不喜欢他们的做法。那些被长州打中的船只现在正在江户修理,一旦修好,它们会直接掉头去打长州。这都是因为江户的奸吏内通夷人。不过,尽管那些奸吏手握重权,一旦我们与两三位大名约好,招募同志,他们将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国家。到时候就看我们的啦。我和江户的同志(旗本、大名等等)联手,扫清奸吏。肃清日本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现在,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藩国完全同意我的看

法，而且他们的代表把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我。但是我仍未收到任何任命。我们国家没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真是令人感到羞耻。

从我昨天收到的信来看，你打算到深山做尼姑（哈哈，呃哼）真是有趣的想法，不过你以前就有这种念头。近来事情过于紧张忙乱，但是如果你完成之后，穿上一件褪色的旧袈裟，并开始游历四方，可能也不会太麻烦。你可以从长崎走到北海道的松前而不用花一文银子。但是，如果你真的打算这么做，你将不得不先念真言经、大藏经、一向经和阿弥陀经。这些都是韵文，相当难懂。不仅如此，这里还有许多门徒宗*的信徒，你将不得不跟他们一样，因此你最好还是继续干下去。这真的非常有趣。你看，如果你去真言宗的寺庙当一名真言宗的尼姑，那你将不得不念真言经；如果那是一座一向宗寺庙，那你将不得不念一向经（你在每个停留的地方都应该念经并宣扬佛法，就跟亲鸾圣人一样。这会非常有趣）。假如，你去到的地方是城市，你将念啊念啊，从早到晚不停地念经，然后你会得到许多布施。因此一定要念经。这真是太有意思了。归根结底，现世并不重要。所以我们就倾尽所有地试一试吧！你死后，留下的将会是一颗颗舍利（天哪，天哪！）。

但是你知道，这件事你不跟人（譬如说，可怜的老龙马可能会死，并随时骚扰你）商量是做不成的。假如这么想的话，

* 门徒宗，即一向宗，日本净土真宗的俗称。——译注

你将不得不考虑其他人，并尊重他们的愿望和想法。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一点，那就是你真的还太年轻了。当你寻找伴侣的时候，千万不要只找那些外表长得好看的家伙。你一定是个坚强的女人，精力充沛，胆子也不小。举个例子，如果你晚上和一两个朋友外出时遇到强盗，记住一定要追赶他们，别让他们跑了，要狠狠地教训他们一番。

我认为自己不是那种长命百岁的人，但也不想像普通人一样死去。然而，假如死之前无法给天下带来变化——但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自己完全一无是处。我很谨慎，因此也不太可能很快就死。但是说真的，虽然我来自土佐的低级武士家庭，生来便籍籍无名，但是仅靠一人之力，几乎不可能使这个国家发生多大的变化。我当然不会骄傲自满。恰恰相反，我将会静静地待在池底，把鼻子埋在沙里，因此不用为我担心。^[33]

龙马

这封信写得很有意思，充满了粗鲁而朴实的幽默感，日本的平民英雄一般都具有这种幽默感。僧侣的生活只适合弱者，勇敢的女人更不应该在其中寻找安慰。时代在召唤高尚和勇敢的人，而坂本很清楚自己并不缺乏这些品质。尽管坂本在信末否认了自己的狂妄和自大，但是言语之间洋溢的自尊却很难使人相信这只是幽默。武市瑞山曾说坂本是个吹牛大王，我们认为乙女也会同意这种观点。但是，这种热情洋溢恰恰显示出，跟过去相比，他是多么喜欢自己的新生活。在过去，身份和地位限制着他，使他无法扬名，除非铤

而走险走上暴力革命的道路。几年后，坂本在信中颇为简洁地向乙女解释此事。在那封 1865 年写于长崎的信中，坂本指出“实际上，在土佐那种地方，不可能有任何抱负。在那里无所事事地浪费生命，简直是白痴”。^[34]在胜手下做事自然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神户海军操练所校长之职对坂本而言则是锦上添花，因为他可以不必成为爱好和平的学生或者官员。从他写给姐姐的信中可以看到，坂本和朋友们与土佐等地的勤王党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即使是在反对他们的鲁莽行事，以及为他们的失败而扼腕叹息的时候。他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勤王党和志士。事实上，神户海军操练所有一段时间停止了运作，期间坂本在胜的协助下，帮一个朋友找到了他的杀父仇人，使他得以报仇雪恨。^[35]

刚刚引用的坂本写给姐姐的信中清楚地表明，他仍在继续坚持勤王思想。江户那帮官员是“奸吏”，坂本和同志们决心“肃清”国家。1863 年 7 月 31 日，坂本给朋友池内藏太的父母写了一封信。池内当时刚刚逃离土佐，参加了京都的勤王党。信中他对志士的“远大目标”做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前文已经引述过信的部分内容，但是这封信极好地阐述了坂本的勤王思想，因此很有必要全文誊录下来。写这封信的时候容堂刚刚返回土佐，各主要大名在京都的合作没能使政局发生任何根本的改变，甚至将军的来访也未能带来明显的成果。谁能责备爱国主义者亲自干预此事？坂本是这样说的：

池内的出走正是这个原因。现在官廷一方的行动正处于劣势。所有的大名，包括土佐的，都回到了自己藩国。藏打心眼

里认为容堂夸大了困难，只是一味地在江户和京都拖延时间，反复地说担心国家安全。然后，等事情开始变得困难时，他就找个借口溜回自己藩国。接着连将军也返回了江户。

他们对我们所说的“神国”没有丝毫的忠诚之心（义理）。他们无法理解让天皇重新掌权的思想，而这正是迫切需要做的。在这种情况下，低级武士要怎么做才能为陛下分忧呢？你们知道，一个人应该将朝廷看得比幕府重要，比父母重要。在这样的时代，认为将亲人和藩国放在第二位，抛弃母亲和妻子儿女的做法违背了一个人应尽的义务——这种想法当然来自我们那些愚蠢的官员。然而那些糊涂的父母却跟在他们后面，大谈特谈“我们藩国”和“我们家”，直到他们的儿子根本不知道该采取何种立场。如果在这种时候，你们和藏的妻子因为口舌之争而大打出手、哀哀哭泣，他肯定会为你们感到羞耻……^[36]

这封信中，坂本坚定地认为天皇的权力应该更大，为此宁愿放弃其他任何念头。封建和家庭义务应该放在第一位的观念似乎惹恼了他。跟随胜的这段日子并没有磨灭他的勤王思想。

但是，在那段时间里，尤其是在1864年夏末至初秋，坂本对国内政治的了解却加深了许多。当时坂本和胜走得非常近。他们四处旅行，并在国内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身为军舰奉行的胜是一名幕府高官，他的助手也对国内事务了如指掌。早在1863年，坂本就给姐姐写信，谴责那些人缺乏耐心，没能等待合适的时机再行动。这名本打算刺杀胜的剑客显然已经学会妥协，

但是他受教育的机会也是非常难得的。

在外国舰队为报复长州炮轰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而采取行动期间，坂本的教育仍在继续。这次政治事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使他得以深入地思考德川幕府的腐败和长州的轻率。幕府为了兑现 1863 年夏向宫廷做出的承诺而派了一个使团到国外去，然而大使们非但未能说服西方列强放弃条约规定的权利，甚至还答应了法国人的要求，愿意就法国船只被长州的炮击一事赔偿。他们还承诺将采取行动，必要时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重启下关海峡。幕府拒绝批准这些协议，于是 1864 年 9 月，由 17 艘船组成的西方联合舰队便开进了下关海峡。

在大多数日本的有识之士看来，幕府对待西方人将炮轰下关海峡的态度显然是矛盾的，就像他们之前对待英国进攻鹿儿岛时的态度一样。一些官员（胜当然是其中一员）主要担心的是外国人将进攻日本领土，而另外一些人则目光更为犀利，看到了其中的有利之处。他们欢迎外国人适时相助，攻打幕府的敌人。8 月 24 日朝廷便发布敕令，命令德川幕府征讨长州，但是直到 12 月 16 日远征队才动身。因此，一些江户官员考虑在外国舰队出动的同时派遣地面部队惩罚长州也就不奇怪了。由于担心民众会反对幕府与欧洲合作，幕府放弃了这一想法，但是当时的学生普遍认为，对于外国人的行动，幕府最后采取了公开谴责但暗地里赞同的做法。^[37]

在斡旋的最后时刻，幕府派胜到长崎去，希望能与外国人达成和平协议。胜发现外国舰队的指挥官不愿意改变计划。^[38]刚从英国回来的伊藤和井上则在长州做最后的斡旋，但也没能使长州做出让

步以避免受到炮击。^[39] 结果长州受到的羞辱让它的勤王党人相信，再也不能以武力驱赶外国人了。之前外国人的行动也使他们的萨摩同党明白了这一点。

胜在长崎时，曾派坂本前往熊本去会见横井小楠。从上文引用的信中可以看出，坂本对长州的挑衅和幕府的态度均感到遗憾，并担心外国人可能会占领长州。胜在日记中记录了与坂本的一次谈话，谈话显示，坂本对幕府愿意接受外国人的帮助，并从中获益感到愤怒。他说，“譬如长州有罪，借异手征皇天之地，岂皇国同人种之所为？其幕吏之罪，实为国体之耻。”^[40]

几个月后，胜说，坂本在他们坐船从长崎返回时提出了一个建议。这是充分利用勤王党人热情的一个新思想。坂本建议招募几百名极端的攘夷分子，作为开发和殖民北海道的中坚力量。^{*} 然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坂本说大臣水野（水野忠精，1862 年成为幕府老中）已经知道了这个建议。显然，坂本的意见已经可以直达幕府的最高统治者。^[41] 但是这个建议在 7 月 20 日提出来时就已经不可行了。他和胜都不知道，幕府的军队袭击了在京都密谋举事的长州人，激怒了勤王党。这些人现在一心只想着攻入京都，掳走天皇。

1864 年夏，上述努力失败后，长州军队从京都溃逃。这个时候，坂本和胜正在大阪。胜的部下很多都是勤王党人和志士，因此自然会有些人离开兵庫的学校，和朋友们并肩作战，其中一些来自土佐。

* 几年后，维新领导人出于同样的想法，招募了一些忠于幕府的人去开发这个北方岛屿。

即便不是大部分，但胜的很多部下都站在长州一方，因此江户的官员怀疑胜为长州逃亡者提供帮助也就不难理解了。^[42]胜不仅支持长州的勤王党，其日记还显示他对土佐的局势也非常关心和感兴趣，而当时容堂正准备严惩武市一派。^[43]

坂本有如此绝佳的机会思考冲动的代价，从而完善和调整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他一方面得到胜的鼓励，另一方面又不必牺牲自己的勤王主义信念。许多迹象表明，他的思想已经开始成熟，也开始将当时社交圈中流行的观点作为自己的想法。因此，长州炮轰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之后，他在与福井藩主交谈时警告说，只有对幕府的机构进行全面改革才能阻止外国侵犯日本的领土完整，而制度的改革只有在松平春岳、山内容堂和大久保一翁这些人决心合作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就这样，他已经开始设想一种主要以调解和谈判为中心的局面。^[44]

坂本的新政治组织概念逐渐表现为议会制的形式，这是他从幕府大臣大久保一翁处听来的建议的延续。他认为幕府在做重大决策时，应该先咨询大名的意见。这样一来，决策和责任将得到分摊，而人民也会更加团结，更加支持国家。幕府重组的第一步是任命松平春岳和一桥庆喜，但这遭到了保守而忌妒的幕府老中的反对。萨摩、土佐和福井大名的几次会面也无疾而终，因为现行的制度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可以运作的环境。

坂本似乎认为，福井藩的松平春岳受到大多数德川家族的信任，而且备受外样大名和志士的尊敬，是最有可能领导新议会成立的绝佳人选。坂本几次和春岳的藩臣、横井小楠以及横井的侄子谈论这

个问题。横井的侄子在坂本引荐下在胜的神户海军操练所学习。这些想法与横井的不谋而合。他一直就希望成立一个合作决策的组织，换言之，就像他所说的“共和政治”。^[45]

1864年春，这类愿望看起来仍然非常遥远。松平春岳不愿意成为催促这种新秩序成立的带头人。胜在5月18日的日记中强烈谴责大名们未能意识到自身肩负的“伟大责任”，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那地位较低的助手坂本会对不愿主动的春岳印象有多好。但是对强藩的藩主而言，真正的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比“愿望”的要求更高。取得勤王党人的支持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已经给政治重组带来这么多的麻烦和困难。因此接下来坂本需要回到浪人中去，这样才有可能影响他们，在失去了胜的支持之后，这一切便变得可能和有必要。

胜遭解雇

有一个时期，幕府的政策和目的变换，于是胜被幕府解雇，跟随他的人也跟着失去了支持。对于一桥庆喜和松平春岳的智慧和忠诚，许多江户当权的保守派谱代大名历来不满意且不放心。就在几年前，二人还被井伊直弼责罚禁闭，而井伊的支持者中，江户的保守派势力最大。新政府实施的那些全面改革——重新与外样大名一起商讨国策、将军访问京都、原谅井伊的对手、惩罚井伊的子嗣、放宽参勤交代制度的限制——都使他们对前途感到不安。庆喜和春

岳给人的印象是，他们愿意改革更多。春岳迟迟不同意日本完全开放，以及后来不愿带头成立任何新的政治组织，都是他的矛盾心态和希望安抚质疑者的心情的体现。至于庆喜，他对萨摩或者长州有可能取代德川家族的趋势感到极不开心，而且和萨摩藩的岛津久光完全合不来。加之江户方面的压力，他变得小心谨慎，且有些变化无常。因此，当萨摩取代了庆喜和春岳之前的位置后，大家纷纷重新评估起他们之前的立场。

1864年，大部分情况明朗起来。这一年将军家茂第二次访问京都。他于2月22日来到京都，一直待到6月23日，而庆喜一直陪同并提供指导。这一期间，将军与宫廷以及现在担任宫廷顾问的外样大名进行了一系列会晤，主要是讨论对外关系的问题。宫廷议会暂时在岛津久光的控制之下。1863年8月英军炮轰鹿儿岛，把他的居城完全摧毁之后，岛津就被召到京都。那次交火之后，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和小松清廉等最为知名的萨摩维新领袖便开始积极采取措施，加大对外贸易的力度以购买西式武器。再者，虽然英国人的炮火给萨摩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但是却使萨摩人明白外国人并非只有坏的一面，与他们交往可以增强藩国和幕府的力量。随后便发生了我们上文所说的那件事，萨摩与会津的军队联手将长州的极端分子赶出了京都。1864年3月，京都会议开始。在萨摩藩的主导下，宫廷的立场发生了转变，宫廷发言人花大量口舌强调的是重整军备和增强国力，而不再是攘夷。与会的山内容堂也认同宫廷的观点。于是，首次摆脱了勤王派公卿及其长州朋友影响的京都局势彻底改变了。^[46]

但是，幕府已经派了一个使团到欧洲去，希望说服法国同意关闭横滨港。不知是为了获得江户那些保守派谱代大名（这些人认为他不够忠诚）的信任，还是为了消除萨摩藩在京都会议上的影响，庆喜现在坚持认为，为了政策的连贯性和国民的信任，不能撤销之前做出的决定。他不肯放弃自己的立场，甚至为此大发脾气。^[47]庆喜宣称的攘夷计划注定将以失败告终，8月，派去欧洲的使团回来了，结果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他们非但没能获得西方的让步，反而又割让更多，因此当场就遭到解职和处罚。但是，激烈的争辩降低了那些强藩大名在公武合体框架下与幕府保持亲密关系的希望，因为他们认为幕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考虑自己的眼前利益。萨摩和土佐的藩主都不高兴地返回了自己的藩国。

谈判过程的混乱，明确地说明幕府领导层内部存在基本目标的冲突。松平春岳和庆喜主导的“改良”派似乎面临着要么改变立场要么下台的抉择，而在他们的支持下声名大噪的胜和大久保一翁也面临着失势的危险。

事实上，春岳自己辞去了职位。在大家寄予厚望的领域内丧失领导权之后，胜和坂本对于领导能欣然接受自己的责任一事变得不乐观。1864年，庆喜也辞去了职位。他接受了摄海防御指挥一职，但似乎主要是为了防止它落入岛津久光之手。

就在春岳和庆喜重新考虑自己的计划和引退期间，江户的保守派势力则得以增强。必须注意到，许多保守派与其说是坚定的攘夷分子，还不如说是决心在时局动荡中将政界的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德川家族和谱代大名手中。这些人中涌现出了一位有魄力的代表人

物，即小栗忠顺。小栗坚定地执行对外样大名的严格政策，而且地位日益重要。1860年，小栗曾和胜一起随使团访问西方。他和胜一样，认为日本的政治结构必须改变。胜渴望建立一个更加温和的合作性组织，小栗则相反，希望德川幕府变得更加专制，这样就能逐渐接管各藩的国防和政府等重要部门，从而成立一个德川家族领导下的中央集权政府。小栗通过正统的渠道，在德川幕府的官僚体系中迅速上位。他的家族颇具影响力，属于德川家的世袭家臣。小栗做过小姓组番头、勘定奉行和町奉行，1863年又担任陆军奉行。因此，他在军队、财政和民政等领域均有管理经验，最后成为陆军的领导。这些使他在德川幕府最后几年的政治辩论中获得了有力的支持。

在1863年和1864年长州勤王党判断失误的背景之下，小栗等人渴望的严厉政策似乎有几分成功的希望。长州贸然炮轰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危险境地。9月，会津藩和萨摩藩的军队联手将长州的军队逐出了京都。1864年7月，幕府的军队出其不意地袭击了长州的密谋者，使他们的计划流产。8月，长州试图攻入都城的计划也被重新组织起来的幕府—萨摩联军挫败。长州现在被定性为“朝敌”，宫廷下令幕府惩罚这个不肯驯服的藩臣。

德川家族的守旧派自然认为他们现在可以回到旧时代了。志士之前梦想的萨摩—长州联盟早已灰飞烟灭，不再有危险了。这两个强藩彼此恨得咬牙切齿，过去那种分而治之的策略至少看起来又发挥了效果。如果能够控制住萨摩，不让它进驻长州腾出来的地方，那么幕府的霸权就稳固了。

外国人严惩长州之后，江户那些思想保守的谱代大名认为是时

候采取更为自信的政策了。1864年10月，他们努力想按原样恢复参勤交代制度。这些人的解释是，危机业已过去，大名们现在应该有经济也有能力恢复以前的军事实力。即便谱代大名也不太热衷此事，因此这一计划彻底失败，但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反映出江户的保守派希望回到过去的热切心情。^[48]

接着，11月10日，幕府免去了胜的海军奉行一职。胜在江户的那些对手终于使幕府的高层相信，以西方的先进技术为基础，旨在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央集权的稳定的新政策才是目前亟须的。派军征讨长州的计划也正准备启动。在这样的情况下，胜手下聚集的那帮浪人和勤王党人便显得非常可疑。胜被解雇后，追随他到兵库的人也全部被解散了。于是，建设现代海军的重任就这样交给了小栗忠顺。^[49]

在这样的形势下，坂本和朋友们的处境变得非常危险。他们没有理睬藩政府要求他们返乡的命令。从法律上说，他们都是逃亡者，因此，为了逃避追查，他们都变换了名字。^{*}就德川幕府目前的态势来看，他们必须得到强者的保护才有可能安全，而胜已经无法再提供这些。不过，他确实也为坂本的朋友们提供了一些非常有用的帮助。

坂本和胜最近结识了几名萨摩藩维新领袖。早在9月份，横井小楠的侄子（坂本的同事）就写信告诉横井，坂本和西乡隆盛在京都的萨摩公馆见过面。^[50]坂本曾经代表胜见过西乡，两个星期之后胜才第一次和西乡见面。他们和萨摩藩的接触始于这次会面，而这

* 此后坂本用过几个化名，但最常用的是才谷梅太郎。我们知道，“才谷”是他的祖先开设酒屋时用的商号。

种关系使坂本在胜被解雇后获得了保护。胜收到幕府的解雇书后，给萨摩藩的实际统治者小松清廉写了封信，请求他帮助自己以前的部下。萨摩藩从西方商人那里购买了几艘新船，需要一些懂操作的人，而且小松他们又亲自见过坂本，于是爽快地答应帮忙。小松给萨摩的代表大久保利通写了封信：

潜居神户胜处之土州人，欲借用异船，有航海之企。其人称坂本龙马。吾人亦商讨其借用暂停于关东之船。同藩之高松太郎亦须归藩。当前土佐国政向甚严，有取缔不法之事，归则绝命。若得前述之船，则乘坐之间亦须潜藏。西乡滞京时已有商谈，言可得上述浪人，召使为航海之手。故暂令其潜居大阪公馆内。^[51]

德川幕府解雇了胜，现在又将一名土佐浪人送进了萨摩的怀抱。这名浪人希望成立一个议会制政府，并在各藩之间开展合作，而他最初则是从幕府官员那里听说这些先进观念的。多亏了这一切，跟两年半前准备刺杀胜的时候相比，此时的坂本才更适合参加维新运动。

第五章 萨长联盟

1860年代，只有两个藩国能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对德川幕府的权威构成威胁。萨摩和长州是日本西南部两个最强大的藩国。为了使自己的军事设施现代化，他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经费。虽然1863年和1864年，西方人的惩罚性炮轰使他们的自强计划暂时受挫，但结果也使他们发下一定要变得更强大的宏愿。但是没有人能够单独做到这一点，因为9月京都发生的暴行已经表明，德川幕府的统治者会利用一方来遏制另一方的过分要求。萨摩和长州的家臣之间充满了猜疑和忌妒，总以为对方正在觊觎幕府新统治者的位置。在勤王党掌权，勤王主义最火热的那几年，两藩之间的不信任导致了他们的政策如走马灯般变换。长州认为应该坚持攘夷政策，萨摩便主张应该让宫廷和幕府之间进行和解。这种互相的不信任导致了1863年的武力事件。长州人炮轰了经过下关海峡的一艘萨摩船只，而萨摩的军队则和会津的军队一起将长州赶出了京城。长州领导在书信中称对方为“萨摩土匪”，而萨摩人对长州人也没有好语气。

唯一能使这两个死对头为了国家主权而走到一起的是来自幕府

或者外国的新威胁。幕府提供了这两个条件。向幕府施压并成功撤销胜麟太郎海军奉行一职的保守派希望对长州加大打击，令其蒙羞。他们处处表示，现在已不再需要就国内政策征求外样大名的意见和帮助了。看上去他们很可能已经受宫廷之托，正在寻找一种新的权力架构。为此，这些人还准备考虑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提出的军事技术援助方案。因此，西南强藩为了抗衡幕府的新威胁而向其他西方国家求购武器的行为就显得既富有爱国心，又是明智之举了。而且，我们将会看到，只有在两藩合作的情况下，这种求购才进行得最为顺利。

形势的发展，使萨摩和长州之间进行某种合作变得顺理成章，甚至无法避免。但是要实现这一目的，却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和斡旋。这个任务落到了土佐浪人的身上。在国内的希望破灭之后，他们分别逃到萨摩和长州寻求庇护。1864年，由胜介绍，坂本认识了萨摩藩的维新领袖，此后便成功地使他们接受了自己的思想。坂本促成联盟成立的本事已经远近闻名，但他并非一个人在做这件事。就在坂本投靠萨摩，并说服萨摩领导接受自己的思想期间，他的朋友中冈慎太郎也加入了长州的勤王党。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土佐勤王党，与1863年9月跟随落败的长州军队一起离开京都公卿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坂本及其朋友们（尤其是中冈）的努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来观察萨摩和长州是如何吸收十年来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将会看到，起作用的远远不只是某些乡土或者浪人的偶然阐述，因为许多敏锐的年轻武士已经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蕴含着这一机会。

西乡隆盛和萨摩藩

1864 年秋，为坂本提供庇护的萨摩领导是这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资源的藩国的代表。萨摩藩是德川幕府时代最有影响力的藩国之一。^[1] 岛津家族在鹿儿岛定居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185 年，当时的家族创始人岛津忠久被镰仓幕府的第一位将军任命为该地区的代理人。过去，这一地区的大部分都属于势力强大的宫廷贵族近卫家族，因此从很早开始，岛津家族与近卫家族便非常亲密。在 15、16 世纪的动乱中，岛津家族的势力一度扩展到整个九州岛，但是 1587 年与秀吉、1600 年与德川家康的两次战争均以失败告终，岛津家族扩张领土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不过，萨摩藩国的幅员仍然辽阔。其领土超过现在鹿儿岛县的面积，计税基数达 77 万石，此外也通过与冲绳之间的贸易以及后者的进贡获得收入。萨摩大名的收入在日本的封建领主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在收入和地位上均超过他的加贺藩金泽市的前田家族。

偏远的位置和闭塞的环境为萨摩提供了一种绝无仅有的安全感，这是位于地理中心的前田家族所无法拥有的。德川时代，萨摩藩的边界巡逻队几乎让任何外人都难以进入鹿儿岛。这个消息甚至传到了荷兰人那里，荷兰商馆馆长道夫在 1833 年的报告中写道，德川幕府的一个治安机构专门用于监视那些强藩。那些被派去萨摩的人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所有人在被发现后都被处死，因此那些被派往那个地区的人都认为自己死定了。”^[2] 道夫所说的这个不受欢迎的职位是否存在尚待商榷，但是他的故事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证明萨摩的边界确实难以逾越。萨摩藩的武士与平民的比例（1：3）是日本（平均约为1：7）最高的。政府雇用了大量的武士来限制居民消费，以及强制他们服从各种封建法令。没有一个藩国管理得像萨摩藩这么好，也没有一个地方像萨摩藩这么秩序井然。

然而在庞大的武士群体中间，各种形式的特权和恩宠有时也会引起大家的不满和关注。71个拥有封地的家族垄断了藩国内部的高级职位。这些“大身分”的家族喜欢维持以前的保守政策，同时避免与德川幕府为敌，而许多地位较低的武士则喜欢和上司唱反调，认为后者的谨慎是因为他们只考虑自身的利益。但是，我们绝不能认为等级界限必然造成政治上的对立，至少德川时代晚期萨摩高层小松清廉的社会地位就非常高。然而无数的迹象表明，在德川时代晚期和明治时代早期，年轻的下级武士往往与他们的上司意见相左。他们希望藩政府在国内政治舞台上采取一种更加坚决，在他们看来更加勇敢的立场。他们的代言人必须是位有名望的重要人物，而这对底层武士来说通常都是遥不可及的。西乡隆盛本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是坂本的朋友和1864年为其提供庇护的人，是一名公认的领导——偶尔还是反对派的俘虏。

西乡体格健壮、热情而神秘，常常被认为是武士传统的完美化身。关于他的故事非常多，我们很难区分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他的名声完全符合日本不断变化的舆论环境的要求，人们先赞扬他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先驱，后来又赞扬他是林肯式民主的先驱。回顾一下他的一生，我们将会明白这一切如何发生，也会发现他的思想发展过程如何与坂本惊人地相似。



1864 年的坂本龙马

1864 年，36 岁的西乡将坂本收留到萨摩公馆。他的人生经历过大起大落，因此对于别人的看法和自身的安全不是特别在乎了。他接受的教育包括禅宗和王阳明的学说，从中形成了知行合一的思想。他处理任何问题的方法都是既直接又直观。他对仔细的分析和战略计划丝毫不感兴趣，因为相信只需唤醒那些目睹过高贵失败的人就可以。“坦诚之心”终将战胜一切，利用“诡计”和“诈术”者将一事无成。西乡的思想有些深度，而这可能是受到一次作战中负伤（13 岁时）的刺激，因为那限制了他的武艺发挥。然而他热情似火的性格和魁梧强壮的身体，让人们视他为真正的剑客和武士，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名声。

西乡早年并未从戎。他在一个乡村税务所当了九年的小官吏。在任期间，他勇敢上书，谴责官员的腐败行为，同时提出一些纾缓民困的措施。这可能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西乡的这些抗议，与后来在流放期间努力教村民认字的做法，为他赢得了良好的声誉，人们认为他同情老百姓的疾苦，是个热心和有责任心的武士。他性格上的其他特点——急性子、喜欢说一些粗俗的玩笑话、可能被误以为鄙视或者智慧的挑衅式沉默——都使他成为传统日本民众心目中的英雄，勇敢真诚而又桀骜不驯。

西乡为人所知，始于被岛津齐彬（萨摩藩主，1851—1858年在位）看作是一名有前途的年轻人。岛津认为他非常适合做情报等需要小心谨慎的工作。1854年至1858年，西乡为藩主执行了多次任务，包括1858年计划让庆喜替换家茂成为将军继承人、成立一个更具代表性的议会式政府、与京都宫廷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这些任务需要经常出差，使他有机会认识当时政治舞台上最有远见的一些人，同时也为他们所知。在这段时间，西乡还成了一些武士团体的领导，这些团体一直在等待机会进攻外国人及其爪牙，藩政府的严厉监视使他们无法成立像土佐勤王党那样的组织，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1859年萨摩志士宣誓效忠新藩主时，西乡的名字列于所有人之首。

西乡的主公齐彬的计划被井伊直弼阻挠，不久去世。新的藩政府不愿意在幕府新政权中冒任何危险令西乡感到气馁，他们不仅禁止任何针对德川幕府的抗议活动，而且处置了齐彬政策的执行者。西乡被流放到远离萨摩海岸的一个小岛上，在那里待了三年零两个月。流放的部分原因是对他反抗幕府的报复处置，这已经是宽大处理了。

1862年西乡官复原职。萨摩的藩主现在是岛津忠义，他是齐彬弟弟久光的儿子，而久光则担任摄政。久光主宰着萨摩政坛，直到1871年废藩置县。他自称遵循哥哥的计划和政策，但是无论是智慧、想象力还是政治手腕都比哥哥逊色不少，特别是他更关心控制，而不是利用武士的意见和力量。1862年西乡被派往京都，为久光的京都之行做准备，但他执行命令期间过于自主，几乎立刻在久光面前失宠。久光发现西乡不仅违反命令，还与那年夏天充斥京都的浪人联系，于是再次惩罚西乡，将他流放到萨摩沿岸一个更小的岛上。这次惩罚一直到1864年3月才结束。他现在触怒的是反对幕府的萨摩藩，所以受到严厉的监禁和控制。也因此，在萨摩从攘夷派向温和派转变的关键几年里，西乡在政治上并不活跃，但是他很快就吸收了同胞们业已知道的一些经验教训。实际上，在齐彬的教导下，他就可能已经吸取了一些知识。无疑，西乡很快就意识到近在咫尺的新式武器和技术中隐藏的巨大的可能性。

西乡被召回是他在藩国中的朋友努力活动的结果，这些人一起向久光保证他的忠诚和能力。其中大久保利通（当时叫作“一藏”）的地位最高。此后，他将和西乡共同主宰萨摩藩的政策和思想。^[3]西乡复职之后被派到了京都，负责那里的萨摩公馆和军队。这个职位权力非常大，因为山高皇帝远，鹿儿岛很难管辖到他。西乡拒绝遵守那些他认为不合理的命令，而且好几次自己决定萨摩藩应采取的策略。他定期向大久保汇报他对京都局势的看法，而这些信件——这个档案丰富的时期最珍贵的一笔财富——使我们得以一窥坂本首次认识他时他的思想。^[4]

西乡首次出任要职是在萨摩藩的政策开始变强硬的时候。我们记得,1862年和1863年,久光曾经在江户和京都为公武合体而奔忙,但结果一无所获。1864年春,在京都举行的强藩大会上,庆喜依然坚持应该废除或者修改与西方签订的和约,不愿接受岛津已经说服宫廷采纳的温和派立场。幕府似乎又信心满满,认为自己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国内事务。显然,公武合体只是意味着宫廷支持江户做出的决策而已。久光返回了鹿儿岛,此后每次说起“公武合体”时,总要强化一个变化,即德川家族作为地位最高者应该参加大名会议,以便所有的大名有均等的机会为天皇的事业出谋献策。不过,实际上这个词在萨摩藩很少被提到,因为它已经被打倒幕府——即“倒幕”——所代替。对于躁动不安的年轻武士来说,这个口号更受欢迎,而刚刚结束不公平的流放,胜利回归的西乡则成了他们的英雄。

西乡接手京都的事务时,首先关心的便是长州藩的威胁。去年9月,萨摩藩的军队曾经与会津藩合力将长州人赶离京城。西乡来到京都时,四处流传着长州藩计划突袭首都、掳走天皇的谣言。西乡确保萨摩藩不参加幕府的防卫准备——他拒绝了幕府的派兵要求——直到他相信长州藩的计划确实将危及天皇的人身安全。他向大久保报告说,幕府可能会利用外国人袭击长州,而长州藩自己似乎正在和西方人交涉。^[5]但是当长州藩向禁门发起进攻时,他却率领萨摩士兵英勇地保卫城门,自己也在战斗中腿部负伤。萨摩军队的加入扭转了禁门之战的局势,但这只是为了响应宫廷的号召,而不是因为幕府的要求。但是,这自然使西乡——或者说萨摩藩——不受长州勤王党人待见了。

在致力于避免德川幕府的权力均衡被长州藩打破时，西乡也对改善本国财政状况的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德川时代的传统儒家模式总是避免与商业有任何联系，就像福泽的父亲告诉他算术是“小店主的工具”那样。结果藩国的商业和贸易经常委托给一些受到特别青睐的“官商”去处理。另一方面，强硬的政治领袖偶尔会通过设立藩国专卖的方法，将一些收益从私人渠道转到官方。萨摩藩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乡村税务所和流放的经历让西乡非常了解由特许商人经营的专卖制度可能产生的不公平现象，因此他现在努力的方向是让政府完全掌握贸易功能。

萨摩藩的问题是他們想购买外国船只，但是外国船只太贵，一般的藩国财政承受不了。西乡在信中和大久保讨论过如何获取购船资金的问题，开始建议将更多的萨摩货物运到琉球卖给外国人。不久他认为把它们运到大阪更好。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惊人的提议，建议政府授权自己使用萨摩的资金，在市场饱和的时候购买货物，特别是丝绸，将它们囤积起来等价位高时再出售。他写道，外国商人确实都很精明，但是他将很高兴跟他们较量一番，让他们见识见识自己的手腕。这么做必然能够获利，进而就有资金购买急需的船只了。^[6]换言之，在西乡遇到坂本时，他已经将所有简单的攘夷思想都抛到脑后。他赞成开国并与外国人做生意，以此增强萨摩藩的实力，使其在和幕府较量时能够胜出。事实上，不久之后，他和朋友们就向欧内斯特·萨道义抱怨说，幕府的主要问题是希望一手囊括所有利润丰厚的商品的专卖权。^[7]

除了获取商业利润，西乡还学会了藩国间合作的思考方式。在

齐彬手下工作的那段时间无疑让他学会了这一点，因为 1858 年的那些谈判需要各藩之间进行紧密的合作。不过，1864 年夏与胜麟太郎的那次会面使西乡接触到了新的议会制思想。10 月 16 日，西乡与胜在大阪进行的这次会面正是坂本第一次会见西乡时极力促成的结果。从西乡给大久保的报告中可以看出，这次谈话涉及了大量的重要细节，解释了他自己的思想发展以及幕府保守派对胜不信任的原因。尽管这次谈话发生的时候，正是萨摩—幕府之间的合作看起来很有可能实现之时，但是它的内容更多的是让德川幕府统治者苦恼，而不是让他们安心。

根据西乡的说法，胜当时正准备到江户去和一个名为阿部正外的幕府老中谈一谈，并说自己有希望说服他解雇保守派官员，并成立一个由四五位主要大名组成的新政府。胜接下来谈到了防卫措施。他认为应该把幕府和四五位大名的海军力量集合起来，这样才能够将外国人驱逐出濑户内海。横滨和长崎完全可以继续开放，不会有任何危险或者可耻之处，但是濑户内海港口的性质则完全不同。胜似乎认为外国人非常理智，只要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拒绝将会导致日本采取联合防御行动，那就可以说服他们，使其放弃计划。在西乡听来，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新想法，而更具吸引力的一点是，这些想法来自一名幕府高官。^[8]西乡希望自己的藩主能够看到这种新安排对萨摩藩的重要性。他尤其对当前危险过去之后的新“合作政府”感兴趣。于是，和坂本一样，西乡被一名幕府官员的政治改革思想说服了。

西乡充分融入国内政治是在德川幕府为惩罚长州 1864 年进攻京都而发兵征讨长州期间。一开始他雄心勃勃地打算彻底羞辱长州，

但结果却变得温和起来，因为他意识到，如果眼睁睁看着这个强大的对手被彻底打垮，自己藩也将面临巨大的危险。西乡离开京都而参加征讨军，职位很高。作为萨摩军的最高统帅，他对萨摩军的部署和作战计划有很大影响。西乡一开始打算狠狠地教训一下长州，而且立刻征讨长州可以使外国人没有借口自行报复长州在下关炮击外国船只的行为。但另一方面，西乡希望清楚地表明，萨摩是以平等的身份向幕府伸出援手，其行动是对宫廷而不是幕府要求的回应。他改变了参加行动的萨摩军的计划，批评幕府的部署，还愤怒地拒绝了幕府派三名军事观察员到萨摩去的要求。他写信告诉大久保说，自己很难不发火，一想到这就忍不住想放声大笑。^[9]

西乡逐渐相信需要采取折中的方法解决问题。他们完全没有理由帮助幕府镇压长州。他将更多努力用在了政治谋略，而不是军事部署上，还为长州统治者铺下了台阶使其得以体面地撤退。他先是通过萨摩军在京都俘获的长州士兵，然后是亲自上门，向长州提出和解条件，并获得了对方的首肯。三名长州家老要被勒令自杀、山口城的防御工事需要拆除、那些避难的京都贵族要被送到九州。^[10]长州的保守派接受了这个方案，因为他们现在正集中力量对付极端主义者给藩国带来的威胁。

1865年1月24日，长州征讨和平结束。三名家老的头颅被呈交给了德川军队的统帅，一切似乎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西乡的政治地位和声誉急剧攀升。他不顾个人安危，到下关详细地解释计划，还亲自安排宫廷贵族转移到九州福岡附近的太宰府。^[11]

然而，接下来几个星期，西乡有关政治改良的所有计划都遭

到了挫折。江户的保守派根本不打算减少德川幕府的特权。西乡和同仁们暂时在做各藩藩主的工作，努力说服他们成立议会。西乡极力主张久光到京都来，大久保则到福井藩去鼓动松平春岳，而第三个萨摩人则到宇和岛市去找伊达宗城。这些努力都失败了，部分原因是大名们担心外界会以为他们重权在握（其实他们并没有权力），于是西乡转而认为必须来一场彻底的、可能是暴风骤雨式的政治改革了。考虑到贸易和军事援助等因素，他开始建议和英国保持亲密关系。西乡敦促萨摩藩将江户公馆的官员全部撤走。京都现在已经成为政治上的首都，没有理由为德川家族的华丽之梦添砖加瓦了。^[12]对于江户方面正计划将老对手长州彻底摧毁这件事，他不免也开始有了不同的看法。换言之，他已经准备好接受坂本龙马的说辞，赞同他提出的与长州进行合作的提议。对坂本来说很幸运的是，他的一名土佐同伴正在用类似的话向长州领导游说。

中冈慎太郎与长州藩

长州藩对维新的贡献最大。从吉田松阴时代开始，长州的勤王志士便是极端攘夷运动的领导者。他们为后来的爱国主义贡献了超额的烈士和英雄，还为其他地方逃来的浪人提供庇护。其他藩国的保守和激进之争从未像长州这么尖锐和激烈，每一次政策的主要转折都以藩政府被推翻为前奏。到了1860年代后期，保守派和激进派的领袖均死于斗争、疾病或者切腹自杀。外国人对下关的轰炸宣

布了单纯的攘夷政策不可行，而幕府坚持全面羞辱长州的做法也使“公武合体”这类口号失去了吸引力。尽管如此，长州人对于国内政坛的竞争对手萨摩人的猜疑和痛恨之情，使两者之间合作的前景看起来遥遥无期。

如果要详细地追溯长州事件发生的原因，就必须岔开去做一番冗长的描述，即使是简要地描述一下领导者的思想变更也需要将已讲过的故事再复述一番。^[13] 萨长联盟是土佐浪人中冈慎太郎与坂本合力促成的，因此，以中冈受到的教育为线索来讲述事件的来龙去脉会更为恰当。他在长州藩扮演的角色，就是坂本在萨摩藩扮演的角色。

中冈慎太郎在本书讲述土佐勤王党的章节中出现过。^[14] 他是土佐东部一名庄屋的长子，是1862年要求到江户去保卫山内容堂的50名庄屋和乡士之一。我们可能还记得容堂根本就没什么危险。他对中冈的印象很好，让他执行了几次任务，同时利用他了解志士们的意见，甚至在1863年春返回土佐时任命他为随从人员的目付。

这段时间里，中冈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有些死板和武断。不像坂本那么幽默和中庸，他保持着彻底攘夷的坚定立场。因此，当1863年6月容堂决定不理宫廷的攘夷圣旨时，中冈感到非常震惊。他感觉到形势危急，于是与上层武士团体的成员协商。身为马回的板垣退助同样激烈反对与西方签订和约。板垣曾受容堂之命，成立一支由50名武士组成的队伍，来防止比他们先到江户的50名乡巴佬（中冈也身在其中）做出什么暴行。现在，板垣——由于站在宫廷一方而失去了官职——和中冈之间产生了某种友谊，为几年后不

同级别的武士之间的合作铺平了道路。^[15]板垣的忠君思想非常浓厚，因此并没有离开土佐。但是中冈则不是，1863年秋，他秘密去了长州，回来时看到勤王党正在衰败的边缘，于是又逃往长州。1863年11月底开始，中冈就成了在长州避难的浪人。有意思的是，他的家人赞同他选择的这条道路。1866年，中冈父亲病重和去世时，家人并没有通知他，以免他受到孝子观念的影响，而动摇勤王事业的决心。

中冈在名为三田尻的长州港口，遇到了一群为了追随落难公卿而来到这里的土佐人（土方久元也在其中），并加入了他们。他们以三田尻为中心，呼吁各方加入勤王事业。真木和泉从久留米赶来，但不久就在京都牺牲。七名公卿（不久就只剩下五位，因为一位赶去参加大和起义，另一位病逝）自然而然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他们是勤王事业的象征。该年26岁的三条实美是公卿的领导。三田尻驻地的生活完全就是后来极端民族主义学校遵循的模式。志士们早上6点起床，向东方朝拜。早饭后学习文武两道，下午军事操练，晚上则可以“自由”选择一些推荐的活动，例如阅读兵书等。所有的操练、考核和团体活动均遵循固定的时间表。^[16]

土佐藩当局知道有许多本藩人在三田尻，于是派了其中一名志士的父亲前去说服他们回来。志士们打算杀死这名使者，但被中冈阻止了。他们决定听使者把话说完，但一点也没有把他的要求放在心上。不过，土佐官方的态度有些矛盾。使者本人在和志士说话时态度恭敬温和，而且官方并没有和长州藩进行任何正式的谈判，要求引渡他们。事实上，中冈得到亲口保证，藩政府没有因他的叛逃

行为而惩罚他的亲人。高知当局可能认为，这些人为保护落难公卿而甘愿放弃遗产，本身就是具有高尚情操的明证，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对这些人采取行动，而不会进一步触怒本来就很不安分的土佐勤王党。

中冈到达三田尻后不久，就被派往京都担任情报工作。在京都期间，他与许多思想偏激的浪人保持密切联系。中冈和长州奇兵队领导高杉晋作以及其他忠实拥趸住在一起。他一直处于极端主义运动的中心，直到那年夏末，长州军队突袭京都试图掳走天皇时为止。1864年春，他认为提前举行勤王起义的希望还很大。随着公武合体计划的失败，那些主要的大名都离开了京都。中冈一度认为岛津久光是勤王运动的主要障碍，甚至联合高杉计划刺杀他。但是久光的保卫工作实在做得太好。当有人准备刺杀他的消息传到他耳朵里时，久光就慌忙逃回了鹿儿岛。^[17]奇怪的是，这些计划似乎都发生在中冈在京都第一次见到西乡隆盛后不久。不管那次会面的细节如何（现在已无资料可考），中冈和长州人显然认为，和萨摩人之间达成谅解的希望非常渺茫。

了解中冈思想最好的方法是看他写给土佐勤王党朋友的信中的政治分析。1864年夏，他认为勤王党在日本大部分地方取得胜利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水户藩传来了爆发激烈内战的消息。人们一度认为天狗党（尊王攘夷派）能成功推翻藩政府，向京都挺进。1864年6月，中冈给土佐朋友写的长信中就宣布了这种可能性。令人沮丧的一点是，宫廷现在被温和派把持。保守派和“佞臣”们给久光升了官阶，保守派公卿也已经上位。而另一方面，大名们一个个都离

开了京都，公武合体派显得非常狼狈。中冈认为，对全国各地的志士来说，现在是个大好的机会，大家应该行动起来，控制京都，让激进的公卿们官复原职。对京都进行一次突袭可以为长州军队重返首都铺平道路，而此事一旦完成则将扭转局势。中冈呼吁土佐同人每个人都尽自己的一份力，共同完成这项伟大的任务。他希望能与板垣退助这样的土佐上层武士合作。中冈不认为违背藩国的命令就意味着不忠。“这样的机会，”他写道，“一百年也不会再出现一次。没错，在这一高贵的事业中，我们看起来会和土佐的步调不太一致，但是它毕竟能使土佐变得繁荣起来。这难道不是忠和孝？不管怎么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以后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最后，中冈汇报了刚刚从长崎传来的最新消息：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外国人已经进到了北京，大清帝国的中心已经陷落。事实上，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土佐的同人会尽到自己的责任吗？现在最要紧的是立刻举行起义。^[18]

这封信到达土佐时，正值容堂在处理武市的追随者。它直接造成30名志士向藩政府请愿，要求释放武市。请愿无效后，中冈的家乡、土佐东部的23名勤王党人起来示威，并最终命丧野根山。^[19]中冈的建议就这样加深了土佐的矛盾，同时加速了土佐勤王党的灭亡。

1864年6月，中冈返回长州，细致地策划一次希望土佐朋友都来参加的志士起义。一个月后他回到京都，但在路上就听说在池田屋密谋举事的人遭到突袭，阴谋已经泄露。长州的激进团体随后决定全力进攻京都。三田尻的浪人真木和泉是这次行动的领导者之一。他将带领他的“忠勇队”从一侧进攻。中冈属于预备队。他们认为

自己的目标是将天皇从邪恶的会津—萨摩卖国贼手中解救出来。中冈在8月19日的激烈战斗中受伤，但成功逃了出来。从他前天晚上给家人写的告别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情绪。“鉴于父亲年事已高，”他写道，“即将到来的这场战斗将成为我的一大遗憾，我可能会被认为是孝不之子，但这是没办法的事。虽然我出生于土佐山区，是个贫穷无知的乡下人，但是从懂事起便一直竭力追求忠诚和正义，假如我将为帝国和天子献出自己的生命，则死而无憾。”^[20]

然而中冈并没有死。他躲了几天，伤口痊愈后便返回了长州。9月5日，外国炮舰攻打下关的炮兵阵地时，中冈再次加入“忠勇队”，试图阻止登陆的盟军破坏和夺取岸上的大炮。结果这次又输了。不久之后，连吃两次败仗的长州勤王主义者便受到同胞的指责，并被认为是这一连串不幸事件的罪魁祸首。幕府准备派一支军队来征讨长州，外国人业已实施了报复，宫廷则已经将长州视为“朝敌”。对于恰当的路线有分歧的不仅仅是长州的上层阶级。平民百姓也对这种没事找事的局面提不起兴趣。他们从远处观看与外国人之间的战斗，后来还热心地帮助外国人装走作为战利品的大炮。萨道义写道，日本人的态度“非常友好”，并认为“看到这些给他们带来天大麻烦的玩意儿被运走，他们心里不可能不高兴”。^[21]

这样看，中冈现在得到了教训，并在9月9日写给土佐朋友的信中表示懊悔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已经从土佐的来信中知道，有23名志士在野根山事件中丧生。要不是听了他的建议，他们可能还活着。中冈将京都和下关落败的事情告诉了朋友们。宫廷看来已经决心开国，此后肯定还有更加令人愤慨的事情。濑户内海的平静水面

不久就会被外国船只打破。不过，中冈认为现在什么事也做不了。制造新的混乱或者脱离藩籍没有半点用处。大家能做的就是忍住泪水，静静地等待。对于天皇同意开国、允许外国船只驶入濑户内海的决定，他认为恰当的做法是由土佐藩主请求天皇重新考虑一下。在这个看似聪明的建议后面，中冈又连问了好几个问题，询问土佐的政治形势。勤王党是否还受到起诉？公共舆论的导向如何？谁在狱中？谁受到了惩罚？土佐东部的情况怎么样？^[22]现在他已经知道，个人或局部的英勇行为根本无法解决日本面临的严峻问题，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下关之战失败后，中冈一度在长州的民兵组织中担任侦察员。他曾去鸟取，看看那里的长州支持者是否有机会扭转藩国的局势，获得官方的支持。他还再次去京都审度那里的形势。所到之处的局势一点也不令人乐观。到处都是“观点庸俗”的保守派在掌权，而那些“正义的”勤王主义政党则受到打压。年轻的土佐大名山内丰范为了避免有任何同情勤王党的嫌疑，甚至将娘家是毛利家族（长州）的新娘搬到一旁好几个月。^[23]

12月16日，中冈回到长州后，被任命为忠勇队的统帅，与因过于鲁莽而在京都之战中丧生的真木和泉的弟弟共同领导。这不是一份容易的工作。忠勇队由日本各地的浪人和志士组成，由于遭受了连番打击，目前人数锐减且士气低沉。长州的保守派开始将藩国所有的麻烦都归咎于这些不受管束且行为古怪的浪人，并埋怨勤王派官员将他们招来。而且，勤王派官员即将在一段时间里完全失势。久坂玄瑞已经在京都自杀身亡。井上馨（当时叫“闻多”）差

点被一名保守派的党羽杀死，被迫长期隐退。^[24]另一位著名的勤王派领袖周布政之助则已切腹谢罪。讨伐长州的幕军先头部队已经逼近长州边界，此时保守派控制了藩政府，因此西乡的建议很快就被接受。1865年初，长州政府同意三名主政的家老自杀、藩主道歉、拆除山口的防御工事，并让1863年9月与长州军队一起撤退的剩余五名公卿离开长州。当局迅速处罚了有罪的政府顾问，三名藩国领导充满仪式性的自杀过后，许多攘夷和勤王运动的名人都失去了地位和影响力。和其他民兵组织一样，中冈的忠勇队也被解散了。

勤王主义者的梦想之中，唯一还有希望的就是保证落难公卿的安全。对勤王主义者来说，这些人变得无比重要，因为他们是自己希望的化身，提醒着大家，勤王主义是受到宫廷支持的合法行为。收留他们的长州正受到惩罚，他们不得不离开这里。幕府本来打算将他们羁押起来，但是这样将失信于长州。另外一个解决方法——这个方法被采纳了——是将他们转移到海峡对面的福冈去，那里的勤王派官员欢迎他们。不幸的是，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些勤王主义者（同样叫“正义党”）的政治未来，因为长州发生的灾难已经使各地的勤王主义蒙羞。

因此，这时就需要与其他藩达成协议，以保证几位京都贵族能够获得庇护。1865年1月，中冈为此跨海找西乡隆盛讨论。西乡派朋友萨摩藩士吉井友实和中冈一起返回下关。他们逐渐有了一个计划。更重要的是，中冈和长州的勤王主义者开始相信西乡是个爱国的正人君子，为他们以后的合作铺平了道路。^[25]

如何转移公卿的讨论仍在进行，但长州的政治形势却发生了急

剧变化。以高杉晋作的奇兵队最为著名的民兵组织，在投降藩政府后变得不安分起来。有消息说长州会把公卿交给江户，还有迹象表明藩政府将会对勤王派进行大清洗。民兵组织重新活跃起来。1865年1月12日，逃亡到小仓的高杉又出现了，这次带来了几名追随者，包括伊藤博文（当时叫作“俊辅”）和山县有朋。高杉一开始只有20个人，但是他很快便将支持者重新集结起来，并占据了主动。不久，原来的民兵组织便都团结到了他的周围。好几个星期事情都不见明朗，但人数上处于劣势的勤王派个个斗志昂扬，而他们的对手保守派则谨慎而又呆板。勤王派快速出击，势如破竹。3月19日，看到激进分子的意志和力量势不可挡，原本已经同意签署投降协定的保守派根本无法统治。于是长州藩的藩主在向祖先忏悔之后，同意按照新导师的要求去做。此后，长州藩便处于高杉和他那群勇敢的激进分子的领导之下。^[26]

不过，鉴于长州的政治局势一片混乱且极不稳定，似乎更有必要让京都公卿离开长州。2月9日，就在长州藩主向勤王派屈服的前一个月，公卿们离开了长州。土佐浪人，特别是中冈和土方，在转移公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卿们被送往黑田长溥控制下的福岡藩，中冈是护送的人员之一。

结果很快证明，大家对福岡藩勤王派的担忧不无道理。福岡藩与其他的大藩一样，这几年也饱受勤王派和保守派的分裂之扰。186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福岡藩都在勤王派的领导之下，其领袖是浪人加藤司书。加藤代表藩主参加了广岛举行的三十六藩会议，讨论第一次派兵征讨长州的问题，还和西乡制订出一个使长州同意回

到正轨的折中方案。现在，他正和西乡以及长州的使者（高杉也在其中）商讨，让公卿到自己藩国来避难的条件和保证。不幸的是，长州的政变吓坏了福冈藩的保守派，担心福冈藩也会步长州的后尘，被幕府派军征讨。他们不想造反，于是开始将司书及其党羽清除出去。1865 年底，他们的计划终于取得了成功，司书被勒令自杀，其追随者被驱逐出政府。然而，即使在那之前，公卿们在福冈藩的停留也危机四伏。^[27] 五名公卿一度受到监禁，彼此之间甚至不能接触。陪同他们的志士立刻将这种违法行为向上级汇报，在西乡和萨摩军队的介入之下，公卿们在太宰府的生活条件才得以改善。^{*} 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维新前夕。

尽管福冈藩新政府的态度矛盾而勉强，但是有萨摩藩的保护，公卿足够安全。接下来几个月，太宰府成为主要的指挥和阴谋中心。从长州的保护之下走出来的五名公卿成了国内的知名人物。坂本、中冈和西乡等人几乎每次去长崎或者鹿儿岛都要顺路造访太宰府。三条是公卿中最坚强的一位，在太宰府有一帮忠心耿耿的浪人追随。他可以将这些人派往京都或者长州。三条虽然失去了地位和官职，但是却有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力量。他和四名同党是京都支持勤王派的明证。

主角们现在开始各就各位，为维新最后几幕的开演做好准备。长州的政权被牢牢地掌握在高杉晋作及其同仁手里。国内政治牵动

* 福冈藩大名黑田长濬是萨摩藩的岛津重豪之子，因此，他可能会特别听从萨摩的建议。

着他们的心，而且他们正努力加强军事力量和购买现代武器，因此伊藤和井上的经验便显得非常宝贵。这些过去的攘夷狂热分子甚至一度讨论开放下关作为对外贸易的港口。大久保和西乡等人继续领导着萨摩藩，使藩政平稳运行。随着江户一意孤行地希望完全恢复旧日的权威，他们也变得越来越同情长州的倒幕激进分子。在幕府内部，胜麟太郎温和开明的政策被小栗忠顺新的专制思想取代，不久之后，这些政策将受到拿破仑三世的驻日公使罗修斯的支持和鼓励。

从志士到政治家

大量的资料表明，经过危险动荡的勤王岁月，这些激进分子的个人魅力大增，政治上也变得更加精明。他们不再相信个人英雄主义对自己的事业有帮助，对国家面临的复杂问题也有了新的理解。从这些人的书信中可以看出，经过险境的磨砺，他们开始变得自信，而且具有献身精神。他们展示出足够的勇气去实现这些，现在也具备了一些其他品质——慷慨大方、高瞻远瞩、小心谨慎。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已经变得自律。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上阵之前依然要喝上一番；中冈在公卿们被转移到福冈的前夕，便向朋友们提议说，不妨在冒险之前最后去一次妓院。志士们仍然是些“人物”，他们面对危险时无忧无虑的态度赢得了彼此和后代的喜欢。他们曾经对敌人非常地傲慢，现在则缓和了许多，而这是以前从未出现过的。

身经百战之后，他们已经变得镇定和更加可靠。

从 1865 年坂本给池内藏太的父母写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些变化。1863 年池内逃离土佐时，坂本曾经给他的父母去信，严肃地提醒他们，天皇的地位在一切之上（前文已经引述过）。池内参加了长州的民兵组织，参加了吉村寅太郎领导的大和起义，还是中冈的京都忠勇队成员之一。^[28]坂本将这次重逢描绘得既温暖又富有人情味，表明此时两位志士之间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写给土佐的信中说，自己已经到了一个叫作“下关”的地方，希望能在那里见到“藏”。接着，听说还需要三天才能到藏那里，他又改变了主意。突然，藏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住他的酒店。

我们拍手大叫，为这次意外的重逢和幸运而欢呼。藏一切都好，非常强壮。他问了我一些关心的家里问题。我们谈了一整天国家的事情，对未来的看法很接近。我们约定，再也不发起无用的战争，也不会为不起眼的小事而死了。迄今为止，离开土佐的人里面，因战斗而身亡的前后八十余人。藏参加过八九次战斗，尽管弹丸矢石飞过，但是一次也没有受伤，他为此自豪。他还说，在面对约百米外的敌人、四面八方飞来的炮弹和子弹时，自己依然站直了身子，大声地下达命令。击中对方大炮的炮弹响声震天。大多数人在看到敌人开炮时都会立刻趴下，但是藏却说，距离这么近，即便趴下也躲不过，反而不在意。他对此感到很自豪。

藏平时很独断，喜欢诋毁别人，也不是很慷慨，但似乎战

争的经历让他变成了优秀的男人。现在藏喜欢每一个人。我们在一起聊得很开心。匆匆不尽。^[29]

这种激动人心的生活与那种待在家里的单调生活比起来，不啻天壤之别！这些土佐人知道，如果遵循传统的价值观，此时他们正待在家里做孝子。我们没有其他人的证词来证明坂本变得优雅和慷慨，但可以说，只有他自己多少具备一点这些特质，否则不可能在朋友身上发现它们。不管怎样，他的信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么志得意满了。在胜手下工作的那段日子，他也学会了留心对手的能力和正直的品格。

中冈慎太郎信中体现出不断增强的政治意识，这一点尤为引人注目。1864年，这名极端分子曾怂恿土佐的朋友们起义，但是到了那年年底，他也只能无可奈何地听取别人的劝告，变得小心起来。他后来参加了长州的民兵组织，了解到西方科技的优点。1865年，中冈还第一次乘坐了西式的蒸汽轮船，船速和性能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30]在他看来，排外这条路已经行不通，在日记中和写给土佐的信件中都清楚地体现了这种转变。他甚至想亲自到西方去，但是认为自己不可能获得赦免。^[31]

除了信件之外，1865—1867年他写的一些日记片段，以及写给土佐同仁们的几篇时局综述也保留下来。从这些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随着武市及其随从的被捕和判刑，中冈在土佐勤王运动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只有符合时代潮流的有能力者，并且不在藩政府管辖之内的人，才能像中冈那样产生缓冲的作用。中冈在长州藩和萨

摩藩的经历，使他讲起藩国外面的趋势来头头是道，令人叹服。事实上，他也可以对长州的朋友讲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情。例如，1865年9月，木户孝允在长州遇到了政治难题，因为风传他计划开放下关港。这时中冈能够给木户写信，告诉他萨摩藩已经改变立场，支持开国。^[32]对于那些几乎接收不到任何外界消息的土佐志士，他甚至更有资格向他们汇报国内的政治形势。大部分土佐勤王党依然生活在武市在京都得势的影响之下。许多人依然相信攘夷在实际上和政治上仍存在可能，并怀疑那些改变立场的人都是卖国贼和叛变者。

中冈非常理解这种观点，因为不久前他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离开土佐以来的见闻和危险经历使他开阔了眼界。毫无疑问，这种新的老练源自他和长州人一起经受过的磨炼。不过，即便在那些繁忙的日子里，他依然有时间阅读。每一次的行动和旅行后面总是有好几天的等待和躲藏，而中冈总是把它们利用起来。我们在他的日记里发现他记录了自己的阅读习惯。他一直非常重视吸收前人的智慧，充分证明了这名庄屋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提到了“经”，并在其他时候列举了东汉光武帝纪、《大学》、《中庸解》，以及《孙子》。他提到了钦差大臣林则徐以及中国试图以武力对付英国人而造成的灾难性局面，也提到“长崎”和“长崎报纸”上刊载的消息。有意思的是，他还提到了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这是德川时代晚期福泽编写的一系列小册子，正是得益于这本书，日本各行各业的人才对西方有所了解。^[33]

中冈对自己政治观点的最佳阐述，是在高杉晋作在长州取胜后

不久写给土佐朋友的一封信。流传下来的原本被田中光显收藏，上面有给板垣退助的字样，可能是他希望写给自己的要人朋友从而影响藩国的政策。不管中冈这封信的目的是什么，他显然希望土佐的朋友们对国内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个大概的了解。

中冈一开始便写道，他注意到国内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几名重要的新人，国人应该留意到这一点。第一个便是西乡隆盛。他形容西乡是个粗壮的矮个子，有点像 11 世纪时日本北部那位著名的叛军首领安倍贞任。西乡聪明，有学识，勇敢而又经常沉默；虽然话不多，但是一旦说起来，每句话都极有深度，直指人心。西乡具有高洁的品德，这一点无人能比，还有丰富的经验。事实上，他的知识和行动相结合的方式与武市瑞山本人很像。除了西乡，长州的木户孝允和高杉晋作也是值得一提的新英雄。他们同样有勇有谋，知识渊博，而且已经展示了行动能力。

讨论过这些人之后，中冈接着谈到了国难的更深层面，质疑封建的分隔制度到底是利还是弊。他说，经过 300 年的和平，尚武的精神已经衰落，没有人对战斗感兴趣。藩国之间的隔阂造成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各方都自行其是。有的主张向外国人开战，至死方休，其他人则说这种方法行不通。这种争吵自然应该被视为封建分裂的一个弊端。中冈接着说，还有一些人赞同开国，以便向外国人学习。他们建议积蓄力量，学习现代的武器和机械知识，等这个过程完成之后，日本便有能力按照自己认为最佳的方式决定开国还是锁国。许多有识之士警告说，必须先实现“富国强兵”，然后才有可能向西方开战。中冈在阐述这一论点时的篇幅和力量都高过他论述攘夷

论，而且几乎无须再加上这么一句（虽然他还是加了）：“以前我无法接受这种观点，但是现在我相信它是对的。”中冈解释说，他的这一结论来自对水户、萨摩和长州的观察。这些藩国均试图采取直接行动驱逐外国人。他们失败了，但同时也促成了最终的解决方案。水户藩的内战、理查德森的被害以及炮轰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都有助于排除其他方案而想出新的解决方法。它们绝非失败，而是与国家神明有联系的有先见之明者的杰作。

中冈接着说道，死于京都的长州藩的久坂玄瑞就是其中之一。久坂是吉田松阴的弟子，学过英语，因此对外国人的精神非常了解。他经常指出，只要看看俄国的彼得和美国的华盛顿这样的人，你就会明白即使是在夷人的国度，危急之时也会产生团结和领导国民的英雄。他过去总是说，如果你不愿在某个时候采取直接行动，那永远不会有任何结果，因为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权衡成功的机会上面去了。中冈完全赞同久坂的观点。

为了证明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他举了两件事作为说明。第一件是理查德森被杀。这件事导致鹿儿岛被炮轰，看起来是个灾难，但是，它比任何事情都更让萨摩人团结起来，下定决心报仇雪恨。不论地位如何，只要是有能力的人都被召集起来——西乡就是从流放地被召回的——萨摩军队和政府的重大改革也开始了。

另外一件事则和长州有关。炮轰下关海峡的外国船只导致京都发生了骚乱。与外国人达成和解之后，幕府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压来。接着长州同意有条件投降，然后发生了内战。之后，木户和高杉与之前从英国回来的井上、伊藤一起，成为长州藩的新领导。

他们现在统一了长州的观点，长州藩在军事上采取了坚定的立场，藩内士气高昂，而且已经从空谈过渡到了行动。中冈解释说，长州的现代化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群手持西式枪炮的人。长州现在正在使用米涅枪、现代的大炮和骑兵部队，每天都有大量军队在训练，而且 64 个民兵队经常在一起操练。这些都是拜那场战争所赐。如果一开始没有动武，如果没有威胁，那什么都做不成。萨摩藩同样拒绝失败，现在已经建起了海军造船厂、大炮和海军。

中冈现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正如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所看到的，萨摩和长州将是未来能够搅动日本的两大藩国，而他们之所以能达到目前的地位，正是由于战争带来的种种好处。就像照镜子一样，我认为所有人都看得出来，不久的将来我们都将听从这两个藩国的号令。任何有朝一日建立“国体”和攘夷的希望，都必须寄托在这两个藩国身上。希望已经成为可能的事实，必须作为我们封建制度的优越性而记录下来。

但是，无论我们怎么提升我们的武士精神，怎么加强我们的国防，除非建立起自己的国家政策，否则永远无法变得比敌人更强大。那么，这个政策的基础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完成最高使命（大义名分），将所有权力交还给天皇，同时统一政府和祭祀（祭政一致）。当务之急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这一点。如果所有人，不论地位高低，都留心自己如何才能最好地抓住这个属于今天的巨大机会，那么我们依然能够将失败转为财富。有一天

我们回顾这些日子，将会发现这种外国病就像泻药一样，确实对我们国家大有好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好好地利用它。

信的末尾，中冈劝告朋友们在合作时不要过于看重地位的差别。^[34] 这名 1862 年为了救藩主而跑去江户的庄屋，现在正为拯救自己的国家出谋献策。他知道，如果不是这种多中心的封建社会，他无法如此自由地走动，要实现目标会更加困难。但是，就跟德川幕府的统治者一样，他也开始意识到分裂的封建社会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使民族团结的目标无法真正实现。中冈认为，真正民族团结需要西南的两个强藩进行合作。他现在和坂本一起，致力于加快这种合作的步伐。

萨长联盟

萨长联盟最初成立并非为了进攻，而是为了防御。萨摩和长州担心幕府会卷土重来，并再次出现 1865 年那样使勤王主义者遭受灭顶之灾的外国干涉。

一些幕府的保守派一直对与长州达成的和解协议不满。他们希望将长州藩的大名及其继嗣，以及太宰府的五名公卿一起押送到江户，并希望长州藩内部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惩罚勤王运动的极端分子。^[35] 30 多个藩国组成的讨伐长州的联军刚刚解散时，这些幕府官员就公开表明了立场。但那时已经太晚，无法修改停战协定了。

不久之后，就发生了高杉晋作及其勤王民兵队起义的事。现在大家明白，即便最初的停战协定也无法实施了，况且还有新的理由抱怨。

长州藩的问题虽然重要，但只是幕府与京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一个方面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幕府保守派与议会派之间分歧巨大，保守派主要由谱代大名组成，希望“严格”地遵守过去的做法，而像一桥庆喜和松平容保这类参加过京都国内政治斗争的人则知道，任何试图回到过去的努力都是徒劳。不久，双方便被迫利用京都宫廷来打压对方。

许多德川幕府的支持者都希望年轻的将军家茂能够亲自指挥对长州的第一次进攻，宫廷也希望他至少能来京都。然而幕府的保守派却反对这么做。他们怀疑庆喜和容保在京都会获得将军的重用，而且认为1863年和1864年将军的两次京都之行均毫无结果。与长州的和解协议达成之后，庆喜和宫廷的朋友们依然希望将军能够去大阪城，最后处理一下长州问题。江户的保守派没有答应。他们派了阿部正外和松前崇广两名老中到京都去，任务是将宫廷的卫戍部队换成他们带去的幕府常规军，同时将庆喜和容保的辞职信带回来。庆喜知道幕府的诡计，于是让宫廷下令，要求将军立刻到京都来。为了强调命令的严肃性，宫廷还命令两名到京都来的老中阿部和松前切腹自杀。判决并没有执行，但这次鲁莽的行为揭示出江户官员对形势的严重误判。事后两人都被解职了。^[36]

对江户而言，长州的勤王党起义使他们得以体面地走出这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将军的京都之行已经无法再拖延下去，保守派认为可以将此与第二次长州征讨结合起来，因为届时将军将亲自指挥。

这样一来，他们将重新夺回主动权。这些人相信，一旦幕府的军队逼近长州藩的边界，长州的保守派将会重新夺回政权，而接下来的投降将大大提升德川幕府在日本全国尤其是在宫廷的地位。

因此，第二次长州征讨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德川幕府在宫廷的地位。幕府一开始宣布的是将军会在处置完叛变的藩国之后再造访京都，而不是之前，但是后来计划发生了变化。征讨于1865年3月6日开始，而将军到6月9日才出发。（由于下文讲述的原因，幕府的军队12月才抵达西南部，直到1866年夏天战斗才开始。）在庆喜的安排下，将军的京都之行的效果超出了预期。宫廷不仅正式批准了这次征讨，还特别任命将军为征讨大都督。这极大地鼓舞了幕府，然而也使那些主要的外样大名感到恐慌。^[37]

主要的大名意识到第二次长州征讨的起因是为了效忠，于是以党派之争来看待这件事。他们知道，这次征讨是为了打压反抗德川幕府的一切可能性，于是便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回应。曾经出任——虽然不太情愿——第一次征长总督之职的尾张藩大名拒绝再次参加。曾经出任第一次征长副总督之职的福井藩大名（松平春岳的继任者）则在宫廷活动，试图阻止第二次征讨。池田（岡山藩）和浅野（广岛藩）认为这个方案不可能对自己有利。福岡藩的保守派自首次上台后一直紧密配合幕府的工作，但藩主黑田后来开始犹豫，后悔一开始答应了出兵。在西乡的努力下，萨摩藩一开始就对出兵的事情态度冷淡，后来更是加以反对。土佐藩也拒绝服从命令，理由是出兵肯定会导致藩内的勤王党人发生叛乱。他们早年与长州人合作过，现在依然蠢蠢欲动。^[38]

幕府的目的让各主要大名担心，尤其令他们深感不安的是，大家普遍怀疑江户的统治者正认真考虑在法国人的协助下，建立一套“现代”的中央集权制度。这些担心有许多实质性的内容依据，而担忧之下的危险则被放大了。

接替胜的小栗忠顺是接受法国人协助这一计划的重要人物。他认为，在取得对长州的压倒性胜利之后，将瓜分或者吞并整个长州藩，随后将以同样的方式对付其他可能的倒幕据点。幕府将在法国的帮助下，实现军事和技术的现代化，从而终止封建割据的局面，建立一个统一的由德川幕府统治的国家。

第二次长州征讨结束之后，这些计划才开始全面进行，然而准备工作则早在 1864 年春法国公使罗修斯抵达日本不久后就已经开始。这名拿破仑三世手下的官员刚刚结束了北非的任期，正摩拳擦掌地准备使自己的皇帝战胜英国，成为亚洲外交界的主导者。^[39]在炮轰下关和鹿儿岛的事件发生之后，萨摩藩和长州藩之间合作变得密切起来。1865 年后，英国公使巴夏礼越来越倾向于支持萨摩和长州。在此刺激之下，罗修斯也加快了自己的步伐。罗修斯发现幕府越来越愿意讨论细节问题。1864 年底，幕府的外交使团访问法国时，被比利时贵族蒙布朗伯爵的一席话打动。蒙布朗说，幕府应该打压封建领主，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他认为日本和四百年前的法国很相似，并强调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幕府的使节准备签订正式协议，但是他们的行动后来未能得到江户的承认。不过，思想的种子已经种下，这一行为并非毫无结果，军官、教科书、武器以及横须贺的造船厂和兵工厂开始转由法国人监督，形成德川时代晚期

的一个特色。甚至福泽谕吉也向当局请愿，要求全部依赖法国人的援助。

幕府越来越愿意利用外国人的帮助，这个现象无法不让人知道，而在各主要大名的眼里，这是 1865 年和 1866 年情报汇报中令人不安的一件大事。他们并没有对幕府打压长州的行动变得更加热心，因为意识到这么做是自取灭亡。

然而对幕府来说，外国人既是危险，又是潜在的助手。就在将军的队伍抵达京都时，一支外国舰队驶进了大阪湾，使这片最靠近首都的水域首次受到了“玷污”。在彻底解决入侵事件前，长州问题不得不退居次位。

西方列强要求宫廷完全同意之前签订的和约。他们听说将军和家老都在大阪，于是决定到那里抗议。外国使节现在有能力提出新的威胁，因为巴夏礼影响了他们，这些人警告说必要时准备直接到京都去。自从外国人的船只来到日本，将军重新凌驾于京都之上的愿望便从未实现过。各方经过细致的讨论，逐渐产生了一个新的希望，即成立一个由大名组成的议会，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有些人（例如西乡）认为宫廷应该将外事权完全从将军手里收回。^[40] 谈判陷入了僵局，为了迫使宫廷采取负责任的行动，家茂请求辞去将军一职，庆喜则四处游说，确保将军的请辞被拒。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天皇终于批准了几个主要的条约，以及除兵库外的几个港口开放。外国舰队离开了大阪。^[41]

在此期间，长州藩的危机却加深了。勤王党人控制下的藩政府丝毫没有投降的意思。高杉晋作和新的藩政府加强了防御和抵抗，

而此时幕府提出将宫廷的防卫工作全部交给德川幕府。这个提议暴露了幕府的目的，使少数几个可能支持征讨的藩国疏远幕府。长州藩斗志昂扬，幕府则士气低落。来到大阪这一幕府指挥部的士兵大多并非真正希望打仗，认为无须开枪长州就会投降。发现长州不肯投降之后，幕府被迫进行一场它负担不起又不愿全力以赴的远征。大阪地区所有可能的人都被强制借贷，甚至包括社会等级最低的“秽多”，进而加深了民众的怀疑和不满。军队无心打仗，幕府急于找到一种体面的方法结束这场战争。直到1866年7月18日，几次“最后”的出使均表明长州人决心抵抗到底，团结一致拒不投降之后，幕府的军队才开始出发。

在耽搁的这段时间里，坂本并没有闲着。我们记得，萨摩人打算让他负责一艘船，并利用他在胜手下服役期间学到的航海知识。他们说到做到，给了他一个独立的身份，让他成为一个最初名为“社中”（意为“公司”），后来名为“海援队”的简单机构的领导。萨摩藩的资金和保护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公司的总部设在长崎的萨摩商会附近，这说明了这家小企业牢记于心的目的：它可以在德川幕府管理下的一个口岸城市向西方商人购买物资，而不会牵连到萨摩藩。不过，坂本的身份是萨摩武士。1865年10月，他给姐姐写信，这么介绍他的计划：

现在，我带着二十余人已经到了长崎，在这里锻炼技能。

土佐藩派来的人中，有一人在西洋英国学问所学习过。三十余



海援队成员的合照

人从日本各地来，一起活动，真是盛事。我组织一伙人成立了一个暂时的商贸公司。今天我从京都给你写信，但是五六天后我将会回到西部。如果给我寄东西，请寄到伏见宝来桥的寺田屋伊助那里。那里离萨摩藩的公馆很近。附近的京桥还有一家名为日野的酒屋。这些酒屋我都很熟……让信差找萨摩藩的西乡伊三郎先生，把东西和你的信寄给他，他会转交给我。^[42]

坂本显然很喜欢这个新的企业，并将其与自己在“土佐那种地方”的活动相比较，他认为在家乡“不可能有任何抱负。在那里无所事事地浪费生命，简直是白痴”。坂本的“二十余人”都是一些老朋友，以及来自胜所创办的神户海军操练所的浪人（其中包括1894年出任外相的陆奥宗光）。他在长崎主要和外国商人打交道，

其中以苏格兰商人托马斯·格洛弗最为重要。德川时代晚期，格洛弗在武器进口和为倒幕的藩国出口学生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43]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坂本将公司业务扩展到为一些没有能力将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国际市场的藩国提供帮助。

这家公司一开始是帮助长州藩绕过幕府的封锁，购买武器。长州藩派去长崎的代表被严密监视，无法和外国商人打交道，但是坂本却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法。当然，他事先得到了西乡隆盛的首肯。经过初步协商，长州藩的领导派伊藤博文和井上馨来到长崎，并住进了萨摩公馆。他们的职责是监督与托马斯·格洛弗进行的谈判。凑巧的是，格洛弗正是 60 年代初将他们俩偷渡到英国的那名商人。

在坂本的帮助下，伊藤和井上在长崎买到了 7000 支来复枪。^[44]9 月，井上陪同一名萨摩家老去鹿儿岛，为萨摩藩的出手相助正式表示感谢。接下来还有对长州藩更大的帮助。1865 年 12 月 4 日，“联合”号汽船被以 37500 两银子的价格从格洛弗手里买下。有一阵子大家都不清楚这艘船究竟是属于长州藩、萨摩藩，还是坂本的公司——各方都认为这件事对自己最为有利——但最终还是决定这艘船为长州藩所有。这艘船被更名为“乙丑丸”，是迄今为止萨长合作取得的最惊人的成果。^[45]

接下来，在坂本的斡旋下，长州藩开始为萨摩藩提供军队所需的大米。鹿儿岛是个大米紧缺的地区，西乡急于为萨摩在本州的驻

* 德川时代末期，许多商人将在中国已经报废的商船卖给日本的藩国，从而牟取暴利。那些藩国急于购买装备，为将来的战争做准备。

军找到粮食补给。结果证明，这样的安排感动了木户。1865 年秋，萨摩藩和长州藩之间恢复了贸易往来。坂本等土佐志士经常住在下关的白石正一郎家里并非没有意义，因为白石在与萨摩藩的贸易中占有巨大的份额。^[46]

现在，萨摩藩和长州藩的统治者显然都希望订立一份更加持久的协议。还有另外一群人渴望此事成真，即太宰府的落难公卿。他们非常乐于见到一个致力于勤王事业的强大联盟成立。这些人被长州藩“搭救”，现在正处于萨摩藩的保护之下。追随他们的浪人也急于促成这种联盟。随着萨摩藩和长州藩之间的贸易关系开始形成，坂本和中冈一起去了太宰府，看看公卿们是否有兴趣为正式的协议增添一些声望，使之变得权威。坂本与三条实美进行了 24 次谈话，与东久世的谈话也有这么多。他和中冈都竭力劝说公卿们不应该以萨摩军将他们赶出京都来判断其意图，而应该看重西乡派军到太宰府保护他们一事。尽管说服公卿们克服对萨摩统治者的憎恶之感显然并非易事，但两人成功了。这件事完成之后，坂本和中冈又双双去见长州藩的统治者，努力使他们相信萨摩藩诚意满满。

坂本和中冈花了很长时间，才艰难地使长州藩领导相信萨摩藩。这难免让人有些意外，因为两藩之间业已有商贸往来，而且双方同样不信任德川幕府的保守派。^[47]他们在说服对方时遇到的困难不禁让我们想到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深仇大恨。长州藩的领导也开始自信起来。革命成功后，这些人又开始怀疑起萨摩人，因为萨摩人与保守派领导之间的决裂并不像自己那么激烈。

联盟工作首先始于太宰府的长州密探。他们飞奔回国，向领导

汇报坂本向公卿们提出的建议。1865年6月，坂本亲自前往下关，并在那里待了近一个月。^[48]关于可能结盟的消息在长州疯传，木户孝允从山口来到下关，与坂本商讨此事。坂本向他解释了西乡为使萨摩抵制长州征讨所做的努力，并保证萨摩藩的勤王派很有可能在藩国的政治斗争中取胜。

在此期间，中冈也没有闲着。1865年春他在京都，留心收集有关幕府意图和实力的各种传闻和故事。到6月底，他与三条实美的随从土方做出决定，认为自己有责任促成萨长联盟。他们一起离开了京都。土方去了长州，中冈则继续前行，到鹿儿岛找西乡。西乡同意从京都返回时在下关停留，与赶来见他的木户孝允会晤。外交谈判的一切准备已经就绪，然而西乡最终未能兑现承诺，中冈独自前去。他努力向木户解释此事，但是并不容易，因为这名长州藩使者觉得自己的藩国和事业再次受到了仇敌萨摩藩的侮辱。

1866年初，坂本劝西乡和大久保派黑田清隆到下关，重启与木户的谈判。1866年2月22日，木户亲自来到京都的萨摩公馆，准备与萨摩藩的统治者谈判。此行遭到长州人的极力反对，包括高杉在内的许多民兵队领导依然不相信萨摩藩的统治者。

木户连续十天会见了小松、西乡和大久保等萨摩藩领导。在此期间，坂本和池内藏太以及名为三吉慎藏的长州武士也来到京都。在大阪时，他们决定去拜访一位朋友——胜以前的举荐人、前幕府官员大久保一翁。他现在担任大阪城守护这一重要职位。大久保一翁警告坂本，一旦被幕府的衙役抓住就会送命。但是坂本不顾劝告，大胆地前往京都，并在过检查站时和朋友们自称是“萨摩武士”。

两名土佐浪人和他们的长州朋友——三个被幕府悬赏的犯人——就这样安全地抵达了首都。

1866年3月6日，坂本抵达京都，之后立刻了解了木户和西乡的谈判进程。令他震惊的是，十天的“会晤”完全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双方都不愿低声下气。西乡一次也没有提到结盟，让木户极为恼火，并准备返回长州。但是坂本并没有什么面子和声望可以失去，他从中调停，大力促成此事。在他的鼓励下，与会双方继续向前推进，直到谈判结束。^[49]1866年3月7日，长州藩的木户和萨摩藩的西乡、小松和大久保终于就结盟一事达成了一致意见，坂本龙马是现场的见证人。木户写给坂本的几条提纲成为协议的正式文本。

萨长联盟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恢复长州藩在宫廷的地位，同时阻止幕府政治上压制长州的计划：

一、一旦开战，萨藩立即增派两千余兵至京都，千余兵至浪华（大阪），压制京坂两处。

二、战若于长州藩有利，则萨藩与朝廷斡旋，尽力于长州藩救解。

第三条适用于长州失败的情况。

三、万一长州藩有败色，一年半之间绝不溃败，其间萨藩必须尽力支援。

第四条适用于持续和平的情况下。

四、若未及征长而幕兵东归，则萨藩断然上书，尽力申请立即免除长州藩冤罪。

第五条设想萨摩藩可能参战的情况。

五、……一桥、会津、桑名等若如向来之做法，拥奉朝廷，拒绝正义，遮萨藩周旋尽力之道，则萨藩遂起兵决战。

最后，第六条保证未来两藩将联合行动。

六、待长州藩之冤罪赦免，双方自当协心，为皇国粉身碎骨，且自今日起，合力协作，诚心尽力于朝威恢复。^[50]

两强藩间旷日持久的敌对斗争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幕府的不肯妥协和两藩共同利益的驱使是联盟必然成立的背景。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以及他们那些浪人同乡充当了调停人和劝解人。木户称他特别感谢坂本，并写信告诉他，未来几年他必将声名远播。^[51] 他的预言被证实了。正是因为坂本对萨长联盟的成立居功至伟，才获得了极大的声誉。

联盟已经成立，木户与黑田一起，乘坐萨摩藩的轮船返回长州。大久保返回鹿儿岛，向岛津久光汇报自己的活动。黑田清隆继

续前往太宰府，向落难的公卿汇报事情的进展。不久之后，萨摩藩便派官方使团访问长州，长州藩随后也派木户带领一个使团到鹿儿岛回访。

萨长联盟意味着幕府保持国内领导地位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同时也使幕府为了实现新的中央集权而打压藩国的企图更加不可能成功。诚然，现在言“落幕”还为时尚早。大多讨论仍围绕着修正、限制和重组幕府的主题进行。有效利用法国人帮助的幕府依然很强大，任何新的政治秩序至少都会慎重考虑他们的特权。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幕府内部并非铁板一块。那些能力和智慧超群的人，例如庆喜和胜，不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努力。他们的失败是没有目标，而不是因为缺少金钱或者物资。他们并没有完全依赖外国援助，因为作为负责任的爱国主义者，他们知道其中的危险和可能导致的谴责。

萨长联盟作为 17 世纪以来的第一个藩国联盟，在公然反抗德川幕府的领导权并获得了成功之后，很容易做出新的不服从行为。就在幕府考虑接受法国人的帮助期间，萨长改善了与英国之间的关系。1866 年夏，巴夏礼亲自到鹿儿岛访问。他和翻译欧内斯特·萨道义发现，与那些言不尽意的幕府官员相比，他们更喜欢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年轻统治者。前者永远不知道后台领导的真实意愿，因此永远无法开诚布公而有效率地和他们沟通。巴夏礼和萨道义开始觉得，英国应该转变方向，直接与宫廷谈判才可能有结果。

萨长联盟是德川幕府走向衰落的重要一步，坂本和中冈的努力，

不仅促成了萨长联盟，对德川幕府的最终垮台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促成两藩结盟之后，坂本和中冈忙着让土佐也参加进来。为此，他们通过坂本的海援队，继续从事各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易，同时也开始传播成立议会式政府的新思想。

第六章 海援队

萨长联盟成立后的几个月里，坂本龙马的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一开始他是一名被缉拿的浪人，并侥幸逃过了幕府衙役的追捕。多亏了一名他喜欢的女仆及时警告才得以活命，后来他娶了这个女人。长州征讨期间，他在鹿儿岛度过了一段悠闲的时光，直到参加下关海峡的一场海战。从那以后，他就在长崎忙于现在名为“海援队”的公司的业务。

多亏了坂本一手促成的萨长联盟，长州藩的统治者才得以坚定地拒绝德川幕府提出的投降要求。1866年夏，第二次长州征讨开战，幕府的军队遭到了严重挫折，颜面尽失。大家开始意识到，德川幕府的衰弱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以后，极少再有人提出公武合体。问题已经不再是幕府是否应该进行改革，而是应该怎么改，以及德川家族在新的制度下应该扮演何种角色。政治气候的变化影响了所有藩国领导。太宰府的落难公卿也感受到了，各方的使节都跑来寻找他们，使其声望直线上升。

1866年和1867年期间，各地都加快了富国强兵的步伐。各藩

国都在努力地利用对外贸易和西方的支持，其中最重要的一些业务就位于坂本的基地长崎。一直以来，这个港口就令德川幕府的管理者非常头疼，而机智的西方商人则在长崎为那些急于实现现代化的藩国提供帮助，为他们增加舰队和武器的数量，甚至让他们直接到西方游历一番。这些努力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列强的政策。英国致力于让本国的商人接触更多的人，做更多的生意，而法国则反对与地方大名做任何交易，因为这违背了与德川幕府之间签订的条约精神。他们承诺支持德川幕府，从而获得了近乎垄断的特别权益。对于那些不安分和心怀抱负的人而言，长崎确实是日本最刺激和最令人兴奋的地方之一，在那里的经历也使坂本变得越来越成熟。

日本各地的政坛正在重新确定立场，这一点在土佐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吉田东洋的弟子已经再次掌权。土佐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自强计划，以便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和外交做好准备。现在，政治上可供选择的路线似乎更少了，过去的怨恨也有所衰退。藩国不再有什么理由担心国内勤王党人的暴力行为，而关于萨摩和长州将结盟的警告也已经成为事实。统治者发现，一些长期以来被他们鄙视的浪人，居然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统治者有着非比寻常的友谊。他们原谅了这些人的傲慢和无礼，而浪人则对于效忠藩国和社会地位均有新的需求，因此很高兴地为这些新近才做出改变的上司服务。

这些改变在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身上显得尤为引人入胜。土佐藩原谅了他们对先前命令的漠视。坂本的海运企业得到了自己藩国的正式支持，他还得到了后藤象二郎的照顾。这位后藤就是五年前死于勤王党之手的吉田东洋的弟子。

寺田屋遇袭事件

到了 1866 年，幕府的治安机构对那些制造事端的浪人已经有足够的警觉，以致在处理嫌疑犯时已经不再问他们任何问题。浪人没有正式的资助者，除非暂时寄居在某个藩国的公馆里，否则他们的住处和集会地点——酒馆和娱乐场所——很容易受到那些专门对付捣乱分子的衙役袭击。

这些酒馆和令人愉悦的娱乐场所同时也提供女人。她们在这十年间参加的活动，使其成为适合影视节目和小说编剧刻画的对象。多亏了艺妓或者女仆的及时警告，许多志士才逃过一劫。1864 年，令长州损失惨重的京都禁门之变发生后，木户孝允被他喜欢的一名艺妓收留，后来这个女人成为他的妻子。1866 年使坂本化险为夷的那名酒馆女仆，不久之后也成了他的妻子。

关于坂本的妻子龙的详细资料，我们了解得很少。佐佐木高行曾经说过，她是“有名的美人，有着无可挑剔的完美五官”。^[1]但是关于她的勇敢则有大量的证据，因为这正是坂本在家信中所着重强调的。早在遇险之前，他就已经在赞扬龙了。由于与勤王党人有联系，1858 年，龙家也受到了井伊直弼大清洗的牵连。变故之后，家里异常拮据，龙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1865 年 10 月，坂本从长崎给姐姐和家里的老用人写信，帮他们回忆了以下这些人：

前些年赖三树三郎、梅田源次郎、梁川星岩和春日潜庵诸生为朝廷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当时他们的同志中有一位名叫

榑崎将作的医生，最近也病逝了，留下了妻子、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大儿子太郎相当聪明，次郎只有5岁。大女儿23岁，二女儿16岁，小女儿12岁。

这是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孩子们学过花道、香道、茶道等，但没有谋生技能。医生只做了一代就死去，也没有什么亲戚。他们的生活异常拮据，有时不得不向人家借一些生活器具，用后再还回去。他们先是卖了房子，接着卖东西，再后来，大女儿开始变卖她的衣服，免得母亲和妹妹这样做。

小女儿异常美貌，被无赖所骗，卖到岛原当舞伎，16岁的二女儿也被骗，没有和母亲说一声就被卖到大阪的一家妓院。5岁的男孩进了栗田口的寺庙当侍僧。

这时龙显示出了异乎常人的勇气：

大姐卖掉了自己和服，奔向大阪，找恶棍对质，她做好死的觉悟，怀里揣一把刀。恶棍见她凛然不可犯，便撸起袖子，露出手臂上的文身，并大声地恐吓。但她已抱着必死的决心，一下子冲过去，抓住恶棍的衣服，一拳打在对方的脸上，并厉声说假如不归还被骗来的妹妹，将杀了他。那个坏蛋喊道：“当心点，姑娘，信不信我杀了你！”她说：“要杀你过来啊。我来到大阪就不怕被杀。”他们毕竟无法杀死这个女人。大姐最终成功将妹妹带回了京都。这不是个传奇故事吗？最小的妹妹在岛原没有直接危险，因此她让妹妹暂时留在那儿。

坂本在信中接着详细描述了龙一家过去对土佐勤王党的支持，同时解释了警方的调查和没收财产对这个小家庭造成的困难。他向姐姐保证：

我说的这个女人真的非常有意思。她会弹筝，但是当然了，现在她不能想弹就弹了。在我们危难时她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因此我当然很乐意为她和她弟弟做点什么。我正在帮她把妹妹带回来。她也很急切地想见到你，乙女，就像你是她的亲姐姐一样。你看，你的名声已经传播到了许多地方。

坂本在信中请姐姐和用人给他寄一本“小笠原流的礼法书”，说是有人问他要。他还希望能寄一本《新叶集》给他，这是楠木正成时代的一本诗集。他同时希望乙女能够送“一条宽腰带或者是一件和服给这个女人。她渴望再次穿上和服。她的名字跟我一样，叫‘龙’。我问过她，她说是父亲在她出生时起的。”在信的末尾，坂本再次列举了自己要求的東西，以免有什么错漏，最后他又一次赞扬了龙：“我必须承认，她比我还勇敢。”^[2]

萨长联盟谈判期间，龙正在伏见萨摩公馆隔壁的寺田屋。伏见是最靠近京都南部的一个港口。这里是南北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因此幕府设有奉行所。以前，到江户去的大名都要在伏见驻足停留，因此在那里拥有住所（公馆），但是他们不得再靠近京都一步。到了德川幕府统治的最后十年，这些以前的规定已经成为一纸空文。伏见作为进出京都的港口，距离京都只有一步之遥，因此

成为志士密谋和组织的最佳地点，其地位也前所未有的重要起来。伏见的萨摩公馆只接待出差的政府官员，而周围那些小旅馆则接待与萨摩藩的活动有关的一些人，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寺田屋。这是一家得到官方特别许可的酒店，专门为运送官员和物资到伏见的萨摩船员提供住宿。浪人们无数次利用寺田屋作为密谋的据点，1862年春的那次集会是由勤王党人举行的第一次重大密谋，可惜被岛津久光破坏了。^[3]

1864年，坂本得到了萨摩朋友的庇护，此后便习惯于在那里住下来。事实上，就像他给姐姐的信中所说的，旅馆给他的感觉就像住在姐夫家里一样。坂本的身份是萨摩武士，因此受到萨摩的治安和司法管辖。通过这种方法，他无数次成功通过了幕府设置的关卡。酒店的侍女会非常偏袒客人，并在危险来临时保护他们，但这并不值得惊讶。寺田屋的老板是一个有着坚强意志的女人。坂本在信中表扬她“热心帮助那些有志于为长州和国家工作的人。她本来就有学问，能做好十个男人的工作……”^[4]正是在坂本的强烈推荐下，她才收留了坂本的爱人龙。

1866年3月9日，坂本从京都回到寺田屋，带来了萨摩联盟成立的消息。跟他一道并在那里等他的是名叫三吉慎藏的长州朋友。两人一起从下关过来，但是三吉留在了寺田屋，而坂本则继续前往京都。坂本回到伏见时，幕府的衙役已经注意到寺田屋中存在一名或者多名捣乱分子，于是伏见奉行派了一帮人来抓捕他们。同年秋天，坂本在给土佐的哥哥的信中描述了此事。也许这是德川幕府末期对这类常见事件描绘得最好的第一手资料，因此我们全文照录：



坂本龙马的妻子梢崎龙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伏见之难发生在正月廿三日夜半八点半（1866年3月8日）。我和三吉慎藏在一起。我们洗完澡，刚准备睡觉，忽然听到了奇怪的声响。听起来像是有人正悄悄地在下面走来走去（我们在二楼）。接着，同个地方又传来了六尺棒碰撞发出的乒乓声。就在这时候，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个女人（名字叫龙，现在成了我的妻子）不顾自己的安危，跑上来警告我们说：“小心！敌人突然闯进来了，一些手持长矛的人已经上了楼梯！”我一听，立刻跳起来，匆匆抓住自己放在隔壁房间的袴、两把刀，以及一把六发式左轮手枪，然后蹲缩在房间的最里面。三吉慎藏穿上袴，佩好好两把刀，手里

握着长矛，随后也蹲下了。

很快便有个人努力想把障子拉开一条缝，他一看到我们的刀便大叫起来：“谁在那里？”他正准备进来，看到我们已经做好了防御准备，于是又退了回去。过了一会儿隔壁房间传来了嘎吱声。在龙的指示下，吉井拉开了里屋通往隔壁房间的滑动门，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屋里已经整整齐齐站着20个手拿长矛的人；他们还提着两盏窃贼用的灯笼，除此之外，到处都是手持六尺棒的家伙。我们彼此怒视了一会儿，接着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忘了不可以这么侮辱萨摩武士。”敌人朝我们走过来，一边大声谩骂：“噢，是吗！下来！”

这时，有个手拿长矛的家伙已经上到楼梯的中间，正朝我的方向冲过来。他在我的左侧。我想，如果我的左侧有根长矛的话，它可以从侧面攻击我，于是我调整了自己的位置，改为面朝左。接着我扳动扳机，从右到左地恐吓全部十个长矛兵。他们全都吓跑了。就在这时，其他敌人开始向我们投长矛，还有炭火盆，你可以想象，房子里实在是一场混战。我们击中了—一个敌人，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死。

有一个敌人从障子的阴影处向我们袭击，他手里拿着一把短刀，砍伤了我的右拇指的指根，劈伤了我的左手拇指的指关节，还切到了我的左手食指关节的骨头。当然，这些都是轻伤，我很快将手枪对准他，但他迅速地回到了障子的阴影里。这个家伙向我扑过来时，我朝他射了一枪，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打中他。我的手枪是六发式的，我已经打了五发，现在还剩一发。

我觉得应该好好利用这发子弹，于是战斗变得安静下来。接着，有个戴黑头巾的家伙拿着长矛沿着墙壁向我冲过来。我一看见他，立刻又扳动了手枪扳机，这一次我利用手持长矛站立的同伴的肩膀为枪托，因此能真正地瞄准那个人的心脏。看起来我们周围都是死人。一些人正垂死挣扎，在我们前面爬着，他们看起来就像要睡着了一样。

敌人从一开始便发出可怕的声响，好像正在撕毁障子和拉门、砸烂门板似的，但是他们一次也没有到开阔的地方来。现在我决定应该重新给手枪上子弹，于是将弹膛取出来。但是尽管我装了两颗子弹，却无法把它装上去。因为我的左手指和右手都受伤了。我把它（弹膛）掉在地上了。我在地上寻找，当然也摸了毯子下面，它显然掉进了火盆或者什么东西里面，找不到了。虽然看不到一个人，但敌人一直在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接着我把手枪扔了，对我的同伴三吉慎藏说：“我把枪扔了！”三吉回答说：“那我们冲进去和敌人搏斗吧！”但是我说：“我先看看是否能从后面出去。”三吉一听我这么说，也扔掉了手里的长矛，我们从后面的楼梯走下来。我们发现敌人只监视作为酒店的那部分建筑，没有一个人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穿过酒店后面的檐下，打破窗板进到里面，屋里的人都睡眼惺忪地钻出了被窝。我们在卧室里。这实在是糟糕，不过我们已经决定无论如何也要穿过这座房子到城里去，即使打烂所有东西也在所不惜。这是一所很大的房子，要穿过去需要破坏很多东西。我们俩一路乱砍乱劈，乱踩乱踢，终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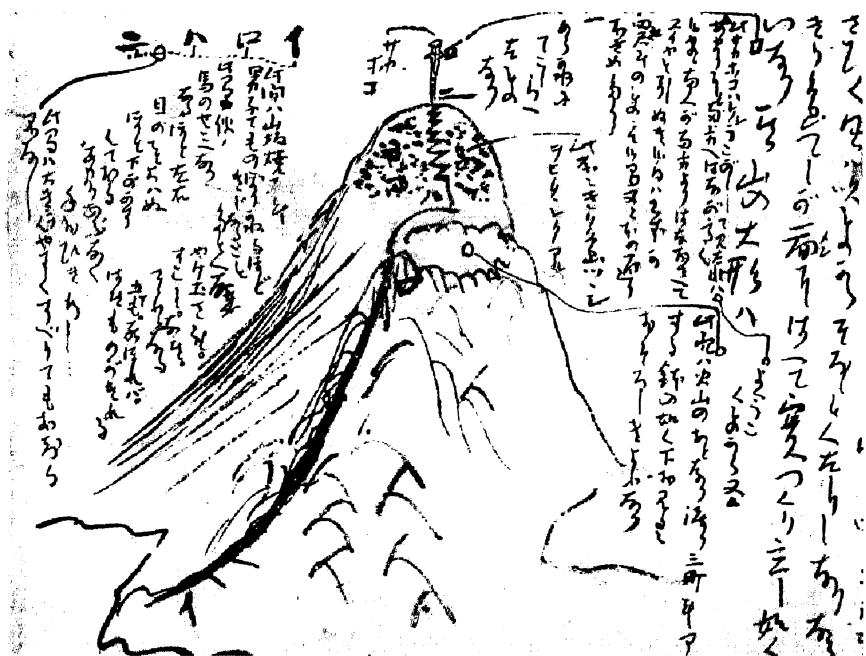
成功了。我们穿了出去，来到城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这真是太幸运了。我们一口气跑过了五条街，我的伤越来越严重，更不要说上气不接下气了（你知道，里面没有穿长和服你是不会出门的，但是因为我刚洗完澡，所以我只穿了一件浴衣和一件棉袍，没有穿袴。）我的脚和我的衣服一样可怜，我逃跑的样子非常狼狈。

我们来到横町和一个叫作“新土佐城壕”的地方，就在离水门不远的地方。我们从后面进了一所房子，爬上一个木架，并试着睡觉。此时一只狗开始不断地对我们吠叫，麻烦依然没有结束。我们逃出来了。过了一会，我建议三吉到（萨摩）公馆去，于是他设法到了那儿。接着公馆的人立刻赶来把我带了回去。我伤得不重，但是刀子可能划破了动脉，因为血一直流，直到第二天都没有减弱的迹象。那三天里，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去小便……^[5]

坂本这段著名的描述，自然而然地吸引了那些有才华的通俗小说家和电影导演。当两名亡命浪人，又气又怕地在黑暗中一路踢打，穿过整座房子时，你能感觉到他们的脑子里需要具备一些勇气和力量。坂本的这个形象已经牢牢固定在今天日本人的脑海里，在很大程度上得感谢那些影视作品。对于喜欢看暴力和动作戏的人来说，那些装有推拉门的西式酒店，很容易就在纸和糨糊建造的日本酒店面前黯然失色。

伏见奉行抓捕两名浪人未果，继续监视了一段伏见的萨摩公馆。两名浪人就躲在里面，然而萨摩藩的军事领导西乡和大山并不会被幕府的耀武扬威吓倒。他们没有按要求交出自己的客人，一个星期后，西乡派吉井友实从京都带领一队士兵护送坂本和三吉到京都的萨摩公馆去。幕府的衙役也喜欢息事宁人，而坂本和妻子龙在京都的公馆会合，终于可以安全地休息了。^[6]许多朋友牵挂坂本，听说他有生命危险后，一个个都非常着急。这反映出了坂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木户写信告诉坂本，自己很担心他的安全，听说他顺利逃脱后才放下心来。^[7]中冈慎太郎则跑到京都确认坂本安全无虞。西乡给他找了一名医生。4月14日，坂本和妻子与西乡一起离开京都。同行的还有萨摩藩的家老小松清廉和吉井友实。跟这些人在一起是不可能受到幕府袭击的。他们把三吉送到下关之后，于5月24日抵达鹿儿岛。三吉受到了长州藩政府的表扬和提拔，还获得了额外的薪俸作为奖励。^[8]

在鹿儿岛，坂本住进了小松清廉的家里。这位土佐浪人就这样成了萨摩家老的座上宾。小松和西乡的回国是为了向久光汇报萨长联盟谈判取得成功的详细经过。坂本和新婚妻子则度过了一段悠闲的时光。这是他们的蜜月，在这期间，坂本的伤势也得到了恢复。他给姐姐写信，讲述了他在雾岛泡温泉、爬山，以及在各地旅行和观光的快乐。7月13日，他离开鹿儿岛。^[9]对他来说，这是危险行动之前的间歇期。



坂本给姐姐写的信，描述了新婚旅行的细节

第二次长州征讨

长州与幕府之间的战争一爆发，坂本在萨摩藩的假期也随之结束。6月5日，他从温泉度假地回到鹿儿岛，7月13日驾驶着从托马斯·格洛弗手里买来的“联合”号汽船向下关进发。这艘船现在叫“樱岛丸”，注册地仍然是萨摩藩。萨摩藩正打算把长州捐赠的大米连同这艘船，一起还给原来的主人，船的名字随后也将更改为“乙丑丸”。船到达下关海峡的时间非常及时，使坂本刚好可以参加7月28日与幕府之间的海战。

幕府的这次长州征讨，结局非常悲惨，而且对日本影响巨大，因此这里要简要叙述一下。幕府为了镇压一个尚武的藩国，将那些不情愿的附庸召集起来。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昭示幕府内部的无能了。战争的结果壮大了倒幕派的力量，令志士们兴奋不已。

我们还记得，1865年7月将军家茂抵达大阪，标志着他将亲自指挥第二次征长战争。但一支外国舰队随后来到这里，要求宫廷批准条约生效。于是，接下来的几个月，幕府都忙着处理这件更紧急的事。经过多次的争吵和斡旋，1865年11月22日，宫廷终于批准条约生效。外国人离开，兵庫开港的时间被推迟，扫清了处理长州问题的障碍。

1865年12月，德川幕府在处理长州问题时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境地。^[10]幕府握有皇家的授权，但却无法调动各藩对战争的热情。包括一桥庆喜和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在内的一些幕府领导都支持“强硬政策”，这部分是为了保住他们自己在江户的地位，部分则是因为相信有必要重建幕府的权威，让大家知道幕府的地位在任何可能的对手之上。然而大多数大名却表示反对，因为计划的成功只对幕府有利，会威胁到他们自身的安全。将力量用于内部倾轧也可能导致外国人人侵或者国内发生骚乱。幕府原本以为，只要进一步展示武力，长州就会乖乖投降，但是他们错了。幕府接二连三地派使团与长州藩的代表接洽，结果均无功而返。不过，长州藩政府也非常小心，不表现出公然违抗，从而保证了不会有立即的军事行动。他们渴望有更多的时间准备，同时意识到必须设法赢得其他藩国的支持，因此，幕府失去了打击的理由，但和解的希望也同时受挫。

就在老中小笠原长行与长州的无果谈判进行期间，幕府的领导层内部以及在广岛长州边境集结的军队中出现了明显的不满和分裂迹象。胜的朋友、坂本的熟人大久保一翁明确反对采取军事行动。松平春岳的代表中根雪江同样大力反对。尽管依然失宠，但胜本人也反对战争，即便其政治地位可能使他在说这番话时必须小心翼翼。大多数反对者的理由基本一样：迄今为止，征讨已经耗费了大量的金钱。30多个藩国听从指令，集合军队，但他们的给养需要耗费来之不易的金钱。这些钱应该用于抵抗西方人。再说，各藩的军队和他们的指挥官显然都不喜欢打仗。他们来时以为政治打压就已足够，对真正的战争并没有做充分的准备。许多在场的大名急于让自己的军队回国，担心没有军队藩国会发生骚乱。大名们纯粹是从形式上响应幕府的号召，显然不愿将自己以后可能会用到的军队交付给幕府。另一方面，庆喜等人则认为，正是因为征讨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的财力和声望，现在才不能无功而返；而且，幕军具有压倒性优势，最后取得胜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反过来看，在危险和孤立面前，长州藩出现了两年前所没有的团结和决心。大家已经知道幕府试图强迫大名（毛利）及其继承人退位，并计划削减藩国的面积和十几万石的收入。我们可以预料，这类威胁完全能够将所有人团结起来，反对德川幕府的要求，因为它们影响到所有武士的声誉。收入的减少也将危及所有的统治阶层。因此，所有人都义愤填膺。与此相反，幕府的统治阶层内部的意志则非常不坚定。而且，极端的勤王派领导人一直在不遗余力地煽动民众的热情，使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御敌。他们四处分发小册子和

声明，让民众明白无误地了解这场战争的目的和必要性。以高杉的奇兵队最为著名的各种民兵队，其成员均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非常适合在非武士群体中传播这类决心和精神。长州正在变成其领导人后来希望全日本变成的样子：“一个全民武装的国度”。他们轰轰烈烈地购买和进口西式武器，大大增强了军事实力。与幕军之间的谈判也为长州军队的演习和操练争取了时间。

长州藩政府小心地延长着这段对自己有利的时间，在此期间，他们的实力增强，而幕府的决心则在慢慢消退。说实话，要阻止那些希望立刻进行全面战争的人并不容易。一群奇兵队的忠实拥趸对拖延感到不耐烦，偷偷地越过边境，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进攻敌人。藩政府不得不加派警力，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6月13日，小笠原长行向长州藩代表下达了幕府的最后通牒。虽然庆喜为了留住支持者而做了一些修改，但是这些条款依然与第一次长州征讨结束时签订的协议有本质上的区别。除了规定毛利家族的孙子继承大名，以及削减10万石的领地之外，他们还要求长州对早年积极参加勤王运动的支藩进行惩罚并保证其不再犯。长州藩政府显然不可能接受这些条款，除非自去年开始主宰藩政的极端主义者已经事先被驱逐。不过，他们并没有一口拒绝，而是要求多给点时间，让他们好好考虑一下这份最后通牒。他们的愿望达到了，但是最终结果并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在幕府的要求下，天皇下令其惩罚藩臣。

当各方正忙着准备开战时，一系列不幸事件降临到了幕府领导人的头上。已经持续了将近一年的征讨费用不断增加，使食品价格

高昂，以致市民和幕府的军需部非常苦恼。大阪发生了骚乱，并迅速蔓延到德川家族领地内的其他大城市。在每一处发生骚乱的地方，幕府都不得不面对暂时丧失权力和声望的局面。它不顾一切地寻找金钱，并强制性地向自己管制下的所有商人和团体借贷。在大阪地区，它甚至向商家承诺几年内将不会再麻烦他们。根据一些权威人士的说法，对国内骚乱的担忧进一步阻碍了幕府的行动，迫使其将最精锐的部队留作己用。

好几处地方的起义导致了当地政权易手，为萨摩领主拒绝出兵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理由。当然，尽管幕府开始收到消息，称萨长之间非常有可能结盟，但迄今为止还不知道萨长联盟的事。萨摩藩在回答出兵的要求时，提到了国内外面临的问题，并说风险太大，不应该进行内战。萨摩藩拒绝出兵对幕府来说是个不祥的预兆，不久一些藩国就听说了这个消息，并纷纷仿效。这种公开对抗使幕府的期望变得相当复杂。同样重要的是，这一行动向长州藩的领导人表明，萨摩藩遵守了与自己有关的那份协议。人们期待坂本可以监督和支持他一手促成的联盟。他在9月份写信告诉木户，萨摩藩已经遵照约定，派了七八百人去到大阪，萨摩的代理五代友厚也在积极地为长州购买军火。^[11]

萨摩藩之后，幕府迎来的第二个打击来自广岛藩。广岛是征讨军的集结区，由于特别的征费和需要，经济上已经遭受严重的损失。藩政府认为自己已经贡献了力量，因此决定不再出兵。

福岡藩的情况进一步凸显了幕府的无能。保守派上台后，许多政府官员因为涉嫌与长州以及来到本藩的落难公卿合作而被处死。



五代友厚，明治时期著名的企业家

就在福岡藩政府准备听从幕府的要求，将公卿送往江户时，大山纲良和黑田清隆带领一队萨摩士兵，前来保护公卿。^[12]强制执行命令显然会导致与萨摩直接发生冲突，幕府的密使对此束手无策。7月，第二次长州征讨就这样在无望的情况下开始了。

幕府原来的计划是想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长州。由彦根、广岛、福山和纪伊组成的陆军主力部队将从广岛和岛根陆上边界发起进攻；由松山等四藩组成的两栖作战部队将进攻长州东南边界上的上关通道，这里因一个岛屿名字而得名；由熊本、柳川、小仓等藩国组成的九州部队将进攻下关；与此同时，萨摩和久留米将率领另外一支两栖部队进攻萩藩。结果，萨摩和广岛没有参战，导致广岛一线的前线有些松懈，无法发动对萩藩的进攻，但是其他地区的行动则按计划开始。这次行动牵涉到32个藩国，它们大多希望

自己的精兵损失越少越好，而且决心只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要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至少也需要优秀的指挥官和高人一筹的军备，事实证明，这两样东西幕府都没有，他们只有在海上才有明显优势，但即便是海战，长州人大胆的冒险战术也弥补了力量上的不足。

一开始，佐幕的军队便炮轰并成功占领了近海岛屿大岛和上关。但是，没过几天，奇兵队便登陆成功，高杉亲自驾驶小船“丙寅丸”（即之前的“天道丸”），大胆地穿梭在幕府的船只中间，打乱了他们的作战计划。不到七天，大部分的幕府军队已纷纷撤退。在部署着最精锐幕军的广岛边界，战斗难解难分，但是幕军指挥官本庄宗秀没有心思打内战。不久，他便制订了一套休战计划。尽管他被解职，彦根等藩的军队使战争又延续了一段时间，但是长州藩取得胜利，攻进了广岛。幕府的最高指挥官辞职，不久，前线的战斗便真的停止了。长州和广岛私下签订了一份停战协议，结束了双方的对峙。在日本海沿岸的岛根（石见）前线，长州藩的指挥官大村益次郎留下了一份很好的记录，描绘了他们是如何打败指挥官一点热情都没有的幕军。^[13] 看起来这里也马上要进行停战谈判，但是谈判还没开始，滨田藩的军队就弃城而逃，任由熊熊烈火烧毁了本藩的城堡。

现在只剩下关前线了。坂本驾船从鹿儿岛前往的就是这个地方。驻守在九州小仓的幕军指挥官是小笠原长行，统率着小仓、熊本、久留米、柳川和唐津的军队以及一千幕府直属军。他们的计划是横渡海峡进入长州，但是高杉的奇兵队和山县有朋率领下的长州军队

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们，并准备自己渡海。在下关开战前不久赶到这里的中冈这样描绘当时的情况：

这里的食品价格已经变得非常高，其他地方也是一样。一升米的价格翻了一倍还不止，真是太可怕了。不过，每个人看起来都过得好好的，生活一切照常，你甚至看不到下层人民很痛苦的样子。这个地方特别富裕，不缺大米和金钱。他们说即使战争继续，土地无法耕种，他们的粮食储备也够吃上三年。由此你可以看到决心战斗到底的长州藩已经为英勇战斗的士兵准备好了粮食。^[14]

战斗爆发前夕，坂本驾驶着原来的“联合”号汽船来到下关。他停靠长崎，把妻子留在那里，并与各方交流磋商如何处理原来长州藩送给萨摩藩大米的问题。^[15]抵达下关后，高杉晋作要求他协助即将爆发的海战。坂本很高兴地同意，他手下的那帮浪人也愿意听从长州藩的调遣，全力以赴投入战斗。幕府有五艘船在海峡，高杉需要“联合”号加入，以便在数量上与对方持平。然而幕府的军队非常小心（坂本在画给哥哥的作战示意图上说：“这些幕府的船只没有参战，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而与几天前在大岛战役时一样，高杉制订了富有想象力的引人注目的冒险计划。他的战舰大胆地轰炸九州那边的炮兵阵地，攻击门司、坛之浦等防御工事。在炮火的掩护下，奇兵队成功登陆对岸，并对幕府的地面部队展开进攻。但是，首次登陆只是一次突袭。高杉的奇兵队速战速决，摧毁了敌人可能

用来袭击长州的小船后就撤回下关。这次作战时间虽然很短，但是坂本却很高兴自己能参战。他写信告诉哥哥：“这是我做过最有意思的一件事。如果我把一切写下来告诉你，你肯定不会相信，但这就是战争。”坂本强调幕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同时写道，高杉在作战前让自己的士兵都喝些酒以提振士气。首次交锋的损失少得惊人。正如坂本所说，“以前，一说到战争，我们总是以为会死很多人，但现在即便是一场很激烈的战斗，也可以只损失十个人”。^[16]

几天后，坂本又一次离开下关海峡。这一次高杉充分利用了幕府的弱点和犹豫不决。小仓是长州藩第二次进攻的目标，但是反对战争的熊本指挥官并没有派兵支援它。幕府的军队也没有对自己的盟友施以援手，因为在秘密听说将军家茂在大阪病重的消息之后，小笠原放弃了战斗，前往大阪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战。这样一来，封建分裂的局面再一次变得极为明显。不过，小仓的军队拒绝投降，与长州的军队进行了绝望而毫无意义的战斗。最终，小仓城被烧毁，长州藩获得了下关海峡的绝对控制权。包括田中光显在内的一些土佐浪人也参加了这次战斗。^[17]

当时正在太宰府的中冈对战斗的结果丝毫不感到意外。他向土佐汇报说，尽管幕府的军队二十倍于长州，但长州依然取得了小仓登陆等各种胜利，而且其军队斗志高昂。一支 140 人的队伍，伤亡人数达到 100 多人。靠着坚强的意志，他们横扫战场，并俘获大量的粮食、武器和弹药。^[18]

1866 年 8 月 29 日，不愿投入更多兵力的各地幕军要么被困要么被打败，士气低落，将军家茂则在大阪城去世。他亲自指挥的这

场旨在重振家威的伟大战争就这么以自己的去世而告终。此时正是幕府全面溃败的艰难时刻，因此直到9月28日，幕府才对外宣布他的死讯。这为全面停战提供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幕府派胜到小仓下关前线，与长州藩代表洽谈停战事宜，并于10月10日签署了停战协定。

就这样，第二次长州征讨以幕府的彻底失败告终。这场战争不仅没能重振德川幕府的声威，反而使它的弱点和分歧暴露无遗。从此以后，幕府不仅需要全面的和解，还依赖外部的大力帮助。

不过，好几个月里，幕府都必须将精力用在解决将军继任者这个问题上。庆喜被任命为征讨军代理总指挥，本来应该继续征讨，现在希望全面停止战斗，但这疏远了那些原本支持他的主战派。

对志士来说，幕府的惨败和将军的去世使他们重新自信而充满希望。随着那些地位较低的活跃分子越来越乐观和傲慢，京都再次陷入了混乱。但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那些有才华的人开始思考如何建设国家的问题。

坂本现在看到了自己公司的新商机。他的本钱和财力很快就用完了，因此需要获得新的资助。公司主要资产是一艘纵帆船，但这艘船连同九人一起被击沉了，其中包括老朋友池内藏太。长州现在有更多机会与西方人直接交易，不再需要坂本这样的人。萨摩的情况也一样。现在他们可以公开反抗德川幕府的统治，不需要再资助坂本的活动。因此，从逻辑上看，坂本需要一种新型的帮助和资助，而这种帮助最好是来自土佐藩本身。

因此，长州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月里，坂本都在设法恢复与他和

朋友们曾逃离过的土佐藩之间的共识。他仔细研究了土佐官方政策的走向，认为他们可能会接受自己的意见。就像坂本是航海方面的权威一样，中冈慎太郎现在是土地政策方面的权威，他写信给藩政的制定者，与他们辩论实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他指出，全面改革以后，土佐可以与长州保持一致，而且，正如他现在所看到的，土佐将与大部分的西方国家保持一致。土佐藩政府已经不再害怕国内的勤王党人发生叛乱，同时也明白容堂的公武合体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希望，因此准备重返国内的政治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好好地利用这些前家臣所创造的机会和影响力。

土佐的变化

1863年容堂返回高知，重新主持藩政，结束了吉田东洋死后政治上摇摆不定的状态。1864年，容堂返回京都，参加为修复幕府与宫廷之间关系的会议，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又回土佐待了几年。他对外称病，不再提出什么建议，但事实上却忙于打猎和主导藩内的改革事务。不管怎样，这段时间幕府很少咨询他的意见，也极少要求他参与政事，其强硬态度最终导致了第二次长州征讨。容堂与岛津久光、松平春岳一样，选择远离国内政治，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以一名行政、军事和财政均已恢复的藩国首领的身份，重返国内的政治舞台。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显然，这涉及镇压和

惩罚那些出身低下的勤王派领导。他们杀害了吉田东洋，并在此后不遗余力地尝试颠覆政权。但是，对那些出身世族大家的无能领导者，容堂同样感到不满。他用提拔上来的中级武士，实际上是吉田东洋的朋党替换了他们。

这些措施必须缓慢谨慎地进行，因为对吉田集团的偏爱与镇压当红的勤王派结合，很可能使藩国各地的乡士和庄屋更加愤怒。藩政府意识到自己失尽了民心。这种不安全感正是杀掉武市的部分原因，因为他被认为是罪魁祸首。土佐的这种局面也是其未全力支持第二次长州征讨的一个很有利的借口。

藩政府一直都小心行事，直到勤王党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下。政府将下级家臣（主要是乡士）聚集起来，让他们听取年轻的大名丰范有关克制和谨慎的训话。^[19] 为了避免激怒他们，藩政府也没有积极地参与国内政治。对于那些摇摆不定的行政人员，藩政府在使用时也比往常更加谨慎。佐佐木高行因在情感和认识（而非他们的策略）上倾向于勤王党而广受同僚诟病，工作岗位经常被变动，以避免他与随处可见的下级勤王党人有过多联系，增长他们的信心。^[20]

但是随着秩序恢复正常，容堂逐渐需要一些有才干和魄力的官员来主导重建计划和改革，因此就又找到了吉田东洋的追随者。这些复出的重要官员从吉田身上看到了土佐通过官方贸易而富强的前景，他们还认为可以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使国家变得强大。这必然造成了他们与拥护幕府、支持攘夷的保守派对立，比如小八木五兵卫。他们也无法获得勤王党人的支持，因为后者仍然喊着“尊攘”

的口号。^{*}吉田派深信，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开国政策。他们一直在努力奔走，直到勤王党人看到了他们的成果并相信只有充分利用开国带来的好处，才可能实现王政复古。

德川时代末期，主宰土佐政坛的是后藤象二郎。他是吉田的弟子，在吉田遇刺的那天晚上和老师在一起。后藤意识到自己的危险，于是在接下来极端勤王浪潮高涨的几年，聪明地离开了土佐，不再抛头露面。他到江户学了几年航海技术，熟悉了西式船只航行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后来，等容堂稳定了土佐的政治形势之后，他才于1864年春回到家乡。有一段时间他仍然避免引人注目，而是悄悄地与另外一名吉田的弟子岩崎弥太郎一起，为继续恩师的事业出谋划策。计划拟定之后，他们利用容堂每月为家臣举行一次的诗歌鉴赏会，将其提交给了容堂。为了逃过政敌的审查，后藤决定用汉文书写自己的观点，这对当时掌权的保守派的能力实在是一种有趣的注释。^[21]当时和以后，后藤的思想和策略都被证明非常具有弹性，甚至能让他从不久前打算杀死自己的志士身上看到了他们的能力和前途。他的个性勇敢，态度坚定，非常专一，又具有一定的幽默感，成为同事们里的一个“人物”。[†]

后藤的好朋友、同样受到吉田东洋提拔的岩崎弥太郎的出身

^{*} 当然，土佐存在许多派别。实际上，几乎包括勤王、攘夷、开国和佐幕等派之间所有可能的组合。于是产生了极为保守的佐幕—攘夷派，与之相对的是通常被称为佐幕—开国派的吉田派。

[†] 有件事让后藤给志士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即有天晚上后藤在去妓院途中遇袭，他打败了袭击者后平静地继续前行。

比后藤低很多。作为一名地下浪人（即将乡士身份让与他人以后的一类人）的儿子，岩崎在和当局打交道时遇到了一些父亲当时遇到的麻烦。有一段时间，因为对官员不敬，他被关了起来。正如一些文章所描述的，从这个时候开始，或者是从后来他跟随流放的吉田东洋学习时开始，岩崎相信商业和贸易才是自己的路子。吉田为他安排了几个商务职位，1859年还将他派往长崎，调查对外贸易的情况。^[22] 吉田遇害后，岩崎的生命受到威胁，但他谨慎地避免抛头露面。后来，公共生活再次变得安全，他便利用自己与官员之间的私人关系，开始试水木材生意。但他很快就发现，在藩政府的垄断政策下，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不久之后，他重新进入政府部门，在后藤手下做事，担任藩政府刚成立的一个贸易机构的主管和代理人。^[23] 因此，岩崎获得了大量的经验和人脉，而这为后来成立三菱商会提供了很大帮助。以后几十年，当后藤成为明治政府的领导人物并创建早期的民主党时，岩崎在土佐和长崎的熟人将为他提供支持提供政治基础。

1864年8月10日，后藤被任命为参政。他之后的晋升是那个快速变化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升迁之一，从一个收入只有150石的马回升到了俸禄高达1500石的家老。^[24] 像他一样很快就出任政府官员的同仁包括福冈孝弟、小笠原唯八和板垣退助。他们都是“吉田的人”，都来自上级或者中级武士家庭，而且全都非常有才华。他们之间也有分歧。未来将领导明治政府自由民权运动的板垣是这些人当中最有军事头脑和最坚定不移的攘夷分子，一心期盼着攘夷战争快点到来。小笠原的观点更倾向于幕府一边，一直反对任何形式

的倒幕运动，直至成为勤王党的信徒。不过，他改变信仰后，因过于热心勤王事业而被容堂解雇，最后以士兵的身份死于 1868 年土佐围攻会津藩城堡的战斗中。福冈是一名学者和组织者，与容堂关系密切，最后建议将军辞职的文件以及后来为明治天皇起草的《五条誓文》均出自他之手。然而，与坂本这样的勤王党人合作，使土佐藩进入勤王运动尾声的是后藤这位出色的战略家，他是这群人的中心和组织者。这群才华横溢的领导人是德川幕府晚期任何一个藩国所能涌现出的最杰出的人才。他们既有卓越的文学才能、管理才能，还有高超的军事才能，其制定的政策使土佐藩得以与强大的邻藩平起平坐，共同进入明治时期。

国内外面临的威胁让政府非常重视军事改革和加强军事力量，而这就是分配给板垣的任务。这并非易事，因为传统的军队编制是以武士的等级为基础而形成的。现代的武器和战术要求有集体作战的观念，只有在牺牲个人荣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而个人荣誉在封建武士的心目中却非常重要。佐佐木高行有一段时间参加了军事训练，写下了弓箭手被转为枪炮手之后的不满，因为以前枪炮手是由最低级别的足轻担任。^[25]因此，军事编制的任何变化都牵涉武士身份的变化。为了简化这一切，1867 年，政府将其规则至少恢复到了 17 世纪的。^[26]但是，要在过时的社会制度上建立一套现代的军事体系依然困难重重。板垣在江户招募浪人，同时组织土佐藩内为防御外国人曾在 1850 年代组建的民兵队。

想要获得现代的军事实力就需要进口武器和科技，而土佐既缺乏资金，又缺乏使用这些西式武器所需的背景知识。诚然，从吉田

东洋统治时期开始，土佐便努力克服这些困难。1863年，土佐购买了第一艘西式轮船“南海丸”，它的效率和速度预示土佐藩的运输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纪元。^[27] 铸铁厂的设立也在计划之中，但是由于缺少资金，藩政府尝试采用可以从收集来的钟和生活器皿中获得的青铜和黄铜作为原料。吉田还野心勃勃地计划将土佐的贸易业务扩展到日本和亚洲的其他地方，这些计划在勤王党人掌权期间被搁置，但是后藤上台以后，吉田的思维方式再次脱颖而出。

最直接也最迫切的需要是钱。勤王运动期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耗光了藩国的财政。运动接近尾声时，勤王党人也变得焦急起来，想方设法到大阪地区推销土佐的产品，以便获得急需的资金。^[28] 勤王党在乡村最有影响力的团体中拥有大批的信徒，对他们的镇压意味着政府不仅难以增加税率，甚至连维持正常的收入都很困难。佐佐木一再提到民众对政府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信心。政府宣布将强制进行借贷，但是根本借不到钱。他们只能从武士身上榨取，在交了特别税之后，武士的薪俸少了一半。政府出台了特别的经济措施，严厉禁止不必要的浪费和花销。这些措施可能对政府有用，但是却使它失去了民心。有个餐馆老板这么对佐佐木说：“要求节俭的措施对你们这些官员来说，只要勤俭就还好，但是对我们町人来说可是糟透了。”^[29] 于是，无法说服或强制民众拿出钱来的藩政府，只好再次做起了生意。

后藤的方法是设立一个名为“开成馆”的机构。吉田东洋以前也有过这个想法。1865年春设立的这个机构旨在集中管理土佐的所有藩企。机构下设单独的海运部、医学校、工业部、矿业部、捕鲸

部和采购部，医学校教授英语和法语，工业部的职责是提高樟脑、和纸、白糖、茶叶等土特产的产量，矿业部负责勘探和开采金、银、铜、铁等金属矿和石灰矿，捕鲸部专门推广捕鲸，采购部负责推销产品以及购买国内急需的外国轮船、机器、武器和书籍，在长崎设有办事处，后来还将办事处开到了大阪。大家认为，有了这些措施，经济问题将迎刃而解。另外，新机构还将为土佐的企业提供他们急需的资金，使他们不必到大阪借钱了。^[30]

但这种直接参与官方贸易的做法也疏远了许多人。因此而向上级递交请愿书的佐佐木认为，堕落到采取和夷人一样的逐利行径是严重的错误。不过，最令他们反对的是设立开成馆所产生的费用。吉田东洋的计划便遭到过类似的反对，而且在佐佐木看来，新政府现在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正在增加人民的负担。尤其是这所新机构的建设均由人民服徭役来完成，他们得不到一丁点利益。他认为这不是赢得民心的做法。

作为回答，藩政府发表了一份面向武士阶层的声明，解释开成馆设立的目的非常高尚，即为了“富国强兵”。有趣的是，这种论点同样基于忠君的思想。该声明说，这么做不仅有利于土佐的家族，也会使整个帝国获益。它接着说道，接下来将会进行其他方面的改革。大家应该想到，原来的那套方法已经不够用了。没错，藩政府正打算把领土扩展到南部的几个岛屿，占领并开发那里，以满足藩国未来的需要。^[31]只要是正当的事业，这样得来的利润不应该引以为耻。

要获得利润，就必须有市场。为了与外国人直接交易，后藤希

望在长崎开设开成馆的分支机构。正是在这里，他和坂本产生了交集。1866年夏末，后藤来到长崎，随行的有中滨万次郎（“约翰·蒙”），即那个曾在马萨诸塞州受过教育的土佐渔民。^[32]但是一开始，后藤买的东西要比他卖的东西多得多，因此藩内对他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要不是容堂绝对信任他，后藤可能已经没命了。他在长崎的生意伙伴包括托马斯·格洛弗、普鲁士领事开的克尼夫勒公司（L. Kniffler & Co.）以及英国人的阿尔特公司（Alt and Co.）。后藤并不满足于只在长崎购买，还去到了上海。他本想在那儿买一艘船，但是机会实在多得令人目不暇接，于是又向怡和洋行买了一艘炮艇。他还签订合同，准备购买多尊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他欠下的巨额债务、签订的大量契约并没有使土佐的保守派喜欢上他，^[33]但是藩国的这些计划却使长崎的开成馆分部未来几年变得异常繁忙。

在进行上述改革的同时，土佐的外交和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他们已经看清了一个事实，即一个半现代化的藩国曾经成功地打败了幕府和它的大约30个藩国。山内容堂转而考虑与新成立的勤王联盟合作的可能性，中冈慎太郎也起草了一份政策文件，巧妙地融合了勤王、攘夷和西化等思想。

在第二次长州征讨的结果出来之前，容堂曾拒绝接见长州藩的使者。1866年夏天的惨败发生后，他建议庆喜放弃所有征服长州的想法。他还思考与强大的邻藩合作的可能性，并派后藤到萨摩藩去见岛津久光。^[34]更有趣的是，他认为应该派一小群人到太宰府去跟那些落难的公卿谈一谈，并了解一下土佐藩外面的政治气候。

佐佐木高行是前往太宰府的这群人之一，几名要求和对手一起去的地位低下的勤王党人也在其中。支持勤王党的佐佐木能够入选、其他人只要自己要求就能入选，都说明土佐的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藩外的情况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空气中弥漫着尽早改革的味道，而勤王党人和吉田派之间的对抗也正在慢慢消退。双方都开始意识到，跟保守派相比，自己与对方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保守派先是与武市一派结盟，后来又与他们的敌人结盟。佐佐木描绘了这种逐渐的变化。对他来说，最明显的例子是与中山左卫士重归于好。中山是一名吉田派官员，和他一起担任奉行，佐佐木觉得可以试着和对方交朋友，结果成功了。令他感到惊讶的是，这事一点也不费力，而且非常有意义。^[35]往大的方面说，后藤和小笠原等领导人正变得愿意去看勤王党人身上可能有的优点，而就在不久前，他们还非常害怕这些人。不过，即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共同的想法，单凭这些勤王党人与萨摩和长州等强藩之间的密切关系，就足以使藩政府和他们重新修好。

然而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实在不少。对于几乎任何一个有学识的人而言，武市所拥护的简单的攘夷主义已经过时，而对那些务实的人来说，保守派早年所要求的绝对支持幕府的行为也已经站不住脚。

在太宰府，佐佐木第一次从土方口里听说了萨长联盟的事，这名土佐浪人将他们已经获得的胜利的支持告诉了佐佐木。佐佐木听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勤王立场，同时也更加相信幕府的权威已经无法挽救。他抱着土佐的政策必须改变的观点回到家乡。但是，并非

所有与他同去的人都是这个看法，而藩政府也确实收到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报告。事实上，有人甚至在报告中写道，萨摩藩是佐幕派。

为了解决此事，藩政府决定派一个使团到京都去。小笠原唯八在那里见到了中冈慎太郎。这名前庄屋向他证实，倒幕运动正在酝酿之中，而且不可能阻止。小笠原听后简直不敢相信。他并非高层领导集团中唯一一个相信此事的人。板垣现在也完全站在了勤王主义这一边。^[36]板垣依然深信攘夷战争势在必行，然而即便战争没有到来，他也开始考虑起倒幕应该采取的手段，而中冈不久后就介绍他们认识的西乡也不太可能削弱他这种好战的思想。

对其他许多人而言，放弃应该攘夷和必须攘夷的天真想法是结束内在分歧并重新团结起来的决议基础。佐佐木由于生病而无法随使团到京都去。他的医生是一名勤王党人，曾在江户福泽谕吉办的学校学习西学。一天，医生带给他一本福泽的《西洋事情》——他写道，这是这本书首次在土佐流传。佐佐木从书中了解到，西方世界除了被批判，同时也值得被赶超，日本无需为了保持正确的路线而全盘拒绝西方。^[37]

对于土佐勤王党中残留的攘夷主义者来说，最引人注目，可能也是最具说服力的要数中冈慎太郎的分析了。中冈很久以前就读过福泽写的这本重要的小册子，不久，他给京都的岩仓具视也带了一本《西洋事情》。^[38]1866年秋，中冈写了一篇文章，可能是为了给到京都来试探政治形势的藩政府官员看，其中重申了土佐必须彻底进行军事和行政改革的观点。

他写道，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手段。土佐的所有群体都必须

团结起来，大名及其手下所实施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旧制度必须做出改变。这一点不仅至关重要，而且史无前例。在旧的制度下，人民害怕政府，在官员面前战战兢兢，而不是把伟大的目标看成是自己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能保护人民，使他们进步，同时又像他们父母一样的政府。他认为，目前只有长州藩在实施这样的政策，海外的英国和法国也在这么做。中冈引用了他赞成的胜说过的话，认为仅仅有武力是不够的，一支不知道“方向”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真正的强大除了需要武力，还需要正义和法律。当今世界已经有了国际法的概念，只有当一个国家“方向”正确、人民优秀、法律健全、精神强大、风俗优美时，这个国家才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因此，中冈呼吁各方，提出更加广泛、更加具有创造性的合作和行动方案。

接下来几段讲的是发展海军和各类海运企业的必要性。中冈认为，土佐可以与大阪的富商合作，同时遵守西方的商业法，与下关、大阪、长崎、上海和香港做生意。这样一来，国家将会变得富强。另一方面，只有摒弃旧的军事制度中的等级和地位差别，同时引进外国的武器和作战方法，才有可能提高军事实力。在这篇不同寻常的文章最后，中冈对自己的基本原则进行了思考。

上述论兵制之事，或有人谓吾但喜西洋，无攘夷之论，然此为最实用之攘夷论也……

夫云攘夷，非皇国之私言。至其不得不为之时，宇内各国皆行之。米利坚曾为英国属国也。时英吉利王贪利日甚，米民益苦，故华盛顿者，诉民之疾苦，于是统米地十三邦之民，拒

斥英人，行锁国攘夷。此后英米连战七年，英知不可胜，遂乞和，于是米利坚脱英属而独立，号十三地同盟合众国，成一强国。实去今八十年之事也。

中冈承认，德川幕府为了自己的方便和私利而将不平等的条约强加给国家是极端无耻的行为，此时人人都想起来痛击外国人，为蒙羞的祖国报仇雪恨。但是我们的国家经过了三百年和平，已经变得非常软弱，此时若试图加快历史进程，只会导致失败和痛苦。因此，我们现在应该做的“远则慕神武神后亲征之伟业，近则至草莽，依吉田松阴攘夷之志，渡海外，思取彼之长等。上下一致，砥砺学术，休养兵力，早立攘夷之大典，一新诸港之条约，征服远海之各国，一雪会稽之耻，虽死亦不能止此决心”。^[39]

于是，攘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不再意味着驱赶外国人和反启蒙主义，而是开始意味着独立、平等和实力。这些目标将由谁提出来呢？

长崎的情况

勤王党人说了很多关于不平等条约给国家带来的耻辱。西方国家激起的日本人的爱国心自然千真万确。长崎保存了一些当地领事写给幕府行政长官的信件，那些发黄的纸张充分显示了条约的不平等。我们无须进行长篇累牍的分析，只消举几个例子，便可见双方

说话的语气。“我有非常重要的话要对阁下说，”1863年，英国领事莫里森写给长崎地方长官的信中这么写道，“为此，请您让副奉行和翻译品川今天下午1点到领事馆来一趟。”^[40]外国人犯了错，领事可以用本国的法律或者采取推诿和恫吓的手段来保护他们，而日本的高级官员却必须温顺如绵羊。这当然不是长崎的传统做法，在以前的那里，最低级的武士地位也要比荷兰商人高，就跟荣耀之于贪婪一样。

不平等条约同时为政治和技术革新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而勤王党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机会，后藤能够去长崎甚至去上海就是这些崭新机会的一个例子。商人总体上不太在意幕府的敏感情绪，从1864年美国领事（和商人）沃尔什回复幕府抗议的信件中，我们可以一窥他们对政局稳定可能产生的巨大影响。他答应说，“我将按您的要求提交报告，但是我必须再说一次，我认为这毫无用处，不会有任何效果。只要日本人想买的东西，外国人就会设法弄来，而且条约没有规定不准卖武器给大名的代理和商人，因此我没有权力阻止这类买卖发生”。^[41]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长崎的情况，看看那里的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是如何影响当时的政局的。

直到1865年为止，虽然不一定包括所有的商人，但外国列强一直遵守条约的文字和精神，在德川幕府批准的范围内做生意。然而，炮轰鹿儿岛和下关的事件使他们接触到新的人群，有了新的想法。他们认为这些年德川幕府的工作效率和完整性降低，而它在努力绘制新蓝图的同时，内部也变得混乱不堪。即使在那之前，已经有一些大商人看到赢利的机会而跨越红线，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托马

斯·格洛弗和他的格洛弗公司。格洛弗早年曾和中国做生意，有丰富的经验。大体而言，格洛弗这类中国来的贸易商似乎不太看得起日本的“中央”政府，很快便嗅到与外样大名做生意有利可图。早在1862年，怡和洋行驻横滨代表的报告中就提到了一名所谓“攘夷派”领主来访的事情。这名领主渴望和外国人做生意，并极力撺掇商人到他的领地去。从报告的日期可以看出，这个人就是岛津久光，而他来访的日期可能刚好在家臣袭击英国人理查德森的事件之前。^[42]即便怡和洋行可能会自责，但格洛弗却感到良心颇安，只要有人买，他就卖。他帮助长州人伊藤博文和井上馨偷渡到了英国，后来还帮助萨摩人五代友厚和松木弘庵偷渡。后藤象二郎同样乘坐格洛弗的船前去上海。格洛弗并非唯一一个从事这种交易的人——一个名叫德雷克的美国商人帮长州人弄到了船只、大炮和步枪——但无疑是最主要的，他后来受到明治政府的表彰和嘉奖，表明在那些受过他保护的人眼里，他的地位是多么高。^{[43]*}

1865年，新的英国公使巴夏礼从中国来到日本。有一段时间，巴夏礼准备完全承认幕府的缔约政府地位，但是不久便与格洛弗达成共识，认为英国的利益在于尽可能地扩大贸易量，而德川幕府限制贸易的做法应该受到抵制或者破坏。因此，在长州藩不顾一切地寻找武器对抗幕府时，英国的政策刚好迎合了他们的需求。没有人对格洛弗的立场表示怀疑。他听到木户抱怨受到的幕府封锁，于是

* 格洛弗娶了一个日本妻子，并在长崎定居。近来，一些有想象力的投资者开发了他位于长崎的那座面海的房子，给游客介绍说那是“蝴蝶夫人的家”。

对他说，也许直接将这些货物运往下关有些困难，但是如果可以从长崎转运，那么没有人能够阻止他将货物卖给长州藩。因此，伊藤和井上来到长崎，在萨摩藩和坂本的帮助下很容易使用萨摩藩的资金买下一艘船，并在船上配备了坂本的人手，然后利用这艘船，将武器运往下关。^[44]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巴夏礼与长州、萨摩藩领导的接触也越来越频繁。这些人的魄力和才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竭力阻止幕府企图中止或者减少这种接触的努力。长州战争正在准备期间，他在格洛弗的陪同下去了一趟鹿儿岛。为了准备他的来访，格洛弗此前已经去过一次萨摩的居城。他从中协力，促成了一笔对萨摩藩的巨额贷款，巴夏礼也获得了热情的接待。在返回长崎时，巴夏礼干劲十足地打算与外样大名进行自由贸易。他认为，不妨在幕府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于是以自己在萨摩藩所受到的盛大欢迎（一些人推测萨摩花费了 30000 两白银）而称赞幕府，并建议江户让其他藩国在接待自己时也以此为榜样。^[45]

从那些想方设法到欧洲去的萨摩藩代表身上就可以看出来，格洛弗开创的这些机会并非只属于他的公司。萨摩藩代表竭力与比利时人、法国人和英国人讨价还价。派驻长崎的代表五代友厚对萨摩藩的贡献之大，使其堪称土佐藩的后藤一样的人物。在后来的明治时期，他与岩崎、后藤一样，成为在金融界和商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1850 年代，五代被藩国派往长崎，在荷兰教官的手下学习航海术。之后，他伪装成一名苦力，来到上海。五代是在藩主默许的情况下来到上海的，在那里，他努力想让欧洲的商人相信，自己的后

台老板需要购买一艘轮船，但是并没有成功。回来之后，他被分配到长崎工作，1864年，在格洛弗的帮助下，19名萨摩人亲自到西方考察和学习，五代就是其中之一。他先在英国学习了一段时间，接着又到几个欧洲国家进行短期考察；有两名成员回来时途经美国。这些在岛津久光（有时被描绘成保守派和攘夷派）的许可和知悉的情况下获得的经历，使五代得到了第一手知识，并使他从此以后把一切有关全面攘夷的思想都抛到了脑后。从欧洲写回的信中充斥着对西方法律和高效的西方文字的溢美之词，他认为西方的法律比日本的法律更加公正和高尚，至于文字，日语也许可以保留，但是必须先将借用的汉字剔除掉。他在信中还极力主张，必须立即利用西方的科学和技术。^[46]五代回国时拟定了18条计划，包括像北德意志联邦一样成立一个日本藩主联盟，同时雇用“印度人和中国人”开发日本和亚洲的资源。^[47]他还汇报说，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比奴隶强不了多少，而通过横须贺兵工厂这类企业，日本正在变成亚洲有名的进步地区。

五代在英国时，参加了在鹿儿岛建造日本第一家现代纺纱厂的谈判。他在欧洲大陆时，曾与蒙布朗伯爵，即英厄尔蒙斯特男爵（Baron of Ingelmunster）达成协议，计划将萨摩藩和琉球群岛的产品运到欧洲去。1867年的巴黎博览会上，这些商品首次全面亮相，使得欧洲人竞相购买。从起草的合同、介绍信和委托书可以看出，五代以及他的领导已经做好准备，打算与西方人进行大规模的贸易。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藩主的名义进行的，他在文件上的头衔是“松平修理大夫源茂久，蒙上帝恩的全琉球国王，萨摩、

大隅、日向国司”致“本文件所有相关人士”。^[48]这些话出自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的倒幕联盟名义上的首领之口！

西方的经历除了导致技术上的变化，也导致了思想上的变化。五代在英国时便建议日本模仿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大名联盟，说明外国的例子可以适用日本的实情。但是，有证据表明作用是双向发生的，日本特使的建议也影响了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的政策。

1866年春，在格洛弗的帮助下偷渡到英国的萨摩人松木弘庵，在伦敦会见了英国公使的前秘书劳伦斯·奥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松木向奥利芬特保证，日本人之所以痛恨外国人，仅仅因为这样一来德川幕府就可以垄断贸易。他还让奥利芬特相信，一旦一个以天皇为中心且广泛代表大名意见的新政府成立，日本将会接受自己的国际义务并信守承诺。奥利芬特向克拉伦登勋爵（Lord Clarenton）*转达了这个消息，后来勋爵亲自和松木交谈了两次。驻日公使巴夏礼随后收到一份文件，其中表达的正是这个观点，同时建议他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努力说服将军采取这种方法拓宽政治道路。萨摩人的想法就这样成为外交部给巴夏礼的发文要旨。

对许多日本人来说，还有一个了解英国人政策的途径，那就是巴夏礼那位很有才华的翻译欧内斯特·萨道义写的两篇题为《英国策论》的长文。它们分别发表于1865年12月和1866年5月的《日本时报》上。^[49]在老师的指导下，他把文章翻译成日语付印，很快便流传开来。很多读者认为这就是英国的官方政策。萨道

* 时任英国外交大臣。——译注

义亲自解释说，自己这么做事先并没有知会上司，也没有得到他的许可，但是从对巴夏礼的才能和脾气的尊重来看，萨道义不太可能在不了解这位领导的想法下就做出如此越轨的事情来。保存下来的日文版《英国策论》着重强调了几点。首先，各国与将军谈判并签署条约，而且称呼将军为“大君”，都是非常错误的。他认为只有天皇才有这种权力，忽视这一点就是与德川家族同流合污，篡夺天皇的权力。日本的真正统治者并非将军，也非天皇，而是各位大名。因此，英国的政策应该是承认事实，并努力与手握实权者达成一致意见。萨道义建议在天皇的主持下，成立一个由主要大名（按他的话说，将军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位）组成的议会。有了这个组织，便可修改条约，而这样达成的协议也将得到贯彻。^[50]于是，英国人对更大市场和自由贸易的追求，在口头和实际行动上声援了西南强藩的要求，也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对勤王党人的事业而言，他们口中声讨的“耻辱”显然有其实际的用途。访问萨摩藩，警告幕府将来与长州开战时不能封锁下关港，以及私下里与西乡隆盛等人会晤时一再主张成立“联合政府”和“大名议会”，巴夏礼的种种做法，使英国对于日本国内面临的重大问题的立场显得不言而喻。

鉴于英国偏袒自己的对手，幕府的代表也就没有理由对法国公使罗修斯提出的帮助置若罔闻了。罗修斯相信日本的未来在幕府，并认为西南强藩都是攘夷势力为主的藩国。他极少与这些藩国的统治者直接联系，因此对于即将发生的事情的了解要比巴夏礼少得多。罗修斯坚定地认为幕府有能力打压长州藩，并对如何更好地惩罚长

州提出了许多建议。巴夏礼坚持认为不应该封锁下关港，而罗修斯则与他相反，主张不惜一切代价让长州藩的勤王党人得不到外国武器。在法国代表的帮助下，幕府终于知道了英国人的所作所为。长崎的领事这样向罗修斯汇报说：“英国指挥官乘坐‘皇家公主’号来到这里，预计将停留一个月。他住在格洛弗的家里。英国公使也要来。在萨摩的帮助下，长州从长崎弄到了许多武器，它们都是通过格洛弗和其他英国人的公司进口的。载有英国船员的小轮船‘天道丸’曾经驶向琉球群岛，但是现在却再次向这里驶来。它可能将在长崎卸下给下关的货物。”^[51]本来是打算去鹿儿岛的罗修斯即刻赶往长崎，看看巴夏礼打算做什么。不过，他拒绝了萨摩官员的邀请，没有到萨摩的公馆去，理由是这与条约的精神相违背。到了1865年，幕府领导人开始相信罗修斯确实如他所宣称的那样公正，但是对于英国人的目的则疑虑重重。

1865年2月，幕府的外国奉行栗本锄云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请求法国人在技术和军事方面提供援助。他甚至建议在横滨部署更多的法国军队，以便与近畿日益增加的萨摩军抗衡。^[52]从1865年1月开始，小栗忠顺制订了一个特别的经济计划。法国人的兴趣在于实际获得一些出口欧洲的商品的垄断权，尤其是蚕纸和蚕茧，而作为交换，法国人将为幕府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帮助。双方各出五六名商人，组成了一个“法国商会”，并在江户设一位法国代表，在巴黎设一位日本代表。1866年2月，巴黎银行家保罗·弗勒里·厄拉德（Paul Fleury Herald）被任命为驻日本特别总领事，有权就所需的商品和服务进行谈判并订立合同，“法国商会”至此宣告正式

成立。双方交易量大大增加，尤其是在长州之战惨败后，幕府向法国订购了大批的军火、制服、鞋子和毯子。总之，接下来几个月，幕府向法国购买的物质足以装备 25000 名步兵、500 名骑兵和 1250 名炮兵。与此同时，罗修斯还亲自或者通过小栗这样的幕府熟人提出建议，强调幕府必须重组，从而削弱大名的自治权，提高政府和军队效率。^[53]

海援队重新获得支持

幕府镇压长州的计划失败后，通过长崎进口的武器数目不断增加。各藩已经不再担心幕府会不高兴，而且可以自己交易而不必通过坂本这些浪人作中间商了。因此，当土佐藩的决策者准备重新考虑国内的政治路线时，坂本也正准备与他们和解。五年前，为了躲避这帮当权者，坂本离开了土佐。对土佐藩的统治者来说，坂本这样的浪人用处肯定很大，他们能够提供其他地方的发展信息，同时也可以充当调解人。对于浪人来说，重新获得官方的支持将直接让他们的事业获得新的帮助，有了新的希望。他们也许可以以强藩代表的身份参与未来的事务。无论如何，武市瑞山希望萨摩、长州和土佐结盟的旧梦想给这类建议加盖了勤王主义的合法印章。

坂本首先从一个名为沟渊广之丞的土佐藩士那里找到机会，朝这个方向迈进。1865 年底，沟渊受藩国之命，前往长崎学习军事科技。十年前，沟渊和坂本同为江户剑术学校的学生，尽管两人选择

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是一直都保持着朋友关系。^[54]坂本很自然地选择了这名老朋友，作为自己愿意接受官方帮助的表达渠道，而沟渊也很有资格向坂本描述官方政策的变化。

1866 年底，坂本给沟渊写了这封信：

……我是家里的次子，一直跟在哥哥的屁股后头直到成年。在江户时，我意识到统治者对义务的解释方式极为可耻。我对船舶非常感兴趣，于是恳求藩政府官员让我学，并努力获得了一些航海经验。但是因为我天资驽钝，学识浅薄，是个一筹莫展的穷鬼，所以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然而，如你所知，我已经开始设法组建一支船队。这几年我都忙着在全国各地奔波，遇到故人时经常不得不把他们当陌生人看待。谁不想生养在自己父母亲的那片土地呢？然而，我还是忍下来，并强迫自己不去想它。我强忍着内心的渴望，没有走回头路。但是后来，我的计划还是没有成功。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再见到自己的藩主。经过长时间的漂泊和流浪，我已经不求获得一官半职，只是也不准备放弃自己奋斗了半生的事业。但是既然你我相识，你也尊敬我，因此我向你略述自己经历的梗概，希望你能慎重考虑一下……^[55]

这封信非常有意思，它表明坂本承认自己患了思乡病，而且想单独干一番事业的希望落空了。这和他以前写给朋友们的信有天壤之别，但是坂本并没有给自己找借口，没有阿谀，也没有后悔。坂

本心里显然非常清楚，尽管自己有不光彩的过去，现在也没取得什么成就，但是仍能够对藩国做出巨大贡献。

沟渊也是这么认为。他几次去见坂本，听他讲述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发展，同时告诉他土佐藩的变化。坂本态度的转变也可能通过土佐轮船“夕颜丸”^{*}的船长武藤早马而为土佐藩官员所知。马回役出身的武藤也是早在江户时期就认识了坂本。坂本向哥哥描述伏见之战的信中就提到了他们的相遇。“有一天，”他写道，“前天我遇到了江之口人沟渊广之丞，并和他聊了聊。后来，我碰巧遇到了蒸汽船船长武藤早马。他是一名重要官员，我担心他回土佐后会将我的事情向上级汇报，因此准备装作不认识。但是我转念一想，沟渊再三来找过我，而且听了我的想法，于是决定也见见武藤。这个武藤过去在江户时就已认识，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高兴再次见到他。故友重逢实在是非常开心。”^[56]

这两个人告诉坂本，土佐藩的领导已经改变了主意，坂本听后非常满意。后藤的土佐海军计划尤其令他感兴趣。正如在给三吉的信中所说的，他开始觉得武市关于萨摩—长州—土佐三国结盟的梦想可能终于要实现了。^[57]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在可靠的土佐密使和长州领导人之间建立联系，为此，他安排沟渊到长州去会见木户孝允。木户知道与土佐重新建立联系的种种好处，反应很快，在给坂本的回信中热情地提到了沟渊来访一事，从中不难看出他对

* 假如记录者说的没错，在长崎的美国传教士圭多·沃贝克的提议下，土佐藩代表才从《源氏物语》中选了这个名字为这艘船命名。

这项计划怀有浓厚的兴趣。^[58]

通过沟渊，土佐政府与长州重新建立了直接联系。沟渊从长州回国时还造访了太宰府这个流放公卿的大本营。他从勤王中心发回的报告补充了土佐藩业已收到的信息，为领导层的决策提供了资料。我们确实有理由相信，土佐藩的政策将出现彻底反转，坂本也将重新受到藩政府的重用。

为了自己的事业，坂本也希望与土佐官方进行和解。他的贸易公司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除非得到新的援助，否则很可能不得不放弃。他既没有船，也没有钱。坂本甚至一度考虑将总部迁往下关，把公司变成长州的附庸，而不是有大量活动空间的独立个体。

从托马斯·格洛弗手里买来的第一艘船“联合”号，在参加下关海峡之战后被完全移交给了长州。“联合”号改名为“乙丑丸”后成为长州海军的一部分，已经不再属于坂本的公司。公司的第二艘船是纵帆船，也是从格洛弗手里买来的。和“联合”号一样，这艘船也是通过萨摩人买下的，而且原本打算首航时和“联合”号一起驶往鹿儿岛。然而两艘船都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浪，缺乏蒸汽动力的纵帆船沉没，整艘船连同全体船员全部罹难。坂本的老朋友池内藏太也在其中。^[59]灾难发生时，坂本正在鹿儿岛休养伏见之战中所受的伤。

有趣的是，这段时间志士的士气依然高涨。浪人们以一套严格的行为准则约束自己，完全将自私自利排除在外。当大家发现坂本的老朋友近藤长次郎打算和托马斯·格洛弗一起去英国时，纷纷严厉地批评他“自私”，结果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而选择自杀。^[60]

幕府征讨长州的战争结束后，坂本和五代友厚以及长州的官员讨论过一个新计划，借此使自己的公司更加有规律地为各藩之间的贸易服务。坂本起草了一份由六项主要条款组成的章程，计划通过下关海峡，将南部各藩的产品运往本州。章程明确规定，藩国的名字将不会出现在合同中，真正的谈判各方将由商号的名称代替。订立合同的各方将承认彼此的票据。货船将使用萨摩的旗帜，只要事先通知了长州当局，所有此计划下的船队均可畅通无阻地通过下关港。可见，此时坂本正努力突破幕府的封锁，在各藩之间做生意，并以此盈利。行动一开始将以纯粹的商业活动为掩护，通过承诺自由通行和彼此承认对方的票据，幕府的封建管制将大大削弱。很明显，这是为了帮助萨长联盟而想出来的点子。在精神上，它也和英国人自由、开放的贸易理想非常接近。但是坂本和他的公司都没有船，因此这次新的合作失败了。^[61]

坂本的下一个计划是他早年开发北海道想法的复苏。他计划从一个普鲁士商人那里买一艘船，将其命名为“大黑丸”。两名美国人奈伊（Nye）和安金斯（Qnkins）将提供技术上的援助，而大阪的商人将提供一部分资金，坂本的萨摩支持者将提供主要的赞助和担保。不幸的是，他们在大阪富翁中的信用不是太好，虽然一开始野心勃勃，写了一封又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并且对未来的预测相当乐观，但最终还是因为资金问题而失败了。^[62] 该计划虽然流产，但却再次显示出坂本对这类项目相当锲而不舍。事实上，没过多久，他就和幕府的一名参政讨论起北海道的开发问题。与他极为相似的萨摩朋友五代友厚则会在明治时期加入雄心勃勃的北海道开发计

划，并且在当地的官产销售中获得不菲的利益。而该交易曝光后导致了 1881 年的政治危机。^[63] 北海道计划想法大胆但却缺乏支持者，它的失败再次说明，如果无法获得比现在更多的支持，坂本将寸步难行。他为手下人的行为负责，同时还得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萨摩藩的援助显然正变得越来越不可靠。另外，幕府在长崎的管制措施虽然并不完善，却使他有必要获得官方的支持。因此，坂本考虑将公司迁往下关。

在这些艰难的时刻，与长崎和下关商人之间的联系对坂本来说变得特别重要。他的长崎总部就设在富裕的当铺老板小曾根英四郎的家里。小曾根同情志士，并为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他还涉足萨摩商品的买卖，因此在进行一些复杂的交易时，可以很便利地充当名义上的买主或者担保人。坂本也至少有一次派他到下关执行任务。^[64]

下关有地位非常重要的白石。关于他和坂本之间的友谊，我们前文已经讲述过。另外，坂本派沟渊去见木户时，木户建议他住在商人伊藤助太夫家。^[65] 在那之后，坂本给伊藤写了几封信，说明他已经成为一名受志士尊敬的成员。事实上，从坂本锲而不舍地追求商业冒险一事来看，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对商人还怀有仇恨。他身上那部分儒家的武士传统已经让位给了一套正在形成的新规则。坂本这个时期使用了才谷梅太郎的化名，这一行为不无深意。差不多一个世纪前，他的祖父因经营才谷屋而获得乡士身份，现在，才谷屋迎来了一位杰出的继承人。^[66]

然而对于坂本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商人朋友只能起到缓冲作用，

他需要的那种帮助只有那些有权使用税款的人才能提供。这些都是通过后藤象二郎获得的。

1866年9月4日，后藤来到长崎。他带着12名随从，在长崎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前往上海，并于10月14日返回长崎。我们还记得他的任务是买船。他的目的实现了，不过花费了一大笔钱，遭到了高知的激烈批评。但是后藤知道容堂在背后给自己撑腰，在离开土佐之前的讨论中，他们就一致认为，除非藩政府准备大力收购船舶，并通过加强海上力量将藩国的边界扩展到“远方的岛屿”，否则土佐在未来的困境中将退居次席。^[67]

这些想法和坂本非常相似。沟渊曾跟坂本讲过后藤的海军扩张计划，现在他可以跟后藤讲坂本的海上营利计划。于是，1867年，通过沟渊的牵头，坂本在长崎一家妓院会见了后藤。后藤明智地点了酒，并让沟渊和另外一名客人作陪，同时还叫来了坂本当时最宠爱的一名妓女。遗憾的是，关于酒后的讨论，双方都没有做详细的描述。

坂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他的浪人同志希望刺杀后藤这名处死武市瑞山的罪魁祸首。据一名知情人士说，坂本拒绝这么做，并解释说，也许可以“和后藤做交易”并真正做成一番事业。那次见面之后，坂本又惊又喜地说，本来可以把他视为宿敌的后藤居然一个字也没有提到过去。相反，他们只谈论国家大事。显然，后藤具有非凡的才华，是个真正的人物。^[68]

坂本给木户的信中说道：“此刻，土佐国见革新之起步，其详实可问询中岛作太郎。此一革新亦承拜先生之力。土佐国已不为幕

府之役，今年七八月可定，则昔日之长萨土之盟可成，欣喜无比。”^[69]

后藤对这位新朋友的印象也很好。他已经通过沟渊了解了倒幕派的力量和决心。在贸易和扩张的问题上，他的看法和坂本的非常接近，而且他对将来可能会用到浪人的力量和人脉一事非常感兴趣。此外，并非只有后藤一人决定支持他们。这是土佐官方最高层做出的决定。西乡到高知的访问为此事铺平了道路。1867年4月，后藤的参政同僚福岡孝弟来到长崎，带来了赦免坂本罪行的文书，同时允许他担任自己公司的领导，这个公司现在已经更名为“海援队”。文书写道：

备忘录

才谷梅太郎，

或者坂本龙马

赦免前述人员脱藩罪，任命其为海援队长。队中事务全权处理。

一开始，土佐对坂本公司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资金上。坂本的公司获得了一笔15000两银子的本金。^[70]更重要的是，它为一个由于没人支持而几乎倾覆的机构带来了地位、安全感和目标。坂本和后藤制定的章程清楚地表明，这个机构将挖掘一切可以挖掘的潜力，完全听坂本的指挥，该机构将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假如商业利润不够资金将由土佐支付。章程的原文如下：

一、凡曾脱本藩及脱他藩者、有海外之志者，可入此队。运输、射利、开拓以应援本藩为主。今后不论自他，从其志而选入。

二、凡队中之事，一切任队长处置。任何人不可违背。若为暴乱之事，引妄谬之害，亦许队长制其死活。

三、凡队中之人，患难相救，困厄相护，义气相责，条理相纠。若独断过激，为侪辈之妨，若侪辈相推，乘势强制，为他人之碍，此尤可慎之事，不可犯。

四、凡队中修业，分课如政法、火技、航机、语言等，随其志学之。互相勉励，不得懈怠。

五、凡队中所费钱粮，取其自营之功，亦互有分配，不得私藏。若举事用度不足，或至学科缺乏，队长出建议书，求长崎官员给付。^[71]

坂本的能力和天赋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去处。他的公司总共有 50 人。公司的领导均由各个地方选出。土佐藩贡献了 12 人，越前藩 6 人，越后藩 2 人，水户藩 1 人，纪伊藩 1 人，最后这位就是陆奥宗光。有关学习的条款说明，坂本打算利用那些大量聚集在长崎想学西学的人。这个群体拥有各种惊人的观点和人才，甚至包括一名公开支持幕府的人。^[72] 它还进一步说明了坂本秉持的信念，即为了实现国家的目的，必须通过不同的途径。他写信告诉三吉慎藏说：“开国之道就是让打仗的人去打仗，学习的人去学习，做生意的去做生意，每个人都做着自己最适合的工作。”^[73]

公司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其公开的日志写道：“公司分文官、武官、器械官、测量官、领航官、医官等，合水夫、火夫，得五十人。”^[74]事实上，考虑到他们有限的资源，这么少的人几乎无法在各个领域形成一股成熟的力量。但是，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的出版事业和政治活动的范围仍然相当大，并且为至关重要的海洋计划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坂本并不是唯一一个受到藩国赦免的人。福岡孝弟到长崎时也带来了中冈慎太郎的赦免文书，并委托他组织一支辅助军队——陆援队。不过，陆援队直到1867年夏天才开始活动，因此被海援队占了先机。当坂本和后藤在长崎谈判，讨论如何重组自己的公司时，中冈正在各地旅行。他去了鹿儿岛、太宰府和京都，全力为统一各方力量，加快倒幕的进程而努力。中冈同样联系了以板垣退助和小笠原唯八为代表的土佐高官，在说服他们德川幕府必将垮台这件事上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留在土佐的那些志士，依然备感压抑。他们对后藤等人执行的镇压勤王党路线深恶痛绝，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他们会对自己的老朋友与敌为友这件事感到困惑和怀疑。甚至坂本最信任的人、他的姐姐乙女也严厉地批评他，认为坂本现在正为了自己的私利和地位而忽略了事业。

坂本给姐姐写了一封非常有意思的回信，讲述自己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和解的。首先，他发现到处都是素质低下的人。哥哥的养子，即他的侄子刚刚也来投靠他，坂本发现这个人有些能力，也有奉献精神，他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或者常伴坂本左右，但是却没有任何

开创精神。当然，他仍然比一般的土佐官员要好很多。最近，他在大阪遇到了一些低级官员，这些人的口气之大，简直可以去当大臣。可怜的后藤象二郎跟他说，自己一直以来都不得不跟这些自以为是的废物打交道。也许坂本的意思是说，人并不是总能选择自己的下属。

接着坂本笔锋一转，提到了乙女对自己的指控，说自己正和目前统治土佐的那帮流氓交往。她这么说无可非议，但是她根本没有意识到，没有了家乡的支持，那帮长崎的伙计是如何难以支撑。他们每个人每年大约要花掉他六两银子，而这样的人有五十个。与此同时，他驳斥了她的指控，认为自己并没有损害自己的名声和计划，他的每次行动和旅行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至于他正在交往的土佐人，他列举了后藤象二郎、福冈孝弟、佐佐木三四郎（高行）、毛利荒次郎和石川清之助。最后这个名字是中冈慎太郎的化名，他紧接在后面写着“（这个人跟我简直一模一样）”。关于后藤，他写道：“在这些人当中，后藤是个真正的同志，而且在气概和志向上，恐怕没有一个土佐人在他之上。”此外，他还和后藤谈到那些逃离藩国的浪人家属可能遭到检举的事情。后藤认为中冈和坂本等人为了藩国的利益而拼死拼活，因此没有必要去找他们家属的麻烦。坂本说：“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怀疑你是否还会说他们是流氓官员。”接着，他明确地说道，可能她无法想象，但是如果他能将年收入 24 万石的整个土佐藩纳入同一条轨道，不是比仅仅拥有 500 人或 700 人的成就更大吗？^[75]

因此，坂本准备坚持自己的行动和决定。他也不愿听从姐姐的

训斥。事实上，他在信中尖锐地回答了乙女也想离开藩国并加入他的事业的想法。他讽刺地嘲笑这个想法。对于女人而言，离开家去参加国内政治是非常荒谬的。幸运的是，他的妻子高尚而忠诚，在他不在时虽然闷闷不乐，但是却做针线活打发无聊时光。不管怎么说，他很可能不久就会和后藤象二郎一起乘轮船回一趟家。

第七章 船中八策

后藤象二郎开始正式支持海援队之后，坂本龙马认为自己的困难已经过去。他看到一个充满名利的未来，并期待与新的靠山共同完成任务。他写信跟姐姐说：“听说我要回土佐，幕府的官员可能会很紧张吧。我将和手下的四方浪人一起干一番大事业。我打算这几天和后藤象二郎一起去京都。届时我打算就住在伏见的寺田屋，而且巴不得幕府的伏见奉行早点发现。”^[1]然而，坂本首次返回土佐的情形，实际上却与他的预期完全不同。这次回乡以及与后藤一起的京都之行都被西方的新问题蒙上了一层阴影。海援队牵扯进了谋杀两名英国水手的案子，他们只有在撇清指控之后才能涉足国内的政治舞台。事实上，西方国家现在在国内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将会看到，当藩国之间出现一个与海援队有关的问题时，坂本和后藤能够提出以西方为先例的解决方法。

这种对于西方人的存在及其问题的关注，并非坂本及其土佐靠山的专属，因为它正是国内政治舞台的写照。在将军坚持认为宫廷应该立刻批准兵庫开港之后，国际问题，尤其是与兵庫开港有关的

问题，是各大藩主和幕府之间努力进行了最后一次合作的诱因。

对西方介入的担忧，加剧了事件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继承了将军之位的一桥庆喜优先考虑的是如何客气地对待西方使节，而他和参政们也从法国公使罗修斯那里得到了新的援助和支持。另一方面，萨摩的领导史无前例地与英国代表亲近，萨道义对西乡隆盛说的一番话也使人们对他的立场不再存疑。

但是，有片刻时间，庆喜似乎很可能给幕府带去它渴望已久的领导地位和方向。他可能愿意接受法国援助这件事引起了德川家族对手的强烈恐惧。他们开始计划发动一场战争。在此过程中，一个新的人物开始崭露头角，即主张以武力对抗德川幕府的公卿岩仓具视。关于他在京都的地位的上升，以及他与萨摩领导人之间关系的故事，同时也是未来明治政府领导集团形成的故事。孝明天皇死后，继任的天皇只有 15 岁，使这个集团拥有巨大机会。

土佐有一群狂热的勤王主义者，与萨摩、长州藩一样，他们也准备对幕府宣战。尚武而又兼具军事天才的板垣退助和中冈慎太郎也在积极地备战。但是坂本龙马却更希望双方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达成和解。他制定了一个政治纲领，承诺如果将军主动归还政权则为他保留一些权力和威望，坂本还说服后藤象二郎在京都和土佐倡导这个纲领。正是为了提出这个计划，坂本和后藤才在 1867 年夏天去京都。坂本的《船中八策》在目的和用词上均预示了明治政府的首份公告，因此了解它们的起源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获得土佐藩支持的好处

1867 年整个春天，坂本都在长崎忙于海援队的事务。他远离京都这个政治活动的中心，还有点与世隔绝，以致他给好朋友三吉写信，以讹传讹（从木户那里听来的）地说幕府有与萨摩藩和解的危险。^[2] 这年春天的大部分时间，后藤象二郎也在长崎，为增强土佐的实力而大力购买外国武器和船只。看看这两个人是如何合力保护土佐企业不受其他藩国欺压，实在是有意思。事实上各藩现在已是独立的公国，当他们之间打交道时，愿意到别处去寻找可能适用的先例和规则。这一点，也同样意义非凡。

海援队远非一个盈利企业，政治上的活动要比经济上的活动重要得多。坂本获得官方支持后的第一次冒险活动便完美地说明了这一点。

1867 年春，坂本从四国北部的大洲藩借得一艘小船，功率为 45 马力，相当于载重 160 吨。5 月 22 日，坂本亲自驾驶这艘“伊吕波丸”从长崎起航，装载着轻武器，准备送到大阪的土佐驻军。四天后的 5 月 26 日，船在经过四国东北的濑户内海时遇上大雾，一艘属于纪伊藩（属于德川家族的尾张家）的轮船一头冲了过来。纪伊藩的船比较大，有 150 马力，载重 887 吨。两船要相撞时，“伊吕波丸”调头向左，纪伊藩的船则调头向右，结果撞上了这艘海援队船只的船腹。受损的“伊吕波丸”很快侧倾，坂本和手下赶紧跳到另一艘船上。“伊吕波丸”在水面漂时，坂本试着让大家帮忙抢救货物或者船只。然而，他的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当坂本与他们争

论时，“伊吕波丸”沉入了海底。

现在，坂本试图让纪伊藩的船长当场补偿一部分损失。他指责说，是纪伊方面的疏忽造成了这次不幸——船长没有在甲板上，而他们的避让行动导致了撞船事故的发生。但是肇事方根本不愿在现场耽搁，也不愿支付坂本要求的 10000 两银子的部分赔偿。相反，坂本等人被送到了岸上。对方承诺将在长崎进行谈判，届时将确定双方的责任和赔偿方案。^[3]

坂本为即将到来的谈判做了充分准备。他将“伊吕波丸”的航海日志送到长崎的朋友手里，同时叮嘱他们不得外泄。他知道自己领导的是一帮浪人，和德川家族的御三家对抗的胜算不大，于是积极寻求外部帮助，并将文件发给了西乡隆盛。他尤其渴望得到土佐的支持。如果这次谈判能够在藩对藩的基础上进行，那么纪伊藩的人就不得不讲理。在此期间，坂本必须防备自己的一些手下采取直接行动，因为他们认为不如干脆用手里的刀向纪伊人报仇。^[4]

6 月 17 日，长崎谈判开始。谈判在德川幕府的官员长崎奉行的非正式管辖下进行。这个人依照德川幕府的司法惯例，竭力想促使双方达成庭外和解。^[5]经过了冗长的辩论，直到 7 月 1 日两方才达成和解协议。一开始，坂本和同事们直接与纪伊藩的船员对质，而当谈判进入尾声时，那年春天离开长崎的后藤象二郎也回来参加辩论。随着谈判一天天地拖延下去，坂本在信中也隐晦地威胁可能发动战争。他在一封信中说道，整个长崎都对纪伊藩的拖延感到极度不满，甚至连小孩也希望来一场战争。^[6]坂本还尝试打一场心理战，四处散布谣言说，假如不能达成和解，长州和土佐可能结盟对抗纪

伊藩。海援队的忠实成员无疑在丸山花街有很多熟人，因为他们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在他们的一手安排下，一首不怀好意的歌谣在当地的花街柳巷传唱开来：

那艘沉船的赔偿，
将是土地而非银子。^[7]

然而，比这些威胁更重要的是他们尝试利用国际先例来解决问题。后藤一度向纪伊藩的代表指出，迄今为止，日本尚未有解决此类争端的先例。“但幸运的是，英国舰队的司令官现在正在长崎，也许我们应该问问他，其他地方解决这类争端时有何惯例。我并不是想让他来仲裁此事，而是说不妨听听他的意见。”^[8]坂本也给纪伊藩的船长写信，建议他们一起去见英国舰队的总司令。不管怎么说，坂本对国际法的兴趣越来越浓厚，在信中也对收到这方面书籍表示感谢。^[9]在这一点上，他完全是时代的代表。德川时代晚期，日本出现了许多西方的国际法畅销书。

纪伊藩的代表最终认为自己处于劣势，并拒绝接受意见很可能与自己对立的外国人的侮辱。为了使他们屈服时不那么窘迫，萨摩藩的贸易代表五代友厚自愿充当调停人。7月1日，纪伊藩的代表同意分期支付83000两赔偿金。坂本听后欣喜若狂，他写道：“这些钱将用来支付船的费用、船上的货物损失，甚至包括船员和旅客的手提行李。”^[10]此事之中，土佐方面的支持也是必不可少的。正如他写给下关一位商人朋友的信中所说的：“土佐人团结一心，如

同兄弟一般竭尽全力。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让人感动了。”^[11]

海援队的第一次冒险事业结局惨淡，但是却说明坂本可以从土佐藩获得坚实的支持。坂本对国际法产生了新的兴趣。不久之后，海援队增加了出版上的投入，其出版的作品便包括这方面的内容。^[12]

许多证据显示，坂本在长崎享受着无数思想豁达者所能享受的无数机会，并且获益良多，他给长州朋友三吉的信中说：“诸君的长崎简直像是战国时期的地方一样。”^[13]长崎的人和此地的影响力肯定各不相同，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这座城市的管制比较宽松，不像那些新开放的港口城市一样面临着巨大的攘夷压力，也不像其他大都市一样对紧张的政治密谋和流言蜚语那么关注。拥有荷兰和美国双重国籍的传教士奎多·沃贝克（Guido Verbeck）在这里结识了大批武士。仍然失宠于藩内高官的佐贺藩士副岛种臣和大隈重信在这里开始接触后藤。后来，代议制机构得以成立正是他们努力的结果。其他一些年轻学生（包括后来土佐自由民权运动的著名“左派”中江兆民）在这里开始接受培养，而后直接成为传播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的主要力量。

长崎同样也是野心勃勃的商人攫取利润的地方。1867年春后藤离开长崎后，土佐在此的官方机构被托付给了未来三菱商会的创立者岩崎弥太郎。对于坂本和他的海援队手下来说，领导从挥霍无度的后藤变为崇尚“企业第一”的岩崎是不幸的。然而，对于土佐藩来说可能不是这样。岩崎不会过于保守或小心，因为就像坂本的学术兴趣增加了一样，岩崎的商业眼界也扩大了。他只是觉得坂本的浪人不太值得藩国投资，因而将两者之间的联系降到最低。

岩崎从后藤那里继承了开成馆如山的债务，其中大部分都是购买船只和轻武器欠下的，最大的一笔债务是欠英国的阿尔特公司的。^[14]后藤耽于享乐，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他个人的挥霍也成了藩国沉重的负担。^[15]本来计划赚钱的海援队，不仅没有赚到钱，还常常亏本，部分原因就在于此。

因此，岩崎开始着手增加公司的收入。他和老师吉田东洋以前的想法大致一样：日本附近肯定有一些没人居住的岛屿，可以将领土扩张到那里，并且获利。长崎的一个朝鲜人使岩崎心中燃起了与朝鲜做生意的希望，因为朝鲜依然是个完全封闭的国家。岩崎推断，朝鲜人对国际市场缺乏了解，可以低价从他们手里买货，然后高价卖给外国人。他选择了朝鲜东海岸的郁陵岛作为货物的集散地。他派出一艘装备齐全的船去探索郁陵岛，船上还带着一块告示牌，准备按照国际法宣布该岛为己所有：

岩崎弥太郎，遵照大日本土佐藩的命令，发现了该岛。

不幸的是，这个岛已经有朝鲜人居住了，探险队两手空空地回到日本。^[16]

这件事本身微不足道，但是却说明了长崎人对自己国家的商业前景向来乐观。坂本曾经梦想着开发与北海道的贸易和联系。萨摩藩的五代友厚也计划要开发北海道，而且同样在考虑与朝鲜做生意的可能性。^[17]出乎日本人意料的是，当他们最终向朝鲜提出这个建议时，对方居然一口回绝了。受伤的自尊使日本国内出现了“（朝鲜）

开化”的呼声，这一点更是成为明治初期对朝关系的主导思想。

于是，扩张计划随处可见。人人都相信，通过开发不发达地区和与外国人做生意，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正如大家认为外国人通过开发日本而获得了惊人利润一样。在解决纠纷和设立商业机构的过程中，西方的先例和组织只要有合适的特点，日本都愿意采纳。为了地方或者个人利益，他们一点一滴地吸取着这些先进的知识，在这个大好机会中，日本的分权制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为其采纳西方制度创造了有利的舆论。

岩崎满足于创造更多的利润，而后藤象二郎和坂本龙马则不是这样，兴趣和关系促使他们回到京都的舞台。但是，在接着描写他们的京都之行前，我们有必要写一写他们与纪伊藩的代表就“伊吕波丸”谈判时取得的进展。

将军庆喜

1866年8月29日，将军家茂在大阪城去世。为了能在9月6日以他的名义向宫廷请病，并请求由一桥庆喜接替他继续指挥长州征讨，其死讯直到9月28日才公布出来。宫廷在收到请求的翌日答应。^[18]

将军的死讯传到九州之后不久，庆喜就收到了前线的战报，得知情况非常不利，于是决定停止战争。出于对已逝将军的尊重，他依据16世纪的先例制作了一份停战协定，并派最近再度受到重用

的胜海舟到长州议和。胜向长州统治者解释说，幕府征求各大名的意见，已经决定改变作风，并保证长州问题最终将以这种方法解决。停战协定一签署，幕府各藩便开始召回自己的军队。前线地区恢复了和平，不过在九州的小仓地区，零星战斗又持续了几个月。^[19]

幕府方面必须马上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选出新的将军。此时德川幕府的处境是，尽管一些重要人物并不喜欢庆喜，但他们没有其他的选项。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的问题上，没有人拥有他这么丰富的经验和关系，而且大家一致认为他能力出众。尽管如此，宫廷直到1867年1月10日才公布他继任的敕令。

之所以拖延了这么久，一方面是庆喜自己不愿意。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新将军即将面临的困难。不过，他在德川家族内部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仍有许多谱代大名认为他是水户前藩主德川齐昭的儿子，而齐昭在1850年代曾与幕府作对，直接导致了50年代末幕府的危机。庆喜与西南部大领主之间深厚的友情，以及长期在京都休假，也让许多江户的保守派认为他根本没有把德川家族的利益放在心上。他对长州征讨摇摆不定的态度——一开始支持，接着反对，现在当上领导后又提出讲和——着实令他们震惊。这些人宁愿相信他经常利用宫廷去取得与幕府保守派斗争的上风。

那些原来与庆喜关系不错的大名，也不像以前那么喜欢他了。1862年幕府改革时，曾与庆喜密切合作过的越前藩主松平春岳也对庆喜的目的和观点越来越没有把握，而且他对庆喜坚持要宫廷批准去年签订的条约的做法也颇有微词。萨摩藩的岛津久光当时便领教了庆喜的脾气，他对公武合体的热情早已消失殆尽，并没有什么特

别的理由在这个时候支持庆喜。其他的大名，像土佐藩的山内容堂与宇和岛藩的伊达宗城，则发现与其发表错误的立场，还不如不到京都去。

另一方面，庆喜却得到了一些幕府官员的大力支持。他们在京都积极协助，并且对他不吝赞美之词。老中板仓胜静和小笠原长行为了他能成功继任，四处奔走，出谋划策。水户藩士原市之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非常出名，以致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德川幕府的最后阶段就是他和萨摩藩的大久保利通两个人斗智斗勇的过程。^[20]

家茂去世到庆喜继位之间的四个月，那些希望改革幕府或者干脆推翻它的人看到了机会，又变得蠢蠢欲动起来。严格说来，长州藩的统治者仍然受拘于宫廷禁令，因此这些工作自然就落到了萨摩藩的身上。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担心有能力的将军的继任，可能会使他们的希望变得渺茫，因此竭力阻止朝廷的任命。他们活动的场所是京都，而这个古老的首都再次谣言蜂起。由于不满庆喜继续征讨长州的政策，担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愤而辞职，回到家乡。这导致京都的治安再次陷入混乱。浪人和志士开始恐吓那些准备与幕府改善关系的保守派公卿。诽谤信、贴在墙上的告示以及人身威胁，都使高级公卿们惶惶不可终日。^[21]

然而，暴力并不足以改变宫廷的政策。在孝明天皇统治时期，公卿已经逐渐建立起对幕府的信任。他们对幕府外事上的一些做法感到不满，也清楚许多大名并不喜欢将军的许多政策，但是1862年至1863年间的那波勤王主义浪潮使这些德高望重的高级公卿相信，激烈的倒幕和攘夷措施极其愚蠢。另外，为了感谢他们的支持，

幕府加大了对主要公卿（关白、摄政、议奏）的关心，已经悄悄增加了他们的薪俸。^[22]而且，这些公卿本身对庆喜的印象就很好，因此要他们支持萨摩藩的主张，除了有效的说服之外，还需要有一个领袖。

在这次新的勤王运动中，宫廷的主要人物并不是还在太宰府流放的三条实美，而是岩仓具视。自志士威胁要取他性命后，岩仓就隐居到京都郊外。我们不难看出为什么狂热的勤王派会怀疑他。1858年第一次陈述自己看法时，他的建议是拖住西方人，然后在荷兰人的帮助下派使团前往欧洲实地调查。他提醒宫廷不要表面上和幕府对抗，并指出被外样大名的野心玩弄的危险。岩仓的宫廷竞争对手是一帮与水户藩主齐昭过从甚密的人，当时他们赢了。但是，井伊直弼当政期间，岩仓再次脱颖而出，他成功说服宫廷同意和宫下嫁年轻的将军家茂。然后，随着1862年勤王主义浪潮的到来，岩仓因坚持岛津久光的中间路线而激怒了志士。背后有长州藩支持的勤王派暂时在京都占了上风，岩仓被解职。在他退隐的五年里，志士用尽一切办法恐吓他。^[23]

到了1865年，岩仓开始悄悄地联系萨摩人，帮他们和自己在朝廷的朋友分析接下来要做的事。他激烈地抨击幕府未能抓住实现公武合体的大好机会，同时认为现在是收回委付给将军的权力并召开大名会议的合适时机。德川家族或许应该回到江户平原的家族领地。但是，岩仓依然警告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并且认为获胜的一方，不论是幕府还是外样大名，都将继续左右朝廷。因此他一再重申全国人民必须紧密团结在天皇的周围。他还强调必须控制并利用浪人

和志士，同时建议可以将他们分配到一些选定的藩国任职，供以后使用。

1866年，一些人开始在宫廷中活动以期赦免岩仓。大多数的低级公卿很有可能从宫廷的人事变动中获利，因此岩仓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有很多支持者。这些活动虽然还不足以使岩仓获得赦免，但确实足以显示他作为宫廷勤王派领导的地位。他提的建议越来越多，语气也越来越强烈，他的计划和谋略也变得越来越详细而大胆。在这期间，岩仓和萨摩的领导层，尤其是和大久保利通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亲密和信任。他已经接受了必须依靠武士阶层这一事实，并且选择了萨摩藩。

和大久保一样，在岩仓看来，1866年家茂去世是勤王派夺权千载难逢的机会。勤王派公卿提交了一份新的请愿书，要求大赦所有的公家（包括岩仓），罢免佐幕派公卿，在天皇的召集下召开大名会议。这次请愿依然没有成功，但是岩仓并不气馁。他开始鼓吹建立现代海军、开发北海道，以及建立一个全国性政府，其中包括为保证皇权至上而设立的神祇官。为了进一步巩固天皇的这一角色，他建议朝廷授予公卿土地，以增加他们经济政治上的安全感和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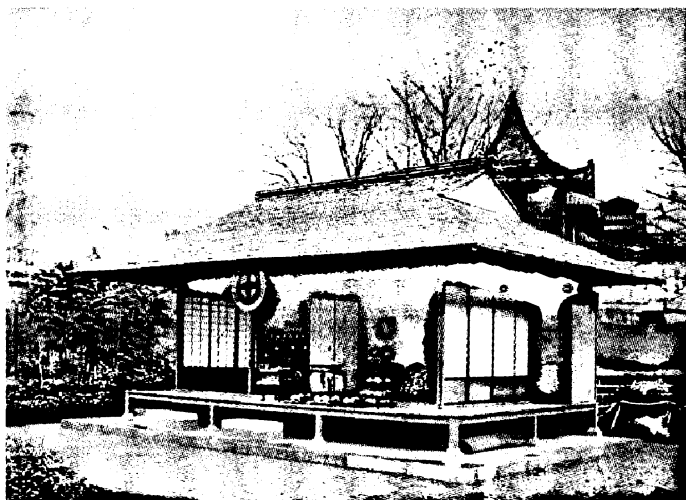
到此为止，岩仓的建议书、备忘录和请愿书对改变宫廷的政策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但确实巩固了他和萨摩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使其成为京都和近畿地区勤王派公卿的领袖。于是，1867年底，岩仓重新成为坂本、中冈这类勤王志士和浪人喜爱的人物。1867年2月3日，孝明天皇逝世，岩仓的支持者有了新的机会。继位的新

天皇（即后来的明治）宣布大赦天下，岩仓也包括在内，而一名 15 岁的男孩取代了备受尊敬的孝明，使得一切计划和谋略均变得简单起来。^[24]

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德川庆喜，即以前的一桥庆喜，还是当上了将军。他们对此虽然沮丧，却一点也没有不安。幕府第一次有了一位经验丰富且年轻（庆喜当时 30 岁）有为的将军。他迅速采取措施，防止京都再有什么阴谋，而孝明死后，出于对宫廷的尊敬，长州征讨也宣布结束。

我们从那些见过庆喜的外国人对他的评价可以看到，同时代人对他的印象非常不错。米特福德写道，他是“一名真正的优秀贵族……我认为，按照我们的标准，他是我在日本这些年见过的最英俊的人。他五官端正，眼睛明亮，眼神敏锐，皮肤光洁，是健康的橄榄色……”萨道义认为他是“我遇到过的最具贵族气质的日本人，有着白皙的肤色，高高的额头和好看的鼻子——真是一位绅士”。^[25]

庆喜上台伊始便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以使幕府机构现代化，可以应付日本面临的种种危机。他首先向老中提交了八条非常笼统的计划，宣布自己将发扬传统的美德，例如公正、任人唯贤，同时努力发展经济、贸易以及加强军队的实力。^[26]这些计划中的一部分是和法国公使罗修斯商讨之后提出的，其目的全是为了增强幕府的支持和行动。3 月 11 日、12 日，庆喜在上台三个月后，在大阪城接见了罗修斯并听取他的意见。从那以后，他一再派板仓去咨询罗修斯，得到的意见也成为幕府决策的重要依据。庆喜的一些手下，特



巴黎博览会上的日本馆，在钢铁建筑映衬下的日式建筑十分别致。

别是小栗忠顺，非常乐于听取罗修斯的意见，对他的大多数建议言听计从。

这些咨询的结果是，幕府设立了新的海军、陆军、外事、财政和内务部，每个部门由一名老中担任部长。另外，古老的世袭位阶制也被改变，以使才能出众者也能够担任高官。一个著名的例子便是永井尚志。他是庆喜的亲信，虽然不是大名，但仍然被任命为若年寄。^[27] 类似的其他几项任命显示庆喜乐于打破传统。官方宣布将向经营大米的豪商正式征税。在幕府会议中，西式服装作为正式着装，代替了传统的和服。1867年夏，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了使国内也像西方一样可以成立商业公司。对待外事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将军会坐在椅子上接见并招待外国公使，例如巴夏礼便

吃了一顿法国菜。庆喜的弟弟德川昭武被派往欧洲，代表将军参加巴黎的世界博览会，而一系列明确推广对外贸易的措施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之中。^[28]

除了制度和物质上的西化，第一批被派往荷兰学习的幕府学者学成归国，也使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普及成为可能。津田真道和西周在这方面的贡献最大，西周翻译的国际法著作受到庆喜的高度赞扬。1867年初秋，两人为庆喜起草了一部新宪法，旨在实现幕府整个管理层的现代化。^[29]

为了重新唤起大家对这个现代化幕府的信心，庆喜计划将那些愿意考虑和支持幕府措施的藩主召集起来开会。津田一西周的宪法包括成立一个类似的两院制议会。1866年底，56个藩国的代表云集京都，庆喜希望利用这些人，尤其渴望利用四五名大藩主的智慧为自己效力。这些人之前的周密考虑曾令他受益良多。

鉴于这名有魄力的将军如此愿意倾听罗修斯提出的大改方案，而且原、小栗和永井这样聪明能干的人才获得重用，将军似乎不太可能再次冒险去疏远外国列强。勤王派暂时处于弱势。事实上，一些水户藩的勤王派甚至变成了佐幕派，因为现在幕府领导人正是他们原藩主的儿子。巴夏礼的翻译萨道义在和西乡隆盛谈话时问他：“这么说来，目前一切已经结束了？”“呃，”他引述了西乡的回答，“我想，我们能够在未来三年认清他。”^[30]几个月后，庆喜接见了外国公使，并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事后萨道义写道：“总的说来，一切似乎都意味着将军取得了胜利。”^[31]

西乡在写给大久保的信中表达了一些同样的担忧。庆喜既有魄力又有才能，他控制了宫廷，又有法国人在一旁帮他并给他提建议，幕府的垮台似乎遥遥无期。^[32]岩仓、木户及坂本本人均不情愿地奉承庆喜，表示敬佩他所做的一切。^[33]

但是，事实上，情况并没有如志士所想的那么艰难。尽管庆喜有过人的才华和丰富的经验，但在以前的大名会议上，他并没有虚心听取自己不喜欢的建议。在眼前与各大藩主讨论时，他必须抑制住自己易怒而专断的性格，显示自己有能力团结他们。另外，许多江户官员仍然不相信他，这意味着他并非完全不受约束。与此同时，宫廷的少年天皇睦仁正逐渐受到中山忠能的影响。中山是个支持攘夷的勤王派，通过近卫家与岩仓具视和萨摩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德川时代还有最后一个外交危机尚未解决，那就是兵庫开港问题。萨道义对西乡说：“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重视兵庫了。它是你手里的最后一张王牌。”^[34]

京都会议

1867年夏，新将军会见了萨摩藩、土佐藩、宇和岛藩与越前藩的实际统治者，讨论解决兵庫和长州问题应该采取的措施。举行这个会议是为了给庆喜的新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提供支持。但是，这一目的非但没有达到，而且从会议召开的方式和讨论的要旨可以看出，以后的这类会议反而加剧了当时在日本主权和领导性质上的分歧。

前往京都参会的这些人，正是五年前最先拥护公武合体和议会制的人。当时他们是这个制度的主要受惠者。但到了1867年，岛津久光、山内容堂、松平春岳和伊达宗城已经不再像五年前那样关心幕府改革并帮助它更有效地治理国家。他们现在关心的是权力而非协助，对这名能干的将军可能主宰的任何会议均怀有戒心。他们怀疑他是利用开会来巩固自己家族的势力，而不是在天皇的领导下真正地实现国家统一。

长期以来，改革派的一个特点便是认为应该成立一个由主要大名组成的议会，协助将军做出重大决策。岩仓具视认为可以仿效16世纪时丰臣秀吉的做法，由五名贵族担任五大老。西乡隆盛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35]大家认为，为了让天皇相信他收到的建议均是集体讨论的结果，成立这样一个由将军领导的议会最合适不过。庆喜本人很清楚这类会议可能给自己带来的种种好处。1862年他被提名为将军便是贵族们尤其是岛津久光极力举荐的结果，而庆喜也把获得议会的支持作为自己接受这个职位的条件之一。但是，当他努力想召集这样一个会议时，却发现他在增加威信的同时，也很可能受到限制。

1866年底，在庆喜成为德川家族的家主但尚未就任将军的时候，他请求召开一个大名会议讨论如何处理长州问题。宫廷同意了这种做法，但是那些支持岩仓具视的公卿却认为，会议的召集者应该是宫廷而不是幕府。另一方面，庆喜和家老们希望自己召唤各位大名，以免显得德川家族的势力已经衰微。一番争论之后，他们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即由宫廷召集24位主要藩主，但敕令上明确写出

是在幕府的要求下这么做的。不过，受邀的大名却不想做出任何不得民心或者不利的决策。24 人中只有 5 人来了京都，而且没有一个是重要人物。孝明天皇召见了他们，称赞了一番，然后把他们解散。敕令发布的时候，一些受到邀请的人已经身在京都，可是却莫名其妙地生病而不得不匆忙赶回藩国就医。由此可见，幕府请求召开的会议没有一次取得了成功。^[36]

长州问题可以等，但是兵庫开港的问题却不能等。1867 年 3 月和 4 月，庆喜在大阪会见外国公使时，对方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罗修斯第一个受到接见，他警告庆喜必须依照条约的规定，在 1 月 1 日前开放兵庫港和大阪。他指出，否则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将采取措施支持成立一个更加听命于他们的政府。但是，罗修斯继续说道，假如庆喜能够控制这种排外的做法，他可以在解决西南强藩的问题上继续支持幕府。庆喜应该将宫廷与政治隔离开来，约束外样大名，还应该废除许多次要的谱代大名领地，整顿军队，用现代化的武装部队代替那些没用的武士，同时在东山再起的幕府领导下加速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37]巴夏礼在接见时强调了兵庫对英国的重要性，支持了罗修斯的说法。

庆喜对这些提醒的回应相当积极。他在接见大使时举止得体，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以致萨摩藩的领导人感到恐慌，担心英国朋友抛弃他们转投新将军。为了确认双方并没有交换承诺，西乡匆匆拜访了欧内斯特·萨道义。萨道义让他放心，而他的回忆录也明确了他和这位萨摩人之间的共识。“我记得接待了西乡等人，他对我们与将军重归于好感到很不开心。我暗示西乡，革命的机会不

容错过。兵库一旦开港，就是和大名的机会说再见的时候。”^[38]

庆喜认为兵库问题必须首先处理。3月24日，他咨询了九位主要大名对此事的看法，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提交各自的意见，并在期限届满之时与他在京都见面。^[39]但是当巴夏礼又一次催他时，庆喜认为自己甚至等不了那么久。4月9日，他向宫廷申请批准兵库开港。^[40]宫廷并不打算这么快屈服。4月23日，宫廷回复称，由于庆喜的申请和孝明天皇的遗愿相悖，因此建议将军先咨询一下谱代大名的意见。4月26日庆喜第二次提交了申请，但收到的答复与第一次并没有什么不同。^[41]

宫廷之所以在兵库开港的问题上不配合庆喜，都是岩仓具视和萨摩藩领导，尤其是大久保利通一手策划的。他们还一起向京都的朋友建议，在幕府咨询过主要的大名之前，不应该允许将军采取任何行动。他们通过这种方法迫使将军等待会议召开。与此同时，为了确保会议能顺利召开，他们一直尽力劝说那些不想参加会议的大名到京都去。大名们一旦集合起来，这些人的计划就开始了。

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认为，让公武合体的领导人碰头是阻止庆喜的一个方法。两人对此信心十足，因为萨摩藩大名岛津久光将是这类会议的重要成员，而他们已经准备好了他在会上发言的意见和建议。

他们必须说服所有与会者都前往京都，因为除非能保证那些人的同伴也会参加，否则没有人愿意来，因此萨摩藩的维新领袖不得不分别去做岛津久光、土佐藩的山内容堂、宇和岛藩的伊达宗城以及越前藩的松平春岳的工作。在这些人之中，他们预计容堂是最难

说服的，因为他尚未决定自己未来的路线，而且德川家族的恩德也令他感到很苦恼。

土佐浪人想出了一个计谋，并且自己也从中获益。1867年初，中冈慎太郎到鹿儿岛去拜访西乡，劝他到高知去见一下容堂。他肯定还建议西乡在容堂面前帮自己和坂本美言几句。3月23日，西乡以岛津久光的特使的身份来到土佐，在逗留期间成功地说服容堂赦免这两人，还为海援队和陆援队争取到了官方的支持。坂本从长崎写的信表明，他完全清楚西乡对自己的事业所做的贡献。^[42]

西乡去土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兵库问题这个政治机会。在与山内容堂交谈时，他强调为了令年轻的新天皇睦仁安心，政府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还使容堂相信，兵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机会。容堂同意到京都去，但是他提醒西乡，德川家族过去对山内家族恩宠有加，因此自己欠对方很大的人情，在民族危急的时刻，国家利益必须超越个人恩怨，所以他同意来参加会议。西乡除了和容堂见面，还会见了几名土佐官员。佐佐木因为生病而无法见到这名萨摩特使，但是听说了西乡与同事们谈话的要点。他在回忆录中描写了自己听到西乡坦率地承认开放兵库港在所难免，以及自己正打算利用这件事使幕府难堪后的震惊心情。廉耻心使他无法接受这种不光彩的做法，佐佐木提交了一份长长的请愿书，解释兵库为何绝对不能开放。虽然简单和直截了当解决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但佐佐木的怀疑为我们解释了接下来几个月土佐藩领导人在面对萨摩藩时为什么会犹豫和不太信任。^[43]

西乡从高知去了宇和岛，并在那里和伊达宗城见了面。在此，

他再次成功说服主人克服了不愿掺和国内政治的想法。回到鹿儿岛之后，西乡跟中冈讲了旅途的情况，而中冈的日记也生动地记录了这名地位很低的萨摩特使是如何跟宇和岛藩领导打交道的。西乡采取了比对容堂强硬得多的方式，最后伊达屈服，同意前往京都。^[44]回到鹿儿岛后，西乡让中冈慎太郎前往京都的大村藩和平户藩的公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不过中冈无功而返。会议召开时，参加者有岛津、容堂和宗城，他们全都是西乡召集的，松平春岳则是萨摩维新领袖小松清廉劝来的。大名们抵达京都的时间先后可能也表明了他们对这项任务的热心程度。5月15日，萨摩藩的岛津久光第一个到，随身还带了700名士兵，伊达宗城三天后到，松平春岳19日到，而容堂到得最晚（6月13日），走得也最早。

正如西乡和大久保计划的那样，岛津久光主导了整个会议。大久保为他写了几份形势概要，强调必须彻底原谅长州大名，同时取消原定的所有惩罚。然而他的主要观点却是庆喜正在无视已故天皇的心愿，准备开放兵库。因此，朝廷应该削减他的领地作为惩罚，而且庆喜本人的地位也“应该降至与其他藩主同样的位置”。所以，大久保设想的是庆喜在议会中与其他人坐在一起的情景，这与庆喜想象中的议会相差甚远。尽管几个月后庆喜终于同意，然而到了那时，大久保却并不满足于这个巨大的成就。^[45]西乡也为岛津准备了一些文件。他强调必须将太宰府落难公卿的大赦问题与长州以及兵库问题结合起来考虑。西乡认为三条实美尤其适合回到宫廷任职。孝明天皇确实没有批准这么做，但是三条的做法情有可原，而且他的忠君思想不容置疑^[46]。从这里可以看到，勤王派虽然

乐于指控庆喜背叛了已故孝明的信任，却并不担心自己违背孝明的愿望。

领主们甫到京都，便去拜访关白二条。岛津代表大名们向关白建议，宫廷与幕府之间的联络官一职应该向“贤者”开放，其目的是推荐曾于1862年跟随他去江户的大原重德。他的努力没能取得成功，因为宫廷公卿均受到已故孝明天皇心愿的限制。相反，宫廷表扬了大名们的关心，同时要求他们将精力放在外部危机和政治问题上。

庆喜急于获得大名们在兵库问题上的支持，于是邀请他们到自己的住处开会，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大名不愿给他面子，都不肯来。几天后，春岳和宗城主动到庆喜的二条城去之后，另外四位大名才屈尊前往。

讨论的核心是解决问题的先后次序。庆喜希望立刻解决兵库开港的问题，而岛津坚持应该先解决长州问题。他渴望在解决能够增强庆喜在外国人面前的形象的兵库问题前，揭露幕府内部的短处。尖锐的讨论过后，春岳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两个问题应该同时解决。岛津一度同意了这个方案，庆喜也同意了。但是后来大久保利通说服了自己的领导坚持原来的立场，接着，大久保和小松也劝谏起春岳和宗城来。容堂由于患了严重的口疾，除了开始的几次会议外，后面的会议均没有参加，不过他赞成春岳的折中方案。此时庆喜认为之前大家均已接受的折中方案仍然有效，于是向宫廷报告说，除了松平春岳反对以外，大家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这种情况恰恰是宫廷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它将不得不在针锋相对的两方之间

做出选择。经过一番踌躇之后，关白二条同意了庆喜的要求。6月26日，宫廷颁布了兵庫开港的敕令。

对庆喜来说，这是一次代价高昂的胜利。两天后，四位大名向宫廷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明确声称庆喜误解了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为了国家的稳定，应该优先解决长州问题。激辩时的刻薄言辞，以及幕府再次强迫宫廷接受自己意见的做法都激怒了密谋造反的勤王派。到了6月底，庆喜已经不再像之前那样处于有利地位了，相反，京都会议巩固了倒幕的阵营，并给了他们新的理由，而兵庫的开放则导致更多反抗外国人暴行的发生。9月11日，庆喜最信任的若年寄和特使原市之进被水户藩的攘夷狂热分子刺杀，因为他们认为兵庫开港是原一手造成的。^[47]

山内容堂是第一个返回藩国的大名。6月29日，他启程返回土佐，而其他三位大名直到9月初才返回。容堂在会谈中的地位比较次要，部分原因是他病得很严重，经常在痛苦之中，而且他也不太赞同萨摩人那种专横的策略——当大名们在土佐公馆开会时，萨摩藩的军队包围了公馆，每个出口都派严兵把守。岛津对折中方案的出尔反尔也使容堂认为这个人毫无信用，为了弄清这些人到底在搞什么鬼，容堂甚至派人跟踪了大久保利通一段时间。他还侮辱过岛津久光，有一次在将军的二条城开会时，他故意开玩笑地拉了拉岛津的头发。他还悄悄地暗示松平春岳，自己派特使中根见幕府的老中板仓，秘密地与庆喜联络。对萨摩藩的怀疑和怨恨导致容堂的心事重重，再加上自身身体不适，因此大半个夏天和初秋，他都不在京都。

容堂怀疑萨摩人的动机，并且对为难庆喜的计划不感兴趣，因

此更愿意考虑可能结束这种政治僵局的其他提议。他希望这种提议与战争无关，因为在他看来，勤王派的领导们正在策划一场战争。他非常警惕自己的那些勤王派家臣，小笠原唯八就是其中之一，他被中冈说服后支持倒幕，于是被容堂解雇。^{*}板垣退助也急迫地想参与倒幕计划，因此被容堂置于对那些精神可嘉但观点却有问题的家臣准备的特别监控之下。他不想参加一场萨摩和长州将成为最大赢家的战争，而且仍然为欠幕府的恩情太多而苦恼。因此，他一定会关注坂本龙马提出，而后由后藤象二郎推荐给他的这些中间路线计划。

成立新政府的计划

京都会议召开时，坂本龙马正在长崎忙着解决自己的问题。在与纪伊藩代表谈判的最后关头，后藤象二郎来帮了他的忙。7月1日，双方就“伊吕波丸”的赔偿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那时容堂刚刚离开京都返回土佐。会议期间一直在京都的中冈慎太郎留在了那里。两个星期后的7月14日，坂本和后藤带着改变日本政治制度的新计划来到了京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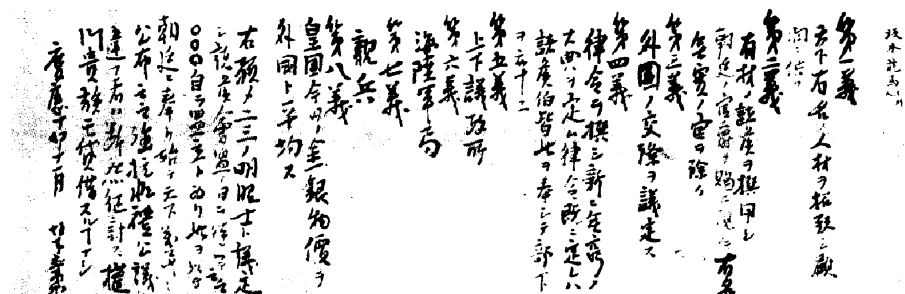
在胜手下服务时，坂本的思想即已形成。他知道一些幕府官员

^{*} 如前所述，小笠原后来参加了板垣退助领导的倒幕军，并在围攻会津藩的要塞若松城的战役中不幸牺牲。

曾建议将军辞去职位和头衔。他还听说了议会制政府，以及在这种架构下将军仍然会是一名拥有大量土地的重要人物。幕府官员大久保一翁曾考虑让藩主们五年开一次会，与此同时，下级贵族在各县召开地方会议。类似的想法在日本许多地方非常流行。松平春岳对此非常熟悉，可能是通过他的谋臣横井小楠知道的。1866年坂本曾和一名越前藩的人谈过，看看是否有可能说服松平春岳主动参与这类变革运动。他认为，身为德川家族旁系的松平春岳是最有可能使这类想法变为现实的人。春岳没有选择这条路线，但是坂本的建议表明，来年的计划丝毫不代表他在想法上有根本的转变。^[48]

接下来在长崎停留的那段时间里，坂本接触了更多这一类的思想。这里云集了从日本各地来的西学者，没有什么比西方的政治制度给日本人（和中国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了。与摇摇欲坠的幕府共同分享权力的大名议会似乎很适合日本。坂本在长崎的合作者当中，有一个学过西医的人，名叫长冈谦吉。按照佐佐木高行的说法，坂本提出来的新政府计划，其实最初是由长冈（佐佐木称为今井，这是他的另一个名字）起草的。长冈是1867年坂本在海援队的秘书，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很亲密。但是，不论由谁执笔，《船中八策》都代表了坂本好几年来希望达到的目的。^[49]

坂本的计划有一个前提，即和平过渡到集体领导。他认为将军可以被说服放弃自己的权力，只要清楚地表明他那样做能够为新政府开路。这个政府不再是躲在宫廷后面的几个私人藩国那么简单。坂本在计划中采用的都是未来20年里很常见的一些现代观点，那些腐朽而荒唐可笑的制度将消失，政府和商业制度将变得合理，一



《船中八策》草稿手稿

支国防军将被建立。这个完美的计划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包括将军和大名，因为他们都担心自己会被新的制度所抛弃。

处理完“伊吕波丸”被撞的事情之后，坂本和后藤一起坐船去了京都。身为秘书的长冈也和他们在了一起。他们知道首都正在筹划重大的行动，迫不及待地想参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坂本在船上给后藤看了他的八条改革计划，这个计划可以大大降低在推翻幕府时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 一、天下政权奉还朝廷，政令当出于朝廷。
- 二、设上下议政局，置议员以参万机。万机决于公议。
- 三、选有才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赐官晋爵，以为顾问，另除旧来有名无实之官。
- 四、广采公议交际外国，新立至当之规约。
- 五、折中古来之律令，新撰定完善之大典。
- 六、扩张海军。

七、置亲兵以守卫帝都。

八、金银货物与外国定宜当之法。

以上八策察方今天下之形势，征之于宇内万国，舍之则无其他急务。苟断行此数策，则挽回皇运、扩张国势、与万国并行亦非难事矣。伏愿本公明正大之理，以一大英断，使天下更始一新。^[50]

坂本的《船中八策》几乎涵盖了整个的维新计划。它的语言被1868年的《五条誓文》模仿，其承诺也成为1874年开始领导设立民选议院运动的板垣和后藤不满的基础。这些思想在德川时代末期的日本非常流行，然而正式以文字形式确定下来却是在坂本和后藤搭乘的那艘船上。这个计划令后藤高兴不已。他觉得可以用它来说服容堂同意推翻德川幕府，同时还可以有力地防止出现一个新的萨摩—长州幕府。

7月14日，坂本和后藤来到京都。^[51]此时山内容堂已经返回土佐，大名会议也已结束，但是其他领主都还在京都。后藤和坂本尤其想和岛津久光的家臣谈一谈，他们知道，一场武力推翻幕府的计划正在酝酿之中。幕府希望不失面子地解决长州问题，使其缺点暴露无遗，*虽然它对大名们的建议置之不理，但是自己却想不出别的解决方法。

坂本和后藤抵达京都时，武力推翻幕府的计划正开始形成。为

* 幕府让广岛藩向长州藩暗示，只要他们请求原谅，幕府将会痛快地答应，但是广岛藩不仅拒绝这么做，甚至连话也没有向长州藩转达。

这一行动出谋划策的主要是长州和萨摩这两个最大的军事强藩，而最大的赢家也将是他们。7月14日上午，岛津久光在京都的宅邸会见了山县有朋和品川弥二郎。久光告诉他们，自己已经断定必须以武力推翻幕府，不久就将派西乡隆盛到长州去巩固两藩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礼遇，他给了山县一把六发式左轮手枪——这一举动超出他的想象，深刻地象征着军事实力已从封建贵族转移到了这名日本现代陆军的创建者身上。山县和品川急忙返回长州，向上级报告消息，萨摩和长州之间进一步加强联系的道路已经铺好。^[52]

对倒幕战争满怀热情的并非只有萨摩人和长州人。坂本发现，自己的朋友、现在在三条实美手下做事的中冈慎太郎也在京都。他从中冈处听说了后者是如何在容堂与将军庆喜开会期间重新联系上板垣退助的。就在板垣跟随主公返回高知之前不久，中冈安排他和西乡隆盛见了一面。西乡和板垣一见如故。当西乡问板垣土佐的态度时，板垣回答说，不管土佐官方的立场是否改变，他准备这个月内带领自己的军队参加倒幕。中冈担心首次见面便说这样的话过于直接，于是向西乡道歉，请他原谅自己朋友的莽撞，但是西乡却一拍膝盖，为终于遇见了知音而兴奋不已。显然，在必须使用武力倒幕这件事上，板垣、中冈与他们的萨摩朋友看法完全相同。^[53]中冈还把一帮听从他指挥的、以前武市勤王党的狂热分子带到了京都。^[54]

但是，中冈听了坂本的计划时，还是看到了一些亮点。没有人会反对将军辞职。虽然中冈私下里认为，就像他说的那样，马背上

得天下的德川家族，必将从马背上失去天下，^{*}但是他却看到了坂本计划的合理性。假如幕府拒绝，那么不愿打仗的土佐藩也能够以此为由，名正言顺地加入那些准备武力倒幕的藩国。只要大家明白，幕府的拒绝将会导致战争，这个计划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坂本和后藤成功使京都的土佐代表相信，土佐必须重返国内政坛。激动人心的事件即将发生，土佐不能缺席。正如坂本所警告的，现在特别有必要让萨摩藩的领导相信，土佐藩长期以来的犹豫和迟疑已经结束。大家必须明白，正如他所说的，帘子一旦拉起来，好戏就开场了。^[55]两人以此为论据，成功使土佐的京都代表相信，土佐藩应该带头说服将军放弃手中的权力。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既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又不让强大的邻藩起疑心。大目付佐佐木高行的到来，对坂本和后藤的劝说行动起了很大的帮助。

成功劝服了土佐领导人之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让萨摩藩也支持这项行动。在坂本和中冈的努力安排下，7月22日，萨摩—土佐会议在京都的一家餐馆召开。萨摩藩的代表是小松清廉、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土佐藩的代表是后藤象二郎、福岡孝弟、寺村左膳和真边荣三郎。^[56]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也在场。

这次会议的成果是签订了一份以坂本的《船中八策》为基础的萨摩土佐合作协议。协议由后藤象二郎起草，序文阐明了合作的基本原则：

* 岩仓也说了一番同样生动的話，他说要迫使庆喜成为另一个石田三成。1600年，德川家康在夺权大战中，曾将石田活捉作为人质。

一、匡正国体，度万世临万国而不耻，此第一义。

二、王政复古。察宇内之形势，参酌协正。

三、国无二帝，家无二主，政刑只归一君。

四、居将军职而执政柄，此天地间未有之理也。宜归侯列，翼戴其主。

右乃方今之急务，天地间常有之大条理也。今当心力合一，毙而后已，绝无顾成败利害之暇。

协议的正文更详细地说明了这一点：

方今皇国之务，纠正国体制度，比之万国而不耻，为第一义也。其要在王政复古，参酌宇内之形势，及至后世，以无遗憾之大条理处之。国无二王，家无二主，政刑归于一君，乃此大条理也。我皇家绵绵一系，万古不易，然变古郡县之政，成今封建之体，大政遂归幕府，不知其上有皇帝所在。于地球上考之，未有国体制度如斯者。故需制度一新，政权归朝，建诸侯会议，成人民共和，庶几较万国而不耻，以此初立我皇国之国体。若执于二三事，喋喋抗论曲直，朝幕诸侯俱相难辨，言枝叶而止于小条理，反失皇国之大基本，岂为本志哉？而后当执心公平，存于所见万国。以此大条理，立为大基本。今非顾堂堂诸侯之责、忧是非成败之时。志士当毙而后已。方今当更始一新，谋皇国之兴复，除奸邪，举明良，求治平，为天下万民行宽仁明恕之政。

协议接着写道，

故定后文之条目：

一、议定天下大政之全权在朝廷，我皇国之制度、法则、一切之万机，须出于京都之议事堂。

二、议事院之建立，由诸蕃贡献费用。

三、议事院分上下，议事官上为公卿，下为陪臣乃至庶民，选举正义纯粹者。且诸侯据其职掌，充上院之任。

四、未有以将军职而掌握天下万机之理。将军宜辞其职，归为诸侯之列，归政权于朝廷。

五、各港外国之条约，于兵庫港报于新设朝廷大臣诸大夫。宜立道理明白之新约定，行诚实之商法。

六、朝廷之制度法则，往昔虽有律令，然参当今之时势，或有不当者，宜改革弊风，建不愧地球上之国本。

七、关系此皇国兴复议事之士大夫，应去私意，基公平，不行术策，贵在正实，不问既往之是非曲直，以人心一和为主旨，定持议论。

以上约定之盟约乃方今之急务，天下之大事未有如此者，故一旦盟约决议，不可再顾此事成败利害，唯当一心协力永远贯彻。^[57]

这份写得非常巧妙的协议，显然兼顾到了土佐关心的问题。将军不会被消灭，而是将成为“诸侯”。不会有新的幕府，也不会有

专制的宫廷，而是会成立一个议会来保障全体的利益。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协议在于赢取并理应得到外国承认，以及修改国家制度方面的主张。他们认为那样才能建立经受得住时间考验和外国人审查的国家制度。事实上，急于避免在“万国”面前露“耻”的日本已经真正进入了明治时代。

坂本成功使藩国领导人看到了这个计划的英明之处。他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兴。这个计划使他们与其他西南强藩的领导人保持一致，并且在未来的决策中拥有同等的发言权。在这种时候，他对指责自己与后藤象二郎交好的姐姐变得不耐烦起来，他这么对姐姐说：“我想你可能没有想过，假如我不是带领 500 人或者 700 人，而是能够带领我们整个藩国，连同它的 24 万石高去为国家服务，那样不是更好吗？”^[58]显然，他自己就是这么看的。

萨摩和土佐之间还有一个不成文的协议，即萨摩同意延迟举兵，让后藤有机会说服容堂去劝说庆喜辞职。反过来，后藤承诺将带两营士兵回来，这样，如果庆喜拒绝辞职，倒幕的盟军将可以展开快速有力的进攻。西乡对后者的可能性更感兴趣。他和中冈一样，认为不打一仗，庆喜绝不会屈服。后藤启程之前，西乡安排了一场宴会为他饯行。留在京都的土佐和萨摩的高级官员都到场了，一开始大家有些尴尬，但是宴会加深了新人之间的友谊，巩固了业已建立的政治关系。^[59]

土萨联盟，这个自武市瑞山时代起勤王积极分子就为之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它将成为土佐—萨摩—长州联盟的前奏。西乡写信给自己的长州盟友解释发生的事情。他认为，将军可能不会辞

职,但是土佐以及随后土佐军队的协助让这份协议非常值得缔结。^[60]不过,后藤依然需要得到藩主的批准,抱着这个想法,他接着去了高知。

山内容堂立刻发现这个请求庆喜辞职并承诺召开大名会议的提议很不错。正如他所说的,这样可以挽救德川家族,而且为他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方式,使他既能尽到对该家族的义务,又兼顾到自己厌战的个人兴趣。如果打起来,土佐将不得不在义务和利益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而战争并不会给土佐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同意向幕府提交一份建议书。

容堂不愿在京都部署更多的军队以用于应对将军拒绝辞职。他不想看起来像是在强迫庆喜辞职,也不愿将自己的精锐部队交给看法可能与自己迥异的下属。一旦脱离了自己的控制,这些军队可能很容易就被板垣这样的顽固分子利用去支援萨摩和长州攻打幕府。

容堂犹豫而拖延,以至于萨摩藩的领导人又开始怀疑他了。京都的勤王分子议论纷纷,甚至说应该在德川幕府之前先惩罚土佐。正在京都等后藤回来的坂本和中冈费了很大劲才制止了同伴,使他们没有做出什么危及新协议的行动来。

中冈慎太郎想了一个办法。此时他得到土佐官方的授权,正开始组建一支辅助部队。他的陆援队是一支与坂本的海援队类似的陆军组织,设立的目的是利用一些勤王派志士,同时保护他们免受幕府浪人武装团体袭击。在紧急情况下,它可以成为京都地区的一支小型机动部队。一些旧相识和浪人朋友,以及从不断增加的武士中招募的新人都加入了陆援队,在这里武装、训练、居住。中冈的花名册上写着创始人员共有 519 人,这些人来自天南海北,甚至包括

德川家族的发祥地三河国。与坂本刚开始创立那支海军时的情况相似，中冈也制定了相似的规章，使自己拥有陆援队的绝对领导权。副领导是田中光显。土佐藩提供活动资金，而驻扎在京都的佐佐木高行则将自己在白石村的宅邸贡献出来，作为陆援队的活动中心。^[61]

与此同时，土佐藩的军队领导板垣退助则在稳步加强常规部队的实力。借助西式武器和西式训练法，他正努力将这群异常关心身份地位的武士训练成一支精锐部队。维新战争中土佐军队的优异表现大部分都是他的功劳。

就这样，整个1867年7月都过去了，土佐藩的意见还是远远无法统一。准备随时加入战争的板垣退助和中冈慎太郎，一个是军事专家，一个是支持武力倒幕者，正在等待萨摩藩和长州藩打响第一炮；坂本和后藤更希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他们提出的让庆喜请辞的建议曾成功地阻止了战争的计划；山内容堂将不得不向将军提出这个建议，但他依然不能确定，万一庆喜拒绝，自己将何去何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领导人变得越来越不耐烦。就在这时，一个与外国人有关的小插曲暂时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而这对土佐藩来说真是天大的好事。它也是坂本的海援队附带的一个好处。

“伊卡洛斯”号事件

1867年8月5日，英国军舰“伊卡洛斯”号上的两名英国人，罗伯特·福德和约翰·哈钦斯在长崎的红灯区丸山被害。英国领事

马库斯·弗劳尔斯匆忙做的初步调查发现，当天刚刚到达的海援队船只“横笛丸”在第二天一早就驶离了长崎港。由于一艘土佐藩的船在当天离开了长崎港，弗劳尔斯猜测，罪犯已在港外被转移到了土佐藩的船上，并且正返回高知。海援队的成员以喜欢饮酒作乐和追求女性著称，而且谋杀发生的那天晚上，有几名海援队成员去过红灯区。也难怪弗劳尔斯会得出结论，认为凶手就是土佐人。刚刚过去的几个星期接连发生了几桩袭击外国人的事件，对此非常紧张的幕府不愿怀疑英国人提出的证据，况且这还可以顺便打击一下这个忠诚度已经大打折扣的西南强藩。双方决定由幕府派一名外国奉行和巴夏礼一起到高知去，亲自与山内容堂解决这件事。种种迹象表明，高知很可能重蹈鹿儿岛和下关的覆辙，因袭击外国人而直接遭到炮轰。^[62]

高知当局急忙从京都召回佐佐木高行和另外一名大目付。在与京都的幕府官员交谈时，佐佐木惊讶地发现，幕府竟打算全盘接受英国人提出来的那些站不住脚的旁门佐证。他为自己藩国受到怀疑感到愤愤不平，解释说所有的土佐武士均遵守不许杀害外国人的命令，然而并没有什么效果。佐佐木决定不坐幕府或者英国的船回高知。由于没有土佐的船，于是他找到西乡隆盛，请求帮助他返回高知。西乡很快就为佐佐木找了一艘萨摩船，他提醒佐佐木高行，萨摩藩也经历过类似的困境，并暗示幕府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借外国人之手打击土佐。^[63]但是不像在1862年和英国人有过交锋的鹿儿岛人那样，佐佐木及其同僚并不想与外国人来一场战争，打仗的话必定会失败。他们甚至都不能让英国人不满。后藤在长崎的开成馆向英国

的阿尔特公司订购了许多东西，欠了对方一大笔钱。要是和英国人反目成仇的话，将会特别尴尬。

正当那艘载着佐佐木的萨摩船只准备启程驶往土佐的前一天晚上，又有一名乘客登上了这艘船。由于手下的人被指控谋杀，坂本龙马不得不踏上自 1862 年离开土佐以后的第一次回程。他的身份依然不确定，虽然已经被藩国赦免，但是他并没有拿到返回藩国的许可，正如佐佐木所解释的那样，他不能公开上岸并接受勤王派老朋友们的欢迎和奉承。不过，藩政府基于两个极佳的理由允许他回来：第一，他所讲的话和所做的调查，对于与海援队有关的问题都非常关键；第二，他身上带着一封松平春岳写给山内容堂的信。春岳表示了对容堂所面临的困境的同情，但是劝他不要引起不必要的外交麻烦，尽可能地和英国人达成和解，即使杀人的罪证并不充分。容堂愤怒地拒绝了这个提议。^[64]

船在高知以西的须崎港靠岸，这里比高知港水深。佐佐木很担心坂本的安全，他写道：“此时此刻，藩政府中的佐幕派非常敌视那些脱藩者。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幸运的是，他成功将坂本转移到一位担任土佐海军舰长的友人那里，自己则继续前往高知向容堂汇报。这和坂本曾向姐姐保证过的那种衣锦还乡的情况有些不同，坂本甚至无法见到自己的家人。他写道：“我在忙着进行秘密谈判，因此无法和你联系。”^[65]

与英国人的谈判正在进行，而与此同时，板垣退助和他的现代军队也一点都不让人省心。板垣调兵遣将的样子似乎是准备进攻外国人，有一阵子传闻说他正打算那样做。但是，当后藤象二郎等人

警告他时，他却信誓旦旦地反驳说，自己正在训练军队去进攻幕府，而不是英国人。^[66]

英国人无法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证明自己的观点。以脾气暴躁著称的巴夏礼当着土佐藩首席谈判代表后藤象二郎的面发了一通火。萨道义一边道歉一边解释说，自己的领导在中国工作时染上了喜欢骂人的坏习惯，后来后藤亲自登门拜访巴夏礼，要求对方做出解释。^[67]事情很快真相大白，英国并没有真正的证据证明凶手是土佐人。

最终，大家决定还是回到有更多证人的长崎，继续谈判和调查。官员们于是乘坐土佐的“夕颜丸”，即原来的“朱林”号（Shooeyleen）离开了须崎。佐佐木是土佐的代表，萨道义则是英国的代表。坂本也登上了这艘9月9日启程的小汽船。他们在海上走了三天才到达长崎。不幸的是，萨道义晕船非常严重，没能注意到与他同船的坂本。他对这段旅途的印象如下：“我在疲惫和痛苦之下，平静地接受了糟糕的食物、肮脏的客舱、酷热以及周围愁眉不展的旅客。‘朱林’号的锅炉太老，我们以一小时两节的速度行驶着。幸运的是，天气还算晴朗，否则我们肯定已经葬身海底了。”^[68]佐佐木的描述同样没什么帮助。他提到，在坂本的提议下，他们一起在下关上岸，看望了坂本的妻子龙。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关于船上讨论的细节。^[69]

船只抵达长崎后，坂本向佐佐木建议用悬赏的方法鼓励民众提供犯罪线索。佐佐木照做，但是没有立刻见效。由于不能证明罪犯是土佐人，10月4日，英国和幕府同时撤销了对土佐的指控。这个

案子直到一年后才破，那时发现犯人是福冈藩的武士，而他在杀死两名英国水手之后随即自杀了。^[70]

这次调查产生的一个意外结果是佐佐木和坂本在调查期间成了好朋友。佐佐木的回忆录表明，坂本对新的思路和战术非常感兴趣。他们讨论了将军辞职后设立议会制政府的想法，并一致认为应该设法让越前藩的由利公正加入新政府。这样一来，将又有一名坂本在胜手下工作时认识的熟人得到重用。为了打败幕府，坂本不惜使用各种非常规的手段，使佐佐木感到大为惊讶。1865年，浦上的基督教徒参加了在长崎举办的天主教弥撒。他们是几个世纪以来幕府审查和迫害的幸存者。佐佐木引用他的话说，“如果和萨摩长州的计划失败了，那我们应该利用基督教来煽动民心。之后的混乱会把幕府拉下马来”。我们知道，佐佐木接受了幕府的观点，认为基督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危险学说，因此，他感到非常震惊。佐佐木回答说，用武力推翻幕府没有问题，但如果是基督教的话，事情将不会就此结束。它带来的危害将是永久性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基督教会比幕府更糟糕。佐佐木坚持认为国家的基础应该是神道教，同时辅以儒家思想。他无法说服坂本，后者认为人应该能够区分目的和手段。^[71]

从这时起，佐佐木成为土佐藩在长崎的行政领导，是坂本和岩崎为了海援队和藩企而必须与之打交道的顶头上司。佐佐木在回忆录中明确写道，虽然坂本及其手下的人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但他还是更喜欢他们而不喜欢岩崎。佐佐木一开始反对后藤设立开成馆，认为这是浪费和自贬身份。后藤为了政治目的而忽略了财务上的考

虑，而岩崎则是另一个极端，他认为自己唯一的任务就是进行整顿。他没有坂本希望的那么慷慨，而且私下里对这群吵吵闹闹的海援队成员甚是反感。佐佐木之前反对过后藤的恣意浪费，但是他现在觉得岩崎的举动更像是一名商人而不是武士。这名理性的生意人、未来明治时代的商业巨子发现，自己总是不断地与这位耿直率真的勤王派上司冲突。^[72]

反过来，海援队给佐佐木带来了很多麻烦。海援队名义上是土佐藩的组织，但却由各地的浪人组成，成员们在长崎臭名昭著。它常年债务缠身，做生意极少成功，正一点一滴地榨干藩国的财政。^[73]坂本在信中清楚地表明了海援队面临的问题。在给长州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询问是否可以给他手下的失业者找些事做。还有一次，坂本不得不写信帮助朋友、赞助人长崎商人小曾根，他因被怀疑为长崎和大阪的幕府官员传递信件而在下关被捕。坂本向长州的朋友保证，小曾根是海援队坚定的支持者，一直都是值得信赖的人。^[74]

虽然坂本的主要兴趣是政治，但是 1867 年秋，他仍然找时间为海援队拉来了几桩生意。他与田边藩签署了一份协议，约定海援队将田边藩的土特产运到长崎贩卖，并在那里为其采购物资。协议规定，海援队将考虑借款给田边藩，帮助后者购买土特产，同时用贩卖土特产所得的资金为其购买西洋货。不久，田边藩的代表就收到了 500 两银子，用来购买土特产。^[75]

坂本接下来的投机事业是与荷兰商人哈特曼交易。海援队同意购买 1300 支步枪，首期付款 4000 两，接下来再付 12000 两。有趣的是，

这次交易的首付并非来自土佐，而是来自萨摩。土佐藩派了一名长崎商人到萨摩藩去，让后者安排在大阪的交易所借一笔款给土佐藩。佐佐木高行作为这次借款的非正式担保人，也在文件上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土佐用这笔萨摩藩的借款支付了给田边藩的 500 两银子，得以启动了与田边藩之间签订的协议。很明显，坂本善于一钱多用，将一笔有限的资金同时用于好几个项目，希望以此获得可观的利润。^[76]

至于步枪，坂本的初衷是想将其献给土佐藩政府，以感谢他们的赦免之恩。由于佐佐木已经保证土佐藩将会支付这笔钱，因此这又可视为颇有商业头脑的一笔交易。萨摩藩本身非常愿意借钱给土佐藩，因为这些步枪可望加强土佐军队的实力，而后者将与京都的萨摩军队会合，一起进攻幕府。

这类交易导致人们对商业组织的模式有了新的思考。1867 年夏，坂本的追随者陆奥宗光（1894 年将出任外务大臣）写了一份报告，完美地阐述了这个问题。陆奥比较了西方和日本货主的不同：西方的货主只按照货物的吨数收取运费，并保证货物的安全，而日本的做法是船东一开始支付给货主部分货物的价款，前提是交货时可以获得比支出更多的收入。陆奥认为海援队应该采用西方的做法，并且认为日本应该像西方那样成立有限责任公司。这样一来，海援队可以将业务扩展到日本的所有港口。他接着说道，船长应该负起更大的责任，因为假如可以当场做决定，他们将能够赚回更大的利润。最后，陆奥认为海援队应该按照军用和商用分成不同的部门，两者之间不能重叠。他似乎是想说，假如海援队专注于业务的话，将会

更加成功。^[77]

就这样，坂本和朋友们在商业和政治上均准备在看起来合适的地方采用西方的例子。那些已经开始的企业显示出了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可能带来的利润和增长。但是，必须重复一遍，并非只有坂本和陆奥两个人持有这种观点。1867年夏，幕府决定允许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放弃限制外国人与官方行会的贸易。^{*}政治和外交危机使得这些计划无法立刻实施，但是显然，不管是在幕府内部还是幕府的敌人中间，西方的例子到处都受到好奇和敏锐者的欢迎。

1867年的夏天是德川幕府命运的转折点。京都的大名会议已经证明，利用这种会议为幕府争取支持的希望落空。志士对庆喜可能成功的担心已经被推翻他的希望代替。坂本龙马和后藤象二郎制订了一个和平解决争端的计划，至少暂时延缓了战争的到来，而就在容堂还在犹豫之时，一场新的外交危机使所有人意识到，日本已经不能再这么无休止地分裂下去了。

在此期间，坂本这类人可能扮演的角色的本质，从今以后将发生显著的变化。阴谋策划的年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正式的联合和高层的谈判。结盟已经不再需要那些为所欲为的浪人从中撮合，因为藩国间的私利已经提供了所有必要的激励。坂本已经感觉到了

* 幕府制定的限制和引导贸易的政策，被萨道义和他那些来自西南的志士朋友们聪明地加以利用，从而证明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处理手法必须做出根本的改变。

这一点，因此才寻求重新在自己的藩国立足，而且已经成功赢得了后藤象二郎的支持。但是现在，土佐藩面临着被萨摩—长州的作战会议夺去所有光芒的危险，而坂本不可避免地要从政治维新的最后一幕的舞台中央退下来了。

第八章 维新

“伊卡洛斯”号事件解决之后，后藤象二郎才带着藩主答应恳求庆喜辞职的决定回到京都。此时萨摩人延迟进攻幕府的期限已经结束，他们准备与盟友长州签署一份新的军事协定，同时，岩仓具视可以在宫廷为他们提供官方授权的证据。但是，后藤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计划。两套计划和方案同时进行。结果，接受了山内容堂的建议，辞去职位的将军落入了岩仓和萨摩人准备的圈套里。

1867 年秋是一段异常混乱的时期。每个人都感觉到巨变正在形成，没有人希望到最后发现自己站错了队，因此，即便是在倒幕最为坚决的萨摩藩也出现了这么做是否明智的激烈争论，从而拖延了决策的时间。土佐藩内部也有类似的纷争，而广岛藩的政策则疯狂地来回变换。坂本龙马在这几个月的决策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因为高层开始讨论时，浪人中介和鼓动者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尽管如此，对于将军辞职之后成立的新政府，坂本的观点却非常值得仔细研究，它们连接了他早年对封建制度的模糊质疑，以及他未见到的明治初期大刀阔斧的改革。

容堂向庆喜请愿

1867年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后藤象二郎回到土佐，向山内容堂报告说自己已经就与坂本龙马在去京都途中制定的八条政策与萨摩藩领导人达成了一致意见。一旦将军辞去手中的特别管理权，一个不会令任何人蒙羞的新政府将会在天皇的名义下成立。政治主动权将掌握在上下两院手里，上院的代表是各位大名和公卿，下院的代表则更为广泛，“乃至庶民”。后藤向容堂解释说，在这种新的结构中，庆喜仍然是领土最大、可支配收入最多的一名藩主，因此将发挥重大作用。另外一种选择是进行一场破坏性的战争，战后，军事实力最强的萨摩藩和长州藩将和德川幕府一样，掌握独裁权力，而它们很可能会更不考虑土佐的感受。后藤称广岛藩的领导已经同意他的计划，假如容堂同意，这次请求庆喜辞职的请愿书将由土佐、广岛和萨摩藩共同提交。另外，他还说，庆喜的亲信之一、若年寄永井尚志曾经向他暗示，将军极有可能亲切地接受这类请求。后藤在与容堂交谈时，极力强调幕府的垮台迫在眉睫。他让容堂确信，庆喜很可能会接受辞职的请求，尤其是由他信任的人提出的。这个计划将为容堂提供一个机会，使他可以报答德川家族一直以来的眷顾之恩，同时又兼顾到身为天皇臣民这一更大的责任。后藤还带来了岛津久光和松平春岳的两封信，其中敦促容堂同意后藤的请求，亲自去京都提交请愿书。

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8月12日，容堂同意了后藤的建议。他认为这些建议既慎重又不失颜面，而且非常愿意带头阻止一场

灾难性的内战。

另一方面，正如之前已经提到的，他拒绝了后藤的另一个请求，即带一些土佐士兵到京都去。后藤解释说，正是因为同意一旦劝说庆喜失败，土佐将会加强倒幕阵营的军事实力，萨摩藩才同意和平解决这一争端，但是容堂不想看起来是在对庆喜施压，而且没有把握自己的军事将领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因此后藤只能两手空空地回到京都，没有给萨摩藩带去自己之前所承诺的部队。

计划还没开始实施，就爆发了“伊卡洛斯”号危机。直到10月4日土佐藩才洗清嫌疑，而在那以前，容堂和后藤都在土佐与巴夏礼谈判，佐佐木高行和坂本龙马则去长崎调查取证。其间，各方均有充足的机会讨论已经决定的路线是否明智。容堂已经做出了决定，但是对于这一路线的优点，他的谋士和家臣的意见远未统一。

一些自称为勤王派的人反对采取任何非战争的手段。五年前，勤王运动曾丧失了代表乡士和庄屋利益的含义，而那对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它的一些支持者现在成了政府的高官，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人比板垣退助更强烈地反对要求庆喜辞职。他陪容堂参加夏天的京都会议，回来时非常兴奋，因为土佐很有可能和萨摩、长州一起参战。他已经设法弄到了几百支美国制的步枪；而且整个夏天都在训练军队。板垣强烈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甚至建议在无法说服领主的情况下，手下逃离土佐，加入他在京都领导的军队。容堂注意到了板垣的不满情绪，为了安抚而将其提拔为大目付，并让他全权负责土佐的军事改革。这分散和转移了板垣的精力，直到“伊卡洛斯”号事件谈判结束，他都在忙着制订土佐军队的现代化计划。^[1]

到了“伊卡洛斯”号危机结束时，板垣的军队已经做好了准备，反对向庆喜请愿的立场也更加坚定。他认为，不先打败庆喜，削弱他的领地，就意味着情况不会有什么变化。听说（佐佐木高行在长崎也听说了）后藤和坂本已经向容堂保证，庆喜辞职后肯定会被新政府任命为关白，板垣表示强烈反对。容堂最后认为应该解除板垣的领导权，他再次离开土佐前往京都前甚至下令要板垣去美国进修。^[2]命令并没有真正执行，而板垣最后也重新夺回了军队的领导权，并因带领一支最为优秀的陆军参加1868年的倒幕战争而名声大噪。假如容堂当年坚持让板垣去美国，那么这名未来民主运动领导人的职业生涯可能将非常不同。^[3]

容堂同样受到许多保守派家臣的压力。这些人认为请求将军辞职的行为过于鲁莽。他们无法适应德川幕府已经衰弱的事实，担心提出这一冒昧的请求将会受到幕府惩罚。9月17日，容堂将家臣们聚集在一起，告知自己已经决定向将军递交请愿书。他解释说，考虑到变得和西方一致的迫切性，日本必须改变自己的政策，而抛弃旧的幕府制就是时代的一个要求。他接着说，这一方向符合将军的真正利益，同时保证自己绝对不支持武力倒幕。就这样，容堂在约束手下的军事狂热分子的同时，又消除了保守派的顾虑。^[4]

一旦决定向将军请愿，容堂便命令侍读松冈毅轩按照自己和后藤的计划起草请愿书。^[5]请愿书的内容和措辞均可追溯到坂本和后藤在船上讨论的那八条政策。它分成两个部分，在容堂的个人陈述之后是一份附有几家臣签名的详细计划。

容堂一开始便指出，目前的国家分裂状态是“我之大患，彼之

大幸也”。他认为讨论这种情况的原因和起源没什么意义，但是强调必须团结一切力量重新建立一套政治制度，这样才可能成立一个“亘万世而不耻，临万国而不愧”的政府。容堂说自己因为身患重病，暂时无法亲自到京都来，但是派几名家臣带来了详细的建议，希望将军能够考虑一下。

补充声明重复了容堂的观点，认为必须建立一种能够持久存在的国家制度。容堂的家臣解释说，他们的主公自夏天的京都会议之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跟平时一样，他的建议一共有八点：

一、议定天下大政之全权在朝廷，我皇国之制度法治一切万机必出于京师之议政所。

二、议政所分上下，议事官上为公卿，下为陪臣乃至庶民。应选举正明纯良之士。

三、于都会之地设庠序学校，分长幼之序，必教导其学术技艺。

四、一切与外蕃之规约，由兵库港新设朝廷大臣与诸蕃相议，结道理明确之新条约，行诚实之商法，以不失信于外国为要义。

五、海陆军备乃一大至要。宜于京摄之间筑造军局，建朝廷守卫之亲兵，组世界无可比类之军队。

六、中古以来，政刑出于武门。洋舰来航以后，天下纷纷，国家多难，于是政权稍动。此乃自然之势也。至今日，宜改新古来之旧弊，不限枝叶，不止小条理，以建大根基为主旨。

七、朝廷制度法治，虽从昔之律例，然参合方今之时势，或非当然。宜除其弊风，一新改革，建地球上独立之国本。

八、议事之士大夫，去私心，基公平，不设术策，以正直为旨，不问既往之是非曲直。一新更始，视今后之事为要。勿履言论多而实效少之通弊。^[6]

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有容堂的侧用人寺村左膳、后藤象二郎、福岡孝弟和神山郡廉。请愿书准备停当后，9月22日，后藤启程前往京都。由于天气恶劣，他10月1日才抵达那里。

准备战争

后藤发现，京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他7月份离开京都时，萨摩藩还同意等到请求庆喜辞职的请愿书提交后再说，但是后来他们认为土佐不太可能参加他们的计划。萨摩人知道“伊卡洛斯”号事件给土佐带来的麻烦，但是鉴于土佐并没有派军队到京都来，因此认为自己不再受夏天签署的协议的约束。他们担心继续拖延下去可能会失去长州藩的信任，而宫廷的盟友也在催促其采取更强硬的措施。在与英国外交官的会晤中，他们发现法国要为幕府提供进一步帮助，这更加深了人们的忧患和危机意识。

法国人的危险在会晤中被放大，但实际上它却缩小了。罗修斯对幕府的影响依然巨大。他与幕府官员制订了许多计划，显著提升

了法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占的份额，技术、武器，甚至是幕府开设的外文学校（已改名为“开成所”）中教授的外语都证明了这名拿破仑三世代表的工作卓有成效。像小栗忠顺这样的幕府领导一直坚定不移地请求法国继续提供援助，1867年夏天德川昭武的访法，以及9月14日栗本锄云随后抵达巴黎，都使人们毫不怀疑幕府对这种关系的依赖。

但是，罗修斯在巴黎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靠山。1866年秋，莫斯蒂埃侯爵（Marquis de Moustiers）取代德鲁安·吕伊（E. Drouyn de Lhuys）出任外交部长，随后法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谨慎起来。墨西哥外交的惨败，以及日渐强大的普鲁士给欧洲带来的阴影，都使法兰西帝国不再热衷于掠夺亚洲的资源。他们给罗修斯下达了新的指示，要求他维持与幕府的良好关系，同时不要疏远在他们看来有可能取代幕府成为新的国家领导的大名。文件中还引用了下院关于法国政策的讨论，以此提醒罗修斯必须谨慎行事。罗修斯质疑新政策不明智，坚持认为幕府胜券在握。他对庆喜的能力赞不绝口，并认为法国的利益在于全力支持幕府，协助其对抗敌人。但他没能说服自己的上司，即便他们并没有解除他的职位。德川昭武到法国时，所得到的资助（之前已经谈妥，由幕府的商务代表弗勒里·厄拉德支付）少得可怜，而等到栗本到达巴黎时，第一件事就是向江户汇报并谴责这种明显冷淡的态度。显然，法国的援助远远没有罗修斯承诺的那么大方，那么热情。^[7]

对巴黎的这种转变，英国和萨摩藩的代表均有所了解。巴夏礼派了顾问冯·西尔德到巴黎去，随后他详细地向巴夏礼汇报了幕府

代表在巴黎受到的冷落。萨摩藩的代表岩下方平也在巴黎，他写信向国内描述了法国人和驻日法国代表态度上的差异。事实上，法国允许萨摩代表团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参加 1867 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说明法国对罗修斯的支持远没有他所承诺和希望的那么多。^[8]诚然，法国官方态度的冷淡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会取消之前对日本的承诺，在距离的作用下，这些报告到达远东时已经变得模糊不清，而且在多数情况下，人们还得将它们与其他更加令人震惊的报告对照着看。^[9]

不管萨摩领导人和英国外交家对法国人的用意把握得多么准确，他们彼此之间还是不遗余力地互相刺激，深恐对方没有看到法国人援助下的惨淡未来。8 月 26 日，西乡隆盛在大阪与欧内斯特·萨道义进行了一次颇有启发性的长谈。一名萨摩藩同僚提醒说，英国人打算出卖萨摩朋友而改为与幕府结盟，西乡想亲自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萨道义后来用这段话概括了英国的政策：“英国公使馆……的政策是，只要他们的影响力消除，天皇就应该重新成为国家的首领，这样我们的条约才有可能得到批准，并且没有人敢说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君的政府构成方式必须做出改变，应该允许主要的大名（或者叫藩国更加合适）也分享权力。”^[10]萨道义与西乡的谈话记录在萨道义的回忆录中，也可以从西乡写给鹿儿岛的两封长信中看到。看到双方为使对方的立场更加强硬而不惜找来法国这个恶魔，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西乡一开始就告诉萨道义，法国人正利用英国人的外交成果发大财。英国人在努力开放更多港口的同时，法国人已经和幕府谈妥了条件，获得了与幕府特别批准的商会进行交易的贸易垄断权。西

乡满意地写道，萨道义听后异常愤怒。^[11]萨道义没有写自己的反应如何，而是说将此事向巴夏礼作了汇报，巴夏礼的反应则跟往常一样，非常强烈。萨道义写道：“这则消息激怒了他。他立即会见老中，坚持正在被放弃的计划。借助巨大的外交压力……终于迫使日本政府出台了一份新的公告。”^[12]

萨道义则接着借助法国的问题来威胁西乡。他把自己已经知道的情况告诉西乡，说法国顾问正和幕府合谋，通过提供技术人员和军事顾问，并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军队，帮助幕府加快实现日本的统一。实力最强的萨摩藩和长州藩将是最先屈服的两个藩国，不管作何反抗，最终都会被武力征服。萨道义提议说，英国很愿意支持萨摩藩和长州藩实现王政复古。要是让大家知道，一旦法国人介入英国也将介入，那么拿破仑三世可能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英国的目的非常简单明了。日本只能有一位领导大名的君主，这样日本的政体将与英国的非常相似。^[13]

萨道义的话给西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给大久保的报告最后加了一句重要的评论：“萨道义非常看不起幕府。”^[14]但是西乡不希望英法介入日本的政治，他写信告诉大久保：“我跟他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日本人都将尽最大努力去改变日本的政治制度，无须麻烦外国人。”^[15]西乡在向自己的上司、萨摩家老桂右卫门汇报这次谈话时说得更加明确：“我们一直在试图激怒英国人，但是这件事（英国人的帮助）……不一样。虽然我们努力想离间他们和法国人，使其反对法国给予的援助，但是，同意他提出的援助建议则是不可原谅的。因此我拒绝了他，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对于这个

问题我们大可放心。”^[16]

但是在倒幕战争这个问题上，促使萨摩藩领导采取更加强硬路线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必须与长州盟友保持良好关系。两藩之间最初订立的盟约主要是防御性质的。身份问题得不到解决，长州藩就依然是宫廷的敌人，其领导人也依然无法公开参加京都举行的计划和密谋。完全依赖萨摩藩保护和掩护的长州藩，很快就对盟友充满了怀疑和不满，因为他们好像是在京都拖延时间。而萨摩藩似乎在土佐藩的和平方案与长州藩的联合军事行动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更加重了他们的怀疑。

前文已述，1867年的京都会议失败后，7月17日，岛津久光接见了两名长州藩派来的密使。岛津向他们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即必须使用武力倒幕，并说已经做好了联合军事行动的最后准备。西乡隆盛不久就会前往长州商讨合作计划，另一名萨摩勤王藩士黑田清隆则一直陪两位客人去到大阪。这两名长州人分别是山县和品川。他们兴高采烈地回到了藩国。山县收到了久光的厚礼——一把六发式左轮手枪，此外，萨摩藩也承诺将向宫廷提出申请，请求天皇批准惩罚幕府对天皇的不敬行为。这一年5月，高杉晋作去世，山县成功获得了民兵队的领导权。现在他正着手起草作战计划，以便西乡隆盛来时可以进行讨论。山县计划突袭大阪，同时快速除掉庆喜，接着号召关西地区的贵族聚集起来，参加萨摩长州联合军（“天皇军”）。天皇军将以关西平原为基地，直接向京都发起进攻。^[17]

8月15日，正当长州的作战计划开始逐渐成形时，萨摩藩的特使抵达长州。结果，去的是村田新八而非西乡隆盛，带来的也不是

作战计划，而是旨在和平解决争端的萨土协议细节。长州藩立刻嗅到了萨摩藩有背叛的危险。上次单独行动带来的惨痛教训依然记忆犹新，因此长州藩决定派一些人和村田一起前往京都，看看萨摩人到底在谋划什么。其中之一的品川弥二郎会见了小松清廉、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他带回长州的报告说萨摩人已经决心进攻幕府，从而令大家放心下来。萨摩领导人使品川相信，他们对于与土佐签订的和平劝说协议根本就没什么信心。萨摩藩已经有 10000 名士兵在京都待命。举事的日子一到，其中的 1/3 将去保卫支持起义的公卿们所在的宫廷。另外一队人马将进攻京都的会津藩公馆。1864 年，大家认为唯一真正支持幕府的藩国就是会津藩了。剩下的萨摩士兵将把幕府在京都崛川的军事总部二条城付之一炬。另外，长州人还得知，萨摩藩将派 3000 多人进攻幕府的大阪城、夺取幕府的炮艇，同时近日抵达江户的另外的 1000 人将与那里的倒幕军队会合，前往甲府阻止德川幕府可能派往京都的援兵。^[18]

关于几名少壮派领导人建议久光采纳的这一政策是否明智，萨摩藩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因此在最后关头拖延了作战计划。西乡和大久保要同僚们放心，即使他们失败了，其他藩国也会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这当然很好，但是鹿儿岛的参政们并不想拿自己的遗产冒险。1867 年夏末，萨摩藩内为政策的方向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高级武士希望采取一种更加谨慎的政策，指责少壮派领导人是“急激党”，而后者则指控前辈们的观点陈旧（“俗论”）。其他藩国曾经上演过的斗争在萨摩藩重演。但是，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得到了久光的支持。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同时也得到了绝大多数

同僚的热心支持。他们一步一步地设法使藩国接受自己的观点。10月3日，从鹿儿岛来的3000士兵抵达了大阪港。士兵们一到那里，就被置于西乡隆盛的领导之下。从那以后，天平开始向主战派倾斜。西乡认为，这么多士兵暴露于大阪幕府驻军的眼皮底下，随时可能受到攻击，于是和宫廷的朋友商议，让宫廷同意他把士兵带往京都。这就彻底改变了首都的军事格局。不久，人们便认为京都的萨摩士兵有万人之多。^[19]

来自鹿儿岛的萨摩援军抵达京都的前两天，后藤象二郎回到了京都。他惊讶地发现军事行动计划进展得如此迅速。西乡和大久保告诉后藤，由于他长期待在土佐，所以才不得不自己拿主意。西乡提醒说，不要忘了曾经许诺要带土佐军参战，在听到后藤解释说荣堂反对使用武力、此事只能作罢后，很不高兴。

后藤竭力劝萨摩领导人不要动武。我们从荣堂的侧用人寺村左膳的日记中看见后藤的努力。他和后藤一起来到京都。^[20]一开始，后藤试图让萨摩藩重新回到7月签订的协议，但是以失败告终，于是他转而请求延迟实施军事计划。他发现西乡完全不为所动。西乡说，如果土佐想说服庆喜辞职，萨摩可以接受，但是他们的计划不会改变。更糟糕的是，后藤发现原来支持自己的广岛藩藩士辻将曹越来越倾向于愿与萨摩、长州共存亡。^[21]因此，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战争在所难免，而土佐藩将不得不在两者之中做出选择，即便它其实哪一方都不想参加。

后藤无法说服萨摩领导人停止作战准备。10月12日，大久保利通和大山纲良前往长州商讨最终的行动计划，10月16日任务完

成。他们与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品川弥二郎等长州人会面，双方同意最迟于10月23日采取行动。萨摩藩的战舰将在此之前抵达长州，而长州藩的军队将被动员起来，伺机而动。大久保建议盟军利用幕府的要求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幕府曾要求长州派两名代表到大阪去，以显示其真心实意请求赦免，而宫廷将无法再次拒绝这样的请求。大久保认为，幕府的要求看上去可能违反了宫廷希望和平解决争端的意愿。京都的萨摩驻军将首先开火，冲进皇宫，控制并保护天皇，与此同时，长州军将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发挥主要作用。^[22]

令土佐藩代表感到更加棘手的是，与长州藩比邻且位于长州藩进攻的必经之路的广岛藩，现在居然也同意加入新的作战计划。10月20日，广岛藩与长州藩签订了协议。和舞台上所有的次要角色一样，广岛藩政府小心谨慎而又犹豫不决。当京都传来后藤劝说庆喜的计划有所进展时，它又试图反悔，撕毁协议，直到最后一刻都首鼠两端。^[23]在这个所有人均感觉到变化旦夕将至但却不清楚性质的年代，极少有政治家采取轻率冒险的行为。

就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萨摩藩的领导层内部再次爆发了争执。寺村的日记记录了土佐藩代表在京都的紧张工作，同时也写到了鹿儿岛甚至京都的萨摩人当中仍然存在两派势力。他写道，不管有多少人反对，西乡和大久保都决心使用武力，然而长州藩的军队并没有遵照承诺在10月23日的最后期限之前赶到，这大大削弱了西乡和大久保说话的分量，长州藩内部则再次对萨摩藩的意图产生了猜疑。大久保和西乡决定从大阪回鹿儿岛，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0月28日，一直以来立场都比西乡和大久保温和的萨摩藩家

老小松清廉告诉后藤象二郎，游说将军的计划在鹿儿岛取得了一些进展。他建议土佐藩立刻将请愿书上呈幕府，不过只能以自己的名义。

现在，两个计划同时进行，每个都是在和时间赛跑。10月28日，后藤将土佐藩的请愿书提交给幕府老中板仓胜静。他告诉板仓，倒幕计划仍在进行，时间非常紧迫。同时收到请愿书的还有宫廷的关白二条齐敬、德川家族最有力的支持者会津藩，以及京都的萨摩公馆负责人。^[24]三天后，不甘落后的广岛藩大名自己匆忙向庆喜提交了一份请愿书，劝说他辞职。11月1日，萨摩藩的军队终于按照原来的约定抵达了三田尻。大久保和西乡取消了原定的鹿儿岛之行，再次将作战计划提上议事日程。11月3日，广岛藩同意继续原定的联合军事行动。于是，给庆喜的请愿书提交了，而作战计划也在加紧进行中。

幕府终焉

11月4日，坂本来到京都。他因“伊卡洛斯”号事件的调查而滞留在长崎，后来终于实现多年的夙愿，返回了土佐。海援队的嫌疑已经得到澄清，与长崎的杀人案没有关系，他自己也与佐佐木高行等官员相处得极好。^[25]坂本还带来了从荷兰商人哈特曼那里刚买来的步枪。^{*}他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热烈欢迎，过去的仇恨

* 不知道坂本究竟有多慷慨，因为佐佐木已经在这批货的担保文书上签字，而且付款用的是萨摩人的钱。

如今已经被忘记，武市的勤王党旧部可以很安全地聚在一起，欢迎自己的老朋友。坂本给朋友们带来了国内政坛的许多消息。他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么写道：“我刚刚乘坐一艘广岛船到了浦户，带来了1000支步枪。沿途我在下关停留，听到了京都方面传来的最新消息。那里的时机已经成熟。听说这个月底或者下个月初就会开始。两天后，萨摩藩将调遣两大队的兵力到京都去，听说长州藩已经承诺派兵去大阪（我认为他们会派三大队的兵力）。我在下关的时候，萨摩信使大久保利通也到了那里……我们藩的情况如何？后藤象二郎怎么样？板垣在做什么？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必须快点见到你。”^[26]

坂本这次回来也去了家乡，这是他自1862年离家以来首次返乡。遗憾的是，没有什么谈话资料留存下来，我们也就无法知道坂本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带来了什么最新消息。^[27]留存的资料显示，坂本认为土佐应该立即行动，希望自己的藩国在未来几天扮演重要角色——假如请愿的话，则依靠后藤；假如打仗的话，则依赖板垣。事实上，他甚至写信告诉木户，“我正考虑改和板垣退助联络”。^[28]不过，坂本无法离开政治中心太久。10月27日，他再次离开了土佐，并于11月4日抵达京都。

坂本发现，城里每个人都激动万分，仿佛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到处都是流言，有些还和他有关。现在，他作为神秘的幕后操纵者的名声甚至超过了实际影响力。京都流传的一些传单上说，他准备到京都指挥300名海援队员。事实上，当时他身边只有五六个人。^[29]坂本也没有参加当时正在进行的高级会谈和谈判。

但是，他确实通过熟人知道了所有正在进行的计划。坂本进城的第一天就会见了庆喜的亲信、若年寄永井尚志。在与永井的几次交谈中，坂本询问幕府是否认为自己有可能抵挡萨摩、长州和广岛藩的进攻。永井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幕府不一定能够取胜，于是坂本明白，德川庆喜在考虑土佐的辞职建议时根本就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30]与此同时，坂本努力安抚中冈慎太郎和萨摩军的领导人，劝说他们再稍等片刻，等到将军的决定后军事行动会获得更多的支持。

坂本还和后藤讨论了庆喜的权力应该放弃到什么程度。土佐的请愿书请求他放弃自己的政治特权，但是没有指明要他放弃将军的头衔。坂本一度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中间路线，并写信给后藤，提出了一个不会令幕府过于为难的解决方法。他说：“假如把江户的造币局搬到京都，控制了货币，即使名义上保留将军的职位，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31]这句话不应理解为坂本的真实目标只有这么低，而可以理解为，即便是最坚定的勤王党人也难以想象将一种存在了250年的政治制度完全抛弃之后会是什么景象。此外，这番话明确表明，坂本并不认同萨摩藩坚持要使德川幕府颜面扫地的极端做法。

此时，准备打仗的一方则在继续积极备战。军事计划已经制订完毕，萨摩藩增派的军队也使倒幕一方的实力大增。一切均已准备就绪，只差一份正式的授权书了。

几名宫廷的公卿在岩仓具视的指挥下拿到了这份授权书。自1867年春获释之后，岩仓就开始经常到京都去。在此之中，他结交了萨摩领导人，并与大久保利通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他还竭力

在太宰府的落难公卿面前挽回自己的形象。三条实美等人一直都认为岩仓是个暗地里支持幕府的无耻叛徒，追随他们的勤王派浪人曾屡次威胁要杀死岩仓。在中冈慎太郎和坂本龙马的调停下，岩仓修补了与太宰府之间的关系。^{*}中冈和坂本两人对岩仓的能力和诚意深信不疑之后，便向太宰府的三条转达了岩仓的意思。^[32]

在勤王派阵营中的地位提升之后，岩仓开始尽力扩大自己在京都的影响力。他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联系人，一个是少年天皇睦仁的外祖父中山忠能，另一个是中御门经之。由于岩仓的建议大部分都要通过书信传达，因此他雇用了一名神道学者玉松操作为助手，为他操刀。[†]接着他开始热情地为宫廷的朋友们分析政治形势。与此同时，他全力为萨摩藩和长州藩争取宫廷的支持，称他们是惩罚幕府的最好工具。他的进展非常缓慢，因为宫廷的高级公卿都坚定地站在庆喜一边，但是岩仓的影响力在慢慢增加，胆量也越来越大。他的文章详细地描绘了新政府的组织理念，而玉松则尽可能按照传说中神武天皇时代的样子为他设计了一面旌旗。岩仓将这面旌旗展示给长州和萨摩的朋友，并让他们动手制作，以保证其规格和描述符合“天皇军”。

11月4日，坂本到达京都的那天，将军仍在考虑土佐藩的请求，而萨摩藩领导人则转告岩仓，请他和宫里的支持者起草一份敕旨，

^{*} 值得注意的是，1867年夏天中冈有一次去拜访岩仓时，给他带去了一本自己已经读过的福泽的《西洋事情》。

[†] 玉松操（1810—1872）出生于京都，曾随国学者大国隆正学习。玉松是一名狂热的勤王派，他替岩仓写的许多信可能反映了其个人观点。

下令“忠诚的”大名向幕府发起进攻。岩仓让玉松起草敕旨，比较了日本奇怪的统治方式与全球其他地方正在实施的进步制度之间的差别，强调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政治制度。敕旨还进一步指出，幕府制不符合日本真正的民族传统，并在最后同意向幕府兴师问罪。接着，岩仓、中山和中御门着手让少年天皇批准这篇奏折。很容易亲近天皇的中山设法在文件上盖上天皇的御玺，然后在幕府的严密监视下偷偷地将文件带出宫。^[33]同时带出来的还有一份恢复长州藩领主名誉的敕旨。11月9日，这些文件被交给了（萨摩藩的）大久保和（长州藩的）广泽。^[34]

这些事情并不像密谋者所希望的那样无人知晓。它很快就被幕府所知，并加快了庆喜的决定。庆喜的谋臣对土佐藩的计划一点也不感兴趣，有些人，例如小栗忠顺，则依然偏向于完全依赖唾手可得的法国援助。即使那些反对战争的人也不太赞同土佐藩提出的计划细节，例如松平春岳虽然一直致力于这种解决方法，但现在却质疑土佐藩建议的议会制政府过于独特和西化，因此并不符合日本的需要。他写信问板仓，这样会不会不仅未能带来统一的国家 and 明确的方向，反而会造成党派纷争和混乱的局面？与他相反，胜麟太郎和永井尚志热情地支持这份提议，相信现在的合作将会在未来获得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35]

后藤通过永井使庆喜相信，战争已经无法再拖延下去。最终，11月8日，庆喜在巨大的压力下召集全部大名和在京都的重要藩国官员到他的二条城开会，这一天刚好是萨摩藩收到岩仓敕旨的前一天。也在被召之列的后藤意识到大局已定。坂本听到开会的消息后，

激动地写信告诉后藤，他和几名海援队的死忠队员将誓死保护他的安全，如果将军不肯辞职，他们将不惜生命地进攻幕府。^[36]

那天的晚些时候，后藤急急忙忙地给坂本写了一张便条。他说：“我刚刚从二条城回来……将军向我们表示他希望将政权归还给天皇，明天他将向天皇请求此事。从此以后，我们将有上院和下院组成的议会了……这真是千载难逢的事情。我迫不及待地想立刻告诉你，没有什么比这更值得高兴的了……”^[37]

这次会议进行得异常安静。庆喜向全部与会者宣布了自己的计划，他们一个个面无表情地离开，一句评论的话也没有。只有萨摩藩的小松、土佐藩的后藤和福岡、广岛藩的辻以及宇和岛藩、备前藩的代表最后留了下来。他们感谢庆喜所做的牺牲，并称赞他勇气可嘉。当时，庆喜的高贵和大度在志士中也有很高的人气，坂本甚至说愿意为这样的伟大赴汤蹈火。^[38]

11月9日，宫廷收到了庆喜的请愿书。庆喜写到，虽然他接受了将军这个职位，但是他“政刑失当不少，然至今日之形势，毕竟薄德所致，不堪惭惧”。与外国的交流使成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至关重要，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将政权归还天皇，同时征求全国的意见，“同心协力，共保皇国”。^[39]由此可见，庆喜打算辞去自己的权力，但是并不准备放弃自己的影响力。

就在同一天，在岩仓授意下拟定的下令进攻幕府的“敕旨”送达了萨摩藩和长州藩。西乡、大久保和小松匆忙赶赴鹿儿岛。萨摩领导人在途经山口市时和长州藩的领导人进行了商谈，确定了接下来的军事行动计划。他们一到鹿儿岛，就极力劝说藩主前往京都。

12月8日，萨摩藩藩主岛津忠义带着3000名士兵，启程离开了鹿儿岛。忠义在长州稍做停留，于12月18日抵达了京都。此时，长州军的主力部队也已在西宫上岸，随时准备进攻京都。

和萨摩藩领导人一样，后藤也跑回土佐，极力劝说容堂前往京都。但是，鉴于首都的不稳定状态依然持续，容堂的家臣对于藩主应该采取什么路线依然有很大分歧。特别是那些保守派家臣，更是极力反对他离开高知。他们提交了一份长长的请愿书，批评京都正在上演的整场戏都是那些专门与亡命之徒、浪人打交道的极端分子和狂妄之士策划的。我们可以将此视为保守的土佐藩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后表态。但是，容堂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决定还是应该去。1868年1月2日，容堂抵达了京都。^[40]

跟西乡和大久保一样，后藤比容堂先回京都。两名萨摩领袖惊愕地发现京都的政治一片混乱，以致他们的宫廷盟友决定要他们归还那份要求惩罚幕府的圣旨。庆喜的辞职决定不仅没有解决纷争，反而使局面更加混乱。宫廷要他继续保卫国土，推迟一切决定，直到大名会议召开。大政奉还的文件模糊而暧昧，因此庆喜需要去宫廷详细澄清。他觉得自己肩负重任但却毫无权力，于是干脆连将军的职位也辞掉了。此时京都大约有50名大名，似乎很可能召开大名议会。但是宫廷的主导者仍然是一帮摇摆不定、习惯于听从幕府指挥的人，看起来庆喜确实很有可能主宰即将召开的大名议会，而这正是萨摩藩最不想看到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久保、西乡和岩仓开始了他们的最后计划。三人一致认为，要想成功突袭京都就必须尽快行动。直到12

月 27 日，他们才把自己的计划透露给后藤和寺村。从寺村的日记可以看出，土佐维新领袖听到这种羞辱前将军的方式之后，感到非常震惊。按照他们的计划，维持了 200 年之久，担任幕府和宫廷之间的沟通工作，并由幕府亲信出任的武家传奏将被撤销，人员将被遣散。幕府用来控制和打探京都消息的其他职位也将撤销。政变之后，把守宫门的禁卫军将被土佐、萨摩、广岛、越前和尾张藩的士兵取代。最重要的是，德川家族将不得不将他们的领地上交天皇，再从新政府那里领取一块面积小得多的新领地。有栖川亲王将担任临时政府的首脑。^[41]

因此，庆喜的牺牲比后藤、容堂和坂本原来计划的要大得多，他的权威将按照原来发展的先后顺序被层层剥去。庆喜已经放弃了最外一层的行政权力，并相信自己将在任何可能成立的新政府中拥有一个位置。接着，他意识到自己的位置可能有点尴尬，于是又把祖先出生入死换来的将军头衔辞掉了。这也没什么可惜的，因为即使没有了头衔，他与下属之间的关系依然非常牢固。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是继续成为一名强大的贵族。如果这一点不能保证，那他的命运将成定局，而这正是岩仓、西乡和大久保所想要的。

后藤设法阻止这个计划，但是没有成功。政变原定于 1 月 2 日发动，但在他的劝说下，密谋者同意推迟一天，等山内容堂来。这是后藤唯一成功的事情。

政变前夕，密谋者在岩仓具视家里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萨摩、土佐、广岛、越前和尾张藩的代表听取了最终计划，并同意根据军事形势的需要出兵配合。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岩仓于 1 月 3 日凌晨

前几个小时赶到宫里，取得天皇的同意。与此同时，与会各藩的军队开始行动，占领皇宫的各个入口。经过仔细挑选之后，一些公卿、大名和大臣被允许进入皇宫，随后，年轻的天皇当着他们的面，宣读了王政复古的诏书。至此，德川幕府的统治正式画上了句号。

事情的发展方向令山内容堂感到恐惧。他担心可能会爆发全面战争，而且认为这样做对庆喜不公。在接下来的会议上，容堂激烈地反对过于苛刻地对待德川庆喜，其观点一度得到了越前藩和尾张藩的支持。但是西乡和岩仓放出话来说，如果容堂胆敢再次阻拦他们，很可能会活不久，于是容堂沉默了。后藤象二郎和福冈孝弟听说这个消息后，纷纷劝他不要再抗议。于是，经过一连串快速的程序，这个不久之前令后藤和寺村感到震惊的纲领正式通过。一个由亲王领导，以那天晚上在岩仓家开会的代表为主要成员，同时得到萨摩、长州和土佐军队支持的新政府开始初具雏形。

庆喜担心自己那些愤怒的下属会忍不住发动内战，于是回到大阪，远远地向宫廷提出抗议。勤王派现在可以指控他抗旨了。

他在大阪接见了罗修斯，但中途被巴夏礼打断。巴夏礼认为自己有外交上的优先权，因此要求庆喜先接见自己。庆喜向两名外交官解释说，自己落入了阴谋之中。担任翻译的萨道义指出，庆喜觉得议会的建议只是用来蒙蔽他的，他说新政府的那些公告“都是预先策划好的。他们全都在纸上写好了，而且没有咨询任何人就这么做了”。萨道义写道：“你什么也做不了，只有同情他。他和5月份那个英俊漂亮的绅士简直判若两人。现在看起来又瘦又累，神情哀怨。”^[42]

1月27日，在下属的不断坚持下，庆喜最终同意，并试图带领

大军重新进入京都。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德川幕府的军队被打败了。伏见之战吹响了倒幕的号角。但是，总的说来，这次战斗中，幕府的军队并没有拼尽全力，因为庆喜根本无心打仗。胜麟太郎和西乡分别代表幕府和天皇进行谈判——第一次长州征讨时，参加和谈的也是这两人。双方谈判之后决定，江户无血开城。在会津藩的若松城战斗中，背水一战的幕府军与板垣退助领导的天皇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并使后者一战成名。1868年秋初，本州的战役结束，幕府海军退守北海道，最后抵抗至1869年6月。

1868年4月，在倒幕战争尚未全面打响，新政府迫切希望得到各界的支持之时，宫廷发布了著名的《五条誓文》。这份文件再次包含了去年土佐藩那份请愿书的主要内容。它由越前藩的由利公正、土佐藩的福冈孝弟和长州藩的木户孝允共同起草。三人都受过坂本的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坂本。他们的措辞也与我们熟悉的那些计策非常相似。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二、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

四、破旧来之陋习，基天地之公道。

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43]

政府召开“会议”经过“公论”再做决策，以及建立一个全民万众一心为“各遂其志”而努力的国家，令人想起坂本与后藤制订

的那些计划，而最后所说的废除“旧来之陋习”，以及为了巩固“皇基”而在全世界范围内追求知识的提法，则几乎与德川时代最后几个月的计划如出一辙。战争结束后，许多人担心会出现一种新的军事专制制度，内心充满不安且不信任，因此，新政府决定谨慎一些，认为重新回到后藤和坂本为争取幕府支持而曾经提出的一些承诺会更好。^[44]新政府的这一做法，同时也为日本现代宪法的制定者提出建立一个更加负责任的政府提供了依据。

坂本和新政府

坂本和中冈并没有看到明治政府的成立。将军辞职后，一切均悬而未决，京都成了猜疑和仇恨的天下。许多人在结清宿怨，局势一片混乱，这两个土佐人也成了其中的牺牲品。他们极少参与庆喜辞职后的政治活动，也没有能看到最后的结局。关于中冈在那几个星期的活动，极少有资料保存下来。他仍然是陆援队的领导，并且仍在为倒幕战争做准备。坂本的资料比他多一些，为了理解他对未来日本政治的看法，我们有必要将这些零碎的资料拼贴起来。在此之中，我们又一次惊讶地发现，日本人首次接受激进的解决方案并在之后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这一速度异常快速。虽然有证据表明，坂本认为庆喜将在当时那个建立在封建社会基础上的新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是也有证据显示，他死前的思想正朝着后封建和更加现代的方向发展。

庆喜确定辞职的消息传出之后，坂本的一群亲密战友聚集在他京都下榻的旅店，商讨新政府的组织形式。坂本似乎赞同成立一个以关白（这个古老的宫廷职位最先由藤原家族担任，后来落入幕府的掌控）为首的政府。关白下面是议奏，任职人员从有远见和正直的亲王、公卿和大名中选出。坂本认为，这些人将担任政府各部门的领导。他似乎考虑这些职位将由西南强藩的大名（岛津、毛利、山内、伊达、锅岛）和几名重要的公卿（岩仓、东久世、泽、中山）担任。换言之，十年来的重要人物将继续在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假如坂本像传言所说的那样，认为庆喜将担任关白，那么他最初的计划确实相当客气。他们又在这份名单上增加了一群参议，负责协助政府各部门的领导。讨论成员之一的尾崎说，大家对萨摩藩的小松、西乡和大久保，长州藩的木户，土佐藩的后藤和坂本，以及越前藩的由利和横井均没有异议。由此，坂本自己将成为这个战略集团的一员。倒幕的狂热分子（板垣和中冈）和三条实美没有被提及。^[45]

与这些计划相比，在1月宣布成立的新政府却走得更远。古老的关白和议奏长期以来均由几个特定的家族担任，并且隶属于幕府，但现在被撤销了。不过，政府设立了参议的职位，而维新领袖们曾一度利用这个职位来劝谏那些身居高位的上级。^[46]

接下来几个星期，事件的主人公纷纷返回萨摩、长州和土佐，将最新的消息告知自己的藩主，坂本终于有时间作一些自己的计划了。他写信向哥哥解释自己为什么沉默了这么久，说自己正“夜以继日地为我们的国家工作”。^[47]

1867年11月26日，坂本从京都出发，前往越前藩的福井城。

他的目的是拜访松平春岳藩中最杰出的一名年轻武士——由利公正。由利自从 1868 年秋起便遭到拘禁，理由是他在出使萨摩藩时有越权行为，然而事实上是因为他不受藩内保守派领导的喜爱。一名土佐目付与坂本随行，因此越前藩的官员对这次来访颇为重视，从而放松了对由利的限制。由利在两名衙役的陪同下，来到坂本下榻的旅店。他们交谈时，土佐与越前的目付均在场。坂本认为由利是财政方面的专家，因此希望和他探讨一下新政府的财政问题。谈话一开始，坂本就解释说，新政府的组织形式尚未确定，战争仍有可能爆发。假如前幕府拒绝合作，那么维新领袖准备跟他们打一仗。不幸的是，天皇政府既没有钱又没有军事实力，而要得到民众的信心和支持只有靠这两样东西。他希望听听由利的意见。由利说，假如天子执政的话，那么他就有权征用自己臣民的财富，尤其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在这个意义上，财富成了实现天下太平的工具。他认为快速筹款的最好方法就是发行金券，并建议政府这么做。由利后来写道，坂本非常感谢他这条有用的建议。^[48]坂本认为由利有过人之才，不久之后，明治新政府便任命由利为财政大臣，可能也与此有关。

返回京都之后，坂本为新政府制定了八条新的政策。这是他最后一次为政府出谋划策。这八条政策如下：

一、招致天下有名之人才，以供顾问。

二、选用有才之诸侯，赐朝廷之官爵，罢除现今有名无实之官。

三、议定与外国之交际。

四、新撰律令，定无穷之大典。律令既定，诸侯伯皆奉此，约束部下。

五、上下议政所。

六、海陆军局。

七、亲兵。

八、皇国今日之金银物价与外国平均。

以上，预先与二三明眼之士商讨，待诸侯会盟之日，××自为盟主，以此奉朝廷，始公布于天下万民。强抗非礼有违公议者，断然征讨之，即权门贵族亦不例外。^[49]

通常认为坂本希望文中××是容堂。这些政策强烈要求日本在重组时遵循平等的原则和一般常识，显然与1868年春颁布的《五条誓文》的目的和内容有关。而且，我们也还将记得《五条誓文》正是由利公正最先起草的。这份由坂本亲自起草的大纲一直保存到了现在，因此我们对他的思想走向没有什么疑义。坂本追求的制度，是那些特别有能力的大名（从土佐的开始）将取代宫廷旧制下的无能官员。但是这些大名的权力是变化的，而且直接受到“人才”选举的制约，而坂本和同伴们必然会是“人才”之一。大名们的权力还将永远受到议会的限制，而议会将在一套基于适用性而不是传统的法律框架下运行。最后，天皇的亲兵、陆军和海军将限制并在必要时惩罚任何可能打着地方自治的旗帜并阻挠这些计划的人。任何人胆敢轻率或无礼地阻挠新政府，国家的武装部队将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

还有一点可以看出坂本在庆喜辞职之后那段时间的想法。有一份题为《藩论》的未完成的小册子通常被认为是坂本的思想的反映，即便那可能不是他写的。我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是坂本所写，但它无疑揭示了坂本和同伴们思考的方向，^[50]而且很可能是陆奥宗光对他和坂本谈话的回忆。

《藩论》一开始便简要讨论了维新产生的问题。文中写道，大家普遍认为应该做出改变，但是对于改什么和怎么改则意见不一。既有拥抱当前潮流，“俄窥和译之洋书，又询航家西情”的人，也有受缚于所读的史书，试图将时钟拨回古代的人。不幸的是，很少有人知道历史和他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含义。我们需要的是感知时代精神和预测行动成败的能力。文章写道，实际上，日本历史上只有两个伟人具备这种能力。一个是14世纪的勤王英雄楠木正成，他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努力均为徒劳并最终自杀了。另一个就是最近刚刚辞职的将军，他意识到自己的职位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于是选择了辞职。

文章继续写道，在广泛民意的基础上处理国家事务的时机已经成熟，藩内的事务也应该这么处理——“治藩内封土亦无他法”。无论血统多么高贵，腐败的政府都是不可原谅的，而听从民意的政府即是好的政府。

文章用大量的篇幅讲述了世袭制的不合理。它问道，是什么权利，使一个懒惰的糊涂虫得以掌权？大部分封建大名生来懒惰奢侈，成年后仍然流露出孩子气的自私和不负责任。他们身披华丽的衣袍，不知道外面的寒冷。他们既不知道也不关心百姓是否正在饿死和冻

毙。他们不仅不了解时代的意义，反而一心扑在享乐上。不仅大名如此，他们的主要家臣也是如此。“故无能之士尽皆在位，污愚之吏难责其身。”

然而《藩论》的作者并非民粹主义者。他承认大多数下层人民均愚蠢、短视而且容易放弃。他们喜欢走捷径，直接选举时将会投票给自己的朋友而不是贤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西洋文明各国常行”的间接选举制。每个藩主都应该先让家臣们知道，“废旧规，更正新律”。旧的义务随之终止，所有的下属将平等地进入一种新的契约关系。这一步完成之后，藩主们就可以给世袭制和石高制画上句号，并且“废官等，收级爵，全藩混合平均”。

家臣们将被一视同仁，接下来他们将按照事先制定的人数比，选出自己的领导。第一轮选出来的人将参加更重要的第二轮选举，竞选最能干和最高尚的领导者。因此傻瓜成为统治者的危险将降到最低。作者接着说道，这一步完成之后，普通民众应该按照类似的方法选出自己的领导，管理普通的日常工作。文章在这里承诺将在后面的章节做进一步阐述后便戛然而止了。

《藩论》是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许多方面显示这篇文章确实为坂本所写。文中对庆喜的高度赞扬，与庆喜辞职时坂本对他的尊敬很切合；那些忠心耿耿的家臣因为试图改革而遭到惩罚的故事，令我们想起了由利公正和坂本的其他朋友；对处于封建等级制度顶层的特权阶级的蔑视，也使我们回想起武市瑞山的土佐勤王党和坂本这种浪人在抗议时的区别：浪人们态度傲慢，无拘无束，根本不把当局放在眼里；利用间接代表制来解决封建官职的问题，再次显

示出坂本和朋友们在接受那些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外国思想和制度时的速度之快。

但是那些《藩论》没有提到的问题同样非常有意思。文中没有明确提到封建制度的终结，即使用不了多久，文中讨论的等级制度和官职改革肯定将为其敲响丧钟。文章也没有详细讲到帝制，尽管它确实说了腐败的政府不可原谅，即使是天皇也不行。在明治统治的最初几个月，天皇崇拜的进展非常缓慢，后藤甚至对萨道义说，一些人“担心极端分子可能会走得更远，会废黜天皇”。^[51]

但是，即使没有这种极端思想，《藩论》所代表的思考方式仍将使未来几年土佐维新领袖非常反感的萨长两藩寡头政治难以为继。我们也许可以认为这篇文章是下级武士的一份迟来的声明，对他们来说，根深蒂固的特权阶层仍然是他们面对的主要问题。封建等级制度垮台之后，这种对西方代议制的热情暂时减弱，直到岩仓等人一再呼吁神圣的明治天皇强化统治时，这一制度才被再次提起。当垄断政治的新形式开始出现苗头时，坂本以前的上司——板垣和后藤——将利用他和朋友们在这篇文章中所说的话来进行抗议，并重新要求成立议会。

走上神坛的武士

策划还在进行，然而，差不多就在起义军取代守卫皇城的幕府士兵、萨摩维新领袖返回京都的一个月前，坂本和中冈在旅店被人

杀害了。这次暗杀和伏见的那次很像，坂本手无寸铁地与刺客搏斗。但这一次没有好心的女佣给他通风报信，救他一命了。

1867年11月30日，坂本从福井回到京都。接着他开始和朋友们开会，制定出新政府的八条政策，并讨论（或者写下）了《藩论》中包含的理念。京都的形势依然一片混乱。谣言四起。幕府的支持者非常担心（事实证明，这种担忧非常合理），深恐幕后阴谋会把佐幕派藩主仅存的一点影响力也夺走。他们怀疑且痛恨一切曾经密谋反对自己的人，而在这些阴谋者当中，坂本的名气、能力和声望均无人能比。当初为了维持首都治安而设立的组织，最有可能拿这些自命不凡的革命者开刀。其中之一的新选组主要从京都的浪人中招募成员，而另一个组织见回组则主要由年轻的幕臣后代组成。到了1867年，这两个组织的人数达到几百人之多。他们的目的就是对付密谋的浪人，冷酷而高效地处理他们。坂本和朋友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和危险正来源于这些人。几年前坂本从寺田屋逃脱的事现在已经家喻户晓，包括木户孝允在内的许多朋友都警告他说，幕府的特务很可能再次逮捕或杀死他。在最近京都的混战中，新选组遭受了重创，其生性高傲的成员现在更是成了好斗的危险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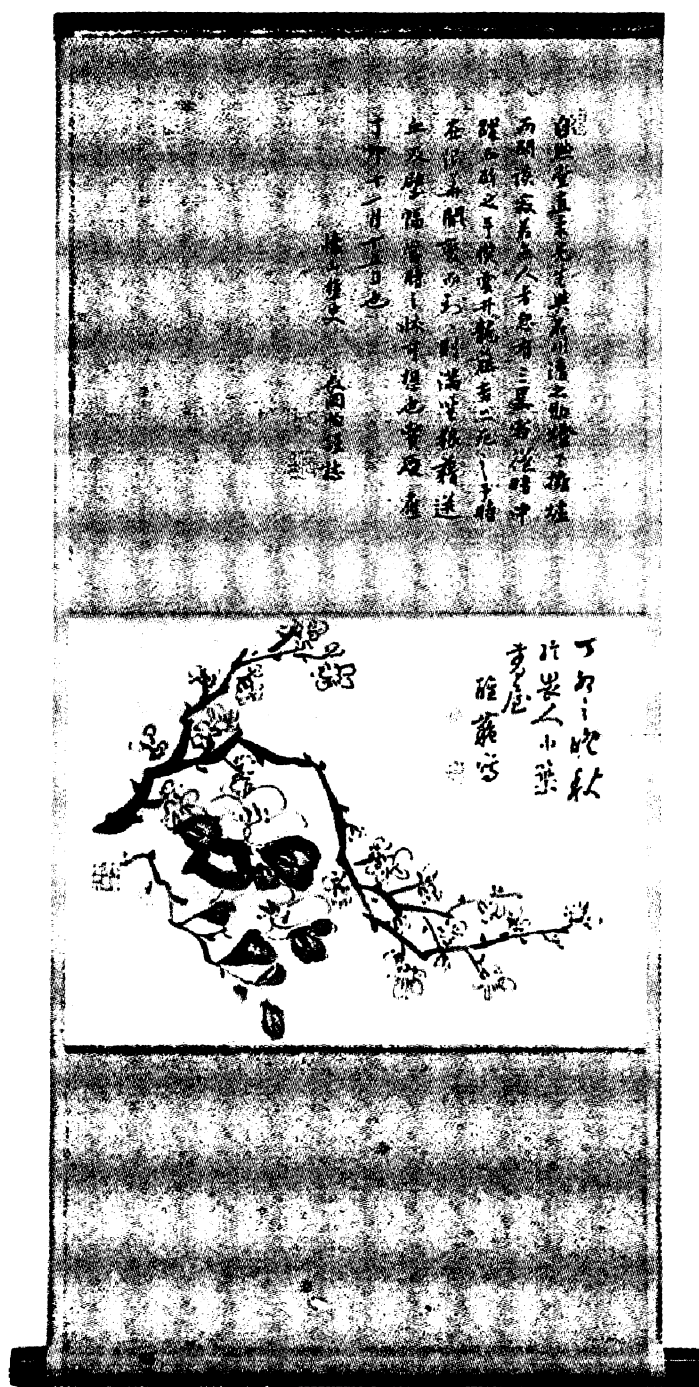
坂本知道自己很危险，但是他天性乐观快活，很难长时间保持警惕。他的京都总部一度设在河原町一家名为“近江屋”的酱油店里。店主让坂本住在仓库上面的一间后房里，房间有出口，紧急时可以快速下楼逃往附近的寺庙。但是，坂本从福井回来后着凉了。为了不过于麻烦别人，他搬到了隐蔽性没那么好的前房居住。

12月10日晚上，中冈慎太郎来这里找他。那天夜里非常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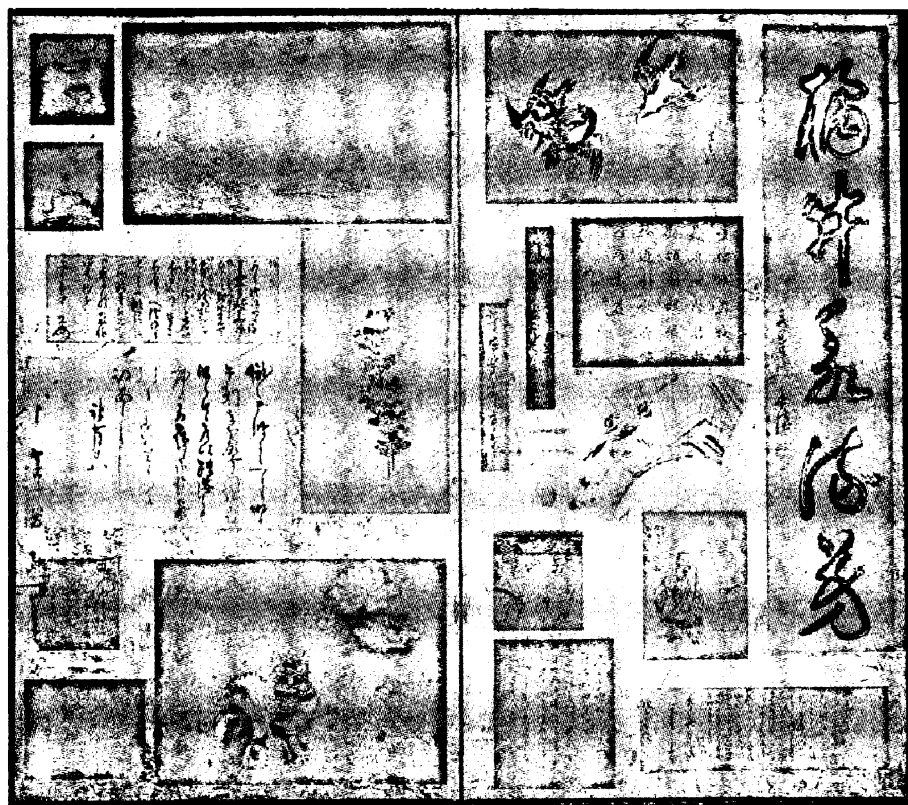
两个人在坂本的卧室里聊天，隔着火盆相向而坐，盆旁边有一盏小灯，把他们的脸照得亮灼灼的。坂本最近身体不太舒服，脸色有些苍白，中冈则很有活力，精力充沛。当时房间里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冈的随从，另一个是店家的仆役，坂本的仆人藤吉则在外间的屋里。过了一会儿，坂本要其中一人出去买些吃的。另一个人决定和他一起去，坂本和中冈继续在房间里说话。

接着下面传来了敲门声。藤吉去开门。来人是一个陌生人，自称来自十津川，那个地区属于皇室的领地，出产的物品均为皇室所有。藤吉知道坂本在那里有熟人，于是拿了客人的名片转身上楼。当他再次来到楼梯口准备让客人进来时，三个人未经允许便冲了上来。其中一个把藤吉砍倒，另外两人越过他冲到里间，向坂本和中冈砍去。两人根本没有机会把剑拔出来。坂本首先倒下，头部、脸部、身体和四肢多处受了重伤。中冈的情况比他好一点。他的伤没那么严重，但是也足以致命。中冈的陆援队下属田中光显赶来时，发现三人都倒在血泊之中。此时中冈还能向他解释事情的经过。他的精神和意志依然很好，但是精力却消耗得很快。田中说起井上薰在长州遇刺后奇迹般恢复的事情来鼓励他，并提醒他即将到来的战争多么需要他，但是这并没有什么作用。中冈拖了两天，于12日停止了呼吸。这一年他29岁，坂本32岁。^[52]

聚集起来悼念坂本和中冈的志士们很快想到要为两人报仇。维新战争期间，新选组和见回组的成员被抓来后，很快便被处死，坂本遇刺一事的来龙去脉从未完全揭晓。1870年，袭击时在楼下放哨的一个人承认曾参与此事，被勒令在静冈的家里幽禁。几年后他写



坂本和中冈被暗杀时房间内的挂轴。画上有斑斑血迹，上部汉文是海援队成员长冈谦吉事后对此事的记录。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



坂本和中冈被暗杀时房间内的挂轴。左下牡丹图上有点点血迹。现藏京都国立博物馆

了一份很长的忏悔书，但是田中等志士认为，忏悔书的细节跟他们的记忆有出入，因此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不管怎么说，这桩谋杀案的幕后主使将永远是个谜。^[53]

维新领袖对两名志士的死非常惋惜。岩仓尤其为中冈的死感到遗憾，但是总的说来，坂本随和而有魅力的性格赢得了他更多的赞扬。两人都使他结交了许多的朋友。田中光显写道：“中冈是个圣人，坂本则是真正的英雄。”^[54] 他们被安葬在京都东山的一座寺庙里，木户孝允为他们写了墓志铭。三条实美也从太宰府写了一首和歌赞美他们：

武士の英魂光耀，死后也仍将守护国土吧（武士のそのたましひやたまちはふ 神となりても国を守るらむ）。^[55]

坂本成为民族英雄的经过，生动地展示了现代日本民族精神的发展历程。这种精神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因为它需要时间以及在国家建构的艰巨任务中的成功。只有这样，那些领袖才可能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而受到赞扬。当评估的时候到来时，坂本的条件堪称完美，于是就被推上了荣誉的领奖台。在冒险经历、快活自信的态度以及来往书信的映衬下，他的形象异常出色，而这正是日本人心目中维新志士的完美形象。一连串的故事显示他反应敏捷、活学活用、淡泊名利、不爱金钱、在危险面前从容冷静等等，于是，坂本成了一名完美的圣人和武士。有人认为《英将秘诀》这本小册子是他写的，这实在是过于慷慨，但是却进一步反映了坂本的受欢迎程度。那本

书中的观点，比如强烈而自信的倒幕观，以及强调必须在机会来临时一把抓住，似乎都与坂本的经历非常吻合。^[56]与此同时，坂本既没有参加明治政府，也没有参加反政府的一方，使他成了一名所有人都交口称赞的英雄。

1883年，坂本的第一本传记出版了，书名是《汗血千里驹》。这本书半是历史半是虚构，并将全部的考证工作留给了后来的学者，但它向塑造坂本的流行形象跨出了第一步。1880年代末，随着日本民族情绪和自豪感的逐渐增强，坂本的名声也随之提高。1891年，他和中冈一起被追赠为正四位。此后，坂本成了维新小说故事中的一个突出形象，那些幸免于难的维新领袖在回忆录中也对他不吝赞美之词。坂本自然是一名土佐英雄，而他站在桂滨的台基上，远眺浦户湾的那尊塑像，则意味着他既是海军的开创者又是国家的领袖。

三条认为坂本死后将继续保佑国家的话，后来得到了明治天皇的皇后证实。日本两次在对马海峡打败俄国舰队之前，皇后都梦见了坂本。第二次梦见他时，坂本自我介绍说：“陛下，愚臣生于土佐，名叫坂本龙马。请陛下放心，我将尽自己的微薄之力，执掌好帝国海军的命运。”^[57]坂本的名声并不需要新的花环，但是有了宫廷的加持，其传奇地位更加巩固。这个勇敢的英雄形象被逐渐放大，直至掩盖了他浪人经历中一些不那么轰轰烈烈的事迹。对于了解现代日本的发展史而言，两者同样有趣，且不可抗拒。

第九章 土佐的维新

大部分总结维新时期的文章都揭示出，很难用一藩或者一个地区的模式去概括所有地区。这么做也很危险。而以一人或者一群人的经历为基础去解释维新的做法甚至更不明智。即便要这么做，也应该以萨摩或者长州的动向为基础，因为它们是造成幕府倒台的主要原因。土佐的情况，不管怎么说，都是极端反常的。统治家族对德川家族感恩戴德；领主能干而有主见；领主下面一级一级的下属和家臣大部分都出生于乡下，家世可以追溯到德川幕府以前的长宗我部时代。这种情况在日本其他地方再也找不到。不过，虽然我们否认了土佐的研究价值，但向那些关注坂本和中冈之死的人讲述一下两人的思想和社会经历还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他们的成长所可能反映和预言出的广阔的国内舞台。在那里，王政复古只是革命的开始，远非成果。

对西方反应的几个阶段

一开始，我们有必要再次重申，维新活动家们在性格形成时期，思想和政治上显著的经历便是发现自己的国家无法抵挡西方的威胁。这句话不应该理解为西方的威胁是佩里来后日本各种变革的唯一因素，它甚至不是主要因素。思想的发展为怀疑德川时代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乡士和庄屋之子从私塾中接受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这种思想往往与痛恨卑微出身的感情相结合，从而为他们准备了充足的原材料，使其得以创造机会并打造一套全新的政治制度。然而，事实上，这些条件已经存在了很久，而西方的威胁使他们行动起来去保护神圣的国土和天皇的安宁。愤怒和反抗的先决条件已经长期存在，但是仍需要一个更高更大的目标作为行动的合法理由。维新时期的行动从来都不是出于社会上某种特定的不满情绪，而是一直出于一种自认为的“无私”和理想主义。在内忧外患的交替作用下，这些能量迅速积聚。鼓动攘夷的激烈言论演变成了倒幕的骚乱，后来又变成了《藩论》中的反封建思想。这些行动大部分都明智地以天皇的安康为由，而其使用的词汇和术语也惊人的一致。但是，基于对世界形势和日本各种弊端的新的认识，这些词语底下的含义却千差万别。

就坂本而言，他对西方问题的认识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佩里舰队的到来，并一直持续到井伊直弼批准哈里斯的贸易条约为止。在这段时间里，没有一个热血青年意识不到国家面临的危险。在国防紧急的情况下，武士们纷纷回归习武的本业。土佐设

立了由乡士领导的民兵队，从平民中招募成员。藩内掀起的习武风尚有助于将年轻人的愤怒和抱负引导到追求炉火纯青的剑术中去。坂本被派往江户学习剑术，在那里遇到了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同学和同龄人，并自然而然地被裹进了激情、愤怒的时代洪流。他向家人承诺，不砍下一个外国人的头就绝不返回故乡。这个誓言如此自然，就像他和土佐其他地方以及其他藩国来的同道者一起讨论攘夷策略一样。

反观土佐藩内部，这些年来山内容堂通过支持吉田东洋及其门生的建议，加强了藩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从而使土佐未来几年与邻国较量时，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因此，这是土佐藩和许多家臣恢复活力的时期。幕府意识到自己的薄弱，要求各藩对政事提出意见，大名们听后开始积极行动起来。幕府为了防止藩国之间行勾结之事而对德川家族不利，长期以来禁止各藩互相接触，似乎不在意团结一致共同御敌。一开始，阿部正弘等温和派幕臣支持这种取向。结果，十年后，包括容堂在内的那些势力强大的外样大名竟敢干涉朝政，提议将军的继承人选。但是这个时期消息仍然闭塞，也只有少数人是有见识的。那些保守的藩国官员整天只想着自己的特权，对于适应这个问题没有多少兴趣。假如我们相信那些批评者的评价，他们也没有什么能力；那些下级武士对蛮力和能力缺乏实际的判断，只会响应警戒和尚武的要求，根本就不知道上司面临的问题有多么复杂。因此，吉田东洋这样的改革派官员便很容易受到批评和攻击，除非背后有个积极能干的藩主在为他们撑腰。这个时期结束时，井伊直弼停止了保护和克制的态度，以左右将军继承人

选为由惩罚了容堂。

1860年，井伊直弼遇害标志着坂本认识西方的第二个阶段开始。幕府允许外国人进来、惩罚容堂的措施使各地掀起了一股反对幕府及其政策的狂潮。包括坂本在内的剑客纷纷寄希望于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同人合作，迫使幕府更加重视宫廷，执行他们所推测的天皇的攘夷愿望。武市瑞山和他的勤王党正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他们的极端思想的养料来源于幕府面对自己未来对手时犹豫不决的态度。萨摩、长州争相成为支持宫廷反对德川幕府的倡议人，从而鼓舞了年轻的勤王党人，而长州藩的得宠以及公家的不负责任更是使他们兴奋不已。没有长州和土佐当局的暗中保护(至少是暂时的)，武市等人不可能如此随意地实施暴行并逃过幕府衙役的追捕，而没有三条实美和姊小路公知等年轻公卿的热情和乐观，极端分子将很难借宫廷批准之名掩盖暗杀的罪行。然而他们确实获得了这些年轻公卿的支持，因此可以声称自己的动机绝对单纯。充斥着“正义”和“开明”等字眼的党名给了他们以天诛之名杀死政敌的权利。他们的时代是极端主义和激情泛滥的年代，是英勇、残忍和无情的年代。下级不是杀死上级，就是逃离他们的控制。攘夷已经上升到了一个高度，成为一种时尚和意识形态，而且从天皇和国土神圣而排外的本质中去为自己寻找正当的理由。攘夷依然意味着袭击外国人和所有可能被认为亲夷的人。它是一项事业，而非策略，至少在土佐，这项事业受到狂热分子的热情支持。他们的无知使其保持了思想的纯洁和行为上难得的一贯性。正是出于这种心态，坂本才离开家乡去参加浪人起义，中冈才抛弃家人和义务跑到江户去保护容堂。

在紧急的情况下，抛弃正常的目标，并与原来的上级断绝关系，似乎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这也提供了一个为国家同时也为自己的名声大展身手的机会。它使剑客变成了志士，使封建等级制度中那些缺乏自主性而令人尊敬的士兵成为积极自信的活动家。

随着无法用武力将外国人赶出日本这个发现的到来，坂本对西方的认识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它使坂本以理智代替了感情用事。活动家们之前一直以简单直接的眼光看问题，现在他们学会了复杂和迂回的方法。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种转变像极了皈依宗教。他们在强大的证据之下，不得不承认自己之前的考虑欠佳，从而改为接受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对于任何两个人而言，转变的时间和方式都不一样。对于某些人而言，只需坐一趟轮船就获得了启迪；对于井上馨而言，这种转变发生在他看到上海港西方商船云集的场面的时候；对于坂本而言，这种转变发生在他去见胜麟太郎的那个晚上。坂本想到自己即将付出的巨大努力，感到紧张而激动，然而胜麟太郎冷静的回答打消了他战斗的念头，他突然准备听从胜的指挥和领导了。当然，并非所有的积极分子都接受了这种转变。一些人继续大肆杀戮，最后自己也死于屠刀之下。但是坂本却抱着加强国防的想法，继续为自己的幕府领导服务。坂本在服役期间结识了许多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这些都使他成为德川幕府末期一名举足轻重的人物。至于中冈，在与长州勤王党人一起出生入死之后，他逐渐认识到，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借鉴和学习才有可能对付外国人。现在他知道，所有地方的攘夷都需要坚决和耐心；如果华盛顿一直等到力量足够强大时才将野蛮的英国佬赶出去，那么日本也应

该能够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开始行动。这些土佐志士学会了从全球的广阔角度和历史的深度看问题，而这种突如其来的能力使他们从志士变成了政治家。

在他们进步的同时，以前的土佐朋友却因为山内容堂的秋后算账而纷纷倒下，结果是那些不愿学习和进步的人的数量和影响力大为减少。因此，土佐藩政府如果希望在未来的国内事务中利用勤王派的力量和人脉，将不得不利用坂本和中冈，因为他们是仅存的两名既有自由行动能力，同时又与藩外勤王人士保持联系的土佐勤王派。与此同时，容堂任命的那些新领袖为了加强土佐的实力，实施了与之前吉田东洋大致相同的改革措施，这意味着一旦土佐重返国内政治舞台争夺领导权，将有新的实力和影响力可以响应未来盟友。

迄今为止，土佐藩内个人和群体的反应，很大部分都源于西方人的出现。但是，坂本和中冈生涯的第四个阶段却主要是对幕府的反应。当然，幕府在妥协和武力、开国和延迟之间的摇摆不定也是影响早期社会氛围的一个因素。但是，1864年，幕府急切地采取措施，尝试恢复那些已经流失的权力，为自己取得明显的胜利而沾沾自喜。前一年的9月，长州的军队被赶出了京都，在随后重夺国内领导权的努力中失败，并获得了“朝敌”这个新的耻辱称号。在外国人的帮助下，长州被迫屈服。幕府获得了宫廷的批准和所有重要藩国的支持，开始召集军队征讨长州。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军，自1862年以来便把持藩政的长州勤王派领袖们屈服了，一批愿意迎合幕府的保守派取而代之。于是，江户的保守派认为自己清楚地看到了重振幕府威风的方式。他们开始大力鼓吹第二次长州征讨，希望

彻底地羞辱长州藩。幕府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进行了一系列全面的现代化改革，看起来很有可能出现一个以幕府为中心的新政府。它将能够镇压其他地方的反对势力，就像首先在长州做的那样。幕府还决定重新启动参勤交代制度这一早期德川幕府控制大名的基础。他们也决定惩罚一些顾问和官员，这些人自 1862 年以来就将萨摩藩、宇和岛藩与土佐藩的藩主视为同级而非下属。松平春岳和一桥庆喜发现，除非改变立场去迎合这种新的“强硬”路线，否则他们的影响力将走到尽头。曾在自己的神户海军操练所收留了那么多浪人的海军奉行胜麟太郎被解职，标志着坂本龙马的靠山从德川幕府转向了萨摩藩。

因此，最后这个阶段便成为如何计划从政治和经济上击垮幕府的时期。那些来自西南藩国的人现在开始认为，自己如果不及时动手，将会被幕府抢先。他们对有关法国援助幕府的每一则消息均笃信不疑，而且意识到自己面临着第二次长州征讨的危险。在这种背景下，坂本和中冈促成了萨摩和长州之间的联盟，而坂本的海援队也通过在鹿儿岛、下关和长崎之间运送粮食和武器，加强了两个盟国的关系。接下来，随着倒幕思想在坂本认识的萨摩和长州领导中蔓延，他的角色变成了既运送物资又传递想法的中间人。坂本从胜麟太郎和大久保一翁那里听到的一些思想，在与横井小楠以及那些熟悉西方的长崎人的接触中可能得到了加强。现在，他利用它们起草了《船中八策》，呼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将政权从幕府转移至大名议会。将军作为最高的大名，依然会继续发挥其巨大的影响力。这些观点不太可能得到坂本的长州朋友和萨摩朋友的支持，

因为他们可能有取代德川幕府的野心。但是在土佐领导人准备重返国内政坛之际，坂本的计划刚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于是将坂本的计划稍事修改，变成了土佐藩提出的建议。

坂本和中冈无疑比大多数的同龄人走得更远也更快。但是不妨说，他们走过的这些历程是那一代人不得不经历的。对于其他人和其他地区来说，顺从还是反抗取决于走哪条路所冒的地位和权力的风险更大，但是后来的愤怒和行动阶段则通行于日本大部分地区。在瞬息万变的国内政治影响下，有些改革方案甚至还没开始实施就已经宣告过时。

经历过这些阶段的坂本既有强烈的爱国心，又有属于个人的野心。作为发起人，他的意见被最后一任将军采纳。作为海援队的领导和一名被广泛赞赏及批评的、举足轻重的神秘联系人，坂本和1862年逃离藩国的那名年轻勤王派乡士已经很不一样了。这种差别就跟提出平权思想和官员选举制的《藩论》与他早期所写的家信区别很大一样。和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坂本利用一切机会学习西方，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阅读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时，我们不可能感受不到西方实力和例子的强烈影响。福泽那本著名的小册子《西洋事情》卖出了成千上万份，几乎是时代教科书。它的影响力从佐佐木和中冈身上可见一斑，而且被当作礼物送给了亟须获得启蒙的公卿们（姊小路和岩仓）。早期对西学的兴趣并不是乐于学习西方的先决条件，即便它自然使胜等人的话具有特别的权威性。

一小部分统治者认识到必须尽可能地利用西方的技术来重组日

本。事实上，这种观点在这些领导人当中如此普遍，以致萨长和幕府之间一度似乎在进行竞赛，都决心牺牲对方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小栗忠顺这种依赖法国的幕府领导人和木户孝允这种长州领导人，对于社会亟须进行的改革有着基本一致的意见。西方的实力和魅力使得各方在应该做什么这件事上，意见惊人的一致。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小栗这样的人能成功地提出他们的方案。从既得利益的角度来看，幕府改革派遇到的阻力更大。随着夷人的到来，王政复古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而他们的方案将与这种观念抵触，而非从中得益。为了消除两者之间的隔阂，坂本提出了一个成立新的议会制，让德川家族和大藩享有同等权力的方案，并在后来成了土佐的方案。有人怀疑这样产生的公平将以牺牲强势领导为代价，而那个时代正需要强势的领袖。由于寡头不愿与议会真正分权，明治时代早期的代议制试验遇到了挫折，然而它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该做什么，因此改革措施总是不断地与地方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有人猜测，一旦真的实施了坂本的议会制，西南强藩很快就会提出一系列要求来加强他们的影响力。回过头来，土佐藩提出的方案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可能是因为它从未真正实施过。

通过将他们打败，倒幕战争替支持德川幕府的保守派解决了这个问题。战争还通过揭示少壮改革派控制西南强藩的程度，解决了统治者的问题。对明治政府的改革派来说，非常幸运的是，当时有许多像山内容堂和庆喜将军这样的人。他们虽然被挤到一边，但是却基本同意改革者的计划，而且这些人有种历史的使命感，能够从

容而体面地退出历史舞台。据说容堂说过，当一个全新的日本开始建设时，大名只会碍手碍脚。他在新政府短期任职之后选择了退隐并安享晚年，于 1874 年去世，终年 46 岁。^[1]

维新领袖和他们的目标

偶尔有人提出说，明治维新应该按其目的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王政复古，第二部分是口号为“明治”和“文明开化”的明治维新。由于只有少数几个人清楚维新需要做什么，因此许多维新领袖不久就成为刺客暗杀的目标（坂本、中冈、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杀害横井的刺客也想同时杀死后藤象二郎）。一些作者认为，总体而言，一批具有现代新目标的政府官员代替了之前的那一批。除了个别例外，大部分的维新领袖均希望回到过去，而接下来的一批则一心想着走向未来。^[2] 这个结论是否适用于整个国家，我们将留待其他人去解决，但是土佐的情况是否是这样呢？

土佐藩存在的并不是维新领导阶层和之后的明治时期领导阶层之间的区别，而是愚昧的勤王主义者和开明的维新领袖之间的区别。以武市瑞山为代表的前者，似乎并没有承诺将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但是，他们早在维新之前就被山内容堂解决掉了。少数几个人，像坂本和中冈，成功活过了局势变换，并在维新舞台上努力为藩国的利益服务。但是，有必要重申一下，这种勤王一维新的转变，与前文提到的维新一明治的转变有很大的不同。坂本死后，土佐藩



晚年的板垣退助

的领导权和目标仍然有着显著的延续性，一些改变（例如在一直到1867年仍是坚定攘夷主义者的板垣身上）也是通过教育而不是通过暗杀或者替代得来的。

1863年，容堂重掌藩政之后，土佐藩的政局便继续被吉田东洋的弟子们把持。他们得到了能够控制藩内保守派的容堂的支持和信任，以前的勤王派已经无处可去，因此也没有给他们制造什么麻烦。后藤象二郎是这些人当中最优秀的政治家和操纵者，并且和福岡孝弟等人一样，一度为建立“全国”政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容堂在不情愿地参加倒幕战争之后的几个月里，被授予了几个荣誉性的头衔。那时为了赢得战争胜利，迫切需要民族团结。他的身份依次是议定、内国事务总裁（与松平春岳共同担任），最后于1868年6月的政府改组（类似于“土佐方案”的一个计划）中成为上议院的议长，

并主持了日本第一部宪法的部分起草工作。但是，战争胜利后，新政府不再那么迫切地需要各方的支持了。在大久保、岩仓及其他同一派领导人的压力下，土佐领导人停止了自己主导的这种议会试验。他们也不再需要容堂这类挂名的首脑了。

后藤象二郎一开始在新政府的外事部门任职，职位是“参与”，在政权更迭后的几个月，在与外国列强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还担任了大阪府知事。正是在后藤的大力主张下，江户才被选为新的首都（1868年9月3日更名为东京），他也随后跟着新政府前往东京。同样被任命为“参与”的福岡孝弟在政府的司法部门工作，主要负责法律的起草和机构的重组。1868年4月，福岡和越前藩的由利公正一起完成了《五条誓文》的起草工作。福岡还协助制订了1868年6月的政府改组计划（即由容堂担任上议院议长的那份《政体书》）。策划者在制订这项计划时，主要参考了福泽的《西洋事情》中有关西方议会的各种程序。但是，正如上文所说的，德川幕府垮台后，这些计划连同土佐的方案都被搁置了，因为现在完全有可能成立一个强大的政府，而无须担心佐幕派会卷土重来。

维新初期名气最大的是板垣退助。容堂同意土佐军队参战之后，板垣带领他那支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的军队一路向北，进入了相邻的高松藩和松山藩。两藩投降后，板垣又继续向本州的主战场进发。在长期包围并一举夺取会津藩若松城的战役中，板垣军队的表现尤为出色。从此他就有了几分民族英雄的味道。另外，参加日本最后一场封建战争的经历也使他意识到，必须发动平民，向他们灌输参与政治的观念。板垣发现，当地的农民没有参加战争，而是冷静地

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一心只想着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向双方兜售食物。没过多久，板垣就听说法国平民在抵抗普鲁士军队时发挥了巨大作用。于是，接下来几年土佐藩的改革文件，很大的篇幅都在强调必须仿效法国，提升民众的爱国心。

板垣的军队也为其他土佐领导层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谷干城和片冈健吉就是从军队中脱颖而出的。中冈慎太郎的助手田中光显带领陆援队参加了京都的倒幕战争。佐佐木高行带领坂本的海援队，在长崎夺取了德川幕府的长崎奉行所，并且在萨摩藩的松方正义到来之前一直控制着这座重要的港口城市。板垣并非唯一一名参加战争的土佐领导层，但无疑是他们当中最突出的一位。

本州北部的战事接近尾声时，土佐藩奖励了板垣和后藤，将他们从马回提升为最高级别的家臣——家老。福岡等人也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拔。中央政府还奖励他们金钱（仍然以大米计算）。后藤在中央委员会的影响力一度超过了板垣。据后藤的传记作者说，板垣曾公开向后藤表示，与政治相比，自己更适合军队，并要求后藤在政府中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3] 尽管如此，板垣却一直待在东京，就跟大多数杰出的领袖一样。容堂自己也在那里，结果东京成了土佐藩和全国关注的焦点。山内丰范领导的土佐藩政府对东京发来的指示言听计从，结果导致许多官员，正如谷干城（其中的一员）所说的，对大批藩国领导在首都大肆挥霍土佐公款感到愤愤不平。“他们认为回到土佐就像从天上掉到地狱，都觉得过于残忍而不愿答应回藩。”谷干城汇总的1870年藩国的预算显示，超过1/3的预算都花在了东京，还不包括那里的军费开支；土佐藩内的行政支出

只占了不到 1/6。^[4]

1869 年，政治形势仍然极端不稳定，因此土佐统治者继续花费大笔金钱来加强土佐的防卫。大家认为不出几个月，萨摩和长州之间肯定会爆发战争，因此围绕土佐在这场战争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而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土佐因为不情愿地参加了局部的倒幕战争已经失了一局，因此现在应该为即将到来的下一场冲突做好准备。土佐应该参加哪一方是个艰难的决定。统治土佐的山内家族和长州藩的毛利家族以及萨摩藩的岛津家族都是亲戚，但是与岛津家的关系更近一些。而且自从坂本与西乡合作以来，土佐和萨摩的政治关系非常不错，因此藩政府决定将与岛津家共进退。1870 年春，山内丰范造访了鹿儿岛，与萨摩藩藩主举行了正式的会谈。土佐军方的领导决定，一旦战事爆发，他们将带领全部兵力冲向京都，为那些自称支持天皇（和萨摩藩）的人竖起一道标杆。

这些计划需要在四国岛内部进行外交上的准备，以保证土佐军队不在时，邻藩不会进攻他们。土佐首先与十二个邻国一一会谈，并征得他们的同意，在赞岐的金刀比罗宫召开了代表大会。我们注意到，土佐藩代表在这里再次想到了议会的方式。会议的目的是为了听取各方的意见，同时加强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但是效果却并不显著。会议召开的第一年，谷干城便发现代表们素质很低，而且对自己的责任满不在乎。他说，他们既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关心自己藩国发生的事，“整天无所事事，只会聚在一起一掷千金，饮酒作乐”。这一试验以失败告终。^[5]

与此同时，土佐藩却加快脚步，力求增加军队的实力。他们在

东京聘请了一位法国军官，让他教士兵们欧式的训练法和战术，还请了几名幕府军官（已经被解职）担任教官。东京的队伍完全在板垣的掌控之下，他将重点放在保持军队的平衡上，其中既有骑兵和工兵，也有炮兵和步兵。谷干城和片冈健吉在土佐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因此，1871年中央集权的最后措施出台时，土佐才能为国家贡献一支人数虽然不多但却训练有素且装备精良的队伍。^[6]

军队改革的力度几乎使土佐与最新的西方科技接轨，因此不可避免地加重藩国的债务。1869年3月，土佐、萨摩、长州和肥前四藩向宫廷请求奉还版籍，宫廷虽然名义上同意，但各地的自治权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1869年7月，年轻的大名山内丰范被任命为土佐县知事。这一头衔的变化并不能改变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自治，结果，土佐藩的预算依然是当地需求和意图的产物。因此，虽然政府名义上不同意前藩国设置官办企业（按照规定，这种企业模式落后且危险，可能会增强地方实力），但是土佐藩的官办企业却和以前一样兴盛。1868年，由于与佐佐木高行不和，岩崎弥太郎辞去了土佐藩驻长崎代表一职，但他不久就东山再起，成了土佐藩在1868年设立的大阪商会的负责人。现在，这个新成立的商会，不论是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的数量，均超过了原来的长崎商会。商会虽然表面是私人（岩崎的）企业，但是实际上却和以前一样，是土佐的官办企业。然而，随着中央政府加强了控制，这种名不副实的情况已经无法再继续存在，结果那些名义上的私企变成了真正的私企。岩崎买下了土佐藩的资产，为现代日本最大的商业和工业帝国之一的三菱商会打下了基础。^[7]

长崎和大阪两个商会的设立只是维新后那几年藩国为了平衡收支而采取的计策之一。政府以紧急“借贷”和军税为名向武士课以重税，而新的税制则第一次将住宅、企业，甚至宗教机构都纳入了征税范围。另外，藩政府还向土佐、大阪和外国商人借了许多钱。1871年废藩置县时，藩国的负债高达922389两白银，比一年的税收还要高出一点。长崎官员成了那些向土佐讨债的外国公司发泄的对象，^[8]最终，尚未支付的船只都被移交给了政府和岩崎，借此偿还了许多外债（总数达到180000两）。除此之外，藩政府还发行了大量的纸币。^[9]

所有这一切，无疑成了压在土佐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谷干城后来写道：“钱迅速贬值，而物价的上涨却越来越快。我们的许多粮食和产品都被非法卖去了国外，商品短缺的现象无处不在，政府和人民都受着贫困的煎熬。政府……曾尝试购买各种土特产，将其运到大阪出售，希望以此来缓解艰难的状况，但却总是被商人这一竞争对手抢了先。政府的大部分行动均以失败告终，结果是民众对政府失去了信心……”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谷建议将大部分没必要留在江户的人召回，以减少土佐财政的消耗，遏制腐败，以及恢复以前一些限制消费的措施。^[10]

财政危机，加上国内日趋危险的政治形势，肯定是这一时期板垣等人大力抨击社会改革的一个主要因素。迅速丧失军事作用的武士成了公共开支的沉重负担，因此很容易便沦为一心现代化的改革者的目标。武士的级别决定了他们的收入，而薪俸则成了政府的主要负担。与此同时，在板垣那支训练有素的现代化队伍中，有些

士兵并非武士出身，但在遵守纪律和协同作战方面常常表现得更加出色。

东京的中央政府同意了这些改革中的大部分，土佐人虽然起步缓慢，但最后却超过了政府建议的范围。1869年，版籍首次奉还宫廷，藩主被任命为知事时，政府领导人宣布废除大名头衔，并将以前的大名全部归入公家，成为一个新的阶级——华族（意为贵族）。接着，那年年底，新政策出台，宣布取消烦琐的武士分类，重新将他们划分为“士族”（意为勇士或者武士）和由以前那些下级武士组成的“卒族”（意为士兵）两类。下面那些原来的农民、工匠、商人和贱民（“秽多”和“非人”）一律统称为“平民”。1869年12月16日，这些向前藩国颁布的法令成为土佐藩的法律。然而，土佐藩与其他藩国一样，在诠释这些法律时有一定的自由度，因此社会等级的相对排列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请注意其中使用的折中方法，你会发现它们非常有意思，因为德川时代晚期土佐藩真正的等级观突然变得清晰起来。

士族阶层被分为五个等级，其中三个等级又细分为上下两等，这样总共就有八个等级。^[11] 详见下文：

士族 第一级：山内家族的旁支、家老、准家老。

士族 第二级：中老、马回、新马回。

士族 第三极

上：小姓组、新小姓组。

下：留守居组、新留守居组。

士族 第四级

上：五种级别的神官、乡士、村主、准村主。

下：组外、九大神社的神职人员。

士族 第五级

上：神职（神社官员）、原来的足轻、足轻。

下：其他级别的足轻、乡村神社管理员（社人）、

大庄屋一番头。

与此类似，卒族也被分为三级共六等。我们注意到，这些分类非常笼统。士族的人数大约为 7250 人（包括家人一共是 30500 人），而卒族的人数是 3700 人（包括家人一共是 17681 人）。^[12] 对级别混乱的神社工作人员的极高的赞美，也许反映了当时以天皇为中心和抑佛的单纯思想。但是，政策中最令人吃惊的一点也许是乡士甚至足轻也成了人们梦寐以求的士族。平民中的庄屋领袖（例如中冈慎太郎）也变成了士族。其他的庄屋则成为卒族，有姓者的地位高于无姓者。然而，事实上土佐藩所有的维新领袖都成了士族。当然，坚持到最后的板垣、后藤和福冈的级别也最高。

土佐的改革就这样缓慢开始，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一度落后于中央政府的期望。这些措施如此温和，一个原因是他们充分考虑了藩政府官员的意见。

1870 年 1 月，板垣和后藤、福冈一起返回高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后藤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板垣和福冈则立刻接过了高知政府的指挥棒。他们回来有几方面原因。极端保守派贵族暂

时主宰了东京政坛，导致政府更关注神道教而非改革。那群武士出身的领导人也渐渐地不再团结。倒幕战争结束后，他们不再需要争取少数派的支持，结果萨摩和长州对土佐人的意见似乎不像以前那么重视了。但是比个体差异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仍然过于软弱和分裂，无法进行任何大刀阔斧的改革。因此西南各藩的领袖们决定返回自己的藩国，重新控制藩内的政局，加强军事实力以防战争再次爆发，同时建立一套以后可能适用于全国的社会和制度改革模式。此时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也已回到了长州和萨摩，西乡隆盛已经回去一段时间了。^[13]板垣后来解释说，他希望首先在土佐进行改革，以此绕过东京政治寡头的控制——这有点像后面几十年中，冒险家在谈论朝鲜（金玉均）、中国（孙中山）和中国东北地区（关东军）的改革一样。

板垣的建议必须先得到容堂和东京中央政府的同意。他和福冈在被任命为大参事（1869年夏实施制度改革后最高的行政长官）后，立刻返回东京，以知事山内丰范的名义向政府提交了他们的建议。建议书一开始便讲所有人生而平等。世袭的职位应该废除，“不论是武士、文官还是武官的职位都应如此，这样所有民众才可能成为国家的臣民”。官员应该从平民、卒族和士族中选拔，而新设立的常备军应该代替武士。武士的薪俸应该改为以债券的形式支付。建议书接着说道：“农民、工匠和商人的唯一区别只是职业的不同，而不应该和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关。”最后，他们建议制定一部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户籍法。他们还附上一篇文章，表达起源于德川幕府封建制度的社会阶层分化应该随着幕府的倒台而一并被废除。“任

何一个文明国家都没有这样的风俗。这种等级划分剥夺了天赋人权，是人为强加上去的。”武士阶层的保障应该被废除，以免他们无所事事地吃皇粮。最好是“每个人都追求知识，并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国家服务。这是天职”^[14]。当然，建议书并没有提出应该停止阶级和头衔的划分，但是确实提到了如何使等级差别变得无关紧要。

东京虽然并不是很热心，但同意了他们的提议。有人指出，任何阶级内部都存在不平等，将武士的收入和地位一刀切的做法并不公平。但是，以债券代替土地或薪俸的做法，似乎是过去的义务和目前的所需之间的一种合理折中，因此得到了政府的批准。板垣等人急于以土佐为试验，检测那些他们认为不久将在日本各地实施的规则是否可行。他们也在考虑废除卒族，并且希望通过法令，禁止武士佩刀。东京政府批准了前一个建议，同意高知进行试验，但是没有批准后面一条。他们的建议远远超过了日本其他地方遵守的时间表。高知人发现，长州与宇和岛等藩的人对自己的建议很感兴趣，但并不急于实施这类措施，而是决心等土佐藩的试验结果出来再做计议。

板垣和福冈兴致勃勃地回到高知，准备大干一场。他们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于向武士解释所做的一切。1870年年初，藩政府颁布了《四民平均之理》公告。公告上说：“夫人为天地间活物之最贵重者，且具备灵妙之天性，兼有知识技能，即所谓万物之灵，固无士农工商之隔，亦无贵重上下之阶级。”只有武士才能参军和入仕的规定是中世纪以来的封建弊端，它导致了普通民众对战争的结果毫不关心，因此必须任人唯贤，这样社会上的所有人才能实现他们的愿望。

如果社会各阶层都争着为国效劳，国家将会从中受益。在最近欧洲发生的战争中，法国战败了，但是法国的平民在长期的围城中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日本人也应该培养这种精神。真正的民族团结和民族富强取决于民智的开化和活跃程度。富人和穷人同为政府的子民，两者之间不应有区别。

接下来几个星期，土佐藩政府宣布将所有在职的文武百官解散，同时任命新人（大多无疑还是原来那些人）。平民可以参军。世袭的武士薪俸改为抚恤金，并以债券的形式发放。藩国政府向武士一次性发放三年的抚恤金，以鼓励他们从事新的职业。1871年8月，日本政府宣布废除封建制，所有权力收归中央，土佐藩的改革计划随之中止，但这时土佐已经走在日本其他地方的前面，实施了很多它们后来才实施的政策。

其他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的政策则继续剥夺武士的特权。武士对“无礼”者格杀勿论的权利被取消，私自惩罚和报仇的权利也被收回。政府还撤销藩国的边境检查站，允许平民自由进出土佐。武士被允许，甚至被鼓励经商。土佐还试验了几次议会制。1870年4月22日，议事局成立，但只允许土族中最高三个等级的家族首领参加，每月开会两次。与会成员在议长的家里碰头，大门外设有建言箱，以便像以前一样听取民众的声音。但是，成员的组成表明其封建遗存的性质，于是两个月后就被解散了。第二次议会则走了另一个极端。1870年8月2日，众议所成立，成员主要由乡正、年寄、商会领导和坊正组成。它和仍然把持藩政的上层阶级关系并不融洽。这个项目由福岡孝弟想出，但是众议所刚成立不久他就退出，重新到

中央政府任职去了，项目也随之中止。最后一次的两院制尝试更有希望实现，因为它的目的是将这两个群体的代表集中起来。但是还没来得及实施，1871年的废藩置县令就给所有地方性试验都画上了句号。^[15] 这些改革不可能不惊动上层阶级。然而尽管有很多怨言和牢骚，但却没有爆发什么冲突，原因可能是平民们没有立刻抓住属于自己的新权利。

板垣的改革计划并不只限于这些。1870年，他性急地以最快的速度去实现土佐的现代化。一系列新措施包括允许成立饭店和戏院，开启了私营企业的新纪元，其中包括为高知的妓院制定规章制度。外国人被聘请来指导法律改革。同时，藩政府向武士发布特别通告，解释邀请外国人来的原因，希望他们获得的是礼遇而不是暗杀。^[16] 过去那些用于统治和控制平民的封建手册被勒令烧毁，连以前山内家族的大名画像也遭到焚毁。与此同时，板垣政府大力贬低佛教，宣扬神道教。高知最好的寺庙均被拆除，无数的雕塑和艺术品也没有逃脱被毁的厄运。政权的更迭变成了一场文化革命。^[17]

这些措施虽然激进，但根源却在于孕育《藩论》的那类思想，而且它们是由德川时代末期土佐的同一批领袖实施的。主宰了政坛的板垣、后藤和福冈都是吉田东洋的弟子，同时深得山内容堂的喜爱。像佐佐木高行、谷干城这样的低级官员也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和名望，但他们并不是当政者，两人都倾向于认为板垣过于冒进和不切实际、后藤有些狡猾和自私，但是他们的这些书面意见均写于板垣和后藤已经与中央政府分道扬镳，而他们自己却继续留任之时。

我们不能因而得出结论说，维新后几年，土佐领导层的组成发生了变化，但是他们计划的内容确实有了改变，因为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措施。一开始的政治和外交均继续围绕着以前那种与萨摩和长州进行封建竞争的思维进行。土佐人认为两者的破裂指日可待，并准备好好地利用这个机会，从而有了军队改革和与四国岛上的邻藩结盟的做法。它大力地拓展藩营事业，目的是为了获得额外的利润。接着，为了满足局部统一的要求，土佐领导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新的政治形势逐渐使人们意识到，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建立一个不一样的社会。人们从当时的文件中感觉到，真正的民族团结既不能靠萨长一手操办，也不由那些腐朽的封建制度中产生。于是有了在土佐试验那些改革措施，然后在未来向全国推广的想法。现在他们想的是如何才能让民众积极地参与国家行动，使他们有种与国家祸福与共的感觉，因此才有了这些激进的社会改革。

跟德川时代末期一样，西方成了这种理想社会的榜样。真正的统一和真正的爱国精神需要使日本的习惯达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准。与若松城外那些令板垣震惊的冷漠农民相比，法国显示出了爱国主义精神的优越性。高知给中央政府的建议书是这么写的：“假如以人性的准则（即平等）代替武士的准则，假如每个人都为他人和自己的福利而努力，那么一旦战争爆发，每个国民都将不惜为国牺牲而自愿参军。”只有人民富足了，国家才有可能变得真正强大。建议书又说：“英国的国债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多，但是英国百业兴盛，人们非常富有。假如人民的生活穷困，政府将什么也做不

了，即使国库非常有钱也无济于事。”^[18] 这些思想经过轻微的改动和润色，将成为 1873 年板垣和后藤等人退出政府后重新提交的一份要求设立民选议会的建议书的主要内容。这种认为有必要团结并利用民众的兴趣和热情的观点，激励着板垣进行随后的自由民权运动，同时它也有助于解释为何明治时期民主制度的宣传总是带着一股民族主义的基调。

阶级利益的问题

自诺曼（E. H. Norman）对日本维新的综合研究被奉为经典以来^[19]，认为维新起源于商人和下级武士之间联合的观点几乎成为定论。诺曼以长州为对象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认为，那些能干而心怀不满的商人和武士利用了农民和下层阶级的压力，不料却在 1870 年代征收土地税、征兵和加强管制时遭到对方的阻挠。^[20] 土佐虽然并不具有代表性，但是在评价这些问题时再看一眼土佐的背景还是大有裨益的。因为土佐是个重要的地区，如果这里没有那种全国性的利益团体的联合，反而是当地特色决定了事件的发展，那么，在各地均以行政手段和社会措施鼓励地方主义并使其得以永存的时代，我们在寻找适合日本全国的社会分析模式时必须非常慎重了。

首先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一个只有极少数人具有政治觉悟和行动力的社会，只需一小部分人采纳，计划便可实现。它根本无

须搅动大范围的阶级利益。只需群体中一些有影响力和威望的人认识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日本必须做出改变。这些少数人是否代表了特殊阶层的利益呢？

对于土佐藩内部，我们首先必须重申之前说过的一点，即勤王运动和维新运动之间的区别。两者的情况和人员有许多重叠，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别非常重要。其中，武市瑞山时代的勤王运动，领导者主要是乡士和庄屋。这些人非常憎恨他们的上级。在佩里到来之前，这种敌对情绪表现为无数的抱怨，而这也是 1860 年代勤王运动得以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乡士和庄屋与上级之间产生裂痕，并不仅仅是因为等级和政治上受阻。虽然这也是原因之一，但更基本的原因可能是乡村和城市的对立。乡村领导者的不满是，藩政府为了藩内新垄断企业的利益而出台种种措施，限制了他们的财富和权威。他们竭力争取复兴的是一种在尊敬的宫廷和全能的乡村领导者之间没有封建中间人存在的制度。但是，西方人来后，权力集中的需求非但未减少反而增强了，因此他们这种乌托邦式的计划无论如何都难逃失败的命运。况且，他们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机会实施这些计划。一番轰轰烈烈的开始之后，他们在幕末时期的土佐丧失了全部的影响力。这些人对明治早期形势的调整和适应则是我们下面即将讨论的一个问题。

然而这些局部利益并没有直接移植至勤王运动的政治纲领之中。首先，那些举足轻重的乡士大多出生于居住在城市并购买了乡士身份的家族。一旦取得权力，他们便准备实施自己早年曾激烈反对过的那些经济措施。他们的行动和文字通常都很爱国，完全没有

强调和呼吁狭隘的地方主义。

反过来，土佐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必须是那些有能力影响官方的决定和政策，且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高官。只有和佩里到来时少数几名位高权重的无能者相比，他们才是“下级武士”。那几个人看起来既无能力，又像扶不上墙的烂泥一般不堪造就。他们读不懂1853年佩里来信的翻译件，而后藤则决定越过他们，直接用汉文上书容堂，这些显示出他们对下属的建议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土佐维新的领袖们——后藤、板垣和福冈——都是吉田东洋的弟子和大名面前得宠的人。他们的改革计划要求乡士和庄屋们待在原地，但是，一旦做到了这一点，为了维持土佐在国内舞台上的影响力，他们又毫不犹豫地利用起了勤王运动的部分政治口号。维新期间，这些“上级武士”（必须对他们冠以这个称呼）牢牢地掌握了土佐藩的政权。

要在上述事件中找出商人影响和指点的蛛丝马迹真是难上加难。从某种程度上说，乡士和庄屋同时代表了乡村和商人的利益，因为他们在乡村扮演的是双重角色。但他们的思想和价值观显然是“反”（而且非常“前”）商业的。如果你称其为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真的会恼羞成怒。另一方面，城市（高知）商人则与藩政府的垄断企业结盟并为其所用。当然，并非所有的城市商人均参与了垄断企业，许多商人显然对开成馆及新的垄断势力深恶痛绝。但是，正是后者，而不是前者，使土佐在维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维新之后，藩政府继续加强垄断企业的努力受到了商人的阻挠。用谷干城的话说就是“政府……总是被商人

这一竞争对手抢了先”^[21]。因当时政治不稳定而造成的紧张和愤怒情绪肯定延续了很多年，但是我们不能证明它们就是政治不稳定的起因。

坂本在国内舞台上的行动得益于他结识的无数商人朋友。这一点无法避免，因为他的商业行为以及对保护和资金的需求需要他走上以前只有商人才走的路子。他与长州商人白石、伊藤（他们从藩国间的贸易中获利）以及与长崎商人小曾根之间的友谊都既有利可图，又令彼此愉快。但是，认为这些人代表了自由商人的利益，或者说他们在这方面影响了坂本及其朋友们，则有些言过其实。阶级平等、取消之前的禁令、允许在土佐成立新企业以及藩政府从之前的垄断贸易中退出等政策，显然为商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但是这种压力只有部分来自商人。我们不应该忽略一个事实，即像佐佐木高行这样老派的人也认为藩企的效率低下，腐败横行，并建议取缔藩企。来自现代派的压力同样非常重要，他们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援引了19世纪西方盛行的自由贸易学说。尽管假设非常诱人，但是目前不可能证明商人的利益左右了改革的实施。

另一方面，明治时代初期，庄屋一乡士的利益却一直是得到公认，且呼声最高的一种利益，因此，观察它在1870年代中期令土佐动荡不安的巨大危机中如何发挥作用将对我们很有启发。虽然我们因手上的资料过于局部而无法做出全面的论断，但是它确实为我们质疑某种论调是否站得住脚提供了资料。那种论调认为，明治初期的“民主”运动是痛恨政府为了城市工业化而征收繁重土地税的

乡村领导层愿望的反映。*

土佐的维新军队中有大量的庄屋和乡士。倒幕战争结束后，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头衔和地位而四处奔走。他们抱怨说，只有自己将放弃战争中辛苦得来的身份和地位。这些抱怨一点用处也没有。^[22]但是，他们得到了其他的补偿。士族和卒族的新规颁布后，这两类人都过得相当不错。更重要的是，在旧有的领地分封制结束、武士薪俸大幅缩水之时，乡士被认为是土地的所有人，并最终获得了“现代”的头衔。庄屋虽然在乡村组织和政府重组时经常被挤下领导职位，但他们通常也拥有大量的土地，结果，在上司们的威望和影响力迅速减少之时，他们的威望和影响力却或多或少地保持不变。^[23]

这些财富水平的变化对接下来十年的民主运动起了一定的作用。1871年板垣和后藤回到东京，在中央政府任职，但是不久就发现无法在“征韩论”的辩论中取胜（后藤早在1869年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征韩明显将得到武士阶层的支持，但是却被他们的同僚们阻止，对此板垣和后藤感到非常不满，愤而辞职，并与肥前藩的同人们一起发表了那份要求立宪的著名宣言，从此正式拉开了自由民权运动的帷幕。忠于板垣的其他土佐人纷纷离开近卫兵团，跟随自己的领导回到土佐。返回家乡后，许多人都被眼前的变化惊呆了。那些将债券投进新产业的武士并没有什么经商天赋，以至于社会上甚至产生了一个新词叫作“士族商法”（意为“武士经商的方

* 大部分作者都指出了1880年代“自由党”的支持者中包括农村的酒坊主和地主这一事实，因此，许多人随意地将两者联系起来。

法”)。火柴厂、饭店等各种企业都是满腔热情地开始,但惨淡地告终。^[24]纸币的发行造成了物价飞速上涨,武士手中的债券价值只剩原来的几分之一。由于征税,封建大官的宅邸已经易手,并被改建成了饭馆和各式各样的酒屋。连家老的家庭用品和私人财产也被沿街叫卖。“我们的境况异常艰难,”一份向政府求助的陈情书这么写道,“许多家庭无法生活在一起。母亲、父亲和孩子不得不各自安排。一些人拉起了人力车,许多人靠打零工勉强度日。”^[25]

随着这些军人从东京回来,武士阶层的不满更趋强烈,短时间内就成立了几个派系,其中最终命名为岭南社的,是一个社会观和哲学观非常保守的派系。他们的理想是忠于天皇,而为了巩固藩内的忠君思想,他们从京都请来了一名勤王派学者,担任年轻人的老师。岭南社是维新前的勤王思想与其他保守思想相结合的代表,土佐各地均可见到它的身影,而其根源则在于之前乡土和庄屋运动所诉求的乡村利益。^[26]第二个组织是佐佐木高行用政府资金成立的中立社,其目的在于与其他团体抗衡,并获取它们活动的情报。1874年板垣在高知设立了立志社,主要成员是那些追随他的武士。^[27]立志社计划在武士的协助和教导下解决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等问题。他们设立学校,教授西学和法律,同时建立合作企业,为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武士解决生计问题。与此同时,立志社也一直在积极地呼吁实现立宪和民权。

现有的地方研究表明,板垣的活动受到乡土和庄屋的强烈反对。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保守的岭南社的支持者。作为地主,他们现在成为惬意、富裕的社会领袖,视民权运动视为危险的激进主义,认为

它没有真正地考虑帝国的主权问题。立志社的成员同时也是高知政府官员和政府支持者监视的对象，因此他们在高知的活动开展得并不顺利。假如不是这样，他们的行动将会变得更加难以控制。因此，就我们目前所知，那种认为下级武士利用农民的力量推翻了政府，而后又阻止他们在民主运动中热情再次高涨的论断显然是错误的。至少在高知，更为准确的说法（尽管也有所夸大）是乡士一庄屋利用武士的野心为自己争取到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之后便抛弃了这些恩人和盟友。没有什么比 1870 年代中期以后，乡士这一志得意满的大地主阶级和他们穷困潦倒的前上司之间差别更大了。

直到 1877 年，仍有许多立志社的成员及其对手认为可以进行第二次维新，而只需几次大胆的进攻就能动摇萨摩藩和长州藩的统治地位，代以新的联合政府，从而保障土佐藩的利益。但是这一年西乡隆盛发动了武装叛乱，带领一队萨摩武士向东京进发，结果叛乱失败，自己也自杀身亡。忠于政府的土佐军协助镇压了西乡的军队；谷干城是熊本城的司令官，他的顽强抵抗注定了叛军失败的命运。但是，直到西乡已死的消息传到土佐，中央政府还一直在担心板垣会带领自己的军队协同西乡作战。^{*}板垣之所以没有这么做，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旧式的做法已经过时了。他反对一些朋友提出的突袭大阪政府总部和暗杀政府首脑的做法。由于这些人无

^{*} 佐佐木高行现在已是政府的坚实支持者，他利用自己在土佐的所有熟人，使政府对板垣的行动了如指掌。当地政府和警察施加的压力当然也不小。

法拿到武器，当西乡失败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情时，公开叛变的呼声自然就停止了。因此，“现代”政治运动成为唯一一条反对政府的路子，而板垣走的正是这条。*

在目前研究的基础上，很难从这么简短的描述中断定，板垣等人在维新前后的行动代表了某一阶级的利益。不可否认，上级武士中明显存在门阀和派系之争，统治阶级中基于地位和权利的敌对斗争同样非常普遍。在土佐的勤王运动主张广泛听取民意的短暂时期，大家注意到了乡士和庄屋所代表的乡土利益，然而这种团结和热情似乎在 1864 年之后就消失了。也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地方性的局部问题对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的思想和行动产生过重大影响。坂本和中冈一踏入政坛，思想就一直被国家性的危机和需要占据。

在谈到这些土佐人物的思想观点时，我们同样必须非常谨慎。有人猜测，现代的读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几十年来“官方”维新史的受害者，那些维新史书过于强调神道教的纯洁性和忠君思想，以至摈弃了广义的民族目的和狭义的个人目的。就坂本和中冈的情况来说，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确实已经将天皇的地位牢牢地植根于他们的思想。中冈的情况尤为如此，也许是他比坂本接受的正式教育更多，中冈经常在文章的末尾加上一段神道教呼吁政教合一的箴言。

* 政府调查了几起土佐阴谋叛乱的案子之后，对片冈健吉、林有造和竹内纲分别判了刑（其中竹内纲的儿子吉田茂可能是最后一位与板垣有联系的土佐政坛风云人物）。

但是，如果因此而得出结论，认为许多支持容堂或者幕府的人，或者两者都支持的人，都不同意全部或者大部分维新观点，则大错特错。他们之间的分歧更可能是在方法和可能性上，而且通常是基于实际的考虑和判断。纯粹的忠君思想和完全纯洁的观点都是不切实际的东西，那些经验丰富且责任感强的人极少保持这些。地位较低的乡士习惯黑白分明地看问题，他们理解不了自己的上司在真理面前为何会犹豫不决。另一方面，那些地位较高的人，甚至包括板垣自己，都非常清楚宫廷公卿的不成熟，同时也非常清楚情况的复杂性，因此不会采取这么严格的立场。他们往往很少谈及神圣的事业，而是频繁地准备立宪计划，从而使将来出现天皇专政的机会大大减少，让萨摩或长州也无法打着天皇的幌子谋取私利。即使是坂本龙马，我们也明显注意到，他很少谈及神道教信仰。对他来说，王政复古实际上是民族团结的一个前提条件，只不过他非常自然地使用了“功绩”和“抱负”这样的词汇。

维新英雄与此前日本和中国史书上的英雄的最大差别，也许正是这种在民族危机时期表现出来的个人使命感和大无畏精神。自信、坚定、傲慢，这些以前没有的品质使志士变成了令人生畏的对手。他们自称听命于（不可知的）天皇的旨意，因此不被同伴限制或引导。他们有强烈的进取心，并建立了一种表达异议和个人介入的传统，而该传统此后一直延续，成为现代日本政治最具活力的特点之一。后世的革命者将自称拥有这种传统。1880年代，板垣的助手、土佐作家植木枝盛首先采纳了这种传统。久坂玄瑞曾称赞过那些鄙视斤斤计较的人，植木赞赏并引用了久坂的这番话，同时高度赞扬

那些“慷慨、骄傲而与众不同”的人。他还出版了一本《爱国志林》，以德川时代的志士为题材，着重表现了志士们对财富的鄙视以及他们的自信和勇气。^[28] 志士的遗产并非只有激进分子。明治时代正好是塞缪尔·斯迈尔斯的书最畅销的时期。这时的教育系统竭力想让每个学童都胸怀壮志，创立一番丰功伟业，实现自我价值。^[29] 因此我们可以将坂本的这种精神视为明治时代日本社会活力的先驱。这种精神也吸引着亚洲其他国家的理想主义者和野心家。明治时代末期，一些冒险家与亚洲其他地区的革命者合作，向自己的朋友和手下讲述了心目中的英雄，这些谋反者都认为自己也拥有这种精神。正如孙中山所说的，“夫国民党者，即五十年前日本维新之志士也”^[30]。

在实施“奉安”这一理念时，志士的传统同样充满了蔑视权威和规矩的狂热。在其他形式的抗议已经变得可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维新志士说过的话、他们的名字和以前的旧例都成了替耸人听闻的暴力行为辩护的理由。尚武的社会传统，加上习惯将重点放在挑衅、教唆而不是杀人者的个人责任的社会风气，造成了公众的暧昧心理，而这种心理反过来助长了狂热青年的刚愎自用，使他们认为自己的暴行代表了正义。但是，他们错了，他们并不是维新志士的接班人。他们不仅没有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反而用可怕的闪回，展示了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日本人生活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一百年前的词语现在不仅已经过时，而且成了愚昧的代名词。没有人会混淆维新豪杰和那些自称为他们的继承人之间的差别，前者看到一条理性的进步之路时当即决定放弃使用暴力，后者则背弃理性，

诉诸武力，徒劳地想让自己的国家回到不合理且虚无缥缈的陈腐神话中去。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幕末时期志士的个人目的和大无畏精神，往往处于一种虽然方法各异，但却目标一致的环境之中。我们经过分析发现，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通常是在实施的手法和时间上，是谁来领导和什么时候实施的问题，而不是在哪里实施的问题。结果，敢于提出政治诉求的少数派的一致性令人吃惊。部分原因是这个问题可以被解释为“外国”问题，因此才能在保存民族的政治和文化完整性上取得广泛的一致意见吗？这一点无疑发挥了作用。但是在最后的评价中，我们必须从德川时代社会的价值观的力量和生命力上寻找答案。这些价值观经历了政治制度的崩塌而依然完好如初，是因为它代表了对政治理想的否定，而非表达。在那些当权者倒台之后，权力的渠道依然存在，而且向所有的追随者敞开。分歧只存在于精英人物中间，即便如此，这些分歧也常常被他们的一致性所掩盖。庆喜就是一个例子。他和坂本一样，本来非常可能被挤到一边，但却成了历史学家和后世读者心目中的维新英雄。

这种共识也凸显了维新时期与一个世纪后的日本之间的差别。战败之后，那种一度非常神圣的民族精神显得格外空虚，因而被日本民众拒绝接受；政治理想不复存在，与此同时外界的影响也日趋分裂，人们不再像19世纪那样，认为西方是美好社会的唯一标准。战后的日本表面上民主、繁荣而且国际化，但是这些表象似乎一直掩盖了有关社会建设目的的深层分歧。然而讽刺的是，这可能也会带来好处，因为日本的现代化成就已经与一度相连的国家神秘主义

分开，现在正处于一种更加民主而有吸引力的社会框架内，能够引起其他国家的浓厚兴趣。维新领袖曾希望自己国家体制达到其他国家的水平，从而使后代子孙不在他国面前“蒙羞”，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理想的被取替也许同样证明维新领袖的目标实现了，就像一个世纪前帝国的构想实现了他们的目标一样。

注释

写在新版的前面

- [1] 见 Joan Mellen, *The Waves at Genji's Door: Japan Through Its Cinema* (N.Y., Pantheon Books, 1976), pp. 61-77。

第一章

- [1] G.F. Meijlan, *Japan: Voorgesteld in schetsen over de zeden en gebruiken van dat ryk, byzonder over den Ingezetenenen der stad Nagasaky*, Amsterdam, 1830.
- [2] 1732 年，土佐藩就是这样获得了一笔幕府的贷款。高知地方史研究会，《高知县历史年表》，高知，1958，第 52 页。
- [3] 关于对京都宫廷的掌控，请参考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编辑的《维新史》（东京，1941）第 1 卷。
- [4] G.F. Meijlan, *Japan: Voorgesteld in schetsen over de zeden en gebruiken van dat ryk, byzonder over den Ingezetenenen der stad Nagasaky*, p. 30.
- [5] 因此，有位作家这样描写 1866 年征讨长州的德川军队：“井伊大人的士兵行军时穿着他们祖父的盔甲，他们扛着长旗，吹着螺号，打着小鼓，就跟来往江户的大名带着家臣行走在东海道上一样。”引自 Yosaburo Takekoshi,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 (London, 1930), III, p. 371。
- [6] 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 Thomas C. Smith, “The Japanese Village in the 17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52) XII, 1, pp. 1-20。
- [7] 史密斯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的二手资料讨论这个问题，参见 Thomas C. Smith, “Landlords and Rural Capitalist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Journal of Economic*

- History*, XVI, 2 (June 1956), pp. 165-181.
- [8] Thomas C. Smith, "The Land Tax in the Tokugawa Perio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II, 1 (November 1958).
- [9] 见 Thomas C. Smith,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Palo Alto, Calif., 1959), 250 页。该部分出色地描绘了德川时代的乡村在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的变化。
- [10] 阿礼国对关东平原的完整描述是这样的：“这里从外表上看是少了骑士精神的封建主义再现……可是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太平、富裕和明显的满足，这个国家在精心培育和维持方面甚至比英国还要完美，到处可见精美的木雕。”可是，关于九州他却说：“土地极其肥沃，这和居住在上面的显而易见的穷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New York, 1863), I, 383, 75 respectively。米特福德的这番话是针对加贺藩说的。见 *Memories by Lord Redesdale* (New York, n.d.), II, p. 405。
- [11] Meijlan, p. 134.
- [12] 《隼杰坂本龙马传》（大阪，1926）第 362 页重印了中冈的《兵团》一文。
- [13] 关于幕府和商人之间关系的扼要评述，请参考 John W. Hall, "Bakufu and Chonin," *Occasional Papers* (Michigan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Ann Arbor, 1951), 1, pp. 26f.
- [14] 大盐的传记有几种。幸田成友所著《大盐平八郎》（东京，1910）对这次起义有详细的描述。
- [15] 1830 年代中期农民暴动的数量急剧增加，接着是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直到德川家族统治的最后几年。德川时代末期米价也急剧飙升。远山茂树的《明治维新》（东京，1951）一书中有详细的图表。
- [16] 有关这一分析，参见坂田吉雄，《明治维新和天保改革》，《人文学报》（东京，1952），2，第 1—27 页；关于水野的政策和失败，参见三上参次，《江户时代史》（东京，1944），第 2 卷，第 544—628 页。
- [17] W. G.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London, 1955), p. 3.
- [18] 石井孝，《佐藤信渊学说实践的目的》，《历史学研究》第 222 期（1958 年 8 月），第 1—10 页。
- [19] 新村出，《兰书译局的创设》，《史林》（东京，1916），第 1 卷，第 3 页。
- [20] Grant K. Goodman, "The Dutch Impact on Japan (1640-1853)" (Univ. of Michigan Ph.D. Dissertation. 1955), p. 270f.
- [21] 福泽可以进出新机构“蕃书调所”（研究外国书籍的机构），但发现不能将一本有价值的辞典借出过夜后，愤怒地弃之而去。见《福泽谕吉自传》（东京，1948），第 108 页。
- [22] 福泽在长崎学习西学时，曾经因为成绩超过了藩国大臣的儿子而被勒令回家。《福泽谕吉自传》，第 25 页。而在他的《旧藩情》一书中则写道，低级武士往往毫无

- 怨言地接受自己的职位。[英文由 Carmen Blacker 翻译, 见 *Monumenta Nipponica* (Tokyo, 1953), pp. 304-329.] 明治维新之后, 福泽虽然在作品中抨击德川幕府的封建专制, 但是却只出版与西方有关的纪实性文章, 而且在此之前, 他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沼田次郎,《幕末洋学史》(东京, 1950), 第 262 页。
- [23] 岩崎英重的《坂本龙马关系文书》(东京, 1926) 的第 2 页采纳了这一观点; 还可参考德富猪一郎,《土佐的勤王》(东京, 1929), 第 4 页, 书中还列举了其他的例子。
- [24] 引自尾佐竹猛,《明治维新》(东京, 1947), 第 3 卷, 第 773 页。
- [25] 关于江户城举行的仪式, 以及领主不得不轮流在江户居住的规定, 可以参考 John W. Hall, *Tanuma Okitsugu (1719-1788): Forerunner of Modern Japan* (Cambridge, Mass., 1955), pp. 24-25。
- [26] 石 (4.96 蒲式耳) 是大米的计量单位; 在土佐, 石常常和计算面积的单位 (反 = 0.25 英亩) 互换, 理论上一反地年产大米一石。关于土佐藩的“石高”问题, 请参考平尾道雄,《高知藩财政史》(高知, 1953), 第 1—2 页, 以及沼田赖辅,《土佐石高考》,《历史地理》(东京, 1924), 第 28 期, 1, 第 45—46 页。
- [27] 平尾道雄最近出版的几部著作记录了这些土佐的产业。在《土佐藩林业经济史》(高知, 1956) 一书中, 平尾用表格的方式描述了 1634—1838 年间土佐向幕府进贡以及进入商业市场的木材。土佐早在 1617 年就开始保护林地和重新造林, 到了 1691 年, 藩国被分为 25 个区, 实行轮番砍伐。此后每年砍伐和种植的数目都详细地记录下来。平尾的《土佐藩渔业经济史》(高知, 1955) 一书详细讲述了土佐的捕鱼业, 他的《土佐藩工业经济史》(高知, 1957) 则详细讲述了土佐的手工业。总的财政状况则见《高知藩财政史》(高知, 1953) 一书。
- [28] 这是根据德川时代土佐藩的权威性资料总结出来的:《高知县史略》(大阪, 1924), 第 201 页及其后; 最近出版的《高知市史》(高知市史编纂委员会, 高知 1958), 第 316 页及其后。
- [29] 德川时代末期吉田东洋编纂的行政法规汇编《海南政典》对此有详细的规定。封地一共分为 14 级, 从属于藩主的“藏入地”到为收入菲薄的官员或武士提供补助的“献上地”。参见松好贞夫,《土佐藩经济史研究》, 第 7 页。那些由整个村庄或者几个村庄组成的封地, 受赠者就是村庄的管理人。但是, 如果像通常那样, 封地只占村庄的一部分, 则除了税收以外, 整个村庄将由藩国指定的领导管理, 受赠者将与五人领导小组中选出一位领导协商处理收税的事宜。
- [30] 平尾道雄,《土佐藩林业经济史》, 第 165 页。
- [31] 根据平尾道雄,《高知的今昔》,《高知县建筑师会发行》(出版时间不明), 第 2—3 页。根据《高知市史》第 289 页及其后的内容, 每天征用的人数高达 1200 至 1300 人, 其中包括帮忙搬运泥土和石块的妇女甚至儿童。
- [32] 指中村城, 即现在的幡多郡。1689 年, 中村城城主拒绝就任德川幕府的若年寄, 希望避免这一荣耀所带来的仪式上的巨大花销。废藩意味着失去在江户的公馆、

居城被毁、丧失收入和 400 名家臣被遣散。这些家臣大部分沦为工匠和商人，做起了低级的营生。中村城“就像经历了一场大火一般”。在将中村城交还给山内家族之前，幕府占用了几年这个支藩的收入。见中村町役场，《中村町史》（高知，1950），第 32 页。

- [33] 野中兼山（1615—1663），学者和官员，通过实施一系列的学术、经济和政治措施，使土佐跻身于强藩之列。大规模的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扩大了耕地面积，与此同时，藩国的垄断者也从其他方面增加官方的收入。野中引进了新儒家学说，并鼓励像山崎闇斋、谷秦山这样的儒家学者进行研究。去世前不久，野中成为官僚斗争的牺牲品，被指控压迫人民，并遭到降职和驱逐的处分。坊间流传有许多他的传记。关于野中一生的事迹及其下台始末，可以参考小关丰吉，《关于宽文的改替》，《土佐史谈》，第 24 期（高知，1928），第 24—40 页。
- [34] 入交好脩的《德川幕藩制解体过程的研究》（东京，1957）对乡士制度有详细描述。其他人的描述见小关丰吉，《关于高知藩的乡士》，《土佐史谈》，第 48 期（高知，1934），第 117—154 页；松好贞夫，《新田的研究》（东京，1936），第 233—311 页。有关该阶层发展的基本资料，见近世村落研究会编，《近世村落自治史料集》第二卷《土佐国地方史料》（东京，1956），第 383—431 页。英文著作可参考诺曼的一篇论文后的简短附录，见 E.H. Norman, *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 The Origins of Conscription* (New York, 1943), pp. 58-65,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松好贞夫；R. B. Grinnan, "Feudal Land Tenure in Tosa," *TASJ*, xx, 2 (Tokyo, 1893), pp. 228-247,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土佐藩家老柴田 kamitiro 和乡士细川义昌的几次谈话。
- [35] 入交好脩，《德川幕藩制解体过程的研究》（东京，1957），第 296 页。
- [36] 同上，第 281 页；入交好脩，《关于土佐藩“町人乡士”形成的一个史料》，《社会科学讨论》，第 1 期（东京，1956），第 102 页。
- [37] 《高知市史》第 330—337 页给出了这些武士的姓名、收入和田产。1787 年的一份抗议书谴责了这些城市化的乡士对领主毫无用处，见第 139 页。
- [38] 平尾道雄的《长冈村史》（高知，1955）第 88—92 页上有详细的介绍。
- [39] 请参考平尾道雄所著的中冈传记，即《陆援队始末记》（东京，1942）第 9 页。
- [40] 如想大概了解有关日本其他地方庄屋势力的专题论文，可以参考几玉幸多的《近世农民生活史》（东京，1957）第 94—130 页。显然，庄屋在大部分地区都拥有很强的势力，但是极少像土佐的庄屋一样自称拥有辉煌过去。他们不仅在追忆长宗我部时代，而且从全国来看，这些人身处封建等级制度中，人员配备相对不足，因此管理上很可能比较松懈。
- [41] 《高知县野地改革史》（高知，1952）。
- [42] 详细的内容和资料，见平尾道雄，《土佐农民一揆史考》（高知，1953），第 31—61 页。
- [43] 松好贞夫，《土佐藩经济史研究》，第 182 页。
- [44] 《高知市史》，第 495—497 页。
- [45] 后面的章节将会详细讨论到勤王党，但只需说一件事就能让大家明白。有一名武

- 市瑞山的追随者对他说，如果大阪的商人不肯借款，可以使用恐吓的手段，让志士当场切腹，并预测没有一名商人能够忍受三次切腹。《维新土佐勤王史》（东京，1912），第294—296页。
- [46] 关顺也，《藩政改革和明治维新》（东京，1956），第56页。
- [47] 松泽卓郎，《万叶和鹿持雅澄的生涯》（东京，1943），第254页；尾形裕康，《鹿持雅澄》（东京，1944）。两书均转载了大量的鹿持作品，同时也描述了他的生平和影响。
- [48] 引自平尾道雄，《土佐农民一揆史考》，第126页。
- [49] 上书第128—140页有完整的资料。
- [50] 其中包括佐佐木高行，他的一生显示出保持忠君思想的同时又忠于自己的同僚是多么困难。请参考他的回忆录《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东京，1915）。
- [51] 三上参次，《江户时代史》（东京，1944），第2卷，第544—628页。水野激怒了谱代大名，因为他计划把江户和大阪附近的领地收归幕府，以加强管理和加强防务。
- [52] 如果要了解有关萨摩改革的概况和相关书目，可参考远山茂树，《明治维新》（东京，1951），第34—41。
- [53] 关于长州改革最近的概述，见关顺也的书（n. 48）。
- [54] Grant K. Goodman, "The Dutch Impact on Japan," n. 22.
- [55] 关于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兰学研究，请参考沼田，《幕末洋学史》，第163—172页。
- [56] 平尾道雄的《土佐农民一揆史考》第76—88页有详细的说明和资料。
- [57] 这个数字是池田敬正提供的，见《天保改革论再检讨——以土佐藩为中心》，《日本史研究》，第31期，第5页。
- [58] 见上文。同时也见《藩政改革和明治维新：高知藩》，《社会经济史学》，第22期（5—6号），第561—582页，以及《土佐藩中的藩政改革及其反对派》，《历史学研究》（东京，1957），第205期，第18—29页。
- [59] 关于心学请参考 Robert N. Bellah,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 of preindustrial Japan* (Glencoe, Ill. 1957), 第六章。
- [60] 《高知市史》，第395—399页；平尾道雄，《天保“棘螺组”始末》，《土佐史谈》，第36期（高知，1931），第23—39页。
- [61] 远山茂树在《明治维新》一书中，将天保时期一份最有影响的声明视为新的专制时代的开始。奈良本辰也在《近世封建社会史论》（东京，1948）一书中提供了一份由关顺也仔细修订的长州藩的早期声明。池田（注释60，61）认为土佐藩的动机也是一样。
- [62] 福岛成行，《吉田东洋》（1927，东京），第11页。魏源的这本著作出版于1844年，是鸦片战争期间在总督林则徐的嘱托下编撰而成，主要是概括地翻译西方的地理知识。如想阅读这本书的简介和一些片段，可以参考 John K. Fairbank and Ssu-yu Teng,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1954), pp. 29-35。

- [63]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东京,1915)。
[64] 大町桂月,《伯爵后藤象二郎》,(东京,1914),第20页。
[65] 平尾道雄,《吉村虎太郎》(东京,1941);《土佐农民一揆史考》,第149—150页。

第二章

- [1] 请特别参考贝斯里在序言中关于日本人的选择和立场的权威性讨论,见 W. G.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London, 1955) pp. 3-93。
[2] 《维新史》,第2卷,第69页。
[3] 见 W. C. Beasley, *Great Britain and the Opening of Japan* (London, 1951), pp. 106-110。该部分对各大名的回复进行了有益的分析。还可参考 E. Honjo, "The Views of Various Hans on the Opening of the Country,"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Kyoto, 1936), XI, 2, pp. 16-31。关于一些大名的回复,也可以参见 W. C.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London, 1955), pp. 101-119。
[4] 贝斯里在书中引用了负责官员的报告:“但是我们拒绝这么做,理由是我们在日本没有什么贸易经验,不能轻易就答应进行贸易。佩里目前的主要要求是友好地对待他国家的公民……”见 W. C.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p. 126。
[5] 见 Marius B. Jansen, "New Materials for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19th Century Jap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Cambridge, 1957), p. 580。该文认为“蕃书调所”是“研究夷人书籍的机构”。
[6] W. C.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p. 26。
[7] 同上,第168—169页可以看到1857年12月30日齐昭提出的建议原文。
[8] 同上, pp. 180—181。
[9] 西博尔德于1823—1829年以及1859—1861年两次来到日本。第二次来日期间,他将自己对政局的印象写进了一本有趣的小册子,见 *Open Brieven uit Japan* (Deshima, 1861), p. 64。此外,也可参考吴秀三写的卓越传记,《西博尔德先生——其生涯和功绩》(东京,1926),第492、923页。
[10] J. A. van der Chijs, *Neerlands Streven tot Openstelling van Japan voor den Wereldhandel* (Amsterdam, 1867), p. 115。
[11] 上书附录II描写了这支海军小分队的历史,见第414页及其后。“观光丸”的离去使得教学有一段时间难以继续,见第467页。
[12] 有关负责医学课程的教师的回忆录,请参考 J. L. C. Pompe van Meerdervoort, *Vijf Jaren in Japan (1857-1863)* (Leiden, 1868)。本书共两卷,其中第二卷有教师的亲身经历。
[13] 佩尔斯·里杰肯(Pels-Rijken)和他的继任者卡滕戴克(Kattendyke)的报告摘

要，可参考凡·德·奇杰斯（van der Chijs）的著作附录（第457—495页）。卡滕戴克的结论如下：“他们是一群轻松活泼的人。法国人在这点上与他们最为相似。他们大多数都彬彬有礼、经常面带微笑，而且风趣幽默。他们缺乏坚定不移的意志，而这是完成一项艰难任务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事实上，培养一名海軍军官并非易事。没错，他们确实非常聪明，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一门学科的知识，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他们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了其他事情上。”

- [14] Marius B. Jansen, “New Materials for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19th Century Jap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Cambridge, 1957), p. 580.
- [15] 福泽这么总结自己的反应：“我不喜欢幕府的官僚作风，不喜欢它那压迫、保守和排外的政策，因此我不能站在它那一方。然而保皇派的追随者更排外，行动也更加暴力，因此我更加不支持他们……一个有野心的人也许会与这些党派的其中一方祸福与共，以便为自己赢得安身立命之地……然而这些对我都没有吸引力。”见清冈夙一，《福泽谕吉》（东京，1948），第198页。这种态度或许正是福泽成为日本现代学者第一人的原因。
- [16] 阿倍道山所著的传记《小栗上野介正传》（东京，1941）。小栗主张幕府在法国的帮助下抵抗到底，后来被新政府处死。
- [17] 这封信其实出自吉田东洋之手，见福岛成行，《吉田东洋》（东京，1927），第60—61页。
- [18] 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大日本古文书：幕末外国关系文书》，第18卷（东京，1925），第380页。
- [19] 原文见岩崎英重（编），《三条实万手录》，日本史籍协会（东京，1925），第1卷，第201页，部分翻译见 Noburu Hiraga, “Tosa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1955)。
- [20] 《大日本维新史料》，第3编，第4卷，第809—810页；亦见平贺（Hiraga）的论文第103页。
- [21] 《大日本维新史料》，第3编，第7卷，第341—342页；亦见平贺的论文第107页。
- [22] 瑞山会（编），《维新土佐勤王史》（东京，1911），第53—54页。原文可以参见平尾道雄，《容堂公记》（东京，1941），第65—70页。
- [23] 坂崎斌，《鲸海醉侯》（东京，1902），第104页及其后。“鲸海醉侯”是容堂的号。
- [24] 至少这是勤王派的说法，见《维新土佐勤王史》第32页。池田认为“这肯定是比喻的说法”，见《土佐藩的安政改革及其反对派》，《历史学研究》（东京，1957），第205期，第19页。
- [25] 福岛成行，《吉田东洋》，第11页。
- [26] 关于中滨，最新的传记见 Emily V. Warriner, *Voyager to Destiny: 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Manjiro, The Man Who Changed Worlds Twice* (Indianapolis, 1956)。本书部分内容以中滨东一郎的《中滨万次郎传》（东京，1936）这一中滨的标准

传记为基础。

- [27] 江头恒治,《高知藩的幕末新政策》,《幕末经济史研究》(东京,1925),第125页及其后;平尾道雄,《高知藩的民兵制度》,《土佐史谈》(高知,1931),第35期,第79—84页。
- [28] 福岛成行,《吉田东洋》,第80页及其后。
- [29] 江头恒治,《高知藩的幕末新政策》,《幕末经济史研究》(东京,1925)。幕府时期,人们广泛认为新的技术能带来财富。因此容堂给宇和岛藩的邻居伊达写信时,建议他也开发几个铜矿,见前述论文第119页。还可参考池田敬正,《天保改革论再检讨——以土佐藩为中心》,《日本史研究》,第19页,该文将这些政策与之前和之后的几次改革做了比较。
- [30] 关于吉田这一想法的著名文章,参见大塚武松(编),《吉田东洋遗稿》(东京,1929),第270页。
- [31] 特别是佐佐木高行,他因不满吉田实施的国内政策,而在书中连续使用了“棘螺组”这个词,见《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90页。
- [32] 千头清臣认为坂本的祖先是明智光秀的一个亲戚,据说是1582年家族陷落后逃到土佐的,见千头清臣,《坂本龙马》(东京,1914),第25—30页。我依据的是竹崎五郎的观点,见《坂本龙马先生系谱:出自大滨家》,《土佐史谈》,第76期(高知,1941),第35—37页。
- [33] 参见岩崎英重(编),《坂本龙马关系文书》(东京,1926),第1卷,第31页。
- [34] 千头清臣认为坂本家族的收入有197石,但我参照的是《高知市史》第331页以及《土佐藩乡士调查书》(《土佐资料丛书》,高知,1958)第30页上提供的最新的权威资料。关于住在高知城内的乡士的名字和收入,可以参考《高知市史》第330—337页。
- [35] 岩崎英重(编),《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60页。这封信写于1862年。
- [36]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2卷第44页及其后有一些零星的荷兰语笔记,记录了一些军事口令、数字和字母表,还有一些显然是私人用的英语笔记,包括年轻人、新娘、春药等等。
- [37] 这封信是写给1863年脱离藩籍的同伴池内藏太的父母的,信没有公开发表过,先藏于青山文库,即高知县佐川町田中光显伯爵的私人藏书。
- [38] 千头清臣,《坂本龙马》,第31页。平尾道雄在《海援队始末记》第12页对其进行了纠正。
- [39]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37页。
- [40] 品川的房子并非土佐在江户的主要公馆,土佐的主要公馆位于锻冶桥、筑地和三田。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67页、119页。
- [41] 平尾道雄,《维新勤王遗文选书: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东京,1943),第4页,《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0页。
- [42] 平尾道雄在《海援队始末记》第20页纠正了一般认为坂本回家是由于担心父母

在大地震中受伤这一说法。

- [43] 千头清臣,《坂本龙马》,第34—35页。
- [44]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38—49页。
- [45] 长冈乡士的家庭收入见《土佐藩乡士调查书》第15—25页。
- [46] 武市的一生和性格见1911年(武市)瑞山会编纂的《维新土佐勤王史》以及平尾道雄的《武市瑞山和土佐勤王党》(东京,1943)。还可参见 Marius B. Jansen, "Takechi Zuizan and the Tosa Loyalist Par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II, 2, (February 1959), pp. 199-212。
- [47] 千头清臣,《坂本龙马》,第37页。据说坂本参观了楠木正成的墓地。那里是大多数勤王志士都会去参拜的圣地。
- [48] 平尾道雄,《土佐藩渔业经济史》(高知,1955),第208页。
- [49] 千头清臣,《坂本龙马》,第38页。
- [50] 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5页。
- [51] 平尾道雄,《武市瑞山和土佐勤王党》,第19页。
- [52]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56页。
- [53] 信的内容见《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52—54页。
- [54] 平尾道雄,《武市瑞山和土佐勤王党》,第22—27页。

第三章

- [1] 关于勤王思想的简要讨论,可参考 Herschel F. Webb, "The Mito Theory of the State," in *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n Institute Studies No. 4,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on Japan*, ed. John E. Lane, 1957, pp. 33-52, 以及 W. Theodore deBary, ed.,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New York, 1958), pp. 371ff。
- [2]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243—248页。
- [3] Betram D. Wolfe, *Three Who Made a Revolution* (Boston, 1955), p. 374。
- [4] 有关这名可怕的剑客和刺客的简要描述,参见寺石正路,《土佐伟人传》(高知,1914),第328—331页。
- [5] 熊泽一卫,《青山余影:田中光显伯小传》,第110—113页。但是不要忘了,田中是在吉田东洋遇刺后逃离土佐的,而当时的监管措施可能特别严格。
- [6] 引自第一章47页注释中所说的那封未公开的信件,现存于佐川町青山文库的田中光显藏书室。
- [7] 这些密谋见《维新史》,第2卷,第663—730页。
- [8] 文件原文见上书第731—738页。
- [9]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61页。
- [10] 特别参见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120—121页。
- [11]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62页。

- [12]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 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120—127页。
- [13] 土方的传记作者引用了一个庶民的回忆表明,土佐的年轻人听到幽禁容堂的消息后很愤怒,并认为迫使像容堂这样身体健康的年轻人以生病为由隐退简直是无稽之谈。容堂尽管犯了一些错误,但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好。参见庵原御次郎,《土方伯》(东京,1914),第20—21页。
- [14] 平尾道雄,《武市瑞山》,第29—30页。
- [15] 关于长州藩的政治,请参考 Albert Craig, “The Restoration Movement in Choshu,”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II, 2(February 1959), pp. 187-197, 以及 Sidney Devere Brown, Kido Takayoshi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35-1877 (Univ. of Wisconsin doctoral dissertation, 1952)。
- [16] 《武市瑞山关系文书》(东京,1916),第1卷,第53页。
- [17] 平尾道雄,《武市瑞山和土佐勤王党》,第34页。
- [18] 《武市瑞山关系文书》,第1卷,第36—53页。
- [19] 因此,当1863年武市将签名的盟约呈给容堂时,容堂以自己特有的风格开起了玩笑。“半平太,”他首先说,“你喜欢清酒吗?我给你倒点吧。”接着,喝了一点酒之后,他说:“你的用意是好的,然而组建政党却是错的。把盟约烧了吧。”平尾道雄,《容堂公记传》,第126—127页。
- [20]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 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145页。
- [21] 同上,第352、393页。
- [22] 池田敬正,《土佐藩的安政改革及其反对派》,《历史学研究》(东京,1957),第205期,第27页。
- [23] 池田敬正总结了这些问题的证据。
- [24]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68—74页。
- [25] 同上,第76—77页;平尾道雄,《武市瑞山和土佐勤王党》,第42页。
- [26] 武市和吉田的谈话,见平尾道雄的《武市瑞山和土佐勤王党》第56—57页,以及《维新土佐勤王史》第86—87页。吉田在嘲笑京都贵族政治上的可能性时,肯定像极了山内容堂本人。第一次由吉田提拔而当官的板垣退助后来写道,“当时我不认识这些公家,盲目地相信他们。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发现他们中许多都头脑简单且非常愚蠢。智慧卓越的容堂肯定把他们都看成小孩子。”平尾引自《板垣退助君传》,第147页。
- [27] 关于长州藩此阶段的政策,请参考《维新史》,第3卷,第7页及其后。
- [28] 《武市瑞山关系文书》,第1卷,第60页。
- [29]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101页及其后。
- [30] 从上级武士(例如佐佐木)的回忆录和下级武士(例如田中光显)的描述中,我们显然可以看出,1850年代末和1860年代,政治上的变化加深了社会的紧张关系,导致局势更加紧张。有关坂本龙马参加的一次这类事件,可以参考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 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131—138页。

- [31] 《坂本龙马关系丛书》，第 59—60 页。
- [32] 见前文注 [6]。
- [33] 这位商人叫白石正一郎，后来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日记见《维新日乘纂辑》（东京，1925），第 1 卷，第 1—146 页。
- [34] 原文见佐川町的青山文库，《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116 页引用了部分。杀手们接着经由大阪逃往京都。他们在大阪时和一些同情土佐的人取得了联系，到了京都后先是在久坂及其长州同伴处获得庇护，等到岛津久光认为已经镇压藩内激进主义者，而前往江户去后，他们才住进了萨摩公馆。关于他们的事迹，请参考《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136—141 页。
- [35] 原文见《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118 页，概述见平尾道雄的《武市瑞山和土佐勤王党》，第 78 页。
- [36] 关于吉田死后那些嘲笑的言论，请参考平尾道雄，《武市瑞山和土佐勤王党》，第 80—82 页。山内丰誉（民部）是容堂的弟弟，山内丰著的第七子。
- [37]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 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 182—183 页。
- [38] 平尾道雄，《武市瑞山和土佐勤王党》，第 100—103 页。
- [39] 同上，第 105 页；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 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 184 页；《维新史》，第 3 卷，第 233—234 页。尾佐竹猛的《明治维新》第 1 卷第 288 页上说，后来一次去江户的队伍有 500 人。
- [40] 在等待消息期间，勤王派刺客杀害了一个名叫井上佐市郎的前横目（负责治安的官员）。井上曾在吉田东洋手下工作，在吉田死后町奉行所调查期间，井上曾经令他们闻风丧胆。平尾道雄，《武市瑞山和土佐勤王党》，第 110 页。
- [41] “松平土佐守，自关东兼大阪御警卫，幸此度通行之由，奉旨闻召间，以非常临时特别之仪，暂滞京都，掌管警备。”《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156—157 页。
- [42] 原文的翻译见 W. C.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pp. 198-206.
- [43] 《维新史》，第 3 卷，第 7—40 页。
- [44] 庞贝·凡·米德沃特 (Pompe van Meerdervoort) 曾在长崎早期设立的医学校当老师，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加了一条有关理查德森的注释。“1862 年 12 月 31 日，我在海牙坐上回家的火车，车上偶然遇到了理查德森的叔叔，据我回忆，他是劳埃德公司的专家，正准备到特塞尔去，为一艘在那儿搁浅的船只做检测。我们谈了起来，他问了我一些有关他侄子的事。我把上面写的全都告诉了他，这名头发灰白的谦逊老人听后对我说：‘查尔斯的性格就是这样，极为鲁莽固执；我总是说他迟早要出事。他不得不开离英国的原因，也是因为太过荒唐。’”见 Pompe van Meerdervoort, *Vijf Jaren in Japan* (Leiden, 1868), II, p. 143.
- [45] 岩仓一直处在勤王极端分子的极大压力之下，而且时时受到“惩罚”的危险。关于他逃跑的细节，可以参考德富猪一郎（苏峰），《岩仓具视公》（东京，1932），第 98—104 页。

- [46] 《武市瑞山关系文书》，第1卷，第109—110页。
- [47]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189—190页；《武市瑞山关系文书》，第1卷，第138页。
- [48] 长州武士对容堂的评价不高，说他过于谨慎，并将这归咎于其性格懦弱，这激起了土佐同僚的愤怒。土佐人曾计划杀害长州人的领导周布政之助，但是失败了。《维新土佐勤王史》，第220—225页。
- [49] 尾崎卓尔，《中冈慎太郎》，第19—20页；关于中冈思想的发展和加入勤王党的详细经过，更可靠的资料见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6—9页；关于这50名乡士和庄屋以及中冈加入他们的经过，见上书第19—25页。
- [50] 这份誓约见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19—20页。它着重强调了忠诚、无畏和服从领导命令。藩政府不可能谴责这种宣言，况且他们还是自费，所以不得不让这50人前往江户。实际上，这次江户之行是这些急于参加国内政治活动的勤王党人的任性行为。看到他们出走的结果之后，藩政府采取了新的措施，防止类似的叛逃计划再次发生。
- [51]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294—296页。
- [52] 同上，第166—167页、241页、259—262页。
- [53] 有关这次访问的经过及其含义的详细讨论，见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1卷，第314—344页。
- [54] 见平尾道雄，《幕末浪人及其保护和管理》，《明治维新史研究》（东京，1930），第552—553页。本文是关于此问题少有的几篇论文之一。
- [55] 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2卷，第367—368页；《维新史》，第3卷，第428—432页。
- [56] 原平三的《天诛组举兵始末考》有详细的描述，见《土佐史谈》（1938年3月），第62期，第1—31页，以及第63期（1938年6月），第14—36页。简要的描述则可参考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2卷，第485—501页。
- [57] 有关生野之变的简要描述，见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2卷，第502—519页。远山茂树、原平三的《江户时代末期农民起义备忘录》第27—29页也有简要的分析，见《历史学研究》（1947）第127页。文中分析了起义的领导者庄屋和富农的动机。作者说，生野地区是幕府直接控制下的一个区域，历史上长期发生叛乱，庄屋和富农每每成为这些针对放款人、酒商的暴动的牺牲品。他们还追溯渊源，认为明治时代这两种乡村领导者的合作源于他们都是新兴的小资产阶级，有能力唤醒民怨，但却无法有效地引导。另一方面，生野之变的领导人之一的传记《平野国臣传》第152页则认为，起义军这么快就丧失民心是因为部分领导人酗酒和行为不检点。
- [58] 大约800名叛变的水户藩士兵浩浩荡荡地前往京都，向庆喜请愿，这件事充分体现了水户藩纪律的全面松懈，我们还记得，庆喜是水户藩前藩主德川齐昭的儿子。叛兵虽然一开始不得不奋力杀出幕府士兵的重重包围，但是随后却一路没有遇到什么阻挠。叛军沿途经过的藩国向幕府报告说，他们曾力图“阻止叛军”，

但是结果都被他们“跑了”。对叛军的“追赶”经常发生在他们已经越过边界之后。叛军最后向佐贺藩的军队投降，佐贺藩把他们交给了德川幕府“审判”，而主持审判的正是他们水户藩的敌人。结果有 353 人被处决，137 人被放逐。尾佐，第 1 卷，第 555—580 页。E. W. Clement,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XIX, 1891 中的“The Civil War”一章对此有简要的描述。

- [59] *Memories by Lord Redesdale* (New York, n.d.), 2, pp. 483-489.
- [60] 关于中冈和容堂的一次见面，请参考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 38—39 页。
- [61] 1863 年年初，参勤交代制度中的人质条款被撤销，山内家族的三代夫人一起离开了江户，她们分别是出生于萨摩藩岛津家族的丰资的妻子、容堂的妻子以及出生于长州藩的丰范的妻子。见《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239 页。
- [62] 坂崎斌，《鲸海醉侯》，第 185 页。
- [63] 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 31—33 页。
- [64] 一封写给朋友的信证实了人们对佐久间是否有巨大影响力的怀疑。中冈在信中大量谈到在水户藩的经历，并对勤王主义思想已经在平民中广为传播感到惊异，但是只字未提佐久间象山。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 34—35 页。
- [65]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269 页。
- [66] 在离开江户之前，容堂已经派板垣与久光年轻而能干的家臣大久保利通取得联系。坂崎斌，《鲸海醉侯》，第 189 页。
- [67] 原文见《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370—378 页。
- [68]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323—324 页。武市被职务羁绊的时候，正好是家茂将军第一次访问京都期间。
- [69]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298 页。
- [70] 当长州特使到土佐来寻求支援时，容堂不让他们和武市及其党羽见面。他在给伊达宗城的一封信中强烈谴责了他们藩的鲁莽行为。容堂认为长州应该联合而非疏远萨摩。平尾道雄，《容堂公记传》，第 134—138 页。
- [71]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382—383 页。
- [72] 关于切腹的描写，见《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365—366 页。自杀的仪式安排应该归功于广濑健太。他和长州志士有紧密联系，并从那里学到了切腹的方式。广濑使同伴们深刻明白无愧于自己的声望和武士道精神是多么重要。
- [73] 关于审讯和最终的判决的详细描述，见《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514—814 页，以及《武市瑞山关系文书》，第 2 卷，第 258—259 页。他的全部罪名是：乘天下之形势，密结与党，煽动人心，乃及京师高贵。上奏文书屡屡不恭。总之，失臣下身份，轻蔑上威，紊乱国宪，言语不敬。多年后，容堂将武市的罪行概括为一句话，即杀害他的大臣吉田东洋。如果让他继续活在世上，藩国最终将分崩离析。大町桂月，《伯爵后藤象二郎》（东京，1914），第 141—142 页。佐佐木也认为只有除掉武市才能恢复土佐藩的秩序，见《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 308 页。
- [74] 野根山事件记录于《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649—660 页。示威者的名单见第 111 页。

- [75] 平尾道雄,《维新勤王遗文选书: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第198页。中冈早期那些富有煽动性的信件见第183—184页。

第四章

- [1] 胜全家的收入只有41石,见W. G. Beasley, "Councillors of Samurai origin in the Meiji Government 1868-9,"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XXX, 1957, p. 102。
- [2] 胜海舟,《处世修养谈》,《海舟全集》,第十卷(东京,1929),第297页。
- [3] 高野的简介,见G. B. Sans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New York, 1950, pp. 260-263。
- [4] 胜海舟,《经历世变谈》,《海舟全集》,第10卷,第332页。在《海军历史》一书中,胜对培训的经过和参加的人员有更详细的描写,见《海舟全集》,第8卷,第36—37页。
- [5] Van der Chijs, *Neerlands Streven tot Openstelling van Japan voor den Wereldhandel* (Amsterdam, 1867), p. 467, 以及《海舟全集》,第10卷,第329—330页。
- [6] 胜海舟,《墙棘之记》,《海舟全集》,第9卷,第190页。
- [7] 一些来自肥前、长州和福岡的学生继续在出岛学习了一段时间。荷兰的指挥官推测,政策的变化源于极端保守的江户政权。他们以经济的名义实施反动的政策,见Van der Chijs, *Neerlands Streven tot Openstelling van Japan voor den Wereldhandel* (Amsterdam, 1867), p. 490。
- [8] 《福泽谕吉自传》,第119页。
- [9] 他的记录中有一些与学问不太相关,但是却非常有趣的描写。其中提到,有一天晚上他去看戏,他看得显然是说唱秀(“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低俗的戏剧”)以及有一次参加社交晚会时,他惊讶地看到“一个男人拿起琵琶就弹起来。听到音乐,客人们便抓住女人的手跳起舞来。有的人跳舞时依次换了好几个女人,有的人跳舞时则紧紧地搂着女人的腰肢和肩膀”。胜的印象记录于《海军历史》,见《海舟全书》,第8卷,第120—176页。
- [10] 《海舟全集》第9卷第173—253页收录了《墙棘之记》一书的全文。
- [11] 例如,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东京,1935),第1卷,第10—11页,以及同书,第3卷,第230—232页。这本书是黑龙会的官方历史记录。
- [12] 坂本的逃亡和活动年表可见千头清臣,《坂本龙马》,第51—52页;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37—38页。
- [13]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59—60页。
- [14] 春岳的描述见《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60—61页。他的助手中根雪江(1807—1877)是一名积极的勤王主义者,笃信平田(笃胤)派神道教,因此非常适宜消除志士对其藩主勤王立场的疑虑。

- [15] 但是胜认为另一个人是剑客千叶周太郎，见《海舟全集》，第10卷，第261页。平尾也注意到了这种不一致，见《海援队始末记》，第51页。
- [16] 熊本藩士横井小楠是春岳的政治顾问。他成了坂本的朋友，而他的儿子则成为胜的追随者。关于小楠的介绍，请参考 G. B. Sansom,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New York, 1950, pp. 266—269。
- [17] 我们想起了1932年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遇刺事件。要不是有个人突然闯进来大喊一声“开枪！”，他可能会说服第一组军官停止行动。见 Hugh Byas, *Government by Assassination* (New York, 1942), p. 25。
- [18] 《海舟全集》，第10卷，第261页。
- [19] 《海舟文集》，第9卷，第17页。
- [20] 原文见《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66—70页。
- [21]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71—72页。信写于1863年5月7日。坂本能够和兄长权平通信，是因为这位名士此时正在大阪的土佐商会工作。
- [22] 《海舟全集》，第8卷，第342页。
- [23] 《海舟全集》，第9卷，第9页。胜接着建议降低将军出行的花销，但遭到保守派驳回而无果。
- [24] 《海军历史》，《海舟全集》，第340—341页。
- [25] 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1卷，第318页。大久保并非第一个提出此建议的人，1858年被井伊直弼下令处死的春岳的顾问桥本左内也曾对此做过探索。
- [26]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2卷，第76页。
- [27] 《海舟日记》，《海舟全集》，第9卷，第9页。
- [28] 《海舟全集》，第9卷，第12页。
- [29] 《海舟全集》，第10卷，第334页。这件事发生在1863年的6月至7月，这个土佐人名叫冈田以藏，是一名浪人。我们前文已经提到，他的下场不太好。
- [30]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70—71页；由利的回忆，见《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62—66页；关于横井和坂本的关系，见山崎正弘，《横井小楠传》（东京，1942），第2卷，第274—283页；关于胜对交给坂本的这些任务的记录，见《海舟日记》，《海舟全集》，第9卷，第21页。
- [31] 平尾道雄友好地提供给我一份这封时间是1863年2月14日的信的复印件。1958年它在高知被发现，之后登载在《土佐史谈》第93期（1958年4月）第11—12页。
- [32]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74页。
- [33]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83—87页。
- [34]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136页。
- [35]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63—68页。胜主要是帮忙写了一封信，使原告在寻找杀父仇人期间可以获得自由通行权。
- [36] 这封信写于1863年7月，现收藏于高知县的佐川文库。
- [37] 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2卷，第448—450页。

- [38] 涩泽荣一,《德川庆喜公传》,第3卷,第40页。
- [39] E.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97-98.
- [40]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98—99页。
- [41]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98页。
- [42] 千头清臣,《坂本龙马》,第74页。
- [43]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94页。
- [44] 同上,第88—92页。
- [45] 盐见薰,《坂本龙马的元治元年》,《日本历史》,第109期(1957年6月),第84页。
- [46] 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2卷,第410页。
- [47] 尾佐引用了庆喜的一些话,大意是幕府不能走回头路,仅仅因为萨摩现在代替了长州,正向朝廷灌输他们的思想。当代对庆喜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的描绘,见 W. C.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pp. 268—273.
- [48] Tsukahira, "The Sankin-Kōtai System of Tokugawa Japan," p.186.
- [49] 关于胜对遭解雇一事的描述,见《海舟全集》,第10卷,第336—337页。关于小栗升迁的简要描述,可参考《大日本人名辞典》,第1卷,第653页。详细而客观的描述则见阿部道山,《海军的先驱者:小栗上野介正传》(东京,1941),第420页。
- [50] 《海舟全集》,第9卷;盐见,《坂本龙马的元治元年》,第81页。胜另外描述坂本对西乡的介绍。“曾会西乡隆盛,后语余曰:初会西乡,其人物茫漠不可捉摸。以强攻之则回以强,以柔待之则回以柔。余深感此言实为智言。”《海舟全集》,第10卷,第261页。
- [51]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99—100页,《维新士佐勤王史》,第676—677页。

第五章

- [1] 关于萨摩藩的资料汇编(含注释),见 K. Asakawa, *The documents of Iriki* (second edition, Tokyo, 1955), pp. 442,323。关于萨摩藩的制度结构的简介,见 Robert K. Sakai, "Feudal Society and Modern Leadership in Satsuma-h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 3(May, 1957) pp. 365-376。更详细的论述见 William E. Naff, "The Origins of the Satsuma Rebellion"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9)。与 Robert K. Sakai 教授进行的多次有关西乡的讨论也使我获益良多。他正在做一个完整的研究,并从中摘取了一些资料写成一篇报告,于1858年8月27日提交给了华盛顿大学的日本研讨会。在日本,有关萨摩和西乡的文学作品浩如烟海,我参考最多的是权威的五卷本的《鹿儿岛县史》(东京,1939—43),以及大川信义编辑的三卷本《大西乡全集》(东京,1926)中的书信和传记。
- [2] H. Doeff, *Herinnerngen uit Japan*(1833), p. 20.
- [3] 有一本西方人写的大久保传记虽然很有用但很少被提及,即 Maurice Courant,

- Okubo* (Paris, 1904)。权威的大久保传记见胜田孙弥的三卷本《大久保利通传》(东京, 1911)。
- [4] 这些信件中最重要的部分已经被大川信义收集在三卷本《大西乡全集》(东京, 1926)中, 大川还对信件做了注释。
- [5] 《西乡全集》, 第1卷, 第330、345页。
- [6] 同上, 第483、498页。
- [7] 萨道义和西乡的一次谈话, 见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183-184。
- [8] 《西乡全集》, 第1卷, 第490—504页。
- [9] 同上, 第512页。
- [10] 同上, 第570—613页。这个折中方案也是福冈藩的家老加藤司书努力的结果, 见他的传记编辑者司书会所编的《加藤司书传》(福冈, 1933), 第52—53页。
- [11] 《西乡全集》, 第1卷, 第618—619页。
- [12] 同上, 第687页。
- [13] 长州的故事以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为依据, 即 Albert Craig, *Choshu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其中一部分的介绍, 见 “The Restoration Movement in Choshu,”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II, 2, (February, 1959), pp. 187-197。有关长州领导的专题论文还包括即将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Roger F. Hackett, *Yamagata Aritomo: Soldier-Statesman of Modern Japan*。本书由 “Yamagata Aritomo: A Political Biography” 这篇论文改写而来; Sydney D. Brown, “Kido Takayoshi, Japan’s Cautious Revolutiona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XXV, 2(May, 1956)。本文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 见 “Kido Takayoshi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52)。
- [14] 中冈的主要资料来源于平尾道雄, 《陆援队始末记》(东京, 1942), 第1—324页, 以及尾崎卓尔, 《中冈慎太郎》(东京, 1926)。后者的可靠程度不及前者, 但是却包含了中冈的日记, 见第329—372页。中冈的部分日记、大部分信件以及其他的文章, 见平尾道雄编撰的《维新勤王遗文选书: 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东京, 1942), 第174—358页。
- [15] 有关板垣的研究, 见 Cecil E. Cody, “A Study of the Career of Itagaki Taisuke(1837-1919), A Leader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the Meiji Japan”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5)。
- [16] 《陆援队始末记》, 第56—57页。
- [17] 同上, 第70页。
- [18] 《维新勤王遗文选书: 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 第185—188页。
- [19] 野根山事件最完整的描述, 见《维新土佐勤王史》, 第560—572、644—650页。
- [20] 《维新勤王遗文选书: 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 第191—192页。
- [21]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118; 尾佐竹猛, 《明治维新》, 第2卷, 第456页。
- [22] 《维新勤王遗文选书: 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 第199—200页。

- [23]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625 页。
- [24] 事件的描述见 K. tsudzuki, *An Episode from the Life of Count Inouye* (Tokyo, 1912), p. 189。
- [25] 《陆援队始末记》，第 108—109 页。
- [26] 《维新史》，第 4 卷，第 428—429 页。
- [27] 关于加藤之死，见《加藤司书传》，第 157—158 页。
- [28] 平尾道雄，《维新勤王遗文选书：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第 34—35 页。
- [29]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131—134 页。信的末尾附加了一段话，强调了战斗的危险性：“庄屋岛与的二男并马于战场取人首级，实有高名。故前日为贼所围（其数二百余），切腹而死。”
- [30] 《陆援队始末记》，第 137 页。
- [31] 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 148—149 页。许多前线的志士都曾认真地考虑过出国，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高杉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曾经打算到欧洲去（部分原因是他担心在国内会遭到暗杀），但是被长崎的商人格洛弗（Glover）阻止了。《维新史》，第 4 卷，第 440 页。
- [32] 《维新勤王遗文选书：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第 229—231 页。
- [33] 日记的转载见尾崎卓尔，《中冈慎太郎》，第 348、349、351、352、354、362 页。
- [34] 原文见《维新勤王遗文选书：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第 314—320 页。
- [35] 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 2 卷，第 598 页。
- [36] 同上，第 608、640 页。
- [37] 同上，第 627 页。
- [38] 关于各藩的反应，见《维新史》，第 4 卷，第 414—425 页；关于土佐藩的反应，见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 327—333 页。
- [39] 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 2 卷，第 625、697—698 页。与法国谈判的基本资料，见大塚武松，《关于法国公使罗修斯的政策行动》，《史学杂志》，第 46 期（1935），第 809—850、982—1001 页，以及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东京，1957）。
- [40] 《西乡全集》，第 1 卷，第 618 页。
- [41] 关于此次谈判和遇到的难题，贝斯里做了很好的总结，见 W. G.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London, 1955), pp. 80-83。
- [42]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136—138 页。
- [43] 对格洛弗这个重要角色的描述见本书第六章的第四节。
- [44] 伊藤和井上在长崎向长州的领导写的报告，以及山口市给他们下的指示，见《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尤其是第 121—129 页。在这份 1865 年 9 月 15 日的报告中，伊藤和井上汇报了他们的进展和花销。
- [45] 关于各方签订的合同，包括船东从萨摩藩（“樱岛丸”）改为长州藩（“乙丑丸”）时重新拟定的合同，见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 113—119 页，以及《坂

- 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173—177页。
- [46] 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132页。中冈至少为白石带过一次钱（第139页）。白石的日记收录于史籍协会所编的维新文献中，见《维新日乘纂辑》（东京，1925），第3—146页。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日记非常隐晦，并不能提供多少信息。
- [47] 必须承认，当时有很多流言。直到1865年11月，会津藩的官员还与大久保利通联系，提议会津藩与萨摩藩结盟，使两藩1863年的合作再次焕发生机。大久保担心这会损害与长州藩之间的关系，因此拒绝了这一提议。见《鹿儿岛县史》，第3卷，第420页。他们与福岡藩之间更有可能达成协议，但是随着福岡藩“正义党”领导人被免职和处死后，此事最终无疾而终。
- [48] 关于坂本的活动年表，请参考平尾道雄，《维新勤王遗文选书：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第168页。
- [49] 西乡向坂本解释说，他只是在考验木户的诚意。千头清臣，《坂本龙马》，第92页。
- [50] 对此次谈判和协议的完美描述，见《鹿儿岛县史》，第3卷，第410—417页，以及《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2卷，第299—344页。后者有一部分是土方的记述，见第299—312页。亦可参考土方对自己维新经历的主要记录《回天实记》（1900），第2卷，第236、264页。
- [51]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186—191页收录了这封信，木户在信中列出了协议的提纲。

第六章

- [1]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453页。
- [2]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136—143页。
- [3] 坂本离开土佐时，本来打算参加这次起义。《维新史》第2卷第86—94页上有详细的描述。
- [4]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27页。
- [5]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26—232页。
- [6] 千头清臣，《坂本龙马》，第105—106页。
- [7]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42—243页。之前坂本写给告诉木户，自己的命是那把手枪救的，而它是高杉晋作送的礼物，同书第241页。
- [8]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139页。
- [9]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33—239页。
- [10] 接下来有关征讨长州的描述，大部分以《维新史》第4卷第474—522页，以及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2卷第692—693页为基础。
- [11]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15页。
- [12] 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173页。

- [13] 大名家族之间的领养制度造成了无数的横向联系。在这一战区，因幡的大名（池田庆德）和冈山藩的大名（池田茂政）是滨田藩的大名松平武聪的兄弟，见《维新史》，第4卷，第512页。他们又都是水户藩前藩主德川齐昭的儿子，因此，一桥庆喜和水户藩现任藩主德川庆笃也是他们的兄弟。
- [14] 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172页。
- [15] 萨摩藩过于礼貌地将大米还给了长州藩。木户拒绝这份接受退回来的礼物，并建议坂本用其作为贸易公司的本钱。坂本接受了，但是对整件事却感到很好笑。他说，“这有点像卷了别人的兜裆布后逃跑。”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152页。
- [16]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18页。坂本信中画的作战示意图，见第217页。
- [17] 田中光显后来回忆了这种不必要的破坏。“那是我第一次放火烧毁民房，但我毕竟还是个二十三四岁的热血青年……”引用自尾崎卓尔，《中冈慎太郎》，第200页。
- [18] 这封信见平尾道雄，《维新勤王遗文选书：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第245页。
- [19]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222页。
- [20] 佐佐木被派往幡多担任奉行时的情况就是这样。才过了几天他就被调往别处，因为藩政府官员经过再三考虑后，想起来那里是勤王党人的据点。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249页。
- [21] 大町桂月，《伯爵后藤象二郎》，第135页。
- [22] 平尾道雄，《维新经济史研究》（高知，1959），第6页。
- [23] 田中惣五郎，《岩崎弥太郎传》（东京，1940），第55页。
- [24] W. G. Beasley, "Councillors of Samurai Origin in the Early Meiji Government, 1868-9,"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1957), XX, p. 98.
- [25]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296页。
- [26] 同上，第347页。
- [27] 平尾道雄的《维新经济》第48—87页对这艘船的使用和重要性做了全面的研究。
- [28] 上书第51页。
- [29]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225页。
- [30] 江头恒治，《高知藩的幕末新政策》，《幕末经济史研究》，第119页，以及平尾道雄，《维新经济史研究》，第1—47页。田中惣五郎在《岩崎弥太郎传》的第58页补充说，开成馆的其中一个作用是为藩内的企业提供资金，从而结束对大阪资本的依赖，藩国因此可以从中获利。
- [31]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320、336页。关于藩政府的回复，见江头恒治，《高知藩的幕末新政策》，第116—117页，以及平尾道雄，《维新经济史研究》，第5页。
- [32] 平尾道雄纠正了《后藤象二郎》一书中的有关年代和意思含糊不清的错误，见《后藤象二郎的长崎、上海之行及其使命》，《土佐史传》（1935）第52期，第25—31页。
- [33]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1017—1018页。
- [34] 平尾道雄，《容堂公记传》，第179—180页。

- [35]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355页。
- [36] 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220—221页。
- [37]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363页。
- [38] 见岩仓1867年5月26日的日记;尾崎卓尔,《中冈慎太郎》,第362页。
- [39] 原文见平尾道雄,《维新勤王遗文选书: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第325—333页。
- [40] 长崎县图书馆。信的日期为1863年6月28日。
- [41] 写于1864年8月6日。
- [42] 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东京,1957),第388页。幕府可能知道的公开交易是,例如1867年5月英国领事弗劳尔斯在报告中附上的一份3月29日签订的合同,“合同的双方分别是土佐藩主阁下的代表后藤象二郎和长崎的格洛弗公司。后藤象二郎兹与格洛弗公司订立合同,同意以75000鹰洋向格洛弗公司购买炮艇‘南海号’。‘南海号’现已在长崎港,艇上所有的设备和武器一应俱全,详见附件。75000鹰洋将按以下方式支付:合同签订时支付10000鹰洋,随函附上格洛弗公司的收据……”其余的14379.37元将于20天内支付,在农历7月底之前再支付一笔数额相同的款项,余下的款项将于12个月内结清,利息为每年12%。但是,一个月后,这名领事向幕府抗议,说根据后藤的报告,“长崎的地方官”不知为何把船扣了,不让后藤他们接管。
- [43] 我没有找到日本人写的格洛弗传记(《格洛弗传》)。似乎很少有人研究他,但如果仔细研究他的生平,可能会很有收获。梅森写过一篇文章,但很短,不太令人满意。见W. B. Mason, “Thomas B. Glover, A Pioneer of Anglo-Japanese Commerce,” *New East* 2(February 1918), pp. 155-167。
- [44] 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第411页。
- [45] 同上,第441、454页。
- [46] 友厚会编辑的《近代的伟人:故五代友厚传》(东京,1921)第327—342页做了引述。
- [47] 五代龙作,《五代友厚传》(东京,1936),第56页。
- [48] 同上,第73—74页。
- [49] 对话的内容见《德川庆喜公传》,第367页,而石井孝在《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的第428页也提到了一连串的公文。在萨道义的第一篇文章为人所知前,石井便认为萨道义的那篇小文章应归功于伦敦方面的公文,见《关于新发现的〈英国策论〉的原文》,《日本历史》,第149期(1960年11月),第7-14页。
- [50] 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第375—385页有日文原文。萨道义在书中说到了本小册子,见*A Diplomat in Japan*, pp. 159-160。它的影响力可以从1867年9月木户写给坂本的一封信中窥见一斑,信中说,在这个神圣的国家,每个人都只能从一个英国人的口里听到这样的话,真是莫大的耻辱,见《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380—381页。
- [51] 大塚武松,《关于法国公使罗修斯的政策行动》,《史学杂志》(1935年7月),第833页。

- [52] 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第553—554页。
- [53] 同上,558页。
- [54] 平尾道雄,《沟渊广之丞》,《土佐史谈》,第29期(1929),第59—65页。
- [55] 原文见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174页。这封信其他书均没有收录。
- [56]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26页。
- [57] 同上,第249—250页。
- [58] 木户给坂本的信见上书第241页。坂本曾写信给下关商人伊藤助太夫,要求他支付沟渊到下关的差旅费,这封信见第471页。
- [59] 平尾道雄在《海援队始末记》第149页只在描述这条船时提到了格洛弗,但是《维新土佐勤王史》第891页援引了坂本的日记片段,其中提到有个普鲁士商人。平尾认为这个人和第二艘船有关。平尾的研究更新一些,因此我在区分两艘船时采用了他的方法。这艘船的名字读音是 Wairu ueru (Weir wolf?),我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两个词。
- [60]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885—894页;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120—122页。
- [61] 千头清臣,《坂本龙马》,第129—130页;《海援队始末记》,第160—163页。
- [62]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164—170页。
- [63] 有关这一事件的详情,见 John Harrison, *Japan's Northern Frontier* (Gainesville, 1955)。
- [64]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160—161页。还可参考永见德太郎的小文章《长崎时代的坂本龙马》,《土佐史谈》(1929,第29期),第71页。《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473页上有一封信,证明他曾利用小曾根作为信使,而《维新土佐勤王史》第891页的一份船舶买卖合同则显示小曾根是担保人。
- [65]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43、471页。同时见注[58]。
- [66] 坂本1867年初写给寺田屋的一封信显示,他依然在使用萨摩的身份:“写萨摩的才谷梅太郎收。”《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44页。
- [67] 几年后,后藤回忆起容堂曾问他应该采取什么政策,“我说他应该抓住机会,重返国内政坛,必要时与幕府对抗,直至打败他们,即使藩国遭受灭顶之灾也在所不惜。但是时候还未到。在这期间我们应该购买船只,占领南部的岛屿,扩充藩国的领土。”“但是当然了,”后藤接着说道,“我那时只有26岁,只会胡言乱语。”平尾道雄,《后藤象二郎的长崎、上海之行及其使命》,第28页。
- [68]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177页。
- [69]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48页。
- [70] 同上,第274页。田中惣五郎也使用了这则材料,见《岩崎弥太郎传》,第65页。
- [71]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2卷,第81—82页;第1卷,第251—253页。
- [72]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188页。领导人的名单见《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54—255页。
- [73]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75页。

[74]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2卷，第81—82页。

[75]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301—309页。

第七章

[1]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56页。信写于5月10日。

[2] 同上，第247页。

[3]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193—194页。

[4] 《海援队始末记》，第198—199页；坂本寄出航海日志的信见第270页。关于这件事的完整记录，包括谈判和讨价还价的内容，请参考《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57—258页。

[5] Henderson, Dan F., "Patterns and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Procedure in Japanese Law"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55, 514 pp.).

[6]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70、294页。

[7]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200页。

[8] 同上，第201页。

[9]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87、292页。

[10] 同上，第296页。

[11] 同上，第288页。后来赔偿金额减少到70000两。有些作者说这些钱都被岩崎拿去用作自己的投资了。例如，岩井良太郎，《三菱财阀读本》（东京，1937），第71—72页。但是这种说法遭到了平尾和田中的反对，见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204页，以及田中惣五郎，《岩崎弥太郎》，第68页。

[12]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189页。

[13]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76页。

[14] 田中惣五郎在《岩崎弥太郎》的第66页列了一张总数为431251两的债务清单，其中欠阿尔特公司180000两。但是田中计算的总数有误，他计算的单个统计数字可能也有问题，我已经将其纠正过来了。平尾道雄在《维新经济史研究》第31页上说，180000是外债的总数。还可参考第九章注[8]。

[15] 佐佐木高行将家臣被征收特别税归咎于后藤的巨额花销，按照规定，家臣必须上缴一半的薪俸，见《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377页。岩井良太郎对后藤的个人品位和花销做了有力的描述，见《三菱财阀读本》，第56页。

[16] 田中惣五郎，《岩崎弥太郎》，第85页。

[17] 五代龙作，《五代友厚传》，第92页。

[18] 涩泽荣一，《德川庆喜公传》，第3卷，第385页。

[19] 同上，第401—404页。

[20] 同上，第372—375页。

[21] 同上，第410页。

- [22] 同上,第358—360页。1867年,这种做法达到高潮,这一年幕府给宫廷送来了山城国所得的收入。
- [23] 岩仓思想的转变可以参考他的著作,见多田好问所编的《岩仓公实记》(东京,1927)第1卷和第2卷,以及日本史籍协会所编的《岩仓具视关系文书》(东京,1927)第1卷。德富在其颇具实用性的《岩仓具视公》一书中总结并写明了这些主要文献各自的特点。关于岩仓政治思想的变化还可参考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3卷,第736页及其后,以及《维新史》,第4卷,第569—584页。
- [24] 佐佐木高行在《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366页提到了当时流传的谣言,大意是说孝明是被幕府下令毒死的。人们认为孝明反对幕府的政策,因此他的死为幕府扫除了障碍。但是随后的研究显示,孝明的死显然对幕府非常不利。日本投降后的幻灭心情蔓延到了以前的正史,这真是非常有意思。一些颇受欢迎的文章“揭露”了岩仓在毒死孝明天皇一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参见蜷川新,《维新史中有这么多谣言——历史必须要写更多真正的事情》,《文艺春秋》(1952年8月),第158—166页。
- [25] *Memories by Lord Redesdale*, 1, p. 394; Satow, *Diplomat in Japan*, p. 200.
- [26] 《庆喜公传》,第3卷,第436页。
- [27] 大塚武松,《关于法国公使罗修斯的政策行动》,以及本庄荣治郎,《罗修斯和幕末的庶政改革》,《幕末的新政策》(东京,1935),第178—214页。这篇文章的译文见“Leon Roches and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the Closing Years of the Tokugawa Regime”,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July 1935), pp. 35-53。不过,译者忘了将日期转换成西历,因此里面所有的日期都是错的。对于这一问题,另外也有很好的讨论,见《庆喜公传》,第3卷,第436—464页,以及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第576—577页。永井尚志(1816—1891)和胜海舟一样,从小接受西学,深受西方影响,以后也都继续为明治政府效力。永井是尾张藩一位大名的儿子,被一名旗本出身的人收养。他曾到长崎跟第一批荷兰海军小分队学习,后来成为海军奉行、大目付,最后被宫廷任命为京都町奉行。因此,在德川幕府的末期,他的地位非常重要。为这些改革出谋划策的人中,最重要的是佐藤信渊(1769—1850)。他制定了一个实行中央集权制的计划。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及翻译,可以参考 R. Tsunoda, Wm. Theodore de Bary, D. Keene, eds.,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New York, 1958), pp. 564-578。关于这种思想在德川时代末期的影响,请参考石井孝,《实践佐藤信渊学说的企图》,《历史学研究》,第222期(1958年8月),第1—10页。
- [28] 本庄荣治郎,《罗修斯和幕末的庶政改革》。根据罗修斯的说法,在此之前,老中已经给所有的外国公使发了一份幕府给各藩主的通告,通告正式宣布“任何希望在三个开放港口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日本人都能保证最完全的自由”。罗修斯满腔热情地汇报说:“部长先生,每一天都带来了日本政府对我们良好意愿的新期待。” *Affaires Etrangères :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Paris:Imprimerie Imperiale,

- 1867), pp. 357, 358.
- [29] 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3卷,第955—958页。关于西后来的经历,请参考 Roger F. Hackett, "Nishi Amane--A Tokugawa-Meiji Bureaucra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II, 2 (February, 1959), pp. 213-225.
- [30]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182.
- [31] 同上, p. 198.
- [32] 《大西乡全集》,第1卷,第813—815页。
- [33] 《庆喜公传》,第3卷,第465—466页。关于更多来自志士的评价,请参考尾佐竹猛,《明治维新》,第3卷,第761—763页。
- [34]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184.
- [35] 《庆喜公传》,第3卷,第387—388页。
- [36] 《维新史》,第4卷,第530—536页;《庆喜公传》,第3卷,第404—405页。
- [37] 《庆喜公传》,第3卷,第486、436页;《维新史》,第4卷,第627页;石井,《明治维新》等,第576—577页。
- [38]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200.
- [39] 《维新史》,第4卷,第629页。
- [40] 庆喜的申请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他在强调日本必须与西方的惯例保持一致时的表述方式。他说这些变化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同时强调必须消除“过去的不良习惯”。“不用几年,”他写道,“我们的军威将会大增……”因此,从这名新将军的总体方针中,可以看到后来明治政府的许多价值观和一些立场。翻译版见 W. C.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pp. 308-309.
- [41] 翻译版本见上书第310—312页。
- [42]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51、270页。西乡的访问结束后,土佐立刻派福冈孝弟前往长崎,带去了正式赦免坂本以及任命他为海援队领导的文书。
- [43]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383页。同样不同意开国的长州勤王派品川弥二郎也对西乡愿意考虑开放兵库而感到愤怒。
- [44] 伊达试图转移西乡的话题,但是发现又被转了回来。中冈写道,“前藩主(伊达)说,‘吉之助,你在京都是不是有喜欢的女人?’西乡:‘没错。’领主:‘她叫什么名字?’西乡:‘即使我告诉藩主您,对您也不会有任何好处。所以,还是让我们讨论一些对您有好处的话题吧。’”尾崎卓尔,《中冈慎太郎》,第356页;还可参考《大西乡全集》,第1卷,第819页。
- [45] 见 W. C. Beasley, *Select 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p. 313。这似乎抵消了大久保和西乡给岛津的第二份请愿书,请愿书上说,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补偿幕府”,尾佐竹猛引用了这份请愿书,以表明彻底的倒幕立场是如何一步步慢慢形成的,见《明治维新》,第3卷,第834页。
- [46] 《西乡全集》,第1卷,第220—240页。

- [47] 《维新史》，第4卷，第658页。
- [48] 《坂本文书》，第1卷，第223—224页上有坂本接触的这名越前藩藩士所做的陈述。
- [49]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419页。关于今井（长冈），见寺石正路，《土佐伟人传》，第1卷（大阪，1914），第222—223页。
- [50]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297—298页。这段总结性的文字随着版本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有的是“×，身为大名会议的领导，应该将此八策呈现给天皇，然后再向全国公布。任何人只要违反了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就应该受到惩罚，不论他是谁，也不论他的官阶和地位多高”。有人说坂本所说的“×”指的是容堂。这个版本可以参考千头清臣，《坂本龙马》，第165页。
- [51] 这里依照中冈日记里的日期。一些间接资料所给的日期各不相同。
- [52] 《大西乡全集》，第1卷，第860页。英文的描述（尽管有日期错误）可以参考由Moriaki Sakamoto, *Great Saigo*, pp. 242—245。本书是编译自武者小路实笃的《西乡隆盛》（东京，1942）。还可参考德富，《公爵山县有朋传》（东京，1933），第1卷，第774—775页。
- [53] 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222页。
- [54]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1083页。
- [55] 从这时开始，志士经常将政治形势比喻为演戏，而上演的正是他们写的剧本。木户对坂本说的话即是其中的两个例子，分别见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420页，和《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362—362页。
- [56]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211页。但是《维新土佐勤王史》第1090页上说，佐佐木也在其中。佐佐木的回忆录表述不太清楚。他只写了接下来的一次会面，那次他确实有参加。
- [57]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310—311页。各维新领袖的自传均有转载。
- [58]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304页。
- [59] 由于生病，西乡并没有参加这次宴会。佐佐木参加了，并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宴会一开始并不顺利，土佐人兴高采烈，身为东道主的萨摩人却表情生硬。中冈小声对福冈说，他喜欢的那个艺妓原来也是一个萨摩家老的心头好。后来场面变得热烈一些了，但是仍然不够喧闹。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421—423页。
- [60] 西乡写给山县的信，见《大西乡全集》，第1卷，第860—861页。
- [61] 尾崎卓尔，《中冈慎太郎》，第260页；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250页。
- [62] 代表性的描述见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216—217页。
- [63] 西乡对佐佐木说的话见《西乡全集》，第1卷，第893页。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434页。
- [64] *Memories of Lord Redesdale*, 1, p. 411. 萨道义写道，“老容堂说他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建议他尽量和平地解决这件事，因为英国人对自己的人被害一事感到非常气愤，但是他不会这么做。如果他的人有罪，他自然会惩罚他们。但如果他们是

无辜的，那他无论如何也要宣布他们无罪。”见第 269 页。

- [65]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 441 页。《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336 页。
- [66] 《维新土佐勤王史》，第 1123 页。佐佐木说，有人建议，如果幕府代表穿西装的话，那就暗杀他们，但是被劝阻了，见 445 页。
- [67] 经常受到巴夏礼呵斥的萨道义支持后藤提出抗议：“领导已经习惯了说这种傲慢自大的话，我自己很讨厌当他的传声筒，并告诉后藤，如果他真的这么认为的话那就提出抗议；至于我自己，我可不敢有任何暗示。”*A Diplomat in Japan*, p. 266。
- [68] 同上，p. 271。
- [69]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 453 页。萨道义也写道：“土佐官员也都一个一个个借口上岸去了……我上去打听了几个老朋友，并找到了井上闻多（馨），他可真是沉默寡言到了极点。”见第 271 页。
- [70] 巴夏礼后来写信向容堂道歉。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 233 页。
- [71]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471—472 页。
- [72] 平尾道雄，《维新经济史研究》，第 28—29 页。
- [73]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 524 页。
- [74]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324、344 页。
- [75] 协议的原文，见上书第 372—376 页。
- [76] 协议的原文，见上书第 376—379 页。
- [77] 同上，第 317—324 页。

第八章

- [1] 当时在京都的中冈，为板垣写了一份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军事改革对比的报告。他写道，萨摩藩的改革是英国式的，并不适合土佐。那里的武士领取很少的薪俸，以致许多土佐足轻都要比萨摩武士过得好。整个军队系统都进行了改革，军官和士兵一起受训。中冈还注意到，萨摩藩给京都地区的军队提供的给养少得可怜，但他们的士气却很高。反过来，他认为长州的模式更加适合土佐。长州有许多俸禄很高的人，这些人娇生惯养，按照现代的军事标准来看根本打不了仗。为了克服这个问题，长州领导人建立多民兵队，人员主要由下级武士甚至是平民组成。最后一条政策是在反复试验和修改之后确定下来的，即规定每个人可以获得 50 石的收入。中冈建议土佐也采用这种方法，不要从上级和中级武士中招募士兵。从这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乡士一庄屋对上级的蔑视。见《兵团》，《雋杰坂本龙马》，第 362—364、534—535 页。
- [2] 《维新史》，第 4 卷，第 714 页；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 224—225 页；《容堂公记传》，第 233—234 页。
- [3] 板垣成为国民英雄后，曾于 1880 年代到西方访问。回来后，他坚信，在优越感爆

棚的西方人面前，民族团结显得非常有必要，有一段时间他更加愿意和明治政府合作。Cody，同上。

- [4] 平尾道雄，《容堂公记传》，第 234 页。
- [5] 松冈的自传见寺石正路，《土佐伟人传》，第 147 页。还可参考《维新史》，第 4 卷，第 728—729 页。
- [6] 请愿书的原文见《维新史》，第 4 卷，第 728、732—736 页。翻译版本见 Ishii Ryosuke, ed., *Japanese Legislation in the Meiji Era* (W. J. Chambliss, tr., Tokyo, 1958), pp. 708-711.
- [7] 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第 590 页及其后。
- [8] 罗修斯为了将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低，将货物发往法国，并确保它们都在一个单独的日本馆里展示。长崎的法国领事在向奉行解释此事时，保证罗修斯“对大君政府的真诚奉献……独自一人为日本而努力”，该文件位于长崎县图书馆，日期 1866 年 10 月 28 日，编号 s/W. Drury。
- [9] 其中包括岩下之前写给萨摩藩的一篇报告，其中称：“你会发现法国有许多强烈支持幕府的人。传说再过大约三年，大名将彻底消失，他们被打败后将变成拥有身份和地位的富人阶级，但是没有政治权力，就跟法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石井孝，《明治维新的国际环境》，第 591 页。
- [10]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244.
- [11] 见西乡写给桂右卫门的信，《西乡全集》，第 1 卷，第 900 页。
- [12]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256.
- [13] 源自 8 月 26 日西乡写给大久保利通的报告，见《西乡全集》，第 1 卷，第 880—892 页。英文翻译见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p. 254—255。萨道义解释说，这封信是 1906 年“我的老朋友松方正义”拿给他的。他的翻译与西乡的原文有些出入，英文中是日本的政体将与“所有其他国家的制度非常相似”，而西乡的原文则是“与英国的非常相似”。
- [14] 《西乡全集》，第 1 卷，第 892 页。
- [15] 同上，第 887 页。萨道义的版本同样有些不同：“我回答说，我们自己将会努力改革日本政府，没有理由（？）麻烦外国人。”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255.
- [16] 《西乡全集》，第 1 卷，第 904 页。
- [17] 见 Moriaki Sakamoto, *Great Saigo*, pp. 244—245。该部分用英语对这个作战计划做了最详细的描绘。
- [18] 《维新史》，第 4 卷，第 676—677 页上有长州成员柏村数马的日记；西乡的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个计划，见 Moriaki Sakamoto, *Great Saigo*, pp. 252—253。
- [19] 《维新史》，第 4 卷，第 679 页。
- [20] 《寺村左膳手记》，见岩崎英重编的《维新日乘纂辑》（东京，1926），第 3 卷。
- [21] 《维新史》，第 4 卷，第 727 页。
- [22] 同上，第 680—681 页。

- [23] 同上，第 740 页。
- [24] 同上，第 737、741 页。
- [25] 坂本及时向土佐官员汇报了土佐人袭击长崎外国人的计划，从而阻止了这类事件的再次发生，见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第 482 页。
- [26]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385 页。信写于萨摩—长州原定的最后行动日期之前两日。
- [27] 但是，上书第 408 页及其后确实记录了一个名为本山的人是如何描述坂本带来的那些令人难忘的信息和资料的。
- [28]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382 页。
- [29] 同上，第 412 页。
- [30]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 254—255 页。
- [31]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418 页。
- [32] 关于这些谈判，请参考平尾道雄，《陆援队始末记》，第 245—250 页。还可参考《维新史》，第 4 卷，第 687 页。
- [33] 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同样精彩的版本。有人提出天皇从未看过这份奏折，整件事都是后来的官方历史学家打着勤王的幌子故意捏造的。请参考远山茂树，《明治维新》，第 206 页。
- [34] 《维新史》，第 4 卷，第 692、706 页及其后。
- [35] 关于庆喜的考虑，请参考《庆喜公传》，第 4 卷，第 79 页及其后。
- [36]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419 页。
- [37] 同上，第 420 页。
- [38]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 259—260 页。
- [39] 翻译版本见 K. Asakawa, *The Documents of Iriki*, p. 377.
- [40] 平尾道雄，《容堂公记》，第 266 页。
- [41] 寺村左膳，《寺村左膳手记》，《维新日乘纂辑》（东京，1926），第 501 页。
- [42]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302.
- [43] 《五条誓文》有许多版本，我选择的是池信隆的，见 *The Beginning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Japan* (Baltimore, 1950), p. 36.
- [44] 远山茂树在《明治维新》的第 228 页，着重强调了《五条誓文》的目的性。
- [45] 关于尾崎三良的评论，请参考《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414—415 页。
- [46] 关于明治政府早期设立的官职，请参考 Robert Wilson, *Genesis of the Meiji Government in Japan, 1868-1871* (Univ. of Calif. Press, Berkeley), 1957.
- [47]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 1 卷，第 425 页。
- [48] 三冈丈夫在《由利公正传》（东京，1916）第 125—128 页，记录了由利对这次谈话的描述。通过一个在福井教书的英国人的有趣描述，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由利这些年来所受的苦楚。请参考 W. Griffis, *The Mikado's Empire* (New York, 1871), Book II, "Personal Experience".

- [49]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1卷，第427—428页。
- [50] 许多年来，我们只能通过横滨英国总领事 J. Carey Hall 给巴夏礼的翻译了解《藩论》。1911年6月21日的《日本编年史》(*Japan Chronicle*)转载了这篇文章，千头清臣的《坂本龙马》(1914)也有引用。千头清臣在注释中写道，原文没有保留下来。由于文章的归属存疑，因此《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的编者决定不收录这篇文章。1930年代，尾佐发现了这篇文章的原件(木版印刷，且上面标有“两百份”字样)，并将其重新发表在第46期的《土佐史谈》(1934)上。原文的日期是1868年，署有名字缩写“Y. M.”。尾佐在《幕末维新的人物》中讲述坂本的部分，分析了这篇文章是坂本作的理由。文章的前言写道，“某藩我的一位老朋友和我讨论了藩国问题，下面所写的都是他的意见。”接着写道，这位朋友向“同伴们”宣传自己的观点。平尾道雄在自己的《海援队始末记》(1941)一书中转载了尾佐的文章，并猜测 Y. M. 可能是陆奥宗光[当时他的名字叫“阳之助”(Yonosuke)]的名字缩写。陆奥来自纪伊藩，是海援队的成员。不过，这位“朋友”也可能是拥有丰富西学知识的坂本的秘书长冈谦吉。
- [51] Satow, *A Diplomat in Japan*, p. 297. 萨道义在谈到后藤所说的新官职时说：“这看起来很像我们向他建议的未来政府的行政架构。”
- [52] 《坂本龙马关系文书》，第2卷，第357页及其后有当时在场的人以及当局调查时所做的详细记录。
- [53]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274—275页。
- [54] 《青山余影》，第235页。
- [55] 平尾道雄，《海援队始末记》，第273页。
- [56] 关于这本小册子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请参考盐见薰，《传为坂本龙马语录的〈英将秘诀〉》，《历史学研究》(1957,6)第208期，第39—41页。千头清臣最先在《坂本龙马》一书中认为它是坂本写的，平尾道雄在早期有关海援队的著作中也沿用了这种观点。但后来他却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摒弃了这种观点，而是接受佐佐木的判断，即它也许是坂本在德川时代末期的思想，但很可能是土佐圈中的某位成员撰写的。盐见引用了一名会津人的日记作为自己的根据。这名会津人曾经混入浪人内部充当卧底，曾经看过一份言辞激烈的倒幕绝密文件，上面署着坂本的名字。
- [57] 我对千头清臣在《坂本龙马》序言第iv到第v页中的英语做了调整。千头清臣的传记作者说，他的英语很好，曾同时用英语写作两部传记(另一部是关于拿破仑的)，然后再用日语把它们翻译出来。《土佐伟人传(续)》(高知，1923)，第297—299页。

第九章

- [1] 这是后藤引用的容堂的观点，见《伯爵后藤象二郎》，第415—422页。

- [2] 关于这一观点的简要描述, 请参考 Sakamoto Yoshio,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iji Reformation," Silver Jubilee Volume, Zinbun Kagaku Kenkyusyo, Kyoto, 1954.
- [3] 《伯爵后藤象二郎》, 第 386 页。
- [4] 《谷干城遗稿》(东京, 1912), 第 1 卷, 第 318—319 页。
- [5] 同上, 关于土佐与邻藩签订的协议内容, 请参考沼田赖辅, 《土佐藩的大政奉还运动及其后的行动》, 史学会编辑, 《明治维新史研究》, 第 705—706 页。
- [6] 参见上文。
- [7] 平尾道雄, 《维新经济史研究》, 第 29—46 页。后藤的传记作者是这样描述的: “从大阪商会开始, 藩企的所有资产和债务最后全部落到了岩崎的手里。藩国的轮船一度移交给了财政部, 后来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卖给了三菱商会, 成为了一家民营的航运企业。后藤伯爵的帮助加上岩崎的能力真是所向无敌, 而大参事林有造的帮助也不小。”《伯爵后藤象二郎》, 第 415 页。
- [8] 长崎图书馆保存的档案中, 有英国领事弗劳尔斯转发的几份控诉书。弗劳尔斯说(例如 1868 年 2 月 13 日那封信): “阿尔特公司告诉我, 土佐国的国君一共欠了他们 27479 鹰洋, 而他们无法从土佐在这里的代表岩崎先生那里拿到一分钱。我很荣幸地请求您能付清这笔款项。假如无法支付, 我恳求您将那位土佐国君名下的轮船扣留在港口, 直到他们与阿尔特公司之间达成满意的协定。”两天后又来了一封信, 内容是“向上述国君单独追讨‘朱林号’(几个月前, 坂本、佐佐木和萨道义曾搭乘这艘船前往长崎)的最后一笔分期付款 77500 鹰洋”。这些档案中还包括一些与 1867 年 4 月土佐藩试图由德川幕府作保向荷兰借 100000 鹰洋(利息为 1%)的事有关的资料。资料显示, 荷兰希望德川幕府能够出面作保, 但是没有资料显示幕府出具了这份保函, 也没有资料显示土佐藩拿到了借款。
- [9] 关于纸币发行问题的讨论, 见平尾道雄, 《维新经济史研究》, 第 88—160 页, 而关于这时期的藩国财政等大问题的讨论, 则可参考他的《高知藩财政史》第 51—55 页。
- [10] 请参考《谷干城遗稿》, 第 1 卷, 第 315—324 页。谷干城提出的“我对土佐经济改革的 18 条建议”。
- [11] 平尾道雄, 《维新经济史研究》等, 第 162—167 页。
- [12] 《藩政一览》, 第 1 卷, 第 152 页; 吉川秀造, 《土族授产研究》(东京, 1942), 第 59 页。
- [13] 《后藤象二郎》, 第 399—403 页; 平尾道雄, 《维新经济史研究》, 第 171—172 页。
- [14] 请参考平尾道雄, 《维新经济史研究》, 第 178—180 页, 以及保存于东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的一份文件, 上面标注着“1870 年 10 月 25 日提交的建议书”。
- [15] 《高知市史》, 第 639—644 页。平尾道雄, 《高知县的历史》, 第 145—146 页。
- [16] 《高知市史》, 第 646, 651 页及其后。
- [17] 沼田赖辅, 《土佐藩的大政奉还运动及其后的行动》, 第 709 页。
- [18] 《建议书》等, 国立国会图书馆。

- [19]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N.Y., 1940).
- [20] *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 The Origins of Conscription* (N.Y., 1943); *Feudal Background of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N.Y., mimeographed, 1945)。但是，阿尔伯特·克雷格 (Albert Craig) 在即将问世的《明治维新中的长州》(*Chōshū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从根本上矫正了诺曼处理长州的方式。
- [21] 见注 [10]。
- [22] 关于他们的请愿书，请参考平尾道雄，《长冈村史》，第 101—110 页。
- [23] 《高知县后改革史》，第 110—114 页；松好贞夫，《新田的研究》，第 308 页。
- [24] 平尾道雄在《维新经济史研究》第 188—217 页描写了土佐的“士族商法”。
- [25] 《长冈村史》，第 123 页。
- [26] 同上，第 113 页及其后。
- [27] 平尾道雄，《立志社和民权运动》(高知, 1955) 对立志社做了细致的研究。乔治·桑塞姆爵士指出，“立志社”的名字来源于塞缪尔·斯迈尔斯那本著名的《西国立志篇》(*Self Help*) 的日文译名，因此可能最好是将其英文名翻译为“Self Help Society”。关于这些组织的成员和不同诉求，请参考《长冈村史》，第 114 页。
- [28] 植木枝盛，《无天杂录》(森下菅根编校, 高知, 1957), 第 256 页及其后。家永三郎，《革命思想的先觉者》(东京, 1955), 第 50 页；详细的描述，请参考 Eiji Yutani, “Ueki Emori: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Meiji Japan” (unpublished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0)。
- [29] 多雷 (R. P. Dore) 着重描述了明治教育系统所做的“种种努力”，见 *City Life in Japan* (London, 1958), pp. 191ff。
- [30] 我在《日本与孙中山》[*The Japan and Sun Yat-sen* (Cambridge, 1954)] 一书中，对明治末期的志士和“中国浪人”(他们这么称呼自己) 的行为做了研究。

年表

年代和时代	国内的情况	土佐	坂本（及其同仁）
嘉永时期 1853 年	佩里抵达日本	容堂解散了高级官员	前往江户学习剑术，参加特别防卫组织
安世时期 1854 年	荷兰海军分队在长崎训练胜及其他人	吉田东洋上台并进行经济和军事改革，民兵队成立	
1856 年	汤森·哈里斯来到日本，准备签署贸易条约	武市瑞山被派往江户	又到江户，受到武市的影响
1857 年	蕃书调所成立	武市回到土佐	回到土佐
1858 年	井伊直弼被任命为大老，家茂继任将军，庆喜落败，幕府严惩持反对意见的志士、大名和公卿	水户藩使者试图联系土佐勤王党	被派往边境，与水户藩士接洽
		1859 年容堂被幕府勒令在家幽禁	
万延时期 1860 年	遣美使团出发，成员包括小栗、胜、福泽，第一份贸易和约生效 3 月：水户藩士和萨摩藩士暗杀了井伊直弼，标志着勤王时代开始 8 月：德川齐昭逝世，水户藩陷入派系纷争	土佐人士加入了遣美使团 吉田东洋继续国内的改革，编纂法典，即《海内政典》 8 月：对容堂的禁令有所松弛	
文久时期 1861 年	长州藩提交了长井雅乐的宫廷幕府和解计划（公武合体） 和官公主下嫁将军	武市在国内剑坛和勤王圈中声誉鹊起 10 月：武市成立土佐勤王党	成为武市的密使和助手 和中冈一起加入勤王党

年代和时代	国内的情况	土佐	坂本（及其同仁）
1862 年	2 月：刺杀安藤失败 4 月：岛津久光来到京都，并打败长州，获得了宫廷的支持 5 月：久光镇压了寺田屋的浪人 7 月：大原在久光的陪同下出使江户，回程中发生了理查德森事件 新的领导人（春岳、庆喜）放松了参勤交代制度	武市无法说服吉田东洋 5 月：吉田东洋遇害，容堂恢复自由 7 月：勤王派陪同丰范到京都（于 9 月抵达） 11 月：三条一姊小路使团（由丰范陪同）接到出使命令，并于 12 月启程前往江户	4 月：逃离土佐 12 月：刺杀胜，但被胜感化，成为他的信徒和手下 中冈等人来到江户
文久时期 1863 年	家茂将军首次访问京都 6 月：长州炮轰下关的船只 7 月：长州全面掌控了京都，姊小路遇害 8 月：英国炮轰鹿儿岛 9 月：萨摩一会津的军队合力将长州军赶出京都； 京都：三条等公卿逃往长州 大和、生野不惜冒险地举行起义	2 月：容堂从江户前往京都 5 月：容堂回到土佐，开始镇压勤王党 7 月：间崎、平井、广濑剖腹自杀 中冈脱藩 土佐浪人在长州等地的战斗中崭露头角	在胜的帮助下，获得了藩国的原谅。 神户海军操练所 12 月：成为神户海军操练所的领导
元治时期 1864 年	家茂第二次访问京都 8 月：长州进攻京都的计划流产 9 月：西方船只炮轰下关 11 月：胜被免去海军奉行一职 12 月：幕府开始征讨“朝敌”长州，在西乡的帮助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周布自杀	8 月：后藤成为容堂的家老；一系列新的改革开始了；勤王党人举行野根山起义失败	从胜和大久保一翁那里听说了将军辞职的计划。 11 月：胜被解职；获得了萨摩人的保护

年代和时代	国内的情况	土佐	坂本（及其同仁）
庆应时期 1865 年	流放公卿被转移到太宰府 长州勤王派起来造反，并控制了藩政 6 月：幕府的保守派决定进行第二次长州征讨。 就法国的援助问题，幕府与罗修斯达成协议。 英国公使巴夏礼上任	开成馆成立； 土佐计划向长崎出口商品 武市自杀	未来的海援队在长崎成立，主要 业务是帮萨摩和长州进口西式武器 和轮船；多次往返下关 12 月：为长州购买“联合”号船 只和武器
1866 年	2 月：幕府与法国签订贸易协定 3 月 7 日：萨长联盟秘密成立 萨道义写了一本有关英国政策的小册子 7 月：幕府在长州征讨中落败 8 月：将军家茂逝世	土佐藩政府开始重新看待勤王党；佐佐木去 太宰府 9 月：后藤去长崎，后转去上海 中冈呼吁土佐勤王党领导放弃立即攘夷的策略	3 月 7 日：促成了萨长联盟 从寺田屋的袭击中逃脱，去鹿儿 岛，回来参加了下关的战斗
庆应时期 1867 年	庆喜成为新的将军，并大力进行改革；幕府 任命法国人罗修斯为顾问 6 月：萨摩、土佐、宇和岛、福井四藩的大 名与将军举行会议，讨论兵庫开港和惩罚长 州的问题 萨长积极备战 11 月 9 日：庆喜上书宫廷，请求将政权奉还 宫廷	土佐向坂本和中冈提供支持 “伊吕波丸”调查事件 岩崎取代后藤，成为土佐在长崎的代表 土萨密盟 “伊卡洛斯”号危机拖延了行动 9 月：容堂决定请求庆喜辞职 10 月 28 日：请愿书提交给了庆喜	被任命为海援队的领导 7 月：《船中八策》 8 月：“伊卡洛斯”号危机 11 月：来到京都 12 月 10 日：与中冈一起在京都 遇害

年代和时代	国内的情况	土佐	坂本（及其同仁）
明治时期 1868 年	1 月：倒幕联军在京都击败了幕军，“明治维新”开始 1 与 27 日：庆喜试图再次进攻京都；伏见鸟羽之战拉开了战争的序幕 4 月：《五条誓文》重申了坂本—土佐所提出的计划的主要内容 9 月：江户改名为东京，成为日本的新都。	土佐军队攻下了高松藩和松山藩，并参加了北部，尤其是若松城的战斗；袭击法国人的事件发生，引发了外交危机；藩政府举行活动，纪念野根山事件中死难的勤王志士	
1869 年	各藩的版图奉还朝廷 藩主成为县知事 幕府军在北海道的抵抗结束	武士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1870 年	实行谨慎的自由主义政策，尝试各种“国民教育”	板垣、福冈以及“四名平等”的主张	
1871 年	废藩置县	进行议会制的试验	

参考文献

I. 西文书籍

Affairs Etrangères: Documents Diplomatiques. Paris, 1867.

Alcock, Sir Rutherford.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2 vols., New York, 1863.

Asakawa, K. *The Documents of Iriki*, 2nd ed., Tokyo, 1955.

Beasley, W. G. *Great Britain and the Opening of Japan*, London, 1951.

———. *Select Document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London, 1955.

Bellah, Robert N. *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 Glencoe, Ill., 1957.

Courant, Maurice. *Okubo*, Paris, 1904.

de Bary, W. Theodore, and Tsunoda, R., eds. *Sources of the Japanese Tradition*, New York, 1958.

Doeff, H. *Herinneringen uit Japan*, Haarlem, 1833.

Dore, R. P. *City Life in Japan*, London, 1958.

Fukuzawa Yukichi. *The Autobiography of Fukuzawa Yukichi* (tr. Eiichi Kyooka), Tokyo, 1948.

Griffs, W. *The Mikado's Empire*, New York, 1871.

Hall, John W. *Tanuma Okitsugu (1719-1788): Forerunner of Modern Japan*, Harvard, 1955.

Harrison, John. *Japan's Northern Frontier*, Gainesville, 1955.

Ike, Nobutaka. *The Beginnings of Political Democracy in Japan*, Baltimore, 1950.

Ishii Ryosuke. *Japanese Legislation in the Meiji Era* (tr. W. J. Chambliss), Tokyo, 1958.

Jansen, Marius B.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Cambridge, 1954.

Meijlan, G. F. *Japan: Voorgesteld in schetsen over de zeden en gebruiken van dat rak*, byzonder over den Ingezetenenen der stad Nagasaky, Amsterdam, 1830.

Mushakoji Saneatsu. *Great Saigo* (tr. Sakamoto Moriaki), Tokyo, 1942.

Norman, E. H.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 New York, 1940.

———. *Soldier and Peasant in Japan: The Origins of Conscription*, New York, 1943.

———. *Feudal Background of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 (mimeographed), New York, 1945.

Redesdale, Lord (Hugh Mitford). *Memories by Lord Redesdale*, 2 vols.,

- New York (n. d.).
- Sansom, George B. *The Western World and Japan*, New York, 1950.
- Satow, Sir Ernest. *A Diplomat in Japan*, Philadelphia, 1921.
- Smith, Thomas C. *The Agraria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 Stanford, 1959.
- Takekoshi Yosaburo. *The Economic Aspects of the History of the Civilization of Japan*, 3 vols., London, 1930.
- Teng, Ssu-yü, and Fairbank, John K. *China's Responses to the West*, Harvard, 1954.
- Tsudzuki, K. *An Episode from the Life of Count Inouye*, Tokyo, 1912.
- van der Chijs, J. A. *Neerlands Streven tot Openstelling van Japan voor den Wereldhandel*, Amsterdam, 1867.
- van Meerdervoort, J. L. C. Pompe. *Vijf Jaren in Japan (1857-1863)*, 2 vols., Leiden, 1868.
- von Siebold, P. F. *Open Brieven uit Japan*, Deshima, 1861.
- Warriner, Emily V. *Voyager to Destiny: the Amazing Adventures of Manjiro, the Man Who Change Worlds Twice*, Indianapolis, 1956.
- Wilson, Robert. *Genesis of the Meiji Government in Japan, 1868-1871*, Berkeley, 1957.

II. 日文书籍

阿部道山，《小栗上野介正伝—海軍の先駆者》，东京，1941。

本庄荣治郎（编），《幕末經濟史研究》，东京，1935。

千头清臣，《坂本龍馬》，东京，1914。

维新史料编纂会、文部省（编），《大日本维新史略》，第3编，第4卷、第7卷，东京，1940，1944。

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编），《大日本古文书：幕末外国关系文书》，第18卷，1925。

大川信义（编），《大西郷全集》，3卷，东京，1926。

福島成行，《吉田東洋》，东京，1927。

五代龙作，《五代友厚伝》，东京，1936。

五代友厚刊行会编辑，《五代友厚秘史》，大阪，1960。

春山育次郎，《平野国臣伝》，东京，1933。

大塚武松（编），《藩制一覽》，东京，1928-1929，2卷。

土方久元，《回天実記》，东京，1900。

平尾道雄，《容堂公記伝》，东京，1941。

——.《吉村虎太郎》，东京，1941。

——.《海援隊始末記》，东京，1941。

——.《陸援隊始末記》，东京，1942。

——.《維新勤王遺文選書：坂本龍馬、中岡慎太郎》，东京，1943。

——.《武市瑞山と土佐勤王党》，东京，1943。

——.《高知藩財政史》，高知，1953。

——.《土佐農民一揆史考》，高知，1953。

——.《土佐藩漁業經濟史》，高知，1955。

——.《長岡村史》，高知，1955。

——.《立志社と民権運動》，高知，1955。

——.《土佐藩林業經濟史》，高知，1956。

——.《土佐藩工業經濟史》，高知，1957。

——.《維新經濟史の研究》，高知，1959。

本庄荣治郎，《幕末の新政策》，东京，1935。

家永三郎，《革命思想の先驅者》，东京，1955。

菴原鉦次郎、木村知治，《土方伯》，东京，1914。

入交好脩，《徳川幕藩制解体過程の研究》，东京，1957。

石井孝，《明治維新の国際的環境》，东京，1957。

岩崎英重等（编），《維新日乗纂輯》，5卷，东京，1925。

维新史料编纂事務局（编），《維新史》，6卷，东京，1939—1941。

瑞山会（编），《維新土佐勤王史》，东京，1911。

岩井良太郎，《三菱コンツェルン読本》，东京，1937。

大塚武松等（编），《岩倉具視関係文書》，8卷，东京，1925—1933。

坂本中冈铜像建设会（编），《雋傑坂本先生傳》，大阪，1926。

鹿儿岛县（编），《鹿児島県史》，5卷，鹿儿岛，1939—1943。

胜麟太郎（海舟），《海舟全集》，10卷，东京，1929。

胜田孙弥，《大久保利通伝》，3卷，东京，1911。

吉川秀造，《士族授産の研究》，东京，1942。

近世村落研究会（编），《近世村落自治史料集 第二輯 土佐国地方史料》，东京，1956。

高知地方史研究会（编），《高知県歴史年表》，高知，1958。

高知县农地改革史编纂委员会（编），《高知県農地改革史》，高知，1952。

高知县（编），《高知県史要》，大阪，1924。

高知市史编纂委员会（编），《高知市史》，高知，1958。

幸田成友，《大塩平八郎》，东京，1910。

儿玉幸多，《近世農民生活史》，东京，1957。

熊泽一卫，《青山餘影 田中光顯伯小伝》，东京，1924。

吴秀三，《シーボルト先生—その生涯及び功業》，东京，1926。

栗原亮一、宇田友猪，《板垣退助君伝》，东京，1893。

葛生能久（监修），《東亜先覚志士記伝》，3卷，东京，1933—1936。

松好贞夫，《新田の研究》，东京，1936。

——.《土佐藩經濟史研究》，东京，1930。

松泽卓郎，《万葉と鹿持雅澄の生涯》，东京，1943。

三上参次，《江戸時代史》，2卷，东京，1943-1944。

三冈丈夫，《由利公正傳》，东京，1916。

中滨东一郎，《中浜万次郎伝》，东京，1936。

高知县幡多郡中村町（编），《中村町史》，高知，1950。

奈良本辰也，《近世封建社会史論》，东京，1948。

沼田次郎，《幕末洋学史》，东京，1950。

尾形裕康，《鹿持雅澄》，东京，1944。

大町桂月，《伯爵後藤象二郎》，东京，1914。

尾佐竹猛，《明治維新》，4卷，东京，1942—1948。

尾崎卓尔，《中岡慎太郎》，东京，1926。

岩崎英重，《坂本龍馬関係文書》，2卷，东京，1925。

坂崎斌，《鯨海酔侯》，东京，1902。

岩崎英重（编），《三条実万手録》，东京，1925。

佐佐木高行，《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 昔日談》，东京，1915。

关顺也，《藩政改革と明治維新一藩体制の危機と農民分化》，东京，1956。

涩泽荣一，《德川慶喜公伝》，8卷，东京，1916。

史学会（编），《明治維新史研究》，东京，1930。

司书会（编），《加藤司書傳》，福岡，1933。

多田好问（编），《岩倉公実記》，3卷，东京，1927。

日本史籍协会（编），《武市瑞山関係文書》，2卷，东京，1916。

田中惣五郎，《岩崎弥太郎伝》，东京，1940。

岛内登志卫（编），《谷干城遺稿》，2卷，东京，1912。

寺石正路，《土佐偉人伝》，高知，1914。

——.《土佐偉人伝（続）》，高知，1923。

德富猪一郎（苏峰），《岩倉具視公》，东京，1932。

——.《公爵山県有朋伝》，3卷，东京，1933。

——.《土佐の勤王》，东京，1929。

友厚会，《近代之偉人故五代友厚傳》，东京，1921。

高知县立图书馆（编），《土佐藩郷土調査書》（土佐史料叢書），东京，1958。

远山茂树，《明治維新》，东京，1951。

植木枝盛，《無天雜録》，森下菅根编校，高知，1957。

山崎正董，《横井小楠伝》，东京，1942。

大塚武松（编），《吉田東洋遺稿》，东京，1929。

III. 西文文章

Beasley, W. G. "Councillors of Samurai Origin in the Meiji Government 1868-9,"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xxx (London, 1957).

Brown, Sidney. "Kido Takayoshi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35-1877,"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52.

———. "Kido Takayoshi, Japan's Cautious Revolutionary,"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xxv, 2 (1956).

Cody, Cecil E. "A Study of the Career of Itagaki Taisuke (1837-1919), A Leader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Meiji Jap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5.

Craig, Albert. "Choshu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59.

———. "The Restoration Movement in Choshu,"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ii, 2 (1959).

Fukuzawa Yukichi. "Kyuhanjo" (tr. Carmen Blacker), *Monumenta Nipponica* (Tokyo, 1953).

Grinnan, R. B. "Feudal Land Tenure in Tosa," *Transactions of the*

-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xx, 2 (1893).
- Goodman, Grant K. "The Dutch Impact on Japan (1640-1853),"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55.
- Hackett, Roger F. "Yamagata Aritomo: A Political Biography,"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55.
- . "Nishi Amane—a Tokugawa-Meiji Bureaucra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ii, 2 (1959).
- Hall, John W. "Bakufu and Chonin," Occasional Papers, Michigan Center for Japanese Studies, 1 (1951).
- Henderson, Dan F. "Patterns and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Procedure in Japanese Law,"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55.
- Hiraga Noburu. "Tosa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unpublished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5.
- Hong, Eijiro. "Leon Roches and Administration Reform in the Closing Years of the Tokugawa Regime,"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Kyoto, 1935).
- . "The Views of Various Hans on the Opening of the Country,"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xi, 2 (1936).
- Jansen, Marius B. "New Materials for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19th Century Jap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957).
- . "Takechi Zuizan and the Tosa Loyalist Party,"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ii, 2 (1959).

Naff, William E. "The Origins of the Satsuma Rebellion," unpublished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9.

Sakai, Robert K. "Feudal Society and Modern Leadership in Satsuma han,"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 3 (1957).

Sakata Yoshio.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iji Reformation," Silver Jubilee Volume, Zinbun Kagaku Kenkyusyo, Kyoto, 1954.

Smith, Thomas C. "The Japanese Village in the 17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ii, 1 (1952).

———. "Landlord and Rural Capitalists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xvi, 2 (1956).

———. "The Land Tax in the Tokugawa Perio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viii, 1 (1958).

Tsukahira, Toshio. "The Sankin-Kotai System of Tokugawa Jap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51.

Webb, Hershel F. "The Mito Theory of the State," *Research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on Japan, Columbia University East Asian Institute Studies*, no. 4, ed. John E. Lane, New York, 1957.

Yutani, Eiji. "Ueki Emori: Tradition and Change in Meiji Japan," unpublished M. A. thesi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60.

IV. 日文文章

江头恒治,《高知藩における幕末の新政策》,《幕末経済史研究》,

東京，1925。

原平三，《天誅組拳兵始末考》，《土佐史談》，第 62 期（1938），第 63 期（1938）。

平尾道雄，《幕末浪人とその保護及び統制》，《明治維新史研究》，史学会編，東京，1930。

——，《後藤象二郎の長崎上海出張と其使命》，《土佐史談》，第 52 期（1935）。

——，《高知藩の民兵制度》，《土佐史談》，第 35 期（1931）。

——，《高知市の今昔》，《高知县建筑师会发行》（未注明出版日期）。

——，《溝渕広之丞》，《土佐史談》，第 29 期（1929）。

——，《天保「おこぜ」組始末》，《土佐史談》，第 36 期（1931）。

本庄荣治郎，《レオン・ロシュと幕末の庶政改革》，《幕末の新政策》，東京，1935。

池田敬正，《天保改革論の再検討——土佐藩を中心にして》，《日本史研究》，第 31 期（1957）。

——，《藩政改革と明治維新：高知藩》，《社会経済史学》，第 22 期第 5—6 号（1957）。

——，《土佐藩における安政改革とその反対派》，《历史学研究》，第 205 期（1957）。

入交好脩，《土佐藩「町人郷土」の形成に関する一史料》，《社会科学討究》，第 1 期（1956）。

石井孝，《佐藤信淵学説実践の企図》，《历史学研究》，第 222 期（1958）。

永见徳太郎，《長崎時代の坂本龍馬》，《土佐史談》，第29期（1929）。

沼田頼輔，《土州藩の大政奉還運動と其後の行動》，《明治維新史研究》，史学会編，東京，1930。

——.《土佐國石高考》，《歴史地理》，第28期，第1号（1916）。

大塚武松，《仏国公使レオン ロッシュの政策行動について》，《史学雑誌》，第46期（1935）。

小关丰吉，《寛文の改替について》，《土佐史談》，第24期（1928）。

坂田吉雄，《明治維新と天保改革》，《人文学報》，第2期（1952）。

新村出，《蘭書訳局の創設》，《史林》，第1卷，第3号（1916）。

盐见薫，《坂本竜馬の元治元年》，《日本历史》，第108期（1957）。

——.《坂本龍馬語録と伝えられる「英将秘訣」について》，《历史学研究》，第208期（1957）。

——.《才谷屋のことなど》，《寧楽史苑》，第8期（1952）。

竹崎五郎，《坂本龍馬先生系図：大浜家から出づ》，《土佐史談》，第76期（1941）。

远山茂树、原平三，《江戸時代後期一揆覚書》，《历史学研究》，第127期（1947）。

关于资料来源的说明

本书引用的著作、文章及其相关的文献资料，均可在“引用作品”和脚注中找到，频繁的引用也说明我非常看重这些资料的重要性和可靠性。下文有关资料来源的讨论并不务求全面，而是希望通过能够对找到的有关早期土佐、维新志士和高知当地历史资料的介绍，使读者明白这些资料对日本的历史编纂工作的重要性，同时为进一步研究与明治维新有关的地方历史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土佐历史相关文献的来源

德川时代土佐的主要文献资料，到了近代，都成了山内家族的私有财产。与德川时代其他藩国的资料一样，这一大堆文件详细记录了财政、行政、地籍登记、庆典仪式、家臣以及宫廷和藩国的编年史，数量之庞大，足以说明德川时代官僚制度的成熟。[如想了解某个代表藩国的文献库的详细介绍，例如冈山藩，可以参考 John W. Hall,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Local History in Japan: Pre-

Meiji Daimyo Record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 pp. 1-2 (1957)]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山内家族将文献转移到东京，并在那里成立了“山内家家史编辑所”。三位历史学家——沼田赖辅、福島成行和平尾道雄——负责档案的保管和编辑。为了利于编排，他们按照《大日本史料》的模式和各自的分工，将山内家族的历史分成几个时期。到了1945年，他们已经努力整理出了几百卷的原始手稿，然而东京大轰炸使这些工作成果化为灰烬。一些被留在高知山内宅邸的文件保存下来，但为安全起见而保存在高知县图书馆的其他文件则毁于1945年7月4日的高知空袭。因此，战争使得综合研究土佐文献的希望落空，这里无法和金泽（加贺）、山口（长州）以及研究中的冈山一样，拥有全面系统的文献资料。

尽管如此，土佐历史资料在数量和质量上仍十分惊人。遗留下来的山内文献中有19世纪早期的记录和一本1865—1871年的、在结构上和著名的《岛津久光公实记》非常相似的《山内丰范记》。同样保存下来的，还有藩企在长崎的交易记录，包括合同和交易细节。在保存下来的早期珍贵资料中，1590年的地籍测量记录（《天正地检书》）奇迹般地保存了368册。这份奇特的文件详细记录了16世纪末土佐的每一块地及其归属，是躲过了水火灾害和保存疏忽之后，全日本有关该时期仅存的两三本之一。现在，它经平尾道雄誊写并加上注释，由高知县图书馆陆续出版。截至1960年，这本书已经出了5卷，内容分别关于土佐、长冈和安艺郡。

虽然迄今为止很少被历史学家提及，但有几本德川时期编辑的重要著作肯定会对未来的研究大有裨益。在此我简单地介绍一下它

们的内容和写作方式，以便进一步观察德川时代的学术和文化。

第一本是《南路志》，由当时的富商武藤致和（1741—1813）及其几个儿子编写完成。武藤家族经营木材、石灰、干货和和纸，还拥有开垦的土地，家主被任命为庄屋。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是本居宣长一派神道教学者及其弟子的学生。由于对文化和古风怀有浓厚的兴趣，同时又有条件沉溺其中，因此武藤家家主决定撰写一部土佐史。这本书共有 120 卷，包括全藩的介绍和一些人的年谱，以及最后的文献附录。目前共有两份完整地保存下来，一份在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一份在国立国会图书馆上野分馆。原书第 9—33 卷正陆续在高知出版，内容主要是关于土佐所有乡村的历史和地理，其中的第一本书于 1960 年面世。除正文外，它还有四本较薄且较次要的补遗。

第二本书是吉村春峰编写的包罗万象的《土佐国群书类丛》。吉村出身农户家庭，跟随前文已经提到过的武市的叔叔鹿持雅澄学习日本典籍。我们再次看到，国学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尚古风气促成了这本学术性书籍的诞生。吉村 20 多岁时成了一名庄屋，并一直担任此职，直到明治时期封建制度被废除。他在组织和编写这本毕生之作时，模仿了德川时期的塙保己一（1746—1822）那本著名的《群书类丛》，但内容只限于长宗我部和山内时期的土佐。这本书一共 307 卷，和《南路志》一样，一共有两套完整地保存下来，分别存放于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和国立国会图书馆上野分馆。这套书中一些最著名的内容，例如长宗我部法典，已经收录在《日本经济大典》（54 卷，1928—1930）、《近世社会经济丛书》（36 卷，1914—

1917) 和最近出版的《近世村落自治史料集：土佐国地方史料》(东京, 1956, 588 页) 中, 但是其余的大量资料仍然鲜为人知或者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我们可以从这部书中找到, 例如, 有关农民起义的全部文献记录、数百个家臣家族的兴衰史、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登记在册的佛教寺庙名称、当地的地名索引, 以及中滨万次郎返回日本时接受审问的逐字记录等。

第三本重要的书籍, 《土佐史料》, 在 7 月 4 日的高知轰炸中毁于一旦, 但是专家们已经重新收集了其中一些资料, 因此仍然值得一提。1912 年, 县政府同意编写此书, 学者们花费了很大精力寻找上述两书中漏掉的资料。1923 年, 编纂工作完成, 共收录 617 个条目, 保留一份副本。图书馆被炸之后, 似乎只有 1925—1940 年发表于图书馆月刊上的无数篇评论文章才能说明它的价值, 但是最近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重新收集到了那些重要的原始资料。这套书在德川时代末期的资料收集方面做得尤其完备, 包含了大量官方性质的文件(例如, 与高知市政府有关的文件、关于年寄和庄屋的规定等), 因此, 即便是部分重编本, 它也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史料。

这里将要提到的第四本, 也是最后一本书是《宪章簿》。这是一本德川时代土佐颁布的法律、敕令、法规和告示的汇编。全书共 68 卷, 由德川时代末期幡多郡的庄屋兼松编写。兼松的原意是想编写一本法律和法规的书, 以备日常工作之用。这本书唯一一套完整的版本保存于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图书室, 高知大学只保存了大约 1/3 的残缺版。这本书非常重要, 但是迄今为止, 同样没有多少学者关注它。

之前有人认为，对这些书籍及其编写的方式进行分析，可能会为研究德川时代的土佐提供有益的见解。大量有文化的武士成为官员，没有什么比期待他们将空余时间和金钱花费在这种具有文学和历史价值且被儒学家认可的工作上更合乎常理了。但是，在这些书籍之中，写于德川时代的三本书分别出自商人、农民出身的庄屋和庄屋之手。显然，“庄屋同盟”的请求中表现出来的对于传统的兴趣，以及中冈慎太郎身上表现出来的对于学习的热情，都不是富裕平民中绝无仅有的孤例。武士们都在做什么呢？毫无疑问，许多人在编写官方的记录和编年史。天保后一个世纪，这些文献将大规模地毁于他们后代所导致的兵燹之中。但是更多的人正将时间花在谋求入仕、追求享乐上，鄙视那些只关注过去的勤奋文人。从短期来看，武士及其行为光芒四射，但是从长期来看他们的光芒无法维持很久。19 世纪的日本能够成功将他们甩掉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已经领了多年的抚恤金，却没有变得更聪明。

维新时期

研究维新的历史学家能够获得的直接和间接资料非常多，以至于我需要用比此文长几倍的篇幅才能将它们罗列出来。之所以有如此庞大的文献资料，一方面是因为明治维新一直占据着日本历史的主要位置。几十年来，这都是致力于记录明治领袖爱国事迹的官方史学家的专属领域，但突然之间，这个领域变成了战场，反对上述思想和政治观点的人希望找出，“改革”的进程是什么时候受到这

些反领袖的阻挠，变成现代日本的“专制主义”的。

多年以来，历史学家们认为，对任何比“近代”（日本对德川时代的称呼）更近的事情进行研究都是自贬身价。那时，只有官方机构和家族赞助的委员会才忙着王政复古的研究。随之而来的解释，必然将笔墨主要放在那些努力为德川幕府纠错的人的功绩上。由明治时期的政治家或者政府本身出资编纂的那些书籍不太可能在详细介绍主人公的活动时，提出这些行为代表了活动者本人或者其阶级的利益。事实上，文部省在主持编写那部6卷的书（《维新史》，东京，1939—1941）时，萨摩、长州、土佐和肥前均有代表在编委会，以保证所有人都将获得应有的赞美和表扬。尽管如此，这本书的索引详细，编写认真，一直都是研究该动荡年代的编年史和故事的重要资料。尾佐竹猛的不朽巨著《明治维新》（东京，4卷，1942—1949）更加详细。该书是这位明治时代的先锋历史学家的最后一部著作。他毕生都在阅读那些已发表和未发表的资料，从而让这本书很有价值。《明治维新》和《维新史》一起，建立了一个后人可以依赖且不必重做的叙事框架。

已经开始编写，但是尚未完成的维新著作包括《维新史料》（东京，19卷，1938—1942）、《幕末外国关系史料》（33卷，东京，1910—1959）以及描写明治政府早期和镇压幕府抵抗者的《复古记》（东京，15卷，1930—1931）。

在书籍的编纂上，没有谁能够超出日本史籍协会的水平。1915至1931年间，他们一共出版了186卷的维新系列，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事件的主要参与者的文章、信件、日记、记录和统计资料。

其内容从第一批出使西方的日本人的印象（收录于《夷人入国录》，2卷，1930—1931）到长州奇兵队的资料（《奇兵队日记》，4卷，1918），还包括对德川时代末期各藩国的数据分析（《藩政一览》，2卷，1928—1960）。对此，可参见贝斯里的论文[W. G. Beasley, “Feudal Revenue in Japan at the Time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xix, 3 (1960)]。各个阵营的贵族、政治家和活动家的文章均有记录。对于本书而言，与坂本（《坂本龙马关系文书》，2卷，1926）、武市（《武市瑞山关系文书》，2卷，1916）和吉田（《吉田东洋遗稿》，1929）有关的资料则尤为重要。此外还应该提到有伊达宗城的日记（《在京日记》，1916）和松平春岳的《再梦记事》（12卷，1920—1922）。

除了这些资料，维新活动家自然得到传记作家的极大青睐，尤其是在战前。千头清臣的《坂本龙马》（东京，1914）、为了替坂本树碑立传而编写的可信度不太高的《隼杰坂本龙马》（大阪，1926），以及平尾道雄那本非常严谨的《海援队始末记》（1941）均对坂本的形象做了全面的刻画。近来，奈良的盐见薰教授一直在研究坂本的生平，有几篇文章令我受益匪浅。我在文中引用了这些文章。

中冈慎太郎的日记片段和书信没有包括在日本史籍协会的系列里面，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书籍中寻找中冈的资料：平尾道雄所写的传记《陆援队始末记》（东京，1942）、尾崎卓尔的可信度不高但却摘录了中冈日记的《中冈慎太郎》（东京，1926），以及收录了中冈的书信并对政治形势做了分析的平尾的《维新勤王遗文选书：坂本龙马、中冈慎太郎》（东京，1943）。

至于大量其他维新活动家的传记资料，只需以高梨光司编写的《维新史籍解题：传记篇》（东京，1935）作为指南就足够了。高梨列了几千个条目，并为每个条目配上了重要的注解，涵盖了1934年之前出版的所有作品。对所有打算认真研究维新人物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很关键的出发点，因为1935年以后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传记面世。这其中有一本《五代友厚秘史》（大阪，1960，395页）特别有意思，是由为纪念五代友厚逝世75周年而成立的一个协会编纂的。事实上，每个重要的维新人物至少有一系列描写自己的优秀传记，其中自然都有些偏袒自己的主人公，但是我们一般可以通过对照同时期其他重要人物的传记避免这一点。例如，当我们读到，1870年，每个重要人物都认为必须停止封建分裂的状态时，就会发现这并非是单独某个人的灵光一现（作者通常会这么写），而是对日本政府在强大高效的西方面前狼狈不堪之时的一种广泛共识。多亏了这些资料，近几年维新政治家开始成为美国大学博士论文的合适题目。随着材料的不断增加，西方学者借鉴和参考的机会也增多了。罗杰·哈克特（Roger F. Hackett）的《山县有朋》已经列入“哈佛历史专著”的出版计划。此外，还应该提到有以下几种：Cecil E. Cody, “Itagaki Taisuke (1837-1919), a Leader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Meiji Japa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5)、Sydney D. Brown, “Kido Takayoshi and the Meiji Restora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1835-1877”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52)、Joyce Lebra, “Japan’s First Modern Popular Statesman: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Career of Okuma Shigenobu(1838-1922)” (Raadcliffe, 1958)。

迄今为止介绍的维新史料大部分均为文献汇编、年谱和传记研究。总体而言，因为分析的主流已经转向了1930年代初与日本的军国主义和侵略有关的各种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类著作便很少面世了。这时的文献资料的构想均源于日本共产党首次在论题中完整阐述的马克思主义新框架。当前的政治决策只有在对日本的历史进程进行“科学”判断之后才能做出，因此，明治维新的地位和意义便显得至关重要。对于那些急于将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当今世界联系起来，且无意为业已获得高度赞美的政治家锦上添花的学者而言，这种分析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久，年轻的学者便对那些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学者所做的细致工作嗤之以鼻，称之为“罗列”历史。对他们来说，问题在于明治维新是否代表着胜利，是否只是朝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前进了一步。如果是前者，那么社会主义可能就在前方，如果不是，那么斗争将会更长，方法也将不同。这种学说由于受到保守的日本政府的反对而显得高贵无比，而日本历史学家就日本资本主义本质的笔墨之争，几乎与那种资本主义在中国追逐时造成的血流成河不相上下。后者用善辩者的话说，那是帝国扩张不可避免的道路。关于日本的帝国主义本质的历史书动辄好几卷。对于许多参与者来说，问题只在于下好定义，使日本的经验得以归入预先的种类，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个问题则要严肃得多。虽然视野不宽，但他们还是写出了一些相当重要的文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股浪潮持续向前发展，作品一度比以前更多，因为历史学家仍然不知道自己的社会是何时错过了进步之路，以及为何会错过。保险地说，很少有社会像日本这样，对自己

刚刚过去的历史如此不满。人们徒劳地寻找早期作家对明治领导人那种溢美之词。作为学术成果的反映，1950年代，公立学校的教科书成了撰写者与保守派之间斗争的主战场，后者认为前者不爱国，而且煽动性很强。

也许这种新潮流下最杰出的作品，同时也毫无疑问是维新最重要、最发人深省的概括性著作当属远山茂树的《明治维新》（东京，1951）。当时正值社会上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分析的高潮，这本书正是以此为基础写成的。它以二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背景，对维新做了适宜而节制的分析。

近来的迹象显示，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争论开始减弱了。局面再次与当前的政治联系起来。选举的失利，使“进步”力量开始认真地反思自己过于沉迷教条和理论，而脱离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结果，为了再次与读者沟通，历史学家纷纷回归历史材料，尤其是人物本身。因此，他们做了一些新的尝试，通过推论将19世纪反抗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与反抗美军基地的斗争比较，从而重新与明治时期的一些维新领袖建立了联系。正是在这种趋势下，吉川弘文馆才雄心勃勃地出版了一系列幕末和明治时期维新领袖的短篇传记。而井上清的《坂本龙马传记》则尚未面世。

外交政策对维新政治的巨大影响，曾是战前日本历史学家着重强调的对象，但是，它们的受重视程度，在马克思主义者寻找和鉴别国内矛盾期间却大大降低了。贝斯里给自己那本《日本外交政策文件选编（1853—1868）》[*Select Document on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53-1868* (London, 1955)]写的权威性序言，就是分析维新

时期内外政策之间相互影响的最好文章。他在目录部分列出了大量的日语著作。不过，其中漏了两条最重要的条目，分别是石井孝的《幕末贸易史的研究》（东京，1944）和《明治维新的国际性环境》（东京，1957）。我大量参考的后面这本书，改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重新解释史料，认为维新时期是国际帝国资本主义与日本的本土“专制主义”联合，试图阻止日本资产阶级的真正发展，因为后者的竞争将威胁到欧洲的制造业。这种观点本身并不是特别新鲜，但是该书提供了大量德川时代末期的详细资料，尤其是法国的政策，并包括以前从未发现的萨道义对英国政策的阐述。荷兰人的文献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尤其是关于日本开国的《荷兰努力为日本连接世界贸易》[*Neerlands Streven tot Openstelling van Japan voor den Wereldhandel* (Amsterdam, 1867)]。我在早期研究蕃书调所，即德川幕府对迫切吸收更多西方知识的反应时也曾利用了《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中的资料[“New Materials for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Nineteenth Century Japa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0, pp. 3-4, 1957)]。

区域史和地方志：土佐

我在写这本书时，大量借鉴了近期出版的土佐历史著作。我想，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注意到日本地方历史学家提供的详细资料，因此简略地介绍一下土佐的史籍编纂趋势是有用的。

土佐的地方志并不是近来才出现的。《土佐史谈》可能是日本

所有地方志中办得最好的一种期刊。这本杂志创办于1917年，迄今为止已经出了99期，杂志的内容既包括大量的分析和记叙性文章，同时又像许多地方志一样，充满对当地人虔诚和尚古风气的点滴描述。在那些经常投稿的人当中，小关丰吉（1877—1940）与平尾道雄（1900—1979）的作品实质的历史价值最高，在战后出版的几本书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收录了早期发表的一些重要文章。

地方志作者在描写土佐维新时肯定不遗余力。其中一部主要的作品是我们上文经常提到的、1911年由瑞山会出版的《维新土佐勤王史》。这本书有着明显的偏见，奉乡土和庄屋等“下级武士”为英雄，但是它对幕末维新时期的叙述非常有用，许多事情的描写比其他书籍都要全面。我还参考了田中光显的传记（《青山余影》，1924），作者在高知县佐川町收藏的维新资料包括大量各式各样的图片、文稿、书信以及其他的志士纪念品。佐佐木高行那本讲述勤王运动秘闻的回忆录《勤王秘史：佐佐木老侯昔日谈》（东京，1915）不仅非常有用，而且很有意思。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保存有一本佐佐木的日记。

县政府和私人机构同样提供了重要的地方文献资料。其中最重要的当属《高知县史要》（大阪，1924）。这本书非常有用，不仅涵盖了大量丰富的史料，还附有一份德川时代的元禄法典，是研究山内家族统治下土佐的行政和官僚制度最好的材料之一。高知市政府最近出版的《高知市史》（1958）同样很有价值，其内容大部分由平尾道雄撰写完成。这本书包括的不仅仅是高知市的历史，其第一本（目前只出版了一卷）记录了大量的土佐历史，增加了许多新的

材料（例如在高知市定居的乡士），并一直写到明治初期。1949 年出版的两卷《高知县史》价值没这么高，但也可参考。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高知县的历史》。这本书在 1956 年于高知出版，编写者是平尾道雄、川村源七、关田英里和横川末吉，某种程度上是为初中学生编写的。

这种用当前历史观重新解读之前材料的尝试，以及保存、利用那些历经二战战火而遗留下来的文献的热忱，都使社会史和经济史受益良多。早稻田大学的人交好脩教授最近收集，并在某种程度上重写了自己多年来发表于早稻田大学期刊上的题为《德川幕藩制解体过程的研究》（东京，1957）的多篇论文。他对乡士制度及其与商人之间关系的解释对本书贡献尤大。池田敬正是一名年轻的学者，精通土佐历史和文献，特别是《宪章簿》。他发表了几篇文章，上文已经引用过。毫无疑问，我们以后将会经常听到他的名字。

《近世村落自治史料集》系列收藏了许多文献资料，其中的第二卷《土佐国地方史料》（东京，1956）包含大量的法典、乡士条例、请愿书和陈情书，其中有些已经在上述的各章节中引用过。旨在重现 16 世纪末地籍调查的《长宗我部地检帐》上文已经提过，迄今为止已经出了 5 卷。长宗我部元亲百条（1597）也成了学者感兴趣的研究对象。（法官）井上和夫注释的《长宗我部掟书研究》（高知，1955）提供了钻研那个时期和文献的权威出发点，是进行政治和社会分析的最佳资料。井上法官早期的重要著作《藩法、幕府法和维新法》（3 卷，1940）尽管非常罕见（令人遗憾的是，它们几乎全部毁于战火），但是对于感兴趣者而言却是必不可少的一本书。他的

第一手资料大多来自土佐。

近几年，高知市图书馆出版了大量有关高知县的小书。有些是简单的村郡地名索引，有些则主要讲述历史题材。后者大多都是平尾道雄所写。他在山内档案馆工作时收集到的资料大部分已经遗失，现在正竭力整理遗留下来的部分。这些延伸性文章大部分包含论述和对大量出现的文献资料的注释，内容覆盖了德川时代土佐藩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财政（《高知藩财政史》，1953，122页）、农民起义（《土佐藩农民一揆史考》，1953，151页）、渔业（《土佐藩渔业经济史》，1955，227页）、木材（《土佐藩林业经济史》，1956，230页）、工业（《土佐藩工业经济史》，1957，255页）、农业（《土佐藩农业经济史》，1958，261页）、维新时期的经济企业（《维新经济史研究》，1959，218页），以及关于商业的系列最后一本的《土佐藩商业经济史》（高知，1960）。松好贞夫早期的文章《土佐藩经济史研究》（东京，1930）和《新田的研究》（东京，1936）也可以归入到这一类。虽然官方的资料库已经失去，但是土佐藩的历史学家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对那些逃过战火的资料进行收集和校勘，对史学界来说，这可能是因祸得福。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几部正在撰写或者正在付印的作品也吸收了土佐非常明显的对地方史的兴趣。阿尔伯特·克雷格（Albert Craig）即将面世的《明治维新中的长州》（*Choshu in the Meiji Restor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在描写长州藩的维新背景时，就借鉴了近年来的二手资料和那本必备的《防长回天史》。约翰·霍尔（John W. Hall）多年致力于研究冈山藩的制度，在密歇根大学与

谷口澄夫等当地历史学家展开了密切的合作，将充分利用《防长回天史》这本现存的伟大文献，为我们绘制出一幅德川时代地方官僚制度的权威图片。至于土佐，我正从上述作品中收集相关的资料和注释，并将试着描绘其制度的运行方式，特别是这个范本一样的、等级森严而又停滞不前的社会是如何变得紧张起来的。按照小泉八云的说法，“社会状况往往使人无忧无虑……无须竭尽全力——无须竭尽所能。而且，没有什么值得努力争取的东西。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值得争夺的目标”。小泉八云笔下的德川时代田园诗般的生活，在坂本龙马看来，就像一个集中营。而且我怀疑，他的祖先在从酒商转变为乡士的过程中，对这种田园式生活的看法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主要人物的生平简介

阿部正弘（1819—1857），谱代大名，1837—1857年任福山藩藩主（10万石），1843—1857年担任幕府老中。佩里来使期间，阿部曾征求各大名的意见，并亲自咨询了主要的大名。

安藤信正（1820—1871），谱代大名，1847—1862年任磐城平藩主（5万石），1860—1862出任幕府老中，1862年遇刺，但逃过一劫。

姊小路公知（1839—1863），公家，祖先可追溯到1334年后醍醐天皇建武新政时的重要人物。姊小路公知同情勤王派公卿，1862年与三条一起，在土佐藩大名的护卫下出使江户，返回京都后遭到暗杀。

长宗我部元亲（1539—1599），武士首领，16世纪时任土佐藩大名；**长宗我部盛亲**（1575—1615），家族最后一代，1600年关原之战后被德川家康剥夺了藩国，1615年重整旗鼓，加入了丰臣秀赖一方，参加了大阪之战，战败后被斩首。许多土佐乡士和庄屋的祖先都是长宗我部的家臣，因此也给自己找到了反对德川家族和山内家族的合法理由。

伊达宗城（1818—1892），1844—1858年任宇和岛藩藩主（10万石），外样大名，退任后成为京都举足轻重的大名。维新后多次担任外交及内政上的重要职位。

福冈孝弟（1835—1919），土佐藩士，以吉田东洋的弟子身份入仕，很快得到提拔。1867年，与后藤象二郎一起到京都劝将军辞职。之后在新政府多个部门任职。1868年起草《五条誓文》，之后主持法律和教育改革事务，贵族院议员，1884年华族令颁布后，受封子爵。

福泽谕吉（1834—1901），九州藩士，19世纪日本杰出的西学传播者。他是大阪绪方洪庵的学生，在江户创办了庆应大学，多次陪同德川幕府的使团出使西方，并将在西方的见闻写成《西洋事情》一书，对维新人物有极大的影响力。

托马斯·格洛弗（1841—1911），长崎格洛弗商行主要合伙人，为希望获取西方经验、信息和武器的西南大名代表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伊藤、井上、五代等许多人都在他的帮助下偷渡到国外，后来在伊藤的一手促成下，明治天皇向格洛弗颁发了瑞宝章。

五代友厚（1834—1885），萨摩藩士，被藩政府派往长崎学习，曾到上海购买蒸汽轮船，并前往英国旅行和学习，在萨摩藩引进西方技术和武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维新后曾在政府多个部门任职，后来成为私人企业家。去世前，产业已经涉及采矿、纺织和运输等多个领域。

后藤象二郎（1838—1897），土佐藩士，吉田东洋的弟子，幕末土佐藩政坛的首要人物。曾在上海和长崎待过一段时间，在长崎

时曾帮助过坂本龙马。他看到将军主动辞职对土佐大有好处，于是说服山内容堂向将军提出建议。在明治政府任职一段时间后，1873年，由于在出兵朝鲜的辩论中落败，与板垣一起辞职，后来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军人物。1882年与板垣一起到欧洲游历。回来后几次出任内阁成员。与此同时，后藤投资了数不清的商业和工业企业。

原市之进（忠成）（1830—1867），水户藩士，最后一任将军的家臣，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1867年被攘夷派狂热分子杀害。

土方久元（1833—1918），土佐乡士之子，曾在江户向佐藤一斋等人学习数年，之后成为坚定的勤王党。土方是公卿三条实美的追随者，跟随他从三田尻到太宰府，并通过自己在萨摩、长州和土佐藩的朋友，竭力支持勤王事业。维新后曾在新政府的多个部门任职，并一度出任农商务大臣。他的大部分职位都在宫内省的管辖之下，1887年更是出任宫内大臣。华族令颁布后，被封为伯爵。

平井收次郎（隈山）（1833—1863），高知勤王党人，武市勤王党重要的组织者和策划者。1862年底，武市随姊小路、三条出使江户期间，平井留在京都，维持与其他藩国和公卿之间的联系。使团回来后，平井与其他人一起，从一名京都公卿那里拿到了政治改革的许可令，随后返回高知。这一行为被认为是对封建上级的大不敬，待容堂返回高知后，平井被勒令自杀。

平井善之丞（1803—1865），土佐藩士（马回），参加了武市的勤王运动，在吉田东洋遇害后的藩政府人事调整中得到重用。容堂回来后，他虽然没有受到审判和惩罚，但是失去了原来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土佐再次加入勤王运动的阵营前夕逝世。

平野国臣（1828—1864），福岡藩士，积极地参与和策划勤王运动，在生野之变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随后与其他 37 名追随者一起被处死。

弘濑健太（1836—1863），土佐勤王党，武市的早期追随者，1862 年帮助安排武市跟随年轻的大名山内丰范前往京都。跟随姊小路、三条使团出使江户，后来返回土佐，希望担负起重整藩政的责任，结果却成为容堂清洗勤王党的牺牲品。

一桥庆喜（德川庆喜）（1837—1913），最后一任将军。德川齐昭之子，过继一桥家，1847—1859 年，以及担任将军的 1862—1867 年，继承了一桥家的家主（10 万石）。华族令颁布后，被封为公爵。

井伊直弼（1815—1860），1850—1860 年任彦根藩藩主（35 万石），谱代大名，1858 年 6 月起担任大老，1860 年 3 月遭暗杀。他主持的“安政大狱”极大地打击了许多重要的大名，激起了其家臣的倒幕决心。

池内藏太（定胜）（1841—1866），土佐藩士之子，在江户学习期间参加了勤王运动。1863 年从土佐逃到长州，加入长州军，参加了京都、大和（与吉村寅太郎一起）之战，并与长州军队一起抵抗外国舰队的进攻，虽然最终失败。后来加入了坂本的海援队，并在一次沉船事故中丧生。

井上馨（闻多）（1835—1915），长州勤王派，明治政府官员，吉田松阴的学生。曾在格洛弗的帮助下留学英国，大力促成了萨长联盟，后在明治政府的多个部门任职，被封为侯爵。井上努力推动

资本主义的发展（任三井财阀的顾问）以及为日本谋求外交上的平等权。

板垣（乾）退助（1837—1919），土佐藩士（马回），以吉田东洋的弟子身份首次出仕。维新前夕重组了土佐军队，并带领他们参加倒幕战争。接着领导土佐改革了等级制度。其后他加入了明治政府，但是在出兵朝鲜的辩论中落败，于是愤而退出，继而成为呼吁成立议会制政府的民权运动领袖。

伊藤博文（俊辅）（1841—1909），长州勤王派，明治政府官员，与井上馨私交甚笃，政见也相同；明治政府的首脑和明治宪法之父。

伊藤助大夫（生卒年月不详），下关商人，坂本曾几次写信给他。他显然资助过勤王派密使。

岩仓具视（1825—1883），京都公家，支持公主和宫下嫁德川家茂。勤王运动期间为了自身的安全考虑，选择被放逐。幕末最后一年东山再起，成为萨摩藩维新领袖与宫廷之间的主要联络人。维新后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要人物。以 1872—1873 年率领使团访欧而广为人知。被封为公爵。

岩崎弥太郎（1834—1885），土佐藩下级武士，吉田东洋的弟子，在财政部任职，一路获得晋升。德川时代末期，担任土佐藩长崎和大阪商会的负责人，成功获得了藩政府投资项目的所有权，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明治时期日本最大财团的三菱商会。

岩下方平（1827—1900），萨摩藩士，1866 年被派往法国，在那里向萨摩藩报告幕府和法国之间的关系。在明治政府的多个行政部门任职，例如京都府知事。被封为子爵，贵族院议员。

鹿持雅澄（1791—1858），教授国学和诗歌的土佐学者，有大量的追随者。武市瑞山的姑父，学生中许多身居高位，例如佐佐木高行。

片冈健吉（1843—1903），土佐藩士（马回），德川时代末期担任板垣的副官，在军队中一路晋升，并在倒幕战争期间追随板垣。从欧洲游历回来之后，于1873年与板垣一起退出政府。之后积极投身倡导成立议会制政府的自由民权运动、基督教（片冈也成为基督教徒）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运动。

胜麟太郎（安房、海舟）（1823—1899），德川家旗本之子，受过西学教育，被派往长崎接受荷兰海军小分队的训导，成为德川幕府的海军奉行，在职期间收留坂本并将其招致麾下。胜是庆喜的顾问之一，反对不顾一切地抵抗倒幕军队，与西乡一起促成了江户无血开城，后担任新政府的顾问，并在海军多个部门任职，成绩斐然。

木户孝允（桂小五郎）（1833—1877），长州勤王派领袖，与西乡和大久保一起参加了萨长联盟的谈判。之后在新政府颁布《五条誓文》和废除封建制等一系列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72—1873年随岩仓出使欧洲，1874年因反对台湾出兵愤而辞职，病逝于西南战争期间。

小松清廉（带刀）（1835—1870），萨摩藩家老，与大久保和西乡紧密合作，促成了萨长联盟的成立和德川幕府的垮台。志士中级别最高的人之一，明治政府的高级领导，但因疾病而很早去世。

孝明天皇（1831—1867），1846年继位。

小南五郎右卫门（1812—1882），土佐藩官员，在马渊嘉平以

及后来吉田东洋实施的天保改革期间崭露头角。1861—1863年，与平井善之丞一起，成为少数几位支持武市勤王运动的高级武士，结果在容堂镇压时，被剥夺了职位和姓氏。明治时期职位和荣誉得到恢复，曾在高知和国家的多个行政部门任职，直至1877年退隐。

近藤长次郎（昶）（1838—1866），土佐商人之子，在江户居住期间表现出了过人的学习天赋，尤其是西学方面，因此，藩政府准许其佩刀和使用姓氏，同时提供薪俸希望其能为国效劳。但他选择了进胜的神户海军操练所学习，之后成为坂本海援队的一员。在长崎时，他为长州藩购买“联合”号提供了很大帮助，以至于伊藤博文向自己的藩主建议，安排上杉宗次郎（他当时的名字）到海外留学以资奖励。但是，海援队的同事听说他和伊藤以及格洛弗的谈话之后，指责其追求自我利益，导致其自杀。

栗本锄云（1822—1897），出生于医生世家、受过医学和西学教育的德川幕府的外国事务专家，职位擢升之后，执行了一些外交任务，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出使法国。在法国期间幕府被推翻，回国后成为报人，对明治时期几份重要报纸的创立和导向均有重要的影响。

黑田清隆（1840—1900），萨摩藩的西方枪炮射击学专家，在幕末与长州藩的军事和外交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出任新政府的许多重要职位，1888年出任首相。

久坂玄瑞（1840—1864），长州勤王派，吉田松阴的学生，与1860年代初武市瑞山的勤王运动有密切联系。他说服了藩主采取全面的攘夷政策，组织攻击了英国公使馆人员，支持炮轰下关海峡的

外国船只以及 1864 年入侵京都的行动，在行动失败后自杀。

马渊嘉平（1793—1839），剑术家，“心学”学者，土佐藩天保改革期间曾受到重用，但是很快便因思想原因受到指责和罢黜。他在任期间吉田东洋首次崭露头角。

松平容保（1836—1893），德川家族的旁系，1852—1869 年任会津藩藩主（23 万石），1862—1864 年、1864—1868 年任京都守护职，成立了对付浪人的新选组。倒幕战争期间，他所在的若松城坚决抵抗土佐军队的进攻。新政府惩罚了容保的首席家臣，但是对容保却相对仁慈，只是没让他再担任重要官职。

松平春岳（庆永）（1828—1890），德川家族的旁系，1838—1858 年担任福井藩藩主（32 万石）。1857—1858 年为推举庆喜为将军而积极奔走，1862—1864 年出任幕府政事总裁，是公武合体派的领军人物之一。明治初期曾在政府各个部门任职，并受到天皇的嘉奖。

松木弘庵（寺岛宗则）（1832—1893），萨摩藩的西学者，1861 年和 1862 年随使团初次访欧。与五代一起，被炮轰鹿儿岛的英军抓获，但随后解决了争端。后来前往英国留学，此后担任幕府的开成所教授等。维新后改名寺岛宗则，成为新政府的高官，在外交、教育、立法和宫内等多个部门任职。

松冈毅轩（1814—1877），土佐藩政府的汉学家，在吉田东洋手下崭露头角，并将后者编纂的《海南政典》翻译成汉文。他起草了敦促将军辞职的请愿书，后来又继续在新政府的多个部门任职，研究与教育和立宪有关的问题。

间崎沧浪（哲马）（1834—1863），土佐勤王党的理论家，出生

于幡多郡一个偏远地区。在江户学习后，成为精通古典文学的学者，返回土佐后名声大噪，有大批追随者。作为武市勤王运动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与弘濂、平井一起获得了在土佐藩进行行政改革的“宫廷”许可令，容堂返回土佐后，间崎因上述的鲁莽行为而被勒令自杀。

三吉慎藏（生卒年月不详），长州藩士，1866 年与坂本一起在寺田屋遇袭，之后两人成为朋友，并经常通信。

蒙布朗伯爵，1841 年被比利时国王授予英厄尔蒙斯特男爵的称号。为幕末游历欧洲的许多日本人所熟悉，与萨摩藩代表签订了贸易协议，维新时期访问过日本，1868 年在寺岛的请求下，起草了首份外国代表声明（见“松木”条）。

陆奥宗光（阳之助，伊达小二郎）（1844—1897），纪伊藩士。离开（德川家族的）藩国，前往京都加入志士的行列。加入了胜创办的神户海军操练所和坂本的海援队。在新政府的多个部门任职，以卓越的外交才能而为人所知，担任外务大臣期间修改了不平等条约并发动了对华战争，职业生涯达到顶峰。

永井尚志（1816—1891），德川家族的旁系（三河奥殿藩）大名的幼子，被旗本家收养。后来成为一名海军训练专家，在长崎的荷兰海军小分队受训，被幕府提拔，最后成为庆喜手下的若年寄，参加了幕军在北海道抵抗政府军的战斗，之后获得新政府的原谅，并在议会和元老院任职。

长井雅乐（1819—1863），长州藩官员，1862 年，为实现以长州藩藩主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计划而积极奔走，但宫廷更青睐萨摩藩提出的计划，减弱对他，进而对长州的支持。为了重新夺回在宫廷

中超越萨摩的主导权，长州藩采取了勤王和攘夷方针，长井被迫为自己的失败而剖腹自杀。

中江兆民（1847—1901），土佐下级武士之子，被藩国派往长崎学习西学，期间专攻法语。后来到江户学习，曾短暂担任过罗修斯的翻译，维新后在东京教授法语。在政府部门工作和在法国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投身自由民权运动，因拥护法国政治哲学、无神论和唯物主义而为人所知。

中滨万次郎（1827—1898），土佐渔民，1841年被美国船只救起后带往马萨诸塞州，并在那里接受教育（名为“约翰·蒙”）。之后参加过捕鲸船和加州淘金热，有了一定积蓄之后，于1851年说服捕鲸人将其送到琉球。回国后曾在萨摩、土佐、幕府和早期的明治政府任职，担任西方顾问、翻译、捕鲸指导和教师。

长冈谦吉（恂）（1834—1872），土佐人，曾在江户和长崎学习医学。在长崎时受到坂本的影响，加入海援队，担任坂本的秘书。除了参与制定《船中八策》，还写了一篇著名的讨伐基督教的文章（写于浦上基督徒被发现之后）。之后参加了维新战争。

中冈慎太郎（1838—1867），土佐庄屋，勤王派领导。遭容堂压制时逃离了土佐，与坂本一起促成了萨长联盟，成立了海援队，最后一起遇害。

中山忠能（1809—1888），宫廷公卿，反对幕府与西方签订早期条约的主要人物。明治天皇的外祖父，和岩仓同为宫廷方面为萨摩维新领袖的倒幕计划提供方便的关键人物。

那须信吾（1829—1863），土佐乡土的养子，与武市一同创立

了勤王党。1862 年杀害吉田东洋的三名刺客之一。后来逃离土佐，投靠久坂玄瑞和萨摩藩的朋友。1863 年参加吉村寅太郎领导的大和起义。之后在护送京都公卿中山忠光途中被杀。

野中谦山（1615—1663），土佐官员，在学术、经济和政治上实施的一系列措施使土佐跻身强藩之列。他开始招募乡士，通过创立官办垄断企业增加藩国的收入，资助并鼓励学者学习山崎闇斋和谷秦山一派的儒家学说。

小笠原长行（1822—1891），德川幕府官员（唐津藩大名之子），老中（1865—1868），第二次长州征讨的指挥官，征讨结束后被短暂解职。维新后参加幕军在北海道背水一战，之后退隐。

小笠原唯八（牧野茂敬）（1829—1868），土佐官员，勤王运动初期容堂最信任的家臣之一，曾充当容堂的密使，帮助他阻止下级志士的暴动，并指挥镇压了野根山事件的示威者。后来因深信必须倒幕，一度被剥夺了等级和职位。此后参加了维新战争（以牧野茂敬之名），并在围攻若松城的战役中牺牲。

小栗忠顺（1827—1868），幕府奉行之子，幕末飞速晋升。他随第一批使团访美，曾担任江户町奉行、勘定奉行和海军奉行。大力主张全面接受法国援助，维新战争期间被天皇军抓捕并杀害。

大久保一翁（1817—1888），幕府最后十年最重要且最有远见的官员之一。曾担任蕃书调所头取、幕府海防挂、京都町奉行、外国奉行，极力劝说庆喜辞职。维新后一直为维护德川家族在静岡的利益而努力，被新政府任命为东京府知事，并担任元老院议员。受封子爵。

大久保利通（一藏）（1830—1878），萨摩藩的维新领袖，去世前一直是明治政府的重要成员。岛津久光的主要谋臣，与岩仓具视进行了密切的合作。明治最初十年平定了江藤（佐贺）和西乡（萨摩）的叛乱，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1878年遇刺身亡。

巴夏礼（Harry Parkes，1828—1885），英国资深的外交官员，15岁即到中国，之后在中国所有开放的重要港口担任翻译和领事，1865年被任命为驻日公使，1883年被调往中国。

罗修斯（Leon Roches，1809—1901），1864年抵达日本，任法国驻日公使。通过向德川幕府提供贷款以及技术、军事援助等政策，积极为法国谋取贸易和政治上的优先权。在他的影响下，幕府的陆军训练与外语学校的教学均变成以法国为导向，而像小栗这样的幕府政治家则准备完全依赖法国。他未预料到幕府会垮台，随着拿破仑三世的失败，其任期也结束了。

西乡隆盛（1828—1877），萨摩藩的倒幕运动领袖，军事专家。1873年离开明治政府，1877年领导反政府武装叛乱，后失败。

坂本龙马（1835—1867），土佐勤王党人，武市瑞山的追随者，后来追随胜麟太郎。成立了海援队，促成了萨长联盟。制定了协调各方利益的《船中八策》。

佐久间象山（1811—1864），松代藩士，因主张开国，利用西方的技术加强国力而为人熟知。吉田松阴等许多人均为他的学生，许多藩国希望将其招致麾下。被攘夷派的狂热分子刺杀于京都。

三条实美（1837—1891），三条实万（1802—1859）之子。他是与土佐大名有姻亲关系的宫廷公卿，强烈支持攘夷，因此在土佐

志士中有很高的威望。1862 年与姊小路一起出使江户，下达攘夷命令，1863 年，宫中职位得到擢升。长州军队被驱逐后，他被迫离开京都，之后与其他落难公卿一起居住在三田尻和太宰府，由土佐和其他地方的浪人护卫。维新后在多个重要部门任职，包括短期担任首相。被封为公爵。

佐佐木高行（三四郎）（1830—1910），土佐藩士（马回），同情勤王党但是并没有参加武市的勤王运动。幕末时期地位变得重要起来，是土佐藩长崎商会的负责人，曾在明治政府的几个部门任职，1872 年随岩仓使团访问外国。虽然他对明治政府的许多政策感到不满，但却不赞同板垣的自由民权运动，一度和土方一起负责监督和镇压土佐的民权运动。后任枢密院顾问，获封侯爵。

欧内斯特·梅森·萨道义爵士（1843—1929），巴夏礼的翻译，被许多维新志士所熟悉。后来担任日本公使。

岛津 萨摩藩（鹿儿岛）贵族、德川幕府统治下的外样大名：

久光（三郎）（1817—1887），在儿子忠义继承齐彬的藩主之位后，担任摄政，是 1859—1868 年萨摩藩的实际统治者。

齐彬（1809—1858），1851—1858 年任萨摩藩大名（77 万石），因能力出众而广受尊敬，死前极力促成庆喜成为将军的继嗣。

忠义（茂久）（1840—1897），久光之子，被齐彬领养并成为继嗣。1859—1868 年担任名义上的大名，曾被新政府任命为鹿儿岛知事。获封公爵。

白石正一郎（1811—1880），专门从事水上贸易的下关商人，与萨摩藩有贸易往来，积极为志士提供食物、金钱和住处，有“侠商”

之称。长州藩主将其擢升为武士以示嘉奖。

周布政之助（1823—1864），长州官员，1862 年负责推动长州藩的政策从公武合体转为攘夷，之后成为藩国政策的主要代言人。第一次长州征讨期间，因看到自己的政策失败导致了巨大灾难而自杀。

高杉晋作（1839—1867），长州勤王派，吉田松阴的学生，民兵队（奇兵队等）的组织者。到过上海，1865 年组织军队战胜了长州藩的保守派，1866 年战胜了幕府，维新前夕因病去世。

武市瑞山（半平太）（1829—1865），土佐乡士，土佐勤王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因精湛的剑术而为人所知，与萨摩藩和长州藩密谋成立三藩联盟，1862 年一手策划并杀害吉田东洋。短暂获得领导权之后，由于容堂的回国而受到限制，因行为与身份严重不符而被勒令自杀。

田中光显（1843—1939），逃到长州藩的土佐浪人，协助中冈慎太郎创办陆援队，后来在新政府的陆军省任职（陆军少将），曾出国考察，并担任贵族院议员。担任十一年的宫内相。获封伯爵。其建造的关于维新资料的藏书楼“青山文库”位于土佐的佐川町。

谷干城（1837—1911），土佐藩士，虽然赞同武市的观点，但是并没有公开参加勤王运动。在江户学习过几段时间后精通古典文学和军事理论，在幕末的军事训练和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明治时期他继续在军中服役，尤其是在西南战争期间，鼓吹“日本主义”和对天皇的崇拜，反对寡头政治和板垣的支持者。获封子爵。

德川家族的将军及其家族成员：

家齐（1773—1841），第 11 任将军（1787—1837），在他漫长的任期结束后，日本迎来了天保改革。

家定（1824—1858），第 13 任将军（1853—1858），懦弱无能，希望由一位成熟而能干的人出任将军，从而燃起了庆喜支持者的希望。

家茂（1846—1866），第 14 任将军（1858—1866），击败庆喜后登上将军之位。

齐昭（1800—1860），水户藩藩主（1829—1844），强硬的攘夷派，主张以武力对抗外国人。他首先开创了到京都游说，寻求宫廷支持的潮流。

昭武（1853—1910），齐昭的第 18 子，水户藩藩主，1867 年以将军代表的身份被派往巴黎参加万国博览会。维新后回到日本。1877 年到法国留学。

庆喜：参考一桥庆喜的条目。

上杉宗次郎，请参考近藤长次郎的条目。

山县有朋（1838—1922），长州藩的勤王派，军事领袖，继承高杉晋作的指挥权，策划了最后的倒幕行动。与伊藤同为明治政府最重要的成员。现代陆军和军制的奠基人。首相。获封公爵。

山内家族，土佐藩贵族，外样大名（20.26 万石）：

一丰（1600—1606 任大名），家族的创立者，从德川家康手中接受了土佐藩的封地。

丰范（1859—1871 任大名），1886 年逝世。容堂被迫隐居后，

他成为土佐藩名义上的统治者，受容堂或其他亲戚的控制。

丰信（容堂）（1848—1859 任大名），1872 年逝世，德川时代末期最重要的大名之一。

丰资（1809—1843 任大名），1872 年逝世。通过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政策，始终致力于加强保守派和既得集团的利益。

横井小楠（1809—1869），熊本藩士，被福井藩的松平春岳聘用。主张开国，成立议会以达成一致意见。在为新政府策划成立议会期间，为保守派所杀。

吉村寅太郎（1837—1863），土佐庄屋，逃离藩国，投身勤王运动的大潮。1863 年领导了大和起义，失败后自杀。

吉田东洋（元吉）（1816—1862），最受山内容堂信任的大臣，板垣、后藤、福冈、岩崎等人的靠山。为了实现现代化而加强了藩国对土佐产品的控制权。井伊直弼大清洗期间主张谨慎行事，不愿藩主有生命危险。1862 年，因疏远武士而被勤王党刺杀。

由利公正（1829—1909），福井藩士（原名三冈八郎）。佩里抵达后，积极主张实现现代化。许多志士知道他是松平春岳的谋士，在坂本心目中有很高的地位。参与了 1868 年《五条誓文》的起草、货币改革和岩仓使团，担任过东京府知事和贵族院议员。获封子爵。

索引

阿部正弘, 64, 65, 66, 69, 76, 373; 简介, 471

阿部正外, 208, 228

阿尔特公司, 269, 299, 328

阿礼国, 20, 408

安倍贞任, 224

安藤信正, 125, 137; 被袭击, 138, 139; 简介, 471

安政改革, 81-84

巴黎博览会, 277, 306

巴夏礼, 230, 231, 239, 275-280, 306, 307, 310, 311, 327, 329, 337, 341, 343, 356; 简介, 482

白石正一郎, 172, 235; 简介 483

坂本龙马, 3, 28, 30, 35, 47, 57, 60, 68, 71, 73, 75, 79, 80, 85, 164, 165, 173, 175, 177, 178, 180, 197, 203, 210, 237, 238, 241, 242, 247, 288, 293, 294, 300, 316, 321, 328, 333, 335-337, 351, 370, 377, 401, 402; 家庭背景和早年岁月, 86-89; 前往江户, 91-93; 和武市一起, 96, 98, 99, 101; 103, 105, 112, 116, 120,

124, 126; 前往长州, 127; 从土佐出发去战斗, 128, 129, 172; 遇见胜海舟, 174-176; 被土佐藩免罪, 177; 在胜手下工作, 178-184; 获得萨摩保护, 197; 成立公司, 232-235; 撮合结盟, 236-238; 寺田屋遇袭, 247, 249, 250; 官方支持, 288, 289; 伊吕波丸事件, 295-299; 船中八策, 318-322; 1867 年回到高知, 348; 为新政府计划, 358-361; 《藩论》, 362-364; 遇刺, 366-369; 对西方反应的几个阶段, 372-379; 简介, 482;

板仓胜静, 302, 348

板垣退助, 55, 56, 83, 163, 211, 214, 224, 265, 290, 294, 316, 320, 326, 328, 337, 349, 357, 381, 382, 416, 448; 土佐的军事改革, 266; 维新后在土佐的角色, 385, 386, 388-394, 395, 398-403; 简介, 475

本居宣长, 45, 457

本庄宗秀, 258

才谷梅太郎, 196, 286, 288

才谷屋, 87, 88, 286

参勤交代, 15, 17, 23, 30, 60, 78, 80, 83,
125, 130, 133, 134, 141, 143, 146, 192,
196, 377

长井雅乐, 127, 139, 141, 162; 简介, 479

长崎, 13, 14, 24, 27, 61, 71-74, 77, 84, 167-
169, 174, 179, 185, 187, 189, 190, 208,
214, 219, 223, 232-234, 241-243, 259,
265, 268, 275-7, 280-283, 286-291,
295-299, 312, 316, 317, 326, 327, 329-
332, 337, 338, 348, 377, 383, 385, 386,
397; 开成馆, 269, 272; 在长崎的外国
商人, 273, 274, 281;

长州, 16, 48-50, 53, 57, 63, 65, 70, 80, 82,
97, 110, 119, 124-128, 130-133, 136,
139-146, 149, 151-158, 160, 161, 162,
172, 174, 176, 184, 189, 190, 191, 193,
195, 196, 199, 200, 206-239, 241, 242,
243, 246, 251, 252, 253, 254, 255-263,
269, 270, 272, 275, 276, 279-285, 294,
296, 298, 300-303, 305, 308-310, 313-
316, 319, 320, 324, 325, 326, 330, 331;
天保改革, 55; 答复佩里, 66; 公武合
体政策, 139, 140; 炮轰外国船只, 151,
189; 进攻京都, 154, 195; 下关被轰炸,
189; 首次讨伐, 209, 210, 214-218; 高
杉的反抗, 218, 219, 220; 第二次讨伐,
227-230, 232, 236, 252-261; 和平议会,
310, 313; 萨摩盟友和支持, 237, 238;
和萨摩一起准备倒幕, 320, 331;

长宗我部元亲, 30, 35, 38, 55, 95, 371; 简
介, 471

池川纸乱, 41

池田(冈山藩大名), 229

池田屋, 153, 214

冲绳, 201

村田, 344, 345

大阪, 84, 112, 143, 148, 272, 285; 市场和
商人, 17, 22; 开港, 231

大村益次郎, 258, 380

大和起义, 153, 212, 221, 481, 486

大黑丸, 285

大久保利通, 119, 193, 197, 205, 302, 304,
311, 314, 315, 321, 345, 346, 349, 350,
389; 简介, 482

大久保一翁, 157, 167, 168, 180, 191, 194,
236, 254, 317, 377; 简介, 481

大老, 70, 79, 83, 94, 98, 99, 100, 104, 109,
113; 大老组成议会, 309

大名, 14; 谱代大名及其对佩里的态度,
63-64, 70; 对庆喜的态度, 301, 亦可见
“庆喜”条

大山纲良, 251, 257, 346

大隈重信, 298

大盐平八郎, 22, 48, 115

大义名分, 106, 107, 115, 226

大原重德, 140, 142, 314

岛津家族(萨摩大名), 16, 136, 201, 384
久光, 127, 133, 139, 140-142, 149, 151,
157, 172, 193, 194, 205, 206, 210,
213, 238, 246, 251, 262, 269, 275,
277, 301, 303, 309, 311, 312, 313,
315, 319, 320, 336, 344, 345; 1862
年前往京都; 简介, 483

齐彬, 68, 113, 167, 204, 205, 208; 简
介, 483

重豪, 47, 50, 219

忠久, 201

- 忠义, 205, 354; 简介, 483
- “倒幕”, 206
- 亨德里克·道夫, 201
- 德川幕府, 19
- 家光, 16
- 家茂, 68, 79, 137, 150, 179, 193, 204, 228, 231, 253, 260, 300, 302, 303, 304; 简介, 485
- 家齐, 47; 简介, 485
- 家定, 68; 简介, 485
- 家康, 30, 201, 321; 简介, 485
- 庆喜, 68, 69, 70, 76, 78, 79, 80, 83, 98, 137, 138, 139, 140, 141, 144, 145, 146, 150, 151, 157, 191, 192, 193, 194, 204, 206, 228, 229, 231, 239, 253, 254, 255, 261, 269, 294, 313, 314, 315, 320, 321, 324, 325, 326, 333, 335, 336, 337, 338, 340, 341, 344, 346, 347, 348, 350, 351, 352, 359, 362, 363, 377, 379, 404; 成为将军, 300-302; 改革, 305-311; 宣布辞职, 353-357; 简介, 485
- 齐昭, 48, 62, 64-68, 70, 78, 80, 94, 98, 99, 100, 109, 113, 137, 301, 303; 简介, 485
- 吉宗, 26
- 德雷克, 275
- 德鲁安·吕伊, 341
- 地割, 40
- 东久世, 235, 359
- 俄国, 7, 27, 62, 77, 225, 370
- 保罗·弗勒里·厄拉德, 280, 341
- 法比尤斯, 72
- 法国, 194, 230, 231, 239, 242, 272, 276, 279, 294, 305, 307, 308, 340, 341, 342, 343, 352, 377, 379, 383, 385, 391, 393; 完全支持幕府, 280-281
- 幡多, 36, 88
- 《藩论》, 362, 363, 364, 365, 372, 378, 392
- 菲尔莫尔总统, 64, 81
- 弗劳尔斯, 327, 427, 437
- 鸟羽伏见之战, 283, 284, 357
- 福岡藩, 65, 167, 218, 219, 229, 256, 257, 330
- 福岡(家老), 88
- 福岡孝弟, 55, 83, 125, 130, 265, 288, 290, 291, 321, 340, 356, 357, 381, 382, 391; 简介, 472
- 福泽谕吉, 26, 74, 169, 223, 231, 271; 简介, 472
- 副岛种臣, 298
- 富国强兵, 224, 241, 268
- 冈本健三郎, 175
- 冈田以藏, 111, 421
- 高村事件, 37
- 高岛秋帆, 92
- 高杉晋作, 82, 119, 213, 218, 219, 223, 224, 228, 231, 259, 344; 简介, 484
- 高松太郎, 183, 197
- 高野长英, 167
- 高知, 整体情况, 29, 30; 高知城, 34, 38, 39, 115, 116
- 托马斯·格洛弗, 234, 252, 269, 275, 276, 277, 278, 280, 284, 285; 简介, 472
- 公家, 15, 71, 111, 142, 144, 304, 374, 387
- 公武合体, 78, 104, 127, 136, 139, 140, 141, 151, 194, 206, 211, 213, 214, 241, 262, 301, 303, 309, 311; 长州版本,

- 136; 萨摩支持, 137; 容堂的尝试, 158
 沟渊广之丞, 281, 283
 古事记, 47
 谷干城, 121, 383, 384, 385, 386, 392, 396, 400, 437, 438, 449, 484
 谷秦山, 42, 43
 二条(关白), 314, 315, 348
 观光丸, 72, 73
 桂右卫门, 343
 锅岛(佐贺藩大名), 65, 167, 359
 国学, 10, 25, 60, 85, 95, 106
 哈里斯, 7, 66, 67, 69, 71, 77, 78, 82, 83, 84, 93, 94, 98, 101, 372
 荷兰商人哈特曼, 331, 348
 蛤御门事变, 154
 《海国图志》, 054, 081
 神户海军操练所, 178, 181, 182, 183, 187, 192, 233, 377
 《海南政典》, 085, 409, 439, 478
 海援队, 232, 233, 240, 241, 281, 290, 293, 295, 297, 298, 299, 312, 317, 325, 326, 327, 328, 330, 348, 349, 353, 367, 377, 378, 383; 成立, 232; 官方支持, 288; 构成, 289; 在1867年的角色, 332
 和宫, 15, 16, 22, 60, 69, 104, 124, 125, 127, 137, 138, 142, 143, 150, 152, 155, 228, 303, 346, 351, 355, 439, 475, 478
 河田小龙, 092, 093, 096
 荷兰, 16, 24, 61, 65, 71-74, 77, 156, 168, 169, 180, 201, 274, 276, 303, 307
 黑田(福冈藩大名), 65, 167, 218, 219, 229, 236
 黑田清隆, 236, 238, 257, 344; 简介, 477
 横笛丸, 327
 横井小楠, 79, 141, 181, 190, 191, 196, 317, 377, 380; 简介, 486
 横须贺, 230, 277
 后藤象二郎, 55, 83, 86, 130, 242, 264, 265, 266, 267, 269, 270, 274-276, 283, 287, 288, 290-300, 316, 318, 319, 321, 324-331, 333-338, 340, 346, 347, 349, 350, 352-359, 364, 380, 383, 388, 392, 394, 396, 398; 重回政坛, 264; 成立开成馆, 267-269; 递交容堂的请愿书, 348; 在新政府的角色, 381; 被任命为家老, 382; 简介, 472
 桦山三圆, 119
 会津藩, 141, 150, 151, 153, 154, 195, 206, 253, 266, 302, 316, 345, 348, 357, 382, 425, 478
 会泽正志斋, 62
 吉村寅太郎, 37, 56, 121, 123, 127, 128, 133, 152, 172, 173, 221; 简介, 486
 吉井友实, 217, 251
 吉田东洋, 25, 41, 53, 54, 55, 81, 82, 91, 98, 100, 101, 104, 115, 122, 123, 125, 130, 131, 132, 133, 146, 147, 149, 156, 160, 161, 162, 163, 164, 173, 242,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99, 373, 376, 381, 392, 396; 简介, 186
 吉田松阴, 63, 70, 80, 119, 157, 210, 225, 273
 急激党, 345
 棘螺组, 52, 85
 纪伊藩, 64, 68, 70, 289, 295, 296, 297, 300, 316
 祭政一致, 25, 226
 加贺藩, 201

- 加藤司书, 218
- 间崎沧浪, 116, 121, 134, 147, 149, 158, 159, 160; 简介, 478
- 见回组, 365, 366
- 剑术, 90, 96, 116, 117
- 辻将曹, 346
- 姐姐乙女, 87, 89, 172, 173, 177, 178, 183, 184, 187, 188, 232, 243, 245, 246, 251, 252, 290, 292, 293, 324, 328
- 金刀比罗宫代表大会, 384
- 津田真道, 307
- 近藤长次郎, 92, 285; 简介, 477
- 近卫, 16, 201, 308, 398
- 京都宫廷, 15, 25, 67, 110, 118, 139, 151, 152, 204, 228
- 井上馨, 216, 234, 275, 375; 简介, 474
- 井伊直弼, 4, 65, 70, 79, 80, 83, 85, 94, 98, 109, 114, 115, 116, 118, 131, 135, 138, 140, 141, 171, 174, 192, 204, 243, 303, 372, 373, 374; 简介, 486
- 久坂玄瑞, 119, 125, 127, 154, 156, 157, 216, 225, 402, 417; 简介, 477
- 久世广周, 137
- 开成馆, 267, 268, 269, 299, 327, 330, 396
- 开成所, 341, 478
- 开国, 23, 62, 63, 66, 77, 79, 92, 96, 135, 139, 174, 176, 207, 215, 216, 223, 224, 264, 290, 376
- 开明, 50, 110, 168, 179, 220, 374, 380
- 克拉伦登勋爵, 278
- 克尼夫勒公司, 269
- 堀田正睦, 66, 67, 69
- 赖山阳, 25, 130
- 兰学, 24, 26, 28, 50, 62, 92, 167, 168, 307
- 劳伦斯·奥利芬特, 278
- 立志社, 399, 400
- 栗本锄云, 280, 341; 简介, 477
- 岭南社, 399
- 琉球, 49, 207, 277, 278, 280
- 留守居组, 33, 36, 51, 146, 387
- 龙, 243, 244, 246-248, 251, 329
- 陆奥宗光, 233, 289, 332, 333, 362; 简介, 479
- 鹿持雅澄, 45, 46, 95; 简介, 475
- 鹿儿岛, 29; 被炮轰, 225, 226; 274
- 罗伯特·福德, 326
- 罗修斯, 220, 230, 279, 280, 281, 294, 305, 306, 307, 310, 340, 341, 342, 356; 简介, 482
- 马渊嘉平, 51, 52, 53, 54, 81, 132; 简介, 478
- 毛利(长州藩大名), 16, 48, 65, 136, 139, 216, 254, 255, 291, 359, 384
- 梅廉, 14, 16, 20
- 蒙布朗伯爵, 230, 277; 简介, 479
- 休·米特福德, 20, 154, 305
- 民兵队, 82, 84, 226, 228, 236, 255, 266, 344, 373
- 明治天皇, 266, 364, 370
- 莫里森, 274
- 木户孝允, 119, 176, 223, 224, 225, 235-239, 243, 251, 256, 276, 284, 286, 288, 295, 308, 347, 349, 357, 359, 365, 369, 379, 389; 简介, 476
- 幕府, 110, 118, 216, 217; 组织架构, 14-16; 1860年之后的改革, 137-141; 三条·姊小路使团, 145-146; 首次征讨长州, 208-209; 第二次征讨长州, 227,

- 252, 253, 256, 257; 和法国的关系, 230, 342; 更大的变革, 302, 305, 306, 333; 伊卡洛斯事件, 327; 对西方回应第三阶段的责任, 375
- 拿破仑三世, 200, 220, 230, 341, 343
- 南海丸, 267
- 南学, 42, 43, 46
- 楠木正成, 245, 362
- 诺曼, 394
- 佩里, 59, 61-66, 71, 73, 74, 76, 80, 82, 91, 93, 100, 167, 372, 395, 396
- 片冈健吉, 383, 385, 401; 简介, 476
- 品川弥二郎, 80, 83, 85, 91, 100, 101, 117, 126, 274, 320, 344, 345, 347
- 平井善之丞, 132; 简介, 473
- 平井收次郎, 89, 129, 133, 149, 158, 159, 160, 173; 简介, 473
- 平田笃胤, 60
- 平野国臣, 153; 简介, 473
- 奇兵队, 82, 213, 218, 255, 258, 259
- 千叶定吉, 90, 174
- 前田, 201
- 浅野(广岛藩), 229
- 桥本左内, 70, 79, 80
- 清冈道之助, 121
- 坂本权平, 87, 88, 93, 129, 172, 421
- 日本主义, 484
- 日根野弁治, 90
- 儒家和学校, 18, 22, 23, 24, 25, 27, 28, 105, 106, 109,
- 若松城, 316, 357, 382, 393
- 欧内斯特·萨道义, 207, 215, 239, 278, 279, 294, 305, 307, 308, 310, 329, 333, 342, 343, 356, 364; 简介, 483
- 萨摩藩, 16, 21, 26, 29, 30, 47, 49, 50, 53, 65, 68, 113, 114, 119, 130, 132, 136, 139, 141, 143, 144, 151, 153, 154, 167, 172, 193, 194, 195, 196, 197, 200, 201, 202, 204, 205, 206, 207, 208, 210, 211, 217, 219, 220, 223, 226, 229, 230,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2, 246, 251, 252, 256, 259, 269, 271, 276, 277, 279, 283, 286, 295, 297, 299, 301, 302, 303, 304, 308, 310, 311, 312, 313, 315, 321, 325, 326, 327, 332, 335, 336, 337, 340-354, 359, 360, 374, 377, 383, 384, 400
- 三吉慎藏, 236, 246, 247, 249, 290; 简介, 479
- 三菱, 84, 265, 298, 385
- 三条实美, 133, 142, 143, 145, 151, 212, 235, 236, 303, 313, 320, 351, 359, 369, 374; 简介, 482
- 三条实万, 77; 简介, 482
- 山口县, 209, 217, 236, 353
- 山内家族, 16, 30, 39, 359
- 丰策, 54
- 丰范, 83, 125, 126, 133, 134, 135, 141, 142, 145, 155, 216, 263, 383, 384, 385, 389; 简介, 485-486
- 丰熙, 50-52
- 丰资, 48, 55, 132, 159, 160; 简介, 486
- 容堂, 30, 54, 55, 57, 65, 68, 76-78, 80, 83-85, 96, 98, 100, 101, 109, 117, 118, 120, 121, 122, 125, 126, 128, 132, 134, 135, 138, 146, 147,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74, 177, 179, 182, 187, 188, 191,

- 193, 211, 214, 262, 263, 264, 266,
269, 287, 302, 309, 311-316, 319,
320, 324-328, 333, 335-340, 354,
355, 356, 361, 373, 374, 376, 379,
380-383, 389, 392, 396, 402; 简介,
486
- 一丰, 30, 34; 简介, 485
- 山崎闇斋, 42, 43; 简介, 481
- 山田马次郎, 84
- 山县有朋, 218, 258, 320; 简介, 485
- 上冈胆治, 148
- 神道教, 25, 028, 042, 046, 047, 052, 057,
061, 106, 115, 330, 389, 392, 401, 402,
421, 457
- 神山郡廉, 340
- 生麦事件, 141
- 生野之变, 153, 418, 419, 474
- 胜麟太郎(海舟), 71, 73, 74, 75, 157,
165, 166, 183, 200, 208, 220, 301, 352,
357, 375, 377; 简介, 476
- 石川清之助, 291
- 石田梅岩, 51
- 蕃书调所, 74, 75, 167, 168, 180
- 水户藩, 25, 48, 62, 64, 65, 66, 71, 94, 97,
98, 99, 100, 109, 110, 113, 114, 115,
116, 137, 154, 169, 213, 225, 289, 302,
303, 307, 315
- 水野忠邦, 22, 23, 24, 48, 50, 51
- 塞缪尔·斯迈尔斯, 403
- 寺村左膳, 321, 340, 346, 435
- 寺田屋, 128, 133, 140, 141, 173, 233, 243,
245, 246, 293, 365
- 松方正义, 383
- 松冈毅轩, 338; 简介, 478
- 松本弘庵, 275, 278; 简介, 478
- 松平春岳, 69, 70, 75, 78, 79, 80, 109, 138,
140, 141, 145, 150, 151, 155, 157, 158,
174, 177, 180, 181, 191, 192, 194, 210,
229, 254, 262, 301, 309, 311, 313, 314,
315, 317, 328, 336, 352, 360, 377, 381;
简介, 478
- 松平容保, 141, 150, 228, 253, 302; 简介,
478
- 松前崇广, 228
- 松山藩, 41, 382
- 太宰府, 209, 219, 227, 235, 239, 241, 260,
269, 270, 284, 290, 303, 313, 351, 369
- 藤田东湖, 25, 62, 81, 115
- 天保改革, 23, 24, 47-53, 60, 81, 132
- 天诛, 144, 152, 153, 374
- 田边藩, 331, 332
- 田所岛太郎, 181
- 田中光显, 112, 122, 163, 224, 260, 326,
366, 369, 383; 简介, 484
- 口真吉, 121, 123
- 土方久元, 143, 175, 212, 218, 236, 270;
简介, 473
- 土佐藩, 16, 21, 29; 收入, 30, 31; 行政,
30, 31; 武士等级, 33; “天保改革”,
50-53; 对佩里的反应, 77; 勤王党, 45,
47, 110, 120-123; 对第二次征讨长州
的反应, 229; 和萨摩结盟, 321-323;
在容堂和后藤主政下的变革, 260-269;
明治早期的改革, 385-391; 债务, 386;
众议所, 391; 维新, 396
- 王阳明, 203
- 尾张藩, 64, 229, 355, 356
- 文明开化, 380

- 文武馆, 84
- 圭多·沃贝克, 283, 298
- 沃尔什, 274
- 吾川郡, 51
- 五代友厚, 256, 257, 275, 276, 285, 286, 297, 299; 简介, 472
- 《五条誓文》, 266, 319, 357, 361, 382, 436, 442, 472, 476, 486
- 武市瑞山, 35, 43, 45, 94, 95, 99, 111, 113, 118, 119, 132, 147, 158, 162, 172, 186, 224, 281, 287, 324, 363, 374, 380, 395; 简介, 484
- 武藤早马, 283
- 夕颜丸, 283, 329
- 范·西博尔德, 71
- 西乡隆盛, 30, 193, 196, 201, 202, 213, 217, 224, 234, 279, 294, 296, 302, 307, 309, 311, 320, 321, 327, 342, 344, 345, 346, 389, 400; 简介, 482
- 《西洋事情》, 223, 271, 351, 378, 382
- 西周, 307
- 下关, 被炮击, 189, 191, 195, 199, 209, 210, 215, 216, 217, 274; 开港谈判, 220, 223; 战斗, 258, 259, 260
- 咸临丸, 74, 169
- 乡士, 34-46, 51, 56, 57, 60, 82, 86, 87, 88, 89, 90, 94, 95, 97, 100, 101, 107, 121-124, 128, 134, 145, 147, 152, 153, 155, 161, 163, 200, 211, 263, 265, 286, 337, 372, 373, 378, 388, 395-402
- 小八木五兵卫, 133, 143, 159, 263
- 小曾根英四郎, 286, 331, 397
- 小栗忠顺, 75, 195, 196, 220, 230, 280, 306, 341, 352, 379; 简介, 481
- 小笠原长行, 254, 255, 258, 302; 简介, 481
- 小笠原唯八, 265, 271, 290, 316; 简介, 481
- 小南五郎, 132, 476
- 小松带刀, 193, 197, 202, 236, 237, 251, 313, 314, 321, 345, 348, 353, 359; 简介, 476
- 孝明天皇, 124, 137, 151, 294, 302, 304, 305, 310, 311, 313, 314; 简介, 476
- 新井白石, 26
- 新选组, 150, 153, 365, 366
- 丰臣秀吉, 140, 201, 309
- 绪方洪庵, 26
- 岩仓具视, 69, 138, 142, 271, 294, 303, 304, 305, 308, 309, 311, 321, 335,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9, 364, 369, 378, 382; 简介, 475
- 岩崎弥太郎, 84, 264, 298, 299, 385; 简介, 475
- 岩下方平, 342, 475
- 广岛藩, 229, 256, 319, 335, 336, 346, 347, 348, 350, 353
- 广濑健太, 159, 160
- 广泽真臣, 352
- 野根山起义, 214-215
- 野中兼山, 35, 41, 43, 84
- 伊达宗城, 068, 210, 302, 309, 311, 312, 313; 简介, 472
- 伊吕波丸, 295, 296, 300, 316, 318
- 伊卡洛斯号, 326, 335, 337, 338, 340, 348
- 伊藤博文, 25, 218, 234, 275, 347; 简介, 475
- 伊藤仁斋, 42

- 伊藤助太夫, 286
 怡和洋行, 269, 275
 乙丑丸, 234, 252, 284
 议会制, 筹划, 180; “船中八策”对议会的构想, 318-322; 萨摩土佐协议中, 323; 容堂的建言书中, 339; 在萨摩最终计划中, 361; 在《五条誓文》中, 357
 樱岛丸, 252
 永井尚志, 306, 307, 336, 350, 352
 由利公正, 182, 330, 357, 360, 361, 363, 382
 栖崎将作, 80, 244
 有栖川亲王, 137, 138, 355
 玉松操, 351
 原市之进, 302, 315; 简介, 473
 泽村惣之丞, 112, 172
 泽宣嘉, 153
 朝鲜, 岩崎的计划, 299; 明治政府对朝政策, 389
 真边荣三郎, 321
 《政体书》, 382
 直木和泉, 154
 植木枝盛, 402
 志士, 125, 128-132; 定义和讨论, 105, ; 道德规范, 105-115; 在国内政治舞台上, 135-136; 行为, 148; 在三田尻, 213; 议论, 404;
 中滨万次郎, 81, 92, 269; 简介, 480
 中岛作太郎, 288
 中冈慎太郎, 2, 3, 9, 20, 28, 30, 37, 38, 43, 56, 97, 109, 121, 124, 147, 154, 156, 157, 159, 161, 200, 210-227, 235, 236, 238, 239, 240, 242, 251, 259, 260, 262, 269, 271-273, 290, 291, 294, 304, 312, 313, 316, 320, 321, 324-326, 350, 351, 358, 359, 364-371, 374-378, 380, 383, 388, 401; 简介, 480
 中根雪江, 254, 254, 421, 421
 中国, 24, 27, 28, 62, 67, 70, 74, 81, 169, 172, 176, 214, 223, 234, 275
 中江兆民, 298, 480
 中老, 33, 387
 中立社, 399
 中山忠光, 152
 中山忠能, 308, 351; 简介, 480
 中山左卫士, 270
 中御门经之, 351, 352
 忠勇队, 214, 215, 216, 217, 221
 周布政之助, 217; 简介, 484
 朱熹, 24, 27, 42, 106
 住谷寅之助, 99
 庄屋, 37, 44; 和乡士的关系, 45; 维新后的阶层, 388; 明治早期的利益纷争, 396, 397
 庄屋联盟, 123
 姊小路公知, 142, 143, 150, 155, 173, 174, 374, 378; 出使江户, 145; 被刺杀, 151; 和胜、坂本联系 180, 181; 简介, 471
 自由民权运动, 265, 298, 394, 398
 土佐足轻, 34
 尊王攘夷, 105, 136, 213, 278
 佐贺藩, 26, 65, 167
 佐久间象山, 63, 154, 156; 简介, 482
 佐幕派, 128, 130, 133, 136, 144, 258, 264, 271, 304, 307, 328, 365, 382
 佐藤信渊, 24, 41
 佐佐木高行, 54, 81, 82, 107, 108, 116-118,

121, 122, 124, 133, 163, 164, 243, 263,
266-268, 270, 271, 291, 312, 317, 321,

326-332, 337, 338, 348, 378, 383, 385,
392, 397, 399, 400; 简介, 483



坂本龙马首次提出“日本国”概念，其“船中八策”确立了近代日本国体的基本构架；他促成萨长两藩联合，并提出“大政奉还”口号，和平推翻了德川幕府几百年的统治；他仰慕西方科技，深怀民主思想，创建日本第一家股份公司，还自学法律与外国人对簿公堂。

然而，就在明治维新几个月前，坂本龙马于京都遇刺，一代天才流星般陨落。

百年之后，坂本龙马借历史小说和影视剧复活，声誉日上，尽人皆知。但是，这种小说与影视剧中的形象，与真实的坂本龙马一致吗？出生僻乡的低级武士如何成长为维新领袖？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詹森利用书信等一手资料，详细勾勒坂本龙马和中冈慎太郎的一生。真实的经历未必传奇，但依然令人振奋。

上架建议：世界史 传记

ISBN 978-7-5426-6630-7



9 787542 666307 >

定价：78.00 元